

编 选 说 明

我们早有编选这套选本的想法了。每个年度，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然而，时间的波涛不息，倘若不能及时筛选，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淹没的。观诸现今的出版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专题性的、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则甚为罕见。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现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决定与我部合作，由我部负责编选，由他们负责出版，向社会、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此举实属难能可贵。

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中篇小说选（分上、下两卷）、短篇小说选、报告文学选、散文选四种。适当的时候再增加诗歌选。每年一套，准备长期坚持下去。

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同时，我们坚持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的充分多样化，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

我们认为，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引导、推动作用

是非常重要的，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除了示范、引导价值，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资料文献价值、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我们也希望这套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雷达同志总负责，具体的分工是：

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

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

报告文学卷由李炳银同志负责

散文卷由韩小蕙同志负责

诗歌卷由韩作荣同志负责

中国作协创研部

1999 年 9 月

目 录

中国高考报告	何建明 (1)
追随智慧	凌志年 (121)
战争大趋势	陈歆耕 (258)
西部的倾诉	梅 洁 (340)
告别伐木时代	李青松 (397)
世界第一村	常 扬 (442)
昨夜西风凋碧树	徐光耀 (495)
附录一 点击 2000 年的报告文学	李炳银 (572)
附录二 2000 年中国报告文学参考选目	(575)

中国高考报告

何建明

A 章 备战黑 7 月

从 1977 年恢复高考到 2000 年，中国经历了 23 个高考的年头，当年在恢复高考中曾经因为作文好或者数学好而考上了北大、清华等最高学府的学子们，今天大多数已经成了社会各界的主力。现今他们的孩子也差不多进入了高考年龄或者已经考进了大学。23 年的岁月仿佛弹指一挥间，人们发现，同为高考，今天与昨天的情形则截然不同。当年，人们是多么期盼恢复高考，那些多年失去了上大学机会的学子们一听说可以参加高考了，就像黑暗中重新见到了太阳，就像枯萎的生命遇见了雨露。然而 20 多年过去了，当他们的孩子也开始考大学时，别说他们的孩子对高考感到害怕，这些当年在高考中出尽风头的佼佼者们也异常迷惘和紧张，甚至比自己当年进考场更加忐忑不安。

这是为什么？因为今天的高考竞争已经比 20 多年前的竞争要激烈几倍、甚至几十倍。首先是人数上的竞争。1977、1978 两年虽说共有 1160 万人参加高考，成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一次

大考，但实际上，如果用适龄青年的总人数来计算，真正可以参加高考的总人数应该超过一亿多人！但正是由于“文革”的特殊原因，使很多人在十年停考后一下重新恢复高考时，完全没有准备。许多人彻底放弃考大学的权力，他们没有走进考场，为那些走进考场的人让出了机会。而且当年的高考，难度远比现在简单。

“我们那个时候参加高考心里没有那么多压力，无非是谁考上了就能够重新走进学校读书。即使考不上，身边不是还有很多人嘛，他们没有进大学还照样有活干，有饭吃，说不定就在我上大学的那几年里，他混上了一个比你大学毕业出来分配的工作还好的岗位。这种情况至少延至 80 年代末。可在我们的孩子也走进高考的今天，情况完全变了：你考不上大学，就意味着有可能一生的贵贱从此确定，你将永远难以走进‘上层社会’，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你没有大学文凭便走不进红红火火的用人‘招聘市场’，而只能去清清淡淡甚至脏兮兮的‘劳务市场’。这两个市场实际上就是两种不同阶层的具体体现。还有一个情况是，那时我们参加高考虽然也下了不少苦功，但基本上是能蒙几分就是几分，很多人个别科目甚至交了白卷，但也进了大学门。现在行吗？肯定不行，我女儿第一次考了全市第二名，高出北大的录取分数线 20 多分却最后落得没有学校上——因为第一志愿的名额没挤上，另一所重点大学又不录第二志愿，这种情况在 20 年前怎么可能发生呢？所以说，同为高考，两代人经历的竞争背景完全不一样。”一位两代人都考入了北大的学生家长对我说。

从什么时候起，高考变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充满火药味？家长说不清，学生更说不清，惟独学校的老师能从他们一年又一年备战的“黑色 7 月”中感受和体味到。

中国的 7 月是高考的月份（虽然刚刚实行春季招生，但主

考期仍未变化)。把7月说成“黑色”，是因为如同战争一般的高考硝烟弥漫了每一年的高考日子，只有硝烟弥漫的战争才可能使晴朗的天空变成黑色，可见高考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何等沉重！

十二年寒窗，为了7月7、8、9三日的决战；

背诵和计算堆积如山的课本与参考资料，为的是跨越这高高的“龙门”；

哺育和操心的无数个日日夜夜，为的仍然是能让儿女或学生能在考场战而胜之。

7月，成了中国人每年必须经历的一场年度战争，但决定战争胜负的，又岂是考试的这三天？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一幕幕可以闻着火药味的“校园备战实况”——

抢生——兵马未动先出招

认为高考的胜败是在7月的7、8、9三天的考场上，那肯定只有傻瓜才这么想。我从南到北采访的十几所名牌中学，他们的高考录取率之高，不得不令人敬佩，几乎清一色在95%以上，就是说，他们的高中生中每一百个人里就可以有95个考上大学（包括大专），也就是说只要能进这样的学校，基本上就稳进大学了。名牌中学和重点中学，就是这样在人们心目中慢慢形成威信和树立形象的。

据我考察的结果表明，现在各地的那些所谓名牌中学和重点中学，最早时并没有人授予他们这样的荣誉，倒是因为高考之风把他们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变成了名扬四方的明星中学。在商品社会的今天，一切有名的东西都是含金量很高的，名演员可以获得高额出场费，名产品销售起来不用有人在一旁吆喝，名企业的无形资产听了就叫你吓一跳。名中学的牌子同样值钱，一个

“计划外”名额招生指标，三万五万随便可以进账。

名牌中学之名靠什么而来？当然不是与生俱来的，关键是那个诱人的高考录取率。

录取率靠什么而来？下大功夫，认认真真，努努力力，刻刻苦苦？名校长们都偷偷地笑了，他们悄悄告诉我：如果“中招”招来的都是笨学生，我再有名气也不可能把高考升学率和录取率提上去呀！那叫傻子，而傻子是永远干不出聪明活的，只有聪明人才能干出省事又不费力的聪明事。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所谓聪明事，就是在学生还远未进入高考阶段，便已经选好了高考苗子——想尽一切办法把成绩优秀的好学生招进自己的学校，剩下的事只要按部就班就得了。在北京，大家都知道四中是名校，从这儿考出去的学生不是北大就是清华，奥秘在哪？因为它每年可以从全北京招收最好的孩子入学，它打出的每年录取学生分数线比普通中学常常高出二三十分，比如1999年，他们的“中招”分明打着的是600分，而实际上真正600分的学生是很难进得了四中的，为什么？因为全市600分以上的孩子都想进这所“北大、清华的摇篮”，结果四中的招生名额有限，不是610分以上者只能望洋兴叹。“中招”五门课程考600分容易吗？对一般学生来说，这是近乎于登天的记录！所以凡能进四中的学生本来就是优秀中的优秀，人尖中的人尖子。

北京四中全国只有一所，而且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直接关心的学校，所以我们排除其它学校与它的可比性。各地、各市的名校之间的竞争就情况不同了，因为他们本来就都没有北京四中那样的特殊性，他们靠的是以各种“招术”来赢得社会和家长及优秀生“自投罗网”，并且挖空心思，不惜功夫。

某校教务处老韩告诉我，他们学校每年为了吸引优秀生到他

们学校来，有好几套手段哩：比如说他们教务处办公室的一位同志专门负责对外宣传和联络工作，定期请本市或者省报驻市的新闻记者到学校“联络感情”，其实就是请这些记者来为学校当吹鼓手；或者硬碰硬地投出几万到十几万元的宣传广告费，以此让社会明白他们学校是有实力的；再有一招就是每个教职员工分配拉生指标，每拉到一个市级三好学生奖励多少钱，每拉到十个过线（即超过学校录取分数线）者奖励多少等等，这样就可以确保生源的优化率达到多少多少了。

“费那么大力气合算吗？”

“当然合算。”老韩肯定地回答我，他从一个老教师的亲身体会中告诉我这样一个规律：一般好生与差生区别，集中反映在学习的注意力上。优秀生或成绩好的学生，他对学习往往有浓厚的兴趣，俗话说能坐得住，不用老师费口舌就能自己管住自己。差生除了个别先天智力因素外，大部分是学习的注意力不集中，坐不住，你怎么管他也达不到自觉学习的那种效果。还有一点差异是，好学生一般通常有极高的竞争意识，眼睛总是盯着更高的目标，差生就不一样了，缺乏竞争意识，随大流，你用鞭子在后面抽着赶着，也未必起作用。有经验的教师所做的总结证明，在同等条件下，一个老师要把一个基础差的学生培养成优秀学生，所花的时间和精力等于教三至五个基础好的学生。这一比例说明，同样一所学校，生源的优劣可以影响学校至少三至五倍的教育效率，其实这还仅仅是一般规律而已，如果把优劣生内在的个人因素一起放进去，这一比例将会更加增大。

老韩向我掏心窝子说：“你想，当老师的再有责任心，可学生总不是自己的孩子，他可能给你‘全心全意’吗？这就形成了谁都愿意教好学生，因为越是好学生教起来越省事，越省事教起来就越有情绪和兴趣，这样就越能教得好，越能出成果。教差

生就完全相反了，你烦都烦死了，一天到晚尽是些费不完的口舌，再好性子的人都会急，到头来你还啥成绩都没有。所以我们给老师下指标，用奖励手段来鼓励大家去争取好生源，大家都能理解，也都能积极想法子，因为谁都知道，与其等以后让我去教一个差生班，还不如我现在就下下功夫争取一班好生来呢！”

竞争就这么白热化地展开了。只要我们到每年的“中招”会场看一看，你就会感觉到抢生源的火药味。然而这仅仅是表面文章，那些“看不见的战线”上的抢生竞争就更加白热化。某校一个初二学生得了省数学比赛冠军回到学校后，即刻就受到市高中重点学校的领导登门接见，校领导当场向学生家长表示：在孩子上高中时，他们免考招他入学。家长和孩子听了自然非常高兴。这事被另一所高中学校的校长知道了，他们也想把这个省数学冠军抢到自己学校。他们听说这孩子还想在语文方面下点功夫，于是就派出一名优秀语文教师免费为这孩子当家庭辅导老师。一年以后，当那个承诺免考让孩子上高中的校长来给孩子办入学手续时，家长告诉他说孩子已经考进了某某中学，即被那个免费派家庭语文辅导老师的学校招走了。那校长对天长叹一声道：完了，我失掉的何止是一个好生，至少是 10 个、20 个呀！果然，那个把“省数学冠军”抢走的学校，立即借“省数学冠军考我校”的新闻广为宣传，这“名人”效应即刻产生效果，家长们互相之间都在传：你看人家省数学冠军都考某某学校了，我们还傻挑什么呀！于是哗啦一下都涌向了这所学校……哈哈，这所“抢得一头凤，引来万头凰”的学校的老师、校长们，高兴得不亦乐乎，因为这一仗不仅影响本年度招生业绩，对以后几年的招生都将起到极富惯性的连带作用。

几乎每个学校的老师们现在都知道，想要在“黑色 7 月”打个漂亮仗，必须在兵马未动的招生时就先下手，且要下狠手！

至于抢生源在校长心目中所居的位置更是别人所无法感受到的。现已离职的某校老校长老王跟我谈了他的切身经历，听后让人觉得别有一番滋味——

老王原来在市一中当校长。而一中、二在某市都是当地百姓心目中名声显赫的学校。一中相对历史要长些，所以在人们心目中称得上“老大”，且有“省级重点中学”的牌子在那儿。王校长原先是在教育局当副局长，从教育局调到一中任校长时，有人说他不走运，因为论资格、论在局里的年头也该坐上局长的宝座了，可偏偏调整班子时，让另一个部门的一位不是搞教育出身的年轻人占据了正局长的位置。这回他真生气了，向市领导提出宁可到下面的学校教书，也不想在教育局呆了。市里一研究，说行吧，“照顾情绪”，也为了能让新局长工作顺手，于是一纸调令将老王调到了一中当校长，同时还保留副局长的虚职。说老王不走运的人，是看了上面的这些情况才这么说的。

老王心里有数，教育局在市里和百姓心目中算个啥？尤其是像他原来当个副科级的副职局长，更是“小萝卜头”一个，谁把他当回事？教育局的大政方针都是上面指示、市委拍板、局长执行的，官道上那么清流一辙的事，有啥可图？校长可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名校校长。老百姓说得形象：市长省长再大的官，我们挨不着他也不买他的账；老师校长虽说不是官，可哪家没有个“小皇帝”？老师校长专管咱家的“小皇帝”，所以老师校长是“皇上的皇上”，谁见了都得磕头见笑脸。

到一中就任后，老王不是没有压力，这个压力来自于周边地市，也就是说兄弟市县的中学间的相互竞争。压力归压力，可毕竟老王的一中是个老校，建校历史近百年，光上《中国名人录》的大科学家和著名人物就有一大串。这么一年下来，老王也是仅在熟悉的过程中走完了一年的工作时间。8月份高考结束，一中

的高考升学率再次创高，排在了省里的前三名，又比过去名列五六位的排名往前迈出了重要的几步。市里百姓特别是那些考上大学的家长们纷纷向市委、市政府反映，要求给一中“记功”。在市新一届人大会议上，一位孙子当年考上北大的人大副主任提议，应该“给本市教育工作作出杰出贡献”的一中留个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的名额。这个建议立即得到相当一批子女在一中读书或者是子女已从一中毕业的人大常委们的一致赞同。一中的代表名额下来后，自然理所当然地落在了校长老王身上。干了几十年机关公务的老王，第一次坐到了决定全市政治命运的权力机构的主席台上，此情此景，他蓦然有种升天的感觉。

然而对王校长来说，这种“升天的感觉”仅仅是开始。市级人大刚开完，省人大代表的选举又紧接着进行，老王在差额选举中得票甚至比几个人大副主任还高。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省人大代表大会开完，全省先进教育工作者的会议又按期召开。不用说，高考率名列全省第三的县级市代表中，老王是最硬气的一个，因为高考升学率的前两名是省城的两所名校，老王的学校虽屈居在他们之后，其实含金量绝对不亚于前面两校，这一点省教委的头头多次在老王的面前这么说过。老王当然爱听这些话，说白了——这是一个显示一中和他老王本人在与别人相比中的分量和资格的问题。

从省城几个会议回来，老王便从过去极少被市长、市委书记接见的“副科级”，一下成了市长、市委书记亲自上学校来看望的红人。市里不管什么会，只要一谈起改革成就，领导们就会把一中，把他老王抬出来。老王从此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名人，在百姓的心目中实际威望不亚于市长、书记。特别是新一年招生时，老王提出一中在前一年高考升学率达 95% 的基础上再上两个百分点，达 97% 的目标和再扩大招生 100 名的“新举措”，几

乎使全市百姓都为之欢呼。

“一中”和“王校长”简直成了大伙心目中最向往的地方和最了不起的人物。老王曾在邻近的一个朋友那儿听说这样一则“民间故事”：有位农民到市里办事，一进城就迷路了，见了红绿灯也不知是走还是停。天黑了，想找的地方还没找到，便想找家旅馆住下。可旅馆要他的身份证，他说我哪有身份证？旅馆说你没有身份证是不能住的。那老乡想了半天就说我认识城里一个人，你们不信可以问他。于是人家就问他你认识谁呀？他便把王校长的名字说了，并添油加醋地说了句：“王校长跟我是亲表哥哩！”旅馆的老板一听是“王校长的表哥”，二话没说，顿时像见了亲娘舅似的为他开了个“高间”。那老乡舒舒服服睡了一夜后，第二天有些紧张地走到账台——他忐忑不安地想这回一圈猪崽的钱泡汤了。谁知旅馆的老板不仅没收他一分钱，而且笑嘻嘻地送给他三条香烟四瓶酒，还全是高级的。这位老乡弄不懂咋回事？那店老板悄悄对他说：我儿子就在一中念书，今年进校时，想给你“表哥”意思意思，可你“表哥”说什么也不要。这不，你跟王校长是一家人，我们想表的一份心意也有人收了不是？头回进城的这位老乡，哪想到一提“王校长是我的表哥”就得了这么多好处，于是回村后对老哥老嫂们说：城里就是好，你只要说是王校长的亲戚，啥事都能办。

“听说你现在的亲戚多了去了？！”这位朋友讲完“传说”，便问老王本人是否真有此事？

老王对“民间传说”没有否认，只是笑着说了句：麻烦也找了不少。其实老王心里是高兴的，至少从这种“传说”中可以看出他王校长在市民中的声望。

好笑的事还有。市里要分一批福利房给教师，这消息传出后立马有几家房地产公司老板主动找到老王，说王校长您的房子包

在我身上，白白送您一套咱们不敢干，那样会让人说是贿赂您，但好的地段、面积大小、朝向好坏，还有装修方面，您只要一句话，我们全给您办了。老王有两儿一女，也快到结婚的年龄了，当教育局副局长多少年也没有解决过一次房子，这回理应可以考虑，但因为看到学校几位老教师家里困难更大些，老王就把公房的指标给了人家。房地产商们并不知道老王想的心思，还以为王校长没看中送上门的优厚礼物。于是相互之间打听到底是谁的“礼”更让王校长笑纳，暗地比着为王校长献礼。大家都知道，谁能“打通”王校长的关系，谁就等于有了比金山银山更坚实丰厚的财富——这就是自己的子女可以安安稳稳地进市一中、上大学。“咱这辈子谁英雄谁好汉，已经是明摆着的了，后一代谁英雄谁好汉才是家族兴衰的根基。”百姓都认这个理，所以能在王校长面前烧炷香、念个经是最最重要的事。但后来王校长没有为自己要房，使得这次“送礼”竞赛也悄然隐退了。

老王在一中的校长位置坐到第三个年头时，教育局的那位年轻一把手被上面调走了。这时市委征求老王的意见，看他愿不愿意接第一把交椅。老王是聪明人，且又有一中校长的这几年“升天的感觉”，所以他连连摇头说“能力有限能力有限”，给谢绝了。正是这一“谢绝”，使百姓对一中王校长的为人更加敬佩三分。

年过半百的老王，此时人气如日中天。

然而月有阴晴圆缺。

在老王上任一中校长的第四年时，这一年的一中高考率首次出现跌势，且跌幅达三个百分点。而同在一个市的市二中却出现了奇迹——与“老大哥”一中同为94%的高考升学率。

这一年，当地新闻媒体的镜头都对准了二中校长。

高考前，老王正随人大代表团在国外考察，回来得知此讯后

暗暗吃了一惊。不过已经坐在“省级先进”头把交椅上的老王自己对自己宽宽心道：偶尔一失，不足为奇。

他照样做他们一中该做的工作，但是下面的老师们向他反映：二中今年招新生采取了新招，把不少好的生源抢走了。

老王听了有些不以为然：我们一中是全市百姓心目中的“王牌中学”，谁想歪招也别想挤掉我们。

在老王根本没有把二中当作自己对手的第二年，二中高考升学率又一次与一中拉平。

“既然是平，就不能说我们输给了人家呀！你们没有看到我们学校今年又拿到了全省素质教育先进单位的金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输了吗？再说，我们都是搞教育出身的，不能只盯在学生的高考升学率上，那样会使我们的应试教育越搞越严重，最终把培养人的教育工作引入不正确的路上，损害的是一代人或者可能是几代人的民族素质呀！”老王在年度高考总结会上对下面议论纷纷的教职员工这么说。他的话让相当一部分人频频点头，但也有一部分老师并不买他的账，提出要离开一中，到二中去。

老王火了：想走的就证明他对一中没有了责任感，让他们走吧，即使是骨干！

于是前后有五名年轻的骨干教师从一中调到了二中。

这一年二中为了抢到全市优秀生，便又出了个新招：他们与某国教育机构联合，在学校开设了个“国际班”，进行中、英语教学。这使又一批本想报一中的好生又到了他们那儿去了……

“简直是招摇撞骗！”老王听说后生气极了，把问题反映到市委。书记听后笑笑，说中国的旧教育模式也该改革改革了，双语教育那么多人喜欢，证明有它的市场，探探路没有什么错嘛。

老王第一次听书记这么不把他的意见放在眼里，心头不由一

阵打颤：怎么，真的自己不如人家了？

可不是，这一年高考再度明朗后，二中的升学率和文理状元都超过一中，第一次取代了一中，并一跃成为全市、全省教育先进单位。在百姓中间，一中不行了，送孩子上二中才能考好大学的意识普遍流行。随之而来的是生源和钱源像回潮的江水一般，全都倒流到了二中那头……

“校长，今年修校舍的钱都不够用了，是不是把那辆新奥迪换成桑塔那吧？”行政办公室主任轻轻地走进校长办公室请示。

老王气不打一处来：换！换掉！马上去办。

这一天，老王到市人大开新一届代表大会，路上一辆崭新的奥迪在他前面戛然而止，对方的车窗里探出一张颇为得意的笑脸向他打招呼：王校长呀！走，我们一起走吧。原来，那新奥迪里坐的是二中校长。

老王的脸抽动了几下，佯作笑容地向对方挥挥手，说我还要办点事，你先行吧。

这一届的人大选举上，二中的校长当上了人大常委，一中校长的老王落选了。会议还没有开完，老王就请假回了校。

人大会议结束时，便是春节。往年的春节，老王家的门槛简直要被人踏破，他收到的参加各种活动的请柬和贺年卡能装满麻袋，然而这一年，老王只接待了不足十来个探访者和二十来张贺年卡。

真是世态炎凉呀！当外面的锣鼓和鞭炮齐鸣时，老王独自在家里叹道。他抚摸着—叠曾经闪闪发光的奖章与奖状，又看看当年一中新生摸底测试的成绩单，沉思许久后，拿起笔和纸，给市委领导写了一份辞职申请……

两个月后，老王的请求得到了批准，被安排在政协教科文办公室当主任。在一中新老校长交接大会上，一中校长握着拳头对

全校师生说：什么都是空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把学校的高考升学率放在头等重要的位子上开展工作。老王一听，有些吃惊地看了看自己的后任，他想说些什么，可又说不出话来。

是啊，不把升学率提高上去，还有什么资格当校长？老王长叹一声，永远地离开了他心爱的教育战线。

春节到来之际，接老王班的新校长拎着几盒点心来看望老校长，并借机讨教些经验。老王长叹一声，说：我们本来就比二中强，问题出在生源的基础上，一句话，你想赶过二中，重振咱们一中的威望，就得想方设法把好生源抢到手，否则再费劲也是白搭。

新校长再问老校长：那么抢生源到底要使什么招？

老王说：什么招？凡是你可以把好生源抓到手的招都可以使。

新校长年轻，脑子反应快，便说：那我就从今年开始，跟各初中班的学校开始议定“合作联助班”事宜，你看行不行？

老王不解：什么叫“合作联助班”？

新校长说：就是从孩子上初中起，我们就以一中名义跟这些初中班结成合作伙伴，共同办好初中三年教学，之后凡初中出现的好生优秀生他就得给我送到咱一中来！

老王一听，拍案叫绝：这招好！家长和初中校都会欢迎的。

新校长站起身说：那我回去就这么干了。

于是，某市高考的抢生竞争便又向纵深处发展了一大步，初中阶段的孩子和家长们，已经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高考“黑色7月”的硝烟开始向他们飘来……

赶时——决胜关键是两招

啥叫赶时？当然是赶时间呗。赶时间又有什么奥妙？奥妙太

大了，大到你外行人根本想都想不到。

我在走访过的所有高中毕业班发现了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那就是进入高三毕业班后，差不多所有学校全都没了新课程。这怎么可能？按教学大纲规定，高三的课程是高考的重点之重点内容呀？高三不教课，高考能取胜？

对头，高三不教课，高考才能获大胜。在一次教育工作现场会议上，四川省代表、川西某校高中教研组组长王伟谈了他积累多年的“经验”。他说他们最早也一直按教学大纲规定，在高三时照例上高三的课，等到高考前两三个月才开始集中学生进行考前复习，但后来发现怎么弄就是感到紧张，要在两三个月内把高考所涉及的内容从头复习下来，学生感到紧张，老师也觉得难以完成。于是学校就决定在高三阶段的上一学期必须把一年的课全部教完，毕业班在来年春节后一开学就全面进入总复习，这个效果明显好于往年。但要把三年的高中课程压缩成两年半教完，就得在高二后一个学期进入高三课程。后来他们还是觉得学校怎么抓，就是抓不过附近某县中的高考录取率。论师资、论教学能力，王伟说他们学校一点也不比邻县中学差，到底问题出在哪里？王伟便派人暗暗探访——必须是暗暗地探访，否则人家知道竞争对手来了，为隐蔽真相，会让你一无所获地归。王伟说他是假借看望大学时的老同学为名，才获得准确信息：原来人家绝招就出在高三的学期里根本不上新课程，全部进入整年制的大复习，用一年的时间投入高考的准备，以此来赢得大考全胜！三年的课程要用两年来教完，不是原教学大纲有问题，就是学校出了邪招。王伟回去对自己的校长一说，当了大半辈子中学毕业班老师的校长怎么也想不通。毕业班班主任会议上，校长把皮球踢给了大家：你们看，我们是按照教学大纲走，还是按照兄弟县中的路子走？多数老师说，这是明摆着的事，教学大纲就像国家的宪

法，不照它做就是违法，就是大逆不道。可一些年轻老师不同意这种看法，说现在是商品社会，什么都看效益，教育同样要看效益，一个高中学校，如果不把高考录取率搞上去，说什么都是空话，别说我们等于辛辛苦苦白干，校长面子过不去，学校的知名度也永远上不去。高中三年课程是两年上完还是三年上完不是根本问题，根本的问题是高考录取率是不是第一位的，不把录取率搞上去，我们学校就会失去生源，最后大家的饭碗便会砸了。讨论异常激烈，三天下来，意见统一了，多数人服从了少数人，王伟的学校也决定从新一届高中生开始，从入学第一天抓起，每天多设置一个课时，每周多安排半天至一天的教学时间，高三开始，星期六、星期天不放假，全天候上课。“对学生和家长讲明白了：谁不参加加时课程的学习可以，但高考能不能考出好成绩，我们学校概不负责。”校长最后拍板，老师们就像面临世界大战一般，一个班一个班地动员，一个家长会接着一个家长会，口径统一：这是为了大家，为了你们有好的高考成绩，为了你们孩子有前程，所以必须校方、学生和家长一起努力。

是否这样有违教育部的相关规定？教育部好像不止一次规定非毕业班不准随便增加课时，我便请教王伟老师。

是有规定，但有几个学校是按规定办事的？除非你们北京的中学，因为离教育部太近了，不敢违规。哪家高中学校不是我行我素？王伟老师说，事实上按照教学大纲的课程安排，高三的学生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进行高考复习。现在高考的分数竞争已经激烈到每争取到一分就可能决定考生一生的命运的程度，不靠全力拼搏，不靠比别人多出十倍、百倍的努力，怎么可能出好成绩？

神州大地高考滚滚烽烟，就是在这一天天天的抢课时中变得愈加火烧火燎。高考就像一列失去控制的火车，越走越快，到最后

谁也无力牵制，带着积聚多年的巨大惯性，向广大学子隆隆压去，于是给广大的考生留下一片片应接不暇的惊恐与无谓的挣扎……中国的高考紧张气氛几乎就是这样形成的，不是在高三，也不是在高二，而大多是从高一入学的第一天起便已经开始了！

某市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刚刚经历了“中考”战火的一批学生进入市重点高中后，以为可以彻底松弛一下，家长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是在开学的第二个星期，学校就宣布：从下星期起，周六不再放假，改为全天候上课，星期天上午是“特色班”辅导，下午是加强班开课时间，各班同学注意，凡是成绩突出的可以参加“特色班”，成绩差的必须到“加强班”补课。高一生们一听就叫起来了：还让不让我们活呀？老师连头都不回地说了声：要活就得按上面说的去做，否则谁也救不了你们。学生们回家跟自己的家长一说，家长们都很吃惊，但对学校这样的安排只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沉默，有的甚至表面上与孩子一起在家“义愤填膺”，可心里则偷着乐——就得这么抓，否则大学怎么考？同学们没有得到家长的实心同情，于是有“领袖”主动出来写信给市教委控诉学校的做法。教委后来把信转到了学校，学校拿到转过来的告状信，执行得也非常坚决：凡参与写信的同学完全可以不参加“特色班”和“加强班”。“哇——我们胜利啦！”孩子们好不兴奋，因为他们的斗争赢得了胜利。但这些同学很快发现，由于不参加周六、周日的课程，他们再也无法在平时的课堂上与其他同学同步学习了，因为老师讲的课已经远远走在了前头。尝到苦头的学生回头再想挤进周六、周日的班时，学校说：可以，但必须每人写出检查并加倍交补课费。到了下一周，参与写告状信的孩子一个个被家长押着走进校长办公室，垂头丧气地拿着补课费和检讨书站在那儿，逐个当众悔过。打那时起，这个学校的周六、周日班再也没有人敢提出异议，一直开到现在。学

生和家长普遍反映：如果不是学校周六、周日班开课，家长肯定要多费不少心，说不定高考就拉下一大截。

刚刚过去的 2000 年春节前，国家教委为了给中小學生“减压”，发了个“紧急通知”，内容要求全国各地在寒假时不得随意开设各种“辅导班”。这应该是个好消息，但效果并不明显，因为家长们一下急坏了，孩子在家干啥？整天看电视？一年一度的高考、中考春节一过就又“硝烟四起”，考不好谁管？教委管吗？不管。肯定不管嘛，它哪管得到千家万户？所以说还得有辅导，于是一时间全国各地的教师成了今春寒假最抢手的一族。以北京为例，所有中学教师几乎被“订销”一空，而且稍稍有点名气的名牌中学教师的家教费涨到每小时 80 至 100 元，就是这样的高价，依旧忙不过来。某中学的一位物理教师告诉我，他从 1 月 20 日正式放假开始，每天安排的家教时间多达九个小时，春节的几天里也只有大年初一那天没有学生来上课。他说在放假的近一个月里，所挣的家教费相当于他半年的工资，日均收入在 600 元以上。面对如此火爆的意外收入，这位教师不亦乐乎。我走访了几个京城外的中学高中班，他们多数是在春节后其他行业的职工上班时，也都开始了全日制的“补习”。这种名为补习、实为开学的上班的目的，仍然只有一个：那就是赶教新课，抓紧高考前的点滴时间，备战黑 7 月！

赶课赶时，其实早已成为中国高中教育阶段的普遍现象。学校的反映是：我们也不想这么干，但高考压力实在太太，学校不为应届生争取更多的复习时间，就难以保证考生成绩。家长基本全部支持。理由是：学校有经验。老师知道应该用多少时间先学完高中课程，再用多少时间进行复习，以对付高考。只有学生感到太苦太累，因为三年的课程要在两年完成，等于每一天 24 小时必须干完 36 小时的事。这么一赶，全中国的學生，全中国的

老师和全中国的家长，便一下子全都感到有做不完的题，干不完的“加班”。于是，备战高考的火焰越燃越烈，直到举国上下都觉得烫手烫脚……

分班又分流——对不起你的绝招

也许，中国是由于人太多的缘故，一旦有什么大的事需要处置时，总会将人分为一二三类，三六九等。你看，进行阶级斗争的时候，把人分为地富反坏右；搞政治斗争的时候，又有左派、右派、中间派一说；搞国企改革时，便出现了编内编外、分流下岗等等，总之人太多太杂，使得按胖瘦高矮，划出个优劣好坏，似乎这样方能循规蹈矩地推进某些事件的历史进程。这些本来都是属于科学管理的有效手段之一，但统统什么事都这么分来分去，可就要坏菜了。

高考的事太多，能否考上大学和升学率高与低，对考生和学校来说都是成败在此一举。将应届学生分类，也就成了备战大考的必要手段。于是最热闹的一招，莫过于考前的分班与分流之战。

按理，学生从来都有好差之分，即使在同样的环境下也有好学与不好学之别，尤其是大学的专业几百近千种，文理科之分在所难免。但问题偏偏出在这必须分的过程中，常常因分班分流而发生学生与老师、老师与老师、老师与学校、学校与家长、家长与老师和学生与家长之间的种种激战。

在恢复高考的前几年里，高中阶段没有分班分流一说，那时到高三下学期才为了便于报考上大学的志愿，要求学生有重点地进行文理侧重复习。但到了 8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高考压力的逐年加大，分班已成为趋势。从人才培养角度考虑，进行“专业性”的文理分班无可非议，尤其是中国的教育从小学到高中

的十二年课程里，一直采用的是灌输式教育，很少能发掘个人智力潜能，因此有专家认为在高考前一两年，应该实行必要的文理分班。起初的分班根据上述理由，但现在的情况完全是另一种分班，即各学校为了取得高考录取率而将同学科的学生们以成绩好、中、差来进行高考前的大分档。成绩好的第一档被编入 A 班，学生均是学校和老师认为有可能取得高考好成绩的，这是老师和学校内定的必保生，他们是决定学校年度高考录取率的“主力部队”；第二档是那些成绩中游水平，推一下可能考得上大学的“二梯队”学生，他们被编入 B 班；第三档是完全没有可能考上大学的差生，被编入 C 班。也许除了一些在国家教委挂上名的全国著名中学外，几乎所有的中学都这么做，有些分得还要细一些，如 A、B、C、D 班，或者叫法不同而已，但分班的实质完全一样。

“不分班不行啊。你想，学生总是有优良差之分，而高考又是一道死死的门槛，小学和初中，好生和差生同在一个班级大家不会有太多意见，可到了高考时学生和家长们便不干了，老师也不会干的。比如一个班本来有三分之一的同学有希望考上大学，但就因为班上有几个差生总是拖后腿，课不能往前赶，必然会影响好学生的进步。所以一到高二，学校就顶不住来自家长们的压力了。有一年我们分班稍晚了一些，成绩好的那些家长就联合起来把校长整整围了一天，要求他必须答应分班，家长说否则孩子考不上大学就拿他是问。有的说得很激烈呀，说你学校要是耽误了孩子考大学的前程，我就把你学校和你校长的家全砸了。你以为家长们说说就是了？想错了，他们真能干得出来的！有一年一个学校就自以为顶住了‘分班风’，结果有两位成绩不错的孩子没有考上大学，学生后来对自己的家长说，全是因为班上有几位差生拖了他们的后腿，家长一听火了，把班主任和学校校长打得

屎尿拉了一身。被打的班主任和校长把打人的家长给告了。处理此事的法院院长的孩子，前两年也吃了没分班的苦头而在高考时没考上重点大学，人家法院院长明确告诉那被打的班主任和校长：你们这是活该！瞧瞧，你不分班试试？分班，那些成绩好的学生和家长当然高兴了。其实学校也是极愿意分的，因为利于教学，同时还能确保高考的升学率。可是哪那么容易分呀！那些被分到 C 班的差生们感到自己是被学校划入‘下等公民’，干脆不好好学习了，成天捣乱不说，弄不好反过来会让学校下不了台。那年我们学校就出现了一个分到 C 班的学生后来在高考时考了全校当年高考分数的第三名，这位学生在拿到大学入学通知书后，与家长一起抬了一桶粪跑到原来的班主任家‘感谢’，说是有意要臭臭那有眼无珠的老师。你说这老师冤不冤？这老师后来一个学期没有好好上班，精神受了刺激。问题最难处理的是那些被分到 B 班的学生，对他们有时很难界定。我就碰到一个家长很难缠地问我，凭什么把他的孩子分到了 B 班？我说是根据学校规定的三次摸底考试成绩多少多少这么分的，那家长提出你能保证那些所谓好成绩的学生中，就没有人是靠作弊而“成功”的吗？我说那谁也不说不准。他说这就对了，你教师既然这都不准，你就更没有权利用三次简单的摸底考试来把我家的孩子分到 B 班去。最后我只好投降，说你只要能在年级教研组长那里说得通，我就让你孩子归位到 A 班，后来他真的做到了，可那孩子到了 A 班不出三个月就自动要求退到了 B 班，因为他觉得 A 班进度太快，听了课仍等于没学。所以说高考前的分班是最热闹的，也是最难弄的事，但每个学校又必须这么干。不干谁都不能安宁。你校长不想分，要是当年全校高考录取率下降了，你校长日子就不好过；老师也愿意分班，不分班家长天天跟你磨，弄不好脑袋上给人砸个包出来。当然分了班也会不小心被人在你家里

放把火。你作家可不要笑，真有这样的事啊。我们邻近的一个县的一所中学，就因为有个老师在分班时得罪了某学生，高考结束后，这老师在乡下的两间房子突然起火，好在村上的人抢救及时才避免了大灾。事后有人说，看到是那个落榜生所为，但谁也没有证据，再说那学生后来到南方打工去了，几年不回，被害的老师有苦难言……”现在也在北京当文化“高级打工仔”的王先生，有声有色地给我讲了他过去在宁夏县级中学当中学老师时的亲身经历，高考前的分班所带来的阵阵惊涛骇浪把我深深震动了。

不能不承认分班教学的优点，它可以让那些比较有把握的学生接受更良好的教育，并向更高的目标努力；它也可以使那些本来有些吃力但在方法得当时又能迅速赶上的学生，获得上大学的可能；而对那些本来离高考录取分数线就有较大距离的学生来说，也可免受备战之苦，踏踏实实坐下来学些真知识。然而分班备战高考，客观上使学生们在还未进入高考的决战时，就开始经历一场心理考验，有人因此得意，又常常发展到忘形的地步。有位家长颇有切肤之感地对我谈起他的在一所名牌学校 A 班的儿子的变迁过程：他的儿子原来在班里是前十名水平，分班时进入 A 班，那小孩子高兴得一下子从家长那儿获得了 2000 块的“奖励”——这是他老爸早先许诺的。在 2000 块钱拿到手进入 A 班后，他不是更加努力了，而是因为听了老师的一句“A 班就是大学的预科班”，以为自己进了 A 班就可以稳拿大学录取通知书了。不出一年，这位学生由于对自己要求不严，成绩跟不上，被逐出 A 班，降到 B 班。这下子他受不了了，在学校里受到同学们的白眼嘲讽，回到家又被老子狠狠地揍了一顿。在如此几方面的压力下，这学生从此开始厌学，最后又降到了 C 班，成了彻底的差生，高考自然没有他的戏可唱。他父亲想为他再出钱弄个

社会大学上上，但儿子说什么也不愿意，现在就只能在一家装饰公司做苦力活。

这位家长还不是最倒霉的，上海某中学学生张雯的家长更心酸。他们的“千金”张雯在前九年义务制教育时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是同学、教师心目中的宠儿。可到了高中后成绩下降了，老师和她父母都着急，张雯自己更着急，为把成绩突击上去，她真的几乎达到了“头悬梁、锥刺股”的程度，但日久天长，身体跟不上了，记忆力也差了，在高二时她被无情地分到差班。分班名单公布的第二天，张雯没有来上课，她给父母留下一张字条后，在家中割脉自杀了。她在遗书上对父母说：“……女儿实在无颜面对你们，无颜面对老师和同学，也无颜面对自己。既然无法抬起头做人，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像张雯这样被高考备战时的分班所击倒的何止一个两个！东北某市 1997 年 10 月就发生过一起七名女中学生集体出走的事件。她们在留给学校和家长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说：“是分班的残酷现实使我们不得不远离屈辱之地……”可见，不得不进行的分班教学，是高考前很多学生必须面临的一次近似残酷的考验。

分班带来的战火并不仅仅烧在学生身上，教师之间也常常因此而烽烟不断。

某校刘、王两位女老师原来是少有的好姐妹，她们是同一所师范大学同班同学，又一同分到了同一所中学且同带一个高中班。本来两人你有事我就帮你代课，我有事叫你一声绝不会说“不”字。但进入高二时，刘老师被学校安排教了 A 班，而王老师则安排到了 C 班任课，这种差异让王老师无法接受，她怎么也思忖不过来，而且越想越觉得自己一定被“姐姐”刘某算计了，因为她知道校长对刘有好感，于是王百思不解，最后认定肯定是刘为了达到能任教 A 班而不惜为校长“献身”，结果把她作

了垫底。王越想越无法忍受这等耻辱，尤其让她气不打一处来的是，每当上课铃声响后，刘某还总是笑嘻嘻地朝她打招呼，而且比平时更加亲热。“假惺惺的，少来这一套！”王心里骂得咬牙切齿。差生本来就叫人头痛，王心里不舒畅，再加上班里学生老出乱子，校长不时在大会上批评她，对教 A 班的刘某则大加赞美，这使得王更加认定：刘出卖了她，刘与校长有见不得人的事。王如此忍气吞声地带完了高考前的 C 班教学，高考下来，她的班全军覆没，刘的 A 班则大出风头，有个学生还考了市第一名。不用说，王与刘两人在学校里彻底地成了优差两类教师的代表，刘成了全校的红人，而王则自我感觉正是由于刘的大红大紫，才使校长把她打入“冷宫”。一气之下，王用一夜功夫，写下了 30 封状告刘某与校长通奸的诬陷信，并发到市委、教育局、报社等几十个单位。这事闹大了，监察部门派人一调查，纯属诬陷，王因此被开除出校。当她离开学校时，已经原谅了她的刘老师前来为她送行，王搂住刘泣不成声地忏悔……

王走了，但学校新一年的分班工作又开始了，校长说得非常明确：不这么做，谁也确保不了学校的高考率，与其让一些人感到难受，不如让更多人在考上大学和考上重点大学后好受。

校长还说，我们仅仅只是分班，要是搞分流那才真叫见招。

什么是分流？分流就是把一些根据平时学习成绩，加上参照每年高考的录取分数线进行测定，把那些似乎没有希望考上大学的学生分流出校，这样做往好听里说也是为了学生未来的前途考虑——有时智力和能力差的确实有，让他们免受高考之苦，明知龙门跳不过，就赶快抓紧时机另找出路，如考职高呀，念私立学校呀，再在别的学校蹲班复读呀，总之你得离开本校，另谋出路。

分流从什么时候开始的？1995 年时，国家教委曾发过通知，

针对那些很难考上大学的学生，学校可以将其在高考前分流“出局”。这个通知精神当然有它的积极意义，首先是发通知之前，教育主管部门没有对分流一事有过任何态度，但分流在各地的学校中已成事实；第二是分流确实能减少高考对全民的压力，使学生、家庭和学校三方面都避免不必要的浪费。然而，分流本来就存在很多人为因素，加上不少学校借此作为手中的一根权衡自身利益、调节高考升学率的魔术棒，分流便成了备战高考的一场非常残酷的“战争预演”。另外，当时教委下发的允许采取分流的通知曾明确规定“必须经本人和家庭自愿”的原则，问题恰恰就出在下面并没有注意这个“自愿原则”。

因此，分流使学生和学校之间的矛盾变得异常激烈。学校在这一问题上几乎都表现积极主动，因为这是决定本校高考升学率的大事。我走访过某省一个偏僻的县级普通中学，在那里你看不出有什么硬件和软件方面的优势，破旧的校舍据说都是“文革”时扩建的，全校除校长办公室有一台电脑，专用作打印文件外，现代化设施很少，更不用说什么“语音教室”了。学生说他们连做物理实验用的仪器全都是些破破烂烂的坛坛罐罐。至于那些老师的教学能力，更不敢恭维。我问一位英语教师是什么地方毕业的，他说是地区专科学校，选他任教英语是因为学校找不出第二个比他英语更强的人了。他们的老师中绝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很多人连省城都没有去过。但是这个中学对外称自己的高考录取率能达到 70% 左右。这个比例在大城市当然不算高，可在内地的普通县级学校里，那绝对是个高水平的学校了！后来我一了解才知其中的奥妙：原来他们开设的四个高三班中，有一个 56 人组成的大班是复读班，即专为那些落榜生“回炉”再读而特设的班级。复读班学生一般不在学校应届生的册子上，但学校却等高考一发榜，便将其中考上大学的人一下编入在册之列。

而在另三个班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在进入高三第二学期，便被强行分流到其它地方去了，个别不愿走的，学校明确说，同意你留在高三班上课，如果毕业会考及格也可以发毕业证，但绝对不准参加高考。如此一进一出，这学校的高考“录取率”一下高出二三十个百分点。到时学校有面子，老师有面子，当地教育局和县长、书记脸上都有光。据调查，目前中小城市的中学里，如此分来分去的做法，已是各自心照不宣的事了，因此有人戏说：越是教学质量差的地方，高考录取率会越高。其中的奥妙全在于它可以借各种手段甚至动用政府行为把那些学校认为的差生分流出列。他们把剥夺学生上大学的权利变成了谋取某些利益的魔棒，校长、局长和县长想要什么样的高考录取率，其分流的魔棒便会怎么个转动，在这样的魔棒下，广大学生成了不折不扣的牺牲品。

我听说过一个并非是笑话的笑话：西北某省有所边远中学的校长和老师们，最大本领不是如何在教学上下功夫提高学生的高考水平，倒是在分流学生这事上招术颇奇。先是硬的，不行就来软的，硬软不吃的就来泡术——天天派专员到学生或家长那儿做“思想政治工作”，基本上没有做不通的，因为他们手里有特别武器——对那些实在做不通的，交县、乡领导亲自处理，竟然出现过有一位党员的儿子坚决不愿分流离校，县、乡两级领导多次找到这位党员家长，说你必须从“讲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和做好儿子的分流工作。那党员家长说我儿子愿不愿从学校分流的事跟“讲政治”挨得着边么？县、乡领导很认真地对他说，怎么挨不着边呢？我们县是省上的教育先进单位，如果今年的高考录取率上不去就会影响全县的荣誉，这不就是政治嘛！最后那党员家长被逼无奈只好将儿子送到刚刚开办的职业高中去了。而对待普通老百姓的办法就更多了，你一定不服从分流也可以，我就罚

你个够，罚得你心痛，看你还硬不硬！更有甚者，某校为了把个别“难缠”的对象分流出高考之列，竟然让医院开出弱智和“神经有问题”等诊断，彻底判处其“高考死刑”，从而顺顺当当笑摘“高考状元县”、“状元乡”的桂冠。

然而今天的百姓已经不完全是愚民了，他们知道怎么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2000 年元旦刚刚过后的几天，北京市朝阳区机械工程学院附中的女校长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场官司轮到了自己头上，告她学校的正是几年前被学校分流出去的女学生、现在已就读北京联合大学的余亭亭。余亭亭在诉状中陈述的理由是，她在 1996 年 7 月被该校高中部录取后，读了两年，到高二升高三时，学校怕一部分学生考不上大学而故意出难题试卷，结果包括她在内的几十名学生，因不及格而无法升高三，被迫分流到了“成人高中”，失去了宝贵的高考机会。余亭亭在家长的努力下不得不转到一家私立学校，并交了两万元赞助费才读上了高三，后来顺利地考上了大学。余亭亭以自己“分流受害者”的亲身经历与事实，起诉该校“剥夺了”她和其他同学读完普通高中和考大学的权利，并因此要求法院判决原中学赔偿她上私立学校所花的两万五千元和精神损失费一万元。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受理了余亭亭的诉状。这场官司在本文成书时尚没有结案，但它至少说明了分流的办法多少包含了对学生高考权利的不公正的侵犯，否则国家教委也不会在 1999 年重新发文要求中学停止分流的办法。而余亭亭上诉后，被告方校长称，她的学校并非像原告所说的分流人数高达 52%，实际是 30% 左右。然而这 30% 的分流数还算少吗？这等于因为分流而使该校高三学生中有 30% 的人被无情地剥夺了高考权利，难道这还不够残酷？

堂堂首都北京市都有学校敢这么干，那些远离皇帝天王老爷的边远地区的学校还不知会干出什么名堂呢！人说“高考黑 7

月”，这个“黑”字不正是被浓烈的战火硝烟熏黑的吗！

模拟疯考——登天门的步步台阶

问高考生在高考前什么最令人头疼，他肯定会告诉你是没完没了的模拟考试。冯小刚的三部“贺岁片”今年出笼后，看到他老一套的故事、老一套的广告式宣传腔调，百姓们就群起而攻之、骂之、烦之。冯小刚的“贺岁片”才三部就让人感到“没完没了”，不可容忍，却没有多少人运用媒体宣传工具指责高考前学校里进行的一遍、二遍、三遍……几十、几百遍的模拟考试和练习考试，这真是怪了。

其实说怪也不怪，因为高考前的几个月、甚至一年两年的练兵考试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谁也无法扭转的历史潮流。

一个“考”字，几乎代表了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全部内核。看看自古至今在培养人、教育人、选拔人方面，哪一样离开过“考”字？它成了对付人的万能手段，而且值得称奇的是几千年来它从未走样。中国的考试是千古不朽的教育经典。

你问三百六十天天考有什么可考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教师们可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即使天天考，时间也还永远不够。至于为什么呢，你就得往下看：首先是针对高考的五门课程，如果按一星期抽测两次，二五一十，一星期就是平均每天都得有两次考试，上下午各一次。这太轻松了！怎么可能安排得这么松松垮垮呢？至少每个课程两天一测验，一周一小考，两周一大考嘛！这是学校的规定。于是学生们发现，各门课程考试频率一下增加了一个“二次方程式”，成了每半天有两门以上的考试了！

但任课的老师还是着急：你们这样搞平均主义不行，数学是

高考中的关键，数学考试和摸底考试量必须是别的副科一倍以上。于是仅数学就变成了每天上下午各一场小考，每三天一次大考。大考和小考是有区别的，小考是年级组织的，大考是学校组织的，考好考坏都记录在案。同学紧张，老师也紧张。

数学老师刚刚调整考试计划，外语老师又跳了起来：挤啥课程都成，但惟独不能挤了外语。谁都知道外语是高考中分数往下掉得最多的一门课，我们以往高考录取率，低就低在外语考试的分数上不去嘛！怎么大家还不吸取教训？说什么外语考试也不能少于数学，至少是一样多。

既然外语这么重要，那就跟数学课安排一样多的考试吧。学生就此又发现：每半天的考试由原来的两课时，增加到了三课时。

凭什么数学和外语搞特殊呀？高考的每一门都不能随便掉分，语文其实是最重要的课程。俗话说，考试考试，没有不重要的考试。既然每一门都重要，为什么复习和备考时就分重分轻，不公平嘛！

反正高考是统计总分的，哪一门拉了下来都不好交待，所以平时怎么抽考怎么测验各门任课老师自定，校长最后拍板。

呼啦——会议一散，文数物化外史地政各科教研组老师聚集一起，紧急制订考试计划，瞬间，全校展开了一片考试厮杀，你考我考大家考，早考晚考中午考，今考明考天天考……再往教室一看，学生的头一齐扎进了“卷场”。老师也不轻松，这个卷子还没有收上来，那个老师又哗啦啦地满屋卷子撒了出去。有个学生给我讲了个亲身经历的笑话：那是在他高三时，在班上“最后冲刺”第十周时，平均每天十节课，几乎课课都有考卷发下来。有位同学那天闹肚子，一节课下课后就往厕所跑，上课铃声响后他还没来得及回到教室。大约又过了十来分钟，这同学提了

裤子赶紧往教室跑，一边跑，一边想着这堂课的外语测试，一进教室便向年轻的外语女教师要卷子。女教师看他那个慌张样，就说回你的座位。这学生以为老师生他的气，不让他考了，便急了起来，连声恳求，并解释拉肚子的事。女教师不耐烦地说你解释半天干吗？回你的座位。学生一着急，本来就没有系好的内裤外裤稀里哗啦全都掉了下来。教室里的人顿时哄堂大笑，那年轻的女教师红着脸扭头就回到了教研组的办公室。掉裤子的学生心想今天可是闯了大祸，要不马上向老师检讨就再不能参加今天的考试了。想到这儿，他急急慌慌地提起裤子向老师的办公室奔去，见了女教师连连赔不是，最后恳求道：老师你怎么批评和处分我都行，可就得让我把这堂课上的考卷做了。女教师终于忍不住火了，高声嚷嚷着：这堂课哪有考试嘛？那同学张大嘴巴愣了片刻后飞步跑回教室，喊了起来：我得到了一个世界级新闻：这节外语课没有考卷啦！教室里随后又响起一阵哄笑，同学们告诉他，大家早就知道了。可是这位同学仍然欢欣鼓舞地说：这一定是他闹肚子带来的好运！

这件事听起来很滑稽很好笑，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处在高考备战中的学生们早已被整天的考试搅得晕头转向，神魂颠倒，在他们看来天天考、节节课考才是正常的，假如某一天、某一节课不考了，他们就认为是不是可能发生了世界大战。从高考走过来的学生都这么对我说：开始时大家很不习惯天天做卷子、节节课搞考试，后来习惯了，每天坐到教室，每节课铃声响后就是做考卷，要是哪天、哪节课没有了卷子，反倒让学生们不自然地打听起来：是不是老师病了？是不是上面又有更大的摸底考试来了？

就像战争到来之时，有的人因为经受不了战争的残酷，常常未见硝烟先疯了。一次次模拟考试和频繁的练习测试，使得一些心理素质较差的学生也时常临阵怯战，或半途而退。某校有个女

生平时成绩还算不错，在一摸、二摸时的成绩也不断往上升，可在三摸后一下子掉了下来，最后她在上课时一见老师挟着卷子进教室便紧张得浑身发颤，弄得老师不知怎么才好。可是这女学生又很要强，还非想做完每一张卷子，她越想做卷子就越紧张，最后不得不放弃后一个多月的复习练兵。家长急得满城找医院为她治病。医生说这是“考试过敏症”，需要静疗，就是必须安安心心地慢养慢治。到了这份上也只能如此，她和家长知道这种情况就没法参加当年的高考了，于是心神慢慢地安顿了下来。时过一月，医生和老师突然上门来慰问和检疗，大家又有说有笑，什么事都没有，于是医生和老师对那女学生说，你愿意跟我们出去走走吗？那女学生说行啊，我在家一个多月快闷死了。她便跟着医生和老师一起出门了，后来她发现医生和老师把她带到了高考考场，那学生很惊诧地问老师：是不是让我也参加高考？老师朝她笑笑，说是的，医生说你的病现在好了，所以我们给你的报考手续全办好了，今天特意让你来参加高考的。那学生心头好激动，可她又怕自己不能上阵，便回头看看医生，医生朝她点点头，示意她完全可以进考场。接下来那女学生在老师的陪伴下进了考场，发榜时她的成绩达到了录取线，她高兴得流出了眼泪……

应该说这女孩子算是幸运的。我问过我在医院工作的太太，是不是真的有这种“考试过敏症”的患者，她说当然有，1999年她所在的西城区几所医院里，临近高考时就收过好几例类似的病人，其中十三中就有一个女学生因为得了这种过敏症，浑身上下都起了皮癣，最后连上学都不能去了，自然不得不放弃高考。

听听，这难道不是“黑7月”的战火给闹的？

但是教课的老师不这么认为，他们说高考不亚于打仗，既然打仗前的练兵是战争取胜的必要准备，那么高考前的模拟考试和测验考试是同样道理。有人扛不住倒下了，证明扛得住的学生更

有可能在高考中获胜。什么都不要有顾虑，把卷子发下去，明天还继续接着考——考完了本校编的卷子，再考邻校的卷子，考明白了本地的卷子再考像你们北京这样大城市、有名声的外地卷子，考完了历届高考的卷子，再考今年各部门、各出版社、各考试机构提供的新练习卷子，考完了新练习卷子再回头考老卷子……别忙，即使新考卷都已笔试过三遍，那也得再进行口试、面试，口试、面试完了还有开卷考、闭卷考，总之什么时候高考时间没有到就一直考下去，考到你感觉烦得不能再烦，可一天不考心里又空荡荡神慌慌时，考到你离开了考试仿佛就不能进入正常生活状态时，考到你吃饭睡觉做梦都在想着试题考卷时，考到你金榜题名、落榜无泪为止。

“你们这些作家、记者根本不知道高考的竞争有多激烈！不这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考试行吗？高考就像登泰山的天门，每一张卷子就是登天门的一个台阶，不走过几百个台阶行吗？”一位老师这样对我说。

排名——选拔“敢死队员”

考完试你就以为没事干了？错错错，每一次考完后你们就看看那张排名表上自己的位置吧！

排名为何物？就是把全班的考试成绩按名次排列出来。班级排完后再看年级排名，年级排名后再看全校排名。别忙，全校排名后还有全区、全市排名。

如此复杂繁多的排名何用？排名的重要性可以用最复杂的话表述，也可用最简单的话讲明。复杂的话叫做：你不处在竞争的漩涡中，你就永远不会知道前面的路有多长、山外的山有多高，你知道、懂得和明白竞争对自己有多重要后，你就会不顾一切、埋头加油、拼命朝前赶。简单的话只有四个字：落后可耻。

谁都不想在排名表上落后，但既然是排名表，便必定有前有后，于是高考前的硝烟便这样越燃越烈……

张玲是某校高三班学习班长，老师对她说，去年本校高考成绩不够理想，今年必须把全校的名次从兄弟学校那儿夺回来，你是班长，要带头，为了你个人的高考荣誉和全校的荣誉，必须次次争取考试排名第一。张玲深感任务无比崇高和艰巨，她努力再努力，进步更进步，一次次模拟、一次次测试，成绩都在全班第一。老师又找她，说班里第一还不够，要争取全校排名第一，张玲又开始努力再努力，进步再进步，终于，她又不负众望，为全班争得了新荣誉。后来老师不找她谈话了，而是校长找她了，说张玲同学，学校根据你的表现，准备发展你入党，这样你就是我们全校惟一的学生党员，建校 30 年来头一次有学生党员。现在给你一个任务，就是争取再把排名往上提一提，争取下次模拟考试时，为我们学校在全区拿个排名第一。张玲在红色的党旗下宣誓时，虽然背的是党章规定的那几句誓词，但脑子里想的是：我必须拿出好成绩，报答校长和老师的器重，争取全区排名第一。她再努力又努力，一直努力到有一天被人抬到了校医那儿……老师和校长后来再不理睬她了，因为他们都认为正是她临阵胆怯而使全校的排名落到了第二位。

可耻！校长和老师用目光对她这样说。

真是可耻！张玲自己在心里骂自己。

后来她怎么再努力也没有把自己的名次往前提，反而使她们班在全校的排名一下子降到了第六位。

一天，张玲向兼党支部书记的校长交了一份东西。

什么？你竟敢想退党？校长气得浑身发抖，连声骂道：你是懦夫，彻底的懦夫！

张玲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与张玲同班的李也同学，被老师认为是可以接替张玲的重点培养对象。

李也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从小接受的是要比别人强上强的教育。但李也的成绩在高一时并没有排在年级前六名之列，这使得在初中全校第一名的她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她恨过去自己的那所中学基础太差，但更嫉妒现在比她高分的那些神气活现的同学。“有什么稀罕，不就是靠老师开小灶嘛！”李也以前看到张玲这样名列前茅的人，打心眼里不服。她暗暗使劲，几乎在高一、高二的两年中放弃了作为都市女孩的全部乐趣，把可以利用的一切时间都用在了赶超同学的分数上。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进入高三之后，李也的分数已经列在张玲和另外一名男生之后，成为全校第三名，她本来就戴近视镜的眼睛前又多了一道圈，同学们因此送她个外号叫“靶子”。这回李也真的成了全校排名的“靶子”了，那天张玲“退居二线”后，校长在全校高考第二次动员大会上把李也推到了前台，表扬了李也这几年的刻苦与进步，并要求通过李也和指导老师的共同努力，争取在“二摸”中将学校的名次夺回来。会后，李也同样得到了她过去十分嫉妒的“开小灶”待遇，她初次走进教研组，静静坐在那儿听老师讲题的感觉实在太好了，只有她一个人，而且老师是针对她存在的问题而讲的，这种有的放矢、毫无干扰的“小灶”，如果她几年前就能享受到，怎么可能有张玲辉煌的份呢？第一次“开小灶”时，李也体会最多的就是这个。

“李也，你现在与一般同学不一样了，是学校重点培养对象，下次区组织的‘二摸’，关系到我们学校以前被张玲同学丢失的荣誉能不能重新夺回来，校长的态度很明确：务求必胜，所以在学校练兵时，你的目标是必须做到百分之百的全校测验第一名。”

百分之百?!李也忍不住有些紧张起来,因为以前她是在别人后面赶超,心里想的总是努力朝前,而这种赶超过程除了她自己有感觉外,谁也不太会注意她,现在可好了,所有的人都盯着她这个靶子。李也一下子感到了巨大压力,而且同学们现在都知道她是吃过“小灶”的,考第一名是应该的,而落后于任何一个人都是不正常的。李也暗暗叫苦:过去我是只管一路拼杀,埋头朝前赶,现在我是站在山的巅峰,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我的妈呀,一旦有闪失怎么办呢?先不说是否对得起自己,老师和校长那儿就没法交待呀!

李也从来没有感到心头有如此大的压力。她忽而感觉四周有那么多人盯着她,有嫉妒的,也有嘲讽的,有幸灾乐祸的,更有杀气腾腾准备吃掉她的……“啊——老虎!老虎来啦!”李也已经几次在半夜突然大叫起来,而每次醒来全身总是湿淋淋的。

噩梦,做不完的噩梦。李也开始在一次一次保第一名的考试拼杀中渐渐感觉到精疲力竭,每次从考场上出来时,她都会头重脚轻,甚至胸口发闷,后来发展到一见卷子就冒虚汗,终于有一天她倒下了。这下可把老师和校长急坏了,因为再有三天就是全区性的“二摸”了,他们怎么也不想看到“第二个张玲”,所以此次采取了对李也的特别措施,有两名校医进行24小时监护。到第三天“二摸”考试时,李也大有英雄出征时的那种声势,前后都有人护着,校长也来了,特意送给她五个字:第一属于你。李也当时掉泪了,她全身热血因此而沸腾,走进考场的那一瞬间真的有种视死如归的感觉。

上帝保佑,李也不仅坚持考完了,而且获得了全区第一名。学校为此举行了高考前的一次庆功暨最后冲刺动员大会。校长把李也请上了主席台,给她戴上了大红花,并号召全校应届高三毕业生以李也为榜样,争取本年度高考录取率再创新水平。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此次会议后，李也坚决拒绝了学校希望她在“三摸”时保第一的要求，而且连续请了两个星期的病假。有同学去看望时，李也讲出了自己的心声：我不想再当第一名了，因为我不想让自己成为这种考试排名的“敢死队员”。同学好奇地说：当“敢死队员”有什么不好？能“开小灶”，还能接受校长亲自戴大红花的荣誉，多风光呀！李也使劲地摇头，说她宁可什么都不要，因为当“敢死队员”最终不会有好结果的，不是死在战场上，就是在战场上被杀得浑身伤痕累累的。

“李也，你得了第一名说话这么轻松，可你知道我妈上次看到班上的那张排名表后怎么对我说的呀？她说我是天下第一笨，下次再不把名次往上提前十名，她就抹脖子！”李也的好同学苏亚男学着她妈的样子做了个自杀的动作，连哭带跺脚地说：“你说我可怎么办？一摸、二摸都排在全班后十名，要是高考真的考不上，我妈她真会抹脖子的呀！呜呜呜……我怕死了，李也……”

李也抱住好同学，用双手拍拍苏亚男颤抖不止的肩膀：“放心，我一定帮你把名次赶上去……”说完，李也跟着大哭起来。

班里的排名虽说只在四五十个同学之间进行，但每一次考试成绩下来，那张排名表就像一道无声的发号令，激烈的战斗因此而开始。

光明和严格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小学到高中从来没有分开过，除了是对好哥们外，还因为他俩都爱好足球。光明是前卫，严格是守门，只要他们俩同在，年级里的足球赛十有八九的冠军属于他们。进入高中后，足球比赛被渐渐剥夺了，一切时间都被困在了教室考场。光明和严格的成绩排名基本都在中游水平，前后差不了两三名。但是到了高三第二个学期后，光明发现严格的排名高出了他十多名；跨入了全班前五名之列。光明觉得

严格很不够意思，既然是哥们儿，要进步就得一起进步嘛。有一天放学后光明到严格家，他一进门就见正在埋头做作业的严格慌里慌张地从自己的小屋里走到客厅，那阵势似乎不想让光明见到什么秘密似的。这越发让光明想看个究竟。后来光明终于推说要向严格借盘 VCD 而进了严格的小天地，他往严格的写字台一看，发现了《北京海淀考王》。原来如此……

第二天起，光明就开始不再理会严格了，他觉得自己的哥们儿跟他玩心眼：这还不是明摆着的事，像《北京海淀考王》这样老师推荐的高考复习好书，他光明所在的小城里是见不着的，谁能搞到这样的书就很“牛”。光明心想，你严格从小跟我是哥们儿，但到了高考复习的关键时刻，却连得到了好的复习资料都不肯借我看，一个人暗着使劲把我扔在每次考试的后二十几名，说轻一点是不够哥们儿义气，说重一点是忘恩负义——可不是嘛，在中考时我光明从表哥那儿得到了一套名校复习资料时，就毫无保留地给你严格复印了一份，现在你小子得了一套《北京海淀考王》就偷偷藏在家里一个人看，这不是忘恩负义是什么？

光明要报复，因为他知道严格有个弱处，那就是他的外语不好。但老师和同学们从来没见过严格的外语排名落后过，这其中的奥秘只有哥们儿光明知道。

新一轮考试又开始了，严格的数学成绩照例直线上升，在排名表上已经跃居前三名。瞧着严格那得意洋洋的劲儿，光明心里的气不打一处来。机会终于到了，外语考试的卷子刚刚发下，光明见监考的老师走到桌前时，有意摆弄了一下自己的笔盒，然后用嘴努努坐在右侧前排的严格。老师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不动声色地暗暗盯着严格的每一个小动作，大约在开考十分钟左右，严格动作了：只见他佯装换笔，将笔盒的底一起翻了过来，

正在这时，一只大手从严格的背后伸过去抓住了那笔盒，再翻过来一看，笔盒底有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小字条……严格作弊被当场抓住。坐在他后排斜侧的光明脸上露出了一丝快意。

新一轮的排名表出来后，严格从上次摸底的前五名一下降到了二十几名，而且受到了班主任在全班大会上的严厉批评。严格痛苦地低下头时，用仇视的目光斜了一下昔日的好友、如今成了仇人一般的小哥们儿光明，那目光分明在说：准是你小子出卖了我，否则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我笔盒下的“秘密”。

像上面这对因排名而反目为仇的小哥们儿，在高三年级中为数不少。有位同学告诉我，他说老师搞的考试排名次，使本来和睦相处的同学间互相成了对手和敌人，常常同宿舍、同桌的人都互不说真话，谁要是能借某一计谋把对手弄蒙了，心里好像比考高分还得意和开心似的。“一张排名表，使同学间的友情全都彻底消失了，整天老死不相往来，埋头盯着对手使暗劲。可气的是老师还要用排名引发同学间的不和，进而制造家长与子女、以及家长与家长之间的矛盾。他们对排名在前的同学和他们的家长笑脸相迎，对排名在后的同学及其家长则横眉冷面，仿佛欠了他（她）债似的。”有个学校的同学们还透露道：他们的学校做得更绝，每次考试前是任课老师跟他们订合同，等考完后排名一出来就开始“现场兑现”，达到“合同”标准的，可以享受“提高班”免费上课的待遇，没有按“合同”规定达标的，想进“提高班”必须交100元至200元钱。这种“合同”开始是在老师和同学之间签订的，后来又变成了学生与家长之间签订，如果学生考得没有达标，不仅学生本人受到某些像上“提高班”要交费那样的罚款式的处罚，学生家长同样要被召到学校接受训斥。

我参加过一个高考班的家长会，那会上若干位受到点名批评的学生家长中有的是大公司的老板，平时在自己的单位里从来是

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可是到了这样的家长会上，就只能老老实实当三孙子。我问其中的一位家长对学校搞考试排名次有何感想。那家长很肯定地回答，他是赞成这种做法的。“排名可能有些负面作用，但正面作用应该大于负面作用。高考对孩子们来说是决定一生命运的门槛，不想争上游的人以后怎么可能在社会上获得比别人更多的成功呢？”这位家长说。

那次家长会上，学校的老师最后说：尽管上面一再要求取消考试排名，但他们不准备取消这种做法，其目的除了让学生有比学赶帮的竞争意识，还可以动员教师、学校和家长等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来确保孩子们在高考前一直保持高昂的战斗状态。

虽然近期国家教育部又明令不让将学生的分数进行排名，但看来只要高考不停，排名次的备战手段也不会轻易消失。

最后出招：户口大迁移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当高考前所有的招术再翻弄不出新花样时，一切好生和差生、估计能考上的和考不上的全都成了学校和学生以及家长的议论中心时，一项更加惊心动魄的备战措施开始悄然拉开了帷幕，这就是“招外之招”的户口大迁移。

湖南与广西交界地区的 A 县和 B 市，是两个相邻却各属两个省份的不同区域。以往 A 和 B 都是两省的边远小县，是那种穷得没多少人爱管的地方，这两个县有一座相连的大山，大山的腹地隐藏着地下资源，过去曾经因为抢挖不均，发生过许多次血腥的械斗事件。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两个地区的百姓之间竟然停止了械斗，变得和睦相处起来。B 得益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优势，由县改为市，而 A 则仍沿革县的旧体制。两个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方，突然因为一件根本不能放到桌面的事，变成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睦邻友善好兄弟。

这事说来蹊跷，是因为孩子参加高考引发的。A 县在湖南，都知道湖南也是中国“五个高考大省”之一，每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数量一直居高不下。受传统影响，送儿女上大学一直是毛主席故乡人的好遗风。当年湖南出革命的大人物，而今湖南出状元也在全国挂得上名。但在湖南考大学实在不易，应届高中生中能上大学的平均 30% 的比例都很难达到。那么多湘妹子湘伢子想上大学咋办？总有辙吧！有一天，在广西工作的 B 市教育局老李回到湖南老家的 A 县，他刚进门，本家的二叔就来找到他，说兄弟啊，你在那边的教育局工作，我想问问你，怎么都是在中国地盘上，俺的伢子考了 450 多分还上不了大学，可远房表妹的孩子在你们那个市才考了 400 分刚刚出头，咋就被大学录取了，而且还是个重点大学呐！这是咋回事？

老李笑笑，说二叔呀，我们那儿是广西，是国家照顾的少数民族地区，同样的高考生，最后在录取分数线上要比咱们这儿的湖南省录取分数线要低不少呢！二叔一听，眼珠子一转，说兄弟呀，那你能不能想想法子，把我伢子的户口转到你那儿去，等娃儿明年再考一次，我想凭他今年的分数，明年考上学应该是没啥问题的。老李不好推辞，说我回去就替你试试看，能不能先联系一个接收的学校，这样可能更好办些。二叔听后很开心，说兄弟这事你要办成了，我请你客，给你两大块腊后腿肉。老李咧着嘴笑，说事成了再说。老李回到广西的 B 市，凭着自己在教育局工作的面子，市二中的校长一口同意了接收那个湘伢子到他们那儿读书。

“校长，这事我得好好谢谢你呀！”老李在电话里对二中校长道了好几个谢。

“老李啊，你这一声‘谢’不是说远了吧？要说谢，还得我

谢你哪！你给我送人才来，明年真的高考录取比例上去了，我这个校长脸上不更有光了嘛！说不准还能加一级浮动工资哩！”

“哈哈……好事好事。”老李和校长一拍即合。二叔小伢子转户口的事由于校长出面到当地派出所去办理，很快也就成了——那派出所所长的孩子就在二中上高二，校长出面不是一句话的事嘛！再说 B 市是新建市，各方面的人才奇缺，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吸纳人才，重点中学吸引好学生进来也可以算得上是“引进人才”吧。二叔的伢子从进 B 市二中读书，到把湖南的 A 县户口转到广西 B 市，用了前后不到一个多月时间。第二年高考时，这位湘伢子在广西 B 市考了 578 分，结果顺顺当当地被广西某重点名牌大学录取。消息传到湖南的 A 县老家，整个山洼洼都沸腾了。二叔一高兴，特意把有功之臣的本家兄弟、在广西 B 市教育局工作的老李也叫了回来，热热闹闹地在寨子上办了十几桌酒席。

“我家的伢子能被名牌大学录取，全仗着我们李家兄弟在 B 市那边花的心血。我得向这位兄弟鞠三个躬，烧三炷香。”二叔当着寨内寨外的亲朋好友，实实在在地给本家老李兄弟弯了三个九十度的腰，点了三撮香火。

这事很快传遍了 A 县三村五乡。于是张三来托老李、李四又来向老李求情，他们都是为了一件事，就是请老李把自己的孩子由湖南的 A 县转到广西的 B 市去上学、去落户。于是乎，老死不相往来的 A 县和 B 市之间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亲热通道”，一个又一个湘伢子湘妹子通过李伯伯、张伯伯、王科长、赵局长什么的被安安全全、顺顺当当地换成了自治区公民。于是乎，一向在自治区连名都挂不上的 B 市的高考成绩如箭般直线飞升，一跃成为屈指可数的先进市。校长们荣光满面，市长们也得意洋洋。

“这事是好事，应该‘特事特办’。”市长对教育局和公安局、劳动人事局的头头们挥手道。

有上方宝剑在，一时间，涌进 B 市的外籍高中生、甚至初中生，从湖南、从四川、从湖北等省份纷纷而来，B 市在这中间不仅获得了在高考录取率上的绝对优势，而且还在财政上获得了非常可观的收入——因为每办一个进市的户口，必须收缴几千至几万不等的“农转非”管理费。那些在湖南或者湖北等其它省份上不了大学的娃儿们，在这儿都轻轻松松地考上了大学，圆了他们和他们祖辈们的梦。

关于通过异地转户口从而考上大学的事，我在采访中发现，这还真是百姓为了孩子求学想出的绝招之一。其实异地转户口或者本地转户口，并非像湖南的 A 县转到广西的 B 市那么简单。中国现行的户口制度是一个非常严密而复杂的机制，想动一动可是牵动社会很多根神经的重大问题，可不是一般人一般地方都能顺顺当当地办得成的事。在南京，有位朋友告诉我一件事很有代表性，他说他的一个同事的老爹是省城一名职务不小的官，是当年解放西藏的老同志。这位老同志有个孙女前些年在南京上学，由于先天性智力差，成绩一直在班里“老末灵”，这可急坏了这位老同志的全家，孩子是全家的“千金”，眼下又都是独生子女，假如这女孩连大学都上不了，不说孩子将来好工作难找，说出去全家脸面上也过不去呀！儿子夫妇俩直让当老爷子的这位老同志想想辙：“你认识的人多，看看上海北京有没有熟人，那儿高考的分数比我们江苏低 100 分呢，怎么着也得让孩子上个大学嘛！”那些日子，老爷子一下班，他的耳边就是儿子儿媳的没完没了的催促。但北京和上海的户口一下两下不是那么好办，可时间不等人啊，转眼孙女上高三了，老师拿着几次摸底考试的排名成绩找到这位身居高位的老同志，说在我们江苏这样的高考大

省，每年录取分数线那么高，以您老的孙女现在的成绩，想上大学肯定没戏。

通融通融也不行？

难，现在的高考判分和录取都实行了电脑联网，不是哪个人可以做得了手脚的。

听了老师们的介绍，这位老同志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把历年各省的高考录取分数线的有关资料给我找一份来”，他命令秘书从教育局借来好几本相关材料，像当年研究连队渡江战役的作战图一样认真仔细。

根据孙女目前的成绩应该接近哪个省的高考录取线呢？广西？云南？嗯，与这两个省比较接近，但接近也意味着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更何况接近录取线就不可能上得了重点大学。宁夏倒也不算高，但宁夏……宁夏的几位老战友死的死，退的退，真想让他们办点急事还说不定误在他们手里哩！不行，再看看。西藏，嗨，西藏的分可够低的呀！党的民族政策真是处处体现嘛，尤其是像西藏这样的地方。对啊，如果孙女的分数能在西藏参加高考，不是一定有把握吗？说不好让这丫头弄个什么状元当当呢！唉——没出息的娃子！

就这么着吧，西藏还有几个当年一起进藏的战友还在位，一辈子没求人一次，这么件事总不至于被婉言谢绝吧？

“什么什么，到西藏去啊？老爸有没有搞错哇？”儿子、儿媳听后大惊失色，说你老爷子不是将孙女往火炕里送吗？那样我们宁可不让她考大学！

“真是短见识。让她参加西藏的高考，又不是让她一辈子进西藏！”老爷子见儿子、儿媳还没有明白，提高嗓门道：“等她按照西藏的高考录取线考上了大学后，就不能再想办法把她的户口重新办回南京来？”

儿子和儿媳恍然大悟，连声叫绝：“哎哟，还是爸爸的点子高啊！”

后来的情况我不得而知，想想这位老同志所下的功夫倒也实在不易。不过这类无奈中使出最后招术的迁户口之举，其实公安部门最了解底细。北京中央国家机关多，每年各部委一些调京的领导同志也不算少，我就遇见过有位调任某部委机关任司长的熟人，照例他在前几年就可以把全家的户口迁到北京，但他没有像别人那样着急，原因是他的儿子正在老家读高中。“孩子的成绩一般，我想让他在老家读完三年高中，即使他的成绩在我们老家是中等水平，但要到北京参加高考就有把握进重点大学了。”这位司长高屋建瓴地说。

果然，在去年高考前他办好了全家户口的迁移手续，儿子赶上了参加北京市的高考并一举中榜，进了一所理想的重点大学。

像这样借全国各地大学录取分数线差异，又根据我国户籍制度上有可乘之机而进行高考前的这类“合理的流动作战”的，有人估计每年总有数以千计的人，他们确实也因此而上了大学。我们暂且不去论说“户口大迁移”到底对与否，但有一点可以说明，为了备战7月，只要是可以运用的手段，学生和家长们都会去试一试的。

“这算什么？只要能让我的孩子考上大学，就是上天揽月，我也会在所不惜。”这几乎是家长们共同的心声。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录取分数线低、考生成绩相对差的孩子家长，他们现在流行把孩子送出都市，通过亲戚朋友关系，介绍到一些高考分数特别高的江苏、河北、山东、河南等省的县地级甚至更下层的中学去接受高考前的特别训练，等到一年半载后再回城参加高考。虽然一时让孩子受点苦，结果则很叫家长们满意，因为孩子带着外地考生的学习精神和备考方法，基本都能稳拿大学入门

券。河北燕郊中学，每年都接受一大批家在北京的高中生中途插班或者三年跟班学习。现在该校已经把开发北京生源当作学校发展的重头戏来做。而知道这所学校情况的北京的学生家长们也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里，首先是路程不远，其次是这里的收费是北京城里同等学校的三分之一左右，更重要的是这里所进行的高考前的一整套备战招术全是“河北式”的，从已经接受这所学校短期或者长期考前备战又回到北京参加高考的学生情况看，家长们获得的预期效果高达 95% 以上，也就是说很多本来在北京考大学没戏的孩子，因为受外地学校不同教学和备战方式“感应”后，基本上都考上了大学，甚至大部分超出了预想的效果。

一切都已准备，只等 7 月高考的铃声响起……

B 章 目击高考现场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世界平静地度过了一个没有全局性战争的和平时期。但是，人的本性决定了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地方总是处在激烈的争斗中。自人们可以使用笔记、相机、摄影机以来，几乎每件重大事件都被详尽地记录下来，但人们遗憾地发现：关于中国高考这场特殊的“大战”，却没有人将在现场目击到的一幕幕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况入木三分地记录下来，所以我一直在寻找这种机会。

中国是个考试大国，每年参加高考的大军在千万人左右。这样的“战事”，时间之长、规模之大，为世界所绝无仅有。在新的世纪之后，中国高考的这种空前的“战事”，或许会发生很大变化。因此在 20 世纪末的最后两个“高考大战之年”里，我着意做了精心准备，直接和间接地进行了“战地采访”，并动员了

一些不同战场上直接参战的考生们，一起与我用近景记录了下面这些并不被载入中国教育史的另一类史诗性的战况——

目击之一：全城戒严

北京。中国首都。

这座皇家古城现今是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全世界注目的地方。每一次动用特别的“战事”手段——戒严，都会引起国外关注。北京是全国所有地方戒严最多的城市。一件重大的国事，一个重大的节日，一次重大的骚乱，都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戒严。

戒严，在北京习以为常；然而戒严对北京人来说又很反感——那是一种心理和行动上受压抑的管制。但只有每年一度的那三天，人们对“戒严”特别欢迎，这就是7月7、8、9日三天的高考日子。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高考需要全城的警察出动。我问西城公安局的警察同志，他们笑笑也一时答不上来。“总之有好些年了，慢慢就成了习惯。”一位老干警说，这事现在好像每年都有上面的布置，可开始时上面并没有作为一项任务来布置，而是我们下面执勤的同志自己联合起来做的。他说，最早他们分局处理过一件因为中途堵车造成孩子没能按时进入考场，孩子的父母大闹分局的事件。那考生的父母打的，在长安街的一个路口被堵住了，一队国宾车队正要通过，那时交通条件差些，一次国宾车队从开始警戒到通过，前后需要近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而这个考生就是在这时给耽误了。

高考年年进行，我们的国宾车队也说不准什么时间又上长安街呀，谁能保证每一年没有三五个考生给耽误了考试时间？我因这“不可抗拒的因素”有些为考生们担忧。

老民警笑了：也不知是不是真有人向上面反映。反正我们交警中有传言：大考开始，国家主席也让路。信不信由你，总之这几年我们在路面上执勤有体会，如今哪一年高考都没有因为中央领导的车队或国宾车队把路给堵死了！

真是绝对的好新闻：大考来了，全国上下都让路！

从民警的口中我还知道了许多有意思的“战事趣闻”：

有一个民警十几年来只要每到7月7、8、9三日，是不是他的班，他都要坚持上岗，不管天有多热，下着多大的雨。这位民警从来不说是为什么。大伙开始以为是他家孩子也在参加高考，可三四年后为什么他还认认真真地参加“高考戒严”行动呀？后来有人经过苦心“侦察”，方知这后面还有一段动人故事：该民警同志是老知青，十几年前他和女朋友一起回城后，便各自找工作。他的女朋友比他小几岁，回城那年还有最后一年的高考机会，但是就在这一年她参加高考途中由于心急人慌，加上车多人挤，结果在一个路口被一辆小车撞伤，后来送到医院抢救无效身亡。临咽气时，她紧握着这位后来当民警的男朋友的手说：希望他以后当个民警，在高考那几天好好执勤，不要让自己的悲剧再发生在别人身上。后来她的男朋友真的当上了民警，并且十几年来始终如一地参加着高考三日的执勤任务。

“能找到这位同志吗？”我向西城分局的民警打听。

人家笑着对我说：“这样的人物恐怕每个城市都能找到吧！”于是，他们就给我讲起他们自己经历的事：早些年，有个派出所突然拥进了一大帮人，是五六个男男女女把一位司机押到了派出所所长办公室。所长见激愤的人们押的司机是他的老熟人。那司机一进派出所看到自己的老“哥们儿”在，顿时便神气起来，哭丧着脸叫屈：你评评理，我好好的在马路上正常行驶，可他们一大群人堵在马路中央就是不走，我按喇叭他们也无动于衷，后

来我连按了几下，他们就把我从车门里拖下来，这一吵起来，他们就把我押到你这儿来了。好啊，现在该由大哥你来断一断这个理！派出所所长还是第一次见这等纠纷，转头问那些义愤的人是干什么的？人家没好气地回答他说：都是考生家长。派出所所长一听就暗暗一乐，转身对开车的司机说：今天算你倒霉，人家是赢家，你输了。那司机满脸狐疑：你老兄今天怎么胳膊肘朝外拐了？所长狠狠地用手掌在桌上一拍：你知道我儿子今天在干啥？他在考试！懂吗？他也在参加高考！你小子知趣点，这几天开车最好绕远一点，否则要碰上我——哼，说不定连你的破车也给砸了！那司机还在那儿愣着，那群人则哄堂大笑起来，他们欢欣鼓舞地拥簇在所长身边，山呼“万岁”。

民警们笑着说，高考三天里，最倒霉的要算司机了，他们是有理说不清，弄不好还会被重罚狠揍哩！“而且我们要告诉广大司机同志：这几天中，没有你们说理的地方，我们就是向考生和他们的家长偏心……”

又是一个欢欣鼓舞的“内部新闻”！

据北京东城、西城和海淀几个主要的公安分局介绍，每年一到高考期间，他们总要处理几起考生家长与司机师傅之间的冲突。有一次海淀区发生这么一件事：一个送矿泉水的司机师傅急急忙忙地载着一车矿泉水正跑得欢，突然大马路上“杀”出五六个人来，看样子也不是什么警察或业余“马路大使”！司机就赶忙按着喇叭让他们走开，这一按喇叭不要紧，挡在马路上的五六个人一下变成了凶神似的冲过来打开车门就把他拖了出来。这师傅没弄清自己哪儿出了问题，以为有人要抢劫，于是便大声喊道：“救命啊！有坏人抢劫啦——！”他哪知这一喊就更倒霉，有人不知拿了一块啥东西，“哗啦”一下绑在他嘴上。完了完了，这司机心想今天可是遇到了杀手。他一心想着活命要紧，抢

劫者不就是要钱嘛！于是他就一边“呜呜呜”地说着别人听不懂的话，一边赶紧从口袋里掏出钱包，塞给那几个“抢劫者”。可“抢劫者”拿了他硬塞过来的钱包不知如何是好，愣在那儿直摇头。这个司机一看这光景心想今天可要死定了：人家连钱都不要，一定是要他的命啊！他顿时吓得大汗淋漓，便“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向这几个“抢劫者”磕起头来。那几个“抢劫者”先是一愣，随后哈哈大笑起来，并且赶紧给司机解开嘴上绑着的毛巾，又将他从地上扶起，告诉他：“你当我们是什么了？我们是高考学生的家长呀！”司机不信，说你们是考生家长干吗要绑架我？人家又乐弯了腰告诉他：那不是绑架，是因为你刚才按了喇叭，大伙才急了。司机这才出了口大气，他正想发作大骂一通，可想了想竟然把嘴里的脏话都收了起来，转身从车上抱下一桶矿泉水，说送给你们了，省得你们在大太阳底下口干舌燥的火气那么大！这回轮到考生家长们不好意思起来，说我们刚才做得也过火了一点，差点把你吓出毛病来。师傅乐了，说我不知道城里高考时，你们家长还在为子女站岗放哨。我孩子也在河南老家考大学，这桶矿泉水算我的一份心意，你们代我一起为我的孩子尽份心吧。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事，几位北京考生家长听了这位到首都来的河南老乡的话，心头好是感激和歉意，当他们分手的时候，双方的眼里都噙满了泪花……

听过民警们“戏说往事”后，我觉得太有必要到现场“看景了”，于是在离家最近的北京四中考场的“西黄城根北路”一瞧：可不是，三四百米长的南北路口，都有警察严加把守，一辆辆必须经过的车子小心谨慎地驶过四中门口时，连斜视一下都不敢。再看看家长们一个个两眼瞪着马路，随时准备抓住那些敢按一声喇叭的“小王八蛋”！那情景与神态，就连我这个骑自行车的都吓得不敢按一下铃。

真是了不得。我提醒自己：这里是战场！

四中离中南海、中央军委等国家首脑部门太近，考生们得到的警卫也格外特殊。但是同一个城市的其它考场就没有这样优厚的照顾了，有一天我骑车路过十三中观望“战况”，不想一进路口就有人喝我下车。我问为何？一男一女就晃了晃袖子上的红套套，说：对不起，师傅，我们是给孩子们义务执勤的。

我明白了，这是考生家长自动组织起来的“纠察队”。这里已全民皆兵。

“不这样不行。我孩子是第二年参加高考。去年也是在这十三中，他说本来一进考场就紧张，外面的汽车喇叭一响，他就走神。我也不是特别信这个，但孩子说他去年差几分就因为这干扰闹的，我权当是真的吧。所以今年我主动为他站岗放哨！”一位家长听说我是来采访的，便跟着聊了几句。那个女同志过来凑了几句，说她宁可相信这是真的，也决不让一辆车子瞎按喇叭影响她的女儿考试。可见战争能使人们众志成城。

家长们告诉我，有的地段专门有警察在考场门前执勤，但他们孩子的考场门口没有警察，所以大伙就自觉组织起来。“都是义务的，可大家都抢着在烈日里‘站岗放哨’，都是为了孩子呗！”一位女家长给每位“值班”的人送来一瓶矿泉水，两天中，她已经掏钱买了20多瓶饮料，她说话的神情显得非常高兴。

正如一位军事专家说的那样：战争有时往往会增进人们相互之间的特殊情谊。

1998和1999年的高考期间，北京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情况，就连往年闷得令人透不过气的天气也变得爽朗风凉，但在全国的其它“高考战场”上，情况则大不相同。

1998年的7月7、8、9日，正是南方的长江沿岸和北方嫩江特大洪水泛滥的紧急时刻。湖北、江西、安徽等省的数百个县

处在洪水包围之中。往年一到高考，这几个高考大省几乎从省长到百姓，人人放下手中的重要工作全力投入到确保考生们顺利通过高考的大事中去。现在不行了，滔滔洪水根本不把数以万计的考生命运和他们家长的心事放在眼里，依旧呼啸着冲向校园，卷走课桌与书本……怎么办？7、8、9 三天，是全国不变的高考“战争日”。

“就是用我们的身体挡着，也要保证考生们顺利地进入考场！”前线总指挥部传来温家宝副总理的命令。

于是灾区沿途的各省市、地、县都下达了一道特别的战书：7、8、9 三天的高考时间里，所有考场地段，允许实行特别警戒——这是一道深得民心的命令。

现在就读北京林业大学的一位湖北籍学生告诉我：他家离县城四十多里，考试前，他从县城的学校回了一趟家，本想把高考准备得更充分些，没想到的是他刚回到家，洪水也跟着进了村子，转眼间，他和村上所有的人都被接天而起的洪水围困在一个小土丘上。他在走出家门时连一件穿的衬衣都顾不上拿，但他却把准备参加高考的书包背在了肩上，他父亲和母亲让他帮着牵引的那头耕牛被洪水冲走了，在洪水围困的那几十个小时里，全村人都在挣扎着活命，惟有他仍静静地蹲在地上看书。父亲过来从他手中一把抢过书本就往水中扔，说你看看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念死书？他二话没说，一个猛子跳下水，捡回了书本，然后非常坚定地对父亲说：政府会想办法让我们准时参加高考的。村里的人取笑他真是书呆子，连命都保不住了，还在做着大学梦哩！6 号傍晚，当村上的人全都认定他的大学梦将被洪魔吞没时，突然远处传来一阵隆隆的机动船声，随即听到有喇叭在喊：这个村上有没有参加高考的呀？我们是专门接送考生的，有的话请马上跟我们走！第一个听到的不是他，是他妹妹。起初他不敢

相信，后来村上的人告诉他这是真的，他和父亲都哭了。临上船时，全村的人都为他送行。大伙说：小娃子，就你运气好，今年一定能考上大学！为我们全村争光吧！他点点头，向滔滔洪水围困中的父母亲 and 拯救着全村人的小土丘默默地发誓：放心，我一定拼全力考上大学。后来他发现，那只小机动船是县政府抗洪前线指挥部特意为了接送那些被围困在洪水中的考生而专门抽调过来的。

那一夜，机动船不知行驶了多少地方，一直到天明，将他和其他十几位考生送到了县城。那泽国里的县城，与他前几日离开时早已完全不一样了，街道成了一条条“河谷”，楼房像暴风雨过后漂在水面上的一张张失去光泽的荷叶，但只有迎送他们的一只只打着“考生专用”旗号的快艇与机动船，像巴顿将军的那辆“三星”战车，骄傲而威武地行驶在泱泱泽国中，没有阻挡，一路畅通。这位学生说，他从未感受过如此庄严和神圣的旅程。“机动船载着我们这些考生，就像威武的战车载着一队英雄一样驶向战场……时间非常紧张，因为一路上险情不断，中途不断又有考生被接上船舱，但大家表现得特别冷静和沉着。机动船到达考场时，离开考试时间只有十来分钟，但我们谁都不感到紧张，后来我们那些走进考场的考生都认为自己发挥得比平时要好得多。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家在关键时刻深切而强烈地感受到了祖国对自己的关爱之情。”

1999年，中国又一次经受了特大洪水的考验。虽然全国有三亿多人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灾难的袭击与困扰，然而我们灾区的数百万考生们则是幸运儿，他们不仅丝毫没有因此耽误大考，而且获得了最真切的关爱和帮助。这也许是中国历年高考大战中最精彩的一景。

目击之二：移家入店

那天碰到老唐纯粹偶然，没想到一向花钱比抽血还珍惜的这位老同事却悄悄告诉我：这几天他们全家都住在三星级宾馆。

“干啥？是不是换了新嫂子在城里度蜜月？”

“去去。你那老嫂子连我每月的零花钱都一分分地数，我有什么能耐休了她？”老唐实情告诉我，他是为了高考的女儿，特意住了一个星期“假日饭店”的一套标准间。“你别说，人家三星级又有热水又有空调，就是跟在家过不一样。”老唐看看表，便非要拉我到 he 住的宾馆一坐。

“假日饭店”并非在京城闹市和商贸黄金地段，所以平日客流量不是很好，但客房价格却不低，一个普通标准间在四百元以上。老唐领我进到七层 he 住的那套房间，里面除了两张单人床外，另有一张行军床。

“我们全家三口这几天都是在这儿过，晚上挤一挤，就可以省下好几百元钱，再说晚上我和你嫂子根本眯不了一两个时辰，所以从家里搬来一张行军床对付着。”

老唐在一边解释，而我则笑 he 仍然那样会算小九九。

“我哪能跟你比，一出手就是几十万字的大部头。你离开报社后，报社的骨干更少了，我这个副总编成天做校对工，一步都离不开。所以只能吃一千来块钱的死工资，这社会主义干的！”老唐还是老样子，干起工作一副革命老黄牛样，说起话满嘴半“反动”。

“说说，这回怎么舍得花大钱住高级大饭店？是为了千金成凤不是？”我揶揄他。

他笑笑：“是你嫂子下的决心。她说 she 单位上有个同事去年就是用了这个办法，结果孩子参加高考考出了好成绩，上了名校

北师大。所以你嫂子说，在孩子紧要关头，舍得花一两千块钱，要是考上一个重点大学，不就都有了嘛！我一琢磨她讲得有道理：要是这几天不能让孩子休息好，考试差上几分，一旦考得不理想进不了大学就不用说了，即使考上了，好校与差校含金量就大了去了。以后大学毕业名牌学校人人抢，次学校、次专业，求姥姥告奶奶也找不到合适工作，到那时就不是赔一千两千的事。我一想对呀，一咬牙就全家搬进了这家离考场最近的饭店。”

看来孩子的高考也让老唐变得明细起来了。“一家吃住在此，感觉与家里不同？”我问。

“当然。”老唐像刘姥姥第一次进大观园似的述说起来：“先说这房间，别看它像一个个笼子似的，它隔音呀！互不影响。不像你去过的我们住的那个杂院，隔壁人家放个屁你这边都能猜得到是谁放的。这儿好多了，孩子说困了倒下就能入睡，空调一开要啥温度就啥温度，省去了我到处着急的份。孩子学习累了，把热水一放，泡上个把小时，舒舒服服。早上也不像在家怕误时弄得全家人睡不踏实，你嫂子一个电话，让人家饭店小姐来个‘提醒服务’！哈哈，我现在知道过去你们几个记者为什么老把我按在家里，把出差的美事全都独吞了，原来出外住饭店宾馆就有这么好这么舒坦啊！就是饭菜太贵，也不合口味，这不，你嫂子回家给孩子做饺子去了。要不还真想写一篇‘高考进住宾馆就是好’的文章呢！”

想不到一个出于无奈的做法，竟使一向观念守旧的老唐也茅塞顿开。于是我想到为什么这几年每逢高考来临时，一些原本生意清淡的宾馆饭店又红火起来。原来它确实使考生和家长们方便了许多。在告别老唐后，我顺便采访了他所住的“假日饭店”经理，问问到底有多少是高考生包下的房间。

至少在三成吧！

三成？就是说约有一百多个考生在你这儿订了房间？

是的。去年最高峰时多达 203 人。今年天气凉爽，相对少了些。

我对经理提供的数字大为惊叹，因为这样大的客流量能在以往宾馆饭店生意极其清淡的夏季出现，对老板来说简直是喜从天降。

从什么时候形成了“高考客源”？无人知晓。现在各宾馆饭店把争取在高考期间接待考生这一特殊客源，几乎作为大家的共同竞争目标了。经理介绍说，尤其是近几年，不管家里条件好的或者不怎么好的市民们，都愿意在高考那几天把家搬到宾馆饭店里来，考生和他们的家长都认为，在宾馆饭店生活可以相对放松许多，如不用做烦心的家务和打扫房间一类的杂活，如果条件允许连饭都可以不做。这样，考生、家长都能省下不少时间，集中精力对付备考。

那宾馆饭店，又如何相应做好接待这个群体的服务呢？

对于我的提问，经理的话就更多了，他说他们“假日饭店”从前两年就开始订出了多种相应的服务措施：如在客房里安排不同的灯光和书桌，供考生学习；在开放原有的游泳池与桑拿外，还添置了按摩、催眠等项目；饮食部特别推出了早中晚不同的“考生套餐”和“状元营养套餐”及“状元宴”、“金榜桌”；还安排了短途考生接送专线。

真是生意人，换着花样赚钱呀！

“你何先生说对了一半。”“假日饭店”的经理狡黠地一笑，说：“我们宾馆饭店，只有把消费价格定在最适合的档位，而把服务水平提到最理想的位置，才能吸引广大‘高考客源’。”

我想也是。不管怎么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越来越清楚“高考”这场决战对一个考生和对一个家庭来说都意

意味着什么，在最后时刻想尽办法合理地利用和分配好时间与精力，显然是明智之举。

1999年7月上旬，我所到过的北京金台饭店、京西宾馆、和平门饭店等几所附近有中学考场的宾馆饭店，所看到的进进出出的考生与他们的家长之多，应该说是当今高考和以往高考有所不同的一个新景观。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这样的景观不仅仅在一些大城市有，那些富裕的或者还不富裕的地方，也有同样或相似的景观。

在苏南某城，我随99级考生家长蔡坤走进了他的“新家”——说“新家”是因为蔡坤自己的家并不在这儿。这位搞服装生意的小老板自己在乡下的家是栋三层小洋房，气派非凡，据说光装修就花了30多万元。蔡坤入住这个市郊的“新家”已经两个多月了，这儿离他在省城中学读高三的儿子学校仅几百米，十分方便。他告诉我，儿子在班上成绩中游，为了让儿子能考上大学，他在三个月前租下了这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每月300多元租金。儿子本来在学校宿舍住，但由于临近高考，复习时同学之间多少会相互受影响，睡眠也不是太好，所以做父亲的采取了“租房独住”的措施。

“效果好吗？”

“肯定好。”蔡坤非常得意地告诉我，他女儿在两年前能考成江苏文科状元与此法有关：“我的大孩子的成绩在全校一直名列前一二名，但临近高考前由于压力太大，身体不太好，当时老师和我们都为她着急，可又帮不了什么忙，我和她妈都只有初中文化，想了想，能做的就是让她睡好吃好呗！这一想，就想到了给她单独找个吃住的地方。那年我们给她找的就是宾馆，一共住了十来天，她妈天天陪着她，慢慢地孩子身体和精神缓了过来，高考时发挥正常，考了全省文科第一名，现在在南京大学读书。

我儿子比起他姐成绩差多了，处在龙门的门槛边。差是差点，但也得保他考上大学呀！所以这回我特意给他临时租了个‘新家’，能让他有相对长一点的时间安心复习和参加考试……”

“你不是在做生意吗？有时间给他做饭买菜？”

“有。”蔡坤说，他每天第一件事是把儿子的早中饭做好，然后下午再过来为儿子做好晚饭。儿子的母亲则利用白天或晚上来帮助洗洗涮涮。

临近傍晚，蔡坤的儿子蔡志军从学校回到“新家”，打开书包边做题边等父亲做晚饭吃。当他拿起饭碗时我问他这个“新家”的环境较之学校有什么好处？

“至少安静和放松多了。”他说。

我想不用多问，对一个临战的考生来说，能有这两点好处，就足够了。

“有信心考上大学吗？”

“有吧？！”说话就脸红的蔡志军低下头瞅了父亲一眼：“考不上也对不起他们呀！”

不错，后来我知道小伙子考上了军校。蔡坤来信告诉我，他的“新家”很快又被另一个考生家长包租了……

今年高考又将来临，又有多少考生的家庭已经开始了“大迁徙”呢？不用说，这一景观将更精彩，而且无论在城市还是比较富裕的农村，许多家长已经把这种高考前的家庭“大迁徙”视为一种“短平快”的投资效应。“你想，孩子从小学到高中读了12年书，还不是为了这高考一搏？家长也不轻松呀，12年陪着孩子度寒窗，为的是望子成龙，盼女成凤。到了高考的最后时刻，这把火候掌握好了，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这当口下点本钱是绝对值得的。”一位家长道出了已经在各地形成的高考前考生举家“大迁徙”的缘故。

目击之三：警笛声声

秦校长告诉我，他们以往并没有专门在高考时特请市急救中心的车子安放在学校，但他们吃过亏，也挨过家长的骂，所以从5年前开始就年年在高考期间备一辆救护车在校门口。也不知咋的，自有了救护车后，每年高考期间的“紧急情况”反倒发生得多了起来。有的家长说多亏学校备了这辆车；有的家长说，就因这救护车倒的霉。说什么的都有，但不管怎么说，要是没有救护车，下面的这些“战场突发事件”就很难处理了——

第一种用车属于常见问题。考试进入一半，有考生突然中暑。这样的情况通常好处理，只要抢救及时，一般不会有什么麻烦。问题是考生和家长并不那么配合。秦校长说，1997年高考的三天里，他们那儿的气温连续高达40℃。考场内一般没有空调，每个教室的四个角上都有一台电扇，但就是这样，学生们仍然汗水淋漓。监考人着急，学校也着急，校门外的家长更着急。但最着急的还是考生们。上午除了几台老电扇出了毛病外，没出其它什么大事。但一到下午问题就连着来了。先是A班的一个女同学做着做着题便“哐当”一下倒在了地上。考场顿时一阵躁动，监考人一边擦汗，一边维持秩序，老师们赶忙用担架抬走那女生。刚一出门，后排的一位考生嚷嚷起来：这个同学也中暑了！他这么一咋呼，全考场的同学就纷纷回头看倒下的那位同学。这是个大个头考生，他没有倒在地上，倒像睡着似的趴在桌子上。也许正是因为他个大的缘故，身子一压桌子，朝前一顶，惊动了前面考生。考场又一阵躁动。监考老师如临大敌，直让考生们只管自己考试，不要借机有任何“企图”。但事情偏偏不是那么回事。单说救护车上只有一个担架，那个女生被抬走后这位大个子男生就只能靠人背了。本考场当时两女一男监考老师，瞧

那男老师骨瘦如柴，连转动一台电扇都要咧着嘴才能挪动三十度角。救人要紧！只见那男老师上前挽起中暑男生的一只胳膊，又将另一只手搭在自己肩头，可因为身高体重失衡，差点反把老师掀倒在一边。有考生嘻嘻偷笑，女监考老师一声尖嗓门：“有什么好笑的？”吓得大家赶忙低头做题。正在三个老师手忙脚乱之时，秦校长带着两位校办食堂的师傅进来了。这俩师傅力大无比，背起考生就往外跑。谁知这么一折腾，中暑的考生突然醒来，一看有人将他“拖”出考场，就大闹起来：“我要考试！放下我！快放下我！”他的一阵胡乱折腾，弄得大家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还是秦校长安慰他说：你先让医生打一针，要是感觉还行，再让你回考场怎么样？那考生听后，突然嚎啕大哭起来，说自己这下肯定完啦！肯定完啦！他像疯了似的挣脱开老师的手，刚想回头进教室，突然身子一斜，“哐当——”一声，倒在了考场门口。恰在这时救护车正好回校，那“哗哗——哗”的警笛声再次响彻校园内外……秦校长说，这一年三天高考中，先后有八名考生中暑，其中五个送往医院抢救，三个在学校缓了几口气后再次进考场，但进医院的五名考生中只有一人重新回到考场，完成了考试。

第二种用车也属情理之中。这是另一年的高考头天。当考场的大门打开时，考生们呼啦一下拥进学校，然后又像潮水般地分流进入各个考场。可是当考生陆陆续续找到自己的座位时，学校广场上还有一名考生站在那儿发呆。老师过去问他是怎么回事？哪个考场的？不要紧张，拿出准考证来帮你一起找找。不着急，还有十几分钟时间呢。老师这一说不要紧，考生哇地哭出了声。怎么啦？你说话呀！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考生终于告诉老师：她一紧张把准考证放在换下的那件衣服兜里……老师问，现在衣服在哪里？在家呢！考生又哭了。老师一声“我的天”后，赶紧

找到校长，把情况一说。校长一看表，说赶快带考生上救护车，回去取可能还来得及。于是救护车的警笛又“哗哗哗”地响起。考生的家离学校不算远，可也足足花了十几分钟时间。等学生“噌噌噌”地上楼取下准考证，救护车一秒钟都不敢多呆就往考场跑。这当儿，老师让那考生检查一下准考证。没错，这回是明明白白拿在手里的，可就在这时，其中的一个老师惊叫一声：坏了！全车人跟着心都往外跳：又出什么事啦？老师从考生手中抢过准考证，就忍不住开骂起来：你是怎么搞的？你的考场不在我们学校，是某某学校！啊——？考生大惊失色，随即又哇哇大哭。哭什么？反正上了车，时间还够。走，司机师傅，我们把她送到某某学校！要得！司机师傅得令后，救护车一个转向，立即又风驰电掣地飞奔在街头。当救护车到达这位考生的考点，考生平安地走进考场时，车上的老师双手捂着起伏的胸口，有气无力地问救护车司机：你们怎么没来医生呀？我、我的心都要跳出来啦！司机师傅“哈哈”大笑，说你老师做了好事，用不着医生。

第三种用车让学生和家长都感意外。秦校长说，救护车看起来是为了防止大夏天考生中暑，但真正派上用场的常常并不是考生病了，倒是一些想不到的“突发事件”，让你非用救护车来救急。有一年的一件事让他难忘：那是一个监考老师的事情。这位女老师当年也有一个孩子在参加高考，当然是在另一个考场参加考试。在这紧要关头，谁不为自己的孩子“参战”着急？这个女老师身体本来就on不好，但对校领导安排她在一个考场作监考并没有回绝，因为她知道每年全市高考时抽调的监考人往往不够，需要很多老师一起上阵。她孩子有些埋怨母亲，说别的考生家长都是天天陪着孩子上考场，然后接回来，你倒好，把自己的孩子扔在一边不管，天天去为别人家的孩子忙活！她听后苦笑了一

下，说妈明天也接送你。孩子听了自然很高兴，好像有母亲为他护航，闯“龙门”的保险系数也大了几分似的。他哪知道自己的母亲本来就是带病在坚持工作。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也享受一份有家长在后面“保驾护航”的安全感，第二天，这位女老师只好比平时早起床一小时，先给儿子备好早餐后马上带他赶到他的考场，之后又立即挥手打的奔赴自己工作的考场。中午，第一场考完后，她又立即像赶火车似的奔到儿子的那个考场。儿子见母亲后兴奋地抱住她，并告诉她今天考得特别的好。母亲虽然累得就差没晕倒，可看到儿子那么高兴的神情，她打心眼里也乐滋滋的。就这样，为了自己的儿子，也为了别人家的孩子，这位女老师拖着沉重的身子，连续两天来回奔波，在第三天下午的最后一场考试结束前几分钟，她一下像散了架似的倒在了考场的后座上。秦校长和监考的老师知道她是累倒的，连忙叫来医生和几个年轻教工，将这位老师抬上救护车。这时考场的铃声响起来了，几百名考生和守在校门口的家长知道救护车里的是位为大家操心而累倒的女老师时，全都默默地站在两旁为她祈祷送行。“那情景我一直忘不了。这是无数次出动救护车中最感人的一幕，也凸现出高考中我们老师所奉献的一份真情得到了广大考生和他们家长的认可。”秦校长深情地说。

考场门口响起的警笛何止以上几次，每一个老师和传达室老教工都可以讲出一段惊心动魄或者感人至深的经历。但是在每一个故事中，我们可以感到的仍是考场内外那紧张的气氛和看不见的“战场硝烟”……

目击之四：临场血书

又是一个“黑色7月”。

大考前夜，某中学高三五个班的164名学生在老师的带领

下，浩浩荡荡地向高考目的地进发。这是一个地处农村的市级重点中学，像以往一样，每次高考时他们都得从自己的学校整装到指定的城里考场附近事先住下并准备第二天的考试。所有的时间都是在有经验的老师安排下度过的，既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太早会给考生过多的紧张压力，太晚会使考生对考场产生陌生感。

在看完考场后，老师说话了：“这是最后一次给同学们作战前动员：明天是你们一生命运的冲刺时刻，是生者和死者之间的选择，是光荣和梦想的决战，十二年寒窗的所有苦和累，将在这三天中得到回应。过去每天唠叨的话已经够多的了，现在只说一句：‘今晚好好睡一觉，迎接明天大考！’”

“咔嚓——”老师将电闸拉下，于是整个宿舍一片漆黑。这是老师们采取的强制措施，为的是让考生们能够休息好，以便明天精力充沛地上战场。所有的笔和手电之类的照明用具及学习用具也一律被暂时收缴。

“喂，你睡得着吗？”考生 A 悄悄掀起蚊帐问 B。

“废话，能睡着吗？”B 说。

“那你在干啥？”问。

B 扬扬一只手指：“看这儿……”

A 说看不到。

B 示意他悄悄走过去看。

A 凑近一摸，不由大惊出声：“哇，你怎么啦？流那么多血！哪儿刮伤了？要叫老师吗？”

B“嘘”地用嘴巴示意 A 别出声：“这是考前的最后一件必须做的事，老考生们说……”说完他把手中的一块什么东西藏在枕头底下，令 A 道：“回去睡吧。”

第二天一早，考生们以最快的动作完成了洗漱，当 A 和大

家一起走出房间时，他的两眼仿佛一下凝固了，他被走廊两侧墙上贴满的一块块大小不一的布条、纸条惊呆了：原来同学们都以各种不同的文字写下了“上战场”的血书。再看看那血书的内容，A 同学被震撼得浑身发颤——

“誓死一战！”

“我以我血为证：拼命冲刺到底！”

“搏不死则活，活不成则死！”

“为了父母！为了老师！更为自己：拼杀吧！”

“……”

血书之多连成了一片“血墙”。看上去十分庄严，也十分恐怖。

现在已经进入上海某大学的 A 同学告诉我，他本来或许第一年可以考上大学的，但正是 7 号这天起床后看到同学们写下的这一张张血书刺激了他的神经，那一年他走进考场，手中拿的虽然是考卷，但眼里呈现的却一直是那一份份血淋淋的誓词……三天考试，他的眼前无时不在晃动着同学们那誓死一搏的血书。因为他没有写，所以他觉得自愧对高考的决心不如大家那么大，有种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大家的强烈内疚。这一年他失败了。

后来老师和他自己都认为失败就失败在他没有写血书上。有老师告诉他，有一年一位平时成绩平平的学生就因为考前拿出了破釜沉舟、决一死战之心，结果超常发挥，考上了北京一所名牌大学。老师从此便常常用这个学生的事例激励考生，于是，这个中学每年高考时，总会在临考前出现众多学生挥写血书的惊心动魄的场面。

“写了血书就真的管用？就一定能考好？”我问现在的 A。

A 说他也说不清，不过同学们都这么做了，他不做就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和内疚，他本人两次高考的结果正说明这一点。

我无法相信 A 的这种说法，但我又找不出另一种解释。我所采访的一些学校，特别是农村中学，几乎都有考生在临考前写血书的情况。写过血书并走过了“独木桥”的同学们说，这种办法有一定效应，因为人在临战时需要一种置自己于死地而后生的精神准备，这种精神准备越充足，就越可能获胜。而一位写了血书又没考上的学生则说，他第一次写了“落榜可耻”四个字，但出考场后他就意识到自己不会被录取，为此他拿起自己写的血书蒙在脸上哭了整整一天。他说从此他就觉得“落榜可耻”四个字就像烙在脸上，使他不敢在老师面前抬头，也不敢在父母面前抬头，更不敢在镜子面前照自己。他说那张无形的血书永远像一块蒙耻的布条笼罩在他的心头，他再也不敢重新参加高考了。后来家长带他到了精神病医院治疗了很长时间，才重新恢复了自信心，第三年他再次走进高考考场时，什么都没有写，只是心里默默地念着一句话：我要用自己的行动抹去心灵流血的昨天！后来他真的考上了，而且是一所不错的工商管理大学。

我不是心理学家，不能解释这类现象，但在考场前看到的同学们一副副或大义凛然，或视死如归，或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我总会有所思索。不少学生告诉我，他们班在进入高三时就有人开始写下血书了，而且有人不止写过一次。我见过一位同学，她拿出三块用手绢写的血书，内容分别是：“十名是耻”、“目标重点”、“一次成功”。她向我解释，第一次写血书是因为她从高二升到高三后，前十几次班级考试排名总停留在十名水平。老师讲过，像他们这样的农村中学，成绩不在年级前五六名，是难以“跳出农门”的，更何况她是班级十名水平。她为此第一次写了血书，这份血书伴了她三个月零五天。后来她的成绩排名在班级前二名，年级前六名。这就意味着按学校往年高考升学率来说她的半只脚已经进大学的门了。但这时的她又把自己的目标定在了

考重点大学，于是又有了第二份血书。她写第一份血书时，同学们谁也不知道，老师也不知道，只有她自己知道，因为她把血书放在枕头底下，但她每天睡觉之前都要看一遍。后来，等到高三第二学期开学后，她在成绩一直稳居在班级前一二名时，她的第二份血书已经从枕头底下移到了宿舍墙上，并十分醒目地高高地挂在那儿。“目标重点”，是她在这最后的半年里最重要和最明确的奋斗理想。在7月6日晚临睡觉之前，她揭下那高高挂在墙上的“目标重点”的血书，然后像举行一个庄严仪式似的，特意找出一块崭新的丝绸手绢，轻轻地摊在桌面上，之后她站立好身子，面朝自己的家乡，闭上双眼，两手合十放在胸前，默默地说了一句话：可怜的爸妈，女儿这辈子要彻底跳出农门了，愿上帝保佑！随后她毫不犹豫地拿起一把新买的水果刀，用力划破左手的食指，鲜红的血顿时流淌出来，她伸出右手食指蘸过血后，在雪白的手绢上写下了“一次成功”四个大字。第二天她进考场时，口袋里惟一带的东西就是这份血书……

“奇怪的是，这天我进考场后竟然没有一点杂念，像是口袋里这份血书真的在保佑我。三天考试下来，我没有感到一点吃力，顺利过关。”这位如今已经是某大学硕士生的女同学很不可思议地告诉我，她说当她后来进了大学向同宿舍的同学谈起自己的血书时，六个女同学中竟有四个也都写过血书，而且一致认为它还“很灵”。另外两个是城市学生，她们虽然没有“血淋淋”的经历，但却也写过类似的“战书”。1999年北京高考结束时，电视上播放了北京理工大学附中某班全体考生写满了“战书”的一块大黑板。考前，老师把大黑板放在考场的门口醒目处，每天班主任在自己的考生进出考场时都让学生念一遍上面由自己写的“战书”，以此鼓舞士气，据说效果甚佳，全班高考录取率超过其他班。

“血书”，或者其它形式的“战书”，它在高考临场扮演着一个神灵的角色。至于到底灵不灵，老师和考生们宁信其灵而不愿轻易予以否定。

这是我在高考现场目击的独特一景。

目击之五：作弊应急

什么时代的考场上都会有尴尬的场面。高考是决定人生命运的大决战，这种时候的尴尬就更多了。想尽办法作弊，是几乎年年都会碰到的最紧张又是最难堪的一景。

参观南京的“江南贡院”后，我才知道，旧式科举考试的严格程度实际上比现在对高考考生的要求要高得多。早在清朝初期的顺治二年（1645年）政府就规定：“生儒入场，细加搜检。如有怀挟片纸只字者，先于一体枷间一个月，问罪发落。如有人代试者，代与受代之人一体枷号问罪。搜检役者知情容隐者同罪。”康熙五十三年又规定考生入场“皆穿拆缝衣服。单层鞋袜，只带篮筐、小凳、食物、笔砚等项”。可无论怎么规定，考生挟带作弊之风仍不断。南京“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中收藏有17张清代考生作弊挟带，这些小纸条相当薄，十几张叠在一起，还没有一张普通宣纸那么厚。每面直径四厘米左右的纸片上用毛笔抄录的《论语》中重要篇章，能有四五百字之多，字虽小得如同蚂蚁头大，却能看得清晰，且书法精湛。南京陈列馆曾请过专家作过试验，现在竟然没有哪一种毛笔能写得出如此小字，可见旧式科举考试中挟带作弊者之功夫和心计。据南京江南贡院工作人员介绍，以前早有人传说，科举考试中有种专门进行作弊用的“坊刻小本”，已经在民间流传近百年，但“坊刻小本”到底是什么样，谁也没有见过。1997年11月，江南贡院通过艰苦寻觅，才终于找到了一本科举考试场上作弊用的“奇

书”。发现这本“奇书”的是一位曾经参加过清朝江南乡试士子的后裔，他是在清理祖上遗留物时，从一双清代千层粉底“文士靴”后跟里面发现的。当时，这位先生看到这双年代已久远的黑色缎面绣花靴上灰尘很多，便用拂尘轻轻一拍，不料从足有一寸多厚的后跟中，突然滑出一只仅火柴盒那么大的小抽屉，那稀世小抽屉里则密藏着一件稀世孤本《增广四书备旨》。“此书为线装本，枯黄色封面，左下角微有破损。里面七十页正文纸张洁白细腻，薄如蝉翼。书长六点五厘米，宽四点五厘米，厚五厘米，其版面仅为普通古版线装书的十四分之一。书虽小，内容却包括《大学》、《中庸》、《论语》三部书的全部内容和宋代大儒的详尽注释。书中每页千余个老仿宋体字，虽然字字如蚂蚁头，然而一笔一划清晰无比，绝无模糊不清的文字，其印刷技术之高着实令人拍案叫绝。”（见《江南贡院》第76页）此书一发现，立即引起国内外新闻和印刷界的广泛关注。吉尼斯世界记录调查后，也确认此为中国现存的十万余种古版书籍中版面面积最小、文字最小和至今惟一发现的清代石印科考作弊奇书。乾隆甲子科年（1744年），有人传言到皇宫内，说有这种奇书流入科举考场之中，朝廷大怒，皇帝下令来搜，结果那年的乡试中第一场就搜出21人怀挟纸片等作弊之物，第二场又查出21人，另外2000多人因怕搜查而临场逃之夭夭了。乾隆听说后更是大怒，下令以后考试者必须脱下衣服，一件件“浸水”搜查，笔具之类的东西，也要在水里浸过三日才能允许带入考场。但仍然有高手照样作弊。

考试作弊是历朝历代考场上最激烈、动魄的一景。

现今的高考也同样，从来没有哪一年听说过没有出现作弊大案的。有考试就有作弊者，这几乎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定律。比起科举考试来，现在的高考作弊恐怕远远超过其水平。首先是现在

不可能采用乾隆下令的脱衣搜身那样的检查，那会侵犯考生人权，谁也不答应，谁也不敢这么干。这就使得“挟带”有了可乘之机。但这是最原始也是最容易被发现的作弊手段了，可监考的老师告诉我，每年的考场上总能抓住几个采用这类低级手段的作弊者。当然即使同为原始的“挟带”，今天与过去相比也先进了许多。有监考老师发现，某学生的“挟条”是用复印机特殊处理的，他事先把公式和语文试卷可能要出的古文，全都用复印机缩小在巴掌大的纸片上，字虽小，可看起来十分清晰。几十个数理化公式一微缩，也就手指大小。“亡命者”敢于为此冒风险，“难办的是一些女生”。当了十来年监考的某校王老师说，他在1988年就遇到这样一件事：在监考时，他发现有个女生老掀裙子，这个动作是很容易被联想到作弊的，当时现场监考的共三个人，两男一女。那女考生很有心计，女老师在的时候她不掀裙角，一等女老师出门解手什么的时候，就猛掀裙子。王老师和另一个男老师想上前阻止，可一到女考生座位前，他们就觉得无从下手，因为一旦人家反咬你一口便够受的。他们赶紧请回那女老师，后来女老师就上前把那女学生“请”出来，让她自己掀开裙子。

“掀就掀！”女考生一点也不紧张地有意当着其他男老师的面把裙子掀得特别的高，连里面的小三角花裤都能看得到，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这个机智的女考生其实打了个时间差。

老师们尴尬地相互看看，不知如何收场。而就在这时，那女学生捂住脸大哭大闹起来，边哭边骂监考老师“欺负”她，说什么也不进考场了。这一闹惊动了整个考场，也把考场外的包括那位女考生的家长招来了。好家伙，校长和门口的保安人员一齐上阵维持秩序。因为家长们都向着那考生，说你们这些监考的，不能没有凭证就冤枉人呀！王老师他们有苦说不出，只好忍下这

口气，结果是学校校长出面向那考生和考生家长赔了不是，才算平息了此事。“你说我冤不冤？事后学校还把我们几个批评了一通。从那年起，我尽量不跟女考生较劲。不过，有时实在看不下去，所以就得罪人。弄不好还会丢小命哩！”王老师说，他们学校就有个监考老师，不知是得罪了哪个作弊的考生，有一次她下班回家，半道上走着走着，被人用车“哐当”猛地撞倒在马路边上，当场晕了过去，整整住了三个月医院，她的胳膊才痊愈。这位女老师在倒下时，听到有人狠狠地朝她说了这么一句：“看你在考场上神气！”王老师说，他们学校地处小县城，相互之间都很熟悉。那些记恨的考生认为，是你监考老师跟他过不去才使他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却不从自己方面找原因，这使得很多老师宁愿不要几百元的监考补助，也不想因为一次监考造成个人和家庭的意外伤害，故尽量把监考的担子推掉。“但再推也总得有人去干，所以我们进了考场心里也发毛。见了作弊者不揭穿，对其他考生是很不公平的，可要揭穿一起作弊，你自己就得增加一份心理负担。作弊其实是最叫人痛恨的事！”王老师说。

考场作弊是历年高考中的顽症，而且现在的形式与方法之多，远远超过了监考老师的能力与经验。先不说老师与考生之间的相互勾结着的作弊，也不说某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本地的升学率而进行的集体犯罪性作弊，单说考生自己的个人行为，现今的作弊技术和手段之高之先进，也已令人叹为观止了。

BP 机刚在大陆出现时，有人就用场外的电话给场内的考生 BP 机上传达信息或答案。后来有了手机，有人就用内外两部手机进行直接“对话”，其准确率远高于 BP 机。再后来听说有人用遥控装置，把一种微型无绳接收器放在耳孔内、衣袖口进行内外“考答”。这样的考试极其轻松，考生只要轻轻对着藏在隐秘处的小话筒读题，无绳传感器便将考题传到场外的接应者那儿，

场外的人迅速通过翻书或查电脑把考题答案告诉场内，这个过程之快捷和它比电扇声音还要小得多的传感效果，可以在监考老师的眼皮底下做得天衣无缝，一丝不露。当然，上面的这几种利用先进的高新技术作弊，后来都被发现了，但没有发现的又有多少呢？天知道。

有一次我到某大学采访，几位“过来人”给我讲起了他们的“高招儿”，我在现场目击后，简直目瞪口呆。

张和李现在同一所大学里读书，他们给我“演示”了两套作弊招术：

一是利用手势。张和李从小是好朋友，彼此间一抬足，一举手，尽在不言之中就能相互间明明白白。他们表现了如某题错与对的手势：张在为难时，他便佯装思考，将一只小手指竖起。一边的李便知道张需要他“通报”。下一步便是张把某题有难告诉对方，用的依然是手势。李一看张的手势便知道其困在何处，于是就能准确无误地发出信号：错为手指在空中一个打×，对便是用手势做一个勾的动作。他们俩人在做这些动作时只须用零点几秒的速度就能完成。张李说，这套“手势”他们用过很多年了，几乎可以打遍“校考”、“市考”、“省考”、“国考”等各种考试。

另一套作弊方法是以桌面上的四个螺丝钉为代号进行“操作”。一般课桌上都有左右上下四个螺丝帽，张李早先就以这四个螺丝帽编好了一套完整的文理“密码”。比如现在计算机统计题分中文理科都有不少是选择题，张、李他们对付这类题是最拿手的：第一道若是对，便在右上方那颗螺丝帽上点一下，假如是错，就做一个划“横线”的动作。当然根据题的难易程度，左右上下螺丝帽合理搭配运用也就是了。

“你们俩人当时高考是不是在一个考场？”我问他俩。

张、李笑了：“我们运气好，总在一起。”

“那你们运用过上面的战术？”

张、李狡猾地一笑：“谁知道！”

我跟着他们笑了。又问：“听说现在大学里作弊现象也特多。你们的合作仍在继续？”

“必要时有可能。”说完，他们又大笑起来。“喂，大作家，我们可什么都没给你说过呀！特别是我们绝不出卖专利，你可千万不要将我们的专利传出去啊！”他们在我临走时不放心地叮咛道。

我也诡秘地朝他们笑笑，心想，你们的把戏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样至少可以防止再有人敢仿效。其实我也知道张、李的手段仅仅是无数作弊“技术”中的一两种而已，还有很多很多没有被发现的。

每年高考现场，监考老师都能在考场中捉住一些作弊新招，而同样，也有不少是老师发现不了的。被发现和目击到的，永远是有限的部分。

目击之六：焚书坑包

对学生来说，什么事最解恨？十有八九会说考完一次大考后最解恨。自然，像决定一生命运的高考，对多数学生来说，那无疑是最解恨的时刻。在高考现场，当三天的大考最后一声铃响起时，当考生们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在跨出考场后，那种久积而又从未释放的情绪与情感，会如埋在地层深处的岩浆突然爆发一般涌出来。

我观察了 1999 年高考结束时的北京某一考场实景：有人开怀大笑地喊着：“别了死亡，我活过来啦！”有人搂住迎过来的母亲或父亲，失声痛哭起来：“我好苦，现在总算出头了！”有

人则低着头，沉默不语地悄然躲开喧哗的人群，独自擦着溢出的泪；也有人又蹦又跳地将手中的笔和纸抛向天空……最让我惊诧的是，我看到有人抢过父亲手中的打火机，发狠地将几本《高考复习题要》连同书包，当场点燃并使之化为烟云，然后又发狠地用双脚踩了数下。有趣的是，站在一旁的父亲微笑着也走过去，协助儿子将半只未燃尽的书包重新挑起来，点上火，再痛快地燃烧了一把。最后，父子俩在熊熊燃烧的烟火中拥抱在一起，他们用这种特殊方式庆贺自己的胜利——儿子的胜利是赢得了考试的顺利过关，老子的胜利是宣告了精神上的彻底解脱。

许多学生和老师都曾目睹过高考结束时一次次庄严而欢悲的焚书仪式、坑包葬礼。

有个农村中学的老师说，他们学校每年在高考结束时，在学校操场上都有学生自发组织起的焚书仪式，而这种特殊仪式校方也阻止不了。“那焚书的场面极为壮观，几十个甚至数百个同学，每人将宿舍和教室里自己的全部课本和复习资料、考卷统统搬出来，堆放在一起，真的像山一样高。然后同学们把它点着，一样样地烧掉，火焰越燃越大、越燃越高，从白天一直能烧到天黑。有的同学火堆旁跪着默默地祈求，也有人四足直挺挺地躺在火堆旁一任高温炙烤，也有人在那里相互搂抱在一起痛哭……开始围着的仅是毕业班的同学们，后来其它年级的同学也来了，再后来老师们也围到了火堆前，大家一起默默地流泪，高声地欢呼，那种场面太叫人联想，太叫人想哭，太叫人歇斯底里了。不管是高考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大家都有一种要告别一段刻骨铭心历史，要告别一段难以忘怀的情结，要告别一段梦想与屈辱的努力……”这位老师用诗一般的语言，向我描述了他所目击的焚书场景及考生们面对焚书的心境。我从他的描述里感受到的东西很多，广大考生和老师在向这种必需又无

奈的高考制度，发泄着自己心头那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情绪，同时也在为自己付出的巨大代价作最后的葬礼，或者说是祭奠。

书烧了，情了了。高考和为高考付出的每一天，每一题，每一页纸，每滴汗，需要有一个碑、一片林来作证。

“来吧，我们每人献出高考前用过的最后一个书包，作为这片土地的肥料与养分，再栽上象征我们全班同学共同生命的小树吧！”在某学校前的一个小山坡上，一群同学们庄严地摘下肩上的书包，一个一个扔进挖好的大坑里，大家轮流往坑里填土，然后在里面栽下一棵挺拔的小树，又细心地用脸盆、茶杯、小勺浇上水，最后排队列在小树的周围，举手宣誓：我们的昨天刚刚结束，生命还在继续，努力吧，像小树一样茁壮成长……

当我听完这段故事，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我在想，经历了高考的中国学生们，他们才是度过了真正意义上的“成人节”。因为只有经历过高考的人，才能体味到什么是梦想与光荣，什么是努力与无奈，什么是痛苦与屈辱。经历高考，标志着孩子们开始成熟，开始了崭新的人生。

有位城市的考生家长对我说，他孩子考完高考后，也采取了焚书的形式告别中学，起初他和妻子都反对孩子这么做，认为不应把书烧掉，应该留下，或者卖掉也值几个钱，可孩子不同意，坚决要烧掉。后来他和妻子没有阻拦儿子的行动，他们感觉应该尊重孩子。孩子在烧完书本后大哭了一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只觉得这么多年太苦了，你们当父母的也很苦，我不想再回忆小学、中学所走过的每一步路。上大学了，我要重新做我自己想学想做的事，要不这个世界上就会失去本该是我的我。

我想无论是谁，我们确实应该深思一下这位孩子说的话。它关系到我们整个民族的教育形式与内容，改革与未来，而且又何止是教育问题，应该是未来中华民族生存和本源啊！

人类是决定世界所有事物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因素，而青年一代，则是决定这个世界的未来的全部因素。

C 章 苦水倒不尽 青春好烦恼

很早以前，英国的著名历史学家 H·G·威尔斯曾这样告诫过我们：“人类历史越来越成为教育与灾难之间的比赛。”我们都知道英国是个素有绝对化的经验主义传统的国家。而一位著名历史学家能在这样一个传统的国度向全世界发出如此告诫，足以让我们振聋发聩。

灾难是什么？灾难就像 1976 年唐山大地震，人们在睡梦中没有来得及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时，二十几万人就已经命归西天；灾难就像 1999 年烟台“大舜”号船被一阵狂澜掀至海底，二百几十号人顷刻间死于非命……

灾难是什么？灾难就像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几千万人不得不把阳光与爱情抛诸脑后，去投身战争与死亡；灾难就像“文革”那场浩劫，无数善良的人被推到了审判台并且被处以死刑……

灾难有自然的与人为的两种。20 世纪后，人类面临的灾难越来越多。

威尔斯把教育同灾难联在一起，并宣称它们之间在进行残酷的比赛，确实有些耸人听闻。可是当我们回首今天我们正在恪守的那一套教育方式与方法时，就会发现，我们正在教育问题上不断地制造着与天灾人祸一样可恶的无数越来越严重的灾难！

可以置青春生命于死地的灾难的最直接和最严重的受害者，便是我们的高三学生。

曾经，很喜欢在中午的阳光下，坐在学校的草坪上与学友海阔天空地神聊，高兴了，就去荡一荡操场角落的秋千。而现在，我早已习惯在曾是快乐闲逸的时光里，与同学们互相考着数不清的公式、定理和单词，而那秋千的影子，也不知何时已在我心里生了锈，因为我是高三生。

曾经，常常在抽屉里藏一本厚厚的小说，趁父母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翻看，也常常在晴朗的黄昏，邀伙伴去打乒乓球。而现在，我的案头和书架上，五花八门的参考书堆积如山，而我可怜的球拍早已尸骨无存，因为我是高三生。

曾经，每每迫不及待地复回远方一个飞鸿，也热衷于为了博取“寿星”的一笑，在朋友生日之际跑遍一间间精品店，去挑选合意的礼物。而现在，面对青鸟带来的问候，我的信笺一再空白，我的心底一直“SORRY”，也只能一次次用“生日快乐”的敷衍，代替往年带给友人的那一声惊喜的喊叫，不能再像从前一样心中默念的是“友谊万岁”，此时心中脑中全是满满的语数外史政，因为我是高三生。

曾经，爱在窗外淅淅沥沥飘着小雨的夜晚，让我的小屋裡回旋起几缕柔柔的旋律，而我在音乐与细雨的感染下涂抹几行空灵的文字；也曾爱策划出一个个诸如“去看海”、“去听音乐会”之类的假日行动。而现在，我的磁带盒上已经积满了一层不薄的尘灰，我的诗干枯了，无法再浪漫了，因为高三。

曾经，我还有许多曾经，可是，我无法再想这些曾经了……

看看现在的高三日子，心中不禁掠过一丝丝怅然。失去的，好像很多，然而路却是自己选择的——“人生能有几回搏”？

.....为了那一瞬的笑颜，我无奈依然紧锁那颗想飞的心，安安稳稳地在蜗居里苦读。只是偶尔有不甘心的瞬间，就狠狠地想一想：哼，等高考完了，我要游内蒙、下海南，疯狂地“报复”一下！

.....

这是我正准备写处在高考最前沿阵地的高三学生的心态时，无意间读到的深圳实验中学心愿同学的一篇作文。

听听这个庞大群体的青春生命的沙哑呐喊，我感到的是一种与这位同学同样的无奈与沉重。我们的官员、老师、家长，还有所有以“有社会责任感”自居的人们，读此小文，也许会想起些什么，也许会明白些什么.....

关于高三生，想说的话太多，也太多彩又多悲。平时，我们只注意了他们的升学率，却难有心思平静下来听听他们的心里是怎么想的，现在我们就借这个机会一起来听一听吧，因为这对人们是有好处的。

作息表，我的“生死牌” ——高三学生诉说之一

其实，我的学习作息表在初三时就有，那是爸爸妈妈为我参加中考准备的。后来我考进了市重点，于是在进入高三后，爸像指挥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前线指挥官似的命令我：现在的“战况”会比中考时要激烈紧张得多，你应该而且必须有张以分秒为计算单位的作息表。于是我赶紧制作高三的第一张“作息表”，大体如下：

5点：起床。

5 点 10 分：穿衣洗漱。

5 点 20 分：吃早餐。

5 点 35 分：离家骑自行车上学。

6 点至 8 点：自习。

8 点至 11 点半：上 4 节课程。

12 点：自修。

13 点至 16 点半：上完下午 4 节课程。

16 点半至 18 点：两节强化班课程。

18 点至 18 点半：自行车回家路途。

18 点 40 至 19 点 30 分：吃饭外加看新闻联播。

19 点 30 分至 21 点 30 分：做作业。

21 点：休息 10 分钟。

21 点 10 分至 23 点 30 分：自习。

父亲对这张“作息表”表示初步满意，末了他加了一句话：重在质量。他的话中有话，因为在中考时我也是用类似的“作息表”，结果常常在最后的一个多小时里实在困得不行，伏在书本上睡着了……

“高三了，一生的命运与前程就在这一搏上，你自己应该清楚。”父亲的话跟老师天天灌的一模一样。我感觉就像希特勒真的要打到斯大林格勒了！

但，大人们都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时间表是死的，现实的许多情况是活的，就像战争一样，突如其来的变化是决定能否取得战争预期胜利的最根本因素。比如我从家里到学校需要半个小时的自行车路程。可下雨怎么办？有一次长安街上的警察就是不让横穿，一定要等一队长长的国宾车队走过。整整 20 分钟，我因为急着到校，差点让警察把我当作“破坏分子”扣到派出所。

那天我心里堵了一肚子火，最后把一个老太太撞倒了，其实我明明看到她在我自行车还离她有一米左右的时候，就“啊呀啊呀”地先倒了下去。这个擦破了一点皮的老太太死赖着让我拉她到医院去看伤。我说我是学生，我要上课去，我把名字留给你，如果需要我出治疗费，我一定让我父母来付给你。可那老太太就是不放，说你留的名字和电话如果是假的呢？我的天哪，当时我真想哭，也真想跪下求她，但没有办法，她还是死死地拉住我的书包带不让我走，更可恶的是，在场的两个中年人也跟着起哄，不放我走。到医院一检查，什么伤都没有，只花了 20 块挂号费和一点包扎费。这时老太太才放我走，可已经 11 点了。半天课没有上，我就得利用其它时间补回来。

哪有时间补呀？我每天的二十四小时是严格地被安排着，就是拉屎刷牙，也都必须严格控制在五分钟内，否则老爸就会说我是有意磨蹭。那次为了补课，我不得不利用同学中午吃饭和课间休息的间隙，摘抄老师讲课笔记。谁知那几天倒霉事都让我碰上了，可能中午吃的饭冷了些，不争气的肚子就闹起来了。这一折腾我就开始发烧，一直烧到摄氏 39.5 度。在医院一住就是 3 天，打针、吃药，吊葡萄糖，那几天里虽然我的脑子迷迷糊糊，但躺在病床上的感觉却是那样地好。因为多少年里，我天天都得无休止地早起晚归，无论刮风下雨，无论烈日暴晒，听不完的课，做不完的作业，好像活着就是为了填海般地往脑子里装知识——谁知道这种知识以后还能否用得着。看样子爸妈都很着急，看得出，他们大半是怕我耽误太多的课程，而并非关心我的身体。第三天夜间，我的高烧实际上已经全退，老爸从我的饭量上判断我可以出院上学了，就对医生说，明天早晨再测一次体温，如果不烧了可以出院吧。医生说正好他们最近病人特多，床位很紧。我心想，见鬼，这么舒服的地方，我不多呆几天才亏呢。于

是我想出了一个计谋……第二天八点左右，小护士过来为我测体温。几分钟后，她从我嘴里拿出体温表一看，那双很大的眼睛睁得更大了：“怎么，又 38.4 度了？”说完，她过来用手摸摸我的头，而这一切，我们配合得天衣无缝。“嗯，这孩子是没退烧。”前来给我准备收拾东西的老爸傻眼了，也露出几分急相，他听完小护士的话后，连忙问：“能不能出院呀？”小护士不高兴了，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孩子的烧还高着呢，你怎么让他出院？”我听着心里不知有多高兴，脸上却装出一副极其痛苦的样子，把头紧紧地捂在被子里。当我的目光与老爸那双疑惑的眼睛碰到一起时，赶忙避开……哈哈，我太高兴了，因为我又“合情合理”地躺过了三天的“作息表”，这是整个高中三年里最舒服的六天时间，也是惟一不用早起晚归的六天，然而我是在病床上争取到的。

你一定在想我的那张“作息表”上漏掉了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周末的两天。对了，这正是我要向你说的。如果说一二三四五的几天里，我是在靠那张用分秒来计算时间的作息表去生活的话，那么周末两天里我的另一张“作息表”简直就是一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战斗图。请看——

星期六：

6 点起床（比平时我获得了一小时的优待）。

6 点 10 分：洗漱穿衣。

6 点 20 分：早餐。

6 点 40 分：从家出发，倒三次车，赶到宣武东经路的育才中学。

8 点 30 分：开始在那儿上三节英语补习。

11 点半：下课，在附近吃一顿便餐。

12 点：乘车往西城黄城根的四中奔。

13 点一直至 20 点：上完四中的“同步班学习”课程（中间有二十分钟休息，能吃一个热狗充饥）。

21 点：回到家，半个小时吃完全天惟一的一顿踏实饭。

21 点半至 23 点半：做两个小时的作业。

星期日：

6 点起床（同样比平时多获得一小时的优待）。

6 点 10 分：洗漱穿衣。

6 点 20 分至 7 点 20 分左右进行一个小时的早自习。

7 点 30 分左右，与家人共进早餐（这也是每星期惟一能与家人共进的早餐）。

8 点半至 12 点：完成两个补习学校的作业。

12 点至 12 点半，与妈共进午餐，老爸为了我的学费和改进全家的经济落后状况，每周在一位开饭馆的东北插队战友那儿帮忙一天，早 10 点离家，一直到晚上 9 时左右回来。

12 点半以后，开始做自己学校的作业，这个任务一般都要到吃晚饭后的前两个小时才能完成。

21 点至 24 点：自习（这是老爸规定的每星期“法定三小时”）。

周末两日的“作息表”是雷打不动的时间，其单调与所付出的艰辛甚至超过平时。也许我的脑子里总有一种想偷懒的意识存在，周末的日子里，我常常有意跟好脾气的妈妈作梗。

一次是“鸡蛋剥壳”事件。

那天是周六，我依然早上 6 点起床，等洗漱穿衣完毕，便像往常一样收拾好书包，坐到妈妈已经准备好了的饭桌前。早餐基本是固定的样式：一杯牛奶，一个煮鸡蛋，两块面包。可是那天

我“出奇”地发现了一个问题：每天由妈完成的一道工序，这天不知怎么被忽略了：鸡蛋壳竟然没有剥好！于是我便大惊小怪地叫起来：妈，这让人怎么吃呀！快来快来！

妈正在忙着给外出的爸爸找衣服之类的东西，被我这么一叫，便赶紧从里屋往小餐厅走。“啥事？”妈的神色显得很紧张地问我。

我像老爷似的伸伸脖子，冲着桌上的东西说：“你看，鸡蛋壳还没有剥呢！”

妈突然感到自己像做错了什么事似的，嘴里连声说着：“哟，我咋把这事忘了！”说着就动起手剥蛋皮。妈的手动了几下就又忽然停了下来，怒发冲冠地对着我大喝一声：“你死人啊？这么大的人怎么连个鸡蛋壳都不知道自己剥一剥呀？”

我呢，死心眼一个，眼睛瞅着墙上的那只挂钟，嘴里却不知不觉地吐出了这句不该说的话：“我是死人吗？你没看时间多过了五分钟呀！我要迟到了你知道不知道？”

这时，我见妈一下像泄了气似的瘫倒在地，双手拍打着自己的双腿，悲切地哭嚎起来：“我这是作的什么孽呀！你这个臭小子，我、我要是死了你怎么办呀？呜呜呜……”

妈妈的哭声把我唤醒了：是啊，我都 18 岁了，难道为了上大学而变成一个连鸡蛋壳都不会剥的寄生虫了？假如是这样，我上大学又有什么用呢？对得起辛勤的父亲和善良的母亲吗？我仿佛自己一下从多年养成的恶习中醒悟，抖着双手将瘫坐在地上的妈扶起，并对她说：“妈，是我不对，以后我自己剥鸡蛋壳。”妈一听，愣了半晌，然后破涕为笑，说：“不怪你，是妈耽误了你的时间。”说着又站起身麻利地为我剥着鸡蛋壳。看此情景，我的眼泪忍不住哗哗落下，“哇”地一声扑在了妈的怀里……妈妈笑了，带着几分苦涩，然后指指墙上的钟表：该是上课的时间

了！我低头“嗯”了一声，便匆匆吃过早餐去了学校，但从此，每当我坐在桌前吃起妈妈做好的饭菜以及剥光壳的鸡蛋时，心中自然而然地恨起墙上的那只钟表，以及我自己的那两张“作息表”，我无数次地撕毁过它，可又无奈地无数次重新将它贴到床头的墙上……当我无比愤恨它的时候，我又会突然想起妈妈的那次瘫坐在地上的哭嚎和父亲每个星期天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的情景。

我只想好好上完高三，争取考上大学，这也许是惟一能真正撕毁“作息表”的出路吧！因为我深深明白，那张不起眼的“作息表”，既是我命运的“生死牌”，又是爸妈对我的“希望榜”……

“我没病，为什么非要进医院？”

——高三生自述之二

我是个女孩，从小天真烂漫，爱说爱唱，但是考进重点中学后，我的“擅长”被无情地剥夺了，特别是进入高三后，那个50多岁的“老人家”——我们都偷偷地这样称那位年过半百的老师，就更不得了啦，几乎每天要在课堂上讲一通：“同学们，现在是最后的时间了。命运就掌握在你们自己手中，把一切爱好、一切性格全部埋藏起来，集中所有精力，学习、复习、复习、学习……”在她的严管下，班上的文学社停了，歌舞组停了，甚至连女生和男生之间的玩笑也停了。如果她见我们同宿舍的几个女生在中午休息时说段开心话，也会板着脸过来训斥道：“有时间说废话还不如多养养精神！快，去午休！”

日复一日，我们往日充满活跃和朝气的班级，变得除了读书和回答问题时有声音外，仿佛相互都成了陌生人，除了埋头做作业，就各自捂头睡大觉。不是没有想说话的人，也不是没有想笑

的人，只是那个“老人家”时时刻刻像幽灵似的站在我们身后。当我们刚想彼此说一句轻松的笑话时，突然发现她在身后站着，神经就会一下紧张起来，刚刚有的一份开心也随之消逝了……唉，我是个从小爱说爱笑的人，从小学到初中，如果一小时里没有从我嘴里说出一句逗得老师和同学乐弯腰的笑话，有人就会以为我是不是生病了。可是到了高中特别是高三后，“老人家”似乎对我格外严管，想必她早已从其他老师那儿了解了我的秉性，所以，只要有同学刚想与我说上一两句轻松些的话，又立马将后面的话咽回肚里，脸色也变得非常特别，这时我转过身，准会看到“老人家”就站在我身后。慢慢地，同学们远离我，仿佛见了我就像见了艾滋病患者。有一次我真火了，抓住一个原本与我很要好的女同学，抱住她就挠她痒痒。谁知那同学急得大嚎起来，她越嚎我就越使劲搂住她，谁知她竟用胳膊狠狠地捅在我的左脸颊上，在我“哇”地叫疼的那一瞬间，她逃跑了。我当时愣在原地半天没有动，我心头感到无比惊骇，难道同学们都因为迎接高考而变成连玩笑都不能开的小胆子“羊羔”了？当我再转过头时，我又看到了那个“老人家”——她毫无任何表情地告诉我：下午下课后，到她办公室去一趟……

从“老人家”的办公室走出来的那一刻起，我就发誓：高三里，我再不与同学们说一句话！

日子一天天这样过去，我发现，以往总跟在我身后的那个“老人家”也不再像幽灵似的盯着我了，而且那张古板的脸有时也朝我笑笑，可我觉得她的笑与狼嚎时的狰狞没有什么区别。

日子又这样一天天过去。母亲发现了我的问题，说丽丽你怎么啦？以前人没进家就听你嘻嘻哈哈的声音，现在怎么一晚上不见你说一句话？我挥挥手，朝她说：“别烦我，忙着呢！我要做作业。”

妈妈“仔细”观察了几天后，跑到了学校，找到班主任，问孩子怎么啦？是不是没考好被老师批评了？还是出了其它什么事？“老人家”这回可给我说了一大堆好话，说你孩子现在进步大啦，也管得住自己了，这样下去考大学一定不成问题。“我有经验，女孩子在高三时最重要的是把她那颗玩野了的心收回来，这就等于高考成功了一半。”那“老人家”非常得意地跟我妈侃侃而谈。

我妈将信将疑地在家静观了我一段时间后，有一天突然走进我的房间，说：“小丽，你明天别上学了，妈带你到个地方看看病。”我感到很惊讶，问为什么？妈说：“你别管，我已经向你们班主任请假了。”当时我觉得很生气，可一想也行，少上一天课，还可以轻松轻松呢！

第二天，妈妈领着我到了市第六医院。我一到门口，就不肯进去。因为我知道这是一所精神病医院，初中时我班的一个女同学在这儿住院时我来过，而今天我妈竟然也把我当作精神病来就诊！

我气极了，不管妈在后面使劲地喊，我气呼呼地只管自己一个人走路。

回到学校，“老人家”一见我就装模作样地过来关切地问我怎么样。我没有好气地回敬她：“什么怎么样？”

那声音肯定很大，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起来。我没料到的是这回“老人家”竟一点儿脾气都没发，还招呼班上的同学说，以后你们要对丽丽同学好一些。

这是什么话？我心头的火更大了。中午休息时，我想找要好的同学透透心里的火，不想同学们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就连连摆手说好好，是你对是你对，便躲避到一边去了。

我想完了！于是就声嘶力竭地喊：“你们是不是神经都有毛

病啦?!”说着，我就把一只茶杯摔了个粉碎，茶叶溅到了几个同学的床上，但是同学们谁也不发一点儿火。看到大家无动于衷、待我小心翼翼的样儿，我哭了，悲痛地嚎啕大哭了一场……

之后，妈妈又没让我上学，带我到了一所大学的心理咨询中心。那里有个“专家”，听说还是博士，我妈十分认真地对我说，一定要配合“专家”，问什么你就答什么。“我带你来之前就打听了，他们说这个专家治好了很多学生的病，人家还是北京心理学会的什么常务理事呢！”我妈已经“走火入魔”了，好像真的非要从我身上挖出点毛病来才是。那天我真急了，就在“专家”就诊的门口，跟我妈嚷嚷起来：“我什么病都没有，狗屁专家我都不看！”妈想不到我会当众这样向她大声嚷嚷，“啪”地给了我一巴掌。当时我的眼泪“哗”地涌出眼眶，心想这世上还有谁能理解我呀？妈，我恨你，恨你也不知女儿心！看着我妈那副后悔的样子，我也心软了，就想既然来了，我也好让“专家”证实一下自己没有病。

“专家”的诊室就是不一样，里外两间，外面的那间墙上挂满了各种脑神经结构图，大大小小的，还有外文的，他的书架里还放了不少诸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等书籍，给人感觉他很有学问也很“专业”。

“专家”见我后，先装作很随便地问我当前的“小燕子现象”怎么看？

就诊就这样开始？我用眼睛瞪了他一下，心想谁有功夫跟你谈论“小燕子还是大燕子”，赶紧拿出你的真本事还我清白！

“专家”见我毫无表情，也不回答，便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你觉得未来的因特网是否可以与人脑连接呢？”

狗屁，你知道人脑怎能与狗脑同样思考一个问题吗？这话我是心里说的，但觉得很过瘾，因为我已经认定：这样的所谓

“专家”也是无法还我清白的，或许更倒霉。

算给我说中了。在发现我几次毫无反应与厌倦之后，“专家”便让我妈在外屋稍坐等候，带我进了他的里屋。这是一间约十来平方米的小屋，里面除白白的墙外，什么色调都没有，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而这位“专家”则颇为认真地又问了我几个诸如“你假如真的感到心头烦躁，就可以在此敞开心扉”、“或者你感到外面的世界对你很压抑，而在这里你用不着顾忌什么，大喊一声也行，高歌一曲也成”之类的话。听完他的话，我差点没笑出声，心想好端端的人，跟一个陌生人有什么可谈的，真要是在这儿大喊大叫不真的成精神病了吗？哈，看来所谓的“专家”才是一些有病要医的人哪！

上面的这些话自然没有说出口，我也没有在脸上表现出什么，只是依然一副冷漠。

“专家”像是使不出什么招，于是便让我出诊室，他有话要对妈单独说。

我在门外隐隐约约听到他在跟我妈说是“不轻的抑郁症”，“而且患这类病的人容易表现出冷漠、烦躁，严重的甚至还会自杀。我这儿有份国外资料证实：大约有60%的自杀者都患有这类抑郁症……”专家的声音越说越小，像怕我听到似的，而我听着听着则越发感到好笑，终于忍不住在外面大笑起来。

妈妈赶紧从诊室走出来，急切地问是怎么回事。跟在她后面的“专家”则若有所思地对我妈说：“好哭好笑都是抑郁症的表现形式……”

我再也压不住心头的話，大声叫嚷道：“你才是抑郁症呢！妈，走吧，我什么病都没有，咱们回家吧！”

妈妈满心疑惑地看着我，又满心疑惑地看了看“专家”，然后抱歉地向“专家”说了声“对不起”。

本来我想在回家的路上跟妈好好谈谈，也借机想奚落一下那个所谓的“专家”，可是看着妈在半路上拿着“专家”给我开的方子走进药铺时，我的心彻底地冷了。

那一夜，我听爸爸和妈妈吵了很长时间，爸说我妈是神经过敏，妈说她宁可神经过敏一些，也不能因为孩子有病给耽误了高考的大事。我呢，心想反正自己好端端的，于是只管蒙头大睡……

不知什么时候，我突然被妈叫醒，旁边还站着爸。

“丽丽，你说，今天是上学还是去医院住院？”妈非常认真地问。

我看看她，又看看爸。我发现爸在朝我笑，于是壮着胆子回答说：“妈，你女儿好好的，自然去上学。我又没病，为什么要去住院？如果你不相信，那么你还像以前那样让我痛痛快地唱首歌……”

爸爸适时地从里屋将我尘封已久的吉他拿了出来。

于是我“噌”地从床上跳起来，像快乐的小学和初中时的样子，边弹边唱了首李玟的《好心情》：

……

我们都被祝福
常常有好心情
一见你就有好心情
像矿泉水清凉在心
融化太多太多的情感交集

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言喻
有你就有好心情

像夏天吃冰淇淋
因为想法感觉都有了感应
每个眼神都变成了动力

我唱完时，见妈的眼里溢满了泪水，她紧紧搂住我说：“我们的丽丽没病，真的没病……”

“是的妈，我什么病都没有，只是到了高三后，学校不让乐不让笑，所以我才……”爸见我们母女俩抱在一起“犯神经”，便忙拉起我的手：“走走，今天我送你上学去，再跟你们老师谈谈。”

从这天开始，我终于结束了“有病”的日子，重新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紧张而又快乐的高考冲刺中去了……

我在乎分数，但更要自尊
——高三生自述之三

那天我跟父亲的争执发展到了极点。你们也许认为我可能是考得不好，老师找到家长告恶状，不是的，那天我考得非常好。数学得了少有的93分，而只比坐在我旁边的班里第一名少了几分。这本来是我从没有过的得意之作，可是老师偏偏让我伤心得差点跟他打起来。他说：“你能得这么好的成绩？不可思议。是不是偷看了旁边同学的？”他问这话的时候，班上有好多同学。我再也忍不住心头的怒火，说：“要是我偷看了别人的，我就是猪。可如果谁硬冤枉我，谁就是猪！”

好了，正是因为这句话，我的老师就破口大骂起来，说我存心欺负他，并把我曾经有过的所有“恶迹”——如进这个高中班是家里出了3万元钱才进来的，如在高一时曾得过四个“不及格”，尤其是得过一个“超级高分——7分”全都抖搂了出来。

他好像觉得这还不够，便在我下课回家前先一步找到了我父亲……

“你小子丢人丢到我公司里呀！”一向在外对别人说一不二的父亲，回到家第一件事就让我“老实交待”：“你、你这个小王八蛋，用手指掐掐你的年龄吧！18岁！18岁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成人了！如果你自己还认为自己是个人，你今天就老老实实把事情说个清楚！”

当董事长的父亲很少能在晚饭时准时回家，今天必定要跟我“算总账”了，那架式使我马上意识到那个“猪”老师找过了他。说实话，从小我就畏惧父亲，他急了会真的朝我拳打脚踢。记得上初中时，我因为差了7分没考上重点中学，他就用铁榔头般的大拳揍了我整七拳，打得我以后每次考不出好成绩时都能想起那一顿狠揍。高中了，父亲的拳头不再落到我身上，可无数次在我眼前挥动过。说实话，我真的心里很害怕他。然而这一次例外——

“没什么交待的！”我自知没做亏心事，分数是属于我的。

“你混小子还嘴硬！”父亲的拳头已经到了我的鼻尖上，我知道这一次已经很难避过了，但仍然倔强地闭上眼，等待他不公的惩罚……

“你给我跪下！跪下——！”父亲突然像头怒不可遏的雄狮，虽然没有出拳，却抬起了他的脚……不备的我只觉双膝一软，“扑通”跪倒在地。

我的头依然倔强地昂着，但泪水再也无法控制地流淌在两颊……

“说吧，是不是偷看人家的了？不知道这比考零蛋更可耻吗！高三了，就剩下几个月的时间，难道你再让我用十万八万的血汗钱去为你买一个大学上？”父亲的眼睛里在燃烧火焰，声音

一阵高过一阵：“知道吗？大学的门，不是能靠钱买得了入门券的！即使我拿出全公司的几千万元资金，我也没法为你这混蛋买回一张大学入学通知书！你知道我的钱……”

“我不要你的钱！不要——！”我至今也弄不清当时我哪来的勇气，我的这一声呐喊，把一向在家称王称霸的父亲也给镇住了。“钱钱钱，你就知道钱！难道不能相信你儿子一回！”说完，我只感到眼前一片漆黑，整个身子便软了下来……我虚脱过去了。

那一天后，我在家里整整躺了三天。母亲找来医生给我挂了三天葡萄糖，但医生却无法痊愈我心灵的创伤。父亲从那一天起就不再回家，母亲说他懒得看到我，见了就会来火。我心想我不也是这样吗？也好，眼不见为净。从床上再起来的，我，打定一个主意，我要用我自己的“办法”来证明给父亲看：你的儿子不是孬种。

回到学校，我向班主任提出，或者给我单独安排在最后一排，要不就安排在第一排，因为这两处的座位可以证明我以后考试成绩的真实性。班主任还算通情达理，满足了我的请求，将我放在最前面的一个座位。

从此，我开始了为自我奋斗的新历程。两个多月后，期末考试如期进行，我的五门成绩都在90分以上，尤其是数学，成为全班第一，得了95分。当同学和老师向我祝贺时，我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因为我要的不是赞美，而是别的。

“好小子，行啊！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呀！”那天，我的脚还没有迈进家门，就见日久未回的父亲从里屋向我迎来。我没有理他，只管放我的书包。父亲似乎并不在乎我的态度，只管高兴他的：“这回是你的那个数学老师跑到我公司向我报的喜。看来你小子不是朽木不可雕嘛！”

“好，照目前这样下去，你明年参加高考问题不会太大了。这下我为你准备的10万块上大学的钱，将来可以送你出国留学用了！哈哈。听着小子，一般来说，班级前三名的学生考大学是不成问题的。下一步关键的是你要保持目前的成绩。明白吗？”父亲仍在乐得开怀，并侧着身子津津有味地发“指示”。

“你真的认为分数那么重要吗？”我感到该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父亲睁大了眼，说：“那当然，对你来说，没有比学习和考试的分数更重要的了！难道你不在乎分数？”

“不。我在乎分数，但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东西。”

父亲眨了眨眼，瞅瞅母亲，又不解地问我：“还有什么？”

“我的尊严！”我一字一顿地说完这四个字后，赶紧转身进了自己的小屋，把门重重地关上……我的两眼已经溢满泪水。

“这小子真成大人了啊！”门外，我听到父亲感叹地说。

“不离家出走，我就会举刀向自己的母亲砍去”

——高三生自述之四

你已经听说了？是的，也不是什么特别丢人的事，反正高中生离家出走的不止我一个人，女同学中也有很多人。你问为什么一定要出走？自己家里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嘛，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到了高三，不知外国人是不是这样，反正我看中国人都是一个德性——人全疯啦！学生疯啦，家长疯啦，老师疯啦，总之全疯啦！

我是重点中学的，中考结束后以为到了重点中学就可以松口气，哪知“天下中学一般黑，重点中学更是黑”。我现在才不相信啥重点不重点，如果说重点中学的优势，就是把全市全区我们这些从小学到中学更能适应应试教育的“做题能手”集中到

了一起，培养成再高一个“段位”的做题能手而已。信不信由你。我到重点中学后的全部感觉就是这样，而且这里搞“考试工场”还给你高戴一只堂皇的帽子：你们在市“重点”，就是说你们是中学中的高才，大学的门对你们开得最大，多做题、做难题，是你们理当的任务。噓，老师和校长们说这些话时从来气昂昂的，就像那些举着大刀砍人的刽子手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一样。

如果让我现在选择高中的话，我不会满怀激情地选市重点了。近三年的经历，我体会到：“重点”就是比别人更残酷地摧残我们这些花季少年而已。十分可悲的是，不知上面的教育局、市领导和社会上对我们这样的重点中学还那么吹着捧着是为了什么？高一高二两年，我们的所谓“重点”就是要用两年的时间赶出高中三年的课程来。进入高三后，整整一年时间便是没完没了地做题。什么叫没完没了？生活中有人对重复三遍以上的事就叫“没完没了”。我真想对电影导演冯小刚说一声，你应该拍我们中学生的考试，那才真正叫做《没完没了》呢！

中国的什么族最大？是我们“考试族”啊！世界上什么人最辛苦？是我们“考试人”啊！

每天全市百姓还在呼呼大睡时，大街上有两种人在奔忙，一是打扫大街的清洁工，二是我们这些背书包的高三生。你6点进校门别以为就是早的了，比你早的已经在教室里上了近一个小时的自习了——老师天天表扬这些同学，就是为了提醒那些6点后才到的同学。6点到8点间的两个小时，常常显得精彩：老师进门看一眼，就溜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小憩去了，而我们教室里也总能听到那些惊天动地的呼呼声……哈哈，开始我们都会取笑打呼者，后来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变成“打呼族”，不再有人取笑了，倒是大家一旦听到某某人呼噜震天时，便悄悄向周围的人

“嘘”一声：轻一点，别吵醒他（她）。瞧，我们多团结一致！这是逼出来的，因为老师家长不会关心我们这些最辛苦的“考试人”。

8 点以后开始上课了。于是，数理化文史地的任课老师，便一个比一个能说会道地开始向你轰炸。这个说数学是所有高考中最重要的科目，数学学好，理化就能自然而然地带起来；那个说语文是高考成败的关键，很多单科成绩特别优秀的考生之所以没有考上重点大学，原因就是被他们的作文分拉了下来，所以语文课抓得好不好，不仅是文科生的重头戏，更是理科生的关键所在；这个说数理化靠的就是多做题做难题，那个说文科的关键是背课记题；这个说世界上没有哪种考试不是靠做题来判别考生优劣的，那个说大学录取的重点与非重点就在于考分的高与低……所有的话语组成一个意思：考试做题是你们惟一的选择，也是惟一的出路。

开始的一两个月里还真有些临战的感觉，但我们渐渐发现，之后的几个月里，老师除了把已经做过的难题卷子或者不知从哪儿找来的怪题卷子让我们重复再做外，并没有什么新鲜玩艺让我们觉得有十分必要去努力，无非就是熟之又熟，剩下的就是人为造成的那些高考紧张空气。什么这个月搞“倒计时”，下个月搞“最后冲刺”，再下个月就搞“决一死战”……黑板报、操场上、饭堂内、广播喇叭里，还有宿舍走道，到处贴满、写足、喊着有关时刻准备高考的口号标语，使你如临战场，甚至像是进入火葬场的殡殓馆，一听那哀乐就深感悲切一样。

从 6 点进校到下午 6 点离校的 12 个小时里，我们所有的感觉就是在监狱或者说是在有监工的资本家厂子里服苦役。总算回家了，可是高三生的家比监狱和有监工的资本家厂子还黑暗。吃饭时本想轻松一下，顺便了解了解国家大事，刚刚把电视打开，

母亲就瞪着眼睛：“不是说好了，高三时天塌下来也不要管外面的事吗！”在这样的管制下，去年美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的天大新闻，就有很多中学生根本不知道。“谁轰炸谁啦？是不是我们跟台湾打起来啦？”我们班就有好多同学在几个月以后才关心起这件事，而且闹出了不少笑话。你瞧我们的家长怎么说的，我那个亲爱的母亲就这么说：“天塌下来，有我们顶着，缺粮了，也有我们去张罗讨乞，可是高考的事只能靠你自己，我们没法替你。你不专心准备高考，对得起谁？”

在母亲的严管下，我在家里的另 12 个小时，被囚禁在自己的小屋里。那小屋原来还让我感到非常温馨和舒服，因为那是我的小天地，可以在这八平方米的空间里拥有属于我的全部欢乐与秘密。但高三后，一直认为我“不老实”的母亲，特意让人在我木门上方挖出一个见方的小洞。我看到后就伤心地对妈说：“你这么搞不是把我当监牢犯吗？”

母亲说：“你要是安安心心在小屋里学习、做题，还怕别人老来瞅你？”

我无言以对，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从此，我所有的行动都处在母亲那双严厉而不可抗拒的目光下。而我的所有行动也是由她统一布置：吃完晚饭，喝一杯奶，吃一块水果，然后开始做作业。22 点，休息十分钟，然后再进入复习做作业，到夜里 12 点熄灯睡觉。一二三四五是这样。周六周日的安排，便多了一个上午和一个下午的做作业时间，除了多吃两顿饭外，没有改变任何内容。

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小学时母亲就和我爸离婚了，原因之一就是父亲认为母亲缺乏知识和修养，为此母亲发誓要把我培养成“有知识有修养”的人。她对关心超过了她自己，特别是在我进入高中后，她除了上班外，所有的时间都是在为我服

务，围绕我的学习和考大学转。这是我深切感受到的，也真是看在母亲含辛茹苦的份儿上，我默认了很多事。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不能在所有的事上都由她主宰我的一切了。因为我也是人，一个活脱脱的人，一个活脱脱的年轻人。

我们的争执开始时常常在一些小事上，比如我好困睡着了，她就外面使劲敲我小屋的门。每次她敲门我就一惊，便嚷起来：“你干吗不能轻一点？”

母亲说：“轻一点你能听得见吗？”

她的话让我感到无奈而又愤怒。

我从小爱听音乐，随身听是我生活中的一个伴侣，上学路上，睡觉之前，甚至看书之中，它都是我忠诚的伴侣。但母亲特别反感我带着它。几次警告说高三后不能再听了。我表面上答应，可行动上很难下决心，主要是随身听让我感到枯燥的学习生活中还有那么一丝丝的快乐。

我依然改不掉在做作业时戴着随身听的习惯，尤其是感觉疲乏时，耳边能有它优美的歌声相伴会稍稍舒心一些。但母亲并不同意我的观点，她坚持认为我是在有意“分心”。

“怎么又戴上了？告诉你，你再不听我可要把它扔到楼底下去了啊！”母亲不是在门外敲了，而是走到我跟前，拉着嗓门大声说话。

我只好暂且收起来。枯燥而又疲惫地重新伏到桌上做那没有尽头的卷子。不知什么时候，我觉得眼皮在不停地打架，抬头一看时间，才晚上11点。我庆幸方才小憩没有被母亲发现。为了能够坚持最后一小时的作业，我下意识地从小头底下取出心爱的随身听，哇，感觉好多啦！

哇，是林志颖的《就是这一天》呀！于是我一边做题，一边跟着欢快地哼了起来：

对你的爱恋永远不变
每天每天你总在我的心田
对你的诺言不会改变

.....

我把握未来每一天
天天灿烂 天天思念 从现在到永远——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个‘天天灿烂，天天思念’法！”突然，我的耳机戛然而止。原来母亲像个凶神似的站在了我的身后。坏了！我刚要收起随身听，却早已被手脚麻利的母亲用力一夺，转眼间，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她便把窗子打开了……

“别扔——！”我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赶紧起身想夺回母亲手中的随身听，可为时已晚。只听楼下的水泥地上沉沉的一声“啪啦”，那声音使我不由得大喊大叫起来：“你想怎样啦？你把我也扔下去呀！呜呜……”

我又是跺脚又是伤心地哭了起来。然后不顾一切地冲下楼……当我捧起散了架的随身听时，我的心也跟着碎了……我跪在随身听“牺牲”的地方哭得格外伤心，惊动了全楼的人，最后是母亲硬把我拖回了家里。

从那天的事件后，我跟母亲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凡是她让我做的事我都跟她顶着干。而她也怪了，似乎我不愿意做的事或者反感的事，她偏要我按她的意思去办——我们母女俩成为“死对头”。

时间到了1999年的初夏，这个季节应该说也是我们高三生最紧张的时间。不知电视台怎么安排的，她是不是对我们学生一点也不了解，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在电视里推出了《还珠格

格》！这电视一放，赵薇演的“小燕子”把我们中学所有女同学都给吊疯啦！当时学校里除了高考的复习外，最让我们兴奋的就是“小燕子”的话题。“小燕子”真的让我们好爱好爱呀！大人们其实太不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了。根本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太浅薄的缘故，实在是“小燕子”那无忧无虑、敢作敢为的精神太让我们这些深深压在学习和做题的苦海里的中学生羡慕了！可以说，“小燕子”精神，正是我们渴望而又得不到的、疾呼而又呼不来的形象！“小燕子”的出现，让我们感到了一种解脱，一种希望，一种追求！

大人们，你们现在明白我们为什么那么喜欢“小燕子”了吧！

我从来不承认自己是“追星族”的一员，但我对“小燕子”的喜爱超过了所有同学，因为我感觉自己受到学校特别是家庭的压制太多太重了，所以我更加喜欢“小燕子”。而我虽然没看一次电视《还珠格格》，可从同学们的言谈中感觉比看过的还强烈几倍，仿佛“小燕子”就是我性格的化身，我追求的影子。我因此向母亲“友善”地提出允许我看一次《还珠格格》，而且我还认认真真地写下一份“保证书”——保证以优良的高考成绩来换得我的这样一次权利。

“你别给我玩小孩把戏了。我怎么可能相信你这样的保证？看电视就会分心，尤其是我不让你看小燕子这样半疯半痴的丫头，浅薄得不能再浅薄了。我正准备给电视台写信呢，他们放这种节目到底是什么意图啊？引导孩子们都去学些什么呀？真是的！”母亲好像对“小燕子”早有一肚子气。真倒霉，我算是哪壶不开偏提哪一壶。

那天是星期天，母亲说她单位里要加班，她把饭菜准备好后，吩咐：老老实实在家做作业，什么事都甭想。我一听高兴得

心都快要跳出来了：这下总算有机会目睹“小燕子”的风采了！

“哎，你去上班吧。我保证就在家好好做作业，今天的作业比哪一天都多！”我特意这么说，后来想想，这话等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母亲用特殊的眼光重重地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便出了门。

“万岁——”我放纵久被禁锢的心，估计母亲已经下到楼底时，便在屋里大声欢呼了起来。赶紧，先打开电视装置，然后接上电线……呀，楼道里突然传来熟悉的脚步声——坏了坏了，母亲返回来了。我赶紧神速地将插销拔掉，又将电视装置重新恢复原状，然后再飞步回到自己的小屋拿起书本……是母亲进门了，她在电视机那儿停下了脚步，然后在电视机上扒拉了一下，好像检查有没有我动过的迹象——我根本没有回过身，眼睛盯在书本上，可我能感觉到母亲在外屋所做的哪怕是最细微的动作。此时我的心怦怦跳得不能再快了！

母亲终于走了，屋里恢复了平静，只有我的心与墙上的挂钟在跳动。我像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战斗一样，忍不住自己对着镜子笑了起来。

我知道母亲的精明之处，所以第二次想打开电视时，就有意等待了一段时间。我知道从钟表上的时间证明这回母亲真的去单位上班了，这时我才去打开电视。

“解放了——！”我伸伸懒腰，极为自在地从小屋走出，毫无顾忌地走到电视机前，掀开布罩，插上电源，点动电视上的按钮……嗯，奇怪，怎么电视没有图像？

我急了，左看右看，电源、天线都是好的呀！是坏了？不对，早上还听到母亲在看天气预报么！这是怎么回事？我毕竟是学过不少物理知识的高中生，在检查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叫我气得直咬牙的事：母亲把连接电源的那个双脚插头中的一根拔掉

了！

我的妈呀，你这是干什么嘛！那是个无法用其它东西替代的玩艺。面对母亲的“聪明”和眼前的无奈，我狠狠地敲了敲电视，一个人在屋里哭了起来——同学们在前一天就告诉我此时此刻正是《还珠格格》重播的时间呀！

我正在欲哭无泪、不知所措、强烈地想看一眼“小燕子”的时候，楼道里不知谁家的门内传来《还珠格格》的电视声音：“小燕子！小燕子”——那陌生而熟悉的声音直灌我的耳朵，可很快声音消失了，是出来倒垃圾的邻居把门拉上了。

哇，“小燕子”的声音太刺激我了！在家惴惴不安的我终于想了个办法：到邻居家看一眼“小燕子”！

用什么法子敲开邻居家的门呢？对，就说我家电插头坏了，借把钳子什么的。

我撒谎敲开邻居门时，心头好不激动，但表面上装出十分镇静的样子。好客的邻居哪想到这是我一手“策划的阴谋”，当我表示对他们正在看的《还珠格格》也愿意看一眼时，他们全家人便热情地邀我坐下一起看。接下去的时间简直可以用“大大过瘾”四个字来形容了。在这个家庭里，“小燕子”不仅吸引了与我差不多大的一个女孩子，也吸引了她的父母和姥姥，我真羡慕他们全家。让我想象不到的是，他们在看完当时重播的两集《还珠格格》后，听说我从没有看过以前的《还珠格格》，就慷慨地拿出了录制好的两盘录像带又放给我看……

我完全沉浸在“小燕子”的狂热之中，发现邻居家准备吃饭时，才想起该是我离开的时候了。“对不起，打扰你们好长时间。谢谢！”我不好意思地起身告别，三步两步地回到楼上的家。

当我用钥匙打开防盗门时，发现锁是开着的，心蓦然紧张起

来：坏了，妈已经回家了！

“你到哪儿去了？”母亲早已站在小厅中央，等候对我进行审问。

“没、没到哪儿……去楼下邻居家借钳子去了。”我恨自己语无伦次。

“借钳子？那钳子呢？”

我傻了，到人家里半天什么也没做嘛！邻居对我借钳子的事怎么也没提醒一声呀！真是。

“你那点花花小肚肠，还想瞒我？”母亲早已气不打一处来：“我知道你不等我出门，就急着想偷看电视！哼，真有本事，自己家的电视不会捣鼓，还想到邻居家借钳子来！去呀，把钳子借来呀！”

“我知道是你存心把插头搞坏的。”我觉得不能不说，尤其是想到邻居家的那种温馨快乐情景，以及我与母亲之间的不平等。

“知道了你还跑到人家家里去看？难道你永远管不住自己偷懒？”母亲又开始没头没脑地骂起来，她骂人时的那种尖嗓音最让我感到刺耳，而此时我感到的不仅仅是刺耳，是刺心，深深地刺着我的心！

也许是积压在心头的怨忿太多太久，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的声音会大得甚至有些歇斯底里：“我不偷懒！我从来没有偷过懒——！”

母亲大概没有想到我会如此反抗，她一愣，火更大了，使出她认为大人惟一能制服儿女的手段——抄起一把铁棍朝我砸来……我真的惊恐得脑子一片空白，因为我想象不出我的亲生母亲会用铁棍向她的女儿砸来！

我被求生的本能唤醒了！我退至不能退却的地方，我的手下

意识地抄起放在桌上的一把菜刀并已高高举在空中……

母亲惊呆了：“你你你想杀你妈呀？”

“我就想杀死你——！”我的声音几乎使全楼的人都听到了，于是我家的房子外传来无比猛烈的敲门声。

就在这一夜，我离家出走了，什么都没带，便离开了家，离开了母亲，一个人在我们小城的一条河边走了五个多小时，在这阴雨绵绵的五个多小时里，我呼天不应，唤地无声，无数次想向湍急的河水中跳去……那是我一生无法忘却的黑夜。现在我回想起那一夜的情景，我真庆幸自己那一夜没有做两件事：一件是我没有留在家，假如真的留在家，我难以压下举刀杀母之心；二是那五小时的漫漫长夜，使我有机会渐渐梳理我并不成熟的心路。

你们一定很想知道我以后的情况。我可以告诉你们：去年我考大学的机会失去了，但我和母亲都不感到后悔，因为我们母女和解了。后来母亲在我出走几个月回家后，重新找了一个中学让我去读，我和母亲对今年我考大学都充满了信心。回想起那段难忘的经历，我只想对所有的家长说一句话，那就是：请在严格要求您的孩子努力学习时，不要忘了给他们一点起码的自由，这样不仅不会影响他们的高考成绩，相反有可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认为这绝对没错。

为了“高三生的独白”部分，我采访过各地的几十名学生，在所有接受我采访的这些高三生中，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他们对现行的教育，特别是“一考定终身”的高考以及高考前的学校教学模式提出了最严厉的意见也是最恳切的希望，那便是请求社会、学校和家长们给予他们最基本的自由空间、最

基本的人格尊重与做人的权利。

“我们大部分人都过了18岁的成人年龄，不能因为高考而剥夺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基本的权利。我们要求有人权——不是西方政界指责我们的那种人权，是我们作为新世纪一代中国青年人应有的那种既有严格要求，又能体现我们健康快乐与自由个性的人权。”一位现在就读于北京某著名学府法律专业的学生如是说。

关于学生的人权概念，我问过不少家长，他们在没有前提的情况下的回答显得很空泛，可真正接触到自己子女的实际情况时，其回答又让我感到吃惊。

“孩子的人权必须建立在一种有所约束的条件下，比如他们应该在完成学校和家庭对他们的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才能谈论此事。”——这是一位在大学当人文教授的学者的回答。原因是他的儿子也是位不安分守己的逃学生。这位教授是在恢复高考后圆了大学梦的“老三届”生，他的体会非常深切：“我的结论是，在中国尤其是现在或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高学历，就意味着你失去社会对你的尊重与选择。设想一下，一个没有高学历的人，想让社会来重用你，那除非在你通过无数次、无数年的艰苦拼搏后才有可能，而有高学历者可以在走出校门时就获得社会给予你的种种机会。难道我们作为家长，有谁真心想让自己的儿女在无尽的努力与等待中来让社会承认和选择他吗？不会的。那样的代价不仅仅是时间和金钱的问题，而且也是整个时代与民族所不允许的。”

不能不说这位高谈阔论的学者的话没有道理，但谁又能为我们的孩子想一想呢？

“剥夺了权利，剥夺了自由，剥夺了最基本的生存方式，我们就不成了一种机器吗？一种让家长、让学校、让一个用先前的

那种模式制造出来的一代吗？这就是你们大人们天天说的时代进步、社会发展吗？再说，当我们一个个变成考试机器后，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创造、我们的幻想、我们的灵智，还有我们的爱情都被泯灭后，这个世界、这个时代还有什么是可以吸引我们生命活力的源泉？死吧——做一具还有心跳的僵尸吧，阿门！”学生们这样告诉我。

我想用实例来回答不少家长和老师在这一问题上的某些固执之见，它们实在值得大家深思。

实例之一：《贵阳都市报》刊发的一位中学生留给父母的遗书：

敬爱（的）爸妈：

我已不存在，请不要悲伤。我很对不起你们，请原谅。

我知道你们把我养这么大很辛苦。但是呢，我又没有报答过你们。我的成绩从来没好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我有想死的念头，我曾经有过几次想死，但是我还是不愿意过早地死去，但是这一次，我已经彻底地绝望，并不是什么原因，而是我已感到，我是一个废物，样样不如别人。而且由于没有交成绩册和补课本，（老师）没有（让我）报到，也没有（发给我）课本，今天我们班上来了个新生，侯老师对他讲：“后面的同学基本上都是差生……”我想，我已被老师列入差生行列了。我也感到很绝望。下午，我去问老师，星期一交行不行？据同学说，他假期作业有两道数学题没做（没有通过小组检查），老师说：“不行，今天不交星期一就不准上课。”我真的绝望了。

我也想过，我一死会给你们带来什么呢？有坏处、有好

处，我一死，会给你们精神上加了不少压力，好处是我一死，你们可以节约一大笔钱，你们可以不用愁我的开支，你们可以尽情地游玩，坐飞机、坐火车、坐轮船，而不用为我担心。我死了，也不要传开来。因为会带来别人所讲的闲话，使你们很不好。如果真的很想我，便给我写信，你们尽情地玩乐吧，你们也不要想不开，存折密码是 1122。来生再见。

李渊

1997. 2. 20. 10:17

另加一句：妈妈，不要责怪爸爸，爸爸也不要责怪妈妈。记住。

据贵阳的市民讲，李渊死后八天，报上刊出了这封遗书，几乎所有的贵阳人都为如此懂事的小李渊惋惜和痛心。李渊是位中学生，他的遗书中非常清楚地表明他的死因并不复杂，但却令人深思。那个老师简单而又残酷的一句“差生”和一个“不交作业就不让上课”，使早已对死读书和以分数论优劣而绝望的小李渊产生了想死的念头。而李渊对死所表现的那种冷静和死之前周到地为父母考虑的那种成熟，更使我们为失去这样的好孩子而痛惜万分！

我们从遗书中不难看出，虽然李渊只是个中学生，但他有思考和处事的成熟的一面。同样，在他的眼里，人生尽兴地玩乐是最大的难得、最大的幸运、最大的幸福——他因此用一句听起来十分幼稚却无比真诚的“你们尽情地玩乐”来祝福自己的父母。读到这里，我们都能感到中国的孩子们因为上学而受到的心灵创伤是何等的严重！

实例之二：见《北京晚报》1999年1月26日报道（记

者张鹏)

高三生杀死亲生母亲

本报讯：一个 19 岁的中学高三生在没有深仇大恨和严重矛盾的情况下，竟然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将自己的亲生母亲杀死后碎尸抛入湖中。昨天下午在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朱宇故意杀人案带给人们深深的思考。

在昨天下午的庭审中，旁听席上座无虚席，被告人朱宇被带上庭后，人们发现他还是一个脸上显露着稚气的男孩，然而当他用平静的口吻叙述所做的一切时，人们被深深震惊了。今年 19 岁的朱宇正在上中学，面临着高考，他的家庭物质生活优裕，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对他寄予了厚望。然而去年 3 月，朱宇萌生了杀母的恶念。朱宇说他对母亲的不满是从 1996 年开始的，当时他父亲因肝病住院，后来终因病重去世，他认为父亲的病本来可以救治的，但母亲怕花钱多没用好药，所以父亲才死。父亲死后，母亲与一个男人来往密切，朱宇认为母亲就是为了这个男人而不去救父亲，平时因朱宇的母亲对他学习管得很严，母子俩经常争吵。去年 3 月 25 日，朱宇交女朋友被母亲反对，两人又爆发了一场争吵，朱宇在这一天起了杀心。

朱宇找到同学崔楠，把杀母亲的想法告诉了他，让他帮助一起干。由于两人是好朋友，崔楠同意了。于是两人开始了周密的准备工作，朱宇翻阅了一些案例资料和有关人体生理解剖方面的书籍，接着买了一瓶镇定剂和一盒感冒冲剂。3 月 28 日中午，朱宇的母亲匆匆从外面赶回家中，不顾自己感冒，准备帮助儿子温习政治，准备考试。朱宇佯装关心母亲，就去冲了一怀感冒冲剂，他把碾碎的镇定药放在冲剂里，母亲喝了药，不一会感到很困，就进屋睡了。朱宇在屋

外耐心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母亲睡得完全没有知觉了，他和崔楠用早已准备好的尼龙绳猛勒母亲的脖子，又割开了她腕上的动脉，杀死了亲生母亲。

朱宇和崔楠将他母亲的尸体肢解了，第二天早上抛入一公园湖中。然后朱宇到派出所报案说他母亲失踪了。接着他找人打开了母亲放在家中的保险柜，拿出一张八万元的存单，兑换了现金，给自己买了BP机、手机等物，并且筹备着用这笔钱开一家咖啡厅，直到去年4月16日，他被公安机关怀疑并拘捕。

在庭审中，北京金桥律师事务所的何桂深律师担任朱宇的辩护人，他认为由于父亲过世，高考紧张，和家长缺乏交流，感受不到家庭温暖等原因，朱宇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严重的人格障碍，使思维意识逐渐偏离了现实，导致了他杀母的罪行……

朱宇的事同样引起了北京市广大市民的强烈反应，《北京晚报》在披露此事的那几天里电话不断，因为法庭审理此案时正值当年高考生紧张复习的最紧要关头。据值班编辑介绍，市民们的来电中，除了一部分人觉得朱宇连亲生母亲都要如此残忍地杀害，且杀害之后又采用恶毒的手段，必须严刑制裁外，很多人指出：朱宇杀母的根源正是朱宇的母亲太看重和逼迫儿子的高考学习。有位与朱宇同时正准备参加当年高考的学生在电话里对编辑说，像朱宇杀亲生父母的心他们同学中不少人都有。“因为大人们为了让我们考上大学，简直把我们当作牲畜一样对待，我就被父亲用皮带抽过好几回。当父亲在空中挥动皮鞭抽在我身上的时候，我真想拿起刀砍断他的手，并且在他知疼的那一刻再问他一声：我是不是你的亲生骨肉？如果是，你就不应该对我这样狠

毒；如果不是，那你这样打我，我就可以杀死你，公安局找我算账时我不怕，因为我是在自卫……”一位高三同学用亲身的感受谈了自己对朱宇事件的看法。

在写到朱宇这件事时，朱宇这位只有 19 岁的高中生，已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我与审理朱宇一案的法官和熟悉他的人进行了交谈，问他们朱宇杀母与他母亲对他的高考期望值太高，有没有直接和必然的联系。法官的回答非常肯定，因为朱宇自己“悔悟”时曾谈到，他母亲平时工作比较忙，对他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学习要好。母亲在朱宇的父亲死后，有自己的生活打算，今后不可能跟儿子过一辈子。但作为对前夫的一个交待，儿子必须考上大学，也只有儿子考上大学，她才能既对得起死去的丈夫，也好重新安排自己后半生的生活，因此她对朱宇上大学的事逼得特别紧，甚至有种非考上不可的强烈和迫切的愿望。邻居介绍，朱宇从小聪明，脑子反应快，学习也不错，但因为他在交女朋友后成绩有所下降，他母亲就大发雷霆，不是采取正确的引导，而是逼得更紧，不许他放学后随便乱跑，星期天也不能随便出家门。朱宇认为，母亲这样对待自己，如果一旦高考不能录取，他不就成了母亲生活中永远的绊脚石了吗？母亲不就会采取更严厉的手段对付自己吗？与其母亲不要我活，还不如我先不让她活。就这样，在不懂法的前提下，朱宇便有了常人不可理喻的极端行为。

然而，“朱宇事件”并非个别例子。就在我即将对本书“封笔”时，2000 年 2 月 25 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均以非同寻常的声势，特别报道了浙江金华第四中学 17 岁高中生徐力因不堪忍受学习成绩排名次和家长的压力，竟然打死了母亲。

报道说，徐力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母亲吴凤仙是金华

县食品公司职工。由于徐力的父亲长期在外地火车站工作，徐力从小到大基本靠母亲细心照料。徐力的母亲工资不高，便靠帮别人加工点毛衣赚些钱供儿子读书，让孩子过着“吃穿全包，一心读书”的生活。徐力也很努力，一直是个好学生，初中升高中还考进了一个重点班，也就是学校为那些有希望在高考中跳过“龙门”的成绩好的学生准备的班级。但在强兵如林中的徐力，学习逐渐有些吃力，高一上半学期排名全班倒数第二。母亲为此对他严加要求，徐力也算争气，下半学期的成绩一跃升至第十名。母亲吴凤仙喜出望外，便要求儿子从此每次期中、期末考试都要排在全班前十名。然而也就从这时候起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去年11月底，吴凤仙参加家长会时得知，徐力这学期期中考试的成绩排在班级第18名。当天晚上回家，她便把儿子狠狠地打了一顿。徐力喜欢踢足球，吴凤仙就对儿子说：“以后你再踢足球，我就打断你的腿。”徐力感到母亲的压力无法承受，委屈的泪水直在眼里打转。

今年1月17日中午，徐力从学校回家，吃完午饭后，想看一会儿电视。在一旁的母亲板着脸说：“还有工夫看电视？期末考试快到了，你能保证前十名？”徐力说：“很难考的，我看不太可能考得上。”“考不上你还有心思看电视？”母亲就开始嚷嚷起来。儿子再也忍不住了，心头久压的怒火仿佛一下子奔涌而出，绝望中的他从门口拿起一把木柄榔朝正在绣花的母亲吴凤仙后脑勺上砸去，直到致死。打死母亲后，徐力感觉总算出了一口恶气。当时他确实也很紧张，但又感到从此可以不受人高压了。为了怕人查出自己是凶手，徐力立即进行了移尸灭迹的一系列手段，还写字条欺骗父亲说“妈妈去杭州看病了”。之后，他居然还照常去参加了期末考试。

然而徐力打死母亲的事件很快败露，并立即在当地和浙江全

省引起轩然大波，而且一经媒体报道，全国上下为之震惊。《人民日报》于2月12日发表了《全社会都要关心支持教育事业》的评论员文章，新华社也于2月13日、2月14日分别发表了以《不能“逼子成龙”》和《刻不容缓的一件大事》为题的评论员文章。《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报》等各大媒体也纷纷发表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如此一起“学生杀母”事件，有这么多中央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评述，足见这样的事已经惊动了我们的中央领导层，而且正如新华社评论员文章所说，“近年来，因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导致学生出走、轻生；家长施加压力，教师体罚和殴打学生，甚至造成学生致残、致死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到了‘刻不容缓’需要制止、刹禁的地步”。

实例之三：笔者保存的《落泪是金》读者信札 87 号——
“集中营”里的那个空位

附言：在笔者的“大学三部曲”之一《落泪是金》发表后，收到过数以百计的各界来信，其间中学生占了相当一部分，他（她）们作为未来的大学生，看到我书中有关许多贫困生的坎坷读书经历后，奋笔给我写了很多信，表达了他们对大哥哥大姐姐妹们的命运的担忧，同时也向我倾吐了自己的很多“青春苦恼”，突出的是学习上的压力。在这些可怜的学生群体中，我发现了与高考命运誓死决战的“特别一族”，这就是学生们自称“高四”、“高五”、“高六”的学生们。

高中三年制，何来“高四”、“高五”、“高六”生？第一年高考没考上又复读再参加高考的学生是也。

原来如此。

高四生，是复读一年者；高五生，为复读二年者；高六生自然就是复读三年者了。在采访这个群体后，我才知道，中国的高

考大军中，复读生是每年杀向“独木桥”上承担和付出最多的考生。他们那满肚子的苦水，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苦大仇深”得几天几夜也倒不完。

浙江金华某中学的一位“高五生”现在成了我的一位小朋友，经常与我通信。他第一次写信给我时，就非常直截了当地倾吐了他对现在大学的一些看法，尤其是他“非北大不考”的决心，让我看后十分佩服。这个学生虽说是落榜生，但其思想与文笔绝对不亚于一位在校大学生的水平，他悄悄告诉我，去年他高考时已经过了录取线，由于他“非北大不考”，自愿放弃了上大学，走进了复读班。这事因为他不敢告诉盼儿上大学不惜卖猪卖牛的老父亲，所以我要遵守我与他达成的协议而不透露他的真名。他告诉了我好多有关他们复读班里的事，引起了我对这个群体的特别关注。

复读班是什么样？

复读班是所监狱。

监狱关的是犯人，

上复读班的人说宁可到监狱，

因为犯人在监狱比复读班更快活。

于是我给复读班起了个名，

说它是希特勒的集中营……

把复读班比作“集中营”的说法，几乎是“高四”、“高五”、“高六”生的共识。每一个复读班的学生中都有自己对复读班的一些幽默诙谐的描述，而这些“黑色幽默”背后，正是学生们欲恨无奈的辛酸与苦水。

有人以为复读班的学生都是高考落榜生，其实不然，他们中

间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仅不是没有通过高考录取线，相反他们是些已经闯过“独木桥”且成绩突出的小状元，他们没有跨进大学门有三种情况：一是填志愿出现的问题，如在河北燕郊中学有个同学去年考分超过600分，但因为他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某专业，他被挤了下来；他的第二志愿是东南大学，分数上不会有任何问题，可偏偏命运不佳，东南大学的第一志愿已经录取满额，因此这位高材生在轻松闯过“独木桥”后，却被意外挡住了路。当然，复读班里这样的学生是少数，他们是复读班里的“王子”，像神一样被老师们供着，因为再经过一年的练兵，来年他们很少不是出类拔萃的顶尖状元。关于他们的故事很少有苦可倒。复读班的多数同学说：这些占总数百分之一的“王子”不代表他们。第二种情况是因为头年录取的专业不理想便放弃入学而复读者。第三种情况就像金华的那位“高五生”，他只认名牌大学，其它院校一概不为所动。然而绝大多数复读生则是从“独木桥”上掉下来的落榜生。

“复读班”的名称，就像犯人胸前别着的标牌，它耻辱地钉在我们的脸上，你一抬头便会迎来无数歧视与刺心的目光，于是你只好低下头，直到有一天你冲过独木桥后，你也不敢袒露曾经有过的这段经历……”这则“散文诗”是一个“高六生”写给我的一封长信的开头语，他说他是“集中营”里的“老囚犯”，因此对复读班的情况最有发言权。我也因此知道了许多关于复读生们的事。

大城市里的复读班已经取消了，这是“上头”的指示（国家教委有规定，尤其是省市重点中学不得设立高考落榜生的复读班，一方面是为了使每年的高考大军能够合理分流，如让一部分考生进入职高，一方面是促进学校现有教学质量的提高——笔者注），但是在中小城市，特别是县级下面的中学，复读班之多、

之盛行，既是当地家长、落榜生的迫切需要，也是地方教委创收的一大渠道。每年百分之八十八左右从高考“独木桥”上被挤下来的学生，正是处在那些教育质量相对低的“穷山恶水”之地，然而立志“走出大山”、“跳出农门”的愿望最强烈的正是这些学生！路，只有一条——大学，便是这些孩子和全家人、全村人、全乡人甚至全县人的全部希望。

读，一年不行，两年；读，两年不行，三年……直到走过“独木桥”。复读班的琅琅读书声里，不仅有孩子的理想，家长的希望，村长的企盼，乡长、县长的寄托，更有老师校长的脸面与梦想。

一位现在在北京大学就读的甘肃学生说，他上高中时，那个县城里还没有一个能上北京大学这样的著名学府的人。当他的老师和校长发现他是位学习成绩突出的“奇才”时，那种兴奋，那种执着，非言语形容。就在老师和校长认为的“奇才”第一年高考差几分达到省高考分数线时，老师和校长依然欣喜不已：“再好好下一年功夫，明年你准成！”于是他们跑了几十里山路，找到他的本不想再让儿子上学的父母，恳求他们把儿子送回学校。于是他就进了复读班。进复读班后的一切都不再是属于他自己的了，老师和校长专题研究了关于他高考的特殊安排，抽出的顶尖老师都有一种光荣的使命感，因为他们中间不少人从来就没有踏进过大学门，把自己久远而崇高的梦想化作努力奋斗的决心，使这些人甘愿自我牺牲许许多多。这位学生的24小时都被特别安排，并有专人负责管理，就是上厕所、洗澡一类的事也要有人专管，以免他中间开小差而影响“正常”的教学安排——他成了“高级囚犯”。当这位学生在第二年一举考成全省第一名时，全校放假一天，欢呼“历史性的胜利”和“史无前例的成果”。校长和老师们都哭了，他们比这位进北大的学生还要高

兴。

……一旦佩上北大校徽，每一个人顿时便有被选择的庄严感，因为这里是一块圣地。从上个世纪末叶到如今，近百年间中国社会的痛苦和追求，都在这里得到集合和呈现。沉沉暗夜中的古大陆，这校园中青春的精魂，曾为之点燃昭示理想的火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者，从这里眺望世界，走向未来，以坚毅的、顽强的、几乎是前赴后继的精神，在这片落后的国土上传播文明的种子；这里绵延着不会熄灭的火种，它不同于父母的繁衍后代，但却较那种繁衍更为神妙，且不朽。它不是一种物质的遗传，而是灵魂的塑造和传播。生活在燕园里的人都会把握到这种恒远同时久又是不具形的巨大的存在，那是一种北大特有的精神现象。这种存在超越时间和空间，成为北大永存的灵魂！

就是这样一段“北大招生简章”的开头语，这个学校的校长和老师都能倒背如流，且吟诵时的那种激情与神圣，可撼天动地。

从此，这所中学便成了名校。他们的复读班也就成了出状元的“熔炉”。

中国的复读班不少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但更多的则并非是制造状元的熔炉，倒是专门陶制泥瓷的“冷狱”。

说“冷狱”是因为进复读班时所看到的都是一张张冷面孔：家长把自己的儿女送进来时是副冰硬的冷面孔；校长在开学典礼（一般这种典礼会被取消）上扔下的也是一堆冷冰冰的话：从今天开始，你们只有加倍再加倍、努力再努力，除非明年不再见到你们，否则别给我笑出声！老师的脸更冰冷，每天都有这样的

话：你们这些学生就是笨！笨到家了！我教的学生就没有像你们这样的！笨，出奇的笨！学生们整天见到这些比欠他账还冷酷的老师，还能有什么欢笑可言？

不会有。学生自己心里清楚，当他们踏进复读班的时候，我已经不得不承认自己是比别人矮一截的差生，是在高考中落榜的耻辱者，是可以被人讥笑为“没出息”的低能儿。你家里再有钱，你长得再帅再美丽动人，你性格再高傲也没有用，你失去了你自己的全部，仅保存了你作为来年参加高考并努力获得成功的躯壳而已！

你不可以言辛苦。早知辛苦你为何不在当初好好学习？你不可以言单调，早知今天别人已经在天堂般的大学校园里丰富多彩时，为何在不该多彩时你却盲目多彩了？你不可以言无止无休的考试考试，早知今天那么多考试为何对以前的考试不放在心上？

你什么都不可以言。这就是进复读班后的你。

在同一个学校里上课，在那些比你小的高三生面前，你不可以言。那些骄傲的应届生听说你是“高四”、“高五”、“高六”甚至“高七”生时，瞧那小脸笑得都歪斜了！

受不了！那就回你自己的教室。

教室里也不会有人跟你说话。每一个人都想隐瞒自己的那份耻辱与惭愧，隐藏得越深，也许越能稍稍放松一下自己。

回到家你更不可以言了。如果是很富裕的家，财大气粗的老爸或老妈开口就把你所有的话噎回去：你有什么能耐？我大把大把的钱扔在海水里了？就是喂条乌龟也该卖出个好价钱了！你算什么？连只乌龟都不如！如果是很贫困的家，看到父亲母亲还有一大串连裤子都穿不起的兄弟姐妹为了你上学在拉犁、卖血和啃野菜，你还能说什么？

默默地回校吧。把头低得再低些，直到把所有的卷子，所有

的难题，所有的泪水，所有的伤痛处理好后，你再去表现你曾经想表现的疯狂与骄傲吧。

复读班里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许多学生相互间几年下来仍很陌生，甚至老死不相往来。我在河北省一个县中的复读班了解到，他们那个班的 61 名（通常复读班都是大班，人数极多）同学中，竟然有十几名是外县甚至外省来的。同学之间都相互不十分清楚底细，连班主任对有的学生情况都了解甚少。“他们有的是自己私自出家门来求学的，边打工挣钱边进行学业，考好了回家再挽回那份屈辱，考不上家里人也不知道，因此也不丢脸。有的是某某县长、乡长或者什么处长的公子、千金，他们的家长怕在本地丢自己的脸面，就关照学校不要说出是他们的孩子，以防传出去败坏了他们的名声。总之，复读班里什么事都有，你想不到猜不到的事，在这里都有。”这个复读班的班主任对我说。

大家还是来听听给我写信的那个“高六生”讲述的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吧——

我是复读班的“座底生”了，也就是老师嘲讽的那类“范进”式的人物，也许是考到孙辈一起进学堂的时候才能中举的蠢才。不过我知道自己并不太笨，只是心有些高得不够现实，才落得是个三年未挪动一个座位的复读班老生，那些应届小弟小妹们则称为前辈或“高六生”。凡来复读班上课的同学都有些怪，除了那些高分未被录取的高考不走运者和个别硬是被有钱有势的父母推进来补课的公子哥外，绝大多数人有共同的境遇：成绩平平，智力一般，于是这些人就像老师说的，不靠“死做题做死题做了死题做难题，难题做完做偏题，一直做到录取线”的笨办法和硬性强制的规定，是难以闯过龙门的。

同学们说复读班像“集中营”是有道理的。首先是这里的恐怖。我第一年进复读班时，一进教室就一眼看到了墙上那几幅

巨大的标语：“决一死战在今年”、“进龙门者为王，怯龙门者为鼠”、“血洗屈辱”、“誓死一搏”等等，那一个个“死”与“血”字读后感到格外的心惊肉跳，浑身冷汗。再看看我坐的座位上、破旧不堪的桌椅上也都刻满了“前辈们”一行行用血泪铸成的斑斑痕迹。我的桌子正右方有一行用刀雕刻得特别深的字这样写道：500分生，499分死。开始我不懂其意，便问旁边的一位老生，他告诉我，500分是前几年我们省的高考一般录取线。原来如此。

“499不也可以录取二本嘛！”我不解地问。

那老生听后淡淡一笑，说“过一段时间你就会知道。进这儿的人都是疯子，他下的血书，发的誓言，死也要实现。差一分也不干，说死就死”。

有这么严重？我半信半疑地等待“疯子”的出现……

复读班开课了。校长专门来讲话，他说今年这个班是请示市教育局才同意继续开设的最后一期复读班了，同学们要珍惜这最后的机会。我后来第二年再上复读班时，校长又这么说，到第三年进复读班时他还是这么说。有一次我问校长，复读班真的以后就不办了？我们为什么年年还在办？他说你知道啥？上面对办复读班是有不同看法的，市教育局也是今年不知道明年的事，所以我必须每年告诫同学们：这是最后的机会。

噢，校长可谓用心良苦。

学习开始了，老师并没有先上数理化，而是先开“誓死会”。几位同学像控诉万恶的旧社会一样，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诉说自己由于没有听进老师的话，或者是把父母的话当了耳边风，结果害得自己高考落榜，以及由此而承受的种种屈辱与辛酸……那眼泪、那控诉，太容易引起我们这些高考失落者的同感了，于是全班特别是那些刚刚从高考中退下阵的“高四”新生

们，常常哭得泣不成声，我亲眼在两年的“誓死会”上，有女同学哭得最后连气都背了过去，其中的一位甚至经医生抢救才脱离了危险。

“誓死会”后就有了“实际行动”。同学们个个要表态，开始写决心书，但写在纸上字太小，大家必须在很近的距离看才能知道你写了些什么。不行，决心书不足以表达大家的“誓言”。于是有人就用大标语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决心，我开始写的诸如“努力刻苦”、“争取考好”之类的词，马上被班长和组长们指责为“太软”、“太平”。

那应该写什么？我问。组长看了我一眼，从桌子抽屉里扯出一张白纸，又从笔盒里取出一把三角形削笔刀，就在我不明白他要干什么时，那把雪亮的刀已经扎进他胳膊的肉里，随即我看到一股鲜红的血溅满刀刃……我吓得几乎要叫出声来，但我的嗓子像被什么塞住了。

我看到组长用另一只手的手指，浸了浸自己的血，然后在白纸上“刷刷刷”地写下了五个血字：生死看今年。

“来，现在看你的了！”班长当着很多同学的面对我说。当我抬头看见自己处在众目睽睽之下时，心跳得不得了，浑身热血顿时涌至头顶。我不知哪来的一股勇气和力量，抢过组长手中的那把雪亮的三角刀，也在自己的胳膊上划出道口子，于是鲜红的血也蓦然涌出。我没有犹豫地把流着血的胳膊凑到桌前的正右方，对准那行雕刻得很深的“500分生，499分死”的字沟里注下我那滴滴鲜红的血……

“万岁——！”“健雄——！”“必胜——！”全班的同学们顿时为我欢呼，并且那一张张兴奋和庄严的脸上挂着对我的敬佩之意。而我当时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伤口的疼痛。我想我也疯了。

事后，每每看到那行被我用血注红的字时，我心头都会不寒而栗。关于“发誓”的事件中我还不算是最疯的，有人为了一句所谓的“誓言”，真的做出了疯事。有位男同学在班里许下“誓言”说，如果再考不上，他就从四楼跳下去（我们复读班所在的楼层）。去年他真的没有考上，当时高考成绩下来后，大家各怀心事，谁都没有特别注意他。那天，老师召集我们复读班的同学通知高考分数和录取情况，上课的铃声响后，大家发现那个男同学没有进教室。就在这时，楼底下传来“快救人哪！快救人”的呼救声。教学楼里顿时大乱，当我们走下楼一看，吓坏了：那位男同学站在四楼拐角的一个窗口正要往下跳……这情景把全校的师生们惊得不知如何是好，楼下的人在校长老师的指挥下组成了人墙，一些老师乘机又纷纷从宿舍里抱来棉被，另一些人在楼下做劝说工作，而欲往楼下跳的男同学，则旁若无人地仰视着蓝天，不知在作何遐想。正在大家不知所措时，警车到了，那个男同学仿佛一下从梦幻中醒来，在他欲跳不能、欲生又不成犹豫时刻——他的脚下已经铺满了软垫和师生们组成的人墙。有经验的警察同志把他救了下来。

这一场虚惊给整个学校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云，好几天我们感觉心头像堵了棉团一般喘不过气来。

每届复读班里，都会冒出几个让你听来不信的疯子。有个女孩长得很漂亮，是原来中学的“校花”，可惜她的高考成绩不好，落榜后她也没有马上进我们的复读班，一直等到12月才与我们一起上课，据说在前三个月里她家托了很多关系，也花了不少钱，想等机会看哪个大学愿意出钱收她，结果落空了。“校花”起初进来，从来不跟谁说话，看样子既有那种美人特有的傲气，也有些抬不起头的自悲。时间长了，她慢慢就跟同学们说话聊天了。大家议论说，上大学也就是那么回事，现在研究生毕业都不

好找工作，即使我们将来费尽心思考上了大学，出来还不是做“高级盲流”，与其这样，倒不如男的现在就去做生意，女的找个大款嫁嫁算了。于是有人就对“校花”说，像你这样漂亮的女孩读什么大学，大学毕业证能值几个钱，你的脸蛋就是最高的“文凭”证书。那女孩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说我现在想明白了，要是今年再考不上就嫁人，只要谁有钱，我就嫁给他。谁知她这半真半假的话不知被哪一位传出去后，常有那些长得肥头大耳或者瘦如猴猕的小老板、大款爷来学校观摩窥视。来年高考，这位女同学很不走运，差几分又成了落榜生。一般来说，在复读班里，头年差几分落榜者，来年都能考个好成绩，甚至还有进北大、清华等名校的可能！可是就在我们一批落榜者重新踏进复读班时，这位女同学却穿着异常鲜艳的衣服，手挽着一位长得特别难看、年纪也显得很大的男人，走进了我们的教室。她乐呵呵地向我们大家宣布：她已经跟这个男人订婚，并马上准备出国旅行。说完，她朝我们甩下一把把各式各样的喜糖。可是我吃着她给的喜糖，怎么也觉不出一丝甜味。当这位女同学挽着男朋友离开教室时，我看到她已经是泪流满面……

复读班里还有一个人的事我必须对你讲。你们外人一定想不到，我们对座位还大有讲究。比如像我这样的“高五”、“高六”生，我选择座位有两个地方，像我去年高考考的比较差，通过一年后我的考分一下上升了几十分，那我一定要坚持坐在原来的座位，因为这样的座位被认为是“元气较足”，用教师的话说是“只要再坐热一点就开锅”。还有一种座位是上一年考出状元水平的“金座”和“银座”，这种座位是幸运座位，留有“仙气”。你们听起来觉得我在宣扬迷信，其实开始我也不信，但随着“高四”、“高五”生一年年“升级”，你对这些事不信还真不行。我旁边的一个座位就“风水”好，在我“高四”时有人

坐在那里，当年就考了个重点。第二年这个座位的同学又考了最好的大学。后来我问老师是怎么回事？老师笑着说，这个座位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占得住的，若非校长熟悉，或家里是头头脑脑的，还不让你坐呢！我仍不大信，可在我当了“高六”生参加第三年高考时，我本以为此次班上最高分非我莫属，但最后还是坐在那个神秘座位上的同学抢走了第一名。你说怪不怪！

信不信由你。我们复读班上的人以及他们的家长都很信佛，家长时常会烧香磕头求菩萨保佑儿女上大学。也有些同学自己每天在观音娘娘面前拱手祈祷。

于是，有经验和听说过座位之灵验的学生和家长们，每年在复读班开学时，便展开“抢座位”之争。复读班教室里年年满满当当，但我们的班上总有一个座位醒目地空在那儿，并且已经空了好几年了。据老师说，原来那个座位也是不错的“幸运座”。但有一年来了一位外地的女同学，她当时不知通过什么关系抢占了那个“幸运座”，可是这位同学不幸运，高考时就差两分没被录取，第二年她本人还要求进复读班学一年，就在她重新上课不到一个星期，突然接到了家里的电话，说她母亲急病让她回去。她急急回到家时，母亲已经断了气。三天后这位女同学搭一辆拖拉机返回学校，不想在半道拖拉机翻倒在山沟里，她当场身亡，书包里的高考复习书撒了一地，上面还留下了点点血迹……后来有人说，这位女同学在复读班没有考上大学后，母亲就不让她再进复读班了，可她瞒着母亲又报了名，当地老人说，这女孩子命不该是读书人，她是“水蛇命”，克龙门的。于是接下来，她坐过的那个座位再也没人敢坐上去了。有一年，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男同学说我才不相信鬼话呢，便勇敢地坐到了这个座位。半年不到，这位本来身体好好的同学竟然一病不起，自然不用说考大学了。第二年养好身体后他再进复读班时，有人问他敢

不敢再坐那个座位了？那同学连连摆手，说我可领教了，那座位一坐上去，便有种透凉的感觉，直冷到你脚底心，你想摆脱也摆脱不了，还能念好书吗？

他的话后来成了历届复读生的“经典传世定理”，再也不敢有谁拿这个座位来赌自己跳龙门的命运了……

高三生是中国高考的“主力队员”，他们每人都必须上场。关于他们的故事，每一个人都能说得极其生动、形象，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有人说，高考是高中生们获得再生机会的龙门或丧失理想的“鬼门关”，也是一生荣华与低贱的分水岭，这话看起来说得重了些，其实在中国的现实社会里，就是这么回事。

然而高考对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直接参战”的高中生们的事，他们的家长付出的代价和寄予的希望也许更大，因此表现出的种种心态，也就更显得似乎不可思议。

追 随 智 慧

凌志年

第一章 追寻天才

天才和创造力一直在以一种令人无法预测的方式造成种种进步现象。我仍然相信存在许许多多的天才，只不过他们的抱负和潜力都因经济上的困扰和工具上的欠缺而被扼杀了。新技术将为他们提供表达自己的新手段。信息高速公路将为新一代的天才们提供艺术上和科学上梦寐以求的种种机遇。

——比尔·盖茨

希格玛大厦第五层

进出的门紧锁着，透过两扇落地玻璃窗，仍能看到里面灯火通明。陈蕾扬起手来，把挂在脖子上的一个小卡片，凑到门框一侧的电子眼上，门锁发出轻微的“咔哒”声，自动弹开。那卡片上面镶着她的照片和一个隐形磁条，所以既是身份凭证也是开

启大门的钥匙。任何人，只要能够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雇员，总是有这样一个东西在胸前晃来晃去。上面一行字赫然写着：

Microsoft

同样一行字也矗立在这座大厦的最顶层。大厦名叫“希格玛”，坐落在京城西北知春路上，并不高，却有几分夸张。四围镶嵌着蔚蓝色玻璃幕墙，有如一个硕大无比的蓝宝石，栩栩生辉，咄咄逼人。每天有无数人在这里进进出出，可是谁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叫做“希格玛”。对他们来说，真正具有意义的是，这里是中关村，也即我们国家舆论所说的“中国硅谷”。

“希格玛”共有七层。在中关村，更多的人叫它“电脑大厦”。大厦里面装满了著名的跨国公司：一层是“三菱”，三层和四层是“惠普”，五层和六层是“微软”。如果不是“联想集团”在这里占了第二层，有些人就可能把它当作卷土重来的“外国租界”。

陈蕾供职的“微软中国研究院”在第五层。尽管这里是“研究院”而不是“公司”，既不做产品也不卖产品，但陈蕾和她的同事还是习惯于把这里叫做“公司”，而不是叫做研究院。办公的空间不算宽敞，以微软公司数千亿美元的市值和数百亿美元的现金存款来衡量，算不上奢华。浅驼色的化纤地毯上编织着深色花格，窗帘是垂下的，天花板由斜线分割成规则的平行四边形，其间点缀着圆形的灯具。外边天色已经大亮，休息厅里的电灯却都开着，把淡淡的光亮洒在研究员们工作的大厅。走廊边上相隔不远的地方就放着咖啡、可口可乐、红茶、绿茶和菊花茶以及冷水和热水。靠西北的角落里，还有一间专用的饮水房。那些来实习的大学生，往往会对这饮水房和饮料产生强烈的兴趣。

他们过去只是从书籍报刊上听说，微软公司的员工和来访者都是按需取用饮料，不必付钱，现在则有了实际的体验。

关于办公室的设计，比尔·盖茨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办公室和人的等级无关，和人的智慧有关。只有在一个独立的富有个性的环境中，软件开发人员的智慧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但是，一个更大更舒适的办公室却不能使一个高级经理更加聪明，反而会助长其高人一等的念头，进而变得愚蠢。80年代初期，微软公司在美国雷德蒙市的那片红杉树林中兴建它的总部时，美国各地的大公司里正在时兴大开间的集体办公区（90年代中国也开始流行了）。但比尔·盖茨坚持让每一个员工都拥有一个单间办公室——大约11平方米，里面摆着电脑台、电脑、一个小圆桌和几把靠背椅，没有沙发。不论是新来的大学毕业生还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全都一样。这种空间格局潜移默化了一种人人平等和张扬个性的思想，与美国东部那些老牌公司中的等级制度背道而驰。现在，总部员工已经有18000人，比那时多了上百倍。办公区域不断扩大，楼房号码已经排到127号（实际上只有46栋），但比尔·盖茨仍旧坚持他原来的主张。所以，每一个进入微软公司的人，从第一天起便能享有单间办公室的种种乐趣。

要让所有人拥有单间办公室，又要让尽可能多的办公室拥有一个朝外的窗户，这使得微软的办公楼全都造型奇特，第一批建造起来的10栋楼房，都是“星型”建筑，以后的则是五花八门，奇形怪状。但无论什么形状，全部是二层。里面的走廊则会因为外形的不同而变化多端，错综复杂。那些来到微软公司总部的记者和作家，大都有过在走廊里迷路的经历，这使他们相信，只有高智商的人才不至于在这里迷失方向。

不过，比尔·盖茨在雷德蒙实行的这些主张，在北京的希格

玛大厦就行不通。像中国所有的机关或者公司一样，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的办公室是按等级来界定的。大厅中央的部分被隔板分成面积相同的方格，每个格子里面有一张 L 形的桌子和一台顶级配置的电脑，还有一位年轻的副研究员或者工程师。他们的桌子上，都会有一些完全属于个人爱好的物品——照片、饰物或小玩具，间或还有吃剩的饼干和果皮，或者整洁或者凌乱，把主人的性别、年龄和禀性显露无遗。电脑大都拥有 21 英寸的屏幕，从早到晚都亮着。两侧贴着大大小小的黄色不干胶纸条，用以记录一些不能忘记的事项。大厅四围是一个挨着一个的单间办公室。靠南边一侧的两间属于院长李开复和首席科学家张亚勤，李开复的稍大，张亚勤的稍小。另外三面排列的单间，属于各个研究小组的经理和研究员，面积更小些。这些单间办公室朝向走廊的一面，均为顶天立地的大玻璃窗，在与视线同高的那一部分玻璃上，造成一条一条磨砂。这种设计刻意地表现了“一半隐秘一半公开”的效果，让你可以看到对面是否有人，却又不能一眼看清楚那人在做什么。

微软员工的邋遢和不拘小节，举世闻名。雷德蒙公司总部单间办公室的制度，似乎最大限度地弘扬了这些人的个性，里面的陈设完全根据自己的兴趣安排。最常见的当然是家庭照片，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工艺品、野花、红杉以及各种说不出名字的花草、芭比娃娃、比尔·盖茨和爱因斯坦的画像、大理石雕刻而成的专利碑、儿童画、各种零食、星球大战的模型、松鼠、其他宠物，有一个人甚至在办公室里养了一条大蟒蛇……这样的情景，在希格玛大厦中也根本不会出现。

事实上，这个工作大厅里不算整洁，但却没有任何噪音或喧闹，如果有谁想要与人交谈，就会穿过走廊来到一间开放式门厅。门厅宽 9 米，长 16 米，中间是一圈圈浅绿色的沙发。一切

摆设都很普通，惟有沙发中间的那些茶几与众不同，桌面一律是用白色书写板制作。“这是开复的发明。”陈蕾总是对来访的客人这样说。当初李开复设计了这种茶几，要求工匠照做，不准有误。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是必要的，因为研究员们即使坐在这里休息时，也能相互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且在这些白板上画满乱七八糟的符号、字母和曲线。当然他们也有可能静静地坐在这里浏览书刊。门厅一侧摆放着一些公用报纸和期刊，也有一种微软公司在中国印刷的内部刊物：《视窗里的事儿》。最新一期的封面上，赫然几个大字：

“正直无愧——阳光下的骄傲”

不过，这一天也即1999年2月2日，当陈蕾走进希格玛大厦的时候，外面可没有什么阳光。

再过两天就要立春，可是并没有一点春日气象。站在大厅南面16米长的落地窗前，向外望出去，知春路的那一边，中航科技大厦和中国天利大厦遥遥相对。天昏地暗，举首浮云低。高压电线在寒风中抖动，发出阵阵凄厉的呼啸。昨日午夜，狂风由西北方向卷地而来，希格玛大厦活像一座深陷茫茫波涛的小岛。城内围墙倒塌，树杆折断，巨大的广告牌轰然落地，停在路边的汽车在狂风中碰撞在一起。到今天凌晨天亮的时候，市内供电网络已有数十处遭到破坏。气象台的报告说，席卷京城的狂风乃是由于蒙古国强冷空气南下，风力超过10级，并且将持续至少36个小时，气温也将大大下降。

陈蕾的模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典型的“白领丽人”，年纪轻轻，却是微软中国研究院中资历最老的人之一。她已经为微软公司工作了4年半，甚至比她的老板李开复为微软工作的时间还

要长。陈蕾喜欢她现在的工作环境，“别人都说我的运气好。”她总是这样说。她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系，是经济学学士以及文学硕士。看得出来，她当初之所以能够进入微软，大半凭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和一副机敏的头脑，而不是因为她在电脑方面有什么专长。事实上，当她进入微软中国有限公司的时候，对电脑还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痛恨。“那时候，我一看见屏幕上一串串的字符就头疼，”她说，“实在是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不过，用不了多久，她对电脑的感情就发生了变化。她惊喜地发现，“这东西太好用了”。

在这个狂风漫卷的早晨，陈蕾走进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走廊，经过那些装饰一新的会议室，进入摆满计算机的办公区域，然后就看见李开复已经坐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屏幕。3个月前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的时候，陈蕾成为院长李开复的执行助理，按照中国人的说法，这职务其实就是李开复的秘书。

李开复出生于台湾，长于美国，兼有一口流利的中文和英文。熟悉他的人都说，他那副华人的外衣下面，掩盖着典型美国人的性格和观念。不熟悉他的人总是会把他当作中国人，实则他是一个美籍华人。不过，他却没有美国名字，甚至连个中西合璧的名字也没有。当他成名之后，名字频频出现在美国报端，他只是按照美国人的习惯，把“李开复”变成“开复·李”。

李开复的办公室朝南，大约有30平方米。半圆形的大办公桌上很少文牍，一大一小两台电脑从早到晚同时开着。电脑旁有时候会放着饼干、橘子或者几本书，但绝没有微软公司总部里惯常有的那种凌乱不堪。东边墙壁上是成功的象征，那里挂着一大片他在美国获得的各种荣誉证书。西边书架上充满了家庭气息，一幅他在多年前结婚时的照片放在最显眼的位置。那一年李开复

21岁，一对新人看上去还没有脱尽稚气，所以陈蕾笑称他是“童婚”——不是21岁，像是12岁。另外一边，两个女儿从镜框里望着年轻父母，一个温文腼腆，瞪着一对好奇的眼睛；另一个精灵古怪，伸出舌头，故作一副滑稽的表情。李开复有时候会走到书架前边和家人对望片刻，有时候又会抬头看看墙壁。墙上有一幅字：“科学研究，桥架中美，技术合作，情倾神州。”那是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所书，也是李开复数月前离美赴华时抱定的心愿。事实上他的热情总是在回归家庭和成功事业的两种冲动之间徘徊，就像一个想入非非的农民，定要种出“两头甜”的甘蔗来。

办公室一侧的套间是他会客和开会的地方。这房间在希格玛大厦处于东南角上，两面有巨大的玻璃窗，视野开阔。沙发由设计师专门设计，高背深座，蓝白相间，款式和颜色都别具一格。不过，李开复很少使用这个房间。他习惯于在他办公室的一角开会或接待客人，那里有一张小圆桌和4把靠背椅。这表明他召集下属开会一般情况下不会超过4人。按照他的想法，参加会议的人越多，效率就越低，所以他从不把一大堆人召到他的会议室里来。

他每天总是在陈蕾之前来到办公室，这一天尽管天气肃杀，仍然如此。像往常一样，他走进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阅读电子邮件，然后一一回复。这样的邮件他有时候一天会接到上百件，最少的时候也会有几十件。现在，李开复决定在回答其他人的邮件之前，先给陈蕾发出一个邮件。他希望研究院的每一个新会议室都拥有自己的名字，还希望研究院里所有人都来参与这件事。在他看来，这是一个让他的研究人员展示想象力的机会。

在太平洋上跑个来回，比走到隔壁房间还快

说起来挺奇怪，李开复和陈蕾的办公桌仅仅隔着一道玻璃窗，但他如果有什么事情要陈蕾去做，既不肯推门出来走到陈蕾桌边吩咐“请你……”也没有拿起电话高声呼唤“请来一下”的习惯，而总是用电子邮件互通往来。在微软工作的中国员工，全都用手指在键盘上表述自己的想法，尽管他们都可以写一手熟练的汉字，但他们相互之间的邮件往来，却更习惯于用英文，因为英文录入要比中文录入更加快捷。他们把这种习惯叫做“电子邮件文化”，说是好处无穷，许多人最初对这样的说法不以为然，但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发现，它的确是微软文化中的精髓。

比尔·盖茨曾说，电子邮件是“弹指间的信息”。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弹指间的管理。80年代初，比尔·盖茨在微软安装了第一个电子邮件系统，它很快成为公司内部通信和管理的主要方法：替代书面的备忘录和电话口信，讨论技术问题以及在旅途中的汇报。那时候公司只有12个雇员，但电子邮件的魅力已经显示出来。比尔·盖茨后来回忆说：“这为提高我们这个小公司的效率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微软公司在全球已经拥有3万多名雇员，电子邮件看来比20年前更加重要，因为这种东西在越是庞大的机构中，就越能显示其无与伦比的效率。

我们当然不能说没有电子邮件就没有微软，但微软在崛起过程中对于电子邮件的须臾不离，则有事实的根据。比尔·盖茨承认他每天要花几个小时来阅读电子邮件，并作出答复，这些邮件来自全球的雇员、客户和合作者。公司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把电子邮件直接传送给他人，越过所有中间层次的阻隔。他是惟一读它的人，因此谁都不必担心礼仪问题。他似乎相信人们口头上都具有

“报喜不报忧”的倾向，而在一种不必见面的交流方式中更有可能流露真情。“坏消息几乎总是从电子邮件中传来。”他说。所以，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必定要把自己的便携式电脑和公司系统连接起来，与公司雇员交换新的信息和想法。即使是在旅行当中，在远离总部上万公里的几个时区之外的地方，也要检查一下他在公司中的电子邮箱。他说这样“才能让我放心”。那些接到他的信息的人，甚至没有意识到他根本不在雷德蒙总部8号楼他的办公室中。

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公司内部，传统的行政方式以文牍与会议为基础，及至机构内部叠床架屋，云山万重，外部也因现代社会的演变日趋复杂多变，仍以传统手段应对，就只有增加文件与会议一途，也即我们通常所谓“文山会海”。倘若管理人员虚与委蛇，以一套一成不变的空话、套话和大话应对万变之情势，那么此种行政方式的结果，就只能是在浪费大量的时间、资源和金钱的同时，滋生不论效率也不负责任的官僚之风。但是，现代社会的演变似乎不仅在产生新的技术，也在产生着新的管理方式。

电子邮件的出现，似乎天生就是对着“文山会海”来的。微软对它情有独钟，但情有独钟的却不仅仅是微软。事实上，在西方几乎所有的大公司中，电子邮件都是一种最主要的管理方式，而见于纸张的文字和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一人长篇大论余者洗耳恭听的会议，一律极为少见。那些精于计算的老板们心里明镜一般：在电脑屏幕上发布一个指示。安排一次约会或开个10分钟的会议，比起开车赶往某处、到处寻找泊车的地方，然后在会客室里坐等、握手、寒暄、说“开场白”和“再见”，然后再开车回家或者回到办公室，既简单又省钱。

“如果没有电子邮件，不能想象我们每天怎么工作。”陈蕾这样说。此话并非夸张。电子邮件的确是李开复最重要的管理手

段之一。他对这件事情极为认真，无论是对远在太平洋彼岸微软总部的上级，还是近在咫尺的下属，他都会通过这种方式来沟通。事实上，研究院中很多人的电子邮箱，本来就是开设在雷德蒙的微软总部，李开复和他们之间的信息传递，须经过北京——上海——东京，一路到达美国，又由同一线路以相反方向传回。这样，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这些“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人们之间传递信息的距离，比他们同比尔·盖茨之间的距离还要长一倍。不过，由于电波运动速度每秒可达 30 万公里——大约绕地球 7 圈半，所以天涯犹在咫尺之间。对于李开复来说，给一道玻璃之隔的陈蕾发出一个电子邮件，同给太平洋彼岸的比尔·盖茨发出一个电子邮件，并无距离的差别。一个电子邮件在太平洋上跑一个来回，比李开复起身走出办公室步行几米来到陈蕾桌前还要快。

从一个领导者的角度来衡量，李开复也许是整个中国最少接听电话又最多写信的人。很难说电子邮件在现代管理中将会完全取代电话，但在李开复的办公室里，我们的确看到了类似的情形。他几乎整天没有一个电话，但却每天都要接收数十个乃至上百个电子邮件，并且做出大致同样数量的回复。这同我们周围发生的情形似乎相悖。伴随着我们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人们正在减少通信的数量，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电话的剧增。一般人必定认为，打一个电话要比写一封信更加快捷方便，也更易表达情感，即使情人之间也是如此，所以现代生活的特色之一就是用一大堆电话账单来代替情书。

实则电子邮件的情形完全不同。

电子邮件书写的要旨在于开门见山。人们在接听一个电话或者参加一个面对面的会议时，大都具有将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问题说上 10 句的倾向，听者则必须在漫无边际的谈话中费尽力

气寻找问题的焦点。李开复的电子邮件也许长达数百言，也许只有一个单词，全都直奔主题，甚至要将 10 句话的内容以一句话说明。有时候只传送给研究院的某一个人，有时候是传送给某几个人或者全体员工，都只在弹指间完成。

如果我们把电子邮件和电话拿来对照，有意思的情形还有很多，比如当电话铃响起的时候，你必须停下手里的工作去摘取听筒，否则便不能了解对方的信息也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当你终于下定决心拿起听筒的时候，却有可能沮丧地发现这个电话你根本就不想接，或者是对方拨错了号码。如果李开复让自己陷于这样的情形，那么他每天要接听 50 到 100 个电话，可以想象他的样子已经不像院长而更像一个接线生（最现成的办法是让秘书接电话，那不过是把自己不愿做的“接线生”让人家做）。但是，现在李开复办公桌上不断响起电子邮件的铃声时，他却仍旧可以继续手中的工作，那些电子邮件全部储存在他的专有信箱当中，不会丢失，直到他认为适当的时候才来处理。他也会接到一些没有意义的邮件或者根本就是对方“拨错了号码”，那么他就可以不用理睬。当然也会遇到一些无理取闹之人——因为微软所有人的电子邮件地址都是公开的，而且你越是有名望，这种可能就越大。比如比尔·盖茨就曾经提到，他在接到一位女性的无聊邮件之后，弃置一旁，但那女性再次致函说：“如果截至明天你还不答复，我就要公布你跟那位袒胸露乳的女招待的事情。”

电子邮件的精髓，乃是以数字化的管理手段取代人的主观随意性，但问题又不仅如此。对于个人来说，它在无形中督促每一个人精确地表达思想，反应快捷，直截了当而不含糊其辞，主动地安排自己而不是被动地应付别人，可以在一派歌舞升平当中无所顾忌地说些不中听的话，做了错事而又没有勇气当面表白的时候，也能以这种不必见面的方式向人家致歉。比如有一次，一个

员工在泊车的时候，不小心将比尔·盖茨的“凌志 400”撞坏。在连续几个小时的郁郁寡欢之后，他终于给比尔·盖茨本人发出电子邮件表示道歉。比尔·盖茨立即回电说，这是小事一桩，不必介意。此时这位员工必定感谢电子邮件，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他就根本没有机会消除心中的不安。诸如此类的情节让很多人坚信，电子邮件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一个美国记者——弗雷德·默迪，在撰写的《电脑的旋律》一书中甚至认为，“这种交流方式也是非常亲密的，能与之相比的只有传统而古老的基督教忏悔室。”

对于一个组织来说，电子邮件所包含的意义就更值得回味。当人们无论高低贵贱都可以直接往来并表达自己的意见时，传统机构中通常具有的那种等级差别就变得模糊，不再需要设立那么多的管理部门以及管理层次，那些担负承上启下之责的一级又一级中间管理人员，现在也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要。比尔·盖茨曾经说：“由于电子邮件，在我和公司的任何成员之间都不存在着等级差异。”这话也许言过其实，但他的所谓“电子邮件是一种有力手段”的话，的确没有错。事实是，他和公司最下层员工之间，仍然有着 5 个或 6 个管理层次，但他的确每天都能听到来自下层的声音。

这样看来，电子邮件是等级式管理制度的天然掘墓者。它需要的是一种扁平式的管理体系，而非一个层层叠叠的“金字塔”。这中间包含的意义当然不仅止于技术，还有文化。换句话说，在一个等级森严并且牢不可破的机构中，即使拥有一大堆最新型的电脑并且全都可以在网络上驰骋，仍然不能设想电子邮件能够发挥其作用。对于那些热衷于等级制度的人来说，仅仅是不能面对面地向下属发号施令、颐指气使，就失去了为官的一大乐趣。至于那些横断中间，名曰承上启下实则阻滞上下沟通的中间

环节，倘若一个没有层次、没有瓶颈、没有过渡的状态能够形成，那就不仅夺去了他们的乐趣，而且还夺去了他们的种种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利益。

点子最值钱，架子最不值钱

李开复的下属都说他是一个好的管理者，但几乎没有人把他看作一个“官”。行政助理陈蕾从来不用帮助他起草什么文件，如果他觉得有必要向下属发出指示，就自己动手。现在，当他想到要为新会议室命名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其“指示”与我们通常看到的那些官样文章完全不同。

一连串英文字母从他的指尖弹到电脑屏幕上，其速度比口述还要快。也许是因为具有华人血统，他脑子里最先出现的念头全是中国式的。他建议使用“中国最著名的发明家的名字”或者“中国最著名的发明”。有一个瞬间，他想到了中国人发明的火药。于是写道：“我建议用‘火药’命名其中之一。这样，当你走进这会议室的时候，必会激发所有的力量，为你的思想而战。”

想到他和他的同事的智慧将会以火药的力量爆发出来，李开复不免有些兴奋，于是又在这句话的后面留下一个符号：“：-))”。我们把这符号竖过来，就可以辨出，这是一对小眼睛、一个小鼻子和两张哈哈大笑的嘴巴，所以它是在显示书写者的快乐。

几秒钟后，陈蕾接到李开复的“指示”，随即在键盘上敲打出一行英文：

亲爱的同仁们，我们的会议室还没有适当的名称呢，有时候这会引起混乱。所以我们现在征集会议室名称。截稿时

间：明天下午 6 点！

研究院全体员工的电子邮件地址都在陈蕾的电脑里面，所以，她只要点击屏幕上一个表明“研究院·北京·中国·所有人”的按钮，就把李开复的“建议”连同她自己的邮件在同一时刻传给了研究院的所有人，甚至连李开复的“哈哈大笑”也没有遗漏。

“火药”的念头在众人感情上立刻产生了共鸣。这批供职于外国公司的中国青年，难免会在心里生出一种五味杂陈的感受：我们的祖先发明了这个足以改变世界面貌的东西，但却只会把它做成鞭炮用于庆典或者祭奠。外国人把火药引进他们的国家——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引进”，但却把它做成枪炮打进我们的国家。悠悠岁月中种种惨痛的故事，难道仅仅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这样的教训么？为什么我们中间种种杰出的智慧，竟不能造就杰出的历史？而种种蒙昧愚蠢的行为却能够发扬光大？

“当我们说‘让我们去火药库讨论吧’的时候，那该多棒！”徐迎庆立即响应李开复的想法。他在给全体同仁的电子邮件中，还特地用中文提出了新的建议：“试想一下这几个名字吧：火药库、司南车、造纸坊、印刷厂。”

在新近加入微软的副研究员中，徐是年龄最大的一个。此人身材不高，大脑发达，既聪明又勤奋，总是冒出形形色色奇特的念头，从来不肯循规蹈矩。比如他会坐在湖边一连几个小时观察水波的荡漾，又会拿起床单，在微风轻拂之中数百次地来回摆动，借以体会它那飘飘欲飞的感觉，然后就想象着怎样把这些感觉描绘到电脑屏幕上。诸如此类的念头，在过去并不能给他带来任何创造性的成就，有时候反而会带来麻烦；但这却是微软对自己员工的最重要的要求，所以他说，他在这里就好像是“鱼归

大海”。李开复说，徐迎庆的这种充满激情和想象力的性格非常“美国味”。奇怪的是，徐在来到微软之前从来没有到过美国，他本人倾向于把自己的层出不穷的念头和过去的经历联系在一起。他在50年代“大跃进”的年代中出生，在“动乱的十年”中长大。“文革”结束后，他成为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受益者，从数学学士一直读到计算机博士，其间还在中国人自己的研究机构中工作多年。这样一个人，对于中国传统中种种利弊无疑有着更深的感受，所以才会想到把自己祖先的“四大发明”拿来作一个外国公司会议室的名称。

然则根据研究院的档案记载，徐迎庆并不是第一个对李开复的“征名活动”做出响应的人。至少郑薇就在徐迎庆之前发出了一个建议。郑薇是当时研究院里惟一的行政助理。这个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的女孩子，似乎格外崇尚中国古代的文化哲人，所以建议使用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这样一些人的名字，并且在相应的会议室里面挂上这些人的画像。这一想法一度得到徐迎庆的赞同，所以他后来又在自己的邮件中补充说：“忘掉‘火药库’吧！”

张高满脑子装的都是外国人。“我想到了一些最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的名字。”这个刚刚毕业于中科院软件所的计算机博士写道：

阿伦·图灵——“图灵奖”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阿伦·伯利斯——第一个获得“图灵奖”的人。

约翰·卡斯和马温·明斯克——两个最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

道格拉斯·英格伯特——鼠标的发明者，1997年“图灵奖”获得者。

吉姆·格雷——1998 年“图灵奖”获得者。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研究院中电子邮件频繁往来。后人如果有机会阅读这些邮件，必会惊讶这些人对这样一件简单的事竟会倾注如此热情，当然还有严肃、幽默，以及一两句插科打诨。徐彦君想起了“雅典娜”。他说，研究院的女性们做出极大贡献，故此以“智慧女神”的名义向她们表示敬意。在向身边的女性同仁大献殷勤之后，徐忽然严肃起来，他说他想起了电影《罗马假日》中主人公的最后一句话：“当然是罗马。”所以建议用“罗马”作为另外一个会议室的名称。他的用意既含蓄又明显：“一个最早建立议会制的城市，象征我们在此进行平等的学术交流。”

李江是到 2 月 3 日才发现有这样一场讨论的。大家已经如火如荼地争辩了一天，而他一无所知。原因是他的名字居然忘记登录在陈蕾的“电子邮件名录”上。“我失去了一次机会。”这位毕业于浙江大学的博士一边抱怨一边提出自己的想法。他说，应当把“司南车”变成“指南厅”。

“我喜欢你们的想法。”李开复也加入了讨论。他说他也喜欢徐迎庆的“四大发明”，但他想起中国人在数学领域里发明了“零”的概念。“这等于是半个计算机啊！”他在给所有研究员发出的一个电子邮件里这样喊道，“我们应该把一个会议室叫做‘Zero Room’。”接着又插科打诨地说：“但是中文怎么说呢？零堂？那会在口头上念成‘灵堂’的。”

这个美国人的中文造诣其实能够胜过很多中国人，他能够顺口说出“象牙塔”、“无为而治”、“赴汤蹈火”一类的中国话，还知道用《半夜鸡叫》里面的“周扒皮”来比喻那种刻薄的人。但现在，他也有了黔驴技穷的感觉。这一大群熟悉英语也熟悉中

文的青年人，开始在中文和英文中间寻找合适的过渡。当陈通贤和孙宏辉找到下面两个词的时候；所有人都意识到，事情终于有了眉目：Zero Room：灵感屋；Abacus Room：算盘室。

“哇——呜！看看这些想法和争论，多么精彩！”李开复在电子邮件中禁不住欢呼起来：“现在我们已经拥有所有充满活力的思想。让我们来结束这场有趣的讨论吧，这将指导我们去思考我们未来的研究。”

2月3日下午，到了陈蕾规定的时间，事情有了结果。会议室的名称确定如下：

指南厅——研究院最大的一间会议室，大致可容50人。

火药库——面积仅次于“指南厅”，一门古代火炮的模型放置在这里。

造纸坊——面积较小。只有一个圆桌和几把靠背椅。

灵（零）感屋——其中一面墙全被书写白板覆盖。

印刷厂——最引人注目的装饰物是一块活字排版盘和一大堆散乱的铅字。

算盘室——李开复使用的会议室。

李开复想到了最初的承诺。在给陈蕾发出的一个电子邮件中，他写道：“我想，奖励应该给徐迎庆，因为是他最先提出了四大发明的想法。”

“你是对的，老板！”陈蕾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给大家写出一句中国特色的口号：“咳！全体同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让我们大家向迎庆同志学习！向迎庆同志致敬！”

这几行字从电脑屏幕上跳出来的时候，徐迎庆有些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他摸了摸自己蓬乱的头发，手指在键盘上弹出：

“这事好像被夸张了！”

如果除去这件事当中幽默和说笑的成分，李开复就不会认为有任何夸张。6 个月前，李开复接受比尔·盖茨的邀请，出任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主持者的时候，5 个月前，他变卖在美国的家产，携妻牵女来到中国上任的时候，只不过是孤身一人。徐迎庆还在中科院计算所当他的副总工程师，张高是软件所的一个尚未毕业的博士生，陈通贤在一个公司里谋职，刘文印在清华大学当教师，李江在浙江大学当教师，日后围绕在他左右的那些人，全都没有踪影。那时候，李开复的情景真是有点凄凉。才过了几个月，就有这么多优秀的人相聚一室，议论风生。刚刚出版的《微软研究院通讯》中，也可以辟出栏目《我们的大家庭》，并且喜气洋洋地宣布“我们的队伍不断壮大”了。

然而还有更重要的事，李开复希望在这个“大家庭”里营造“智慧至上”的气氛。作为一院之长，他当然可以使用他的权力来处理诸如会议室名称这样的事，那会更加简单，依据惯例，也无不妥。但他早就说过，他来到中国是“期望和一些最优秀的人在一起工作”；他也说过，他是在“追随智慧”。他懂得那些最优秀的人尽管性格各异，但几乎全都具有藐视权力的本能。这种本能并不总是有道理，但这就是他们。看到有权势者门庭若市，从早到晚乱哄哄地围着一帮人，他们会说缺乏智慧的权力永远不会造就进步的力量。看到思想者冷清孤寂，门可罗雀，他们会有惺惺相惜的感叹。他们会说，点子最值钱，而架子最不值钱；智力最值钱，而权力最不值钱。李开复明白，在他身边聚集着的，正是这样一些人，他需要他们。他们和他一样，是冲着他的智慧而来，而非追随“权力”。在这场关于会议室名称的讨论中，每一个人代表的都是智慧、热情和想象力，他们能够赋予冷漠的电脑以炽热的感情，用自己的头脑判断这个世界的好与坏。

世人皆知微软公司一向信奉“脑力胜过体力”，我们也可以把这一信念看做是 20 世纪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不过，在过去的岁月中，这个世界生产“权力”的速度还是超过了生产“智慧”，不免形成深厚而又广大的权力海洋。我们虽然还不能断言权力与智慧是成反比——权力越多越无限，智慧越少越有限，但却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弘扬智慧的最大障碍是权力。对于那些敢于幻想和善于思考的人，权力带来的损害，远远超过了迷信和愚昧。智慧被压抑、被扭曲、被侮辱的种种记录，乃是 20 世纪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在即将开始的 21 世纪，智慧必将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功，更不会甘于昔日的耻辱。它也许会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一个新的信念：“脑力胜过权力。”

今天我们回看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历史，可以认为，“会议室命名”是李开复激发员工热情与幻想的首次尝试。参与这次活动的人后来都说，那是他们经历过的第一次“脑力激荡”。风气既开，必会发扬光大，这就难怪李开复要欢呼“哇——呜”。现在，他坐在这蔚蓝色的大厦里，想象着未来岁月，难免有些得意，似乎已经知道历史从什么地方来，又将到什么地方去。

摆脱“完美主义”的迷人陷阱

1998 年 7 月 9 日，微软公司正式宣布李开复博士加入微软。李开复在这一天说：“我现在相信微软研究院是实现我的梦想的地方。”但是，微软公司首席软件总工程师巴特勒·拉姆伯森博士那时不一定会赞赏这样的“梦想”。他曾经说：“让一个最优秀的研究人员变成一个最优秀的管理人员，不一定是个好主意。”

李开复是个优秀的研究人员，这在他还没有走出校园的时候就已得到证明，有如当日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后来的微软公

司副总裁里克·雷斯特所说，“那时候他是一个明星学生，做出了一些里程碑式的工作。”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更多地牵涉，现在来看李开复的职业历程。

此人在 90 年代开始的时候离开卡内基梅隆大学，进入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那时候他踌躇满志，自信天降大任。五姐开敏说他“从小聪明过人”，他对自己的智慧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不过，从那时起直到 1998 年 7 月进入微软公司的 8 年中，每当他把自己的智慧和热情投入研究的天地，总是无往不利，而当他把心血用在管理领域，情形就格外复杂。他的上级和下级都说他是一个好老板，可惜的是，他作为一个“好老板”的才能从未得到回报。事实正像他自己后来说的，那是一个“失败的历程”。

1990 年进入硅谷的苹果公司，是他职业历程的第一个起点。那时候，他在语音识别领域取得的成绩已为世界瞩目，所以不用像其他毕业学生那样为了找工作而发愁。他坐在家里守株待兔，苹果公司的一位总监就找上门来，先是给他演示了一段录像：一个装饰讲究的办公室里，一台电脑和一个男人在对话，声音真切，有如一对亲密伙伴。当然这是一个虚拟的场景，人是真的，电脑却只是一个关于“未来电脑”的梦想。但李开复深受感动，内心惊叹那位制作录像的幻想者是“一个非常有能力有远见的人”。此人名叫阿兰·凯，在李开复之前 23 年毕业，有人说他是“个人电脑之父”，因为他的论文对整个计算机业都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他构思了 20 世纪个人电脑的模样，又在施乐公司做出世界上第一个图形界面。就在全世界都按照他的构思生产个人电脑和“视窗”操作系统的时候，他却坐在苹果公司里描绘出 21 世纪的电脑，那是 1990 年，恰是李开复毕业的日子。

阿兰·凯后来成了李开复的“忘年之交”。那录像则在当场就对李开复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在以后的日子里把这段录像

反复演示了 30 次。这个人和这个“幻想”使李开复相信，苹果公司真的很想把语音识别技术放在产品里。这时候，那位总监开口了，他说，苹果万事俱备，有幻想，也有足够的钱实现幻想，就差一个语音专家。

这以后的事情可想而知，苹果公司使用了一切手段表明自己的诚意，请来一些深孚众望的人打电话到李开复家里游说，还给他送来鲜花。这让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受宠若惊。他觉得这不是一个只知赚钱的公司，很有人情味。那时候，微软还不是一个既令人生畏又令人羡慕的公司，员工也远远不是 35000 个，而是 4037 个。尽管“视窗 2.0”已经诞生，但没有人注意，大家还是在用 DOS。“办公室”也不存在。苹果看上去比微软好得多，李开复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他选择了苹果。

在苹果的最初 6 个月里，是他最快乐的一段时光。那时候，公司看上去一切都好。语音识别技术成为大热门，李开复在卡内基梅隆的博士论文也成了专利，每套能卖 10 万美元，半年卖出好几套。钱是归学校的，李开复分文未得，但毕竟满足了年轻人的成就感。总裁每天到李开复的研究小组来看，眼见进展顺利，人人兴奋异常。苹果机在市场上虽然只占 10% 的份额，但价格昂贵，利润很高，足以和占有市场份额 90% 的个人计算机相抗衡。苹果沾沾自喜，完全没有想到，世事多变，公司已四面楚歌。

后来人谈论苹果公司的潮起潮落，都说那个时候公司的总裁实在目光短浅，缺少魄力。其实，当时苹果公司的人没有一个能够拥有正确的判断，当然也包括李开复。毫无疑问，这里有一群最富有智慧的人，但这些人几乎全都陷入完美主义的迷人陷阱。不像微软公司那群没有规矩不论方圆的小子，只把眼睛盯着市场，苹果对自己的技术兢兢业业，但求完美无缺，根本不管用户

的心里想什么。他们把“苹果机”的外观做得豪华而又精美，软件又快又好。李开复当时觉得，“苹果机”是世界上速度最快样子最漂亮的。他们不肯接受“兼容”的概念，倒不是“兼容”本身有什么不好，而是看见那简陋的“个人电脑”，就嗤之以鼻，一想到要把自己的技术放进“个人电脑”，就觉得是“把鲜花插在了牛屎上”。举出两件小事就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完美主义”已经如醉如痴，走火入魔：“苹果机”的软盘驱动器必须具有“轻点鼠标自动弹出”的功能，因为一个最好的技术，就不应该让人们伸手去按什么按钮；语音识别不能允许把麦克风戴在头上，男人戴这个东西已经难看得要命，更不要说那些“白领丽人”，高髻云鬟新样妆，难道要让这个黑乎乎的东西搞得一团糟吗？苹果的设计人员就是这样陶醉于自己的“完美无缺”，根本不管“自动弹出”技术的实现将使每台“苹果机”的成本增加 10 美元；将麦克风放在一英尺以外的要求，就使得语音系统根本不能做出正确的分辨和选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苹果的“完美主义”并不为用户接受。用户宁愿使用并不完美但却便宜的东西。简陋的机器在扩张，完美的“苹果”在下降。苹果在市场上的占有率，一度降到 3%。这样看来，苹果的最大毛病似乎就是它没有毛病。假如它能够像它那个著名商标一样，有一点缺陷，也许就不会落到后来的地步。

1991 年 4 月，这些“完美主义者”对于眼前的危机再也不能熟视无睹，彻底转换公司模式的钟声敲响了。那一天，总裁来找李开复，告诉他，研究小组将被拆掉，他可以做经理，但人员须裁减，18 个人只能剩下 15 个。李开复即使再缺少公司运作经验，也可以看出公司出了麻烦。幸运的是，语音识别系统的研究

仍能继续。大半年后，李开复的研究再进一步，语音系统技术和操作系统合在一起了，公司的情况也出现转机，还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签了合约，这给不少人带来幻想。老板也许是想再接再厉，一举扭转公司颓势，所以吩咐李开复立即展示他的语音技术成果。

展示新技术的地方是一个海滨度假场。那里正在开一个会，名曰：“技术·娱乐·设计”（TED），所以吸引了几百个电影明星、导演、画家和设计师。李开复走到台上，和他的“小精灵”（Casper）频频交谈。“小精灵”不是人，是卡迪片中一个善解人意的鬼，现在则是李开复面前的一台电脑。它一边回答李开复的话，振振有词，一边在自己的屏幕上显现出李开复想要的东西：一张开出65美元的支票和一个日历本，还能帮助李开复安排工作日程。那时候计算机界对于语音还没有多少认识，大多数人还远不是今天这样，处心积虑地让电脑“能听会说”，在人与电脑之间，键盘是无可争议的桥梁，就连微软这样的公司也还没有涉足语音的领域。想想这些就可以知道，李开复与“小精灵”对话的那一瞬间是多么奇妙。

大家一起站起来鼓掌，全都惊叹不已。《华尔街日报》和其他报纸的记者纷纷赶来，围着李开复问这问那。美国ABC电视台的记者要来实况转播，这正是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约翰·斯科利所需要的。他问李开复有无把握。李说：“失败的概率为10%。”老板说：“能不能减少到1%。”李把脑筋一转，当场就说“能”。老板以为他要回家挑灯夜战，再来一次“完美主义”的技术改进，其实李开复想的是：到时候带上两个“小精灵”——如果一个“小精灵”失败的概率为10%，那么两个同时失败的概率为： $10\% \times 10\% = 1\%$ 。

1992年3月2日清晨7点，李开复和他的“小精灵”出现

在“早安美国”节目上。这是电视台早晨的黄金时段，至少2000万美国人一边吃早饭一边观看。30岁的李开复第一次面对电视直播镜头，不免紧张。他不断呼唤他的“小精灵”，其实他面前的那台电脑只是做样子的，真正和他对话的电脑在幕后。女主持人当场发现面前的“小精灵”有些问题，好在此女不仅风度翩翩，而且有经验，处变不惊，还能故作惊喜，说出一番颇有诗意的话：“早晚有一天，机器也会气急败坏地对你叫喊。你以前必会认为这是夸张之辞，但现在，这里有一台能和人交流的计算机——世界上第一台，它居然能听懂你的话并且还能回答你的问题。”节目刚一结束，她便转向操作者说：“别蒙人，你们的电脑连线都没有接上。”多年以后，李开复说起此事，还在遗憾：“到今天她可能还会以为是假的，其实那的确是真的。”

一切顺利，老板担心的失败没有出现，连备用品也没有用上，不过，还是出了一个小小的纰漏：女主持人询问苹果的老板，这机器什么时候能变得更好。问话的声音纯正悦耳，“小精灵”闻之心动，插话道：“你要不要和我约会？”

这场面令全美惊叹，就连那个纰漏也被看做是成功的象征，大家都说那是一个精心安排的幽默：这机器也想吃女主持人的“豆腐”啦！“硅谷”惊叹不已，雷德蒙的田园也不再宁静。苹果股票从60美元跳到63美元。李开复一夜之间就成了电脑世界的明星，那真是他的职业生涯中一个辉煌的时刻。

不过，那时候他太年轻，既不能洞悉人间万象，也不理解市场变幻。“我太相信其他的人了，以为他们都比我高明。”他后来说。他以为他的发明真的可以成为产品，然后长驱直入千家万户。他可没有想到，当他和“小精灵”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时候，苹果已经在走下坡路。“小精灵”其实只有宣传的价值，距离实际的应用还远着呢。老板让他把“小精灵”弄到电视上去，

与其说是为了造福人类，倒不如说是为了拯救苹果。

“小精灵”风光一阵就没了下文。这情景有些像我们国家成千上万的科技发明，获得了什么大奖之后便沉睡实验室中。宣传的效果无论多么辉煌，毕竟不能代替市场上的商战。李开复从电视屏幕走下来，就看到公司开始裁员了。第一年裁了10%，以后几年更多，先是一般的雇员，然后是大大小小的老板。“那是很残酷的事情，很不好玩。”李开复说。研究项目不保，小组也被拆掉。那些“没了庙的和尚”集中到他的名下，越来越多，一度增加到200多人。这不是繁荣的象征，而是末路的征兆。第二年，公司有一半人离去，又雇了一些人来。李开复那个组流失率最低，但也有10%，有才能的人说不定哪个早上就走了。中国的企业即使到了这个地步，也是硬撑着，想方设法“扭亏”，要政府关照，要银行贷款，担心员工一走社会就会大乱，而员工大都宁愿在一棵树上吊死也不愿离开。美国的公司就没有这些，没有哪一位老板会承担“安置下岗职工”之类的责任，也没有任何人有权力阻拦员工离去。

苹果在90年代后期重整旗鼓，经理层的人员大换血，由此带来新的局面。但在90年代初期，苹果没有好的领导，董事会都是一些有权有钱就是没有智慧的人，公司员工全都不知道他们将被带到什么地方去。李开复一个人撑着200多人。人家不断抱怨“这有什么用处？”

牢骚和抱怨的盛行，大都是日薄西山的征兆，无论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机构，都是一样。现在苹果到了这个地步，就连新任首席执行官杰欧·艾姆利奥也在抱怨。他对一个朋友说：“我就像是在划一艘大船，这个船有一个大洞，快沉了，而每一个水手都在划向不同的方向。现在我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向同一个方向划。”

他的朋友挺感动，但接着就发现有什么不对，于是问道：“那个洞怎么办呢？”

“啊……啊……还有一个洞？！”杰欧·艾姆利奥似乎刚刚想到。

这总裁看来也不是一个完全清醒的人，雄心有余而智慧不足。不过他的比喻也有几分道理。人心散了，全都自顾自。这种局面一旦发生，就很难扭转。

1995 年，李开复接任苹果公司副总裁的职位，负责公司多媒体技术的研究。他年轻气盛，期望能够力挽狂澜。作为一个研究人员，他在苹果辉煌了一阵，现在，他觉得自己也有做一个高级管理人员的能力。

他对总裁杰欧·艾姆利奥说：“电脑业现在已经非常重视多媒体软件的研究开发。”他的计划是推动公司重视软件开发。他还有一支多媒体的研究队伍，有 200 多人，他认为这是公司振兴的希望。总裁有些心动，继续听，于是李开复大着胆子说出很多极端的念头。他说，不能用衡量硬件的营业额标准来衡量软件的成功与否。这想法在今天不言而喻，多媒体已经横行天地之间，比微软的“视窗”和“办公室”还要厉害。但这想法在当时就被视为年轻人的“不现实”。总裁说：“公司正在赔钱，再把巨额资金花在这些‘不现实’的研究上，董事会中没有一个人会接受！”李开复退而求其次，就说：“你可以把多媒体公司卖掉。这个公司价值 5 亿美元，一大笔现金。”苹果的确需要这笔钱，但卖公司必须连这 200 多人也卖出去。董事会能同意吗？这时候苹果公司董事会里的气氛，真让你觉得挺像中国的某些机构。他们想的是：我不愿意让你干，也不愿意让你走。李开复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说出心中下策：放弃操作系统的研究。因为市场上的

局面已经不是 90 年代初的样子了，微软的“视窗 95”已经红遍全世界，没有办法再在这个领域和微软竞争。李开复建议，苹果可以和微软合作，把多媒体软件的重心放在“视窗”的操作系统上。“95% 是微软的操作系统，5% 是我们的多媒体。”李开复说。但董事会中那些蔑视个人计算机的人依然要撑自己的脸面，坚决不肯“把鲜花插在牛屎上”。

到了这一步，李开复终于对苹果彻底失望。“我觉得我的想法都不被接受，”他说，“这是我要离开的很重要的原因。”但还有更重要的，他已经隐隐感到，在一个硬件公司里，他不可能痛痛快快地做他最喜欢做的软件。

1996 年早春，他离开苹果，走的时候仅仅带着一叠剪报，那上面记录着他和他的“小精灵”共同拥有的辉煌时刻。

还有一份材料是他属下的两个员工给公司两位主管发出的电子邮件。里面都谈到李开复。一个名叫艾瑞克的说：“他真的是我在苹果工作时最好的经理。他诚实正直，决策正确，目光远大，是一位优秀的经理。我希望你们两位一定要理解，和开复一起工作是我最有兴趣留下的理由。”另外一位说：“他对我是难得的导师。有更多李开复这样的经理对苹果有好处。”事实上，用不着这些下属的提醒，杰欧·艾姆利奥也能了解李开复的价值。他在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时的情形，还能记忆犹新：“那天晚上，一件令人悲哀的事发生了：李开复告诉我他打算离开苹果。开复是苹果公司 5000 员工中最杰出的两个人之一，而我们竟然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无能为力。”

比尔·盖茨与李开复

大多数人在见到李开复的时候，都会仔细端详，在脑袋里面想象他和比尔·盖茨之间有什么瓜葛。其实他在 1998 年 7 月 9

日接受微软公司的职务前，还从来没有和比尔面对面地坐在一起呢。那时候，他是 SGI 公司的副总裁，名声远远不及比尔，但他的成就在多年以前就吸引了比尔的注意。“他有关语音识别的博士论文很了不起。”比尔有一次这样谈论李开复。他说，开复对语音识别的想法和他“不谋而合”，还说他对开复在苹果公司的工作“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比尔是地道的美国人，开复却是华裔，有着一副地道的中国面孔，你怎么也想象不出他和比尔会有共同之处。两人那些共同的地方乃是凝于无形之中。全都绝顶聪明，全都少年得志，全都是工作狂，全都戴一副纤细金属框架椭圆镜片的眼镜，除非在正式场合，全都不系衬衣领口上的钮扣。不过，比尔属于更加外露的那一种人，从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开心的时候总会咧开大嘴情不自禁地欢呼，见到不能令他满意的人和事，就会粗鲁地骂起来。当然比尔有时也会做出一些笑容可掬的样子，就像他出版的所有书的封面照片一样，但那是做给别人看的，很难说是真正的比尔。实际上这个时候的比尔更像开复。开复有东方人的含蓄，无论喜怒哀乐，来到脸上的时候全都会打折扣，头发一丝不苟，不像比尔那样乱七八糟。中等身材，举止文雅，面容白净而少棱角，说话声音委婉平和，内容不卑不亢，逻辑严谨，常在紧要关头节外生枝，插科打诨，脸上露出一一种诱人的笑容。眼镜后面的目光中，总有几分傲慢，但绝没有比尔眼睛里的那种肆无忌惮。当他的嘴角微微向上翘起却又转瞬即逝的时候，便有一分紧张和缺少自信显现出来。他已习惯于处在中心的位置，但有时候也会在内心里估量旁人对他的印象，每当这时候，他的目光就会忽然离开他所关注的对象飘忽左右。他的内敛和宽容远远超过了他的大多数同龄人，比如他在苹果公司做副总裁的时候，有一次召集会议，一个美国人用粗鲁的脏话冲他大骂，在场者全都愕然，他却淡然处之，不动声色。这种

“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本色，乃是中国文化的典型表现，在美国文化中极为罕见，在锋芒毕露的比尔身上更是从未出现。

李开复的名字第一次与比尔·盖茨联系起来，乃是出于一种偶然的机缘。

1998年春的一天，他只身一人，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来到华盛顿州的雷德蒙，见到他的好友黄学东。黄本人就是微软研究院里主持语音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两个朋友不期而遇，分外惊喜。黄学东问李开复来雷德蒙做什么，李开复老实地说，他正在为出卖他的公司做最后一次努力。他摇头叹息道：“我在出卖自己的心血，而且知道卖不出好价钱。”

李开复那时是硅谷 SGI 公司的副总裁，并且直接领导着 SGI 下属的一个多媒体公司。SGI 以大型和中型的计算机工作站服务器为主要产品，在全世界都挺有名气。在美国，计算机的世界里真是此起彼伏，各领风骚三五年。70 年代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80 年代是苹果公司，SGI 的无限风光是在 90 年代初期，那时公司里的工程师们，大都是硅谷最优秀的。至于微软公司的空前盛况，还要等到 3 年以后。

李开复进入 SGI 是在 1996 年春天，那时候这家公司还有一层耀眼的光芒，有一批最优秀的工程师，做的是世界上最快、最酷的机器。色泽鲜艳，光彩夺目，内装多媒体软件也都是最快最好的。不过，明眼人已经看出危机的征兆：机器价格昂贵，非一般人所能承受，软件只有专业人员才会有兴趣。计算机企业的瞬息万变和表里不一，甚至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如今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已明晰，可在那个时候，聪明者如李开复，也不能完全洞悉公司隐情。

SGI 公司对待李开复的办法非常特殊，首席执行官艾德·迈

克拉肯和总裁汤姆·杰姆拉克，双双亲自出动，把公司副总裁的权力交给他，显然也把公司振兴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李开复少年得志，自以为智慧过人，又有超常的勤奋，必能无往不利。

表面看来，起步挺顺利。李开复一边卖公司原来的产品——服务器，一边想象着开创一个新的软件平台，可以在互联网上跨平台使用。艾德·迈克拉肯看来对互联网有特别的兴趣，很慷慨地花费时间来听李开复的游说，然后便竭尽全力地支持他的计划。公司有一段时间情况不好，艾德·迈克拉肯把口袋里最后一笔钱掏出来，交给他的诸位高级经理，咬咬牙说：“李开复小组需要多少钱，就用多少，剩下的你们其他人分。”

然而李开复需要的不仅是钱，还有时间。艾德·迈克拉肯可以倾囊相助，却没有时间等待他的成功。公司的财务已经无法继续维持，人心离散。眼看着李开复的新产品出现一点眉目，可现在谁都等不及了。在他身后，有才华的人一个又一个悄无声息地离开。他觉得苹果公司的阴影跟在他的身后来到了 SGI。

不过，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在自己的研究中。直到有一天，一个电话让他从梦幻中醒来。那是高级副总裁瑞伯·布吉斯打来的。瑞伯是个商业天才，曾在加拿大开过一家软件公司，SGI 看到人家的公司不错，就掏钱连人带公司一起买了来。瑞伯进入 SGI 负责公司的软件研制，也是李开复的顶头上司。当初为了说服李开复加入 SGI，他费了不少心血，但现在，他在电话的那一头说：“我要走了。”

李开复大惊：“我是冲着你来的呀！你怎么可以……”

硅谷的情形就是这样。这里有大约 7000 家计算机企业，有好几万软件工程师和管理者，每年却有大约 30% 的人离开自己的企业。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来去匆匆，能在一个地方呆上两年，就已经是老员工了。李开复回天无力，只有感叹。直到多年以

后，他谈起那情景还很伤感：“越是优秀的人走得越快。可惜我没有很多时间和他们在一起。”

公司的情况更加糟糕。走的人也更多了。到了这一步，总裁不得不仿效美国大多数公司陷入这种局面时的办法，一边裁员，一边改组，一边把最后的赌注压在李开复身上。“我们打算做一个专门的软件。要你来做。”他对李开复这样说。

很幸运，这是李开复正在做的东西，所以，它在公司是救命稻草，在李开复却是兴趣所在。概括地说，这是一个多媒体软件，它可以帮助用户在因特网上进入三维世界，声形并茂，前后左右，恣意进出漫游。它可以是很小的东西，有如一张网页、一个广告；也可以是整个世界，让你在里面寻找人世间的的朋友，或者去任何一个地方旅行。

“那时候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李开复在两年以后这样说，“可以彻底改变因特网的经验。”这时候他已经是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他的不少研究员果然在做类似的事情了，比如沈向洋的“三维漫游”和张宏江的“多媒体检索”。但是，在1997年夏天，他却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很酷的事情”竟会将他引向有生以来最狼狈的境地。

任何失败之举，在它刚刚开始的时候都会笼罩一重诱人的光彩。李开复的起点也是诱人的。他的智慧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当他把自己做成的软件拿出去给别人展示的时候，每个看客都会张大嘴喊出声来：

“哇！怎么会有这么了不起的东西！”

“微软做不出来！苹果做不出来！国际商用机器做不出来！”

“移植到个人电脑上去！”

李开复尽管已经历过苹果的沉浮跌宕，却还没有学会超过他的年龄的思维方法，真是既天真又自信。别人一说他的技术了不

起，他自己也就觉得了不起。“我要做一些彻底改变人类生活的工作。把我们的软件全部移植到微软的‘视窗’上。”他对他的老板和同事这样说，“让我来做一个多媒体公司。”

如他所愿，SGI 真的买下了一个公司，让他实现他的“多媒体之梦”。大家都看出，这项计划既刺激又危险，但李开复胸有成竹地说：“只要我们的软件好，就可以成为微软的伙伴。就算是竞争，我也不见得输给它。”

他准备孤注一掷，但是他低估了一个技术被人们接受所需要的时间。一个好的东西并不能保证一定会被人们接受。用户的需求真是奇特，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地突然爆发出来，淹没那些毛病百出的烂货；有时候无论你的东西怎样优秀，他却迟迟不肯接受。这样的例证在计算机的市场上屡见不鲜。

李开复熟知这些事，但是从来没有想到同样的事情会落到他的头上。他把自己的宠儿叫做“宇宙”（Cosmos），拿着它到微软去寻求合作，立即就发现了不祥之兆。

“不错！”人家毫不犹豫地承认他的东西更好些，甚至认定，几年以后会非常重要。“不过，现在用不着。我们现在买来的技术应该足够。”人家轻描淡写地对他说。

李开复赶忙插话，说他分文不收，只是想把这很不错的东西捆绑在微软的操作系统上。微软的那位一边倾听他的陈述一边微笑，笑完了还是不肯接受。

若干年后，李开复有一次谈到微软这一次拒绝和他合作，承认搞技术的人难免都会犯“技术至上”的错误，但事情恐怕远不仅仅如此。他还低估了比尔·盖茨对市场的影响力，他一心想着只要自己的产品好，就会迫使微软要么接受合作，要么接受竞争。根本没有想到，“视窗 95”在以她的活力赢得了全世界之后，竟也会反过来拒绝活力。

他不得不为自己偏爱的“多媒体之梦”做最后挣扎。熬过几周之后，事情终于有了结果，网景公司接受了他的产品。网景浏览器占有60%的因特网市场，照理可以让李开复绝处逢生。漂亮“女儿”抛头露面，动心的人家也不能算少，一年的营业额超过了1000万美元。可是公司支出更大，必须照常开门，100多员工的薪金一分也不能少。一年以后，亏损已经超过2000万美元。到了这时候，李开复不得不承认，微软的“拒绝”不是没有道理。“好东西也不能做早了，”李开复后来说，“当初就算微软接受，也不一定成功。”

1998年春天是在一片惨淡的气氛中到来的。新总裁瑞克·布鲁斯上任，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到李开复说：

“我知道你的产品很好。不过，我们还是把多媒体公司卖掉吧。”

那是李开复迄今为止的生命中最黯淡的春天。他到处奔走，遇到可能的买家就会苦口婆心地讲述自己用智慧、心血和梦想培育起来的公司。到了自己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就会在心里暗自打定主意：

“无论如何，不能在一个不看重我的公司干下去了。”

“我更喜欢自由平等的环境”

李开复再一次来到雷德蒙的时候，已是1998年初夏。美洲大陆西海岸的这座小城，风景如画，阳光明媚，气候宜人。不过，李开复的心里却笼罩着一片乌云。

春天结束的时候，他的出卖自己公司的努力再一次受挫。期待中的买主是日本的索尼公司，1500万美元成交。公开的舆论叫做“并购”，消息已经刊登在《华尔街日报》上。可是当日本人知道李开复不准备继续管理这个公司，另外5个最优秀的管理

人员也将集体离开的时候，变卦了。

现在，李开复的悲剧演到了最后一幕。有一家公司对他的“心血”表示出兴趣，不过，条件极为苛刻：500 万美元，只是日本人的三分之一，并且还要裁掉三分之二的员工。一望而知对方不是雪中送炭，而是乘人之危。李开复心有不甘，还在挣扎着要给自己的公司和员工找一个稍好些的新家。于是他来到雷德蒙，希望微软不会像当初拒绝他的新技术一样拒绝他的公司，但他再一次失望了。

那天中午，李开复和黄学东坐在一起吃午餐，对黄学东说他要离开 SGI。黄学东并不奇怪，他早就认为李开复的光辉被 SGI 的阴云掩盖了。不过，当他听说英特尔公司正在打李开复的主意，不免着急起来：

“英特尔？要你做什么？”

“他们计划在中国建立一个研究院！要我去。”

这叫黄学东更加惊讶：

“我从来没有想过你愿意到中国去。”

“我觉得我挺适合做研究。”

“为什么你不到微软来呢？微软也要在中国开研究院啊！”

这是李开复第一次知道微软将要在 中国设立研究院的消息，也是第一次将自己的未来和微软联系在一起。事情来得有些突然，李开复一时语塞。被迫出卖自己的“心血”这件事表明，他的激情和才能都处在一种被压抑和被埋没的状态中，他正处在一个艰难的探索时期。多年以后谈到这段经历，他说这是自己的“失败时期”。这种失败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既有技术、市场的原因，又有他个人的性格作祟，还有那个行业里特有的文化色彩。整整一个春天，他都在为自己寻找一个新的起点。硅谷里面，能让他挣到一大笔钱的小公司的确不少，他的同事中有很多

已经捷足先登。但他却觉得那样的未来缺少刺激，没有满足感。他也去了一些很大的公司。比如英特尔，那是美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公司，享誉全球。总裁克瑞格·波瑞特告诉他，英特尔正在中国开设一个研究院，希望李开复去主持。李开复说他“在硬件公司做怕了”。克瑞格·波瑞特说，他们将请他来做软件。李开复说：“我就是怕在硬件公司做软件。”但克瑞格·波瑞特执著地邀请李开复：“来我们公司看看。”李开复真的去了，立刻就发现他不能习惯英特尔的文化。“有点像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级分明。”李开复后来对朋友说，“我更喜欢自由平等的环境。”

其实他的所谓“自由平等的环境”，还是为了他那始终不能实现的“梦想”。他还是念念不忘自己的研究，他讨厌那些急功近利的公司，希望自己的智慧能够在广阔的技术领域发挥影响，又能在将来的某一天汇入产品走进千家万户。这是一个奢侈的梦想，需要大笔金钱的支撑以及一个真正理解他的老板，其背后的支持不仅坚定不移，而且持之以恒，才有可能成为现实。但这样的支持在美国极为罕有，可遇不可求，而且越来越少。他曾经效力过的“苹果”和SGI，说来都是了不起的大公司，竟全都不能做到，如果微软再做不到，还有谁呢？这样看来，也许他真的需要微软。

微软对李开复的公司没有兴趣，这迫使他不得不将自己的公司以500万美元的低价出售给另外一家公司。但微软却对他这个人感兴趣。这一点从黄学东的兴奋就可以看出。黄学东是出自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博士，在英国做访问学者多年，又来到卡内基梅隆大学，其专长也是语音识别，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两个人早就成为朋友。有一个时期，李开复在苹果公司把语音识别系统做得如火如荼，促使微软建立起自己的语音研究小组，黄学东就是在这时加盟微软，成为微软语音研究的创始者。两个朋友成为

竞争者，也就很少往来。多年以后说起这些，黄学东笑道：“就像国民党和共产党一样。”

但是黄学东现在发现有了“国共合作”的机会，不免兴奋起来。他的兴奋并非出于私谊。美国人才如云，论成就声望，在李开复之上者不是没有，但黄学东对朋友了如指掌，知道在李开复身上有一件最奇特的事情，其研究成果总是走在微软公司的前边，或者也可以说，微软总是追随他的后尘。前述李开复的语音识别技术的突破，令微软在雷德蒙的那块宁静田园不再宁静，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李开复做出的一个叫做“QuickTime VR”的东西，它能把一大堆照片粘连在一起而不露形迹。此后，微软也开始招募多媒体专家，也做出一些东西，不叫 QuickTime VR，而叫“Surround Video”，却和前者大同小异。第三次，李开复的一个新软件（QuickTime）可以在个人计算机上看到视频，微软也做出了一个叫做“Active Movie”的东西。第四次，李开复拿出了他的“宇宙”，微软紧接着购买了一个公司，也开始研究类似的“三维技术”。同样的事情重复再三，连续不断，令人怀疑微软在抄袭李开复的创意。李开复本人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但他毕竟为此沾沾自喜：“不能说是抄袭，但总是我在先，微软在后。”令李开复感佩不已的是，同样的东西在李开复手里总是虎头蛇尾，在微软手里全能轰轰烈烈：语音识别在苹果日薄西山，但在微软却成长起来；“三维”研究队伍在苹果已经消失，但当初曾为苹果效力过的沈向洋，却在微软发明了世界领先的“三维漫游”。

有了这些传奇故事，黄学东有一切理由相信，微软需要李开复。“我当然希望开复做更多的研究，但他做管理也很好。”他后来对一位记者这样说，“很难找到一个既懂研究又懂管理的人。要是找一个不懂研究的人来管理，外行领导内行，那麻烦就

大了。”他告诉李开复，尽管比尔已经决定在中国设立研究机构，但真正操作起来的时候就发现一个棘手的问题：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微软一向信奉“只有最优秀的人身后才会聚集优秀的人”。现在的局面是，最优秀的人不肯到中国出掌大局，肯去的人又并非足够的优秀。无奈之中，微软正在考虑退而求其次的办法：把这个机构的规模缩小，甚至只让它具有象征的意义，然后再慢慢做大。但现在，情况似乎“柳暗花明”，他对李开复说：“如果是你来做，也许微软愿意把这件事重新设计一下。”

那次谈话之后，雷德蒙对于李开复就有了某种特殊的意义。这是一座建设在原始森林里的城市，在地理上与西雅图市接壤。雷德蒙规模小，而西雅图规模大，有如中国的县级市和地级市，但与中国的县市不同，这两者并无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不了解情况的中国人大都以为微软是在西雅图市，严格说来是一种误解。产生这种误解也许是因为，西雅图机场是进出雷德蒙的必经环节，从那里驱车沿高速公路到雷德蒙，只要 40 分钟。当然我们还有可能做出另外一种估计：本世纪最初 20 年，在西雅图那片浩瀚的红杉树林中，产生了一个工业时代的经典之作——波音飞机公司；本世纪最后的 20 年，在同一片红杉树林中，又产生了一个信息时代的经典之作——微软公司。所以西雅图能够享誉世界，而雷德蒙却要淹没其中。

雷德蒙的四周重峦叠嶂，圣海伦火山 30 年前的一次爆发，至今还在周围遗留着可怕的死寂。不过，人们聚居的地方一派生机。原始的红杉树林簇拥着民宅和道路，严冬季节，奥林匹克山峰冰雪覆盖，山下却是绿草如茵。向西是普吉特湾，隔着浩瀚的太平洋和中国遥遥相对。微软就建立在大洋东岸一片茂密的丛林中。

公司的位置在第四十大街西侧，既无警卫，也没有高墙，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只有一道一米高、十米长的矮墙，很不起眼地趴在街头拐角处，上书“微软”二字。从外观上看，你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公司。据说比尔 20 年前为微软选择新基地的时候，在整个美国查看了至少 40 个地方，终于还是买下了雷德蒙的大片土地，又在红杉树林中开辟出一片校园式的土地，一边建造那片闻名于世的“星形”建筑，一边刻意保留着田园牧歌式的情调。人们将自己的轿车停泊在鲜花丛中，从办公室的窗户伸手触摸百年老树。松鼠在树上树下跳跃，但逢行人，便跑到跟前摇头摆尾。几只水鸟在湖面随波荡漾。那片小小的湖水被办公楼、绿草和鲜花环绕，名字叫做“比尔”，与公司老板同名。湖边曾发生过无数动人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只公鸡。它在一天早晨来到这里，徜徉不去。公司员工感受到它的孤单，于是为它抱来一只母鸡。从此这对“情侣”就在“比尔湖”畔相依相随，又与人类和睦相处。看得出来，公司里的人，都努力在一个人造世界里保留浓郁的天然本色，让最现代的技术融于一种原始之美。

微软公司设备部经理卡尔·贝茨当初设计这个田园式办公区的时候，有过一个经典的解释。他说：“优美青翠的环境能有效地帮助人们抚平心头的愁绪。”也许这话真的有道理，李开复在同黄学东谈话之后再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心情的好起来。

英特尔和苹果扑了空

里克·雷斯特正在他的办公室等候李开复。

他是微软公司负责科研的副总裁，素以寻觅世间天才为乐事。尽管微软公司的雇员这时已经增加到 35000 人，还有数万份求职简历摆在人力资源部的案头。但他仍旧恪守“追随天才”

的原则。他曾经是美国宾州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教授，也是世界著名的计算机操作系统专家。当比尔·盖茨在1991年决定发展微软研究院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煞费苦心说服里克·雷斯特朗到微软来主持这个事业。在6个月的时间里，计算机界一些最有名的人物，接二连三来到宾州，替微软做说客。这些人全是比尔·盖茨请来的。有DEC公司的戈登·贝尔，还有微软的首席技术官奈森·梅尔沃德。其情景令人想起中国古代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的故事。据说，里克·雷斯特朗决定加盟微软的时候，对比尔·盖茨说：“我准备寻找50个比我更优秀的人到研究院来。”比尔·盖茨开心大笑道：“难道这世界上真有那么多比你优秀的人吗？统统请来！”从那时起到现在，8年过去，里克·雷斯特朗请来的计算机专家，不是50个，而是500个。

里克·雷斯特朗后来承认，如果不是戈登·贝尔出面说项，他不会考虑到微软来。还说这是每10到20年才出现一次的机会，是“比尔·盖茨给了我这个机会”。但他认为这个故事的后半段有些夸张。当他从一个记者口里听到这个传说时，笑道：“让我弄清楚这件事情，好不好？”他说，当初比尔建立研究院的时候，的确是想邀请很多优秀的人。微软董事会也提出要请来100个最有才能的人。“当时我还没有来。”他说，“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500个能人了。”

但他并不知足，他现在的目标是李开复。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个被计算机语音识别领域称为“天才”的人，居然会对到中国去感兴趣。他觉得，这真是天上掉下一个大馅饼。

里克·雷斯特朗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当教授的时候，就知道李开复。他说他是个“明星学生”，在80年代末期就已经创立了一种语音识别的新方法。“他是一个领域里面的先锋和开拓者。”他后来回忆说，“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10年，到今天，全世界

所有语音识别的研究，都是在他的开拓性工作的基础上继续的。”这样一个人如果能到微软来，“是非常理想的事情”。

“如果你来，我们可以把在中国的研究机构做得更大，更优秀些。”他对李开复这样说，显然是在尽力把李开复的情绪调动起来。

“多大？多优秀？”李开复单刀直入。

“可以和剑桥一样。”

英国剑桥有微软在海外的第一家研究院，始建于 1997 年。那里集中着一批欧洲最有才干的研究人员。微软对剑桥研究院的投资为 6 年 8000 万美元。现在，里克·雷斯特的话显然是在告诉他，微软也将对中国研究院给予同样的投资，并且招聘一大批高级研究人员。

“我感觉这是一个很大的承诺。”李开复后来说。这使他感到振奋，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似乎正在向他开启。但他发现微软对他们要在中国做的事情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想法，对于那个神秘的东方大国也没有很深的理解。比如里克·雷斯特和雷德蒙研究院院长凌大任都说，未来的中国研究院应当设立在上海浦东。李开复当即反驳说没有道理。他此前 5 次到中国，并且在中国各地巡回演讲，知道北京才是中国计算机人才的汇聚之所。他到过上海，知道那里漂亮，新鲜，物价便宜，并且充满了现代气息，承认要是为他太太选择久居之地，上海一定是个最佳地点。但是，那里的学术空气不如北京活跃，与这座城市的宏伟和热情比起来，实在不能般配。中国早就有“最好的学者在北京，最好的官员在上海”之说。上海人热衷于职务的高低、房子的大小以及工资的多寡，以满口当地土语为荣耀，即使在公共场所也不肯说一些让外地人听得懂的话。在中国，好像只有边远地区的人们才会这样。李开复把诸如此类的想法倾泻而出，他知道如

果他真的去主持微软设在中国的研究机构，里克·雷斯特将是他的老板，所以并无一点隐瞒。里克·雷斯特静静地听完他的陈述，然后说：

“你来了，就由你决定。”

分手时，李开复对里克·雷斯特说，英特尔公司已经给了他聘书。后者闻声色变，连声叮嘱：“你千万不要接受英特尔的职务。”

从微软公司的人事制度上来说，里克·雷斯特有权独自决定他属下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但他还是立即将这件事向比尔·盖茨报告。他需要比尔的支持。“噢，我早就知道他。”比尔·盖茨说。两人频频交换电子邮件，想办法让李开复加入微软。

李开复为微软公司的诚意所感动。在他的心目中，微软是个了不起的公司，但说老实话，迄今为止，微软给予他的印象是复杂的。这家软件领域最大的公司美名远播，可又恶名昭彰，腰上缠着一大堆财富和一大堆官司。人家都说它是电脑行业的“巨无霸”，它自己却没有一点大企业的特征——沉稳、老练、步步为营、按部就班、等级森严和老谋深算，好像一个蹒跚挪步的老人。这个“巨无霸”倒像是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孩子，充满活力和幻想，喜怒无常、藐视规则、行事卤莽、横冲直撞。

他钦佩比尔·盖茨，常常掩饰不住对比尔的神往。可以说，他对微软的向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冲着比尔的。这倒不是因为比尔有钱，而是因为比尔对科学研究有着充分的理解，并且对用户的需求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他依据自己在硅谷多年的经验，认为技术家不能持续地管理一个企业，但比尔·盖茨是“一个几乎独一无二的例外”。他说：“比尔·盖茨是一个技术天才，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杰出的企业家。”

李开复的梦实现了，但妻子谢先铃的梦那几天却总是被电话铃声打断。

有一个电话挺奇怪，尽管李开复不在家，但对方依然没有放下电话听筒的意思。他询问先铃，李开复为什么要去微软？为什么要去中国？去中国有什么好？还问先铃想不想跟随丈夫去中国，口吻之关切令先铃觉得异样。等到李开复回家的时候，妻子告诉丈夫，有一个电话来客。

“是一个叫什么斯蒂夫的人。”妻子说。

“斯蒂夫？”丈夫想不起来这个人。

“斯蒂夫·乔布斯，”妻子提高声音重复道：“我以为他是你的朋友。”

“是斯蒂夫·乔布斯？”

“对呀！”

“那是苹果公司的新总裁啊！他和你说什么了？”

“说了 15 分钟的话。我告诉他，你上了微软，还要去中国。”

李开复与苹果公司确有渊源，但却从来没有见过这位苹果新任总裁。斯蒂夫·乔布斯在美国计算机业颇有名声，美国舆论说他是“无与伦比的天才”，就连比尔·盖茨也对他佩服不已，说他的“思想就像炸弹一样”，还说自己不过是“乔布斯第二”。这样一个人在这个时候给李开复打电话，令他觉得意外。

李开复接通了电话。

“你为什么不回苹果呢？”斯蒂夫·乔布斯露出本意。

“我们并没有见过面啊！”

“这无关紧要。”斯蒂夫·乔布斯说，“在苹果，你以前的员工都说你是一个好老板。他们都对我说，应该把李开复搞回来。”

“可是……”

“不要‘可是’，在你接受微软的职务之前，来我这里看看吧。”

“我已经接受微软的职务了。”

“你为什么到中国去呢？”

“我是一个中国人啊。那里有那么大的市场，有那么多人用计算机。可以为中国做很多事情，也可以为微软做很多事情。”

“听起来你已经决定了？”

“是的！”

“……”

李开复拒绝了斯蒂夫·乔布斯，却对他的真诚念念不忘，一年以后还在说，“我对他的器重非常感激。”不过，对于李开复义无反顾地选择去中国这一点，很多像斯蒂夫·乔布斯一样的美国人不能理解，很多中国人也抱有极大的好奇。当日李开复并没有对此做出更多解释，直到这年冬季，他对一位中国记者谈到了他的理由：

最大的理由就是微软有很多很多很优秀的人。有非常聪明、比我更聪明的人。微软的环境很开放，不同的意见都能表达出来，没有什么人会为听到逆耳之言不高兴。你只要足够优秀，就能很快做出成绩。有成就的人爬得很快，大家也乐意让他爬得很快。我希望和一些比我更有才华的人在一起工作。我会给他们一个公平的机会。当然公司的成长也很重要，公司不成长，有才华的人机会就不多，公司越成长，机会就越多。

我过去在其他公司工作，这些公司也是领先的公司，但这些公司没有办法让我有成就感。我做出好的东西，用在那

些公司的产品中，是几百个人、几千个人用，而微软的产品是几亿人用。对我来说，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全世界有亿万人在使用我的产品。

这番话是李开复在上海说的。那时候微软中国研究院刚刚成立，坐在他对面的记者来自《人民日报》。他觉得李开复的回答有些冠冕堂皇，像中国国内报刊经常宣传的精神文明模范人物在做报告，还有点饱含憧憬和幻想的流行歌曲味道。

李开复后来在北京再次提到这一点，他对《电脑生活》的记者说：“一个软件工程师能够进入微软是一种幸运。”那位记者在报纸上嘲笑他的自信，其实这是不了解他的经历。此人大器早成，但自从出道以来屡战屡败，就连苹果和 SGI 这样声名赫赫的大公司，也让他觉得压抑，其情景有如一台“286”电脑，根本不能包容“视窗 98”所拥有的庞大智慧和激情。他在 1992 年 3 月昙花一现之后，就再也没有获得证明自己才能的机会。那么多雇员都说他是个“好老板”，他自己也这样认为。“要论研究的水平，在雷德蒙和剑桥，像我这样和比我好的，至少还有一打，要论管理水平，像我这样的就不多。”他有一次这样说。不过，在来到微软之前，他从来没有尝过作为一个管理者的成功喜悦。这一点就连他的妻子也看明白了。当他把加盟微软的决定告诉妻子的时候，妻子极力赞成，还说：“你的晦气也只有微软这样的公司才能冲掉。”这样一个人要是在中国，大概真的会被人家当作“企业克星”，到处碰壁。幸亏里克·雷斯特不信这套“歪理邪说”，而比尔·盖茨有时候会觉得失败比成功更加值得珍惜，甚至还偏激地认为“成功是一个讨厌的教员，它诱使聪明人认为他们不会失败，它不是一位引导我们走向未来的可靠的向导”。微软文化中所包含的这种精神，正是李开复身上所应验

的。不然的话，李开复哪里会有今天？他太需要成功了，而现在他终于有了一个新的机会，假如旁观者能够了解这种种情节，必会在李开复的话里发现某种真诚。

优秀的中国人不会留在中国吗？

现在，李开复最急切的事情，是寻找足够聪明又愿意和他同赴大洋彼岸的人。那个夏天，李开复呆在加州自己家里的时间，明显少了。他不断地跑到雷德蒙，就算回到家里，也是埋首电脑前，在屏幕上不停地寻找计算机领域中那些熟悉的名字。他信心十足：在雷德蒙的微软研究院，40岁以下的研究员中，华人差不多有十分之一，在硅谷，这个比例更高——20%甚至30%，不愁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7月份的第二个星期里，他约见了十几位华裔学者，发出几十封电子邮件。结果却发现那些人全都不肯与他同行。他们不是不赞成李开复的选择，更不是不相信李开复的能力和诚意。他们都是各自领域里的佼佼者，眼光远大，头脑敏捷，不用李开复多费口舌，就会发自内心地赞叹在北京建立研究院“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李开复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美国人，但却长着一副华人外貌。了解他的人都相信，他将冲击中国那块最富智慧的土地上的那种群体惰性，也愿意倾全力助他一臂之力。只不过，一说起到中国生活和工作，他们就会吞吞吐吐起来，提出种种理由：小孩子要读书，大陆太脏、太乱，太太不愿搬家，我现在工作很满意，我已经有足够的钱了，就算搬过去，早晚还不得回来？……是啊，这些人全都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斗，事业有成，热爱现在的工作，享受自己的成功带来的生活乐趣，没有什么不满，为什么要改变呢？

再接着谈下去，事情就更加复杂。

一个朋友说：“你知道为什么在美国的中国人那么优秀吗？

就因为一些优秀的中国人出来了。”

另一个朋友说：“回去？整天就要和官员打交道，赔笑脸，说好话。”

李开复无可奈何地承认：“这都是一些很现实的问题。”还承认自己把事情想得简单了。他开始担心国外那些最优秀的中国人能不能回国。他需要的是真正优秀的人才，而不是那些在外面混不下去只好回家的“人才”。可眼前说这些话的，不仅都是最优秀的人，而且都是地道的中国人，比他这个在台湾生、在美国长的人更了解中国。

李开复发现自己应当到中国去看看。7月中旬，他就出发了。“管他呢，我自己先去。”他对里克·雷斯特说。也许是他的执拗天性发生了作用，也许是一股热情和几分天真，也许什么原因都没有，但他就是不肯退缩。里克·雷斯特已经明白了他的难处，却一点也不同情，对他说：“无论在哪里找人，都是一样标准，不能妥协。”“好吧，”李开复回答，“我就不相信中国所有优秀的人都出国了，总能找到。”

平心而论，他对中国并非一无所知，不然他也不会对来中国工作抱以那么强烈的热情。自从1990年以来，这是他第六次来中国。过去他到过北京，也到过东部的上海和南部的珠海。但现在不同了。那时候是演讲，谁也不求谁。讲完了，和当地官员客气几句，握手，笑笑，转身就走啦。这一次，李开复既然是“追寻天才”，所以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直奔中关村。同行的还有微软雷德蒙研究院的院长凌大任。几个月后，中国的报刊都在不遗余力地说，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促使比尔·盖茨决定在中国建立研究院，根本没有提到凌大任。实际上，要说有哪个华人对微软的这个决定发挥了影响，那就是凌大任。此人祖籍上海，出生在意大利，又在美国长大。尽管不会说中国话，但却对中国有

一种天生的感悟和理解，其微软研究院院长的特殊身份，又特别适合在科研方面对公司董事会施加影响。公司中一位熟悉内情的人说，凌为研究院的成立出了大力。他多次去中国，还向公司高级主管进言，说微软既然在欧洲成立研究院，在中国也应该成立。他甚至还花了很多时间寻找去中国主持研究院的人选，直到找到李开复。

与过去6次来访不同，李开复第一次不是作为一个访问者而是作为中关村的一员来到这里。希格玛大厦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样热闹，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刚刚搬进来，李开复和凌大任走到楼上来的时候，办公室还未就绪，满眼一团糟。公司原来在知春路上一个破旧房子里面，办公室像个货栈，洗手间露着缝隙。吴士宏那时是公司刚刚上任的总经理，还没有后来那些对微软的满腔恨意。她率队浩浩荡荡开进希格玛大厦，挺开心，觉得这蓝色的大厦“比起老地方像是天上”。不过，李开复和凌大任可不是因为它“像是天上”才来的，他们对楼没兴趣，对人有兴趣。

微软公司的两个院长转身就去了清华和北大——中国两所最著名的大学。他们对那个真正的“硅谷”了如指掌，所以对所谓“中国硅谷”的说法一笑置之，但却相信“人才摇篮”不是虚妄之词：中关村有58所高等院校和148所科研院所。中国每年300个计算机博士，大部分就出自这里。

北京正是盛夏，两人西装革履。中国的校长当然不是傻瓜，望着这两个和他们一样皮肤的美国人，揣摩其用意，脸色立刻就不一样了，眼神也有些奇怪。这也难怪。你说是“追随人才”，中国人的说法是“抢人才”。外国公司在中国“抢人”的故事早就闹得满城风雨，何况微软还背着那么大的恶名呢！

其实所有这些争论都是表面文章，即使那些义愤填膺慷慨陈

词的人，也不见得真的那样想。至少在年轻一代中间，谈论这些是非的人就越来越少。这一年我们国家有 300 多个计算机专业博士生毕业，还有一万多人在国外学成回来。连同过去 10 年，回来的差不多有 10 万人了。多年以前，国内舆论纷纷评论“出国潮”，有些贬义，也有些羞羞答答。听说有哪位博士回国了，记者们就觉得是涌现了一个爱国志士，就像饥饿的人见到一桌丰盛的宴席，急不可耐地扑上去。那些回来的人，也就真的像“爱国志士”一样在报纸电视上频频微笑。这两年可就有些不同：回国的人越来越多，但是种种“道德的感召”却越来越少。看到报纸上说他们放弃高薪放弃工作放弃种种舒适生活，他们就会觉得好笑。他们会说：“为什么‘爱国’总是让人们放弃什么，而不是让人们得到什么呢？”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并不向往政府机关，也很少到国家的企业或者国家的学校去就职，而是把自己的智慧拿去办公司，取一些不中不洋的名字：亚信集团、UT 斯达康、爱特信……然后说自己是“正规军”，而那些没有出过国的人不过是“土八路”。1998 年 1 月 12 日的美国《时代》周刊刊出封面文章，题为《连线中国》。文章描述了不少中国国内网络世界里的风云人物，其中不少就是从海外归来的。报刊上现在热烈欢呼“回国潮”，记者们开始从另外一个极端来理解这些归来的游子，遣词造句的时候不说什么“放弃”了，而是编出一句特别功利的话登在报纸上，说这是在国外流浪的中国学子的切身感受：“求稳定留美国，要发财回中国。”

话虽不太高尚，但多少让人觉得可信。不过，李开复不这样想。他说，从美国回来加盟微软中国研究院的这些人，都不是为了发财。还说过，“一个人就算只为自己，也不一定就是坏事，只要他做事的客观效果对社会有利。”他生在台湾，知道台湾的科研人员也曾经历过一个外流和归来的过程。60 年代是外流，

每年出走上千人。80年代美国经济萧条，连美国人的就业都成了问题，却让台湾时来运转。那里掀起了一场“吸引人才回台运动”，回来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后来成为台湾计算机产业的重要支柱，并且开创了赫赫有名的新竹科学工业园区。李开复现在发现，同样的情形正在大陆重演，挺受鼓舞。“就算现在还不能说‘回国潮’，在五年、十年以后，海外会有更多的人回到中国来，”他说，“我就是想要捷足先登。”

有容德乃大，无求品自高

李开复带着这样的念头回到美国。夏天还没有结束，就又到中国来了。这一次，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一家人住进了京城东郊一个叫做“香江花园”的别墅区。离开美国之前，他把带不走的家当都卖了：汽车、家具、房子，还有环绕房子的那一大片草坪。

出卖房子在这个家庭是最费踌躇的一件事。这是一栋平房，坐落在加州一片树木茂密的山坡上。李开复和先铃结婚的时候，是一个刚刚毕业的穷学生，两个人租了人家一间旧房居住。油漆斑驳，夏暖冬凉，老鼠到处横行，吱吱乱叫。1994年他已成名，口袋里也有了些钱，于是买了一片7000多平方米的土地。它使他特别兴奋，不仅价格不贵，而且还因为那是一个宁静美丽的地方，从山脚一直伸向山坡，正是夫妇两人梦想中的那种乐园。绿荫之中有一座陈旧的马棚，夫妇两人自己动手刷上油漆，以两块白色的门板贴在墙上作为装饰，又挂上两盆淡绿色的盆景作为点缀，然后就带着女儿搬进去。小小的房间弥漫着油漆的芳香，不过这只是个临时居所。一个永久性住宅在旁边同时开工。这是在美国通常可见的那种木制结构的房子，有500平方米。新房子兴建了一年半，夫妇俩人每天从他们的马棚里面走出，看着他们

“未来的世界”一点点成长起来。内饰全部由李开复精心设计。他以自己擅长的多媒体技术绘图，中西合璧，并且刻意地在那巨大的西洋式客厅里面保持了一种典雅天然的中国风格。地板使用 1000 块大理石铺就。工程进行到最后阶段的时候，李开复希望客厅中心地板的大理石，能够依其表面彩纹镶接，浑然天成。但所有工人都说这要求过于苛刻，拒绝照办。于是夫妇俩人俯身趴在地上，仔细寻觅石板上的花纹。一块块排列整齐。这样的努力一直持续 50 个小时，终于将 60 块大理石排列成一个正方形。石面彩纹流畅地蔓延开来，一丝不苟，每一个细节都没有走样。很显然，这中间凝聚着的不是技术，而是心血；不是智慧，而是激情。它似乎向人们展现了这个家庭生活中同心协力、有条不紊的景象。1995 年新房建成，从那以后，它就成为他们一同逃避外面喧嚣生活的港湾。

可是才过了两年多，李开复就要卖它了。“我真是下了很大决心。”他说。卖的时候他依依不舍，围着房子转来转去，照了很多照片，然后又希望找到一个好心的买主。“还好，新房主很照顾它，”李开复后来说，“他有时候会给我写信提到它。”先铃则以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对于那所房子的怀念。有时候李开复把那房子的照片拿出来仔细端详，而她总是避开。她说：“我不忍心看照片。”

先铃并不了解中国大陆，对于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在那里没有足够的信心。李开复于是让他的妻子做出选择。他说他特别需要她同赴中国，但她也可以在美国等他。妻子不愿意离开丈夫。她说“那可不成”。她早已听说北京和上海有很多漂亮女孩子，会发出许多难以拒绝的诱惑，“MBA”绝对不能在那里久居——“MBA”本来是“工商管理硕士”的英文缩写，又同“已婚独居男人”（married but available）的英文缩写恰恰吻合，所以在微

软中国研究院的那些独身男人中被普遍使用。

搬到北京的那一天是 1998 年 8 月 29 日。这一家人进入北京，随身带着 10000 磅的行李，这是他们剩下的全部家当，一点也没有留在美国，全带来了。其中精神的价值显然超过了物质的价值：镜框、书籍、照片、字画和女儿的玩具。“香江花园”是京城有名的“高尚住宅区”，里面一半房子空着，另一半住的都是外国人和有钱的中国人。院内绿草如茵，鸟语花香，警卫森严，其中一个黑衣警卫日夜站在李开复的家门口。访客进入大门，门卫随即记下汽车牌号。在京城，只有中南海和一些高级官员的住宅，才会有诸如此类的制度。

李开复的住宅是一栋三层小楼，远不如他在美国的那所房子漂亮宽敞，月租金却要 8000 美元，闻者无不咋舌。房子里面挂着一百多幅女儿的照片，墙上都是镜框。大女儿满口英语，却又很中国化，穿着中国皇后嫔妃的衣服照相，喜欢画中国的灯笼，还喜欢吃四川怪味肉。小女儿才 3 岁，却能熟练地用筷子吃中餐。另一个很显眼的位置上，悬着一幅条幅。那是父亲最珍爱的一幅字，是钱穆所书。父亲去世后传到李开复手上，他从台湾带到美国，又从美国带到大陆。在美国，有一次搬家时碰上下雨，雨水淋湿了字幅一角。李开复想把它弄干净，不料越弄越糟，于是在美国到处找人，终于找到一家，洗净裱好。人家报账单，要 2000 美元，他觉得被宰了一刀，但随后看看条幅如初，又觉得值得。对联云：

有容德乃大，无求品自高。

当年父亲的朋友看了，都说这就是父亲。现在，儿子的同事看了，又说这就是儿子。李开复自己说，第一句像他，但第二句

的境界，他还差得远。也许它真的是一半像父亲，一半像自己。但是无论怎样看待这幅对联的含义，都可以相信这个美国家庭仍然一脉相承地保留着华人本色。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微软研究院里很多中国年轻人的禀性和思想虽然叫你觉得新奇，其实都是几代人延续和发展的结果。在他们的身上，有着他们父辈的深深的烙印。

李开复 1961 年出生于台北，成为一个大家庭里的最小的孩子。在他出生之前很多年，他的家生活在四川成都。那时父亲李天民是国民党政府在四川地区的立法委员。应当说，这在中国官场已属不得了的位置，但是他并不热衷于政治而对学问情有独钟。1949 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军政要员纷纷逃亡台湾，李天民分得两张机票。这意味着他可以携带他的妻子儿女当中任何一人飞往台湾。但是他却留下所有家人，带着一个昔日部下离开。母亲携带着兄姐在一年后出逃，经由广州到香港，再辗转到台湾。父亲虽然为官一场，却没有留下什么钱。一家人旅程艰难，到了台湾之后就更加艰难。父亲对政治已经彻底失望，辞官回家，拼命写作，赚钿积铢，渐有积蓄。等到李开复出生的时候，家境已是小康。

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个妻子。这一年，父亲 55 岁，母亲 44 岁。很多人都说她的年龄不再适合生这孩子，母亲只说一句：“我要生。”分娩之前，医院的专家说：“这孩子要么是天才，要么是白痴。”看到这产妇眼睁睁地望着他，专家又说：“低能的概率更大些。”但母亲仍旧是那句话：“我要生。”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专家的话，前半半对了，后半半错了。

开复刚刚一周岁的时候，大哥便乘船渡洋往美国求学。那几年大陆上正在闹饥荒，数千万人死于饥饿以及饥饿诱发的各种疾

病。在李开复幼年的记忆中，台湾的报纸上整天嚷着“反攻大陆”，吹嘘“蒋总统”多么英明，或者诅咒大陆是“共匪”，但父亲从来不说这样的话。事实上，李天民对共产党高层领导人有着很深的了解，尤对周恩来的评价极高。晚年陆续出版书籍，几乎全部涉及共产党的领袖。比如《刘少奇传》、《林彪外传》、《邓小平传》和《周恩来评传》。他本性孤傲，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总是说，做人应该秉持公正，每个国家每个政党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正因此，他的大部分著作在台湾和大陆都不能被容纳，只有香港肯出版。但这些事情都是开复长大之后才能悟出的。至于当时，他只记得：“父亲是一个非常不爱讲话的人，尤其在家里很少说话，只是埋头写他的东西。”

到了1990年，在离开大陆40年之后，李天民终于有机会回到家乡四川。女儿说，那是“很震撼的一次旅行，回来后情绪久久不能平复”。回到台湾的那个晚上，81岁的老人把自己在大陆拍的照片取出，令家人观看，指出哪个是祖母之坟，哪个是家乡的文殊院。又交代家人，在他去世后定要将他的骨灰送回家去，葬于祖母身边。最后取出一方石印，那是四川一位金石篆刻家送他的纪念。老人默默诵吟石印上的诗文，及至念到“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时候，不禁失声。

1993年老人病逝的时候，面容安详，嘴角带着微笑，但所有家人都明白，在他的内心深处必定留下极大遗憾。因为他在弥留之际曾经告诉儿女，他做了一个梦。他在梦中来到水边，在一块石头上捡到一方白纸，上面写着：中华之恋。还说，他有一个计划竟然不能实现，那就是再写一本书，书名叫做《中国人未来的希望》。

所有这些情节，令开复震撼。父亲去世后台湾《中外杂志》刊登纪念文章，说他“与书为伴治学谨严”。但儿子心中必定知

道，父亲之所以积数十年精力于大陆人情世故，乃是出于不能抑制的思乡之情，而不独是为了做学问。这也正是开复格外景仰父亲为人，并且一定要将父亲遗传的对联带在身边的最重要的缘由。

开复在 11 岁的时候离家赴美，完全是出于母亲的开明。

那一年大哥从美国回来，看到他整天背书，被升学的负担压得不能喘息，没有玩的时间，也没有朋友，可是学的东西全都没有用处，那情景就像现在中国大陆一样。“这样下去，考上大学也没用，”大哥说，“不如跟我到美国去吧。”母亲是开复心目中的独裁者，但却心地善良，说话做事都是直截了当。她说开复是全家最聪明的孩子，所以最为宠爱，对开复的期望也最高，管教最严。在她的管教下，开复每天按时做作业，背书写字稍有差错，便有挨打之虞。这样一个母亲，居然很容易地同意开复赴美。她说，她知道很多伟大的人出自美国。而她没有说出来的一句话是，她相信儿子也将是一个伟大的人。

到了开复离家的那天，母亲忽然担心儿子一去不返，盯着他说：“绝对不可以娶美国老婆。不然你就不是我的儿子。”11 岁的儿子根本不明白母亲在说什么。母亲只好又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她的意思：“每个星期用中文写一封信。”这一回儿子听懂了，并且一直到今天还念念不忘。

现在，李开复不仅娶了中国老婆，而且把家也搬回中国来了。一时间，这事成了美国华人圈中议论的话题。李开复曾经依靠智慧成为美国计算机领域的传奇人物，但现在他的行动中所具有的感染力和戏剧效果，显然超出了智慧的范围，也吸引了更多优秀的人向他靠拢。李开复后来评价自己举家搬到中国的行动时说：“这个决定对后来的结果还是很重要的。”

那几天，李开复的电子邮件特别多，电话铃声也不断地响，这些人过去都曾问过他，是不是过个一年半载就回美国，现在方知，此人真是孤注一掷，至少也会比较长期地留在中国。他告诉每一个向他询问的人，他“对老板没有承诺”。意思是微软需要他干几年就是几年。不过，他对老婆有承诺。那一次先铃要他直截了当地说明，他到底打算在中国呆多长时间。李开复说：“至少5年！5年之内，不提回去的事。5年之后，你要还是想回美国，我就跟你回去。”

最初的追随者

那个夏天，在人才济济的雷德蒙，只有两个人的话令李开复感到欣慰。一个是微软公司的软件检测工程师陈宏刚，另外一个则是微软公司的研究员凌小宁。前者毕业于西安交大，又完成了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博士学业。这时候西安交大的老师表示希望他回到母校效力。他对老师说，他要先在美国证明了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之后才会回国。他学的是数学而非计算机。当他到微软公司来应聘的时候，这一点让他在首轮面试中处于劣势。但接着就有一个真正识才的人出现，似乎是从天而降的“伯乐”。此人真叫厉害，知道陈宏刚对计算机并非内行，但却看出他有一种天赋的才能：对计算机软件的感悟力。于是破例聘他来检验之责。微软的任何一个软件产品在上市之前，都须先行在自己的阵营中超负荷运行，以发现其中弊端，也叫“臭虫”。陈的工作，就是专门寻找“臭虫”。陈对自己的第一个成功感到满意，就连微软把他列在“临时工”之列——只要对他的工作不满意就随时可以让他走人，也不在意。

学校只能培养人才，不能培养天才。这样说一定会叫学校的老师不高兴，但在陈的身上，你会发现情况真的如此。上班第二

周，这个从来没有学过软件的人，居然发现检验小组所有人使用的方法并不是最好的，于是随着自己的感觉任意行事，结果找到 8 个“臭虫”。此后一周，30 个。又一周，40 个。而检测小组的其他人，一个星期也只能找出 10 来个。他的工作令所有同事惊讶不已，更令软件制作工程师汗颜。先前的“伯乐”如今是陈的老板，他走到陈的身边，问他是怎样做到的。陈支支吾吾，不敢说自己另辟蹊径，但老板对他已有充分信心，说，“不要紧，说说看。”陈于是大着胆子指出那些行家的问题。老板大悦，逢人宣告自己的英明：“你们看，我们有那么多检验员，但是我们的六分之一的臭虫都是一个人发现的。可是这个人居然还是个‘临时工’！”然后又对陈说，“我很自豪，他们都不愿意雇你，是我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雇了你。现在我要再冒一次险，让你成为正式员工，并且来领导这个小组。”

陈宏刚开始领导这个检测小组，心里则念念不忘当初对西安交大的老师说过的话。

人人都说比尔·盖茨把世上人才尽收帐下，此话有些夸张，但的确不是空穴来风。如果说陈宏刚是寻找毛病的高手，那么凌小宁的专长就是创造新的事物。此人 70 年代是北京大学的工农兵学员，80 年代是北大的硕士研究生，等到他在美国俄勒冈州获得计算机博士学位的时候，90 年代已经开始了。凌出生在江南水乡无锡，长在北京。从根本上说，他经受的是典型的中国教育，而且是在革命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不过，他并不喜欢政治口号而格外热衷于技术。1967 年，他随着红卫兵的潮水轰轰烈烈地在全国串联了一圈，回到北京之后，人家背了一大堆红卫兵小报回来，他却把母亲给他的零花钱买了一堆五金工具，包括一把钳子，一个锤子和一个改锥。那一年他 15 岁。他的冒险精神

和创新精神，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露头的。先是热衷于化学。他在商店里寻觅了一大堆价格低廉的试管、烧杯和酒精灯。回到家里，做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实验。把玻璃管在液化石油气炉上烧红，弯成各种形状，又将大大小小的试管连接起来。天平太贵，买不起，他居然能够自己制作。这一连串奇妙幻想的最后结果是做出了各种各样的火药，以及一种袖珍火箭。每当火箭在院子里面拖着火焰呼啸升空的时候，他就会欢呼雀跃。但是终于有一天，三个警察闯进他家，带着搜查证和拘捕证，对他的父母说，有人检举他们的孩子在私造军火。还说，西单商场刚刚发生了爆炸案件，导致死伤无数，警方已经查证，其爆炸物乃是民间制造。父亲惊得目瞪口呆，母亲吓得两腿发抖，他们对儿子的“罪行”一无所知，只知道儿子沉溺于“科学发明”，所以每逢儿子向他们要钱的时候，宁可省吃俭用，也不拒绝。警察听说“作案者”只有15岁，也觉得此事蹊跷，答应暂时放他一马，但还是彻底搜查了孩子的房间。警察留下了孩子，带走了孩子的“百宝箱”。那里面装有他的所有瓶瓶罐罐，也装着他的激情和幻想。

小宁只好改弦更张，学做半导体收音机。那是60年代末期，中国人还不懂得计算机是什么东西。老师在学校里对学生说，那是“帝国主义的玩艺”，比不上我们的算盘。不过，晶体管已经有不少。小宁看到那黄豆大小的东西居然拥有庞大的电子管的效果，觉得真是神奇。这时候他已经有了工作，被分配在一个轧钢厂，每天八小时，只是重复一个动作：把沉重的钢条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他干得挺开心，因为这能让他赚到一笔钱——每月18元。他把钱都买了晶体管，任自己的幻想和激情融在“单晶硅”中。没想到这一“融”，就融入了计算机的世界。

但他真正成为微软公司的软件工程师，是在20多年以后了。

那一年他已 40 岁，在微软这个年轻人的世界中，未免嫌老，可他总是以 20 岁的激情和想象力来工作。如果不是那场所谓“革命”耽误了他十几年的时间，他不是也能像周围的伙伴一样，从 20 多岁就开始自己的创造历程吗？

他是“过来人”，懂得眼前的一切来之不易，所以更加珍惜。他总是问自己：“当我拥有一个机会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当然意味着奉献，就像中国人常讲的“主人翁”，但是还有更多的东西。“你不仅拥有责任，而且拥有权力、利益、信用。你付出很多，得到也很多。”他说，“你不断地积累起来你的信用，就成为一个领域的旗帜，也许可以叫做精神领袖。”

现在他已经不是那个面对警察的孩子了。假如有人来阻止他，他也一定会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他刚到微软公司不久，就遇到过一次这样的事。关于这件事情的传说，已经写进微软研究院的通讯中。实际的情况则更加动人。那次微软正在准备出资 100 万美元购买一个软件。就在合同准备签订的时候，凌小宁来了。他说这笔钱不用花了，他自己就能做。老板问他有多大的成算，他说：“60% 成功，40% 失败。”老板愿意看看他的方案，但却心存疑虑，所以只给他 3 天时间。凌小宁 3 天没有睡觉，写了 3 张纸。一大群专家聚在一起讨论，不禁大感兴趣。在经过一番认真修改之后，凌小宁对老板说，“现在我有 80% 的成算。”老板说：“好，我们听你的。拒绝合同。”此后的事情整个微软的人知道了。凌小宁在 3 个月后拿出了他的设计，果真能够取代公司原来打算购买的那套东西，看上去更漂亮，更容易操作，所以成为专利，成为微软很多产品的一部分。不过，它的英文名称很拗口，译成中文，叫做“图形自动化显示”。直到现在，仍然没有人能做出比这个更漂亮的東西。凌小宁也就成为这一方面的权威，像他本人后来说的——“旗帜”。那些想要探索这个领

域的人，大都来找他询问一些难解的问题。“如果我再多做一年，我就会成为这方面公认的专家。”凌小宁说。

诸如此类的事情在微软并不少见。从技术上看，凌小宁的“图形自动化显示”比起李开复的语音识别系统。张亚勤的多媒体压缩与传输、沈向洋的“同心拼图”、张宏江的视频检索，要简单得多，其理论的地位也会差上一个档次，所能节省的100多万美元，在微软每年数百亿美元的营销额当中，更属九牛一毛。就凌小宁本人来说，过去岁月中的精彩成果还有很多。不过，那些事情都是别人要他做的，这一回是他自己想要做的。所以，这件事情的意义就非同一般。退避三舍，并无任何损失。揽到手里又没有十足成算，其中失败的风险他自然知道，即使后来的结果如愿以偿，他本人也不会因此得到任何实际的利益。尽管有这些因素，他仍然非常想拥有这个项目。“说不清楚为什么，只是觉得应该做。”他后来这样说。也许，理由已经存在于多年以前那个孩子的被湮没的激情中。

尽管只是一次小小的成功，他却说，这是他迄今为止最为得意的一件事。他终于能够将自己的智慧和热情发泄出来。不过，他的等待有点长，30年！这时间甚至比微软公司的历史还要长。今天回看这些往事，举世清明在躬的人们都不免想到，和李开复、张亚勤、张宏江、沈向洋这一代人相比，凌小宁是不幸的，他失去了最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年龄。但是，和那些同龄人相比，他是幸运的。他在进入中年的时候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将那15岁孩子内心中积蕴的潜力发挥出来。

1998年夏天，微软公司里的这两个中国人几乎同时做出结论，应当跟随李开复到中国去。先是陈宏刚，当李开复来到雷德蒙的时候，他们见了面。陈说：“我就是想回中国看看，什么条

件我都可以答应。”然后是凌小宁。黄学东当初把李开复介绍到里克·雷斯特面前，现在又把凌小宁介绍到李开复面前。李开复对凌小宁说：“考虑一下回国去吧。”凌小宁说：“不用考虑，我已经决定了。”这件事情的意义，看起来就是李开复的“人才滚动理论”发生实际效用了。

事情果然出现转机，几个月后，也即这一年秋天和冬天，知春路上的希格玛大厦第五层有了人气。雷德蒙微软总部里，不断有人来到微软中国研究院，把微软在全世界 3 万多职工的眼光都吸引过来了。

他们再也不用为父辈的悲剧操心感怀

现在回到本章开头，1999 年 2 月 2 日，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终于有了第一批年轻人，大家聚集一堂，面对会议室名称这样一件本属于枯燥无味的文案，有说有笑，如此情趣盎然，又由情趣盎然而至于感受到一种全身心投入一个事业的激动和兴奋。这些年轻人当然不会知道，当他们点击键盘抒发想象的时候，京城深处也在经历一场激动与兴奋，只不过性质完全不同。再过 20 个小时就是文坛一代伟人老舍先生诞辰百年。所以这一日从早到晚，怀念者由京城内外赶来，络绎不绝，鱼贯进入丰富胡同老舍生前居住的“丹柿”小院。我们国家的历史一向是由伟人构成，文人的世界亦不能例外。现在，伟人身后留下无限哀荣，世人争相缅怀其“生的伟大”，只不过，没有后面那半句——“死的光荣”。然则老舍先生给予我们国家的最深的震撼却不是他的生，而是他的死。他在 1966 年 8 月 23 日只身来到京城北郊，在距离今天希格玛大厦不远的太平湖中，自沉而死，其原因乃是不堪忍受受蒙蔽的红卫兵的凌辱，对周围发生的一切，由失望而终于绝望。在他留下来的数百万字的作品中，话剧《茶馆》里面常四

爷有一句话最为震撼人心：“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它更由于巴金先生在一篇短文当中连续四次呼吁国人倾听此话，终于能够广泛传播。

将这同一天里聚集在丰富胡同“丹柿”小院和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两群人加以对照，一边在“怀旧”，一边在“催生”；一边是一曲绵绵无尽的悲歌，一边是一套满怀激情的新词。这两群人都是智者，但一边的智慧是掌握在他人手中，一边的智慧是掌握在自己手中；一边的智慧给自己带来苦恼甚至绝望，一边的智慧给自己带来快乐和希望。可见历史已经走了多么长的一段路程。眼前这群生气勃勃的年轻人，只需把眼睛盯着现在和未来，似乎再也用不着为他们父辈的喜怒哀乐操心感怀了。

第二章 天外有天

在工业社会中，一个最好的、最有效率的工人，或许比一个一般的工人能多生产 20% 或 30%。但是，在一个信息社会中，一个最好的软件研发人员，能够比一个一般的人员多做出 500% 甚至 1000% 的工作。

——李开复

李开复的精英哲学和比尔·盖茨的“未来小屋”

1999 年开始的时候，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有一个故事流传开来：一位不留姓名的女子打来电话，希望得到李开复的精子。她操着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对陈蕾说，她与李开复素未谋面，但她已从国内公开的出版物上知道其人其事，所以幻想着自己未来的孩子能够有一个像李开复那样聪明的大脑。她的态度如此认真，

以致陈蕾不敢怠慢，当即将那女子的要求转告李开复。李开复既好笑又好气，敷衍道：“我已经结婚了，恐怕不行，请她找别人试试看。”那女子并不气馁，再接再厉：“谁的都行，反正我知道你们那里的人都是精英。”这时候陈蕾也要笑出声来。她后来在饭桌上把这件事说出来，询问希格玛大厦第五层中有谁可以满足那位女子的愿望。众人笑道：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精子库”啦！

微软中国研究院当然不会建立什么“精子库”，所以这件事听上去有点荒唐，不过，故事本身却是真的。它既然出现，就反映了 21 世纪即将开始时中国社会的一些情况。“望子成龙”乃是中国所有父母的通例，自从人工授精技术成功以来，在欧洲和美洲那一边，一直有很多人在谈论以最聪明最有成就的人的精子来繁衍后代的可能性。“克隆羊”的诞生，更使得这种可能性从“精子”扩展到“基因”。所以，无论从人情还是从科学的角度，这个女子的要求都不是过分之举，至少要比那种只知寻找权力或者财富做靠山的风尚更符合新世纪的潮流。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希格玛大厦里这群年轻人的笑声中，的确夹杂着几分自负。

Best of Best——微软人总是这样来看待他们自己。这话译成中文，可以叫做“优中之优”，假如想象力再丰富一点，也可以叫“天外有天”。这些人志得意满，自认为是天底下最聪明的人，言谈话语中怎么也掩饰不住那种从里向外冒出来的优越感。在常人的嘴里，用“人才”来描述他们已经觉得不够分量，而是把他们叫做“人精”、“天才”、“魔鬼”、“智力超群者”、“知识英雄”，中国最新的名词是把他们叫做“知本家”。在 20 世纪和 21 世纪的交汇点上，这些人的确处在“智慧宝塔”的顶端

——那是一个令所有人神往的境界。

过去 100 年里，世界的每一个进步都使得知识和智慧的地位大大提高。人的智力战胜了大自然的力量，然后又战胜了它自己创造的资本的力量。今天，智慧的价值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对于这种情形，李开复曾说：“人的体力差别和脑力差别不是在一个数量级，这是生理决定的。一个跑得最快的人，和一个只有平均速度的人相比，不会超过一倍，但是一个最聪明的人和一个有着平均智力的人相比，差别就会有十倍，甚至几十倍。”这比喻挺生动，也耐人寻味，不过，更加值得回味的还在后面呢。他说：“在越是困难的题目面前，人的智力差别就越明显。”想象一下这种情形，你就可以理解他的话中深意：让一个一流的人和三流的人一同来解决一个三流的问题，结果不会有很大差别。但我们若能提出一个一流的难题，那么一流的人仍将所向披靡，而三流的人则会一筹莫展。所以，如果我们周围有哪一个杰出的人变得平庸起来，最有可能的情形是，他（她）没有机会面对一个杰出的问题。

李开复把他的思想写在一篇文章《我的人才观》中，此人他日若能成为世界大师，这一番话必能作为“开复定理”载入 21 世纪的史册。不过，这种“人才观”在微软乃是一脉相承，而非李开复独创。比尔·盖茨就曾无数次地说到这一点。他认定过去几十年社会的种种进步，乃是源于天才身上的一种无法预测的创造力。他说，他相信人的智慧和创造性从一定程度上是“天生的”，世上存在许许多多的天才，还直言不讳地说自己“更注重人的智慧或者聪明才智，而不太看重其他方面。”有一次，友人请求他回顾上一年度的重大事件，他一再提起的惟一成就，就是帮助他的管理人员雇佣了一大堆“聪明人”。在关于比尔·盖茨的种种传说当中，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

地球将要毁灭。

上帝对比尔说：“因为你是世界首富，所以我允许你离开地球到另一个星球去生活，但你只能带走一样东西。你想带走你的财富还是别的什么呢？”

比尔说：“不，我将带走我的公司里最优秀的 20 个人！”

这故事的杜撰性质是无疑的。但人们都知道它并非完全空穴来风，因为比尔·盖茨在 1992 年的确说过：“如果把我们公司最优秀的 20 个人带走，那么，我告诉你，微软就会变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公司。”当然他除了注意“现实的优秀”之外，也注意“潜在的优秀”，所以他为那些每年暑期来到微软公司实习的学生制定了一项奇怪的奖励规则：可以去他的家中参观一次。

住宅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是主人身份和风格的象征，在美国也不例外。比尔·盖茨的住宅位于西雅图风光旖旎的华盛顿湖东岸。岸边是传统的富人住宅区，由一片老式的欧式建筑组成，但最近几年却雨后春笋般地崛起了一座座崭新的别墅，外观以鲜明的线条和几何图形为主要特色，造型现代，色泽耀眼。当地人都说，那是微软的暴发户建造的，他们的高收入在过去 3 年把周围房价抬高了至少 50%。其中最大的“暴发户”，就是比尔·盖茨。这些话中充满了羡慕、讥讽和嫉妒。但比尔·盖茨不管这些，仍然肆无忌惮地在华盛顿湖畔挥霍他的财富。他的住宅造价 5000 万美元，濒临蔚蓝色的湖水，另外一边为重峦叠翠环抱。房子是原木结构，规模宏大，极尽奢华，里外遍布最现代的电子信息装置。车库里能够停放至少 26 辆轿车，楼梯是用一株生长 800 年以上的道格拉斯杉树制作，还刻意将一圈圈密集

的年轮呈现在表面。不过，房屋外表没有任何绚丽色彩，仅仅是原木本色。冬季，这房子就和周围的枯枝败叶融为一体。有人说这是典雅之风，但也有人说这是土气。比尔·盖茨本人把它叫做“未来小屋”，名称的恬淡从容以及外观设计的不事张扬，显然符合比尔·盖茨的初衷。他也许希望将自己的财富淹没在湖光山色中，不过，一个人到了他那个地步，就再也不能隐藏自己。关于这所房子的故事流传在当地每一个角落。其中一个，税务机关根据房屋造价要求比尔·盖茨每年交纳 50 万美元的房地产税，为总价的 1%。但比尔不同意，他说他花了 5000 万美元是不假，但这房子的市场价值没有那么高。于是双方都同意请一个中间机构来评估这房子的价值。评估结果是，“小屋”价值 6000 万美元，到 1999 年，更进一步升到 10200 万美元。这样一来，比尔·盖茨在这一年只好为他的“未来小屋”交纳 100 万美元的税。

比尔·盖茨梦幻般的经历以及这些传说，让他的“未来小屋”成为华盛顿湖上一个游人观光的去处。这些游人乘坐游艇到湖上眺望那座充满神秘色彩的住宅，好奇心重的人可以一直将船驶到很近的地方，直到能够清晰地看见屋内的窗帘、灯饰和花卉，每逢这时就会有警卫人员出来，挥手示意你必须立即离开。偶然也会碰到比尔·盖茨本人在庭院散步，当他发现湖面上有人将镜头对准他的时候，就会立即掉头走进房内。

到微软来实习的学生们大都是比尔·盖茨的崇拜者，现在他们再也不用远远地眺望他的“未来小屋”，而是涉足其中，这在他们看来当然是一种难得的际遇。从微软的通例上说，连那些正式职工也不具有这样的机会。比尔·盖茨本人不会在家恭候学生，但他的“未来小屋”能够向这些学生敞开大门这件事本身就在证明，他把这些人看做是微软公司的潜在后备军，以及潜在的财富。凌小宁曾有一个偶然的走进比尔·盖茨的家，他说

他当时的感觉是受到了尊重，这种感觉比这豪宅本身更有吸引力。“你尊重人家，人家才尊重你。”凌小宁说。

我们将这种情节联系起来，就可以发现，微软公司不论有多少劣迹，毕竟是 20 世纪最后 20 年美国历史的一个缩影。全世界的软件业，本质上都会赞成比尔·盖茨对智力的偏爱。它走向成功之时，恰是美国经济面临困难之际，从这个方面上说，微软本身就是“杰出”的代名词。但在那些智力寻常者的内心深处，对于这样的情形难免有些不快。平心而论，20 世纪留给我们的传统之一，是整个社会从最基本的心理方面对于智慧超群者的一种厌恶情绪，即便是在普通人中间，接受“等级哲学”的人也多于喜欢“精英哲学”的人，有如中国话所谓“阳春白雪，和者盖寡”，亦如美国社会广泛存在的“反唯智力论”。优秀的人之所以讨厌，并非在于他（她）的优秀，而在于他（她）的与众不同。渴望得到社会追捧的人必须奉行一条无形的准则：走所有人都在走的路，做所有人都在做的事。倘若你要与众人分道扬镳，另辟蹊径，我行我素，那么你的成功本身就代表了一种“罪恶”。它在你和你周围的人之间造就隔膜、嫉妒和猜忌。这情形在中国乃是成功者的孤独之源，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也难免会发生类似的感叹。叔本华早就说过：“具有高超智力的人，特别是他们是天才的话，很少能有几个朋友。”一个名理查德·哈福斯泰德的美国人，曾在 60 年代描述了他的国家的这种状况：“‘聪明’这个词令人生厌。这代表优秀，标榜与众不同和对平等主义的挑战，具有这种素质的他或她必定缺乏普通人的情感。”普通中国人不会说出这么多富有哲理的话来，但却会对他们讨厌的人说：“就你聪明？”“文革”时期，冤案无数，陈钢的遭遇是其中很小却又耐人寻味的一件。他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创作者之一。这首小提琴协奏曲是 20 世纪中国音乐艺术苑中

最伟大的作品，但陈钢因此获罪。在他遭受的种种磨难中，只有一个时刻，历经 30 年之后仍刻骨铭心：一个红卫兵用一根拖把柄重重地敲打他的脑袋，一边狠狠地说：“你太聪明了！”到了这个世纪的最后几年，一个中国人再也不会因为“聪明”而被拘禁围殴。

在这样的情形中看来，我们不论对微软人的傲慢自负怎样看不惯，都必须佩服那位到希格玛大厦第五层来寻找“精子”的普通中国女子的好眼力：这里的人，的确个个聪明绝顶。

直至今今天，意识到这一点的中国人并不多。报纸编辑把微软描绘成钱的象征。年轻人在提到“微软”的时候，按照自己的想象做了改动，不是说“Microsoft”，而是在其中的“S”上加上一道杠，叫做“Micro \$ oft”，这样，就用一个美元的标志把“微软”二字隔断。《南方日报》在 1998 年冬天发表毛骏飙的文章，其中说，微软在交足了学费后，终于学会了“一石二鸟”。不过，这家报纸把微软的“二鸟”看成是占领中国软件市场以及改善自己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与“智慧”二字全都不搭边。

未来的希望在今日中国的大学院墙里

我们一向不习惯把人的智慧当作一回事。这也不奇怪。过去 100 年，智力虽然战胜了体力，但它始终拿权力无可奈何。改革的确为亿万人提供了发财走运的好机会，追求财富的梦想成了现实。但是大多数过来人都会发现，财富对于智慧的需求，远远不及它对于权力的依赖。所以我们即使在最边远的山村也能听到这样的议论：有了权力就拥有一切，失去权力就失去一切。

不过，历史有时候会让创造历史的人落伍。没有一个青年在目睹了历史的进程之后，还能对自己的现状无动于衷，还能固守自己以往的精神世界。这一点李明镜必定会有极深的感受。1998

年 12 月，也即希格玛大厦的招聘计划刚刚展开的时候，李明镜是汉王公司最杰出的软件设计工程师。他设计的“汉王手写识别系统”说起来挺神奇，你在一张板上随便写点什么，它都能保留在它的记忆体中，永远不忘，甚至还能明白你的意思。“汉王”在中国的市场上声誉鹊起，广告铺天盖地，公司销售额也直线上升，就连微软公司也不得不对它刮目相看。他们计划出一笔钱来购买李明镜的专利。谈判进展顺利。“汉王”授权微软公司使用这个技术的签字仪式，选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西侧人民大会堂辉煌的大厅里，这同微软中国研究院举行开张典礼的国际俱乐部二楼大厅同处长安大街，遥遥相对。两个新闻差不多同时出现在报纸上，在时间上纯属巧合，但记者们要的正是这种“巧合”。他们把这“巧合”炒来炒去，在初冬时节的京城掀起一阵不大不小的热潮，给世人造成一种得意洋洋的心理：“连微软都在求我们啦。”“汉王”里那些年轻人，因此成了振兴民族软件业的新一轮英雄。

不过，这些英雄中最重要的一位，李明镜，这时候并没有多少豪迈的感觉。“我想知道这套软件卖了多少钱，但老板不告诉我。”他后来说。他只知道他的发明销路很好，头一年可能卖了好几千万，利润率很高。他并没有分成的打算，只是好奇，想知道他的智慧值多少钱，但却惊讶地发现老板不愿意说，“他就含糊地告诉我一个大概”。老板希望他再接再厉，周围的同事都觉得他想做什么就能做出什么来，但是李明镜开始含糊起来了。他觉得压力很大，虽然他很努力，一天到晚拼命工作，但他深知软件世界里的一个通例：你要做出 98 分的成绩，只需要 2 分的努力，但你要得到最后那 2 分，则要花费 98 分的力气。比如他已经把“汉字手写识别系统”的识别率从 70% 提高到 90%。他说：“那很容易。但在 90% 以上，再提高一个百分点都很难很

难。”那一天，人民大会堂的气氛的确让人激动，可李明镜却发现，在既成的道路上前途渺茫。“我忽然有一点想离开汉王，”他后来说，“我对微软感兴趣。”不过，李明镜的离开“汉王”和进入“微软”，还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这一事件在中关村引发的那场不大不小的波澜，还要等到更晚的时候。

1998年的那个秋天，研究院着手组织它的队伍。其具体计划，要在今后3年当中找到至少100个研究人员。这主要不是像李明镜那样已经卓有成就的人，而是国内大学的博士生。

李开复、凌小宁和陈宏刚成为第一批考官。这3个人在这个秋天到处奔波，目标就是中国各个大城市中的名牌学校。研究院名声日隆，希格玛大厦的电话铃声前所未有地频繁起来。有人想来求职，有人想要合作，有人想要赞助。当然也会有一些人说出一一些耸人听闻的事情，其中最有戏剧效果的是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她口口声声提到“盖茨”，说她是“盖茨”的情妇，还说“盖茨”已经把其财产的多少都给了她，但这个月“盖茨”忘记了给她钱。既然“盖茨”已经在中国建立了研究院，那么院长李开复就有责任给她一笔钱。说者风情万种，闻者一笑置之。因为微软上下无论亲疏，全都把他们的老板叫做“比尔”，从没有人叫“盖茨”的，所以这个故事的荒诞无稽一听便知。不过，这种荒诞的故事只是微软招聘连续剧中一个小小插曲，一闪即逝，大多数对研究院感兴趣的，都是些杰出的人。秋天结束的时候，至少有500人向研究院提出申请。这些人全部来自中国最有名望的大学和研究所。包括北京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上海的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安徽的中国科技大学、湖北的武汉大学和华中理工大学、浙江的浙江大学、黑龙江的哈工大、江苏的南京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的计算所、软件所和数学所。报纸上说，这

些人全都是计算机专业的博士，这消息令读者关切，但有些言过其实。到微软来的第一批求职者中，至少还有一些计算机专业之外的学生，比如无线电系、电子系、自动化系，以及物理和数学系的学生，而且包括了一些硕士甚至本科的毕业生。

然则舆论一律认定，微软的“猎头计划”乃是瞄准了中国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这有充分的根据。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招聘原则是，重天赋而轻经验；注重学习的能力而轻原有知识的积累。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可能会比一个老道成熟的人有更多的机会得到微软的关注。这种观念虽有它的片面性，但观察电脑世界的实际情形，年长且富有实际经验者，极少有能够适应其高速变化节奏的，在其他领域中受到尊重的经验和稳重，在这里反而会成为前进的障碍。

1998 年秋天，希格玛大厦迎来的首批面试者，全都是中国名牌大学的博士。微软把目光集中于中国的名牌大学，这在研究院成立伊始，即有明显征兆。1998 年 11 月 6 日，也即研究院挂牌的第二天，天还没亮，院长李开复就起床了，洗浴、刮胡子，穿上西服，系上领带。按照惯例，他的衣着一向随意，但今天不同，他穿着笔挺地出门了。这倒不是因为他要在上午接受那些围着他转了好几天的记者们的采访，而是因为他要陪同微软副总裁里克·雷斯特去访问北京的几所大学。中午 12 点半，这一行人精神抖擞地走出希格玛大厦，沿知春路东去，穿过学院路，向南跨过一条小河，经过京城最后的一段古城墙，一直向西，就到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大楼。他们在这里会见了 500 个学生。又转头向西北方向，经过颐和园路，在 4 点钟的时候进入清华大学，360 个学生正在等待他们的演讲。到了傍晚 6 点钟，这一行人离开清华，进入隔壁的北京大学，大约 600 个研究生怀揣着一大堆问题，在北大小礼堂里等待他们的回答。这一场会见结束的

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连续8个小时马不停蹄，茶点未进，但里克·雷斯特和李开复全都兴致盎然。陈宏刚始终在一旁伴随。自从他在夏天来到北京，加盟研究院，李开复就想让他负责研究院与中国高校的关联，还负责人员招聘。他的那些中国朋友们认为这个决定太保守，一再说陈宏刚是毕业于华盛顿大学的数学博士，在微软公司有着良好的职业记录，现在拿来搞些婆婆妈妈的事情，未免大材小用。李开复不以为然。他说，正是因为他有最好的教育水平和最好的职业记录，才让他来做这件事情。还说：“对于研究院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和学生见面。”朋友们觉得他有些故弄玄虚，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李开复的确是把和学生的见面看得比和官员的见面还重要——在后来的一年里，他先后与35000个大学生见面并且对他们发表演讲。新院长的这种管理特色，有他自己的信念为基础。他坚信中国存在他需要的人。

那时候，希格玛大厦里面谈论的话题还有：招聘问题、待遇问题、档案问题、社会保险问题、回国学者举家搬迁问题、外地学者进京户口问题、最优秀的人在哪里、受教育水平越高优秀人才的概率也就越大、大学生中最优秀的人是不是全都出国了、寻找并且雇佣比自己更聪明更有创造能力的人、中国的信息产业部、科技部、教育部、北京计算机领域的56家媒体、人事制度、户籍制度、档案制度、怎样感谢那些支持了研究院的中国官员、该为那些介绍毕业生来应聘的学校提供多少赞助……李开复还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一些挺有煽动性的说法：“我的新使命是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环境，和有同样梦想的人合作，共创人类计算机的未来。”“基础研究的定义就是发明一些现在不可能的事情。”“不容忍官僚作风，不容忍傲慢作风，更不容忍明争暗斗。”“决

定权在研究员手中。”“我们当然鼓励成功，但我们也鼓励失败。”但大家谈论最多的还是下面这个话题：

“未来的希望在今日中国的大学院墙里！”

陈宏刚开始频繁地和那些即将毕业的博士们接触。微软在中国学生心里早就留下了傲慢无理的名声，所以大多数学生对微软的主动行动准备不足。1998年11月5日上午，陈正走进希格玛大厦之后，方知他和另外那4个博士是第一批进入研究院来面试的人。他们是从大约500个申请者中挑选出来的，各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共同的特征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全都是博士、全都年轻、全都聪明，不同的特征可就有点引人入胜。

1989年深秋时节，在北京火车站站前广场，不足20岁的陈正顶着秋风秋雨瑟瑟发抖。他是福建人，有着南方人的那种典型的小脸，尖下巴，戴着一副镜片又厚又大的眼镜。表面有些拘谨，脑子转得飞快，不是那种刻苦用功的学生，却有一种高效率的突击能力。读书的时候，总是在学生中间串门聊天，但却总是能在考试的时候进入前三名。当日他北上京城，是为了尽可能远地躲开父母的干预。父亲年轻时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医学，母亲则按照自己的爱好在中学做英语教师。两个人都是大学毕业，这在那个年龄的中国人当中实属凤毛麟角。这个家庭要是放在陈正的时代，多少也算是个“人才高地”。“可惜他们的理想后来全都不能实现。”陈正后来说。陈正1972年底出生，对父母这一代人的坎坷以及感情深处的种种伤痕并不能深知，但在他们的交谈、抱怨和相互争吵当中，渐渐明白他们的“牺牲很多”，知道了他们投身革命和自觉接受改造的一些故事，整天批判别人也被别人批判，然后是父亲下放基层医院，母亲到军垦农场劳动。陈正上小学的时候，这一切终于结束。这以后，他对父亲的印象就是，

“一个很模范的人，特别热衷于工作，一定要在单位里面做到最好才满意。”但新的时代毕竟不再属于父亲那一代人，而是属于儿子的了。于是，父亲把自己没能实现的理想，寄托在儿子身上，他希望陈正学医，但儿子坚决拒绝了。

陈正看见那厚厚的医学书籍就头疼，但却格外钟情于计算机，于是自作主张报考清华大学计算机系。那一年北京开学晚了。陈正9月底从南方到北方，恰逢秋雨秋风，只穿衬衣，不免饥寒交迫。尽管北京从来没有在9月份下过雪，但陈正多年以后回忆起当日情景，一口咬定那天他见到天上飘着雪花。直到终于到了学校，走进一间8人同住的房间，打开箱子拿出最厚的衣服穿上，才觉得好一些。他对北京的第一个印象是“很冷”。然后就是第二个发现：“北方的饺子那么难吃。”不过，他很快就把目光从衣食上挪开，因为他感受到北京的政治气氛浓，学术气氛也浓。他想到父母临别时嘱咐他不要参与政治的话。他对政治本来没有兴趣，只把时间和智慧用在计算机上。即使是恋爱季节，和计算机在一起的时间也远远超过和女友呆在一起的时间。女友说他和计算机结婚了，他憨笑默认。直到现在没有结婚，他并不着急。

1989年深秋进入大学的学生中，还有一个名叫张高，湖北人。他在考高中的时候是黄石市的第三名；在大学的时候是学生会的副主席。此人只知道埋头读书，语文很差，数学极强。他在华中理工大学完成了学士和硕士的学业，同学都说他有很强的做官的能力，不过，他却羡慕那些做工程师的同学。他没有仿效姐姐去搞艺术，对母亲的裁缝技术也没有兴趣，但他却欣赏母校的传统。他说华中理工大学的毕业生是“宁做总工不做总理”。他讨厌官场上的恩怨是非。他在1996年来到北京，不是看中那些

高墙后面的政府机关，而是选择了中科院的软件所。现在，他的博士学业也完成了。这一年软件所的毕业生时运不济，整个科学院都在精简，软件所原来 200 多人，只能留下 50 多人，还要那么多新人干什么？同学中想出国的不少，20 来个博士走了七八个。硕士走得更多，十个中有九个出国了。剩下的不是进了国家机关，就是在北京寻找外企。张高仍然信守多年前的原则：讨厌曾经讨厌的，喜欢曾经喜欢的。他想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还希望在自己背后有很大的支持。张高不想到企业去。他说，那里总有人在屁股后面追着你要产品。但他终于意识到，继续留在中科院，就连科研的经费都会成为问题。这时候他从导师那里知道李开复的名字。于是，像陈正一样，抱着试试看的念头，发出了电子邮件。李开复当日复信，邀请他到研究院来看一看。他怎么也没有料到，这电子邮件竟成了他个人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东京大学一位教授在日本计算机领域享有极高声誉，但是多年以来却从来没有带过中国学生。90 年代，蔡东风成为他的第一个中国学生。日本教授以中国学生为自豪，但中国学生却对日本不感兴趣。蔡东风是辽宁人。他是日本东京大学的博士，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国，但后来他还是回来了。他不像他在国内的那些同胞，不是对老一辈日本人的侵华耿耿于怀，就是对今天日本人的排外抱有很强的反感。他是搞研究的，只关心学术的顺逆，他说日本人的软件开发思想不如美国。他念念不忘自己在国内的大学经历，一定要生活这样的环境中才觉得心里踏实。这也难怪，他是“文革”结束以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有谁没有一肚子的回忆呢。他说他的大学生活是一个很有戏剧性的故事。整个国家 12 年的中学毕业生在同一个时间考大学和读大学，这本身就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

观。当年他的“老班长”比他大10岁。而今天，当他1998年11月走进微软的时候，恰在“不惑之年”，比他周围的那些应试者也要大10岁。

祖籍江南却在河北省张家口市长大的童欣，1989年终于熬到了上大学的年龄。那时候他惟一的愿望就是去一个离家很远的地方。父亲是北京人而母亲是苏州人，当年两人一个学采煤一个学地质，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一同来到张家口——长城以北一个荒凉闭塞的地方。那是一个“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时代，“荒凉闭塞”正是年轻人远大理想的一部分。但现在不同了，电视上播的是“将爱情进行到底”，广告上说的是“将减肥进行到底”。父亲和母亲并不完全赞同这种变化，但却很坚决地要求儿子“将来不要留在这个城市”。此种“摆脱闭塞摆脱贫穷”的愿望虽然简单而且原始，但它给予一个人的内在冲动之强烈，不身临其境是难以体会的。童欣就是这样考进了江南西子湖畔的浙江大学计算机系。在杭州一呆6年，由本科而硕士，一直在实验室里研究计算机图形学。最初的兴奋过去之后，他又开始思念北方。“在一个实验室呆久了，想出去。”他后来说。住在北京的爷爷奶奶，也整天写信要他回到北京去。他就抱着这样简单的念头考取了清华大学计算机系，读博士。他想继续他的计算机图形学研究。“研究最纯粹的图形学，比如计算机绘画，还比如动画。”他对导师这样说。导师是国内“可视化”领域的权威，有60多岁。他说他从来没做过童欣说的这个东西。不仅如此，整个清华也没有人做这个东西。既无前人研究的基础，也没有人能够指导，童欣只好放弃自己的想法，好在他已长大成人，知道中国导师和外国导师不一样：“在外国，导师最怕你做不出新鲜的东西；在中国，老师最怕学生的论文不能通过。”日子稍久，他又

发现，“中国的研究者中，绝大多数人都清楚，他们做的研究不是世界一流的。但他们没有办法，没有资金支持，成功之后很少有使用的前景。”看来他的脑袋里面不再只有一些简单的念头，而是在设想自己的将来。周围一派“出国气氛”，一个在加拿大的朋友说，那里需要一个做图形学的学生，可以接受他去读博士后。但童欣并不是那种义无反顾的人，他对周围的一切又恨又爱，虽然不满却又舍不得离去。1998 年的秋天，他是在“出国”还是“留下”的犹豫中度过的。就在这时候，他的一个同学告诉他，微软在中国成立了研究院，要招聘专做图形学的研究员。童欣知道微软的图形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还听说全世界这个领域中最优秀的人在过去几年里几乎全都去了微软。他不禁心驰神往。当天就向研究院发出一个电子邮件，送去自己的简历。

越是优秀的人，越往外跑吗？

这些年，出国潮流一点也没有减退的迹象。名牌大学里的毕业生——学士、硕士和博士，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出国”。清华大学的老师们感叹：最好的学生都出国了！你如果到美国的硅谷和微软总部看一看，就会发现那里确有一堆又一堆的清华大学毕业生，那里的人们都说：“清华是硅谷的预科班”、“清华是微软的预科班”。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坚持说，留下来的也有优秀的，出去的也有不优秀的。在北京兴思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从事的一项调查中，有 86% 的大学生反对“最好的学生全都出国”的说法。微软公司的研究员芮勇有一次谈到这个问题，觉得这两

方面的看法似乎都有道理，但却不能说明何以会存在那么多相反的证据。还说，国内就这个问题发布的那些统计数字，并不能平息人们的忧虑。芮勇毕业于清华大学，现在则在微软公司雷德蒙总部供职。他认为，把两个方面的结论综合在一起，就有可能更加符合事实：首先我们有足够的事实证明，从大学中出来的学生的确有优劣之分；其次我们也有事实说明，优秀的人当中，出国的比例较大，留下来的比例较小。将芮勇的“一家之言”以一个简单化的图来表示，如前图。

芮勇属于“阴面”中人，而现在我们所叙述的这几位却在尝试留在“阳面”。这里所谓“阴”和“阳”，完全是为了理解问题的方便，一点也没有褒贬之意。事实上，人才去留的原因极为复杂多样，完全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道德界限所能划分。1998年冬天，这几个人没有像他们的同学那样首选出国之旅，而宁愿留下来，说起原因，也不是记者们习惯于要发掘的那一类爱国主义的主题。陈正说：“我不想出国，因为我比较懒，这和性格有关。”张高说：“我只是想做自己喜欢的事，也想过出国。不过，还没有联系好。”蔡东风是一个已经出国却又回来的人。他说：“日本不像美国那样开放。”况且他的妻子在沈阳航空工业学院有一个很不错的研究室，所以他和妻子回来了。

最优秀的人永远不会恳求你

11月5日上午，这几个人走进希格玛大厦来应聘的时候，研究院还没有正式成立呢。挂牌仪式要等到几个小时以后，办公室内装饰正在收尾，满地乱七八糟，空气中飘散着强烈的油漆味。面试的地点选在六层，那里是微软中国公司的办公地点，研究院最初的招聘，也是借助于公司的人力资源部。

从表面上看，微软公司人力资源部与我们国家的人事机关相

比较，仅仅是称谓上的不同，然则称谓本身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实质。“人事”，也即关于人的事。“文革”结束已经多年，调查祖宗三代的来龙去脉不再时兴，但人事部门仍要花费很多时间考核政治表现，处理人事纠纷，调和山头冲突，其着重点在于人际关系和人的表现。微软的人力资源部则是将人作为“资源”来对待。其管理原则，只在于聘用员工、确定既不太高又有竞争力的薪酬水平，以及培训。当日微软中国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经理名叫王瑾。按照她的解释，微软公司的人力资源宗旨是三个字母——“ADK”：

A——Attract 吸引最好的人。

D——Develop 发展最好的人。

K——Keep 保留最好的人。

三个词中，每一个都不离“最好的人”，所以王瑾说她惟一的目标就是“Best of Best”——“优中之优”。

那时候，在大学里的大多数学生心目里，还无法区分微软中国研究院和微软公司的差别。陈正在成为微软研究院的雇员之后，有一次很坦率地说：“微软在大学生中的形象不是很好。”另外一位还没有毕业的硕士潘锦辉说，微软在大学生中，“老实说，总体上是一个负面形象。毕竟，它比较霸道。”还有一位名叫谢旭东，清华大学电子系的团委书记，在学生中间颇有号召力，按照他的说法，“大学生中有人认为，微软公司是想垄断中国市场。”当他率领400位清华大学的学生到希格玛大厦参观的时候，就有学生对他说，“研究院请我们来是为微软做宣传。”

对李开复来说，更加要紧的是，无论诅咒微软的人还是崇拜

微软的人，大多数并不真的了解微软。当然学校里已经很难再构筑政治斗争的舞台，学生们也不再热衷于口诛笔伐。他们不会像某些媒体，看到微软就说是“狼来了”。他们从来不说“振兴民族软件”，也不会大骂微软“霸权”。他们只是觉得微软在中国没有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说来说去，也就是把他们的产品汉化一下。”陈正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想的。他的一位同学在微软中国公司干过，就是在他现在等待面试的希格玛大厦第六层。“咳，不过如此”，同学以亲身经历告诉他，微软的待遇、技术、环境，还有将来的发展，都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时候陈正恰在选择职业的关键时刻。他是外地人，按照北京市新公布的“广开门路吸引人才”的政策，他这样的博士是可以得到户口的，但必须提前找到工作。学校交给他一张招聘单位的名单，大部分是外企。至于国内企业，就连联想这样赫赫有名的，也不在这些清华博士的眼里。微软倒是挺出名的。但这种来自同学的“反馈”具有一传十、十传百的功效，有如水面泛起的涟漪，一圈比一圈更大地扩张开来。不少同学听了都说，宁可去惠普或者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这几个博士走进希格玛大厦之前的几个星期，听到的就是这些。按照这样的解释，微软非但不是“狼”，就是“羊”也算不上良种的。

然而那些真正了解一些真实情况的人，就不会这样简单地说什么“狼”或者“羊”。陈正的导师是张钹，“钹”字音“伯”，几乎所有的人都念作“拔”，但这并不影响他在中国计算机业的成就和名望。张钹了解李开复的学识，对李开复的品格也能洞悉。他把李开复的电子邮件地址给了自己的学生，鼓励他去找李开复。那时候，陈正已自购一台电脑，并且把自己和电脑一起放在校园外面租来的一间房子里。当天晚上9点钟，陈正就给李开复发出一个电子邮件提出求职申请。按照以往的经验，他对这一

类申请总是抱着“随它去吧”的念头。况且李开复是一院之长，日理万机，对于像他这种刚刚毕业的求职者，也许根本无暇顾及。

第二天早上，陈照例来到清华园，心里惦记着向什么地方继续提出求职申请。这时候手机忽然响起。他看看来电号码，从未见过，所以不予理睬。但那个号码却百折不挠地拨进来，令陈正心烦不已，终于强忍心头愤怒询问对方姓名，这一来，电话那一头的声音就令他惊讶不已，以至一年之后还能念念不忘：那是陈宏刚，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高校关系及营运部经理。他问陈正是否接到李开复的电子邮件。陈正转身冲出校门，回到自己的房间，打开电脑的时候还不能相信李开复的回复已在他的信箱中。一分钟后，他看到了李开复的信。

“欢迎你来微软，”李开复说，“也许我们可以见面聊聊。”

仅仅这么一行字，便扭转了陈正心里积累起来的所有对微软的不快。“我觉得真是快捷无比。”他后来这样说。

但还有更加令他料想不到的事呢。

陈正当天来到希格玛大厦，很快见到李开复，以为要面对一场严厉的审视，但李开复谈得很随意，他说已经看了陈的简历，还格外仔细地询问陈的想法。谈话结束时已是正午，李开复说要请陈正和他一起吃饭。

这是陈正迄今为止最难忘的一顿饭。他表面故作镇静，内心惊讶不已。按照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他怎么也想不到，李开复这个“既是大名鼎鼎的计算机科学家，又是老板”的人，会这样善待他这个还未出茅庐也从未显露才能的学生。

其实这在李开复说来，并不是一种礼贤下士的特殊举动。他这人喜欢美味佳肴，信奉“食不厌精”，尤其喜欢中国餐，但他的午餐和工作之间从来没有一个明显界限。然而更加重要的是，

他从来不把向他提交简历的学生看做是来恳求他的，事实正相反，他来到中国就是为了寻找他们，追随他们。所以严格地说，是他在求他们，而不是他们在求他。

老板是由于拥有好雇员才有价值，有如老师是由于拥有好学生才有成就。这一点在李开复刚刚进入卡内基梅隆大学读书的时候，便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感受。那时候这所大学的教授对待新学生的态度既友善又尊重，这完全不是出于礼节和客套，而是出于某种真诚。这令李开复惊讶不已。他后来无数次地向中国学生们讲起，他在进入卡内基梅隆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选择老师。那一个月中，学校里 100 多个教授轮流登台演讲，向新学生展示自己以往的成就和将要做的事情。学生们凭着自己的兴趣选择教授，教授们则煞费苦心地寻找最好的学生，请学生吃饭，说服其归入自己门下。选择的权利在学生一边，如果学生拒绝，教授就没有办法。一个教授，如果连续多年没有成就，就不会具有吸引学生的力量；如果连续几年没有好的学生，其声望甚至饭碗都会受到影响。李开复在那个月里找到了他的导师罗杰·瑞迪，这成为他日后成功道路上的最重要的起点。当然他的收获还不仅仅如此，他在那个月里还尽情地享受了一次自由选择的权利，第一次体会到师生之间、老板与雇员之间的一种美国式的关系。

这种情形在中国人看来十之八九会不以为然。通常的情形是，越大的机构就越是傲慢。他们在嘴上说着“筑巢引凤”，其实还是等待人家上门恳求，碰到不愿意求他们的人，就会在心里说：“想来我这里的人多了，你不愿意干可以走。”这种说法看上去不无道理，但微软却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解释同样的事情：问题在于，最优秀的人永远不会恳求你。他们可以去任何地方，也只会直截了当地问两个问题：

你能让我做什么？

你能给我什么？

招聘规则：N—1

这 5 个“考生”是从 500 个求职者当中挑选出来的，概率之低令人惊讶。但是坐在那里等候他们的“考官”之多，更加出乎这些“考生”的意料：竟然也是 5 个。陈正只是在电话里和陈宏刚打过交道。此外还有凌小宁， he 现在是微软中国研究院总工程师和软件开发部经理；有沈向洋，他在两个月后成为研究院的主任研究员和形象计算组经理，但在当时还没有作出回国的决定。还有从美国研究院来的高级研究员黄学东和洪小文。他们本是李开复请来为研究院的挂牌仪式助阵的，但现在仪式未开，却被请来参加招聘的面试。

在微软公司 25 年的历史中，从最初的 2 个人到现在的 3 万多人，人员招聘制度乃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公司每年接到 12 万人的求职申请。这些申请者来自全世界，若非拥有足够自信，不会找到微软的门上来，但比尔·盖茨仍然认为，许多令人满意的人才没有注意到微软，因而会使微软漏掉一些最优秀的人。在有关比尔·盖茨的诸多传说中，寻找人才的故事，比他的财产增长更加激动人心。据说这个世界上不论任何角落，只要有哪个人才被他发现，他便不惜任何代价，必欲弄到身边而后快。他安排的很多“面试”，不是在考人家，而是在求人家。用微软研究院的副院长杰克·巴利斯的话说，这是“推销式面试”。有趣的是，微软这些心高气傲的“考官”们，“求人家”的时候所迸发出来的那种兴奋感，甚至还要超过“考人家”。他们知道谁是值得他们“恳求”的人，其“恳求”的方式常常会出人意料。在西方记者撰写的关于微软的书籍中，多次提到一件事情：加州“硅谷”的两位计算机奇才——吉姆·格雷和戈登·贝尔，在微

软千方百计的说服下终于同意为微软工作，但他们不喜欢雷德蒙冬季的霏霏阴雨。比尔·盖茨说，这好办，就在“硅谷”为他们建立一个研究院。

不过，大多数求职者可没有这样幸运。微软人事制度中的一个原则是，永远只聘用比实际所需更少的人。某些人用一个公式来概括这个原则：

$$N(\text{实际需要人数}) - 1 = \text{招聘人数}$$

一般说来，招聘考试是面对面地实行，所以也叫做“面试”。但有时候也会有长途电话跨过千山万水甚至跨过太平洋，考官和应试者只是坐在电话线的两端。每一个面试者，要同微软公司的5个人到8个人面谈，有时候可以达到10个人。每一个考官的面试都是一个小时，以“一对一”的方式提问。他们说，微软文化中讲究公平和对等，所以不会让一个应试者同时面对一大堆考官，因为那样对应试者来说不公平。不过，应试者是否能够感受到这种公平，还很难说，当他们从研究院的行政助理郑薇手中接到那一长串“考官”的名单和时间表时，没有见过世面的人已经额头出汗。此后是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持续处在高度的紧张之中，甚至在中午吃饭时也不会停下。

主考官全是各个方面的专家，每个人都有一套问题，各自具有不同的侧重，问题的清单通常并未经过集体商量，但有4个问题是考官们共同关心的：

是否足够聪明？

是否有创新的激情？

是否有团队精神？

专业基础怎样？

按照这一原则，学校考试成绩并不是衡量一个人的最重要的标准，一个人的成绩只要没有差到“平均线”以下，就有足够资本走进希格玛大厦第五层。一些在大学里面分数第一的人，在这里却不能通过面试的审核。1999 年 1 月，研究院组织了他们第一次书面招聘考试，应聘者以笔作答，得分最高者为西安交大的一位博士，但后来他却没能通过研究院的面试。学校通常使用的考卷，只能涉及人的全部能力中的很小部分（有一种说法是 $1/400$ ），不仅无法全面衡量一个人的素质，而且还有极大可能导致相反的结论。与此相应的另外一种情况是，学校导师拼命推荐的学生不一定能为微软接受，导师竭力说“不”的学生，也不一定会被微软拒绝。面试的目的，正在于检验应试者的书本之外的能力。这和我们国家的教育标准有着完全不同的趋势。你如果作为一个应试者进入微软，就会觉得以往的书本知识全都用不上，不得不动用自己的应变能力加以应对。

当你起身离去之后，每一个考官都会立即给其他考官发出电子邮件，说明他对你的赞赏、批评、疑问，以及评估。评估均以五等列出：

强烈赞成聘用。

赞成聘用。

可以聘用但有些勉强。

不能聘用。

绝对不能聘用。

你在几分钟后走进下一个考官的办公室，根本不知道他对你先前的表现已经了如指掌，他在嘴上说“接着谈谈”，其实是瞄准了“哪壶不开提哪壶”。所以一个进入微软研究院的应试者会

觉得是在攀登险峰，越到后面难关越多。当然也会有些人只经历了两三个考官就宣布结束，并未见到后面的“险峰”，但那并非吉兆。因为这三两个考官们也许正在网络上传递着同一句话：“此人没戏，别再耽误工夫了。”

一般说来，你见到的考官越多，考官们在你身上花的时间越多，你的希望也就越大。有些人在完成了既定程序之后又有附加程序，这时候必定是考官们的意见不能一致，因而觉得有必要没完没了。也许分歧持续到最后仍然不相上下，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但的确出现过，这时候，决定权属于应试者将要进入的研究小组的经理，人力资源部完全不加干预。李开复虽有最后的决定权，但他从未使用这种权力，去要求他的经理接受谁或者拒绝谁。然则鉴于微软公司的招聘方针是“宁缺勿滥”，所以，如果发生“赞成”和“反对”各占一半的情况。几乎可以肯定会做出放弃的结论。因为考官们在另外一个层次上达成了一致：分歧久拖不决，至少说明我们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这个人足够优秀。

面试的问答一般使用中文，有时候也用英文。即使是使用中文的时候，也必须夹杂着很多英文的词汇。这倒不是故作高深，而是因为很多话牵涉专业领域，根本没有一个相应的中文予以表达。但谈话有时候只涉及常识性的问题，与专业没有关系。有些问题的焦点在于求得正确的答案，也有相当多的问题并不在于寻找答案，而是检验应试者的思维能力、判断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些甚至根本就是无解之题，这时候检验的焦点就不是专业领域，甚至也不是“智商”，而是一个人的“情商”。

以下是研究院面试中的一些经典问题：

为什么下水道的盖子是圆形的？

请估计北京共有多少加油站？

你和你的导师发生分歧怎么办？

给你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你将怎样去解决它？

两条不规则的绳子，每条绳子的燃烧时间 1 小时，请在 45 分钟烧完两条绳子。

前两个问题虽有准确答案，但考官的目的却是在答案之外，也即判断应试者分析问题的能力。第三个问题的要点不是纠缠是非，而是看你能不能和意见不同者合作共事。有一个应试者非常聪明地度过了每一个难题，但因这个问题导致失败。他把他的导师一通大骂，还说他今生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是选择这个人做他的导师。接着就向考官陈述导师如何不对，而他受了多少委屈以至怀才不遇。这位考官不仅没有同情此人，还立刻做出“此人不能要”的结论。其理由得到所有考官的理解和赞同：问题不在于导师是否有缺点，而是这个学生能不能自己处理不同意见，以及是否具有合作精神。有一种人虽然聪明，但眼神轻灵，心有旁骛，嘴快手慢，动辄埋怨时运不济，一有机会就在背后把老师同学同事朋友说得一钱不值。这样的人如若不能摈诸门外，那就不是引进人才，而是引进是非。至于第四个问题，你很容易说出至少 10 种答案，比如你可以连续三天三夜不睡觉，但微软并不喜欢诸如此类的回答，而是更加喜欢以如下方式处理难题的人：他首先去寻找那些熟悉这个领域的专家，寻找有关的论文。如果这难题竟是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从来无人解答，那么他就要寻找相关领域中的最有权威的专家。总之他要尽量寻找捷径，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又能够超越前人，而不是从头做起。最后一个问题是陈宏刚的得意之作，又被一些应试者带到清华大学的网站上，作为微软的经典考题广泛传播。但传播者不能洞悉的是，这个问题的焦点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机敏，所以应试者能在多

长时间内找到答案才是问题的关键。一个寻常的应试者，往往越是想要快些做出来，脑袋里面也就越是混乱。所以，即使有人事先告诉你这个诀窍，那也无济于事，甚至适得其反。

这种严格的面试程序和琢磨不定的考题目标，固然能够确保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员工如所期待地“优中之优”，但是它对于应试者的苛刻也实在使人为之心惊，即令对于“考官”的能力和品格，也是一场最严格的检验。不能了解其中关节的人，总会低估这种考核的严格程度。一位中国记者在研究了这一面试程序后，私下里同一位考官讨论他的结论。他说：“这种办法，不会遗漏那些足够优秀的人，但不够优秀的人也有可能进来。”但那考官说他的感觉正好相反，因为少数人的否定意见常常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不优秀的人不容易进来，而优秀的人有时候会被漏掉”。尽管如此，这些考官面对应试者的时候依然一丝不苟，咄咄逼人，不能容忍稍有懈怠。每日少则四五人，多则八九人，最多的时候 10 个人。从早到晚，全神贯注。应试者嘴里说出的话自然不容遗漏，即使是表情、行止和种种身体语言，也必须作为判断的根据。这些考官并非全才，所以总是碰到自己不能了解的领域。可是即便不懂也还要装作听懂，直到真的听懂。“一天下来，人都要晕了。”沈向洋这样说。他还没有来北京赴任，即在美国通过电话面试了李江和刘文印，等到真的到了北京之后，立即感觉到谈话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消耗。另有发生在洪小文身上的一件事情为证。洪小文 11 月初和黄学东来到北京，刚刚走下飞机便扭伤了腰，以致不能行走。但他已经接受任务需要面试几个中国的博士。他深知找到真正优秀的人是研究院的生命线，所以不肯推辞责任。他以电话接通 5 个应试者，连续发问 5 个小时，根据应试者后来的回忆，其声音并无异样，逻辑也无一丝松懈，所以他们全都不知道这严格的考官其实是躺在床上。

实则洪小文不过是嘴上逞强，腰间伤痛不已，兀自强忍，等到终于放下电话听筒，立时大叫“好痛”。

当然面试的过程并不全是单向的问与答。应试者有足够的时间向微软提问。大多数人都会利用这个机会更多地了解研究院。但是最为主要的还是“我来了以后干什么”和“我来了将来的发展是怎么样的”一类的问题。倘若是一个家在外地的人，必会询问他的户口如何落在京城。考官也会非常认真地回答你的任何问题。这在微软的文化上属于一种平等的默契，没有人因为你是后来者便会歧视你。但事情除了包含平等的观念之外，还有别的含义。微软的人事变动极为频繁，升迁的依据全在于一个人的能力以及是否适合，资历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成为一个因素。所以你现在虽是一个资深“考官”，但你对面的这个年轻的面试者，有极大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你的上级。我们国家的官员，大都不喜欢那些比他们更聪明能干的下级。一个老资格的人成为一个年轻人的部下，则会让双方都觉得别扭。但希格玛大厦里的这些人，却在心里不断询问：“谁比我更聪明。”能够为自己找到一个好老板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这一点，在微软公司多年的陈宏刚和凌小宁均有极深体会。凌小宁说：“一个经理的成功之处，就是找到比你更聪明的人。”陈宏刚说：“今日下级而明日上级的事情实在是太平常了。”当年陈进入微软时面试他的那位“考官”，日后便成了他的下属。这两个人的年龄都比他们的老板李开复要大，但他们从来没有认为这会成为一个问题。当一位记者向凌小宁询问，他为比他年轻的老板工作是什么感觉的时候，凌小宁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说：“我是在和人的智慧一同工作，而不是和人的年龄一同工作。”

不消说，这种情形令年轻人激动。研究院成立以后的第一个

星期，面试者已经达到 40 人。这些学生还没有离开希格玛大厦，已经议论纷纷。蔡东风说：“我觉得这是一个理想的地方。我看到了一些真正搞学问的人。”他一天前从沈阳坐火车进京的时候，一路上还抱着试探的念头，现在一出门就给妻子打电话，提出举家搬到北京的理由。张高在那个上午花了 5 分钟的时间解决了“烧绳子”的问题，接着就发现“这里有我喜欢的事情”。他说：“一个星期以前我还想着出国呢。”而现在，他在突然之间便做出决定：把出国的念头暂时放一放。陈正说：“那天我对这些从美国回来的人感觉很好，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正式的面试。”他在以前也曾去过其他几家公司。经历过多次面试，既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面试顶多一个小时就完了，让人感觉到草率和随意。那时候他想想都觉得奇怪：一个小时，他们怎么能看清楚我？我又怎么能看清楚他们？现在，他望着微软研究院里那些严厉的考官，心里挺感激地想：

“看来他们真的很看重我。”

聪明人的“磁场”

1998 年的最后一周，寒流袭击中国北方的大部地区，南方的暖流到了江淮一线，就再也无力北上，但是求职者依然纷纷北上。向微软中国研究院提出申请的，已经超过 1000 人。除了那些刚刚毕业和即将在来年夏季毕业的博士硕士之外，另外一些具有工作经历的人也来了。在研究院的内部刊物《通讯》的创刊号，李开复为第一批加盟微软的激情满怀的中国青年写道：

多少年后，当微软中国研究院出现了许多闻名世界的大学者，出现许多一流的研究成果时，我们再回过头看一看这份小小的刊物，您会知道，微软中国研究院是如何一步一个

脚印走过来的。

看上去，李开复比他招聘来的那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还要踌躇满志。他似乎认定希格玛大厦第五层将会涌现大学者。他在他的道路的起点上，就想到“再回过头看一看”。这一点，多少露出了他的华人血统的本色，也与他的老板比尔·盖茨明显不同。人人皆知比尔·盖茨讨厌回顾过去而喜欢“展望未来”。他虽然还不至像亨利·福特那样，认为“历史只不过是一堆废话”，但无论谁提到“看一看后视镜”，他就会显得极不耐烦。他还对他的雇员说过：“今天我们这里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持续四五年的有价值的东西了。”

然而报刊记者既不管过去也不管未来，他们只关注现在。看到大学里的年轻人纷纷进入希格玛大厦，他们便跳起来。《电脑生活》上刊登文章，大声质问：“微软要在中国干什么？”一位名叫李学凌的记者现在再次注意到李开复的那句话：“微软在想，为什么不到这些人才的源头，到中国来寻找这些人呢？”《北京经济报》为微软说了一句好话：他们正在帮助中国“防止人才外流”。但《中国青年报》在进出希格玛大厦的那些人的脚步声中听到的是“警钟响了”。它宣布：“国内计算机企业与国外‘巨无霸’争夺人才的商战将旷日持久地展开，急需人才的民族产业也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中国科学院计算所人事教育处副处长赵雅玲告诉记者，在过去几年中，计算所有 80 多人离职出走。这也就是中国人所谓“人才流失”。“最近 3 年，情况更加突出，”赵说，“要不是国家规定最低 3 年的服务期限，计算所人才流失将更加严重。”这话属实。问题是，在 1998 年年末把这些事情汇入质疑微软的浪潮中，给人的感觉是将中国的“人才流失”统统归咎于微软了。《中华工商时报》的栏目主持

人程武大概是总结了这些故事，所以在他的专栏寄语中断言：外企伸手“抢”人。北大方正的王选教授也许是感觉到危机迫近，所以赶紧宣布，“要让在方正工作的年轻人能够有其钱，有其车，有其房。”联想集团公关部经理李文广，告诫那些一心向往外国企业的中国青年，在那里工作永远进不了人家的技术或者管理的“核心”，而在民族企业中，却能“有推动民族计算机产业发展的自豪感”。不过，他还是承认，“我们无法与微软、英特尔这样的国外大公司抗衡。”

现在，微软研究院开进希格玛大厦才 20 天，居然就抢了先机。

1999 年 2 月，微软中国研究院从希格玛大厦六楼搬进五楼。会议室的名称标牌也挂上了。办公室里设施全都就绪，一切都是崭新的，光亮耀眼。李开复已经有了第一批生力军——还不到 10 个人，办公室里大部分座位还是空的，显得有些冷清，远不如六楼那样热闹，那里有吴士宏领导的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和张湘辉领导的微软中国公司研发中心。不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来到五楼，访问了这个名字很大人员很少的地方。另一方面，求职申请继续涌向希格玛大厦，四个星期里，又来了至少 500 份个人简历。研究院小心地避开记者的纠缠，只把眼睛盯在大学校园里的那些聪明学生身上。

我们有时候会强烈地感觉到，和聪明人呆在一起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这需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自己必须足够聪明。“当一个青年人到一个公司的时候，很快另外一个青年人也会去。”比尔·盖茨曾经说，“因为，有才华的人喜欢一起工作。这种工作环境容易制造一种兴奋感。”高手们喜欢聚集在一起，其工作效率又吸引更多的高手加入进来。这种良性循环是微软公

司过去多年以来管理员工的基本逻辑。这样看来，比尔·盖茨那段关于市场世界的“反馈理论”，也许同样适用于人的世界——人才的“正反馈”和“负反馈”。我们将其稍微修改一下，就可以得到如下一条规律：

一个人的创造性被社会承认得越多，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就越高，个人的创造性也就越大。

一个人的创造性被社会抹煞得越多，整个社会的创造性就越低，个人的创造性也就越小。

至少我们在微软中国研究院里，有可能对所谓“人才反馈论”进行考证。

1999年1月15日，星期五，本书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张亚勤，由美国新泽西州搭乘西北航空公司的班机，降落在日本东京机场，准备在飞机加过油之后继续西向北京，就任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首席科学家和副院长之职。飞机比预定的时间晚了许多，这使他与沈向洋不期而遇。沈向洋的英文名字叫哈利，原来是雷德蒙微软总部的研究员，现在则在这里候机飞往北京，就任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主任研究员和形象计算组经理。二人殊途同归，兴奋异常，当天傍晚登上同一架飞机，一边喝着清酒，一边高谈阔论，在浩瀚的空中迎着天际的夕阳和彩霞，奔向希格玛大厦第五层。

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两个人也是冲着李开复来的。

沈向洋生在上海，长着一副江南才子的模样。此人既聪明又勤奋，从里到外涌动着一种激情。眼镜后面的一对眼睛不大，但却灵活而又专注。在他来到微软中国研究院之前，已是计算机视

觉计算领域中的成名人物。老实说，这样的人全都有一副傲骨，眼睛里面是很难糅进几个人的。在他看得起的少数几个人中，李开复是最重要的一个。他 10 年以前进入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读博士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学校曾出过两个了不起的中国学者，都是来自台湾。一个是许峰雄，此人后来主持完成的“深蓝”，战胜了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由此轰动世界。另外一个人就是李开复，那时候他在学校里的名声甚至还在许峰雄之上。“我进学校的时候，大家都讲他们的故事。我就想，努力 10 年吧，也会做得那么好。”沈向洋后来说。不过，他的真正了解李开复，却不是因为李开复是他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师兄，甚至也不是因为李开复以往的学术成就，而是几年以后一个转瞬即逝的场面。那时李开复是苹果公司的副总裁，沈向洋则以学生身份在苹果公司实习。有一天李开复召集下属开会，大约是说到了不得不裁员的事情，正说着，一个雇员就冲着李开复大骂起来，其用语即使在最粗鲁的美国人中也极为罕有：“×你妈，别跟我来这一套。”沈向洋不由大惊，以为李开复会动用老板的权威压制属下。却不料李开复的语调平静得出奇：“你这样讲是没有意义的。你如果不同意的话，可以给我一个建议。你认为应该怎样去做？”沈向洋多年以后还能清晰地记得，那个人的脸立刻就红了。“我当时觉得李开复这个人真了不起，”沈向洋说，“风度，胸怀，全都没得说！”

张亚勤是计算机领域当之无愧的“世界级科学家”，其成就覆盖在数字影像、视频技术、多媒体通讯和因特网诸多领域。他是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IEEE Fellow），还获得了美国 1998 年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这一奖项已有近 70 年的历史，在美国电子工程界颇负盛名，以致克林顿总统特意给张亚勤写来贺

信：

亲爱的张亚勤博士：

我非常高兴地祝贺你荣获 1998 年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

你真正地理解了努力工作和责任感的价值。任何人都必须付出巨大努力方能获得成功，相信你所取得的特殊成就更需汗水与智慧。对于其他所有人来说，你是一个灵感的启示。

最衷心地祝愿你获得新的成功。

比尔·克林顿

自从 1999 年 1 月，张亚勤就成为中国报纸上一个时髦人物。他在世界计算机多媒体领域的成就，甚至还在李开复之上，但两人性格迥然不同。李从外表到思维全都属于文质彬彬、严谨细腻的一类。作为一个领导者，有的人小事精明，大事糊涂，这是最糟糕的。有的人大事精明，小事糊涂，已属难得。李开复则是大事清醒，小事周全，能用简单的话将极抽象的问题条分缕析，即令事物的细节也能想得清清楚楚。张的外表圆浑忠厚，憨态可掬，开口的时候轻声曼语，举大体不论细节，无论多么复杂的问题，总是能够一语中的。李在意自己外在的形象，擅长公关，对记者说话的时候总是能把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张似乎从来不在乎公众对他的看法。他在过去几年获奖无数，但却从来不肯把他的奖状奖杯放在办公室里。有一次同事把他接受“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的照片挂在走廊上，他看了，当场摘下。他不喜欢把时间花在记者身上，甚至还会对那种虚浮轻狂的记者抱有几许蔑视。李开复或许也有大致类似的想法，但他绝对不会像张亚

勤那样流露出来。

1998 年秋天，当李开复为研究院到处物色首席科学家的时候，计算机界的同行纷纷推荐张亚勤。经过一番周折，两个人终于在电话中相识，然后如约见面，一见如故。“我和开复聊了两次，感觉很好，”张亚勤这样评价他对李开复的最初印象，“说实话，他的能力远远超过了现在的职责，当这个院长是屈才了。”李开复则使尽浑身解数游说张亚勤到中国来，他认定张亚勤是计算机领域里的“一面旗帜”，此人若能来到北京的研究院，必可带来一大堆才华出众的人。

事情的发展果如李开复所料，张亚勤决定加盟微软中国研究院之后，消息立即在美国同行圈中蔓延开来，一时间，到处都在半信半疑地相互询问：

“怎么，连张亚勤也去啦？”

“一点不错，是张亚勤。”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打量微软中国研究院。一个月后，李世鹏回来了，两个月后，李劲回来了，又过了 6 个月，朱文武回来了。在希格玛大厦，至少有 3 个人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不是看到张亚勤回来，他们不会想到要回中国来。

张亚勤——属于全世界的财富

在美国计算机领域中，张亚勤的确被认为是华人的骄傲。“在美国工程界的所有来自大陆的中国人中，无人能出其右。”芮勇坐在雷德蒙市最豪华的中国餐馆“豪苑”中，一边喝着中国茶一边表达他对张亚勤的敬佩。张亚勤的经历在美国计算机业的华人圈中，的确被描述成一个传奇故事。当然对他的钦佩不仅仅来自华人，也来自一些最有智慧和成就的美国人。“和他相处不到一星期，我就意识到他非常特殊。”瑞曼德·比克赫尔茨教

授说。瑞曼德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主任，还拥有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通讯学会主席、美国科学院院士等等头衔，在世界电气电子工程界享有很高声誉，也是张亚勤读博士期间的导师。谈到自己当年的学生时，瑞曼德有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感慨：

“他真的是全世界的财富！”

但是张亚勤本人不同意这些说法。“咳！总有几成水分。”他这样说。按照张亚勤本人的说法，记者们在介绍他的时候，多有不实之处。比如说他在美国领导着几百个美国人从事科研，就有极大水分。但他的确在新泽西州的桑纳福实验室领导过一个40多人的多媒体实验室，还创办过两家公司。有一个时期，国内的报纸上把他们这些人说成是“世界级科学家”，当他在中国南北行走的时候，这几乎成了他的一个“头衔”。同样的头衔还用在李开复、沈向洋和张宏江这三个人身上。一位中国记者拿这个问题去询问图灵奖得主、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罗杰·瑞迪：“我想知道，这种说法是不是夸张？”

“绝对是事实。”罗杰·瑞迪回答。

但张亚勤却有一番更加苛刻的评价。他认为这种说法本身并非夸张之词，但正在引起误解。他说：“‘世界级’在国外是一个常用的词，不是国内理解的那种世界名人或者大师，只能说是一流的。一流的人不止一打两打三打，所以这个称谓不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只能说，我们这些人在多媒体方面是受人尊重的，做得比别人好一些，别人知道你的名字。计算机的世界浩瀚无比，大的方向就有无数，把一个大的方向分割成许许多多领域，把一个领域分割成许许多多方面，把一个方面分割成许许多多题目，我们的成就，只能说在某个题目，充其量是某个方面——比如我在多媒体视频方面，开复在语音识别方面，沈向洋在视觉方面，

张宏江在视频搜索方面。说得更多，就是水分。”

然而张亚勤极为看重“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的荣誉，不仅因为这是一项难得的殊荣，还因为他在这个协会 110 年的历史上开创了一项新的纪录——最年轻的院士。他获得这个荣誉的时候刚刚 31 岁，直到今天，他对这一点仍感意外。这个协会产生于美国，但却是一个世界性的组织，其规模也是世界最大，举凡电脑、电子、能源等等电气电子工程领域，都包括了。有 40 多个分会，30 万会员。不过，院士只有几百个。这些人在全世界都受到尊重，有如我们国家的两院院士。张亚勤说：“能够成为这个协会的院士确实不容易，只要想想中国人中寥寥无几，就知道有多困难。”

张亚勤是山西太原人，但他的童年时代几乎都是在晋南运城的外婆家里度过的。由太原而运城的转移，在他看来是一段虽然惨烈但却被轻描淡写的经历。“文革”开始的那一年，他才两岁，父亲莫名其妙地不见了。亚勤过了几年没有父亲又渴望父亲的日子。有一天，家里忽然一团糟，在一片悲怆的气氛中，他知道父亲死了。那一年他 5 岁，以这样的年龄，还不能完全洞悉死的含义，但他知道父亲从此再也不会回来了。母亲在父亲去世之后重新结婚，也许是不希望将往日的阴影带进这个新的家庭，所以很少对他说起父亲。

“我是外婆带大的，”他有一次说，“我的初级教育是外婆给的。她经常给我讲一些故事，告诉我要独立，不要依赖别人。”外婆有些文化，不太多，认识字，会算账，这在那一代中国妇女中已经少有。亚勤在 6 岁那年被送到外婆家里，也许是因为他的记忆中从来就没有过父爱，所以也没有一点失去父爱的阴影。“从来没有过，因为没有对比。”他说。多年以后，他自己也有

了一个女儿。看着女儿在新泽西温暖的阳光下欢呼雀跃的样子，张亚勤终于意识到久久积蕴在心中的那种“父亲情怀”。“我的女儿如果没有我，肯定不行。”他说，“直到那时我才想到，假如当初父亲在的话，我的童年可能会不一样。”

以上种种情节，在迄今为止描述张亚勤的那些文章中全都没有提及，他本人也极少向别人提起。在旁人的印象里，他是一个一帆风顺，平步青云的幸运儿。他在成名之后，只有一次对记者说起这些往事，语气平淡从容，心绪也无一丝波澜，让人觉得他要么城府极深，要么就是健忘。记者不禁问道：“你是不是一个不太喜欢回忆过去的人？”他笑了，说：“也不能那么讲，应该说没有时间。有时候想起来，也是比较近的未来。没有时间想那么久远的事。”

张的兴趣广泛，但却具有将精力长时间专注于一件事情的能力。他常常一连数日闭门不出，沉浸在他的多媒体世界，但他也喜欢做生意，对风险投资和股票买卖都有兴趣，还喜欢下围棋，打球，玩扑克牌。他的言谈平稳，节奏缓慢。每逢这种时候，让人觉得他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大一些。但他也喜欢不动声色地开玩笑，常会把一些笑话说得像真的似的，有时候还会情不自禁地表现出一种顽童的秉性。比如他会在电梯门打开的一瞬间突然转身跑开，从楼梯飞快地拾级而上，然后在三楼的电梯口笑容可掬地等着你出来。清华大学的硕士生潘锦辉在跟随他工作了几个月后说：“他是那种又能做事又能玩的人。”的确是，他无论是玩还是做事，都喜欢赢。他信奉“要么世界第一，要么就不做。”下围棋的时候如果输了，他会心急火燎地拉着人家再来一盘。“制胜”与其说是他的性格，不如说是他的天资。但在他的兴趣世界中，有两样东西是被排除在外的：一个是“政治”，只是在极为罕见的情形中，他才会对政治倾注内心的激情；一个是

“小事”。“从小就看穿了一些事情，用时髦的话讲是超越。不太在乎小事了。”他这样说。

他的所谓“小事”，有时候包括了一些在旁人看来很了不起的事情。1978年，张亚勤12岁的时候进了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记得这“少年班”在当时的轰动。“文革”之后，百废待兴，我们的国家一时间出现了“渴望人才”的气息。于是大家拼命寻找“天才儿童”，希望他们能够在转瞬间成为振兴中华的栋梁。第一个入学的孩子叫宁铂。他立即就成为世人谈论的话题，有的说是“神童”，有的说是“少年奇才”。实际上少年班中大部分孩子那时候都成为舆论追逐的对象，但张亚勤是个例外。母亲不许他接受记者的采访，还告诉他名声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在那个火红的年代，这孩子只是默默地读他喜欢的书，默默地玩他喜欢的游戏，不同所谓“神童”的舆论发生任何瓜葛。20年后，情形居然发生戏剧性的变化，“神童”宁铂归于平淡。这时候世事再次显示出它的冷暖无常的本色。报纸上开始拿宁铂作为不成功的代表，诉说“拔苗助长”的种种坏处，其情绪激昂和理直气壮，有如当年诉说“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种种好处。张亚勤却开始成为记者们新一轮追逐的对象。这情形让人想到中国古代“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故事，沉浮逆转之势，既有喜剧效果，又有悲剧味道。不过，张依然保留着20年前的信念。“宁铂那时候很出名，这和他第一个‘神童’有关。但他的确很聪明，才气很高。”张这样评价自己当年的朋友，“虽然他后来有些挫折，但少年班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评价还早。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标准不一样。我们都是三十出头。这个年龄的人很难讲是成功还是失败。”

但张亚勤本人的成功却是大家公认的事。当他回到国内，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担任首席科学家的时候，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会

受到“英雄凯旋”般的欢迎。他在中国科技大学8年，完成本科和硕士课程，又在1986年离开科大赴美，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得电气工程博士。然后成为普林斯州的桑纳福多媒体实验室的总监。桑纳福是美国四大研究中心之一，其历史上最辉煌的记录是发明了电视，所以被誉为世界“电子技术的摇篮”。张亚勤的研究室总监之职，是中国人在这个研究领域中所担任的最高位置。13年后也即1999年3月，他回到合肥做学术报告那天，母校把欢迎他的活动搞成了一个盛大的节日庆典。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向他涌来，希望一睹他的风采。报纸上说，人流挤破了门。张亚勤这一回终于承认记者的描述不是夸张。他说：“那情景让我很受感动。”学生把演讲大厅挤得满满的，从座位到讲台，一直排列到距离他不到一米的地方。而外面的学生还在不断地涌动着想要进来，终于挤破了门上的玻璃。他所尊敬的老师们都已两鬓苍苍，现在也淹没在年轻人的海洋中，不无感慨地望着他们今生今世最大的“骄傲”。

张亚勤早就听说宁铂毕业后留校任教，眼下却说不清楚是不是希望在这种场合看到他。会场上不少经历了这20年世事变迁的人，这时候难免在心里升起一个莫名的问号：假如当年出走美国的是宁铂，而张亚勤留在宁铂后来的位置上，那么今天两人的情形是否也会发生逆转？事实上，张亚勤不喜欢人家拿他和宁铂做比较，尤其不喜欢自己成为公众人物，他讨厌成为明星的那种感觉。

尽管大多数明星都有过一个艰苦奋斗的历程，但做明星和做事情终究不是一回事。一个人一旦成为明星，也就失去了做事情的本色。张亚勤以往做出来的事情，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视频传输；一个是数字电视。他是这两个领域中的佼佼者。90年代初期，美国人认定数字电视是未来的方向，于是集中了一大

批最聪明的人来攻克这个全新的领域，张亚勤是最早介入的人之一。他的贡献在于开创了一系列数据压缩的新算法，使得图像数据能够压缩得更小，传输更快，质量也更好。他的发明后来成为一整套最新国际标准中的重要部分，为全世界所有进入这个领域的人共同遵循。在计算机的领域里，创立一种能够影响世界标准的技术并非易事，有些人毕生奋斗未必能有所成，而张亚勤居然能在 31 岁以前就创立出 50 多项技术。若非天赐良才厚遇，实难想象。然则张亚勤的幸运更在于，他在世界第一流杂志上连续发表的近百篇论文，以及 11 种专著，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他后来获得的一系列荣誉，与他在这些领域里的贡献有着直接的关联。他是美国这个领域中拥有最多论文和最多专利的中国人。1999 年 3 月，当这个圆脸浓眉的东方人接受美国“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的时候，一份描述他的杰出贡献的清单，在同行中间流传。对于那些外行人来说，清单上的专用名词不免枯燥难懂。所以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自己手上拿着的和家里摆着的东西，就可以感觉到，张亚勤和他领导的桑纳福多媒体实验室对于人类进步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影响：因特网、数字电视、电视上网、手机上的视频、可视电话、电视台节目制作、掌上电脑、DVD……都包含着“数字视频”的应用。

荣誉这东西，有点像是一副反方向运动的“多米诺骨牌”。一旦你的面前树立起第一个，后面的就会接踵而来。自从成为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的院士之后，张亚勤面前的荣誉一个接着一个，挡都挡不住。人类有些毛病会因地因时而异，但另外一些毛病却有可能是共同的。比如中国人喜欢为强者助威或者贬损弱者，“追星”或者“墙倒众人推”，美国人也难免会有这样的毛病。张亚勤觉得自己要成“明星”了，不免心中不安，逢人就说：“事情不是我一个人做的，我只是做得比较早。”有人以为

是他发明了数字电视，他赶忙纠正：“任何人都不能说自己发明了数字电视。”他不谈自己的成就而去谈论宗教，说他在美国的时候对宗教特别有兴趣。虽然还谈不上信教，但他常常在周日带着家人一同去教堂。又说他到台湾访问的时候去了故宫，看到王羲之书法和清明上河图，为中华文化的永恒和历史的博大所震撼，不禁觉得计算机技术真是渺小，而且转瞬即逝。

“因特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对一个朋友说。

朋友说：“因特网统一了全世界。王羲之的字现在有几个人看呢？”

“为什么要统一全世界呢？”他反问。

此人少年得志，大器早成。现在他觉得自己应该更加潇洒一些。“喝茶，吟诗，下围棋（据说他是围棋业余五段），像古时的文人那样，与世无争，多好啊。”他有一次这样说，“像现在这样搞技术，最要紧的就是争胜。一天不胜就会被淘汰……”说话间忽然长叹一声，“为什么一定要战胜别人呢？”言谈中居然有一些“求败不成”的孤独，但他也许是在故意淡化自己昔日的荣誉。倘若如此，则证明对自己的未来仍有足够信心。

1998 年 12 月，张亚勤终于接受了李开复的邀请，加盟微软中国研究院。微软人说他选择了微软，中国人说他选择了中国，其实都只是说对了一半。他这样来解释自己的动机：“如果是到微软在美国的研究院，我可能不会考虑。我想回中国，但如果中国没有这样一个微软研究院，我也不会回去。因为中国和美国的差异太大，我一下子接受不了。现在是中国的微软，正好。”

现在，他必须像李开复一样设想搬家的问题了。他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有一个很好的家。妻子汪健是华尔街日报电子版的资深分析师。她是安徽马鞍山人，也是张亚勤在科大的同学。“我们的感情很好。”张亚勤提到妻子的时候总是这样说，“我觉得

她很不简单。有见识。很多事情，她看得比我更加清楚。”当微软面临难缠的官司，导致股票大幅度下跌的时候，妻子的“很简单”的见识再一次得到证明。那个“黑色的星期五”，汪健把电话从美国打到北京，告诉张亚勤，她对微软仍然信心十足，尽管现在公司的麻烦一大堆，但那些最基本的东西没有改变，眼前的动荡只是暂时的。还笑说：“如果没有这个动荡，你就没有那么多新股票啦。”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她是对的。现在，她觉得张亚勤的选择是对的。夫妻俩着手搬家，女儿6岁了，自从知道了要回到中国，就不住地问爸爸：

“我们要把东西都搬回去吗？”

“都搬回去。桌子、椅子，还有你的玩具。”

“那我们家的墙能搬走吗？”

女儿找工作竟是这样的局面

1999年1月15日晚上8点钟，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北京已是漆黑一片。张亚勤和沈向洋住进香江花园距李开复别墅不远的一座公寓。“生物钟”还没有倒过来，两个人一半清醒一半昏沉地过了夜。第二天一早，李开复进来。为了说服这两个人加盟研究院，他花费了不少心血，现在终于聚首香江，不禁长出一口气，“你们的头发太长，先去修一修。”他说。

1月的北京干燥寒冷，不像雷德蒙的冬天多雨湿润，温暖如春。“不下雨的时候，雷德蒙几乎是天堂。啊，蓝色的天，绿色的树！”沈向洋后来无数次地这样念叨。北京没有茂密的红杉和如茵的绿草，倒是不下雨，不过，天上总是白色的，空气质量也差，让沈向洋觉得眼睛难受。

3人驱车驶出香江花园，沿京顺公路西行，折向北四环路，20多分钟以后，希格玛大厦就在眼前了。

五层楼的气氛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热烈。没有欢迎仪式，甚至连寒暄也没有，只有一群求职的博士在等待着他们面试。其冷清的气氛，与 1995 年 8 月 24 日微软公司发布“视窗 95”时轰轰烈烈的场面形成对照。后者被舆论广泛张扬，成为世人心中微软的形象，实则微软人在每年的 365 天中，有 364 天都是在这样冷清的气氛中度过的。瞬间的辉煌，不过是长久寂寞的一个句号和一个起点。

这是张亚勤和沈向洋第一天以微软中国研究院员工的身份来上班。对这两个人来说，眼前来求职的博士们并不生疏。沈向洋一看到他们就会想到他在美国带过的几个中国学生。那时候他觉得中国学生非常优秀，常常禁不住赞叹他们的聪明。其中一个学生对他说：“像我这样的在国内很多。”这话令他经久不忘。在 1998 年秋天研究院成立的那天，他虽然还没有答应李开复回来，但却已在心里打算去国内的大学寻找那些聪明人。此后一周他走了不少地方，演讲，交流，结识的人不是教授就是博士。谈到那次旅行，他说他最大的感受是“中间少了一代人”。和他一起坐在台上的国内的研究者，都是老一代人。唐荣锡 70 多岁了。他的学生彭群生也有 50 多岁，算是年轻的了。“我才 30 多岁，和他们坐在一起，真是不好意思。”

但他终于发现他的学生所言不虚。他惊叹国内学生的聪明，可却奇怪这些聪明人的研究为什么那么不聪明。想到自己在出国之前和他们都是差不多的人，这才忽然意识到，这十多年国外的经历令他走了多大的一步。当然他在国内也看到一些值得敬佩的人。他说，这样的人在他的专业领域里至少有 3 个：浙江大学的彭群生、西安交大的郑南宁，还有马颂德。3 个人各有专长，共同之处是，全都是从国外学成回来的博士。“完全是环境造就人。”他后来对朋友感叹道。尽管如此，他总是不相信这么聪明

的中国人会一事无成。他还记得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博士生韩玫，还有自动化所的柯启发。“他们的天赋在我之上，”他说，“带这种学生，当老师的感觉非常舒服。我为什么到中国来，也是为了这个。”

新年到来之前，沈向洋带着这个念头回到美国去了，试图说服妻子跟他一同到中国来。可在这边，批评研究院伸手“抢人才”的消息不断传到希格玛大厦，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高校的校园。这情形令陈宏刚担心。他向李开复建议，加强研究院与高校之间的联络，请10所最著名的大学推荐自己最好的学生。但是，国内很多大学负责分配的老师却说研究院的招聘开展得太晚，学生们虽然在夏天毕业，却是在头一年秋天已经开始纷纷求职。还说，最好的学生都出国了。清华大学说，他们首先要考虑中国自己的企业，给外企的招聘名额是有限的，不能超过3个。陈宏刚苦口婆心，终于被允许可以选择7人，但却必须另外交给学校一笔钱。陈宏刚有点奇怪，但学校分配办公室的人告诉他，这在中国为政府公文允许，叫做“培养费”或者其他什么名目。既然如此，微软只好照“章”给钱。不过，这样一来，看上去就真的成了报纸上说的，微软“出巨资抢人才”。

尽管如此，在第一批招聘结束之后，来申请职务的人更多了。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这叫陈宏刚很惊讶。“中国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才。”他说。计划中的招聘人数虽无定额，但算下来不过1%的录取概率。他建议增加笔试一道关卡。李开复同意了。于是，凌小宁设计出一套题目特别的考卷。1月中旬，希格玛大厦设立了中心考场，数百人先后应试，仍然不能覆盖所有提出申请的人。陈宏刚在那些天基本上是在天上度过的。他带着考卷，从北京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到西安，从西安到上海，从上海到武

汉。他不停地飞来飞去，但飞机的速度毕竟赶不上网络上电子数据的传输。他发现大学生们正在使用电子邮件传递他的考卷，所以他在一个城市里考完之后，另外一个城市的学生立刻就知道了，然而陈宏刚仍然锲而不舍地继续他的“飞行考试”。

最后一站是武汉，那里只有武汉大学计算机系的一个女学生报了名，名叫张黔。按照 1% 的概率来计算，此人的机会极少，但陈宏刚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他在当晚抵达，住进武昌最好的酒店湖滨花园，立即打电话给张黔，说是请她来考试。张黔来了，一进门便看到自己的简历放在桌上。她 7 岁上学，从小学到博士，读书 20 年来经历考试无数，但眼前这样的考试竟是从未见过：考场设在酒店客房，没有监考老师，考生只有她一个人。陈宏刚把卷子递给她，只说了一句“考一个小时”，就出去逛街了。

张黔从小到大都是那种让父母包办一切的女孩子，就连对计算机的兴趣，也是父母包办出来的。她不像那些“电脑神童”，不是那种伴随奥林匹克竞赛长大的孩子，家里没有计算机，上计算机课的时候，顶多觉得还不算枯燥。到了考大学的那一年，她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报考哪个专业。父母对计算机一窍不通，只是凭着直觉，认定这东西有前途，就替女儿选择计算机专业。没有想到张黔一上手就有了兴趣，而且她对那种把计算机世界划给男人的说法特别不服气。“很多人说这是男人的世界，其实只是男人能在这里泡的时间多一些，”她说，“男人女人在思维方面没有不同。”

1998 年暑假刚过，张黔开始找工作。贝尔实验室到武汉来，为它们设在北京的研究机构招揽博士，张黔去应聘，贝尔一见倾心，立即给了她聘书。就在她要和贝尔签合同的时候，忽然在因特网上看到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的消息，不禁叫道：“发生了这

样的事情，怎么没有我的份呢？”

她立刻放下贝尔的合同，将简历送到微软的网站上，然后忐忑不安地在家里等待微软的回音。根据她对微软非常有限的了解，她知道微软是“男人的世界”，而自己毕竟是个女的。现在，经过和陈宏刚第一回合的接触，她觉得微软的考试真是轻松随意。考官和她一对一。随便聊了几句家长里短，就结束了。她那时并不知道，这是一次覆盖全国的考试，更不会想到，严厉的事情在后面呢。

陈宏刚回到北京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告诉李开复，他在武汉发现一个学生，人很聪明，是个女的。微软公司的招聘制度一向不论性别和年龄，这倒不是微软格外大度开明，而是美国社会的通例。说它“男女平等”、“老少皆宜”，那是夸张之词，但若有人拿到哪个公司仅仅因为性别或者年龄就拒绝聘用的证据到法院去告状，就有极大可能胜诉并且让它难堪。事实上，张黔很快就感觉到微软对她的重视，因为另外一次更加严格的考验在一个星期之后来到。那一天她再次接到微软的电话，说要为她安排正式的面试，但在此之前，将由凌小宁博士通过电话向她询问一些情况。

对于这种方式的考察，不要说张黔，就连她的饱经世事的爸爸和妈妈也是闻所未闻。爸爸妈妈都是学采矿的，大学毕业后在湖北省煤矿厅工作。他们那一代毕业生都是政府分配工作，现在看到女儿找工作竟是这样的局面，觉得既意外又紧张。当天晚上，张黔在一个小屋里静静等候。电话果然从北京打过来。她原以为又是一次“湖滨花园式”的轻松闲聊，可马上就意识到“这一次是来真的了”。对方的问题一个追着一个，全都围着一个主题，层层逼进，特别紧迫。一个小时不一会儿就过去了，那边终于宣布结束，张黔感觉到自己长长吐出一口气，身心疲惫，

同时感觉到电话那边的人也松了一口气。她走出小屋，望着张口结舌等在外屋的爸爸妈妈说，这在她可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小时”。但她觉得电话那边的“考官”对她是满意的，所以又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可是这还不是真正的面试！凌小宁只是在决定要不要给她正式面试的机会。张黔远在武汉，要她来京面试，微软要提供来回飞机票，提供食宿。可她的简历表明，她的专业并非微软所需，户口又是外地的。所以，张黔知道，微软对她的认真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她对微软。当她接到微软的电话要她登上飞机北上京城的时候，自信成功已经伸手可及。

现在到了1月15日下午，也即张亚勤和沈向洋的飞机即将飞向北京的时候，张黔也登上南方航空公司的飞机向北京飞来。当晚下榻燕山大酒店。次日上午9时，她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见到未来的老板张亚勤。在张黔眼里，张亚勤的样子挺随和。他告诉她，他是第一天来上班。她则告诉他，她整天听到微软这个名字，使用微软的软件，但却是第一次和微软的人面对面。

这一天有两批人来面试，张黔这一批有7个人。每个人拿着一张单子，上面的时间表告诉他们，将在哪一个小时与哪一位“考官”见面。考官坐在一个一个的小房间里。张黔和其他应试者一样坐在休息厅中，一边喝着免费的可口可乐一边等候。看前面一个人走出来，后面一个便走进去。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人搬来一大箱子“肯德基炸鸡”，应试者坐在“火药库”。考官坐在“造纸坊”，各自大嚼同样的食物。张黔在这一天连续见了5个“考官”。这个细心的女孩子走进走出，发现考官们不断地发出电子邮件，和另外的人说些什么，心里难免紧张。不过，张亚勤的憨厚模样令她轻松。张的问题更像陈宏刚的海阔天空而不像

凌小宁那样咄咄逼人。张黔说自己喜欢做研究，在和陈宏刚谈过以后，就不再想到贝尔而想来微软工作。还说，她总想提出自己的想法并且把这种想法变成现实，但她发现贝尔重在做产品，“更多的工作可能是去完成别人的想法”。她提到，陈宏刚告诉她在微软研究院可以更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也提到凌小宁那个电话令她紧张。但直到这时，她对面前的张亚勤还一无所知。

完成面试走出希格玛大厦的时候，她打开手上的那本微软中国研究院《通讯》的创刊号，随手一翻，就看到《我们的大家庭》这一页，张亚勤的照片和简历赫然在目。张黔只读了第一段文字，便一声惊呼：“原来他是这么一个大人物！”接着又在心里埋怨自己的孤陋寡闻：怎么过去对此人竟是从未听说？“我还从来没有跟过世界级的专家，”她说，“从来没有体会过和世界级专家谈话是什么感觉。”她后来承认。正是这个瞬间对她发生了重大影响，因为她就是在那个时候决定：非微软不“嫁”。

人生最简单也最难实现的两个理想

20 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中国的年轻人中正在兴起一股力量：相信才能，相信智慧。他们眼睛里面的“伟人”和他们的父辈眼睛里的“伟人”是完全不同的。在他们父辈活跃的那个时代，权威和政治表现被看得高于一切，这与他们的想法几乎背道而驰。即使在最和谐的家庭中，儿女还是会对上一代的意识形态情结不屑一顾。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人才反馈理论”，在越是年轻的人身上，就越是可能得到验证。

1999 年 1 月底，张亚勤到美国出席一个多媒体技术大会，这样的会议每年一次，会场集中了全世界多媒体领域的精英人物。熟人相见，彼此问候。张亚勤再次成为人们包围的中心。这倒不是因为他是大会主席，而是因为他回到中国的消息传了出

来。过去一年里，张亚勤一直都是多媒体世界“小人物”心目中的英雄。有如李劲所说，大家“与其说是相信中国，不如说是相信张亚勤的选择”。那时候李劲是日本夏普公司美国分公司的研究员，同样对“张亚勤的选择”感到惊讶。5年以前，他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认识了张亚勤，从此便在心里把这个人当作榜样，现在听说张亚勤去了微软，去了中国，脑子里面第一个反应就是，“哟，张亚勤去了！”然后是第二个念头：“他为什么想要回国呢？”

他说他之所以对回国的念头感到惊讶，是因为国内的研究水平太低，在任何一个国际会议上，没有什么高水平的国内的论文：“咳！也别客气了。不是‘没有什么’，根本就没有。”他说。这是他当初想要出国的“最重要的原因”。他始终认为国内并不具有激励他向上的环境。不过，就从这一天起，李劲的想法变了。他说：“我并不了解微软中国研究院，但我了解张亚勤。我相信他的选择总有道理。”

李劲在清华大学好几届学生当中享有盛誉，还是上海中学生们崇拜的偶像。他出生在上海，但却没有江南人那种纤弱的样子，身高体胖，宽肩膀上顶着一个硕大的脑袋，脑袋里面汇聚着各种新奇的念头。当他把两只手伸到后面抱住头仰面朝向天花板的时候，也就是他的新思想不断涌动的时候。他喜欢在说话的时候伸展四肢仰在靠背椅子上，还喜欢把他的各种成就挂在办公室的墙上。当他在1999年6月回到阔别多年的上海时，报纸上出现了一个让整座城市的孩子为之着迷的题目：“电脑娃娃回来了！”

他的“电脑娃娃”的称誉，与邓小平有直接关联。那是在1984年，邓小平到了上海，李劲在电脑上展示了他的编程技巧。

邓小平摸着这孩子的头说了那句著名的话：“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

那时候李劲才 13 岁，已经是上海少年宫里一个挺出名的电脑迷。那时候少年宫的计算机都是人家捐赠的，用金星彩电做显示器，分辨率很低。不过，李劲第一次看见它的时候，特别兴奋。“做一个航模要好几天，还要花很多钱。但在计算机前你不用花什么钱，只要动脑子，立刻就看到你的想法实现了。”李劲后来回忆道。他在 12 岁那一年编出了他的第一个程序。那是一个高射炮打飞机的游戏，大约 100 行。他聚精会神地写了两天，然后叫来很多孩子，得意地在电脑上显示自己的创造。

那时候大多数孩子都把时间用在考试上。智力过人的孩子去参加课外的竞赛，但也都是物理化学数学之类，他们要依靠这个上大学。计算机不仅不是什么主流，而且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计算机是什么东西。李劲的父亲也不知道。不过，当李劲第一次给他描述计算机的时候，他也着了迷，从此便鼓励和支持李劲在计算机领域中的一切热情和希望。

第一次参加全市的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李劲获得第一名。于是他和另外几个孩子一起组成一个更高级的培训班。他在这里遇到了他的第一个计算机老师王松赞。他是上海一个工厂的技术员，也是少年宫里的职业指导，上海市 80 年代涌现的无数“计算机娃娃”几乎都和他有缘。

邓小平来少年宫参观的那天，李劲演示了他做的程序。他只记得那是一个火箭，对于其他的事情就全都不记得了。他后来看到一段录像，证明邓小平当时的确和他在一起。邓小平看完他的表演，站起来和他握手，问他几岁，他说 13 岁。录像到此为止，至于邓小平摸着他的头说出的那句话，录像上竟是没有。李劲说，那是他的老师王松赞后来转述的，“所以我就认为这是真

的”。记者们也相信这是真的，在报纸上广泛传播。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句话为李劲所在的少年宫和上海中小学带来极大好处。李劲发现，他周围的电脑设备一下子多了起来，孩子们学习电脑的热情暴涨，他不知道的是，全国都在流传邓小平的那句话，上海以外的孩子们，也在纷纷奔向电脑。

李劲出名了，当然这不仅仅是由于邓小平摸了他的头，还因为他的确具有“神童”的天赋。他参加了无数竞赛，拿到很多奖。但是他说他从来不为这些赛事做任何准备。“竞赛的准备是零，”他说，“不做什么题。竞赛就是反应快。不是靠做题，是靠天赋，靠心情平静。心态比你做 1000 道题还重要。”

他讨厌学校里没完没了地讲同一个东西。他的体育很差，跑不动，跳不高，但对知识的悟性极高。他看出课堂上的新知识其实不多，老师嘴里说的很多东西，不过是同一个知识点在不同场合的应用。你灵活的话，就能举一反三，不灵活的，就只好不断做题。他说：“掌握了这个窍门，一个‘笨孩子’就能变聪明。一个聪明孩子就能成‘神童’。”他在初中的时候学了高中的课程，在高中学了很多大学的课程。16 岁那年，他就免试进了清华大学。

然而这个天赋极高的年轻人终于遇到了难于排解的烦恼。

他选择了电子系的图像专业，仍然是他那个圈子里面最优秀的学生，他用三年半时间学完了本科和硕士 7 年的课程，又用三年半获得了博士学位，像他的同学说的，也像报刊上广为传扬的，他是“清华园里的神奇小子”。可是他却发现，他的一连串“优秀业绩”，不过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

严格说来，让李劲烦恼的，不是有了什么麻烦，而是没有什么麻烦。直到大学毕业的时候，他还没有看到一篇像样的关于图像的论文。“大学毕业了，可是如果有人要问我：图像编码是什

么东西？你在研究的是什么？我会说，我不清楚。”到了做博士论文的时候，他决定遍寻清华大学里保存的所有关于这个领域的论文，他做到了，看了 1000 多篇。他认为他的论文不比别人的差，应该满意。但他又说：“我知道我的论文不是世界一流的。最要紧的问题是，清华不是站在世界前沿，只不过是我們国家的前沿。所以我在这里永远只是国家级的，不是世界级的。”这种烦恼在他看到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时，终于达到了顶点。那是学校图像组的很多精英以多年心血研制出的一个图像处理系统，获得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成为整个图像组 90 年代一个最大的成就，但却只卖出 5 台。

但报刊上依然在宣传李劲的辉煌，他把自己的苦恼藏在心里，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多年以后，他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研究员，也有了更多的阅历，终于和一位记者谈到了这个话题：

问：你在大学是一个最优秀的学生，但你在毕业的时候，还不知道你的专业做的是什​​么？我不懂这是为什么？一个不知道自己做什么的学生却是一个优秀的学生。这是正常的吗？

答：又正常又不正常。要做研究，本应掌握大背景：别人都在做什么？没有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了？将来可能是什么？可是我们的学校很少让学生知道这些更广阔的东西。我们很多教授，也没有了解这些东西。老师喜欢听话的学生，学生喜欢能让自己毕业的老师。老师的东西学生很快做出来，老师就满意。但这个东西人家是不是做了，来龙去脉是什么，全都不知道。老师是糊涂的，学生是模仿的。所以，一个学生可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得完全符合老师的“优

秀”标准，但也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做的东西有没有用处。

问：这些问题是你在做博士的时候感受到的？

答：是的，所以我拼命撒下大网读论文。我几乎完全是靠自己摸索。论文阅读得很慢，浪费了很多时间。有时候，费了很多时间找到的文章，发现是很糟糕的文章。

问：你当时就发现还是不行？

答：对，效果不是很好。

问：你的意思是不是，在国内做研究，由于环境的问题，你个人的努力无法弥补这种差距？

答：一个是环境的问题；还有一个是缺少领头人。我们国内的教授跟踪世界的潮流是不紧的，谈的都是老一代的东西。

问：“老一代”是指什么？

答：“老一代”的意思是 10 年。国外的热点起来的时候，大家不知道，等到国外高潮过去了，国内才热起来。

问：你是不是由于这些原因才出国？

答：是的。尤其是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我做的东西和国际的先进水平还是有一段距离。

问：你为什么没有尝试把你的论文提高？

答：很想，但做不到，我没有样本，没有见过人家怎么做的，把自己的论文提上来，太难了。有时候，不是你不会做，而是那层纸没有人给你捅破，告诉你怎么样做上去。

问：仅仅是一层纸？

答：我觉得是。有时候，导师只要在小的问题上轻轻推动一下，告诉你这个方向是对的，那个方向是不对的，什么样的东西是一流的，什么样的东西不是一流的，学生就会明

白了，并不需要手把手地教给学生怎样做。

问：你说的这个情况，对越是有才能的学生，损失就会越大。因为只有最难的问题，才能把一流和二流的学生区别开。

答：对。但我不相信学校的教授不知道这些问题。中国有很多问题，大家都可以说出来。我可以说出清华的 100 个问题，但是你让我当清华校长，我也没有办法解决。很困难，超过我的能力。报纸上都能一针见血地告诉你问题在哪里，但不能告诉我们怎样解决。

问：因为很多问题虽然发生在校园里面，但原因在……

答：校园外面。

现在，李劲发现，他崇拜的张亚勤居然要回到中国去，不免好奇地向张亚勤问这问那，还想到自己要不要考虑一下这个机会。一年以后，李劲已经是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一位研究员，回想起当日情景还能记忆犹新：“要说亚勤的回国造成‘特大震动’，那是报纸的说法。其实美国这个社会不会有什么特大震动。但当时的确对我们冲击很大。”

对微软中国研究院来说，张亚勤的出现是一个重要标志。“提起张亚勤，没有人不知道。”李世鹏这样说。无论他到什么国家去开学术会，说起“微软中国研究院”，很多人会摇头说“不知道”，但他一说“张亚勤在那里”，人家就会露出惊讶的表情说：“啊！张亚勤！”李世鹏在 1998 年 12 月提出来研究院工作的申请，那时候他是张亚勤领导下的美国桑纳福实验室的一个研究员。他性格内敛，说话不多，但却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解决别人不能解决的难题。自从听说张亚勤回国的新动向，他就决定尾随其后。他说：“张亚勤回国对我绝对有影响。他要是不过

来，我们这里很多人都不会过来。李劲，朱文武都不会来。可能张宏江也不会回来。”不过，张亚勤本人认定，这么多有才华的人能够来到希格玛大厦，乃是被这里的环境所吸引。“我要是跑到一个乱七八糟的地方，他们也不会来。”他说。

李世鹏在 1998 年 12 月专程回到中国来参加面试。这样的面试与其说是让研究院挑选他，不如说是他来挑选研究院。他是山东威海人。那是一座漂亮、宁静的小城。不过，在李世鹏刚刚出生的那些年，这座城市像全中国一样，既不漂亮也不宁静。爸爸是小学教师，妈妈原来也是教师，“文革”的时候下放到服装厂当了工人。李世鹏 15 岁离开威海到合肥，在中国科大读无线电系，然后离开中国到美国读书。直到今天，嘴里已经没有乡音，心里对于家乡的印象也只有两个：一个是“特别穷”；一个是“特别红”。还记得，小的时候“有很多书不让看”，幸而爸爸开明，“总是有办法弄到一些书让我看，而且什么书都可以看。”妈妈这辈子没有什么大志，只是想继续做教师，常常说，如果她能继续当教师，感觉会好得多。可惜那一代人的理想十之八九不能实现。人到中年以后，理想已经灰飞烟灭，所有希望都寄托在 4 个孩子身上。李世鹏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他总是能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在爸爸拿来的所有图书里，他对《无线电》杂志的兴趣经久不息。这兴趣在大学期间变成了做“信号处理”，到美国又是“数据压缩”和“数据传输”。他设计的一种算法，能把任意形状的物体更好地压缩，所以成为整个视频图像编码的基础。外行的读者可以把这个“基础”想象成一个巨大的工具箱，李世鹏发明的是其中一个工具，犹如一个巨大车间中的一个精密车床。这“车床”一旦旋转起来，能把高清晰度电视中原来必备的 16 兆的内存，下降到 4 兆，以致每台电视的成本降低 10 美元。技术突破带来的刺激在李世鹏是刻骨铭心的，

直到多年以后还不能忘记。他说他在张亚勤的领导下度过的那些时间都没有浪费。“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就要来。”他说，“我不是为了微软在中国，才一定要来的。而是因为，我喜欢和张亚勤共事，喜欢多媒体技术的研究。”

和自己喜欢的人呆在一起，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说起来真是人生两大乐事，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却是两个最简单又最难实现的理想。我们常常不得不和自己不喜欢的人打交道，一辈子都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现在，有了这样两个条件，李世鹏说：“人这一辈子，还求什么呢？”他的回归中国，还有什么不能理解呢？1999年旧历新年，他回到新泽西州，在张亚勤家里小聚，席间还有朱文武。李世鹏告诉这两个人，他对研究院的感觉很好，还说他已经“心动了”。朱文武说他不会“心动”，因为他没有那么大的决心把全家都搬到中国去。不过，要不了多久，朱文武也会“心动”。

1999年3月1日，李劲也回到国内来面试了。“当时我有三个选择：留在夏普、到惠普、到微软。”他首先去尝试惠普公司。那是在2月份，他到硅谷的惠普公司面试，却听说在惠普做视频研究主任的张宏江正在考虑到微软中国研究院去，这让李劲更加惊讶。在美国计算机数据检索领域里，张宏江享有“开山鼻祖”的声誉。一个张亚勤已经让人震动，现在又加上了张宏江。李劲不得不认真地对待这件事了。他和张宏江频繁交换电子邮件，张要到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种种理由，也渐渐为李劲所理解。李劲想：“至少对宏江来说，微软比惠普有吸引力。他都离开惠普了，难道我还要去吗？”就这样，两个人的倾向渐渐偏向微软一边。

像李世鹏一样，李劲一来到北京，就觉得非选择微软不可了。他把惠普给他的聘任合同放在一边，专心等待微软的聘任。

这时已是春暖花开时节，李开复到清华大学去演讲。这种演讲对清华学生来说，是大开眼界；在李开复来说，则是紧盯着有没有自己需要的人才。演讲完毕，他和清华的老师聊天，人家告诉他，清华有一个学生，16岁就进了清华，只用3年多就修完了人家7年的课程，成绩列在当年毕业生的第一名，所以号称“清华园的神奇小子”。李开复听得两眼放光，赶忙询问陈宏刚，此人现在哪里，陈说，在美国，不过已经申请到我们这里来了。李开复大喜道：“这样的人来面试，不是我们挑选人家，而是向人家推销我们自己。”

看来研究院的“自我推销”挺成功。4月10日，李劲来到希格玛大厦上班了。他说：“我终于选择了这里，很高兴。”一个月后，张宏江回来了。又半个月后，李世鹏回来了。又5个月后，朱文武和郭百宁也回来了。这样，到了1999年结束的时候，从国外回来的研究人员已经有11名。

令竞争者色变的“豪华阵容”

1999年1月16日，也即张亚勤上班的第一天，研究院的招聘达到高潮。此后两个星期，走进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博士超过了100人。

如前所述，微软在选择人的时候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原则，他们相信自己眼睛的观察和大脑的判断，不看重考试分数却看重无法用数字衡量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对于学校的评语，导师的推荐等等，并不十分在意。甚至有些导师持有强烈批评态度的学生，他们也愿意一试。他们尤其不肯拘泥于大多数中国人信守不渝的“专业对口”的观念，不看重原来的专业却看重学习新东西的能力。不过，尽管有这些独具一格的东西，当招聘全面展开的时候，我们还是渐渐看到一些通行全世界的古老规则，仍然在这里

发生作用。比如他们认定，学历越高，优秀的人就越多，因而对名牌大学的博士特别偏爱。李开复本人就认定清华大学的学生最好，在那里特别下功夫。研究院的经理们大都出自美国的名牌大学，都有着博士的头衔。依据自己以往的经验，他们认定中国的情况也必定如此，有时候还会把自己说过的“寻找潜力”的名言忘得一干二净。后来的事实证明，名牌大学中优秀学生虽然多些，但中国还有很多复杂的情形。直到一年以后，也即1999年冬天的招聘中，他们才重新想起李开复的那句关于“潜力”的名言，大幅度降低了对于学历的要求，博士不再是惟一的选择，硕士和学士常常会得到更好的评价。

随着1999年春节的临近，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人气更旺。微软中国研究院《通讯》的创刊号上，刊登出“大家庭”第一批成员的简历和照片，印制精良，色彩明快，两个月前在成立仪式上露面的，只有势单力孤的6个人——李开复、凌小宁、陈宏刚、陈蕾、杨飞和郑薇，现在多了张亚勤和沈向洋，还有几位新伙伴。有徐迎庆博士，他来自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有李江博士，他曾是浙江大学的副教授；有刘文印博士，他原来是清华大学的讲师；有蔡东风博士，他原来是沈阳航空工业学院计算机教研室主任；还有孙宏晖，他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硕士，又具有5年的软件开发经验；还有陈通贤，一个软件开发工程师。这些人原本寂寂无名，现在，他们的简历和照片同世界最著名的科学家放在一起，拥有一样的篇幅和一样的尺寸，真是前所未有的。

国内的新闻媒体，再次掀起了报道研究院招聘进展的浪潮。看上去像是不约而同，但内行的人都能看出其中有着组织的痕迹。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名叫尚笑莉的女孩子的杰作。这时候研究院还没有建立起它的公关体系，成立庆典上的轰

轰烈烈和 100 多个记者的造访，都是微软中国公司的公关经理尚笑莉和她聘请的西岸公司组织起来的。尚笑莉喜欢闲散恬淡的生活，工作起来却非常投入，表面上笑语盈盈，心里却有一片乌云。她不明白，为什么她的努力总是不能让总经理吴士宏满意。几个月后，她终于和吴总爆发了正面冲突，只好离开六楼的公司来到五楼的研究院，此是后话。现在，在 1999 年 1 月 21 日，她将京城计算机圈子的记者们再次请到希格玛大厦来。不过，不是在第六层，而是在第五层。微软中国研究院正在这里举办一个新年谈“新”会。

李开复在会上神采飞扬地宣布了张亚勤和沈向洋加盟研究院的消息。台下记者闻声交头接耳。李开复一向讨厌会场上的混乱秩序，有一次，一大堆电影制片厂的人在研究院的会场上摄像，乱哄哄的，他当场大声呵斥那些人出去。研究员们后来都说，那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看到他们的院长发火。但现在，他任由记者席上乱哄哄，不仅不发火，还有些得意。

这是李开复几个月来心情最好的时刻。这一天，他要告诉中国人的好消息实在不少。他将《通讯》上面“我们的大家庭”的第一批成员一一介绍，又宣布，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专家顾问委员会也已正式成立，第一批顾问都是国内计算机领域最著名的专家，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北京大学副校长迟惠生，和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张钹。最后说：“微软中国研究院在成立之初就已经提出，我们的目标是在吸引国内优秀人才加盟的同时，吸引更多的留学人员回国参加工作，我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记者的高昂情绪不断掀起新的浪潮。那些外行倒还没有听出什么，但内行的记者可就大不一样，他们全都听说过张亚勤和沈向洋，没有想到这两个人今天就在当场，不免惊讶。沈向洋在掌

声中演示他的一个最新研究成果：电脑屏幕上面显示出一株鲜花，在人为的操纵下转来转去，从每一个角度呈现出它的颜色和形状。

“瞧，这种技术5年后将会得到广泛应用。”李开复对记者说，“我们的三位顾问在上午第一批看到，各位是第二批看到，晚上是国内计算机界的专家和学生，国外要几个星期后才能看到。”

但记者们似乎对沈向洋的技术没有兴趣。他们更加注意的是，中国的人才一下子都跑到希格玛大厦来啦。他们不断追问有多少人到研究院来求职。李开复请记者原谅，他“现在只能提供这样一个模糊的数字，因为每个星期要面试大约40名申请人”。口气虽谨慎，得意之情却溢于言表。

记者们走出希格玛大厦，报纸上便纷纷出现了一些大同小异的话：“微软中国研究院群星灿烂”、“微软中国研究院加紧整合人才”、“微软中国研究院兵强马壮”、“清一色全是博士，却皆为华夏之子”。《中国计算机报》上这样写道：“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研究阵容，可能用奢侈来形容更为贴切，豪华研究阵容则以首席科学家张亚勤博士领衔。”尽管李开复在1月21日说的是，“最后，我们将挑选15—20名博士或准博士加盟研究院。”陈宏刚还补充说明，“微软才录取了10人左右。”但《国际商报》不知道从哪里得来新消息，说“已经或即将加盟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国内计算机专业博士有40人之多”。

那个星期的情形，确实有点像苏贵友在《科技日报》上说的：“一石激起千层浪。”《经济日报》记者蒋峥也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感受微软冲击波》，说微软中国研究院“一网”就“网”了十几位拔尖人才，该院还计划6年内在国内物色近百名研究人员，国内专家为之色变。还说，这情形真像是一支中

国儿歌里面唱的：

一网不捞鱼，
二网不捞鱼，
三网捞个小尾巴尾巴尾巴鱼……

那些日子，中科院和中国农科院在北京召开 1999 年工作会议。这种会议差不多年年都开，年年免不了议论“人才问题”，但这一年似乎有了新的话题。有人觉得报纸在庸人自扰，说“尽管微软有雄厚的实力，也不能包打天下”。有人却觉得报纸敲响了警钟，惊叹：“人才问题太突出了。科技体制改革到了攻坚阶段，必须动真格的了！”另外的人似乎有些超然物外，不置可否：“究竟是利是弊，我们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去寻找答案。”

中国新闻社的记者大约是想得到一些“人才危机”之类的启示，跑去询问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柳传志兜着圈子说，中国企业第一需要的是管理人才，他们好比数字“1”，而软件人才好比是“1”后面的“0”。软件人才可以造就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没有“1”在前边支撑，它根本成不了一个完整的数字。外国缺少搞技术开发的“兵”，中国缺少的是“将”，大家对人才需求的层次不同，暂时不会存在争夺人才的矛盾。柳传志说了这么多，就是不肯跟着记者骂微软。又有记者跑去追问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对自己的弟子李江到微软工作感觉如何。潘云鹤尽管已经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顾问，还在两个月前给研究院题词“桥架中美”，但他毕竟是中国计算机界的成名人物，不少人一见他就说，“你老兄的身上肩负着振兴民族信息产业的希望”，所以潘出言谨慎，不偏不倚。他说：“学校鼓励学生到最能发挥才能的地方，而不是最能挣钱的地方。”但记者的目标在于微

软，不能容许他兜圈子，仍然不依不饶地追问。潘云鹤只好说，“浙江大学支持学生到微软研究院工作。”他认为学生应到“最高层次”去，而微软中国研究院正是这样的地方。他口口声声，只说“学生”，就是不说“老师”。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不过，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发现，他其实在心里有着不得已的苦衷，说了上句留着下句。因为他知道，事情如果不加控制，那么涌进希格玛大厦的就不再仅仅是刚刚毕业的学生，而且也会波及大学校园和研究机构中最能干的那些老师和研究员。只要举出一件事情，就可以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李开复正在向他手下最得力的干将王坚频频招手，而王坚也大有见异思迁的迹象。这故事发展到后来，确有可能让潘云鹤心里五味俱全。

士为知己者死

王坚不是潘云鹤校长嘴里说的那种“学生”，那时候他是浙江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和系主任。他和李开复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99年1月10日。此前两人心仪已久。当研究院在1998年秋天成立的时候，李开复便给王坚发出电子邮件，邀请他参加研究院的成立庆典。王坚没有来，但却和李开复在网络上面有了往来。根据王坚的回忆，李开复至少写了5封电子邮件，每一次都约他见面。几个星期后，李开复到沪杭一带演讲，专程来到浙江大学，学校热情相待。不过，等到李开复想见王坚的时候，接待者却告诉他王坚不在。李开复快然而去。“其实当时我就在学校里，”王坚后来说，“我知道他要到杭州来，提前一天回到杭州等他。”这以后，沈向洋到浙江大学来演讲，李开复嘱咐他去找王坚，仍然未果。这使得李开复意识到不可能在学校里找到王坚了。他只好在电子邮件里面邀请王坚北上，“看看研究

院”。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如此执著地想要见面，这令王坚既惊讶又感动。他回信说：“我来北京看你。”

王坚生长在西子湖畔，却有北方人的脸盘和身材。总是顶着一头乱发，衣服皱皱巴巴，脖子前伸，走路一颠一颠的，全然一副只懂做学问而不懂做官的样子。在他的正式简历中，除了说他是“教授”、“主任”和“导师”以外，还说他是“中国人类工效学会理事、浙江大学工业心理学国家专业实验室主任。他曾经主持完成了数十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 863 计划、国家各部委以及与摩托罗拉和英特尔合作的项目”。不过，李开复一门心思要找到他，却不是因为这一连串辉煌的头衔，而是另有缘由。

几个月前，李开复一到北京，就到处寻找计算机用户界面领域的优秀人才，跑遍清华北大，居然没有！他很奇怪地问北大计算机系老师董士海，董说：“有一个，在杭州！”此人正是王坚。李开复多方打听，大家都说王坚是国内研究“人机界面”最优秀的一位。

专家们所说“人机界面”，就是人与机器连接的种种环节、人与机器交流的渠道和交流的办法。比如键盘、鼠标、屏幕、屏幕显示的画面，都是人机界面。通过这些渠道，人知道怎样把自己的意图表达给计算机，计算机懂得怎样把自己的意图表达给人。全世界许多计算机科学家在不断研究这些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计算机科学是一个“大同世界”，不分国家不分语言不分种族不分文化背景。但也有些领域可能被不同的文化背景所左右，“人机界面”即属其中之一：中国人喜欢的界面，也许与美国人有很大不同。这个道理，李开复自然能够洞悉，所以他在来到中国后所能想到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就是“人机界面”。这就难怪他要执著地寻找王坚了。

见面的地点是希格玛大厦。研究院的办公室刚刚启用，就成

了聪明人频繁相聚的场所。但这一次似乎有点特别，这是研究院中从国外回来的学者和一个国内学者的首次聚首。王坚走进门厅，来到前台，说是找李开复。一个秘书模样的女孩子问他是哪里的，他说从杭州来。

女孩子显然是新来的，她说：“让我查查电话号码。”

王坚说：“我有。”

她很奇怪地问：“你怎么会有他的电话？”

王坚说：“怎么不能有？是他自己给我的。”

她更加奇怪，不禁和左右交头接耳：“我从来没有告诉别人李院长的电话是多少啊。”

李开复给王坚写信，从来都是落款“开复”，所以王坚也从未觉得他的身份有什么特别，心想他也就是和其他人一样的一个研究员吧。现在，他忽然从对方的话中听到什么“李院长”，方知他要见的人竟是院长。

这时，李开复从里面跑出来。生人见面，难免都有寒暄时刻，但这两个人却是开门见山。王坚原以为李开复只是一个语音方面的专家，对人机界面并不在行，现在发现不论他说什么，李开复必能听出其中要害，扼要分析的时候也是一语中的，心里暗自叹服。他告诉李开复，在中国，有人认为界面就是语音识别。李开复说，语音识别只是界面的一部分，其他还有很多，“最重要的是，要有让人感觉不到互相切换的界面。”这话令王坚大为欣赏，他早就讨厌在使用计算机的时候必须做出很多繁杂动作。他说他不喜欢现在苹果公司做的那些界面，“视窗”就更加糟糕。后来他才知道，“苹果”的界面正是李开复在那里参与制作的。不过，当时他却一点也没有发现李开复对他的批评有任何不悦。正相反，李开复立刻高兴起来，问他有何高见。王说，有两部分可以做，一个是改进现在的界面，但没有什么意思；一个是

做人家完全没有想过的事情。李开复更加兴奋起来，竖着耳朵继续听。就听王坚说道：“如果今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得好一些的话，可能会帮助我们做好界面。”李开复摇头道：“没有什么人工智能的东西，只是统计的问题。”这最后一句话给王坚留下极深的印象。一年之后，他在回忆起这次见面的时候说：“现在我知道，我当时的想法是错的，他是对的。”

谈话虽然只有半个小时，但对聪明人来说已经足够。王坚发现他遇到了真正的知音。“我从没有见到一个人对人对机界面的理解像他这样深的，”王坚后来对他的朋友这样说，“他本身不是搞人机界面的。但他很理解这个东西，理解这个东西的价值在哪里，困难又在哪里。真不容易。”

当王坚怀着这样的念头回到杭州的时候，有一个电子邮件已经在那里等他。那是李开复发出的，尽管李开复很希望王坚能够加盟研究院，但他明白这会触动中国人的“抢人才”的神经。更何况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还是研究院的顾问，难道还能去他那里“挖墙脚”吗？所以李开复在信里并没有奢望把王坚弄到研究院里来，只是提出，研究院可以和王坚的实验室合作研究人机界面。这让王坚非常开心，觉得他的实验室大展宏图的机会来了。但只不过几天之后，他的主意变了。他给李开复回信说，他要到微软中国研究院来做访问学者。王坚后来说：“那是一个牛头不对马嘴的信。他说的是双方合作。我却说来做访问学者。”

导致王坚改变主意的原因说来挺奇怪，一个是学校让他“当官”，一个是学校让他“开会”。会议内容涉及“学科建设”一类话题。在学校的不少人看来，这是一个探讨学校大政方针的会议，因而异常重要，但在王坚看来，只不过“说了很多没有用的话。真没有意思”。他实在不愿意把自己的时间用在开这种会上。过去但逢开会，他就要别人代替他去，但自从这个学期开

学之后，事无巨细都要开会，并且都要系主任去参加。他发现他正在为这顶“乌纱帽”付出代价：一坐又是一个下午！

大家轮流发言，慷慨陈词，不是说“为科研服务”，就是说“替科研人员解忧排难”。王坚却在心里盘算：“美其名曰他们替我们做事情，其实是我们替他们做事情。我们有什么需要开这个会呢？是他们需要做某一件事情，却要我们来捧场，好像是为我们做的。我们不要他们管的事情，他们要来管，我们需要他们管的事情，他们管不了……”几个星期后，学校又让他当理学院的副院长。这叫他更不满意：“我已经说了不愿意，他们就是不信，居然就宣布了任命。怎么这样不尊重我的意见呢？”

他心里这样想着，不禁愈加失望，当场决定“找个地方躲一躲”。他对人事处处长说，他要出去做访问学者。处长问为什么。他说：“就是为了做一些事情。”处长说，只要系里没有意见就行。王坚心里说：“我自己就是系主任。当然不会有意见。”他连个报告也没有写，就给自己“休了长假”。

李开复见到王坚的信，当然高兴，事情一拍即合。春天刚刚开始的时候，王坚来到研究院。不过，当时这两个人心里想的都是“访问学者”，谁也没敢想别的。那时候，希格玛大厦第五层还是空空荡荡的，李开复给王坚选了一个离他最近的办公室。

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是奇怪，他们最看中的事情，就是人家对他们的理解和尊重，也即所谓“士为知己者死”。逃避了“乌纱帽”和“会议”的王坚，在希格玛大厦找到了“知己”。他不喜欢自己大学里的会议，却喜欢希格玛大厦的会议。平心而论，希格玛大厦里的会议比浙江大学多。但王坚说，在杭州开会，说的都是没用的话，在这里开会，全是学术讨论，开门见山，谁也不会拿废话来浪费时间，“这才是真正的讨论”。他还发现，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这些人，个个绝顶聪明，天天和这样的人一起，

感觉就是不一样。“在学校，也有很好的人，但你一年不一定见上一次。”

李开复感觉到王坚对研究院的兴趣与日俱增，王坚也感觉到李开复希望他把“访问”变成“加盟”。这种心照不宣的情形，有些像初恋的情人，频频传出信息却不肯言明内心的激情。不过，我们细查研究院的资料可知，直到1999年6月，研究院还将王坚列在访问学者名单中。根据王坚本人的陈述，双方把这层纸捅破的时候，已是盛夏时节。他清楚地记得，他向李开复明确表示要到微软来工作的那一天，内心的烦躁情绪烟消云散。校长潘云鹤却要烦躁了，以他的学养、见识和研究院顾问的身份，自然不能阻拦，但他却责怪王坚没有报告就一走了之。这看来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不过，潘校长还是没有想到，王坚离开浙江大学，原因只不过是那里没有李开复。

李开复在掀起一场“人才大战”吗？

那个春天，和潘云鹤具有同样感受的人至少还有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党委书记李生。有一天李生接到李开复的信，一看之下便百感交集。李开复说：“你手下有3个人，我们希望招聘到研究院来工作。”李开复说的是荀恩东、王海峰和刘挺。荀恩东和王海峰都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博士生，仅仅是个毕业分配的问题，这在制度上属于正常之列。但刘挺不同，他是教师，教师的离开虽然并不罕见，可对学校来说却有些尴尬。

刘挺这个人，李生是知道的。他从学士到硕士再到博士，都在哈工大，始终是学校最好的学生之一，其间有好几次差一点就走了。本科毕业读硕士时，他想报考清华，学校千方百计留他，他答应了。到了硕士毕业开始读博士的时候，又有北大的王选教授要他去，还寄来了上年的博士考题。学校又千方百计地说服他

不要走，直到许诺他提前一年拿到博士学位，刘挺才终于答应留下。但是几个月后，刘挺发现：“那一次没有出来是犯了一个错误。”

他的专业是“中文信息处理”。1998年7月，他真的比同班同学荀恩东和王海峰提前一年毕业了，他觉得挺得意。周围的人又开始动员他留在学校。有人说：“你要是留校，这个系的主任将来没准就是你的。”刘挺在中学演讲竞赛就是第一名，在哈工大一直是学生干部，有组织才能，知道怎样煽情。但他对教书没有兴趣。于是，学校试图说服他到哈工大的“八达集团”去，领导一个专做软件的研究室。刘挺很希望他的研究能够成为产品，他去找“八达集团”，但他立即就发现选错了地方。集团的经理们想的是让刘挺给他们带来滚滚财源。当他们发现刘挺做的所有项目都不能立即变成产品——比如“自动校对”只能识别60%的错误，就抱怨刘挺的软件风险太大。他们不敢做。这时候刘挺发现，他要是在哈工大继续做下去，就没有办法扬其所长。他掰着手指细数从哈工大出去的前辈兄长：北大计算机系主任、中科院计算所的所长、中科院软件所的副所长、北航计算机系主任、还有北工大的一个副院长，都是哈工大的，不免又在心里盘算另谋高就。他想过“北大方正”，那里有闻名全国的王选教授。也想过“东大阿尔派”，那是中国最大的软件基地，隶属东北大学，覆盖100亩地，股票牛气冲天，经理们住的都是小楼，老总姓刘，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当员工抱怨挣钱太少的时候，他赞道：“想多挣钱，那是好想法。”仅仅这句话，就让刘挺觉得此人非同寻常。不过，他还是觉得：“无论‘北大方正’还是‘东大阿尔派’，都不足以让我不顾一切地想去。”

恰在这时候，李开复来到哈工大演讲。刘挺坐在第一排，目不转睛地盯了李开复两个小时，觉得此人魅力无穷：一副中国人

的面孔，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演说精彩异常，要说“句句是真理”，恐怕不恰当，但若说他就像学校里的一个才高学富的师长，是一点也没有夸张的。只不过，在这个完全中国式的面孔后面，是一个完全美国式的文化体系、道德标准和工作方法。刘挺后来说，他当时对这一点“根本没有想到”。正是这个“没有想到”，在日后酿成了他和李开复之间的冲突。

刘挺认识到这一点已是一年之后的事了。当日李开复演说结束的时候，他可没有这样想。那时候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我将不顾一切地去。”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教师身份，不好意思在李开复和学生的座谈会上露面，只是在一边小心翼翼地问陈宏刚，教师可不可以提出申请。陈宏刚说当然可以。但李开复很谨慎地告诉他，为了避免给人留下“抢人才”的印象，研究院在大学里主要是招聘毕业的学生。刘挺后悔自己的提前毕业留校，但他已经打定“不顾一切”的主意，所以还是偷偷把自己的简历交了出去。

现在，李生读罢李开复的信，既难受又兴奋。他是哈工大的最高领导，也是刘挺、荀恩东和王海峰3人所在实验室的主持者。他原本打算要刘挺来实际负责这个实验室，现在眼看就要“折将损兵”，焉能不难受。可是，自己门下三弟子同时被微软看中，他连称这“命中率太高了”，又挺得意。他试图说服刘挺改变主意，还许诺给予种种特殊的待遇。刘挺心里一边感动，一边回想“读博士时没有出来的教训”，所以去意坚决。

“微软能够让我挣到足够的钱，又能让我做我愿意做的事情，还有最优秀的人带着我做。”他老实地向老师陈述理由，“我要是仅仅求待遇，‘八达集团’的待遇就很好，有个‘三室一厅’，钱也够花。但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情，只能做人家要我做的事情。在学校，倒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但我们研究经费

总是不够。”

看看没有希望了，党委书记最后叹口气说：“换一个角度看，这也是好事。”是啊。微软在全国1000多个申请者中只招二三十人，李生实验室就占了3个，这也是他的欣慰。人事部门的干部最后给了他一个忠告：把档案留在学校，“给自己留一条退路，要是觉得微软不好，随时可以回来”。因为他是老师，不是毕业分配的学生，北京不会接收他的户口和档案，所以，这是一个让刘挺和学校“两全其美”的建议。但刘挺说：“我不要退路。”

刘挺把档案拿出来，放在黑龙江省的人才交流中心，只身来到北京。没有档案，没有住房，最糟糕的是连户口也没有。幸而北京市不久之后有了一个新政策，可以给来北京高新技术企业工作的外地人才一个寄住证。让你有一个暂时合法的身份。至于户口，要等3年之后。于是，刘挺借居在北京的一个亲戚家，肩挑巨大的风险和希望，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就像所有进京打工的民工一样。

然则对于哈工大来说，事情刚刚是个开头。后面还有两个人，晏洁和吴枫，也都是哈工大的博士生，也随着刘挺、王海峰和荀恩东，来到希格玛大厦。还有周明，他像刘挺一样，原来也是哈工大的博士，又到清华任教，资历更深。这样，李开复的手下一下子有了6个来自哈工大的人。哈工大计算机系是全国第一流的，中国人都说它是“工程师的摇篮”，看来真是名不虚传，从这里出来的学生虽然不如清华的学生那样敏捷趋时，但若说到“扎实严谨之风”，国内大学无出其右者。

微软递出橄榄枝

那段时间，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主任周立柱也发现自己麾下的

人才正在离开，比如计算机系的教师刘文印就提出了到微软去的要求。

刘文印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就是个挺好的学生，身后有一大堆奖状。在以色列留学，获得了优秀学生特等奖和博士学位，是国际图形识别研讨会举办的“虚拟识别竞赛”的第一名，还获得了清华大学优秀青年教师特等奖。1998 年夏天他从以色列回来的时候，待遇没有改变，一切都和出去读书之前一样。后来他提出要到微软的时候，人们普遍认定这是一个重要原因。有人说清华大学不重视他，连他申报的项目也没有批准。也有人说，还是那么几个钱，还是讲师，连个“副教授”也没有弄上，怎么留得住人？刘文印说那是“误解”，项目的确未获批准，不过，和学校无关。那是因为“863 计划”的截止期是本世纪末，转眼就到了，所以上面不再想开新科目。至于待遇，的确不能让他满意，但大家都是这样，清华大学并没有特别亏待他，人家只是在执行既定的规则。

尽管如此，人事部门还是在用“破格”的办法挽留他。他们告诉刘文印，他的副教授的评审已经通过了，就等着校长签字了，请他耐心等候。这的确已经够优待的了，清华大学无数教师熬到快退休时才弄个“副教授”，他年纪轻轻，却已经伸手可及。

但刘文印还是要走，他离开清华的理由说来和刘挺离开哈工大理由如出一辙。“你能给我什么，这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你能让我做什么。”他说。他从国外回来已经好几个月了，借了一万块钱买了个电脑。想上互联网，传输一兆字节 10 块钱。想传真，一张 3 块钱；想复印，一张 3 毛钱……全都要钱，而他手边就连一分钱也没有，不得不把自己的账记到唐老师的研究经费上。尽管都是为了研究，但他不想沾人家的，没有谁的口袋是

宽裕的。当时他想，一旦自己的项目资金批下来，就会还上这笔债。1998年冬天，他知道项目未获批准的那一天，特别失望，这意味着他的“一分钱都没有”的日子还将遥遥无期。“如果有经费，我就不会想到离开清华。”他后来这样说。那一天，他对唐老师说“我想走”。他还没有说出微软这个名字，唐就接口说：“你要是到别的地方，我不会放你走。除非是微软研究院要你。”真正做学问的人似乎总能心心相印，这种不谋而合令刘文印走进希格玛大厦。离开清华之前，人事部门告诉他，既然你决意要走，你的“副教授的报告”就不再有效了。刘挥挥手就走了，朋友们觉得他的样子挺潇洒。其实他比谁都明白：要是到其他单位去，一定要把“教授”和“副教授”之类的东西揣在兜里，它虽然并不能真正代表学养和品格的高下，但却意味着位子、房子、票子，也许还有车子。但在微软中国研究院，这东西根本没有用。人家不看这个，安身立命的关键是真本事！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汉王”公司里发生的那场风波。前文所述“汉王”的主要发明者李明镜，在1999年1月份向微软递交了他的申请。李开复非常想要这个人，但却怀着深深的顾虑。所谓“抢人才”这样一片阴云，仍在他的头上徘徊，令他不敢理直气壮。想来想去，他只好去找微软中国研发中心总经理张湘辉。张是李开复的朋友，同时也是“汉王”的朋友。他找到“汉王”的老板刘迎建说，这一次微软不是要他的产品，而是对他的人感兴趣。

“汉王”距离希格玛大厦很近，那块“汉王科技”的大字招牌就矗立在“微软中国”的西边，遥遥相望。对于微软到处招揽人才的事情，“汉王”听得多了，可从来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会蔓延到自己的领地上来。

震惊不已的刘迎建后来告诉李明镜，这消息让他“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李明镜毕竟是他的公司中最重要的技术骨干，所以他迫不及待地请李明镜吃饭，问李为什么要走：是他这个老板不够好？还是待遇不够好？还说，不论李明镜有什么要求，都好商量。李坦率地说，“都不是”。他只是觉得，对“汉王”来说，自己的价值已经贡献得差不多了，就算不走，也不会再有大的作为。刘说：“你即使什么都不做，只要人在这里，就可以稳定军心。”这话不能说没有根据，那时候李明镜在国内很多人的心目中是“民族软件”的旗帜，就在不久以前人民大会堂那个会议上，大家不是还在说，连微软也在求我们吗？但李明镜却不以为然。他说，正是这个让他觉得“压力特别大”。他不愿意成为“民族大义”的象征，觉得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比什么都重要。他说：“如果我的作用仅仅是稳定军心，对我个人来说，太悲哀了。”刘比他大不了几岁，又是他的技术上的合作者，是个明白人，想想他的话，也觉得有道理。又想想，这样一个人走了，实在是“汉王”的重大损失，还是不松口。就这样，从春天到夏天，一个心里想：“他要是真的不同意，我就不走。”另一个心里想：“他要是铁了心要走，我也留不住。”7月，李明镜的合同期满，这对“鸳鸯”终于分开了。

看来事情的发展的确有些像《市场报》所说：“这个研究院将引发国内人才争夺大战，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1999年3月，微软中国研究院加快了向国内高等院校渗透的步伐。此前他们已经实施一项计划：微软将每年从中国各大学计算机专业最优秀的博士生中挑选10人，授予“微软学者”名誉称号，所以这个计划也就叫做“微软学者计划”。对于全国每年300多位从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博士来说，如果这个机会仅仅限

于“名誉”，也就不会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事实上，“名誉”之外还有不少诱人之处：

每月 1200 元；

每年由微软资助出国一次，参加学术会议或者访问微软总部；

免费获得微软软件；

暑假可在微软中国研究院工作并获得另外的报酬；

有资格参加微软举办的学术会议和活动；

学习期间的研究成果完全属于个人，而研究院不加干预；

毕业之后也完全拥有自己择业的自由。

这消息在学生当中引起的波澜尚未退去，微软又在向教师们摇橄榄枝了。1999 年春天，研究院向中国媒体发布了新的计划：每年向国内 10 所大学捐赠总价值为 1000 万元人民币的正版微软软件。首批软件将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等 10 所学校的每一位计算机专业教授捐赠。

一时间，包装精美、五颜六色的微软版软件，在 10 所名牌大学里面弥漫开来。过去，这些东西在“民族软件捍卫者”眼中，就像是“八国联军的毛瑟枪”，现在却成了“友好的使者”。研究院开始把它当作一种“名片”来使用，送给大学计算机专业的教授和“微软学者”，希望能在树立微软形象的同时，也减少“盗版”软件对大学校园的诱惑。如果这些教授能够发现微软软件的种种优越，那就更好了，须知他们有足够力量影响一代

又一代的学生。实际上这种影响力几乎立即就发生了。京城各大学校园，学生们均对“微软学者计划”表示向往。有个学者说，“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人才战略无论其主观意向如何，客观上将会成为未来国内优秀学子的风向标。”《微电脑世界》的记者黄盛萍写了一篇文章，抒发对“微软学者计划”的感慨。说这“无疑又将在数字中国的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中刮起一阵强劲的飓风”。这篇题目叫做《研究的快乐还是捆绑的快乐？》的文章说：“在微软学者计划中，一再提到这些学者在培养结束后可以自由选择去留研究院工作，但实际上，这真的有点像往‘视窗’上捆绑‘浏览器’。”

然而至少有一个对“捆绑”不“捆绑”的问题并不在意。他是一个上海的小学生。1999 年春夏之交的某一天，他在电脑上给远在北京的李开复发出一封信：

“李叔叔：我想参加你的研究院，从你那里学习电脑，最终变成第二个比尔·盖茨。可以吗？”

李开复当即很认真地回道：“欢迎你。好好学习！等你长大了，就来加入我们的行列。”

这一情节在当日被国内外报刊广为使用，显然只具宣传效果，少有实际价值。那时候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件刚刚过去，北京卷起强烈的“反美”浪潮。然而，李开复内心的轻松仍然是确定的。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已经拥有 60 个员工，另外还有至少 1000 份申请简历放在他的面前，厚厚的一摞，同窗外一片“打倒美帝”的呼喊形成对照：这真是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国家。

无论出现怎样的隔绝、猜疑和对抗，事情的发展确已证实，微软公司的“人才逻辑”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依然能够通行。高

手们喜欢在一起工作，在这一点上，中国和美国没有什么区别。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这场人才的戏剧，看上去只是整个中国 20 世纪末的一场更大戏剧的一幕。此前虽有“筑巢引凤”、“优胜劣汰”之说流行，但却多有“怀才不遇”、“劣胜优汰”的故事发生在我们周围。此后计算机业人才争夺日趋紧迫，也属于当然的局面。诸如“联想”这样的企业迅速展开其“寻人计划”，大学纷纷开出高价聘请教师，政府也在想方设法构筑“人才高地”，这些都是例证。所以，真正有眼光的人不是一味追究“微软要在中国干什么”，而是回看自己为何没有干什么。一位年轻的软件工程师在《电脑生活》上说：

“我很悲哀看到这一点，中国的企业一定要在外来竞争逼迫的情况下，才能重视人才吗？”

战争大趋势 ——寻访新军事革命思想猛士

陈歆耕

第一章 惊涛拍岸

王保存惊呼：“狼——来——了！”

王保存何许人也？一个头发稀疏的老头儿。中国军事科学院外军部大校研究员。著有《世界新军事革命》等军事理论专著 10 多部，参与翻译的著作有《大失败》等 20 多部。他的英语说得比汉语还要流利。

1999 年 8 月 25 日，他在军事科学院外军部的小会议室里接受我的采访。我的采访主题是面对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挑战，中国国防和军队的建设如何与世界格局接轨？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觉得谈决策和思路，首先对世界新军事革命的进程和形势要有明确的了解。在谈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新一轮军事革命中所存在的差距时，他那布满沟壑和老年斑的脸上折射出坐卧不安的忧虑和焦灼。

王保存当然不会喊“狼来了”，这是我的一个形象比喻。他

用了一个文绉绉的短语：

“形势异常严峻！”

当然，喊“狼来了”并不意味着大战在即，它是一种态势、一种提醒、一种危机意识……五枚精确制导炸弹从不同角度击中中国驻南大使馆，已经为这种“态势”和“提醒”作了一行血写的注脚。

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多多次军事革命。由于军事理论家们考察的角度不同，对历史上军事革命阶段的划分也众说纷纭，不尽相同。

有人以战争的能源基础来划分：

古代战争的能源基础是人力，使用的主要兵器是长矛、短剑、弓箭和标枪；

中世纪战争的能源基础是畜力，军队的武器装备主要是战马、长矛、滑膛枪和刺刀；

现代战争的能源基础是机械力，使用的主要武器装备是坦克、飞机、大炮；

目前人类正在开发新的能源，研制新的武器系统，推动新一轮军事革命……

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以三个浪潮来划分战争阶段：

由农业革命所引起的“第一次浪潮战争革命”，以锄头为象征；由工业革命引起的“第二次浪潮战争革命”，以装配线为象征；现在人类正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因而正在发生“第三次浪潮革命”，以电脑为象征。

美国“国防预算规划”研究中心主任克雷派尼维奇认为，自14世纪以来，人类历史上共发生过10次军事革命：

第一次，步兵革命。步兵代替顶盔贯甲的重骑兵成为战场上的主角；

第二次，炮兵革命。炮兵使防御在围城战中失去保持了几个世纪的优势地位；

第三次，帆船——火炮革命。火炮安装在帆船上使军舰从士兵的浮动要塞变成火炮的平台；

第四次，堡垒革命。新型工事的建造使攻城战又变得对防御一方有利；

第五次，火药革命。滑膛枪和线式战斗队形在战场上获得了成功；

第六次，拿破仑革命。以征兵制、纵深战斗队形和军队机动性与灵活性的极大提高为主要特征；

第七次，陆战革命。铁路、电报和线膛枪炮在美国内战中广泛运用；

第八次，海战革命。铁甲舰、鱼雷和潜艇成为海战的主要武器；

第九次，两次世界大战间的革命。以闪电战、舰载航空兵、现代两栖战和战略空袭为军事革命的主要成果；

第十次，核革命。核武器、核战争理论和核部队的产生。

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十一次军事革命。

不管军事理论家们如何划分战争历史，他们都无不充分意识到并断言：目前世界正在进行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军事革命。

“当下正处在新军事革命的前夜。”国防大学军事科技与装备教研室主任、教授张召忠用文学化的语言描述道，“人们在黑暗中小心地摸索，在黑暗中焦灼地等待，聪明的人已经预感到一

场狂风暴雨式的革命正在悄悄地酝酿之中，而愚昧的人们却在蒙头大睡，等他们美梦做完睁开惺忪的双眼之后，昨天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

到那时，要想再找一块立足之地恐怕就难了。

新军事革命的意义是什么呢？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道格拉斯·约翰逊博士在回答中国学者的提问时说：“如果你有机会到葛底斯堡，你可以站在葛底斯堡的高处，察看一下这个古战场。1863年美国内战时曾有20万人在这里战斗；今天我们大约只用150人就可控制整个这一地区；到2025年我们将只需10人。这就是我们在谈论的革命！”

早在70年代末，苏军总参谋长奥尔加科夫就敏感地预见到：先进技术的出现将催生一次新的军事革命。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进入军事领域，以及精确制导武器的初露锋芒，极有可能锻造比火箭核武器更厉害的杀伤性兵器，从而引发新的军事变革。

王保存研究员翻开他的新著《世界新军事革命》，在他慢条斯理的述说里，飘散着一场撼天动地的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浓浓血腥味——

1981年6月，以色列悄悄出动14架战斗机，绕过约旦等国的雷达监视区，避开美军E—3A预警机的探测，神不知鬼不觉地飞临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东南20公里的空域，一举摧毁了伊拉克动用5年时间、耗资5亿美元建起的核反应堆。以军飞机安然无恙往返2000余公里，整个作战时间仅为2分钟。

1981年8月，在锡德拉湾，美军两架E—14战斗机，从“尼米兹”号航母上突然升空，用两枚“响尾蛇”导弹，分别击中了利比亚两架苏—22战斗机，战斗时间仅为1分钟。

1982年2月，英国特混舰队行程1.3万公里，抵进大西洋

西南端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水域，与阿根廷军队展开了空前的封锁与反封锁、空袭与反空袭、登陆与抗登陆战斗……导弹战、电子战纷纷亮相，硬打击与软杀伤交织，天、海、陆一体。150 多架飞机纷纷坠入大海，数十艘现代化军舰或受重创或葬身海底，阿军“超级军旗”式战斗机在 40 公里外的超低空仅以一发“飞鱼”导弹，就击沉了英国价值 2 亿美元的“谢菲尔德”号驱逐舰。

1982 年 6 月，以色列空军以美制 F—15 和 F—16 战斗机、E—20 预警机等，只用 6 分钟就摧毁了叙利亚部署在贝卡谷地的价值达 20 亿美元的 19 个“萨姆—6”地空导弹连。在此后两天内，以军共摧毁叙利亚 42 个导弹连阵地。

1986 年 4 月，美军数十架战斗机、电子战飞机和加油机，经 5000 多公里夜间长途奔袭，悄悄飞到地中海上空，与其第六舰队几十架各类战斗机统一编队，分 4 个波次飞向利比亚首都黎波里和班加西城。到达预定位置后，数十枚“百舌鸟”及雷达导弹和“哈姆”高速反辐射导弹，以及 60 多吨激光制导炸弹和集束子母炸弹，铺天盖地地从天而降。不到半个小时，利比亚东西两城的雷达站、兵营、导弹阵地和 20 多架飞机被炸毁，有的炸弹不偏不倚地落在利比亚总统卡扎菲当晚的居住地。

1989 年 12 月，美军首次使用 F—117 隐形战斗机，成功地躲过了几个国家的雷达监视，以密集编队长途飞行数千公里，空袭了巴拿马城西 120 公里的一个军用机场和两个步兵团，使后续空降部队未受任何抵抗便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机场……

或许，这些都只是一场真正的高技术战争到来之前的预演和前奏，但一些目光敏锐的军事专家和观察家们却从中看出了未来战争的端倪。

随之到来的便是让世人震惊的海湾战争。这场仅仅打了 42 天的高科技局部战争，已给人们留下不尽的思考和回味。人们纷纷用“震撼”、“震惊”、“耳目一新”等绝非夸张的词语来评说。

写过《第三次浪潮》的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认为：“1991 年的海湾战争预示着新战争形态的出现。”

美参联会主席沙利卡什维利说，海湾战争“反映了正在进行中的新军事革命的一个缩影，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战争新时代”。

王保存研究员站在中国现代军事思想者的角度，郑重提醒道：“海湾战争具有巨大的昭示作用，它使仍沉湎于机械化军事形态的人们从睡梦中惊醒，茅塞顿开：信息在战争中的作用表现突出，芯片的作用大于钢铁；战争形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机械化军事形态正在向信息化军事形态转变，一场史无前例的军事大变革已悄然来到我们身边。”

但打赢海湾战争的美国人并未停止步伐，就在人们被海湾战争的冲击波“冲”得蒙头转向，不知所云时，他们却宣布海湾战争的样式已经过时。1992 年 4 月，美国国防部发表了长达 1300 多页的《致国会的最后报告：海湾战争》。这份报告是国防部副部长组织 100 多名军事专家，紧步海湾战争烟尘，花 12 个月写成的。报告在充分肯定海湾战争胜利的基础上，对军队的改革和未来发展提出了三个战略性的重大问题：

第一，在苏联和华约解体、长达 40 多年的冷战结束之后，面对一个没有明确敌人和对手的世界，作为超级军事强国的美国将如何建设未来的军队？

第二，在高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

美军将如何继续保持自己的优势，将确定怎样的跨世纪发展目标？

第三，在未来武器装备发展中，如何克服和解决海湾战争中所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和缺陷，怎样提高部队的综合作战能力并打赢下一场战争？

1993 年 1 月，克林顿总统上台后做出一项重大战略决策：组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特别小组，并于 9 月 15 日宣布在 15 至 20 年内投资 4000 亿美元建设美国信息高速公路。美国国防部提出投资 1000 亿美元建立全球共享型“国防信息高速公路”计划，2000 年入网的计算机达到 15 万台，形成美军全球信息指挥体系。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组织近百名专家经过半年研究，提出一份名为《军事技术革命：一种结构框架》的研究报告，明确提出“信息革命是军事技术革命的核心，军事学说和军队编制是军事技术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4 年 4 月，美国国防部长佩里亲自带领一个“军事革命课题组”，系统研究 2005 至 2015 年间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军事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

美军方组织 80 名高级官员和情报战略分析家在海军军事学院以中国为假想敌，以 2020 年为时限，使用新一代武器装备和作战样式进行较大规模的模拟对抗演习，结局是美方失败。

1995 年，兰德公司受国防部信息战执行委员会委托，进行信息战研究，不久即向委员会提交了题为《战略信息战：战争的新面貌》的研究报告，论述了战略信息战概念及其基本特征，并提出具体建议。

在美军紧锣密鼓地准备打一场信息战的同时，英、法、日等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也积极参与其中，争相加快信息高速公路的建

设和高科技武器的研制，都想在新一轮军事革命中取得领先地位。

1999年3月24日晚8时，北京时间凌晨3时，南斯拉夫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科索沃省府普里什蒂纳万籁俱寂，正被沉沉夜幕笼罩着，路上几乎见不到行人，零星的路灯散发着惨淡的光亮，偶尔传来几声狺狺的狗叫……

蓦地，火光一闪，两声如霹雳般的爆炸声把这座城市从沉睡中惊醒。随后，重兵器的射击声、凄厉的警笛声响彻夜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开始了对科索沃的首轮空袭。6架威力巨大的B—52轰炸机和一些B—2轰炸机24日从英格兰西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起飞，在距离南联盟几百公里处发射了空地导弹。停泊在亚得里亚海上的美国航空母舰也向南联盟发射了“战斧”式巡航导弹。法国空军幻影2000D型战机和美国的F—16、F—15等多种型号的战斗机，携带空对地攻击导弹和激光制导导弹，呼啸着进入南联盟领空，直接参与了首轮空中打击……空袭共持续了76天。

中国的军事专家们看到，科索沃战争与海湾战争相比，有许多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在这之前，在美国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外交研究所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客座研究的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伯江，曾向霍普金斯大学尼采国际研究生院战略研究所教授埃利奥·科恩博士提出这样的问题：“美国是在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开始军事革命和未来战争讨论的。由于当前的武器核查危机，美国正在计划对伊拉克实施另一场军事打击。从军事革命的角度来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进行军事打击，其战略、作战方法或战术的运用会有些什么变化？”

科恩教授回答：“我认为最大的变化是我们将使用的武器全

都是精确制导武器，情报基础也将会比海湾战争时好得多。”

这次谈话过去 10 个月后，因为武器核查危机，美英决定实施对伊拉克空中打击的“沙漠之狐”行动。“沙漠之狐”之后 3 个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便发动了科索沃战争。两次战争都表明，美军的精确制导武器在全部投弹量中的比例已由海湾战争时的 8% 猛然增加到 90% 以上。

海湾战争仍然是一场集中兵力的战争。在“沙漠之狐”和科索沃战争中，美军不再采取大规模集中兵力的方法。他们通过“体系集成”，对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兵力，实施了集中的指挥控制，并对敌进行远程精确打击。海湾战争时，施瓦茨科普夫的指挥所还设在海湾前线，而在“沙漠之狐”行动和科索沃战争中，美军不仅能在本土实施指挥，而且操纵控制卫星及进行战场所需数据处理的大部分机构设施也都在本土，首次实现了在美国本土指挥大规模的海外作战。美军的作战平台也是远离战场分散配置的：B—52 是从万里之外的美国本土起飞的；空射巡航导弹是在 1000 公里外发射的；潜射巡航导弹是在 1600 公里外发射的。但打击的目标非常集中，远程的作战能量全部释放在作战地区。

军事科学院首批军事学女博士姚云竹分析说，科索沃战争有两个重要的新特征：一是未动用地面部队，美军从开始就没有准备出动地面部队，尽管中间有些争议，他们仍然没有打算打地面仗，完全依靠空袭来达到政治目的；二是美军实现了作战中的零伤亡。

军事科学院女博士朱小莉对新军事革命的特征做出了精辟的概括。她与姚云竹同为我军首批军事学女博士，始终冲击在军事学术的前沿。早在 1996 年，她就主撰出版了专著《美俄新军事革命》。该书一出版，立刻引起了美国军界高层的关注。

朱小莉博士认为，当今世界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是世界两极体制的垮台和业已开始的世界多极化趋势。这是酿成当今新军事革命发生的最直接动因，其影响是决定性的。而思想文化对于当今的新军事革命无疑也是具有深刻影响的一个因素。这主要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和观念体系、人的思想及科学文化素质应该从 20 世纪向未来的世纪的转变。如果世界日益全球化、人类正向信息时代迈进，而人的思想、观念却仍然封闭和固守在过去的时代，那么就不可能实现军事领域的根本变革。

朱博士强调说：以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变为特征的新军事革命，自海湾战争拉开序幕后便高潮迭起，汹涌激荡，势不可挡。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考察了工业时代的军事史实后得出结论：凡是不能适应 19 世纪中叶军事革命的国家都以失败告终。因此，可以断言：中国能否成功实施这场新军事革命，绝不单单是改变中国军事面貌的事，它将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在未来的世纪在全球占据一个应有的位置。新军事革命有三个重要特征：武器装备系统出现了断代性的飞跃；作战方式和作战理论发生根本性变化；军事组织结构走向全新的构架。

作为新军事革命到来的首要标志，武器的断代性飞跃表现在——

武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武器是由物质、能量两大要素构成的。冷兵器由人的体能和物质结合转化为杀伤力；火器通过化学能、机械能与物质的结合转化为火力和机动力；核武器则以核能转化为毁伤力；而新技术革命浪潮中涌现出来的高新武器，都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和依托。高新技术武器有一个区别传统武器的显著特点：追求物质、能量、信息三大要素的集合，把整个作战范围的参战诸军兵种部队及武器平台、指挥控制、情报通信、后勤保障等合成一个精干而密切协同的有机整体，从而使

20 世纪庞大的战争机器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武器的效能发生了变化。在工业革命的 150 年中，常规武器的杀伤力增加了五个数量级。原子弹的诞生，一下子使毁伤力提高到相对于火药发明以后所有战争所消耗弹药的总和。二战中，摧毁一个目标大约需要 9000 枚炸弹；越战期间，大约需要 300 枚；而海湾战争中摧毁一个目标仅需 1~2 枚精确制导武器。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发射的精确制导弹药虽然只占发射弹药总量的 8%，却摧毁了约 80% 的重要目标。

武器组成发生了变化。判断一场新的军事革命是否到来，要看一种全新的武器是否已在战争中起主导作用。而从战争和武器的发展史看，一种新的武器取代旧的武器成为战场上的主导兵器，往往要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一旦它大量装备部队并用于实战，成为战场的主导因素，就意味着一场新军事革命的到来。如坦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已出现，但当时数量极少，只是作为步兵的支援武器。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大规模地发展坦克，实施坦克—飞机协同的“闪电战”，使坦克成为战场的主导武器，一场坦克、飞机取代传统步兵的军事革命才得以发生。信息技术武器的发展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50 年代末、60 年代初，信息技术武器就已问世。越战时，美军用一枚“白星眼”激光制导炸弹摧毁了清化桥。其后，信息技术武器逐步在局部战争中崭露头角。直到海湾战争时，它才成为战场的主导武器，向世人显示了全新的战争样式。

王保存研究员建议我把目前的世界格局与 18、19 世纪时的世界格局作一个比较。

18、19 世纪时，西方列强较早完成了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的转换，军队的装备完成了由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过渡，与那些还

处于农业时代的国家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其结局是那些拥有洋枪洋炮、蒸汽类舰船的西方强国，到处扩张，几乎把所有弱小国家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

王研究员说：处于两个不同时代的军队是没有办法打仗的。由于军事力量的悬殊，工业时代的军队肯定要打败农业时代的军队。

今天又开始出现类似 18、19 世纪时的情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较早地步入信息时代，与那些还停留在机械化、半机械化时代的国家，形成了时代差。尽管少数发达国家尚未彻底完成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转换，但他们已经处在遥遥领先的地位。这些国家军队装备的主体已经信息化。今后一二十年，两者之间的距离可能继续拉大。

世界银行在 1998 年世界发展报告《促进发展的知识》（提纲）中，非常形象地称知识经济的到来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为“要么搭上车，要么落伍”。

发达国家（A）与发展中国家（B）的差距，如果用非常简练的话来表述就是：

A 能看到 B，能打到 B；

B 看不到 A，打不到 A。

有一个未经考证的逸事：萨达姆总统举起手枪朝着天上的美国飞机大叫：“有本事你下来！”但萨达姆不想想：人家干吗要下来？美国大兵能在数千里之外揪揪按钮，对敌方实施远距离精确打击，置敌方于死地。这是美国人独霸天下的资本。

从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我们已经看出时代差所带来的后果。

萨达姆拥有百万大军，同时拥有一定数量的高技术武器，号

称世界第四军事强国，居然那么不经打，如秋风扫落叶般一败涂地，实在让世人惊诧不已。当然我们可以从伊拉克军队指挥机制的落后、军事理论的陈旧等等方而找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伊拉克与美国等强国存在着严重的“时代差”。伊拉克军队的组成、装备、作战方法还停留在机械化战争的时代。

交战前，伊拉克拥有陆军坦克 5600 辆，多国部队 3700 辆；伊装甲车 6000 辆，多国部队 5600 辆；伊火炮 5600 门、高炮 4000 门、作战飞机 740 架、直升机 1500 架，多国部队飞机总数 3200 架，其中作战飞机 2000 架；伊有舰艇 60 余艘，编有四个分队，8 个岸炮和岸导营，还有一个陆战旅，多国部队有 247 艘舰艇，9.4 万陆战队员。从兵力的结构对比上可以看出，伊拉克的陆军数量占有绝对优势，这是机械化战争时代大规模实施地面战的产物。在海、空军方面，伊拉克则处于绝对的劣势。至于在指挥、引导、预警、电子对抗和通信系统方面两军的差距更大。伊拉克的电子设备比美落后好几代，无法与美进行战役级电子对抗，指挥、引导系统仅 24 小时就大部被摧毁和陷于瘫痪。由于无法获得战场信息，伊拉克始终掌握不了战场主动权。拥有海、空优势的多国部队在不到 100 小时内，就摧毁了伊拉克 82.7% 的陆军坦克、70% 的装甲车和 69% 的火炮；60 艘舰艇，成了多国部队的靶舰，空军飞机连跑带炸损失过半。

与伊拉克军队落后的技术装备相适应的是陈旧的作战理论。萨达姆在战争打响前视察前线的一次讲话中说，美国人靠高技术，他靠经验，他坚信“在任何情况下，要想将一个士兵从地面上赶走，最终还要靠另一个带着手榴弹、步枪和刺刀的士兵在战壕里同那个士兵搏斗。书本上的技术优势最终将在战场上接受检验。我们不靠书本，我们靠作战经验”。在萨达姆脑子里的战争图像，还是二战时候的堑壕战、肉搏战。这样的军队怎能夺取

战争胜利？

在科索沃战争中，由于南联盟的地形复杂，并且拥有一支强大的防空力量，北约的空袭效果与伊拉克比要大打折扣。但北约与南联盟的力量对比仍然非常悬殊，用一句学术性的话说属于“非对称作战”。战争结束，起码有这样一个事实让我们过目难忘：广场的歌声，毕竟无法抵御精确制导炸弹的碎片。

王保存研究员的警告，或许算不上惊世骇俗。我在张文木先生的文章《科索沃战争与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中读到了类似的看法。文章中有这样一个段落：“1999年3月24日，北约秘书长索拉纳下令对南斯拉夫实施空中打击，震惊世界的科索沃战争自此牵动了世界的神经，双方差异悬殊的较量使作者联想起发生于上世纪的中英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对于中国值得研究的是，在中世纪（至少在唐朝以后）曾是世界超级大国的中国，为什么会在近代被打败，而我们将制定怎样的安全战略才能在明天可能的战争中赢得胜利？”

第二章 脊 梁

现代战争，尤其是高技术战争，打的是黄金。打了18天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埃、叙、以三国平均每天耗资3亿美元；马岛海战中，英军平均每小时的耗费高达120万美元；海湾战争不到半个月，战场消耗和损失就达数千亿美元。西方军界人士幽默地说，打现代战争“如同在一家菜单上没有标价的高级餐馆进餐那样心中无数”。

研究如何处理好经济和国防的关系，合理、高效地投入使用好国防经费，是迎接新军事革命挑战要解决的第一道难题。

军事学术专家张世平指出：“经济是一个国家的两条腿，缺了这两条腿便寸步难行；外交是国家的两只胳膊，要靠它来结交朋友，团结对我友好的国家；政治是国家的躯干，是国家能够运转的神经中枢；国防是什么？国防是一个国家的脊梁，没有脊梁就会挺不起腰，抬不起头来。”

在科索沃战争后不久，国防大学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金一南曾在国防大学讲过一课，内容是“从俄罗斯在科索沃冲突中的地位作用看国家经济转型时期的国防建设”。这一课赢得了将军班学员们的满堂掌声。

他说：自3月24日开始的科索沃战事，北约和南联盟双方的政治意图、军事战略、实力对比基本都是清楚的。要说其中有变数的话，那么最大的、最捉摸不定的变数，就是俄罗斯的态度与作为。这里面至少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俄罗斯这个砝码将压向哪边？由此产生第二个问题：这个砝码究竟有多大分量？

金一南认为，俄罗斯在科索沃战争中的态度简直就是一个谜。

首先在是否介入的问题上，叶利钦最初表示“俄罗斯有一系列极端措施”，要“尽一切努力制止北约对南联盟的军事行动”，随后很快又改了口，说“不想利用极端措施”。俄罗斯之所以不卷入武装冲突，是因为“俄罗斯在道义上比美国占有优势”。

随后在导弹瞄准问题上，4月9日俄罗斯杜马议长谢列兹尼奥夫与叶利钦会谈后说，叶利钦已经下令，将俄罗斯境内的导弹指向与南联盟发生冲突的北约国家。议长的话刚说完，总统发言人就出来否认，说没有发布这样的命令。

接着在南联盟加入俄白联盟问题上，俄罗斯的矛盾态度又一次出现。4月9日叶利钦收到南联盟方面要求加入俄白联盟的请

求，叶利钦当即认为这是对俄罗斯地位的高度评价。联盟一旦实现，俄罗斯可能就要在南联盟境内部署部队。他责令有关部门就这一问题立即进行磋商。但第二天叶利钦就改口说，考虑与南结成联盟还为时过早。

俄罗斯在科索沃战争中所采取的最具有实质意义的行动是派遣黑海舰队舰只出航地中海，但其过程千曲百折，拖泥带水。3月31日，在俄总理普里马科夫的外交斡旋失败后，俄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宣布，俄罗斯将向地中海派遣包括导弹护卫舰和反潜护卫舰在内的7艘军舰，第一艘侦察舰将于4月2日起航出发。此举确实令北约国家紧张了一阵。

但自侦察船“利曼”号4月4日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后，后续的巡洋舰、导弹驱逐舰和反潜护卫艇就不见了踪影。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改口说，其他军舰去不去地中海，要看北约的态度。一直拖到4月19日，叶利钦总统才明确表示，不再向地中海派遣军舰。于是，地中海只有一艘俄罗斯侦察船在那里孤独无援地漂泊着。

俄罗斯人在科索沃战争中惟一出出让世人惊诧的精彩一笔，是在1999年6月12日凌晨，当踌躇满志的北约准备分区按部就班完成对科索沃的占领之际，突然派遣一支200多人的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入科索沃，抢占了普里什蒂纳机场。

世界舆论为之大哗。

金一南研究员感叹道：一个两亿人口的大国，靠200人的大胆军事行动改善战略地位，从一面看是个奇迹，从另一面看又是个悲剧。俄罗斯军人每每在行动中表现出很高的军事造诣，但又每每因国家后劲不足，难以为继，导致成果东流。抢占机场行动亦正如此。在北约开始以每小时200人以上的速度进入科索沃之后，俄罗斯这支部队却得不到有力补充，几天之后不但开始向周

国的英军士兵讨水喝，而且“科索沃解放军”都敢口出狂言要对俄军动手。一些昔日盟友竟然不给俄后续部队开放“空中走廊”，以致俄军在谈判中最终没有能在科索沃获得一块属于自己的维和区。

专家档案1 金一南：喜欢“瞎激动”的学者

金一南挂在嘴边的话是“打得赢”或“打不赢”。他成天思考的问题也是“打得赢”“打不赢”：中英鸦片战争，为何中国打不赢？中日甲午海战，为何北洋水师打不赢？科索沃战争，究竟是谁输谁赢？下一个世纪，中国在未来的高科技战争中能不能打赢？

一谈到这类问题，金一南的情绪就激动万分。要是正在吃饭，他捏筷子的手也因激动而哆嗦，以致他的爱人常常会数落他：“瞎激动什么？打得赢打不赢跟你有什么关系？”

1972年金一南从北京入伍。还在工厂当工人时，他就读完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那时，越南战争鏖战正急，他自订了一份《航空杂志》，每天研究美军侵越各种型号飞机的性能，诸如航速、作战半径、携带弹药数量等等。25年后他到美国国防大学访问，在巴林空军基地的门口，有一架飞机模型，他一眼就认出来：“这是F—105鬼怪式飞机。”陪同他的美海军女上校兰茨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的？”因为这是一架已被淘汰多年的老式飞机，在美国很多人也说不出它的型号来。由此，她对这位中国军方学者的丰富知识钦佩不已。

1997年在美国国防大学一个月进修，为金一南能够全面洞悉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军队内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在这一个月里，他访问了美军的五所军事院校：西点军

校、海军军官学院、卡索尔陆军军事学院、陆战队大学等。参观了七个军事基地。他吃住在美空军的巴林基地，使得他有机会直接与美军人进行思想交流。他坚持每天写日记，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记下来。等回国时，已记了厚厚两大本。

回到国防大学，经过 10 多天的冷静思索，他向训练部呈送上了第一份长达万言的报告。报告中除了介绍访问的基本情况，还分析了美军院校搜集整理情报工作的几个特点，以及美军信息情报工作正在出现的一些新的重要变化，同时对国防大学图书馆的资料体系建设提出若干建议。其他一些人出访回来写的报告大多是流水账式的情况汇总，而金一南的报告有情况，有分析，有措施，信息量大。

没有几天，金一南又递上了第二份报告，题为《美军院校体制编制和教育训练情况》。这又是一份万言书。这份高质量的报告由国防大学办公室转发各大部和教研室，同时报送总参军训部和总参外事办公室，1998 年 5 月经总参军训部院校局选定，被全军院校体制编制论证小组作为重要参考文件录用。

紧接着，金一南又写出了第三份报告，专题汇报他在美进修的所见所闻所感。其中谈到了美国优秀的青年和人才为什么都愿意到军队效力，美军各军种之间如何培养争强好胜的精神，还有美国社会各界对华的态度。

除此之外，他还如发射集束炸弹般地在《解放军报》、《世界军事》、《国防大学学报》上发表文章。从此进入他的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段。仅仅是 1999 年 1—8 月，他就在各类报刊发表文章 30 余篇，被军内外请去讲课 16 次。北大哲学系与社会学系副主任樊富珉听了他的课后，感慨地说：“我们第一次请军队的同志来讲课，听了你的课让我对今天军人

的知识水平、思想能力刮目相看。”

在谈到如何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经济改革和军事改革的关系时，依旧以军事大国俄罗斯为例，金一南研究员指出：长期以来国防投入是苏联国民经济的沉重负担，俄罗斯消极吸收这一教训的后果，跳到事物的另一个极端：视军队建设和国防投入为包袱。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提供的数据，1996 年和 1997 年俄罗斯的军费开支已降至不足前苏联 1988 年的十分之一。于是国家军事战略方针的混乱和经济与国防关系问题处理的失措，既导致俄罗斯的军事战略始终没有切上实际情况的脉搏，也导致本应以提高战斗力为核心的军事改革，变为了单纯的经费压缩和人员裁减，成为“甩包袱卸负担”式的改革。新军事革命的关键并不在于裁军与不裁军，而在于如何建设一支高质量的军队。所有军事改革的目的，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提高战斗力。

有一句名言：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紧要关头只有几步。国家也是如此。一个国家的生命虽然漫长，但紧要关头也仅有几步。这几步就是关节点，是十字路口。

中国国防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 左右。中国强调国防经费的投入要与国民经济增长相协调。国防部长迟浩田在 1998 年 2 月访问日本时所发表的演讲中表示，“国防建设要服从经济建设的大局”，中国把经济建设作为当前最重要的课题，同时还面临着财政赤字的压力，因此，今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将是渐进式的。

专家们认为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费的投入与国民经济增长必须相协调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因为经济建设而忽略了国防建设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国不可一日无防。“兵

者，国之大事也”。一旦有突发事件，经济实力并不能立即转化为军事实力。军事科学院的一位研究员说，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一个国家的军费与军队的数量比，如果控制在人均 5000 美金之间，那么这个国家的军队只能维持现状。如果低于人均 5000 美金，那么，这支军队不但不能发展，而且要走下坡路。按照这样的标准，中国国防费的投入确实可以讨论。1996 年至 1999 年四年中，美国的国防开支分别为 2657、2705、2641、2655 亿美元，平均每年的支出相当于中国 1998 年国民生产总值的七分之二。

张世平研究员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到处都需要钱，没有钱什么事情都干不成。这是事实。但是，今天的中国绝不会像五六十年代那么缺钱吧？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但中国人拿出 60% 左右的财政收入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两弹一星’上天的时候，中国大多数老百姓还不知道电视机为何物，然而中国人也把事情干成了。关键还是个观念、意志、意识问题。”

与此相关的是中国军队需要加快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的转变，使得有限的军费投入发挥出更大的效益。

现代高科技局部战争表明，靠“数量规模”是难以在未来战争中立足的。如果能让国防费中的每一分钱都能有益于战斗力的提升，进行军种结构的合理调整，突出海空军和战略导弹部队的建设，将陆军的“数量规模”大大缩减下来，是中国军队改革的必由之路。

撒胡椒面式的军费使用方式是绝对不可取的。

专家们指出，中国人的国防意识和国防观念，不能总是等待外来的刺激才有所觉醒。只要人类还没有找到一种可以替代战争

的方式解决因国家利益以及其他各种因素导致的冲突，人类就不可能享受永久的和平，这样，一个国家的军备就不能有一日松懈。

令人欣慰的是，改革开放 20 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中国成为世界上公认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1965 年至 1980 年期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平均增长率为 6.5%，1980 年至 1990 年上升为 8.9%，1990 年至 1995 年期间上升为 12%。中国经济增长率大大高于同时期世界各国经济平均增长率。1978 年至 1995 年中国贸易出口额年平均增长率为 17.4%，进口额年平均增长率为 15.8%，由世界第三十二位贸易出口国上升为第十位出口国。

在未来的时期，中国经济将保持高速增长趋势。据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预测：到 2020 年中国 GDP 总量相当于 1990 年的 10 倍，2030 年 GDP 总量相当于 1990 年的 19 倍。世界银行发表的《2020 年的中国》预测到 2020 年中国的 GDP 总量将是 1990 年的 7.5 倍。

1995 年美国兰德公司按实际购买力评价计算方法（PPP）对中国、美国、日本、印度、韩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长期性预测，主要研究结果如下：第一，美国经济势力最强，中国居第二位，日本居第三。奈斯比特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预言：“中国必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经济强国，这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崛起。”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必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中国有义务也有能力在世界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而，中国必须拥有与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相适应的国防力量。中国不做超级大国，不谋求霸主地位，但中国应该拥有与经济实力相称的军事力量。中国不能因为有人瞎嚷嚷“威胁”了谁，就

眼睁睁看着别人的牙齿越来越锋利。

而且，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力，不仅仅看经济指标。

1975 年，美国国际关系学家克莱因在《世界权力的评价》一书中提出了对国家进行综合评估的克莱因公式： $P_p = (C + E + M) \times (S + W)$ 。翻译成中文是：国力（被确认的权力）=（人口和领土构成的基本实体 + 经济能力 + 军事能力）×（国家意志 + 战略目标）。

军事能力是一个国家五个最基本的因素之一。

因此，专家们提出，经济安全是中国当前和今后最大的安全，这关系到国家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所谓经济安全，就是一个国家在保持对外部经济压力的独立性的同时，以公平的可持续的方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能力。保卫国家的经济安全，必须要有足够的军事力量。经济问题随时可能引发战争已是不争的事实。随着国家“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需要，海外投资和企业、海外市场、海外劳务、海上交通运输将大量增加。要使中国的海外利益不受侵害，中国必须要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海上和空中力量提供安全保障。

这事关中华民族生存的命脉！

第三章 “思想库”

公元前 516 年，孙武怀揣兵法十三篇应召赴吴宫晋见吴王阖闾。

吴王披阅一遍孙武所呈兵法，连连称妙，当即决定将孙武留在宫中，继续同他讨论治国治军之道。孙武又面述了他多年研究的兵法原理，其惊世骇俗的分析，新颖独特的见解，深得一心图霸的阖闾的赞赏。为了试试兵法十三篇的可操作性，吴王说：您

能不能对您的兵法做一次小型的操练呢？

孙武说可以，并马上在宫中挑选 180 名宫女，当着吴王的面进行操练。担任队长的两个宫女是吴王的宠妃，她们误以为这是做游戏，不遵口令，嘻嘻哈哈，影响了操练的严肃性。孙武坚持要按军纪将她们处死。吴王为两位宠妃说情也无济于事，孙武毫不犹豫地將她们送上断头台。吴王心里很不舒服，但理智告诉他孙武是正确的。他果断地委任孙武为将军。

此后，孙武运用他的高超的军事理论，接连消灭徐国、钟吾国，击溃楚国、齐国，在公元前 482 年黄池会盟之后，把吴国推上了霸主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是名副其实的“屠宰场”，交战双方每前进一步，都是用士兵的尸体铺就的。在开战后的头三个月里，英国军队共被毙、伤、俘 85 万人，法国损失 85.4 万人，德国损失 67.7 万人。

在著名的凡尔登战役中，德国投入兵力为 50 个师，损失近 60 万人，法国投入兵力为 69 个师，损失 35 万多人。

用堑壕、铁丝网、机枪、火炮构成的防御体系，使得进攻比防御要艰难得多，付出的代价也更加巨大。

正是在这样的战场，促使了坦克的孕育和诞生。英国战地记者斯温顿在西线战场亲眼目睹了“绞肉机”式的战斗，深深感到若想打破僵局，就需要有一种新型武器。这种武器必须有防弹装甲，必须安装能摧毁机枪的武器，可以通过自身的动力越野，跨过堑壕，压垮铁丝网。斯温顿在返回英国的次日，给英帝国国防委员会秘书莫里斯·汉基写了一份备忘录，建议参照美国柯尔特公司制造的履带式拖拉机，制造一种有装甲、带武器、能越野的战车，并附上了草图。但英国陆军大臣基切纳对此不感兴趣，

认为是“一个美妙的机械化玩具，但价值有限”。幸好，斯温顿的建议得到了当时担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的支持。

时间不长，世界上第一辆坦克“小威利”诞生。

经过改进定型后的坦克，于1916年9月15日在法国北部的索姆河战场第一次投入使用，便不同凡响。当时英国共有坦克49辆，但有17辆因机件故障留在后方，在发起冲锋时又有5辆陷入沼泽，9辆机件损坏，真正发挥作用的只有18辆。面对这突然出现的钢铁怪物，德国士兵丧魂落魄，仓皇逃窜，英军在很短的时间里即占领了5公里阵地，伤亡人数是过去的二十分之一。

坦克的投入左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局。在随后的康布雷、亚眠战役中，英法军队都是依靠坦克重创德军，迫使德军于1918年11月11日投降。

然而，在这个时候历史给世人开了一个玩笑。明明英国人发明了坦克，把坦克奉若神明的却是德国将领古德里安。这是因为德国人重视对坦克战术理论的研究，而理论研究的突破又带来了战场奇效。

熟悉二战历史的朋友不会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德军坦克部队在航空兵的配合下，以排山倒海之势，几乎席卷整个欧洲；27天灭亡波兰，23天占领挪威，18天迫使比利时投降，39天征服法兰西……

事后，英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哈特扼腕叹道：是古德里安用他的装甲思想和行动，帮助希特勒改写了历史。

专家们在考察了以往的军事革命特别是工业时代的几场军事革命后得出结论，每场革命都必然产生崭新的军事理论或部分改变原有的作战理论。如拿破仑时期的全民战争和总决战思想，第

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闪击战”理论、苏联“大纵深战役”理论、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核时代的核战争理论和有限战争理论等。

而正在发生的新军事革命对原有军事理论的冲击将是前所未有的。它同时告诉我们，和平年代两军的较量，更多地表现为思想和理论的较量。要制胜先要有制胜之道。

国防大学军兵种教研室副主任、教授霍小勇认为，在战争时期，通常是先有胜仗，后有胜论，胜论是对胜仗的总结和归纳；和平时期，是胜论在先，才有胜仗，军事思想和理论的高度，是对未来战争规律的认识和预见。

他常说：“军事谋略必须走在时代的最前沿，谁有创新，就等于在探索战争特点和规律，预见战争发展和未来，占据制高点，掌握指导战争的主动权。”

先进的军事理论和思想的指导，可以弥补装备的落后。回顾我军建军 70 年的历史，为什么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为什么能够战胜具有优势装备的敌人，就是因为有毛泽东的先进军事战略思想的武装。战略指导思想的较量是高层次的较量。战略指导思想对了，人才会有，装备也会有，什么都会有。

军事理念的滞后，对于一个国家，一支军队来说，是非常可怕的。军事科学院指导部少将副部长、博士生导师刘继贤这样告诫我们：在军事科学研究方面，我们应该有危机感和紧迫感。这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注意到我军同发达国家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也要看到我军在军事科学研究上的落后状况。如果忽视了这些基本情况，或者稍微放松军事科学研究，我们将有可能不仅丧失原有的军事科学优势，而且难免在未来的国际战略格局中陷于被动地位，从而使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根本利益蒙受损失。

“军事科学研究的落后，比装备落后更可怕！”他说。

专家档案2 刘继贤：将军 + 学者

刘继贤走上军事科研的道路纯属偶然。1978年军科恢复建设，急需大量干部，军委调南海舰队司令员谭知耕到军科担任副院长。那时，南海舰队某舰刚刚发生一起重大事故。此时，把他调离司令员岗位，显然带有“惩罚性”。舰队有关领导找刘继贤谈话，想让他随谭知耕到军科工作，担任谭知耕的秘书。刘继贤起初不愿意离开舰队，一是他对军科是干什么的不清楚；二是他在现岗位干得很顺手。舰队政委亲自找他谈话，说司令员最近心情不愉快，很需要有一个得力的人当助手。政委甚至给他留下了后路：“你去看看，愿意干就留下，不愿意干再回来。”

于是，刘继贤跟随谭司令员到北京上任。一到北京他就不想回去了。谭司令员是一位老红军，为人很好，他也劝刘继贤留下：“你文化程度高，很适合在军科工作。”而刘继贤呢，这时竟然迷上了军事科研。他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研究领域。一旦钻进去，有无穷的乐趣。一部人类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人们诅咒战争，可是战争却又催生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为了成为战争的胜利者，人类几乎把全部的智慧都用到了战争中。徜徉在以往的战争中，可以让人领略无限美丽而又险峻的智慧。当然，刘继贤也意识到在军科工作，如果不搞军事科研是没有发展前途的。担任副院长的谭知耕主管学院的学术研究，刘继贤经常要给他起草各种讲话稿，给研究报告提供参考意见，如果是一个学术外行是难以胜任这项工作的。他每天晚上都要到办公室加班读书写文章，摘录的资料卡片，可以装好几箱。一些军事学术刊物开始发表他的理论文章。他结合工作搞研究，研究又促进了工

作，奇怪的是，这时竟有人风言风语地批评他“当秘书写研究文章是不务正业”。刘继贤就把所得几百元稿费全部交给组织做党费。组织部收了 10%，其余退还给他，接着刘继贤又把剩余稿酬捐赠给了北京儿童福利基金会。“利”没有了，可是“名”还有啊，刘继贤只好在发表文章时用化名和笔名。

但刘继贤却非常有自己的主心骨。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科研”不放松。如果不是坚持做学问，刘继贤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学术成就。1984 年至 1986 年在国防大学学习期间，他每学一门课都要写一篇学术文章，学习结束时，他已经发表了 20 多篇文章。学校建议原单位对他提两职使用。

今年 47 岁的刘继贤将军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非常突出，他在三个方面都有独特的建树：一是关于领袖人物的军事思想研究，已经出版的专著有《毛泽东军事思想原理》、《邓小平新时期军事理论研究》、《江泽民军事论述研究》，前两部书均获得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及全军军事科研成果特等奖。第二个方面是国防与军队建设研究，主编了百万字的《未来的国防建设》，与海军指挥学院徐锡康教授合作撰写了《海洋战略环境与对策研究》，与儿子合著《科学技术与未来军队建设》。父子两代共同研究军事理论，这恐怕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刘将军的儿子刘洋现在是军事经济学院的硕士研究生。第三个方面是对军事科研本身的研究，有两本重要著作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一本是《军事科学研究与管理》，一本是《军事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科概要》。

刘继贤指出：军事科学理论对战争和国防实践的指导地位与作用，对于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相对落后的军队来说，显得更为

突出和重要。我国经济、科学技术和军队的武器装备，同世界发达的国家和军队相比，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况。在今后若干年内，这种局面还难以有大的改变。一旦爆发战争，我们仍然要准备用相对劣势的武器装备去对付、战胜优势装备之敌。这是我们的实际情况，也是思考问题的基点。为了战胜敌人，保卫国家的安全，保障经济的发展，我们要发挥国家的总体力量，发挥人民战争的整体威力，同时还要发挥军事科学的指导作用，依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用人的高度能动性弥补物质条件的不足。这其实是一条我军已经走过今后还将要走的制胜之路。

正因为这样，在战争尚未来临之时，建立起我们的战略“思想库”，就不仅显得需要，而且显得非常迫切了。

目前在军事学术界炒得最热的新军事革命问题，最初就是起源于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阿尔文·托夫勒的理论提出后，美军的许多上将、中将反复找托夫勒聊天，一起研究如何把托夫勒的理论应用到军事领域中来，调整军事建设的思路，推动军队的改革。

重视发挥“思想库”的作用，是信息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因为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的超量爆炸，各种情况的瞬息万变，导致摆在决策者面前的未知数越来越多，需要有专门的机构对信息进行加工整理，为决策者充当“望远镜”和“显微镜”，使其在变幻莫测、混沌迷离的环境中，看得更远，分得更清。“思想库”是一种软科学咨询机构，也称“智囊团”。它聚集一批博学多才、深谋远虑、能谋善断的智囊人物，汇集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教授、科学家，以跨地区、跨国界的集体智慧，运用软科学对经济、技术、军事和社会的发展进行研究，为决策者提供最佳的方案、策略，帮助其运筹、决策。

美国的兰德公司、英国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就是充当此类角色。

这类“思想库”或信息咨询公司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朝鲜战争前，兰德公司向国防部推销一份秘密报告，其主题词只有七个字，但要价 150 万美元。国防部认为这是敲诈，不予理睬，结果“在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战争结束之后，国防部才想起那份报告，要来一看，那 7 个字是：“中国将出兵朝鲜”。国防部为此而追悔莫及。兰德公司除每年出版一定数量的图书外，仅公开发行的各种研究报告、论文就有 400 余份，此外，还有几乎同等数量的秘密报告。每年兰德公司出版部向各国政府、学界、企业发出的各种出版物达 40 万份。该公司研究的领域涉及应用科学和技术、民事司法、刑事司法、通讯、防务观念及部队和支援系统，还有教育、能源及环境和天然资源、情报系统、国际问题、恐怖主义与国家冲突等数百个项目。早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前，兰德公司就已在相当规模上，着手分析精密制导武器对未来军事行动的影响了。1984 年，他们就完成了《2000 年的空军》的秘密报告。

刘继贤提出，为了国家安全，要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既要把专家当做“脑库”来用，同时也可把专家的智慧当做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一张牌来打。

沈伟光在他的《新战争论》中专门写到了“理论威慑”问题。他认为理论领域的优势，可以展示一个民族的智慧，一个国家的潜力，可以创造出无形的威慑力量，是信息战的一种形式。虽然理论的作用不像原子弹那样能直接成为战斗力，但可以转化为威慑力量，成为一种无形的战斗力，使敌人望而生畏，畏而却步。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就是具有极大威慑力的一种理论。虽然这种理论还在完善阶段，但却已引起世界各国的恐慌。因为

通过这个理论模型，人们看到了战争的更大的毁灭性。

第四章 拒绝失败

转型与超越

要活跃当前的军事理论研究，应该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科技进步的灵魂，也是今天我们迎接新军事革命挑战要把握的精髓。要多研究未知领域，不炒别人的剩饭。军事理论领域要创新的内容很多，比如对马列军事理论的研究要创新，要研究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军事科学各学科的理论要创新，过去没有的要填补空白；尤其要重视研究现实中的重大问题，拿出新的可行的对策来。对如何确保军队打赢未来的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如何保持军队在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条件下不变色，都必须列入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研究员、战略学博士生导师彭光谦大校正在写的一本书叫《战争控制论》。他认为，工业时代的战争是一种绝对形态的战争，以消灭对手，占领对手的国土为目的。工业时代的战争，其目的、手段都是无限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核武器的出现，使战争形态开始发生变化，因为战争的手段与战争的目的出现了背离，战争不但不能使交战方达到经济和政治的目的，而且可能导致人类的毁灭。因此，21世纪是战争控制论的时代。战争的目标是有限的，而战争的手段、时间、空间、方式都是可控的。

专家档案3 彭光谦：吞吐风云的纵横家

许多人习惯地称呼彭光谦为“彭大校”。我采访他时，

正好他刚刚获得全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

彭大校 1943 年出生于武汉，从小家贫。他上中学时用获得的助学金买的第一本书是郭化若翻译的白话《孙子兵法》。尽管他高中毕业时数理化的成绩都是 100 分。可是他却感到自己更喜欢宏观思维和谋略思维。读孙子的著作和《福尔摩斯探案集》，要比解数学方程式有味道得多。1962 年高中毕业后他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北京大学世界历史专业。从此他整天在世界历史的海洋里漫游，心中激荡五洲风云。

他没有遇到好时光。北大毕业时，“文革”开始，他被分配到山东的军垦农场劳动。虽然胸怀世界，放眼全球，可是每天干的却是挖排水沟、插秧、割麦子等力气活。某坦克部队到农场来选人，看上了他，于是便穿上了军装。1985 年部队搞精简整编，他在某工程科研所政委的任上主动要求调到军科从事战略理论研究。从此如鱼得水。

1994 年 9 月，彭光谦受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战略思想库邀请，前往担任客座高级研究员。在美期间，他针对一些人的反华情绪，在美国《防务周刊》和侨报上发表了 8000 字的文章，论述“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与亚太和平”，提出发展中美关系的两大重要基础，在美国高层决策机构产生了较大影响。美国国防大学和美国太平洋总部联合召开太平洋问题国际研讨会，彭光谦代表中国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在促进东南亚和平与发展中的建设性作用》的发言。在自由研讨时，一位美国军人反复问他一个问题：“你如何看待美军在亚洲的存在？如何看待美军在亚洲的作用？”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既要坚持原则，又不能过于生硬。不回答也不行。彭光谦灵机一动，说：“从长远看，任何国家的军队都应该撤回本土。但考虑到美军在亚洲的存在

是冷战遗留的产物，允许它的撤离有一个历史过程。”这位美国军人咧咧嘴，对这个回答似乎很不满意，但又说不出话来。

这位在少年时期就沉迷于《孙子兵法》和《福尔摩斯探案集》的“纵横家”，近年来研究成果迭出：著有《邓小平战略思想论》、撰写与主编了《军事战略简论》、出版了由他担任副主编的180万字的《世界战争通鉴》，发表论文上百篇，此外有多份研究报告、战略咨询报告送往高层决策机关。他的许多战略思想观点，让人听了耳目一新。

彭光谦对我军21世纪的发展思路提出了他的构想：

A. 我们无意做超级大国，即使将来国家实力增强了也不做超级大国。我国的性质与“以仁为本”的战略文化传统决定了我们决不会像某些大国那样把有限的资源浪费在无限的霸权主义欲望之中。我军下个世纪无论怎么发展，就其规模与性质来说都是适度型与防御型的。其根本目的在于满足国家利益对我军最基本的安全需求。此外，再无其他目的。这一目的的具体要求是保卫国家的安全不受威胁，为国家的长远建设创造一个稳定的和平环境：保卫国家的主权不受侵犯，为中国人民自己当家做主创造一个和谐的战略空间，保卫国家的领土不受割裂，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准备必要前提，保卫国家利益与民族尊严不受损害，为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开展平等互利的国际交往提供必要支持。

B. 衡量下个世纪我军的发展目标是实现以下四个方面的转型：一是实现由机械化半机械化战争形态下的军队向高技术战争形态下的军队转变；二是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军队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军队转变；三是由主要满足国家生存需要的临战应急型的军队向着重满足国家生存与发展需要的能力牵引型的军

队转变；四是由数量规模型与人力密集型的军队向质量效能型与技术密集型的军队转变。

C. 21 世纪我军的发展应包括体制、机制、结构、理论、观念与技术等在内的全面发展与整体提升：一是技术进步，即加大科技投入，提高军队武器装备的高技术含量，尽可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在军事技术上存在的“代差”。二是体制改革，重点是贯彻精兵、合成、高效的原则，与现代战争要求相适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家政治体制相衔接，实现人与武器的最佳组合。三是理论创新，在充分吸取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精华和世界先进军事工业的基础上，创造性地继承与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探讨现代条件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治军与作战的新特点、新规律，创立具有时代气息与中国特色的现代军队建设理论与作战理论。

.....

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

历史上的无数次战争，已经给我们准备了丰富的教材：谁保守，谁蹈袭前人，谁就将成为下一次战争的失败者。

两次世界大战初期失利的国家，几乎都是军事思想上保守的国家。70 多年前，意大利人杜黑在《制空权》一书中做出了“空中战场是决定性战场”，“将改变整个战争，也改变陆战和海战的面貌”的预言。美国的米切尔也大声疾呼要建立独立的空军，要占领制空权。但这两位军事理论家的预言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那些保守的陆军将军们对他们嗤之以鼻。当人们看到空战初期的飞行员，驾驶着歪歪斜斜的木制飞机，从机舱向外面扔手榴弹时，谁会相信这玩意儿能对陆军构成多大的威胁。珍珠港事件和塔兰托战役，印证了杜黑和米切尔理论的先见之明。但此时人们已经付出了血的代价。

1941 年德军入侵苏联，从 6 月 22 日到同年 11 月就深入苏联腹地 850 ~ 1200 公里，短短几个月便占领了 15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苏联失利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极为重要的一条是苏联仍然囿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陈旧经验，对机械时代的战争新特点认识不清，对坦克和飞机所能达到的新的战争效果认识不足。当苏联的将军们开始清醒时，已有数十万人倒在血泊中。

国防大学胡思远副教授强调，在未来的知识经济条件下，军事领域的创新已经成为自身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

迎接这种挑战，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历史责任。

他认为，工业时代的军队的建设模式以“重复性军事实践为主”，而信息时代的军队建设模式以“创造性军事实践为主”。创造性军事实践，就是以军事发展上的创新为主要动力，对军队的战法、训法和建设方法进行不断创新的过程。

创新，意味着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

要用未来的我们打败未来的敌人。用现在的我们打败现在的敌人，不行；用现在的我们打败未来的敌人，那就成天方夜谭了；用未来的我们打败现在的敌人，这叫过低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我们要用超前的眼光看到敌人的发展，也要用超前的眼光设计我们的未来。

中国军队面对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挑战，最核心的问题是创新。不创新就面临着淘汰、死亡。要勇于舍弃那些曾给我们带来荣耀的经验和手段。

专家档案 4 胡思远：数字化教员

胡思远站在国防大学的学术报告厅讲坛上，正在作学术讲演。他讲演的题目是《关于美军战略问题》：

“……美军的战略思想与军队建设的规模，我可以用

121008 这样一组数字来表示。如果美军准备同时在东北亚、中东地区打赢两场高技术战争，那么，他们军队建设的规模便需要 12 个航空母舰编队、12 个陆军师、12 个航空飞行大队，每年需要投入的军费为 3150 亿美元；如果采取打赢一场、控制一场战争的战略选择，美军的建设规模便需要 10 个航空母舰编队、10 个陆军师、10 个航空飞行大队，每年的军费开支为 2950 亿美元；如果他们采取打一场、放弃一场的战略选择，美军的建设规模是 8 个航空母舰编队、8 个陆军师、8 个航空飞行大队，每年的军费开支为 2750 亿美元……这就是 121008 的内涵，美军的战略选择和部队建设的规模、军费投入预算就是这样密切相关……”

台下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胡思远是国防大学兵种教研室副教授。在国防大学他被誉之为“数字化教员”。他讲课或讲演，往往不看讲稿，成百上千个数据脱口而出。军事科学院战略部邀请他去讲科索沃战争问题，他不看任何材料，随口引用了上千个数据来分析问题。军科是全军最高的军事科研机构，在这里讲军事问题要想得分可不容易。如果有人用“凑合”来给你的讲演作点评，那就算是很高的评价了。

但胡思远一次次赢得同行的热烈掌声。

战略部部长姚有志将军说：“老胡，你神了。这么多数据，你是怎么记住的？你这大脑简直就是电脑啊！”

胡教授与我谈论最多的是创新。有人说，要“找”新观念，请找胡思远。他说：“我写的文章，包括我对你谈的许多看法，全是我自己研究的心得。全是新东西。如以色列空军在一次轰炸黎巴嫩的雷达和炮阵地中，为什么选择在下午 2 点？我在地球仪上反复琢磨，发现下午 2 点时，正好太

阳以 60 度角对着黎巴嫩军队的炮阵地，以色列的飞机从太阳里钻出来轰炸黎巴嫩的炮阵地，而黎军却很难发现他们；再比如，在科索沃战争爆发前，我断定美军在科索沃战争中将主要使用的是空中力量。为什么？因为美军打仗有三个基本原则：少死人、少花钱、省时间。根据以往的经验，美军作战的伤亡比率，陆军是 5：1，海军是 25：1，空军是 75：1，使用空军死人最少，因此我得出结论美军不会轻易出动地面部队，或根本就不打算出动地面部队……”

科索沃战争打响前后，胡思远先后写了 40 多篇分析战局的文章，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他的文章《北约对科索沃如何出手》，刊登在 1999 年 3 月 12 日的《中国国防报》“军事特刊”的头条位置，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如何发动科索沃战争，采取什么样的作战样式，不仅做出了准确的预测，而且都不幸而言中。据说这篇文章让美国人看后非常恼火。那是因为仗还没有打，就让一个中国学者看出了该怎么打。要命的是，这些分析都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美国人不能为赌这口气而违背客观规律。

胡教授的办公室里显得有些凌乱。桌子上、椅子上、窗台上到处堆满了刊物和书籍，随手记录的资料卡片，这儿一堆，那儿一沓。胡教授说他的稿酬大都买书了。他个人藏书有一万多册。他有一个观点，“书烂了，思想才能立起来。”书不是放在书橱里做样子的，士兵只有展开才能形成战斗力，书只有读烂了，才能领会个中三昧。他说：“做学问如烧开水，要不断地升温，才能烧开。”“知识如滚雪球，越滚越大，不滚就化。”

此类精辟的箴言，不断地从他的嘴巴里蹦出来。他到地方高校讲课，往往是讲台上窗户上都挤满了人，讲到精彩处

欢声雷动。他出差坐在火车软席车厢里，被一位发了财的美籍华人大老板认出来，“你就是胡思远啊！”大老板随手掏出一张支票说，“你说中国造航母需要多少钱，我捐助 500 万。”

胡教授提醒我特别注意一下以色列军队的创新意识。“我曾碰到以色列的一位飞行中队长，他说他们可以根据实战需要自行设计飞行动作，他们有权更改大纲。”

以色列在世界上是一个典型的蕞尔小国，它的面积即使加上整个巴勒斯坦，也仅 27000 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半多北京的面积。1984 年的人口为 405 万，也只有北京的一半。

它的周边被四个敌对的阿拉伯国家——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死死包围着。这四个国家的总面积为 129 万多平方公里，是以色列土地的 48 倍；人口总数为 6161 万人，是以色列的 15 倍。

在五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所表现出的军事力量，一次次让世界震惊。五次中东战争，以色列都是胜利者。

在地理和人口方面，以色列是小国，可是在军事上却无人敢说它是小国。

以色列军队中最富有战斗力的恐怕又是空军。他们在飞行员的挑选和训练上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训练难度世界第一；淘汰率世界第一；成员年轻化世界第一。他们的战斗机飞行员服役最高年龄为 20 岁，教官的年龄平均不到 25 岁。

1967 年 6 月 5 日 7 点多。

地中海上空，40 架以色列战斗机呈密集队形向西南方向飞去。飞行高度 50 米，飞机间隔只有一个翼展。飞机几乎是贴着蔚蓝色大海的浪花飞行。远看如同一群逐浪飞翔的海鸥。

此时，一辆总督轿车正疾驶在开罗东部的一条高速公路上。车上坐着埃及第六空军基地的军事长官阿萨德·埃勒将军。他刚刚参加完作战会议。

“要不要听新闻？”深知将军习惯的驾驶员拧开了收音机的旋钮。喇叭里传出纳赛尔总统坚决用武力封锁蒂朗海峡的讲话。就在这时，驾驶员蓦地惊叫起来：“啊，飞机！”

看见一架架飞机几乎从头顶上呼啸而过，将军生气地把头探出窗外，朝天空大吼一声：“胡闹，不怕摔下来……”可是当他看清机身下蓝色的以色列机徽标志时，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还没有等他转过神来，埃及第六空军基地的跑道上，已经传来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一朵朵黑色的蘑菇云腾空而起。

以色列飞机在8时45分同时袭击了埃及9个机场。五分钟后第十个机场也遭到袭击。四机编队的飞机在四分钟里向各自的目标投弹一次，又用机枪扫射四次。仅隔数分钟，第二个波次的攻击又以同样的程序，将所有机场扫荡了一遍。有人比喻：以色列飞行员动作之准确，有如将录像带倒回去又重放了一遍。几乎在同时，约旦、叙利亚的机场也遭到同样的洗劫。可怜阿拉伯的数百架飞机，尚未升空就已经千疮百孔……

就这样，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序幕刚一拉开，胜败就已成定局。以色列在发动空袭时，动用了286架飞机，而以色列空军的全部飞机也就是286架！此举使得美国的军事专家极为震惊：“对于一个背后是海，三面被敌视国家包围着的小国，敢把所有飞机一次全部投入攻击对手的恐怕只有以色列。而敢于这样做的就不是小国。”

第四次中东战争初期，埃及军队用水泵冲开以色列的巴列夫防线，以色列面临着全面溃败的危险，可是在最后一刻，犹太人不仅顶住了埃及的进攻，而且扭转战局，反败为胜，让全世界的

人为之惊叫一声：“好险！”

每次打法都不一样，每次都有奇招。靠着超人的创新战法的能力，以色列编写了一个个战争神话。

研究失败

美国的军事评论家们曾严厉地苛责美军发展历程中出现的马鞍形路线：前次胜利往往导致下次的失败。美军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赢家，可是在接踵而来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饮足了失败的苦酒。美国人从中悟出一个道理：避免失败的诀窍是研究失败，并在设计未来战争时多把自己想象成失败者。

金一南研究员在美国进修期间发现，美国军人很少以夸耀的口吻提到海湾战争，即使研究海湾战争也更多的是寻找暴露出的问题。参联会主席鲍威尔告诫人们：“沙漠风暴行动是与理想的敌人进行的一场理想的战争……我们获得了理想的联盟、理想的设施和理想的战场。我们在总结战争经验时应该格外当心。”

相反，美国人对越战却耿耿于怀，紧紧揪住不放。因为这是美军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有很多高级军官至今还在探讨，美军是如何在越战中一步步深陷泥潭的？越南丛林中沾着牛粪的竹签太让美国军人刻骨铭心了。海湾战争中担任指挥的两位四星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克林·鲍威尔和海湾战地美军中央总部司令诺曼·施瓦茨科普夫都参加过越战，在施瓦茨科普夫的传记中有许多参加越战的痛苦回忆。海湾战争的胜利使美军终于拂去笼罩在头顶上的失败的阴霾。但历史的教训告诉他们，尽快忘记胜利，才是获取下一次胜利的良方。1994年罗得岛州波特海军军事学院举行大规模海上对抗演习。在这场有8名海军将军、40名海军上校和一批政策分析家参加，设想下个世纪初在西太平洋与某大国发生对抗的演习中，美国海军遭到了沉重打击，实

施有效防御之前第七舰队的航空母舰被巡航导弹击沉……美国军人喜欢这样把自己置于失败者的地位，这比用自酿的“胜利”浆液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显然要高明得多。

国防大学兵种教研室教授霍小勇应邀到美国国防大学进行讲学和学术交流。在一次座谈中，美方的一位将军突然发问：“战争时期，军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用生命和鲜血在敌人的胸膛书写历史，请问和平时期军人面临的挑战是什么？”霍小勇稍一思索，当即回答：“和平时期军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超越自我，以勇于创新的精神去书写新的历史。”

这话确实说到了要害之处。霍小勇经常思考的问题是：作为国防大学的教研人员，要教出水平，研出成果，必须首先是勇于创新的改革者，要以不懈进取的毅力、严谨的学风，去关注和回答在理论和实践中遇到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

专家档案5 霍小勇：每天有十个新的想法

全美信息战权威、美国国防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信息运作部部长大概不知道，首创“信息战”理论的其实是一位“非西方人”，要不然他不会在一见到中国军事教官霍小勇时，就口若悬河地大谈特谈信息战的优势与发展前景。在他看来，信息战似乎是美国的专利，他当然就是世界上最具权威的信息战专家了。

他不知道，他所面对的这位中国教官是一个什么“量级”的人物。不揣对方深浅，过早地暴露自己的实力，显然在谋略上就逊了一筹。

霍小勇是国防大学兵种教研室副主任、硕士生导师。1998年12月应邀赴美讲学。作为国防大学公认的“大牌”教员，他曾在1990年、1996年两次全校性的教学法和“创

“优质大课”比赛中，荣膺第一名，在藏龙卧虎的中国军队最高学府显示了自己的实力。

还是在美国国防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当那位信息运作部部长仍在口若悬河地畅谈信息战的发展前景时，霍小勇突然反问道：“部长先生，假如你们有个对手，甚至这个对手还不穿军装，但他用信息技术搞乱了纽约股票市场，美军当如何还击？”他又指出，信息战使传统的战争规则失效，当社会力量也能介入时，战争将越来越难以控制；当信息战走出传统的战场范畴，其危害性将使信息战最终走向“核武器效应”——被禁止与限制，由“武器的威慑”，变成“威慑的武器”。霍小勇的观点一下子把部长给震住了。他本来是坐着的，立即便站了起来，走到霍小勇跟前折服地说：“过去人们常说美国军队长于技术，中国军队长于谋略，我们从霍教授身上看到了中国军人的这种明显优势。”

有关霍小勇的故事，几乎都跟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有关。他深知作为一个教员，正像人们常说的，要给别人一碗水，自己首先得有一桶水。

出访美国前，霍小勇也不无担心：中国不是军事强国，以中国的一名普通军事教官走进美国的国防大学，人家会把你当盘“菜”吗？但没过多长时间，他就用自己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大洋彼岸军人的尊敬。在麦克尔堡美国国防大学的礼堂，霍小勇作了题为《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高等军事教育》的讲演，讲演和现场答疑结束后，热烈的掌声使得他不得不三次起立、还礼。来自亚洲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纷纷上前祝贺，称赞他“讲出了东方人的智慧”。

听过霍教授讲课的人都说，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他的表情、动作与他讲课的内容和谐结合，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

界。他的课抓人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课的内容包含了大量最新的信息，不是炒冷饭、炒剩饭。

霍小勇清楚地记得，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博士在评价美国氢弹之父泰勒的成功之路时，有过一段耐人寻味的描述：泰勒几乎每天都有十个新想法，其中有九个半是错的，但他不在乎。然而，他就是凭着每天半个对的新想法的积累，获得了巨大成功。

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善于创新思维，这是霍小勇的最大特点。

他有一双独特的善于敏锐观察的眼睛。这双眼睛能够捕捉到比事件本身多几倍的研究信息和机遇。见人所未见，进而想人所未想。美国空袭伊拉克，人们的注意力常常被美国大量的高新装备所吸引，但是，美军的一次小小的军事行动却引起了他的注意。1996年9月3日，美国动用4架B—52轰炸机，从本土出发，飞越关岛、菲律宾，绕过印度洋，直接攻击了伊拉克禁飞区里的目标。B—52轰炸机是美国60年代初期的装备。1962年10月，美国已正式宣布不再生产这种装备。尽管后来对这种飞机进行过一系列技术改造，但用现在的技术平衡量，也仍然属于第二代战机，无法与现在的第三、第四代战机相比。然而，这4架B—52轰炸机，在卫星系统的导航下，用17架先进的加油机保障，进行十多次空中加油，连续飞行34小时，航程达21880公里，在距目标800公里的位置，使用先进的巡航导弹攻击了预定的目标。从这个战例中，他得到一个启示：当一般技术兵力兵器纳入到高技术兵力兵器的系统效应中，可以使一般技术的兵力兵器产生高技术含量的作战行动。这对指导我军立足现有装备探索和研究以劣胜优的理论和战法，有重要的借鉴作

用。当他把这一观点运用到全军军以上干部科技研究班的教学中去时，得到将军们的认同。

90 年代末，霍小勇从国际新海洋法规定的 200 海里所
属经济区，被一次瓜分全球三分之一的海洋；从世界各国都
在裁军，惟有海军不仅不裁而且都在暗中扩军的动向；从英
阿马岛战争英军海军兵力全球运用的特点；从南海斗争日益
加剧到周边国家大力增强海军实力的种种迹象，进行广泛的
收集整理和分析，并据此提出了“强化海军独立作战，强化
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的双重战略观念”；提出“黄金
海岸”是国家和地区生存与发展的命脉，具有特殊的战略
价值；提出了和平时期“整体威慑、显示存在、有效遏制”
和局部战争中“灵活反应、前伸作战、快速制胜”的不同
战略运用指导思想。海湾战争一结束，他的论文《国际战
略格局变化中的海军战略思考》就脱手了。在这篇近万字的
论文中，他精辟分析总结出了海军战略运用的六大特点，
并以此切入，对当代我军海军战略指导及海军建设提出了一
系列带有创新性的见解……

迄今，他发表论文上百篇，与他人合作完成专著 6 部、
咨询报告 6 份，共 200 余万字，获军队、大军区级学术成果
奖 20 多项。他编写的《海军战略概论》教材是我校军种战
略学的首创；他的论文《探索具有我军特色的战役理论体
系》在全军首届战役理论研讨会上，被军内院校作为硕士
研究生的范本。

老霍 40 多岁的年纪，脑袋上的头发却早已擅离职守，
但智慧却与日俱增，一个个新的想法不断从他倍儿亮的脑门
上跳出来……

有一位空军作家认为，相对于美国的科技水平，美国的军事理论则是滞后的。美国军人们言必称“高技术兵器”，可是却很少把战争作为一门艺术来研究。带着《孙子兵法》走上海湾战争前线的美国军人，并没有领悟孙子思想的精髓。他说：“我们看不出美国人在这场战争中展示的军事思想与其他国家有多大差距，起码不会比他们之间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更大。也许正因为如此，这场战争才没能成为军事艺术的杰作，倒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武器的豪华博览会……”我们要加快发展我们的科技，但要在短期内赶超美国恐怕也不太现实。但中国人有自己的优长，那就是自孙子以来源远流长的“东方智慧”。美国人不怕我们的科技，但是怕我们的“智慧”。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充满自信。

中国军人既需要学习美军“打什么仗造什么器”的对技术的迷恋和追求，也不能丢弃“有什么器打什么仗”所需要的智慧。

创造性思维的关键点

创造性思维的关键表现在——第一，要获取世界最前沿的学术信息和外军军情；第二，应谙熟本国的国情和军情；然后，创造出中外前所未有的新的战略理论和新的战法。按照这一思路，陈伯江的姿态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专家档案 6 陈伯江：出色的访问学者

1998 年底，一本很有影响的著作在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书名为《美国高级将领与著名学者访谈录》，作者陈伯江是军事科学院的大校研究员。

陈伯江 1997 年 6 月至 1998 年 6 月，赴美首都华盛顿的

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研究所从事客座研究。他在抓紧时间提前完成了美方要求的研究工作后，便确定以“美国的军事革命与跨世纪国防的发展”为题进行访谈。接受陈伯江访谈的有 18 位美国高级将领和著名学者。

陈伯江找到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霍普金斯大学尼采国际研究生院战略研究所教授埃利奥·科恩博士。科恩教授发表过大量有关战略与军事问题的著述，并且是著名的海湾战争研究专家。他曾亲自领导《海湾战争空中力量调查》和空军多卷本《海湾战争研究》的撰写工作。

访问科恩教授时正值伊拉克第一次武器核查危机剑拔弩张之时，美国官方扬言要对伊动武，五角大楼正调兵遣将，进行动武部署，海湾战事一触即发。就在访问的前一天，陈伯江在一个刊物上读到科恩教授写的关于美国如何对伊拉克动武的文章。陈伯江在请科恩教授谈了美国研究军事革命的过程、特点、影响及发展趋势之后，问道：

“美国是在 1991 年海湾战争之后开始军事革命和未来战争讨论的。由于当前的武器核查危机，美国正在计划对伊拉克实施另一场军事打击。从军事革命的角度来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进行军事打击，其战略、作战方法或战术的运用会有什么变化？”

科恩教授不假思索地回答：“关于这个问题我写过一篇文章，看来你已经读过这篇文章。我不知道我能对文章内容做多少补充。如果要补充的话，其内容将是保密的。而我不能泄密。我认为最大的变化是我们将使用的武器全都是精确制导武器，情报基础也将会比海湾战争时好得多。我不能肯定作战技术是否有很大的不同，是否会更加侧重于攻击我们在海湾战争时所说的战略目标。”

十个月之后的 1998 年 12 月 17 日，美英两国发起了对伊拉克实施空中打击的“沙漠之狐”行动。其作战手段的新变化，印证了科恩教授的预测：美军在精确作战能力和信息优势方面比海湾战争有了明显进步。

在陈伯江寻找访谈的理想对象时，学术界的人几乎都不约而同地向他推荐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博士。

威廉·佩里于 1994 年 3 月至 1997 年 1 月在克林顿总统第一任期时担任国防部长。此前曾长期领导美国的防务研究和军事工程技术发展工作，并在 70 年代后期担任过国防部副部长。美军正在使用的高技术武器如隐形飞机、精确制导武器、先进信息装备的研制开发，几乎都与这位著名的斯坦福大学毕业的数学博士有关。美国的“军事研究高级指导委员会”就是他批准成立的。他对推动美国的军事革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有的文章称他为“军事革命之父”。

他四处打听如何与佩里取得联系。恰好，与他同在外交研究所做客座研究的美国空军中校巴特勒也准备采访佩里，并与佩里的秘书取得了联系。他了解到陈伯江也有此想法，就答应帮助促成此事。

佩里离职后，立即被斯坦福大学聘为教授，并担任该院国际安全与军控中心名誉主任。斯坦福大学位于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市，陈伯江所在的乔治城大学在东海岸的华盛顿。他们最初约定的访谈地点在斯坦福大学。他与巴特勒中校商定好按预定时间专程去西海岸。但碰巧的是，佩里正好在预约的时间之前来到华盛顿参加国会听证会，于是，他们把访谈的地点改为华盛顿。佩里的秘书告诉说，佩里将于 3 月 19 日早上乘飞机由旧金山飞华盛顿，上午参加国会的听证会，中午在国防大学军官俱乐部就餐，下午 1 点半可以接受

他们的访谈，每人安排一小时。

3月19日中午，陈伯江和巴特勒中校一起驾车前往国防大学俱乐部。访谈被安排在一间小会议室。佩里秘书又告诉他们，由于下午2点半佩里还要前往机场乘飞机去欧洲参加一个会议，因此原定的访谈时间必须缩短，每人只有20分钟。

访谈准时于1点钟开始。巴特勒先谈。陈伯江则利用短暂的时间在会议室外与佩里的女秘书聊天，了解有关佩里活动的情况。

巴特勒中校于1时50分准时结束访谈。陈伯江进去边与佩里握手边说：“今天我有机会对你访谈，感到非常荣幸。在我着手进行有关美国军事革命、未来战争和国防发展问题研究的时候，你是我最想访谈的对象。因为据我所知，你本人不仅亲自领导了对于当今美军正在使用的先进军事技术有着重大贡献的防务研究和工程项目，而且在你担任美国国防部长期间，又对推动军事革命的讨论发挥了重要作用。非常感谢你所给予我这个能听取你对上述意见进行阐述的机会。”

年逾古稀的佩里精神矍铄，颇有学者风度，他主动拿出了陈伯江事先给他的提纲。陈伯江说：“为了充分利用时间，我就不逐一提问了，请你按提纲谈就可以了。”佩里笑了，回答：“这真是个聪明的主意！”

陈伯江在提纲中一共提了近20个问题：

首先我想知道的是，推动美国这场军事革命讨论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美国可能希望从这场着力培育的军事革命中得到什么好处？

有人认为，目前技术发展的速度已经超过了军事理论的

发展，因此军事革命的重点应当放在军事理论和编制体制上，使之适应技术的发展，你曾长期领导过防务研究和工程项目，你怎样看待这场军事革命的重点和实质？

与历史上发生过的军事革命相比，对于当前这场军事革命，特别值得注意的特点是什么？

1978年，你作为当时的国防部副部长，曾经预言美国很快具有能够“发现战场上所有高价值目标”的能力；“直接攻击所看到的每个目标”的能力；以及“毁伤所攻击的每个目标”的能力。20年之后，你对美国当今和未来的这些能力有何评价？

我注意到你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战争的艺术需要秘密和突然，而和平的艺术需要开放和信任”，怎样才能促进国家间的开放和信任？

.....

预定的20分钟时间到了，佩里还没有回答完，而他的谈兴正浓，结果又延长了10分钟才答完所有的问题。秘书两次进来催促他们才结束谈话。

这次成功的访谈，大大增强了陈伯江完成整个计划的信心。接下来，他又访问了自称“狂人”的美国前“军方第二号人物”——美国参联会前副主席威廉·欧文斯海军上将。

威廉·欧文斯在任上时，负责美国冷战后时代武装力量的重组和重建工作。由于他将商业高技术引入国防部的军事运用中，并倡导和推行了军事领域的革命，因而被公认为是自二战以来军事系统需求方面最重大变化的设计师。

访问欧文斯也很费了一番周折。欧文斯退休后立即担任了科学运用国际公司总裁兼董事会副主席。这是美国一家最

大的雇员所有的高技术公司，拥有员工 3 万余人。主要生产军方和政府使用的信息技术、系统一体化、电信等高技术产品。年产值达 40 多亿美元。该公司总部在美国西海岸的圣迭戈，在世界上 150 个城市设有办事机构。欧文斯穿梭于世界各地，行踪不定，陈伯江几次联系都无结果。但陈伯江没有轻易放弃访问欧文斯的计划，他抓紧空余时间做了许多准备工作，读了所有能收集到的有关欧文斯的资料 and 文章，列出了 10 多个需请欧文斯回答的问题。他把问题寄给了欧文斯的助手布莱克博士。希望他能安排时间访谈，并表示实在无法安排，采用电话或书面采访的方式也可以。

机会来了。布莱克收到陈伯江的信时正好赶上欧文斯来华盛顿，欧文斯看了这位中国学者提出的书面问题后，欣然答应接受采访。在布莱克博士的安排下，陈伯江于 3 月 26 日下午来到科学运用国际公司在华盛顿的办公楼。在一个小会议室里，开始了他对欧文斯的访谈。从欧文斯的态度看，他之所以乐意接受这位中国的普通学者的采访，确实是被陈伯江的学识水平打动了。他说：“我已看过你的访谈提纲。我认为你对我本人以及美国的军事革命都非常了解，因此我愿意接受你的采访，并愿意回答你的所有问题。”欧文斯看了一眼手表接着说，“现在是 2 点 30 分，我已处理完今天的工作，今天下午剩下的时间都是你的了。我不仅愿意回答你在提纲中列出的问题，而且也愿意回答提纲之外的问题。”

陈伯江对欧文斯的访谈持续了近两个小时。这是这位“狂人”很少给予的礼遇。欧文斯的主要观点是：这场军事革命是一种把我们注意力从作战平台引开的革命，其技术基础是“系统集成”，要更加重视传感器和信息优势；这场军事革命的实质是人类第一次对战场了如指掌，使军队具有

“主导性作战空间感知能力”；这场军事革命将使军事力量和力量的平衡发生重要变化，“信息伞”可以代替“核武器伞”；这场革命将导致军事理论、作战概念及文化和军队的编制体制发生重大变革……

专家们提出要让更多的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又一关键点是要形成教育和鼓励创新思维的文化氛围。有学者提出诘问，在我国的历史上曾有过许多重大发明，但为什么却没有引发革命性的变化？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可是率先制造出热兵器的却是西方国家。前不久，一个名叫麦克·哈特的美国人在书中排列了100位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人物。我国造纸术的发明者蔡伦被排在第七位。排在第八位的是德国人谷登堡，他被誉为印刷术的发明者。活字印刷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怎么成了谷登堡的发明？哈特是这样解释的：首先，虽然中国人毕■的活字印刷早谷登堡几个世纪，但欧洲的活字印刷并不是从中国学来的，而是独立发明出来的；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的活字印刷并没有被广泛使用，中国的现代印刷技术来自欧洲。更重要的是谷登堡提出了一套高效率的生产方式。他的近代印刷术出现之后，欧洲科技发展迅速，中国的发展则处于停滞状态，原始的印刷术在中国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

是什么东西禁锢和束缚了中国人的思维？或许应该从中国的文化结构去寻找深层原因。杨振宁博士在比较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教育方式后得出结论说：“究竟哪一种教育哲学比较好呢？或者说，对于学生来讲，应该着重哪一种教育哲学？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你在讨论的是一个美国学生，那就要鼓励他多做一些有规则的训练；如果讨论的是一个亚洲学生，他的教育是从亚洲开始的，那么就需要多鼓励他去挑战权威，以免他永远太胆

怯。”

第五章 未来的命脉

在推动新军事革命的实施，规划未来军队的发展蓝图时，有一个需要解决的前提是国家的发展战略。因为国防和军队的建设必须服从国家发展的长远战略。

国家发展战略是一个军事专家们很难涉足的领域。不管 21 世纪中国国家发展的战略是什么，但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回避也是无法回避的。

那就是——海洋战略。

刘继贤、徐锡康在《海洋战略环境与对策研究》中说：“海洋战略是国家筹划与指导海洋方面各种事务的方略，是为获取和维护国家海洋方面各种利益，而对国家海上各种力量的建设和运用进行的全局性筹划和指导。”

专家档案 7 张世平：中国的马汉

在采访某机械化师师长戚建国时，他极力向我推荐新近出版的一本书《中国海权》。其时，他正在东海海防前沿组织军事演习，住在一座废弃的旧营房里。他的床头就放着一本《中国海权》。戚师长说，这本书的作者“章示平”不知道是何许人也？学问功底很深厚。

真是凑巧。我到军事科学院采访，陪同的同志向我介绍，“我们军科战役战术研究部研究员张世平最近写了一本《中国海权》，反响很大。”于是，我有缘结识了张世平，并获赠他的这本 28 万字的专著。这时我才知道写《中国海权》的章示平，就是眼前这个张世平。

有一位资深学者称：《中国海权》填补了中国海洋理论的空白。

张世平本不是从事海军和海洋战略研究的学者，他的主业是研究战役战术，偶一涉足海洋便不同凡响，让那些吃海军和海洋饭的学人几乎辗转难眠。

此前，张世平已经有《军队指挥系统概论》、《高技术条件局部战争作战指挥若干问题研究》、《毛泽东作战指挥思想研究》三本专著问世。在长期的军事学术研究中，他深深感到军队的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远远滞后于地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个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格局已经形成，可是我们的军事理论还在研究如何防止被动挨打。缺少军事理论牵引的国防建设，其战略指导也必然会脱离国家外向型经济战略发展的需要。21 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是：生存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军事理论要着眼于国家经济发展的大战略，着眼于未来，探寻国防建设的大思路。基于此，张世平将目光投向了浩瀚的海洋。

《中国海权》从写作至出版曾使作者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和精神压力。张世平先是写出了 30 万字的纲目。一位已经退休、正在住院的老将军审阅了纲目后特地约他到医院面谈。老将军指出：这本书的主题、框架都非常好，但遣词造句过于犀利，可能会不利于书的顺利出版。希望他作些修改。不过，老将军约他面谈，不仅仅是交换对书稿的具体意见，而是了解张世平对出版这本书有什么样的思想准备。他问：“这本书写出来肯定会有人出，也会有人看，但对你的个人前途可能会有影响，你准备承担多大的后果？”

张世平回答：“首长，我已经做好了蹲大牢的准备。”

老将军足足有 10 多分钟沉默不语，倏地，两行浊泪从

清癯的面颊上挂下来，然后神情凝重地说：“我支持你，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蹲大牢是不可能的，但对你的职务提升可能会有影响。”

老将军接着又说了一番让张世平受到极大震动的话：“搞理论研究也需要勇于牺牲的精神，战争年代打仗需要冲锋陷阵，出生入死，搞理论研究也要像打仗那样敢于冲锋陷阵。而且，在理论上冲锋陷阵所要经受的考验，往往更严峻！”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这本书问世后反响强烈，并得到不少部队高层领导的充分肯定。军科的领导也给作者以坚定有力的支持和鼓励。

实际上，海洋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2000 多年前罗马共和国的著名哲学家西塞罗就感慨万端地说：“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英国政治家沃尔特·雷利爵士从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的兴衰史中得出结论：“谁控制了海洋，即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即控制了世界财富，因而控制了世界。”约翰·肯尼迪在“基蒂霍克”号航空母舰上作演说时特别强调：“控制海洋意味着安全。控制海洋意味着和平。控制海洋意味着胜利。”

当然，对美国及世界影响最大的是 A·T·马汉的《海权论》。美国史学界称其为“海上力量的思想家”，“是带领美国进入 20 世纪的先见之明的天才”。这位 56 岁便退出现役的海军上校，在十年后因在军事理论上所做出的突出建树又被授予退休海军少将。1884 年，新建在罗得港的海军军事学院院长斯蒂芬·B·卢斯将军邀请马汉上校担任海军历

史和战术教员，向他提供了一个成为世界名人的台阶。通过讲课，他编写了三大著作：1890 年《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1600—1783 年》；1892 年《海上力量对法国革命和法兰西的影响：1793—1812 年》；1905 年《海上力量与 1813 年战争的关系》。这三部著作在中国合译出版时书名为《海权论》。

马汉认为，海洋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财富，从战略角度看，海洋既有商业航运价值，又有军事价值。由于优势的海军力量曾对巨大历史争端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并支配着历史进程，世界局势的发展和未来也日益取决于海洋。因此，美国必须掌握海权。拥有一支能够担负对外作战任务的一流海军，是“确立和维护国家权力的最为重要的条件”。海军的战略目标，是保证国家获得平时和战时的海权；“海军在海上作战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掌握制海权”。

海权是什么？张世平回答：“海权，说到底就是海洋活动的自由权，是海洋国家的合法权利。”

继马汉之后关于海洋和海军战略的理论汗牛充栋，那么张世平的这本《中国海权》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警示和理论启迪？简而言之，这部典型的“中国读本”，对唤醒国人的海洋意识，对呼吁决策部门从“未来生存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海洋，研究确定海军发展战略和关于海洋的方针政策，具有强烈的针对性。

可以断定，这是部将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著作。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头脑中，中国的国土就是“960 万平方公里”，即国土 = 国家所管辖的“陆地”。由于海洋观念的淡薄，使许多人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海洋国土”一说。

张世平通过《中国海权》，试图从根本上扭转中国人的这种陈旧的国土观念。

中国人需要确立的第一个基本概念是：国土 = 陆地国土 + 海洋国土 + 领空，另外还有管辖海域。

按照旧国际海洋法公约，中国的内水加领海面积为 37 万平方公里，那时中国的国土面积实际上为 997 万平方公里。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约”确认“群岛国”概念，使一大片公海成为这些国家的内水；确认“专属经济区”概念及其宽为 200 海里；重新定义“大陆架”概念，并把大陆架扩展到最远可达 350 海里，不足 200 海里的也可以扩展到 200 海里。

从 1994 年 11 月 16 日起，《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生效。这意味着公海再一次被缩小，沿海国家对海洋的管辖范围进一步扩大。

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中国享有主权和管辖权的海域总面积为 338 万平方公里，加上陆地国土面积，中国国土总面积应当为 1298 万平方公里。另外，中国在太平洋中还有一块经联合国认定的，拥有永久开采权的“地”——7.5 万平方公里的海底。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走向海洋的民族。

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百越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三大发源地。以山东大汶口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文化和以浙江宁波附近的河姆渡遗址为代表的百越文化，地处中国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到处可见海洋文化的痕迹。有关专家认为，龙山文化传播到海外，是从山东渡渤海，沿着黄海北岸到达朝鲜半岛南端，然后借左旋环流和太平洋暖流东漂，顺风顺水，一直漂流到太平洋东岸。

近代以来，在菲律宾、苏拉威西和北婆罗州、夏威夷、马奎萨斯、社会岛、库克群岛、奥斯突拉尔、塔西地岛、查林姆岛、新西兰、复活节岛和南美的厄瓜多尔等地，都发现了源于中国百越人的有段古镞。这些古镞是通过百越人的海上漂航传播开来的。

美国的生物化学家经过研究考证发现，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是中国人，他们是在大约 6000 年至 2 万年前由中国大陆顺太平洋特定的海流东漂，经过漫长的海上生活，横渡太平洋到达北美洲的。美国圣地亚哥大学考古学家詹姆斯·莫里亚蒂在给中国考古学家贾兰坡的信中说：“由于一系列的新发现，开始提供了在哥伦布之前，中国人横渡太平洋的证据。”

中华民族曾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最辉煌的航海时期。

宋、元时期，中国的航海业进入全盛阶段。福建的泉州港，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中国远洋船队达到了“虽天际穷发不毛之地，无不可通……”的水平。忽必烈曾两次下令属下庞大的海军船队越海远渡日本，均因遇飓风等原因未果。

明成祖即位后，多次派遣宦官出使亚、非诸国，招徕各国使臣进贡，开拓贡使贸易。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远洋船队七下西洋，将中国古代的航海事业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顶峰时期。

中国人对海洋的认识，也不乏先见之明。郑和曾向明仁宗进言：“欲国家强盛，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于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这样的海洋观，比马汉早了 460 多年。如果郑和的海洋观能够被明代统治者所接受并用于制定建国强军的方略，那么，中国的历史就该改写了。

正如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精彩的发明，但并没有在中国引发革

命性的变化，郑和的海洋观也成了稍纵即逝的火星。随后，在整个世界进入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之际，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却实行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因而中国的航海业注定走向衰败。

有人对这一现象提出诘问：是什么东西禁锢了我们的思维？

日本著名政治家兼汉学家副岛种臣有一段阴险而入骨三分的言论，或可值得我们深思。他是在甲午海战前，得悉中国设海军衙门、斥巨资购重舰后说这番话的：“谓中国海军可虑，则实不知中国也。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可行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

张世平研究员概括说，历史上的中国虽然最早走向海洋，但并不具有海洋民族所具有的海洋意识和海权意识。中国对待海洋有四个基本特点：

第一，轻视经略海洋。从远古时期起，中国人的社会活动就一直是以陆地农业经济为主，海洋经济从来没有摆在重要的地位上。从世界各国发展历史看，以农为本必然导致重陆轻海的思想观念。中国从神农、皇帝起，尤其是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之后，农本商末的思想就占据了主导地位。海洋对于中国人来说，不过只有鱼盐之利、舟楫之便罢了，经略海洋始终处于从属的“配搭儿”的地位。

第二，航海技术先进，航海的经济效益低下。历史上的中国，造船业曾经位于世界前列。其船型之多，不下 1000 余种，其中海洋渔船就有 200 ~ 300 种之多，因此被称为“世界上最多的船舶图样”。“中国帆船”这个词，在英国、法国、葡萄牙、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一般文献、辞书中，早已成为专门名词。到宋元时代，中国的航海者已进入“定量航海”的阶段，

对海洋气象、水文的变化规律和对信风的运用已经十分纯熟，磁罗经导航技术、测深技术、用锚技术、使舵技术等，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但正如李约瑟先生所说：中国人是伟大的航海技术发明者，而非伟大的航海民族。中国人并没有通过海洋“发家致富”，更没有通过海洋向海外“殖民”。

第三，视大海为“天然屏障”。历史上的中国，不仅把海上经济看做是对陆地经济的一种可有可无的补充，而且在国防观念上也把大海视为“天然屏障”，主流海防意识是“看家护院”。中国在宋、元以前基本上没有来自海上的威胁，自给自足的大陆经济也没有提出向海洋索取资源和向海外发展的要求，自秦始皇开始的“西北甲兵”、“东南财赋”的格局，等等，逐渐使中国的统治者越来越安于大陆上的一方沃土，即使是开拓“四海”，也主要是为了求得“归顺”和“宾服”以及一般的经济贸易，以保证陆上安全。梁启超曾说：“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之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个郑和。”

第四，视海洋资源为他人之物、海上通道为他人之路。历史上的中国人，多以“仁爱”、“中庸”的道德观和“中华上国”之居对待他人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和海上通道的控制。虽然，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多次海上征战之举，而且不乏进攻性海上行动，但这些“壮举”大都以恢复原有的政治秩序为目的，或者是以“保家卫国”为目的，而很少有为获取海洋资源、开拓或者保护海上通道为目的的。或者说，历史上的中国人经略海洋，政治目的大于经济目的。中国有关海上军事行动的基本思想，始终是“海防”而不是“海权”。

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历史都告诉我们，一个濒临海洋的国家，如果忽视了海洋，丧失了海权，走向衰落只是迟早的事情。因

此，张世平研究员告诫说：“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首要的问题不是有没有拥有海权的能力，而是有没有拥有海权的强烈意识和获取海权的信心与勇气。”

张世平研究员提醒国人需要确立的又一个基本概念是：“海洋 = 未来生存空间 + 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强调“居满思缺”。然而，今天的中国似乎未“满”而忘“缺”。资源匮乏、市场不足、劳动力过剩几乎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通病。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不例外。怎么办？

张世平指出：总沿着“长江、长城”找“馍馍”，围着“黄山、黄河”做买卖、建“厂子”，“馍馍”再多也会吃光，“厂子”再大也装不下太多的中国人，要生存，要发展，岂能不难？如果能在“四大洋”及其所连接着的其他土地上找“馍馍”、办“厂子”、做买卖，吃别人的鸡下的蛋，花从别人那里挣来的钱，又有何难！因此，中国必须走向海洋，走向世界，才能拥有良好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因为资源问题，是中国未来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

资源问题历来是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并由此引发了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军事矛盾。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问题将越来越突出。21 世纪的海洋之争，最主要的是资源之争。

有资料介绍，陆地上的煤炭还可供开采 200 年，石油则仅可供开采 100 年。随着陆地资源的日益枯竭，人类未来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将越来越离不开海洋和越来越依赖于海洋。因此，在不远的将来，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实质将取决于有效利用海洋的能力。

中国虽然有 960 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占有陆地面积仅有 0.008 平方公里，远低于世界人均 0.3 平方公里的水平；中国近年来年平均浅水资源总量为 28000 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中国陆地矿产资源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只有 1.5 吨，而前苏联为人均 15 吨，美国为人均 20 吨，世界人均量为 3.5 吨，我国的人均占有量还不到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一半。到 21 世纪中叶，人类将面临生存危机。因为陆地资源最多可养活 100 亿人，目前世界总人数为 51 亿，按照人口增长率计算，2050 年将达到 100 亿。

人类缓解生存危机的途径只有面向海洋。全世界的海洋面积为 3.61 亿平方公里，占地球总面积的 71%，相当于陆地面积的 2.5 倍。从太空看地球，地球是一个淡蓝色的水球。海洋是资源宝库，海洋矿物资源是陆地的 1000 多倍，海洋食物资源也超过陆地 1000 多倍。目前人类只利用了海洋生物的百分之三左右。海洋初级年生产力可养育 300 亿人；海洋金属储备量可供人类需求万年以上；海洋中铀的储量是陆地的 4000 倍（50 亿吨），一公斤铀可利用的热量相当于 2250 吨优质煤。

根据最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布的《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报告，中国拥有大陆岸线 18000 多公里，以及面积在 500 平方米以上的海岛 5000 多个，岛屿岸线 14000 多公里；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制度和大陆架制度，中国还将对广阔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行使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国的海域处在中、低纬度地带，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比较优越。中国大陆有 4 亿多人口生活在沿海地区，沿海地区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 60% 左右。

抓住了海洋，也就是抓住了我们未来的命脉！

相信这是一个并不深奥的道理：中国拥有多少海上权益，命脉已系于中国拥有什么样的海军力量。张世平在列数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后告诉我们：海军威，海权兴；海权兴，国家盛。

在此，我们首先应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海军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谁都清楚，新中国的海军是在边打边建中成长起来的。在 1950 年 5 月 25 日发起的解放万山群岛的战役中，刚刚组建起来的中南军区海军，只有一艘美国造的登陆舰“桂山”号，一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意大利、英国制造的登陆舰“国楚”号，还有 20 余艘杂型小炮艇、小登陆艇。但他们与陆军协同作战，乘拂晓前冲入敌舰群中，一举击沉国民党军舰艇 4 艘，缴获舰艇 12 艘、其他舰船 11 艘。

在其后的 20 多年中，年轻的中国海军在东海、南海海域取得了一江山岛战役、“八六”海战、崇武海战、西沙自卫还击作战等一系列海战的胜利，创造了鼓舞人心的战绩。

1980 年 5 月 18 日，中国向太平洋海域发射第一枚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中国海军海上打捞数据舱的行动，总共只用了 5 分 20 秒。中国海军为配合运载火箭发射的远洋航行，向世人显示了中国海军力量的成长壮大。

1984 年 11 月 22 日，由“向阳红 10 号”和“J121 远洋打捞救生船”组成的中国南极考察队从上海宝山锚地出发，于 12 月 30 日下午 3 时 16 分，考察队 54 名队员，乘坐两艘登陆艇，登上了乔治王岛的菲尔德斯半岛，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南极洲。此前，已有十多个国家在南极建了 100 多个考察站。

1996 年 3 月中旬，我军在台湾海峡成功举行了三军联合作战演习。据《解放军报》报道：“先进的战机、舰艇、导弹、电

子战装备在演习中密切协同，显示了强大的空中海上打击威力。”

1997年2月至4月，中国海军舰艇编队首次横跨太平洋远航美洲大陆。编队规模之大，访问国家之多，航行时间之长，在我海军历史上都是具有突破性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埃·克莱明斯海军上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舰艇编队的这次访问非常成功，”“中国舰艇保养得很好，中国水兵的军容风纪和良好的专业素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90年代以来，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先后出访了近20个国家。

.....

但是，张世平研究员指出：对待中国海军今天创造的辉煌，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中国历史上的海上辉煌，有许多是中国与外国相比；中国今天的海上辉煌，则主要是“新中国”与“旧中国”相比。如果在世界范围作横向比较，中国今天的海上辉煌，还很难说是真正的辉煌。

“真是这样！我们中国人早该摆脱‘坐地观海’和‘不争大洋冲突只在海口设防’的古老海防观了。”张世平研究员接着强调说：如果我们能建立和发展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强大海上力量，这无论对于我海、空军力量在中远海域进行正常巡逻，以维护未来海上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争议地带前沿海域的经济秩序，捍卫国家主权，还是对于打赢未来在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其重大战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第六章 看不见的刀光剑影

在未来的时代，有一种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我们却须臾不能离开，离开便寸步难行，那就是——信息。

在农业时代靠力气吃饭，在工业时代靠机器发财，在知识经济的时代必须靠信息生存。小小的硅片，正在改变着世界，改变着未来，也在改变着未来战争的形态……

网络时代的奇观

这则故事决不是从科幻小说中摘录出来的——

某年2月4日，美国总统的军事副官报告说：北加州和俄勒冈州的电话系统已瘫痪，美军在路易斯堡的指挥基地电话通讯也被切断，其原因是敌国在计算机互联网络上植入了名为“计算机陷阱”的病毒。

战地指挥官通过无线电接受上级指令，却不知道这些命令是真是假。

在美军高层召开紧急会议不久，一列时速高达320公里的客车，在马里兰州与一列货车相撞。中央情报局获得的情报证明，这是因为敌国特工人员给列车调度系统注入了名为“逻辑炸弹”的电脑病毒，打乱了列车的正常运行程序。

当美、英、法等国准备向海湾地区实施军事进攻时，由于军用通信系统遭到敌方的信息干扰，竟无法调动各自的军队。军用数据库中那些与战争息息相关的数据突然不翼而飞。与此同时，美国佐治亚州的两家银行一片恐慌，因为，他们突然发现正在营业的自动提款机已随意在账目上增减存款数目……

半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总统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但白宫里的数千部电话都成了聋子的耳朵，成为摆设。信息战专家说，这是由预先埋植在电话系统软件里的“陷阱门”病毒造成的。美国总统只能用最传统的口头传令的方式召集会议。

……………

这是四年前美国兰德公司和五角大楼的将军们在联手进行的

信息战演习中故意设置的若干片断。演习在美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都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兰德公司在演习总结报告中写道：“在信息战争面前，你可能不知你已被进攻或怎样遭到进攻的，美国将失去战争避难所的作用。”

类似这样的演习，美国已经进行了多次。

其实这样的情景，不仅仅是演习中的假想，而且已经在我们身边实实在在地涌现。由美国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开发研制的一种像手提箱大小的电磁脉冲炸弹，可以由特工人员或旅行者带入敌境，把它偷放在敌军指挥部或中央银行附近，在预定的时间内放射出高功率的电磁脉冲，然后在眨眼之间便能烧毁攻击目标里的全部电子部件，使敌方的计算机和通信系统失灵，军事指挥和金融系统瘫痪。

1998年，一名犯罪分子通过电脑网络侵入美国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涂改账目，将资金转移到国外银行，造成该银行7000万美元的损失。据资料介绍，全世界仅电脑网络犯罪每年损失约50亿美元。

1988年，美国加州两名少年在一名远在以色列的黑客指使下，实施了对五角大楼电脑系统的入侵。

人们大概还记得，进入新千年不久有一条引人注目的新闻：短短几天之内，美国雅虎、CNN等八大著名网站都被神秘的“黑客”侵入，并一度瘫痪。美国媒体惊呼：“黑客巨人”来临了！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发誓要将袭击者绳之以法，但至今尚未获悉逮住了犯罪者。专家们分析，这些攻击行动使用的技术基本上是一样的，即用数目众多的服务器传输大量无用数据，以造成网络堵塞，从而使攻击目标终止服务。颇富戏剧性的是，刚刚被假释出狱的号称“世界头号网络通缉犯”的前电脑黑客米

特尼克，居然迈进了华盛顿国会的巍峨大厦，成了参议院的座上客。这位著名黑客现身说法，向参议院政府事务委员会的参议员介绍了如何消除电脑网络的安全隐患，以及如何加强信息安全建设。

大多数军事专家认为，1991 年 1 月 17 日爆发的海湾战争是“信息战”首次在世界舞台“亮相”。美军精确制导的“战斧”巡航导弹带着计算机储存的目标参数飞向伊拉克首都各重要设施，发射成功率高达 98%。美军 F—117 隐形轰炸机发射的“灵巧”炸弹，从直径不到三英尺的排风管中钻入一幢大楼，摧毁了伊军藏于地下的情报中心。

有趣的是，也是在这场战争中，伊拉克政府收到荷兰几名“黑客”的建议，表示他们有能力利用国际电脑网干扰美军在海湾地区的部署，但要价 100 万美金。萨达姆对此不感兴趣，断然予以拒绝。其结果是，伊拉克付出了千百万人的生命和数千亿美元的损失。

持续四年半的波黑战争，造成 20 万人死亡，200 万人流离失所。而波黑三方最终走向谈判桌，达成协议，却是美国成功运用信息战的结果。波黑三方的势力数塞族最强，多种解决方案都因塞族拒绝合作而流产。北约运用精确制导武器对塞族部队的指挥系统实施了成功打击，削去了塞军的优势，迫使塞族同意谈判。在代顿谈判中，美国人又成功地给波黑三方上了一堂信息战的课。美国将他们各自的实力做成一个数学模型，输入计算机。在计算机和大屏幕投影前，美国主持三方领导人进行了一场艰苦的讨价还价。任何一方的价码都能立刻由计算机模拟计算后在大屏幕上显示出来，其得失和版图划分的精细程度让波黑三方领导人心服口服……

信息战这种新的战争形态，正受到世界各国军事专家普遍关注。信息战成为当今新军事革命的重心，似乎已成为不容质疑的共识。

21 世纪的新型战争

我国青年学者沈伟光在他的专著《信息战》中对信息战的概念作了明确的界定：“信息战，广义地指对垒的军事（也包括政治、经济、科技及社会一切领域）集团抢占信息空间和争夺信息资源的战争，狭义地指战争中交战双方在信息领域的对抗，它是现代战争的本质特征之一。”

专家档案 8 沈伟光：信息战理论的创立者

1990 年 3 月，一部谁也没料到在日后会产生世界性影响的军事未来学专著在浙江大学出版社问世。书名叫《信息战》。作者沈伟光是个只有 30 岁的少校军官。

一部军事学的著作在一家地方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身就让人觉得有些蹊跷。它当时就像一个不受欢迎的“早产儿”，在产房里瑟瑟发抖，降世后即面临着夭折的危险。

书总共印了 5000 本，大部分堆在出版社的仓库里无人问津；出版社要作者包销 1000 本，少校沈伟光到处写信找熟人推销他的书，也只卖出去几百本。其余的一部分堆在他家的阁楼里，后来妻子看放在家里实在是个累赘，就当废纸卖掉了。还有些书被他免费赠给认识与不认识的人了。多数人对“信息战”不感兴趣，甚至有人说：“靠信息能打仗？打信息战，要我们军队干什么？”

必须指出，这部 22 万字专著的出版，距离阿尔文·托夫勒这位号称全球最有影响的未来学家在美国出版的《权

力的转移》一书中正式提出信息战概念，早了 8 个月，距 1991 年海湾战争爆发、信息战在世界舞台首次亮相早了近一年。

其实，早在 1985 年，沈伟光就开始了对信息战的研究。这部专著脱稿后他寄给了军内一家出版社。但寄出后犹如泥牛入海无消息，两年后在沈伟光的催问下，出版社才将书稿退还给他。书稿在耽误了整整两年后，又回到了沈伟光手中，此时纸页已微微泛黄，上面落满尘埃。幸好，在此期间，沈伟光将书稿中的主要观点浓缩成一篇两万字的论文，寄给《解放军报》“学军事”版曾光军和李炳彦两位编辑。时间不长，他们回信了，告诉他稿件本已编好准备发，因有不同意见不能刊用。沈伟光没有气馁，回信再次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1987 年 4 月 17 日“学军事”版，破例为这位小人物的研究作了一个简短的介绍。这篇不到 600 字的短文刊登在该版的右上角，标题很醒目：《信息战的崛起》。这是能证明沈伟光是全球“信息战”理论创立者的最早的文字材料，它毕竟比书稿的问世早了三年！

《解放军报》1987 年 4 月 17 日是这样介绍沈伟光的“信息战”观点的：“83016 部队沈伟光在近期撰写的长篇论文《信息战的崛起》中指出，信息将是未来维持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源，甚至比能源及资源更重要。当‘信息革命’的浪潮不断撞击到军事领域的城堡时，信息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日俱增，逐渐由从属地位上升到主导地位，由此为信息战的崛起铺垫了道路。

“文中以大量论据，阐述了信息战是现代战争的本质特征之一。作者把信息战作为一个战争概念，将信息战从形态、时态、规模、范围和内容上来划分，认为有以下主要特

征：一是就形态而言，有‘无形’和‘有形’之分；二是就时态而言，有‘永久性’和‘暂时性’两种；三是从规模上说，可分为‘无限性’和‘有限性’；四是从范围上讲，有着‘广阔性’和‘区域性’；五是从内容上说，可分为‘可扩充性’和‘可压缩性’两种。

“作者认为，信息战的崛起，将使得战争形态、军队结构、作战方式、军人素质和指挥手段都会有崭新的变化。比如：先进武器威慑将成为战争的主要样式；小型化和分散化将是武装集团的组合形式；信息将取代人而充斥于未来战场；‘智力型’是军人素质的主要特征。

“文章还指出，信息战的崛起，是我们思考国防发展战略问题的重要内容。作者认为，现在紧迫的是：更新观念，把人们注意力转移到信息战的轨道上来；开发军事软科学，为赢得信息战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

读完这篇介绍文章，不难看出，如今被汗牛充栋的文章和书籍反复“炒作”的一些有关信息战的观点，在12年前，沈伟光就已经在著作和论文中论述过了。

1998年初，奥地利林茨市开始筹办第19届阿斯电子艺术节。他们准备邀请29个国家的280名科学家和艺术家出席盛会。还准备邀请50名著名的电脑“黑客”一展身手。这是世界上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电子艺术节。从1978年至今，每年举办一次。电子艺术节不是汇集陈列市场上已有的电子产品，而是展示电子艺术家们带有想象性的新的设计思路。艺术节有一个重要议程是举办为期两天的世界热门话题学术论坛。这一届论坛，他们确定的议题是“信息战”。无疑，这是自海湾战争之后，世界各国最为关注的热点。有关信息战的文章、书籍、研究报告大概用一列火车也装不

下。各国的军备竞赛也瞄准如何打赢信息战，制定下个世纪战略决策。

组委会在研究邀请专家演讲的名单时，有人提出：中国那么大，从来没有人走上这个讲台，能否试试，找出一位合适的中国人？

于是，他们开始在网上搜索。

遗憾的是，在中国的网址上没有发现合适的中国人，他们几乎准备取消这个打算。就在这时，他们倏地在美国人写的一篇文章中发现了线索。美国一家著名战略研究所的研究员查里斯 B·埃弗雷特与另两位研究员在合写的《信息战与美国国家安全的评论》中指出：“世界上最早提出信息战概念的，是一位非西方人——中国的沈伟光先生。”文章在介绍了沈伟光关于信息战的一些思想观点后评述道：“像许多有洞察力的天才思想家一样，沈伟光抓住托夫勒的观点去理解和丰富壁龛战争（特种部队进行的特种战争）思想。他明白信息战将引起特殊的作战力量（区别于特种力量）。他对指挥与控制的评论是有洞察力的；信息战的作战目的在于控制而不是流血；制胜的关键在于人的决策而不在于技术；真正的优势不在于产生技术，而在于产生思想……”

接着，他们四处了解沈伟光在中国何处，是干什么的？他们托早年来华参加中国革命的一位奥地利医生傅莱老人帮助寻找，傅莱老人又托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已退休的副司长傅立群老人协助。终于，已经转业到国务院特区办工作的沈伟光接到傅立群老人的电话，告诉他奥地利老人傅莱有重要事情需面谈。傅莱见到沈伟光，确认他就是奥地利要找的中国信息战专家，就给奥地利发去一个电子邮件，告诉他们“沈伟光先生已经找到了”。奥地利电子艺术节组委会得到

信息，立即派汉学家英格丽小姐专程到中国来，说是了解情况，实际是对沈伟光作进一步考察，看这位沈先生是不是真正具有很高学术水平的信息战专家，再确定是否邀请他出席电子艺术节。英格丽小姐与沈伟光谈了一星期，所有谈话全部录音带回交给组委会。组委会对沈伟光表示满意，时间不长就发来正式的邀请函，并表示由他们支付所有的费用。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沈伟光先生不但是全球最早提出“信息战”概念的人，也是最早出版《信息战》专著的人。

让组委会专家感到吃惊的是在信息技术并不发达的中国，居然“冒”出一个执信息战牛耳的专家！

谜一样的东方，是一部让人阅读不尽的大书。

论坛要求与会专家每人提供一篇论文，在会后汇编成集。演讲的内容也可以与论文一致。沈伟光提供的论文题目是《迎接信息时代的挑战》。而他讲演的题目则是《为遏制信息战而奋斗》。讲演内容是他临出国前准备的。

1998年9月12日，来自东方的沈伟光登上了国际“信息战”论坛。当他刚讲出第一句话时，台下“哄”地笑了。因为他讲的是汉语，与会者谁都没想到讲演的是一位中国人。他们没有戴翻译耳机。沈伟光一边讲，奥地利总理的翻译一边口译成德文，再由另一位翻译译成英文。当人们热衷于研究如何打赢信息战时，沈伟光大胆地提出了“遏制信息战”的新观点，警告人类“网络的破坏可以瞬间将地球瘫痪”，在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

他站在铺着猩红地毯、被鲜花簇拥的富有现代气息的学术讲坛上侃侃而谈：信息战，从表面上看，使战争由掠夺财富和土地转为抢占信息空间和争夺信息资源，战争的方式由流血变为很少流血甚至不流血，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由物资

和人力的拥有量转为信息的拥有量，取决于制信息权和信息战能力。战争似乎变得比以前“文明”了，容易了。实际上，信息战的到来，信息武器的出现，将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危害，信息战的危害甚至可以说比核武器还大。我们至今只看到信息战“文明”的一面，并没有深刻认识到信息战的危害性。

他分析道：在信息时代，先进的计算机系统把军队乃至整个社会联结在一起，军队和社会肌体的各个部分的组合运转，都要依靠芯片；军用装备和民用设施联系紧密，相互兼容。在这样一个网络化世界里，每个芯片都是一种潜在的武器，每台计算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有效的作战单元。任何社会团体和个人，只要掌握计算机通讯技术，拥有一台计算机和入网的电话线，就可以攻击装有芯片的系统和与网络相联的装备，利用网络来发动一场特殊战争……信息战人员可以是正规军人，也可以是十几岁的少年。信息战的非杀伤性武器装备，主要是在民间开发和生产的，而不再为军人所独有；作战不仅仅在传统武力战场，而且分布于整个社会，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战争”。这样的战争一旦失控，其结果可想而知……

他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吁：人类应该在认识信息战的过程中，找到遏制它的有效办法。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知识也永远具有两面性，运用于正义就促进人类进步，运用于邪恶就会给人类增添灾难。当知识经济的曙光刚刚给人们带来欢娱之际，信息战的乌云就已出现……

讲演通过国际互联网向全世界直播，引起了国际舆论界的关注。

人们在利用信息传播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将信息技术用于战争，从而使战争形态出现新的变化。

专题研究新军事革命的朱小莉博士非常简明地概括出工业时代战争与信息时代战争的区别：

构成工业时代战争形态的要素为：物质 + 能量。

构成信息时代战争形态的要素为：物质 + 能量 + 信息。

在信息社会里，信息成为比物资和能源更为重要的资源。谁捷足先至信息社会，谁就能取得信息社会的主控权；谁能主控信息社会，谁就能称雄全球乃至整个宇宙。占有或垄断信息资源，攫取信息空间，拓展信息边疆已成为各大国竞争的焦点。因此，信息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战争的目的由实物争夺转向信息争夺，领土侵略转向信息侵略。沈伟光认为，在信息时代军队的行动自由权在于制信息权。在步骑兵时代，军队制胜的关键是控制要点、要道、枢纽区，掌握制陆权；飞机、航母出现后，对制海权和制空权的拥有成为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信息战开辟了第四维战场，于是军队的战场主动权又从制空权移位于制信息权。

王保存研究员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工业时代的战争表现为火力与机械，信息是次要因素；而信息时代的战争，火力与机械降到次要地位，信息上升到主要地位。谁拥有信息优势，谁就能打赢战争。

信息战是不流血或伤亡大大减少的战争。沈伟光在《新战争论》中论述道：千百年来，人类总是把战争与“流血”、“暴力”、“武装冲突”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同义词。信息战的崛起，极大地动摇了战争是“流血的政治”等传统战争概念。信息战可以在无形的信息空间里大打出手……这一特性决定信息战是一场在“看不见的空间”里进行的，是“不流血”、“非暴

力”的无形战争……诸如采用电磁脉冲炸弹、逻辑炸弹等信息攻击技术造成敌方通信中断、军事运输瘫痪、军事指挥失控。

信息战是否都可以表现为不流血，可以存疑。因为，完全依靠信息、网络来发动的战争，或许只是信息战的一种样式。在信息社会，我们不可避免地还要继承工业社会的遗产，这是因为人类的生存仍然需要工业化的生产，另一方面，信息要发挥作用也还离不开必要的载体。在 21 世纪，人类还不可能淘汰飞机、坦克、航母、导弹这些信息赖以存在的作战平台，流血的暴力型战争必然继续存在。但由于武器的精确制导化，可以使打击的目标控制在必要的范围，大大减少平民的伤亡。

信息战已日渐具备以下特性：武器装备信息化。美陆军装备的 53% 已信息化，空军装备的 70% 已信息化。信息化装备主要有：

——信息化弹药。它能够获取和利用目标所提供的位置信息，修正自己的弹道，准确命中目标。包括制导炸弹、制导炮弹、制导子母弹、制导地雷、巡航导弹、末制导弹道、反辐射弹道等。目前，战役战术制导弹药的命中精度，近程的已达 0.1~1 米，中程的小于 10 米，远程的为 10~50 米。在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发射的精确制导弹药虽然只占发射弹药总量的 8%，却摧毁了 80% 的目标。如今，精确制导弹药的研制已进入第三代，正向灵巧型、智能型发展。灵巧型弹药在火力网外发射，发射后不管，可自主识别和攻击目标。智能型弹药能够在各种条件下，利用声波、无线电波、可见光、红外、激光，甚至气味、气体等一切可利用的直接或间接的目标信息，自主地选择攻击目标和攻击方式。

——装有大量电子信息设备，与 C⁴I 系统联网的作战平台。

主要包括坦克与装甲车、火炮与导弹发射装置、作战飞机与直升机、作战舰艇等武器载体。国外最先进的作战平台有智能坦克、RAH—66“科曼奇”武装直升机、“百人队长”攻击型核潜艇、I·42战斗机等。

——军用智能机器人。能代替士兵执行各种军事任务。既可驾驶坦克，操作火炮，直接参加战斗，也可用于侦察、观测、监视工作；既可携带弹药攻击目标，也可运送弹药和物资；还可以用来清除障碍，维修装备和护理伤员。有人预言，未来战场担任突击任务的很可能是一支军用机器人装甲部队。

——单兵数字化装备。是从头到脚，从攻击、防护到观察、通信、定位，能适时地侦察和传递信息，具有人机一体化、多功能等特点的士兵在数字化战场上使用的个人装备。

——C⁴I系统。它是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和情报系统的简称。属于军队的神经中枢。能把军队力量中的各个要素协调起来，发挥出整体效能。

在信息时代，先进国家军队的武器装备主要是信息化武器，还有大量的隐形武器和结构形态、工作原理、杀伤机制、杀伤效果都不同于传统武器的新概念武器，如激光、粒子束、微波、次声波武器、智能化水雷等。

军与民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由于信息技术既大量用于军队又大量用于民间，军队和社会的信息化程度都在不断提高，因此出现战争日益平民化的发展趋势。军队在战场上使用的某些高技术装备在市场上都能买到；很多军事专业技术与民间技术没有区别，有的计算机“黑客”、“电脑玩家”在网络上发动攻击的能力不比军事信息专家逊色；发动战争的装备平民也拥有；信息战所攻击的目标很多属于民用目标，如金融、电力系统等。专家们认为，信息战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全民战。随着世界信息高速公路

的建设，社会民间组织乃至个人，都有可能利用全球联网的计算机与通信系统参与一场信息战。从战略上讲，信息化战场已难以划定边界线。军人失去了在短兵相接中表现英雄壮举的机会，那些计算机程序专家可能要回到办公室，回到自己家里去打仗。

广播、电视、书刊和互联网等传媒成为信息战的重要武器。美国非常重视通过传媒对别国进行心理战，宣传自己的价值观，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提供舆论支持。尼克松主张对外广播电台建设的投资不能节省，强调“美国不能赤手空拳进入这一思想战场”，“美国从事的最有效的对外政策计划之一，一直是支持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艾森豪威尔认为，“在宣传上花一个美元等于在国防上花五个美元”。里根政府从 1983 年起拨款 10 亿美元，专门用作广播电台的经费。1990 年，“美国之音”因经费紧缺而裁减了六种语言的对外广播，这一做法遭致美国政府的严厉指责，很快全部恢复了播音。

沈伟光和李炳彦在一次对话中特别强调，维护国家安全，应学会利用各种传媒打信息战。广义的信息战，包括宣传战、舆论战、社会心理战，是影响、控制、攻击对方决策观念和认知系统的作战，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的作战。一些大国总是试图通过提高媒体的辐射和影响力，推行强权政治，诋毁和损害其他国家形象，干涉别国内政，乃至采取这一手段挑拨其他国家内部的矛盾，制造混乱，以此实现“媒体霸权”。

构筑看不见的万里长城

沈伟光在 1990 年 3 月出版的《信息战》中提出了“信息边疆”的问题，在 1997 年 4 月 15 日的《中国国防报》上，他又更准确地将这一问题表述为“信息边界”，并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专题论述，对信息时代的国家安全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从现有的资料看，前几年外军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信息进攻上，注意到信息防护问题是近几年的事。1995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公布的《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白皮书》指出：美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安全问题严重，民用信息系统的安全也大有问题，确保国家民用和军用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保密已成为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1996年11月，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发表的《信息战——防护》报告提出，美军的信息系统有很多节点极易受到攻击，呼吁军方采取措施防止发生“电子珍珠港事件”。1997年12月俄公布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把“信息安全”列为国家七大安全领域之一。

沈伟光认为，“信息边界”是一种无形的、划分各个国家或政治团体“信息疆域”的不规则界线。“信息疆域”是国家或政治团体信息传播力和影响力所能达到的无形空间。“信息疆域”不是以传统的地缘、领土、领空、领海，甚至领天来划分的，而是以带有政治影响力的信息辐射空间来划分。“信息疆域”的疆界、“信息边界”的安全，关系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信息时代的兴亡。世界各国纷纷拓展“信息疆域”，保卫无形的“信息边界”，一场争夺信息领域优势的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得益于商品疆域的拓展和保护，未来国家经济的富强将取决于“信息疆域”的拓展和“信息边界”的安全。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信息化战争必然会成为信息社会的主导型战争形态。信息化战争形态的出现也必然导致“信息边疆”、“信息边界”的产生，这就需要建立信息国防，建设“信息边界”。

沈伟光从三个方面谈了他的看法：

一是要筑起牢固的“精神”防线。信息社会无论是个人，

还是国家或政治团体，都将被淹没在浩瀚的信息海洋之中，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在拓展信息空间和辐射自身信息的同时，筛选和梳理所获信息，剔除和拒绝破坏型信息，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利用有效信息。从未来信息战的实质看，它通过破坏对方正常的政治、经济运行体系，沮丧对方军民的战斗意志，导致他国处于瘫痪状态，是其重要手段。不管是现实，还是未来的战争，国家和个人的精神都是易受打击的“攻击之窗”。构筑精神防线是第一要务。

其次是建设有效的“网络边疆”。以计算机、通讯和信息技术支撑的网络正在成为联络信息社会的纽带。从国际金融、商业交往、旅游、政治到文化娱乐活动，都愈来愈多地在网络上进行。网络化，正在影响、制约、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竞争对抗方式。在社会高度网络化的同时，也暴露出网络的脆弱性。在网络技术上领先一步的国家，依托网络，把自己的“信息疆域”扩展到许多国家，对别国的“信息主权”造成威胁。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社会信息运动的网络性必然决定竞争对抗的网络性，而网络性决定了在国家安全领域的对抗不仅仅是军事上的信息战，而更多的是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总体网络斗争。“网络边疆”的冲突在所难免。

“网络边疆”的冲突将主要表现在，依托网络迷惑、干扰、威慑、破坏对方；以多种技术手段侵入对手的网络，掠取信息；以欺骗等手段阻止对方的网络渗透和入侵；在网上施放威慑信息，遏制对方的侵略；打击和破坏对手的“网络边疆”，使之有可乘之隙。

一些信息技术发达国家的做法可资借鉴。在政策观念上，他们已从单纯强调计算机及网络系统的功能，转变为网络保密性、

完整性、可用性、准确性和连续性多性并重。许多西方国家或是单独或是联合地制定了加强网络的长远安全建设的规划和标准，并且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积极开发研制网络安全保护新技术，如防计算机病毒技术、新的电磁和声屏蔽技术、防信息泄露技术、安全保密和加固计算机技术等。

我国信息网络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已经建立起全国公共数字数据通信网、中国教育和科研网、中科院科研网等数百个重要的信息网络，也拥有 1000 多个数据库。但普遍存在着信息资源规模小、范围窄、质量差等问题，影响信息网络功能的发挥，也造成了在我国信息网络上基本是跑“洋车”和送“洋货”的局面。对国外信息资源过分依赖，使得西方文化和政治的渗透不可避免，并给网络安全带来重大隐患。因此，我们应该发展信息网络与建设网络并重。一方面，要充分地利利用各类全球信息网络，向网上输送我们的有关信息，拓展我国的信息空间，增强信息影响力。另一方面，对事关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的重要骨干信息网络，尽可能由国家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并尽量形成一定范围的局域网，避免为方便使用而降低网络的安全性。对其他信息网络，也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手段，如设置“防火墙”、建立“防护栅栏”、安装“信息选择平台”等，防止危害国家信息安全的信息传播，阻止针对我国的网络入侵。此外，在国家电力网、电视网、电话网等其他安装有计算机的网络上，都应该采取必要的防护安全措施。

沈伟光呼吁，要建立一支“信息防护”部队。就如同有了领海需要海军，有了领空需要空军一样，确立“信息维”、“信息边界”的观念，就应该建立相应的“信息防护部队”。这将是一支完全区别于传统部队的全新的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专业化部队。它将由科学家、信息专家和精通信息战的军人组成。

它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国家“信息边疆”的安全，反击其他国家、政治团体，甚至个人的信息入侵，并防止和打击本国的信息犯罪活动。它将在信息空间与看不见的对手进行信息对抗。它也是实施信息战的特遣队，反击信息入侵的骨干力量，抢修“信息事故”的应急部队。“信息防护”部队的建立，将成为信息化时代军队建设的显著标志之一。越是信息技术落后的国家，越应该注重建立“信息防护”部队，以加强国家信息防护，确保国家的总体安全。

尾章 为享和平阳光

在国防大学和军事科学院的营院里，一片祥和宁静的景象。我们看到的是排着整齐队列走向教室的穿军装的学员、脑门上头发稀疏戴深度老花眼镜夹着皮包登上讲台的教授、皓首穷经在史海钩沉伏案写作的研究员、正在电脑前“嘀嘀哒哒”敲着键盘的博士生……

春去秋来，大自然在正常更递，一切都跟以往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就在这平静的生活背后，却翻卷着世界战争的风云和巨浪。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战争话剧，就在老教授的光秃脑门里、在三尺讲台上、在年轻军官的敲击键盘的手指间一幕幕展现出来。

我知道在中国军队的院校、科研院所和各军种之中，肯定还有许许多多对军事理论有着很深造诣的专家，在地方的各个阶层也有许多痴迷于军事理论和智慧的学者。我看到、读到和采访到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但，我敢肯定地说，这些专家都是非常优秀的。

他们是东方智慧的杰出代表和体现者。我要再重复一句：有他们存在，不亚于中国拥有原子弹、氢弹、航天飞机……

是谁说过：和平时期两军的较量更多地体现在智慧和理论的研究上，如果战争不可避免，理论便能指导人们以较小的代价，获取更大的胜利。

同时，我们还有责任指出，中国的军事专家们在孜孜不倦追踪和研究新军事革命，但在他们的心目中却在期望着让人类永享和平的阳光。

孙子言兵，“始终未尝言杀，而以久于兵为戒”。说得明白些，孙子写《孙子兵法》时首先想到的肯定也是如何避免战争的发生。因此，他把“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战争的最高境界。“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中国军事专家们的心与 2500 年前的孙子是相通的。

作为证明，沈伟光在提出信息战的理论后，马上又提出要为“遏制信息战而奋斗”，前不久又提出要为人类勾画不流血的“理想战争”，以替代暴力型的流血的战争。

从提出“信息战概念”到大声疾呼“遏制信息战”，又到勾画“理想战争理想”，沈伟光完成了他的军事未来学研究的三级跳。

这三级跳使用的都是同一根撑杆——设法消弭战争，让人类永享和平。

他用自己的实践告诉世人：如同中国人拥有核武器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核垄断，制止核战争一样，中国人研究信息战的目的，是为了遏制新的战争恶魔肆虐人类，创造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安全环境。

沈伟光在《思维战》中明确提出，通过改变人类思维方式，彻底铲除人类武力战的根源。他说：“假如人类此时面临着共同的敌人——外星人的入侵，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还顾得上相互杀戮吗？”其实，人类面临的共同敌人是很多的，如地震等自然灾害，人类应该团结起来，战胜共同的敌人。由此可见，他不仅关心国家的命运、国防建设的走向，更关心人类的未来。

从公元前 3200 年到公元 1995 年，世界上大约发生过 14500 次战争，其间只有 300 多年是和平的。在战争中死亡总人数达 70 亿。1946 年 2 月，爱因斯坦在写给一位美国退役高级军官的信中说：“我不怀疑战争的起因是深深埋藏在人类的本性中的……战争是原始人生活中的一种正常活动……战争倾向是人类本性中的一部分，正像河水要时常泛滥是它的本性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战争如同梦魇始终与人类相伴相随。

“我常常在想：我们真该勾画一个理想战争”。也许有些悲天悯人和异想天开。一次，沈伟光在回答《国防大学学报》记者的提问时说：“有史以来，战争都是与暴力、流血画等号，至今还没有理想的战争出现过。但追求这种理想，却始终是人类的梦想。孙子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企望制造不流血的理想战争。1985 年，我在中国南方边境战争的野战工事里，设计并提出信息战理论时，也就有这样一个美丽的梦想。十多年了，我目睹着信息战由梦想变为现实，并迎来了正在进行的机械化战争向信息战转变的军事革命，眼看信息战将成为主宰 21 世纪战争的主要形态。但现实告诉我们，信息战的发展已远远超出未来学家的想象，它的危害性可能会超过我们预知的范畴，我感到恐惧。因此我提出要遏制信息战而奋斗。在本世纪末，要重新勾画一幅理想战争的画面，把战争引向文明，使和平能够持久。”

他为新近出版的文集《新军事问题》撰写的一万多字的前

言，即以“理想战争理想”为题。在文中，他提出了几种比信息战更理想的战争模式：“思维战”、“虚拟战争”、“警示性战争”、“竞赛性战争”、“领导者之间的战争”……目前，他正在着手撰写全面论述“理想战争”的论著《理想战争宣言》。

但愿他的抱负能够成为现实。假如有一天，不管这一天何时到来，一种文明的不流血的“理想战争”模式，能够取代以往暴力型的流血的战争，那么，这将是人类的一件多么伟大的幸事啊！又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我想全世界将没有一个人不同意把最后一位诺贝尔和平奖授给他。

我们知道，早在 45 年前，就有 12 位著名科学家联名发表《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强烈要求废止战争。宣言的副本被送给了美、苏、中、英、法、加六国首脑。12 位科学家在宣言中发出质问：现在能制造出的核弹，威力要比炸毁广岛的大 2500 倍。我们要置人类于末日，还是人类该弃绝战争？”

45 年过去了，战争没有弃绝，但用于屠杀人类的炸弹又翻新了多少代？

人类不应该把以往的陈旧的思维方式带入 21 世纪。我们应该摒弃狭小的利益之争、思想隔膜、文化偏见、种族歧视……为人类的共同利益挽起手来。

弗洛伊德说：“对赤裸裸暴力的压制，只有通过手拉手而产生的更为强大的强制力才能起作用。这种手拉手的结合是以把这些成员联系在一起的共同感情为基础的。”

让我们用理解、尊重、沟通、交流、同情……代替航母、飞机、导弹、核武库……

我愿与中国当代的“孙子”们共同祈祷：愿世界和平、安详、悠远的钟声永远回荡在人类的上空。

西部的倾诉

——中国西部女性生存现状忧思录

梅 洁

之一 孕育的恐怖及其它

新加坡、香港还是别的一个东南亚国家或地区，在一间铺满花布的灿烂的房间，年轻的妇幼中心的阿姨正在向幼稚园的孩子讲述“妈妈的子宫”。孩子们席地而坐。坐在花布上的孩子和他们倾听的神情组成了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爱情。“妈妈的子宫”被画在一张硕大的白纸上（还同时画有卵巢），呈粉红色，白纸用支架撑展着，挂在孩子们的正前方。

阿姨问：“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孩子们回答：“是喇叭花！”孩子们嬉笑着，东倒西歪，奶声拖得很长。阿姨纠正：“这是妈妈的子宫。你们回答得很好，它长得像一朵喇叭花。你们知道子宫是干什么的吗？”“不知道！”“它是你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前睡觉的地方，你们温暖的睡床。你们知道它长在妈妈身体的什么地方吗？”“不知道！”“它长在妈妈的肚子里。”漂亮的阿姨说着就拍自己的肚皮。接着阿姨又说：“你们看，它没有眼

睛，没有鼻子，没有嘴巴，你们呆在里面怎么和妈妈说话呢？你们恐怖吗？”这时，孩子们瞪大惊恐的眼睛回答：“恐怖——！”他们又一次把声音拖得很长。亲爱的阿姨笑了：“不要怕，宝宝们！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根脐带和妈妈的子宫连着，妈妈通过脐带和你们说话，供你们呼吸和营养，你们的肚脐眼就是长脐带的地方。摸摸你们谁没有肚脐眼！”孩子们又一次笑了，笑得东倒西歪。然后纷纷举起小手，争先恐后地回答：“我有肚脐眼！”“我也有肚脐眼！”……

我不知中央二台在播放什么国家什么地域的什么节目，打开电视时我就看到了上面这个画面。这个画面令我惊愕而感动。我感动女性身体内如此隐秘的一个部分竟被如此温暖洁净地传达到如此幼小的孩子们的心里，我惊愕在中国成年人的社会心理中也讳忌、也躲闪谈论的女性生殖器官，竟被几个年轻的阿姨如此真切地在说给五六岁的孩子们听。

此刻，我无法阻拦我已脱缰的思绪，它已飘飞万里到达了西部高原——1998年7月至9月我一直在那片沉寂辽阔的高原上行走。我行走的理由不是为了满足文人想象中的浪漫，我是在探寻贫困地区与母亲、与“生命之初的睡床”有关的命题。

中国贫困的西部每年都有数百万儿童在失学、辍学，他们中十有六七是女童。我知道西部女孩不知道那个美丽如喇叭花的器官的功能，她们来月经时都吓得发晕；她们甚至不能也没有条件以洁净的方式来保护那个维系人类的温床——她们用破布袋装草木灰来对付每月来临的青春之潮；她们和她们的父母绝对把这有期不遇的生命破碎视为“脏水”，来潮时她们被禁止去寺院斋堂祭拜，甚至不能去坟上祭拜亡祖。她们九岁就要订婚，十五六岁要出嫁，出嫁后她们恐惧做爱，然而不久，她们又听其自然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性。她们几乎一年生一个孩子，她们不到30

岁就有五六个儿女，她们说起生孩子如同儿戏：“像下耗子一样！”但她们若生不了男孩还得继续受男人蹂躏，继续像生小老鼠一样生儿育女……她们的女儿长大，像母亲的童年一样去放羊、去捡发菜、去挖甘草根，再长大像母亲少女时一样用破布袋装草木灰侍弄月经。她们经历着“贫困——得不到教育——愚昧——更加贫困”的人生怪圈，而西部低素质人口却在翻番地剧增。

孕育在这里成为威胁生存的恐惧。

于是，西部万丈厚土却寸草不生，西部辽阔千里却没有了森林。可人类的至珍至爱没有了草芥森林还能有什么呢？除了沙漠戈壁没有了可供温饱的土地，除了大风干旱没有了可供饮用的净水，除了愚钝没有启蒙，除了贫困没有智性。瘦骨嶙峋的西部没有了生命的质量和孕育的美丽，人类丧失着自身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西部的农村走了数月之后，我终于听懂了那位宽厚冷静目光忧伤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站在世纪的门坎上发出的声音：人类进入 21 世纪的通行证上首先承诺的应是为每个人提供受教育的权利！

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西部的孩子们不再大批地失学，西部的大人们不去封杀悬挂在教室里的“喇叭花”（如果有老师悬挂的话），西部的儿童们也能倾听有关“妈妈的子宫”的温暖的声音……那时，西部将告别贫困告别愚昧，西部的森林和草就会慢慢长起来，而西部的孕育就将交融着温暖的理性与激情。

人类教育的滞后、同步或超前难道不该是现代人关心的主题？

上帝造人时，赋予人生育的能力，这使人类得以繁衍并获得幸福，然而，也因此使人类遭际报应和灾难。

地球诞生已有 47 亿年，地球上出现生物已有 20 亿年，人类的诞生迄今只有 300 万年。起初的 200 多万年人类数量一直很少，大约 1.2 万年以前，人类开始栽培农作物时地球上人口约 500 万。从有公元纪年开始，即差不多 2000 年前，地球上的人口约 2.5 亿。从公元 1 年到工业革命即 1750 年世界人口翻了两番，达到 7.28 亿，又过了 200 年，即 1950 年，地球上的人口净增了 17 亿。然后又过了个瞬间，即不足 50 年，世界人口又净增了 35 亿！这就是今天全世界的人口，已超过了 60 亿！仅在 300 年前，世界人口翻一番需要 35000 年，大约要经历 1400 代！而现在，不足 50 年，没用一代人的时间，世界人口就翻了 1.5 倍还多。

孕育的背后蕴藏着巨大的恐怖。

有人看到了这个恐怖，比如 200 多年前的马尔萨斯。1789 年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发表时，他看到的世界不过只有 7 亿多人。但马尔萨斯恐怖了。他提醒人类：在食物供给满足的情况下，人口将按几何级数 1、2、4、8、16、32……增长，而生活资料只能按算术级数 1、2、3、4、5、6……增长。马尔萨斯担忧人类会因食物供给不足而发生战争、贫困，他当时没有想出别的控制人口增长的好办法，他提倡晚结婚或终身不婚不育。

然而，马尔萨斯的声音被人类孕育的幸福抑或是蒙昧的黑暗吞没了。

现代人称马尔萨斯为庸俗经济学家，但 210 年过去了，当人类如洪水般一天天淹没吞噬地球时，人类也没有想出比马尔萨斯更好的办法。

中国人浩浩荡荡。

从 18 世纪 30 年代（清雍乾之交）人口突破 1 亿之后，便一亿一亿地翻番。翻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人们在欢呼“六万万人民万岁”时，“中国的马尔萨斯”出现了。

1957 年 6 月《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马寅初在分析了中国人口高速增长与资金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之间的矛盾之后提出：提高人口素质，控制人口数量。

马寅初拥有比马尔萨斯高明、鲜活得多的办法。比如加强宣传，消除“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的封建观念；修改婚姻法实行晚婚；若婚姻法控制不力，可借助行政措施，即生两个孩子有奖，生三个孩子征税，生四个孩子征重税。并提出用征来的税金做奖励少生孩子的奖金，国家财政不进不出……

这是多么行之有效的办法！

这是中华民族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发出的智慧之声！

这是继马尔萨斯之后、经历了 168 年文明对愚昧的又一次提醒！

然而，马寅初被打倒了。全国上下声讨，北大马寅初住宅，大字报铺天盖地。一个智者的声音被淹没了，文明伤痕累累……

“人多力量大”、“人是第一宝贵的因素”，那就放开生吧。

一年 2000 万、3000 万地生，每年生他个澳洲，生他个加拿大！直生到天空昏暗、江河污染、森林草地破坏殆尽，直生到用占世界 7% 的土地养活着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直生到人均只剩下 1.31 亩耕地、以占世界 40% 的农民仅养活占世界 7% 的非农民。生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中国意识到要搞计划生育时，中国的人口已达到了 9 亿。没过几年即 1980 年中国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时，人口已突破 10 亿！当中国把计划生育作为国策时，人口增长率开始慢了下来，20 年全国上上下下地努

力，终于使中国少出生了 3 亿人口。然而，终因基数过于庞大，2000 年中国人口仍将达到 13 亿，2010 年突破 14 亿……

宋健等系统工程学家曾根据资源、物产估计：中国淡水资源容量最好人口 4.5 亿，中国粮食生产总人口不能超过 12.5 亿，能源资源不能超过 11.5 亿。现在，我们已全部超过了好几亿。以后的年月呢？据有关专家测算，到 2050 年中国人口达到 16 亿时才可能出现零增长。十几亿人堆积在这片资源有限的国土上，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

贫困与愚昧交织的中国西部，文盲率很高尤其是妇女文盲充斥的西部，涌现在中国生育大潮的风口浪尖之上——

1977 年联合国沙漠化会议提出了干旱地带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的临界指标，即每平方公里不能超过 7 人，半干旱地带不能超过 20 人。今天，干旱沙化的西部把冰川沙漠荒原全部计算在内每平方公里已达 49 人！“苦甲天下”的甘肃定西每平方公里已达 130 人！定西的通渭每平方公里 79 人！山河破碎的会宁每平方公里已达 88.5 人！80 年代初，甘肃惟一有余粮可外运的河西走廊每平方公里的耕地上已容载 572 人！这样高的人口密度同江苏省人口密度几乎相近。即使这样，“三西工程”（甘肃境内为两西工程）还将其作为移民 50 万人的地方。

笔者赴宁夏采访时从银川一家书店购得一本《中国人口——宁夏分册》，从中发现，沙漠荒原包围的宁夏 1985 年人口密度已达 62.4 人，超过临界线近 7 倍！从 1950 年至 1985 年，宁夏年平均出生率为 32.680，除西藏外，排全国第一。其中，在马寅初遭难的年间，即 50 年代至 70 年代的 20 多年里，年平均出生率从未降到 400 以下。1962 年以后连续 8 年排全国第一，1962 年为 44.60，1963 年 50.520，1964 年 49.370，1965 年 48.080，1966 年 42.200，1967 年 43.130，1968 年 40.

890 , 1969 年 42. 690 , 1970 年 40. 270 。据 1981 年对宁夏妇女终身生育子女数的普查, 40 岁妇女生育 6 个, 45 岁生育 6. 82 个, 50 岁生育 7. 07 个, 55 岁生育 7. 03 个, 60 岁至 64 岁生育 6. 79 个。据对同为“苦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区的 50—54 岁的妇女终身生育子女数普查, 同心县为 8. 06 个, 固原县 7. 64 个, 海原县 8. 44 个, 西吉县 7. 88 个, 隆德县 7. 94 个, 泾源县 7. 51 个。

在西海固山区, 妇女早婚早育成风, 从普查资料看, 1981 年全国 15—19 岁已婚青年占同龄青年 4. 28%, 宁夏山区为 8. 4%, 翻了一番。而南部山区为 13. 7%, 翻了两番; 全国妇女平均生育期为 20—34 岁, 宁夏山区为 18—47 岁, 西海固山区为 16—49 岁, 生育期普遍长; 1981 年育龄妇女生五胎以上的全国为 7. 67%, 宁夏山区为 10. 7%, 而西海固山区则高达 34. 8%, 最高的生了 23 胎! 实在是惨不忍睹。

完全无节制的生育使宁夏 1985 年的总人口比 1950 年增长了 246. 2%, 增长速度比全国平均快 1. 6 倍。

蒙昧笼罩着西部女人的生命。

这时, 我不禁想到把青春、心血和智慧献给了西部女童教育的专家、学者周卫先生, 想到他曾经经历的一幕——原籍江苏的周卫先生, 1968 年大学毕业后, 即被分配到最贫困的西海固地区西吉县一所偏僻的农村中学当老师, 在那贫穷的山塬沟壑里, 他发现几乎每户人家都是六七个孩子, 最多的人家 12 个孩子。有一次在家访动员学生上学时, 正好碰到婆媳俩同时坐月子, 每人怀里抱一个刚出生的娃娃, 这让一个知识分子的心像突然被蚂蜂蜇了一下, 惊愕而疼痛。他问婆婆的男人: “你有几个孩子?” 男人说: “5 个。”周卫看炕上爬的、地上跑的光屁股娃娃不止 5 个, 又问他。男人又忙说: “儿子娃 5 个, 还有 2 个女子。”原

来，他心中就没有把两个女娃算做家里的人。周卫又问孩子们的名字，他说了几个就说不出来了，索性就用孩子出生时他的年龄替代，叫什么“马三十七”、“马四十”……

我想，也许是这太多的疼痛最终成为周卫在日后的年代里，锲而不舍地从事西部女童教育研究的原因吧。

我也不禁想到我在宁夏同心县窑山村时的一种心境：前面我说过我曾在下马关镇买了 100 支铅笔、20 把削笔刀，我是准备送给窑山村里的孩子们的。可当一个 9 岁小男孩向我走过来时，我却迟疑了。因为我刚刚从他们家出来，他的父亲只有 40 岁，他的母亲只有 37 岁，可他们家兄弟姐妹竟然有 6 个！一个也没有上学。我问他母亲：“你这么年轻怎么生这么多孩子？”她满不在乎地说：“俺们生孩子不精贵，下耗子一样……”“你们这里不搞计划生育？”“搞，管得不严。”“孩子们上不了学怎么办？”“挖甘草……”望着眼前的女人，我无言以对。但我深感心里很痛。我真想对她说，你真不该把这么多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你应该知道，你的每一次孕育都给这个世界增添一份恐怖……然而，我什么也没有说。所以，当 9 岁小男孩向我走来时，望着这个不该来世的小男人，我发生了瞬间的迟疑：你要笔干什么？你永远也不可能上学。可是，当孩子抬着头用乞求的眼神望着我时，我的心软了。我发给了他两支铅笔，一把削笔刀。孩子是无辜的，罪不可恕的是愚昧。

我想，还有组数字能够给我们一种启示——1981 年全国 12 岁以上的女性文盲半文盲占同龄妇女人口的 24.57%，宁夏同年为 57.59%，而宁夏南部山区则高达 80.26%！而在宁夏 1981 年生育 4 胎以上的妇女中，大学文化程度的为零，高中文化程度为 0.05%，初中文化程度的为 1.04%，小学文化程度的为 8%，文盲和半文盲则为 90.91%。现实再鲜明不过地在告诉

我们，教育之于妇女的生育观、人生观何等重要！教育之于人类已经陷入的困境——人口爆炸式增长何等举足轻重！

之二 仅仅是“楼兰人来不及种树了”吗

一位始终在关怀、忧虑人类生存的作家，曾站在被沙漠掩埋的楼兰古城遗址，心情非常沉重。当他从出土文物中得知 3000 多年前的楼兰，也曾有环境学专家向国王建议对“砍树者”实行“罚马”、“罚牦牛”，当国王将此建议晓谕臣民时，一切都已晚了，沙漠、狂风、干渴已开始疯狂地吞噬楼兰。楼兰人来不及种树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曾经“马蹄哒哒，驼铃声声，商贾使节络绎不绝”、处在古丝绸之路上的楼兰城的富裕和繁华；我们同样也可以想象，当沙暴卷来并掩埋这座城市时，无处逃生的楼兰人的惊恐与绝望。

于是这位作家站在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的楼兰遗址，面对强大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告诉人们：一切繁荣倘不以坚固的生态平衡为基础、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依托，那么繁荣就是靠不住的，一阵黄风就能刮走。

楼兰被掩埋了。和楼兰同时兴起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尼雅、卡拉当格、安迪尔、古皮山等繁华城镇也都先后湮没在近代的沙漠之中。这是世界旧大陆的悲剧。

当我穿行在辽阔的西鄂尔多斯荒原，当我行走在沟壑纵横、山壑破碎的甘肃定西和宁夏西海固，当我站定在漫漫无际的腾格里沙漠之中时，我总在想，仅仅是楼兰人来不及种树了吗？世界旧大陆的悲剧就不再发生了吗？

事实上，中国西部因贫困而蒙昧、因蒙昧而无节制地生育、

又因恐怖的生育而降临给生存环境的巨大的、灾难性破坏已经发生——

我在宁夏采访时，随处可以看到和听到贫苦的农民和他们的孩子生钱的惟一办法是挖甘草，即使我在同心县韦州镇，很优秀的老师在赞扬某某女童能艰苦读书是因为该女童能吃苦挖甘草，赞扬该父母能供女孩念书也是要领我参观满屋子的甘草。人们居然不知道这一代又一代的挖甘草已经把宁夏整个的生存环境给毁得面目全非……

历史上的宁夏不是今天这样被沙漠和秃岭紧紧包围，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黄河两岸，沃野千里”。唐人韦蟾在《送卢潘尚书入灵武》（灵武为今宁夏灵武县）诗中写道：“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队铁衣明”，说的就是宁夏“粮果飘香耕耘忙”的景象；《山海经》说六盘山上“其木多棕”。棕是亚热带植物，大量生长在六盘山上，足见六盘山和它脚下的西海固气候多么温暖湿润。然而今天的宁夏已是“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春天的风可以将禾苗吹死、掩埋，夏天的风可以将庄稼“青干”在地里，秋天的风常使成熟的农作物纷纷落粒；曾经青山葱茏的六盘山下的西海固如今万山秃尽，每年水土流失数万平方公里，每年损失1亿多吨肥沃土壤，成为黄河中上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宁夏土地沙化面积已达17000平方公里，地处西鄂尔多斯荒漠区的盐池县因滥挖甘草而使土地沙化面积已达700多万亩，占县内沙区面积的86%！

甘草，又称“药王”，属国家保护植物。在宁夏这样的干旱荒漠区，保护甘草更是保护草原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宁夏却在疯狂地挖甘草。作家徐刚曾在《疯狂的宁夏草原》一文中披露：最早的“疯狂”始于1984年，4个县70多万亩草场全部被破

坏。1985 年中宁县药材公司在完成下达收购 10 万斤甘草的任务之后，又超收 70 万斤。草原管理部门向药材收购部门打官司，要求交纳草原建设费，然而官司输了。官司都输了，以后还能管什么？于是人们又一次疯狂地拥进了草原，不挖白不挖。1987 年，宁夏自区至县，又下达了收购 350 万斤甘草的任务指标。1993 年，数千人、上百辆手扶拖拉机浩浩荡荡开进了盐池县草原，埋锅烧饭、安营扎寨地挖起了甘草。70 位农民跑到银川上访，问“草挖光了羊吃什么”。于是自治区政府下文“禁止采挖甘草”，然而疯狂的采挖者们依然挖了 4 个月，把所有有甘草的草原全部翻了个底朝天。

1949 年宁夏有甘草资源 1400 万亩，那时年收购量为 75 万公斤，1993 年宁夏甘草资源减少了一半，只剩下 700 多万亩，但当年收购任务居然为 572 万公斤！有人收就有人挖！是什么人在年年下达如此之高的收购甘草的指标呢？从 80 年代至今，宁夏仅挖甘草一项直接和间接损坏的草原达八九百万亩！每年因挖甘草损失的牧草达 5000 万公斤，断掉 5 万只羊的粮草！

现在，宁夏甘草已经不多了，人们须到 50 里外、100 里外去挖，挖不到就三五人合伙，拿上被褥、镢头、麻袋和锅碗瓢盆，开上手扶拖拉机到内蒙、新疆去挖……

然而，1998 年 9 月，我在宁夏采访时，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无论是书报资料还是电视节目，都依然在说：“宁夏有三宝，枸杞发菜和甘草。”

《汉书·地理志》云：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今甘肃天水、陇西、定西等地域囊括了甘肃中部 18 个贫困县。“民以板为室屋”的甘肃中东部地带什么时候变成“万丈厚土、寸草不生”的呢？

甘肃中部地区从东汉中期到解放前的 2000 多年间，多次爆发大规模战乱，战祸绵延先后达 60 多年，给当地经济和自然环境造成重大破坏。《定西县志》记载：“清代以前，森林极盛。乾隆以后，东南二区砍伐殆尽，西北两区犹多大树，地方建筑获利赖焉。咸丰以后，西区一带仅存毛林供居民燃料。光绪初年左宗棠提倡种树，东自会宁，北至榆皋，西至临洮，道旁杨柳浓荫蔽日，名左公柳。光绪 21 年，建筑营房砍伐殆尽。”

由于自然生态的被破坏，这一地区旱灾发生的频率越来越短，从清朝 263 年中的 17 年一旱，到 1892 年至 1946 年 4 年一旱，1952 年始，变为 1.4 年一旱。“人相食”这一自然界最残酷的现象，许多年来我们这一代人只是作为一种理念而不敢实信。然而这一现象在甘肃中东部许多县志上都有记录：1528 年，靖远大饥，会宁大旱；陇西大旱人相食；环县大旱人相食；秦州各县大旱人相食。1548 年，靖远大饥，饿殍盈野。1628 年，靖远、会宁、兰州、庄浪大旱；定西、通渭大饥；环县旱，大饥，人相食……1635 年，临洮夏旱，饿死甚众；会宁飞蝗蔽野。1865 年，靖远大饥；皋兰冬大饥，饿殍载道……1930 年，定西大旱，灾民 3 万……

1960 年，定西、通渭、会宁一带大旱，赤地千里，老百姓挖草根、剥树皮而食。通渭灾情严重，饿死者甚众……

笔者在甘肃采访时，甘肃“两西指挥部”调研室张振江先生说到 1982 年的大旱：1982 年一年没有下雨，粮食绝收，人畜饮水极度困难。政府动员数千人往灾区送水，送水车队经过时，天上飞的鸟、地上跑的牛、羊、猪、狗都疯狂地跑过来和人抢水。定西地区 120 万人全部靠汽车拉水度命，国家补助拉水费近 600 万元。张先生说，以定西为代表的甘肃中部 18 个干旱县 600 万人近 400 万人没水吃。“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生产靠贷

款”在这一地区持续多年，仅定西地区从 1973 至 1982 年吃国家返销粮 14 亿公斤。“吃的救济粮，穿的黄军装”就是那些年中部地区的真实写照。

“始于 1982 年的‘两西工程’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德政。没有‘两西工程’就没有今天的甘肃。”张振江说。这位 1968 年甘肃农大水利系毕业的分子，几十年来，为甘肃水利发展和“两西工程”建设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甘肃中部的干旱，主要是生态环境遭到了根本的破坏……”

张振江说道，为了落实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1984 年甘肃省委抽调了 1000 多名专家、领导和干部对中部地区生态环境作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调查研究。调查结果怵目惊心——

定西县：植被破坏呈持续性、全面性、群众性。破坏的方式主要铲草皮、挖草根。全县铲草皮、挖草根的面积达 70.3 万亩，占全县三荒面积的 40%；全县草场超载放牧达 2.5 倍以上，天然林木已荡然无存，新栽林木也已毁掉 54%……大量的生态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全县每年水土流失 180 万吨，每亩达 3.3 吨，伴随泥土每亩流失有机质 22 公斤，由此造成全县土地支离破碎，沟壑纵横，土壤瘠薄，耕地严重缺肥；自然灾害频繁发生，1950 至 1983 年 34 年中，大小旱灾 23 年，平均 1.4 年一次，其中粮草绝收的大旱达 10 年，除此，冰雹、霜冻也频频发生。1963 至 1983 年 21 年间，定西一县吃国家返销粮 1.29 亿斤。

永靖县：史载，永靖灌木丛生、牧草茂盛、牛羊成群。明清以后移民开荒，人口剧增，林草面积已逐年减少。1950 年以后，永靖县人口失控，所有的负载都压在了土地之上，大面积开荒使永靖陷入“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首先是滥砍乱伐，使森林破坏殆尽：据小原村群众回忆，40 年代，那里只有 9

户人家 47 人，200 多亩地，山草长 30 多厘米高，到处有次生林。后来，人口猛增，扩大开荒，把毛刺林连根挖出当柴烧。1958 年吃食堂，次生林全部挖光。到 1983 年小原村人口已增加到 117 人，坪沟乡也由 1950 年的 2042 人增加到 4390 人，于是，森林覆盖率仅剩 3.9%；林木砍完之后，永靖农民开始挖树根铲草皮。全县干旱区农户 1.47 万户，全年共需要燃料 8000 多万公斤，其中做饭需要 4800 多万公斤，烧炕需要 3300 多万公斤。这其中 44% 的燃料是烧秸秆和畜粪，其余则全靠铲草皮、挖树根。小原村户均铲草皮 1500 多公斤，面积近 30 亩；再就是全县超载过牧，把秸秆饲料和仅有的草场全算上，只够一半的牲畜用，超载达 50% 以上，迫使草场严重退化。环境的急剧恶化使永靖县水土流失面积达 78.55%，80 年代初，人均口粮只有 150 斤，不够半年吃，人均收入只有 40 元、十几元，吃盐都不够。

会宁县：1949 年以前，全县荒山植被达 60% 以上，近 50 年会宁的人口几乎翻了两番，1998 年会宁人口为 57 万。50 代会宁每年调出粮食 1100 多万公斤，60 代会宁依然可以每年调出粮食 890 多万公斤。从 70 年代开始会宁非但没有余粮外调，每年还要调进粮食少则 3000 万公斤、多则 6500 万公斤。会宁从一个余粮县变为一个严重缺粮县，致命的原因是人口的增加使会宁的山河遭到严重的破坏。如同定西、永靖和其它县一样，七八十年代以来，会宁大约每天破坏植被 3000—6000 亩！如果按半年烧草根、半年烧秸秆，会宁一年破坏的植被也达 50 到 100 万亩！

.....

现在，我们再来看青海。青海是黄河、长江的发源地，黄河是青海境内的第一大河，过境干流长 1960 公里。青海的湟水河、大通河等 90 条河流汇入黄河，占黄河水量近一半，所以说青海

是母亲河的最大输液者。然而，80 年代以来，大量淘金者涌入河湟谷地，使这里的人口增加了 10 倍。加之生育失控、草原过度放牧，今日的青海南部鼠类猖獗，毒草、杂草丛生，荒漠化面积迅速扩展。据国家环保局卫星图片显示，荒漠化速率已由七八十年代年均 3.9% 增加到 90 年代年均 20%，加快了近 4 倍。生态恶化使青海自 1992 年以来几乎年年发生旱情，受灾面积数百万亩，黄河的干流之一湟水流域每年因水土流失丢掉耕地上万亩。1997 年黄河上游水量降至历史最低点，致使上游的两大水库龙羊峡、李家峡水库蓄水量减少了近 25 亿立方米，成为建库以来最少的一年。1998 年 8 月我在青海采访时得知，那个周长为 360 公里、世界上最大的咸水湖泊青海湖，从 70 年代以来每年水位下降 10 至 13 厘米，致使一些地方如今已露出了沙丘、形成了半岛。10 年前，我到达过青海湖。那时，望着湛蓝湛蓝的湖水，我把它比做大海退却时遗落的一滴伤心的泪水，抑或是地球在山崩地裂地自我嬗变时留下的一份蓝色忆念。那时，我很诗意很浪漫。10 年后我又一次站在青海湖边，望着一天天一年年减少的湖水，我就想，当这滴泪水彻底干涸时，当这份忆念彻底泯灭时，地球将怎样抖动它的愤怒呢？那一刻，我很忧郁也很恐惧。

当我即将结束西部的采访时，我来到了腾格里沙漠南缘的沙坡头。当我独自站立在这无边无涯的瀚海里面，当我向波涛般凝固的黄色走去时，我居然不是恐惧，我体验的是博大、是敬畏。科学告诉我们，沙漠是在人类到达地球之前的几千万年，已经完成了它的铺张的，所以当人类出现时它已非常傲岸。但那时的沙漠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它仿佛对人类说：我们相依相存吧。那时的人类对它是敬畏的、不敢轻易触怒的，因为它是“天赐”的。

“腾格里”是蒙语，意即“天上掉下来的”。可是后来人类狂妄了，得意忘形了，在这个桀骜不驯的大物面前不小心翼翼了，于是这个大物肆虐了。我不是在这里讲童话，因为依然是科学告诉我们，地球原本留给我们的原始沙漠是很少的，现在地球沙漠的87%是人类后来的活动造成的。

沙坡头是腾格里大沙漠南端紧逼黄河的连绵沙山，东西长十几公里，在黄河北岸堆积成高达百米的沙坝，这里曾经流沙纵横，平均每10个小时出现一次沙暴，沙暴一来，地毁人亡。沙坡头一带年降雨量只有200毫米，蒸发量却为3000毫米，是降雨量的15倍！沙漠每年以8至9米的速度向黄河方向推移。我想，如果沙坡头不出现一个治沙林场，不走来一批献身于治沙事业的专家和工人，黄河在这里早已成为地下河！那条抻长的京兰铁路不知已被湮埋过多少次！

1957年沙坡头建立了固沙林场。走来了专家，走来了工人农民。他们在茫茫沙海里安营扎寨，开始与人类的暴戾搏斗。他们创造了1×1米半隐蔽式草方格沙障固定流沙，那些草方格的草用的是麦秸或稻草秸。然后，他们又抢墒在草方格里播进草或灌木。30年不懈的努力，30年生与死、成功与失败的搏斗，终于在沿铁路两侧连绵不断的沙山上布下了一张绿色巨网，这张网宽近千米、长近70公里，形成纵横几万亩的固沙林带。昔日吞村毁舍、席卷大地的黄沙被绿色巨网牢牢捕获，再也未能逞凶。绿色巨网曾经历了百年不遇的大沙暴的袭击，但安然无恙。

在沙坡头沙漠边沿高高地耸立着一座碑，那上面记载着1994年联合国命名沙坡头固沙组织为世界500家最佳治沙单位的表彰内容。仰望那座沙漠中的丰碑，我感受着一种悲怆和震撼：这是人类对命运抗争的纪念。回眸南望依然喘息着、挣扎着穿越沙漠的黄河，我就想，我们的“生存教育”应该添加的内

容，我们的老师应领孩子们常来沙坡头看看。告诉他们我们生存环境的危机与艰难，不能再砍树、铲草皮、挖树根了！告诉他们沙暴曾经湮没了一个楼兰、尼雅……可沙暴只仅仅湮没楼兰、尼雅……么？让他们回去告诉他们的父母，让他们长大了，告诉自己的孩子……

之三 雾罩窑山

窑山，是中国西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一个贫困乡。

1998 年 7 月至 8 月我走过了甘肃、青海之后，9 月我便到了宁夏。我在宁夏走了很多的路，从宁北走到了宁南。我站在了腾格里沙漠南沿的黄河岸畔，我进入了那个曾经神秘存在而又最后彻底消失的西夏王国残败的墓陵，当我穿越了 600 平方公里的西鄂尔多斯荒原、然后翻越六盘山到达和甘肃定西一样有“苦甲天下”著称的宁夏南部山区西海固时，贫陋的窑山只是我行程中一个小小的驿站，可是，我还是想说说窑山。

在我赴宁夏之前，宁夏在我心中的印象有三种定格：第一，宁夏是个沙窝子；第二，天下黄河富宁夏；第三，宁夏人的坚韧与强悍。所有的印象都来自既遥远而又贴近的传说。应该说，在完成了宁夏的行走之后，这三种印象都有了感性意义的再现。

今天，纯地理意义的宁夏可以说是腹背受敌：腾格里沙漠从东至北步步围逼，西边的贺兰山已剥蚀得面如死灰，南边数百平方公里的鄂尔多斯高地和塬、梁、峁、涧、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寸草不生，这也许就是人们说的“宁夏是个大沙窝”的缘故吧。

多亏了黄河。黄河从贺兰山南麓入境，折东麓北流至石嘴山出境，流经宁夏 392 公里，黄河过境处，沃野百里，水肥土美，果花飘香，谷米殷积，早在十六朝时便有“塞上江南”的美誉，

这就是我后来到宁夏时看到的银川大平原——黄河大灌区。我抵达宁夏时已是9月上旬，一望无边的稻地青黄相间，再有20天就要收割谷米，路边街市，摆满了中宁产的大枣、苹果，又脆又甜……也许，这就是“天下黄河富宁夏”了吧。

然而，曾经连续18年出生率达440、居全国第一的宁夏，如今人口已接近500万，就这么一块绿地，还能富饶多少年呢？

9月12日，我独自一人走进了距银川北35公里处的900多年前一个王朝的墓陵——西夏京畿皇陵，在贺兰山下的洪积扇上，方圆十里建有9座帝陵和147座陪葬陵，这被称为“中国金字塔”的皇陵是一个已经在中国销声匿迹的民族——党项族王朝的陵园，这个王朝曾经把自己的疆域辽阔到了今日的甘肃、宁夏、青海、陕西、内蒙古河套的全境，与北宋和辽国分庭鼎立。直到13世纪初，成吉思汗带领的蒙古人灭了这个王朝。在长达190年的统治中，它创造了完全属于自己民族的文字——那最少11笔画的象形文字，据说今天在全国只有3人可以认读，那是西域神秘灿烂的文化。西夏国的兴灭不是我此刻要写的内容，我只是想说，那个曾经神■般养孕福佑了匈奴、羌戎、鲜卑、吐蕃、党项、蒙古等游牧民族的贺兰山，那个南北绵延250多公里、东西宽60多公里的贺兰山，绝对不是今天的“面如死灰”，它一定是峰高林密，树木葱茏，水草丰茂，马鹿成群，这不仅有明诗可鉴，更有遍布贺兰山的古岩画做证。

明人有诗赞贺兰山：“贺兰之山八百里，极目长空高插天。断峰迢迢烟云阔，古塞微芒紫翠连。”这是何等壮丽的自然景观。而贺兰山岩画更为世界著名，那数百幅凿刻在岩石上的牛、马、羊、犬，虎、豹、狼、鹿，以及飞禽以及犏牛，以及人类的活动：射猎、交媾、战争、群舞……贺兰山岩画既是古人类的文化遗存，也是对贺兰山自然生态的真实记录。

然而，这一切都消失了，贺兰山秃了，金碧辉煌的西夏皇陵也只剩下几座偌大赫然的黄土堆。

站在颓败荒寂的陵园我四下眺望，眼前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莫非银川是因为这一望无际的、如同银屑般的盐碱而得名的？”我茫然地想。

北边的文明消失了，宁夏人本可以掉转头往南走，因为南边有土层厚达 20 至 90 米的黄土高原，有耸立在黄土高原之上的六盘山。曾几何时，那黄土高原水草丰盛，牛羊成群；那六盘山上森林覆盖，古木绕云。史载，长安三百宫、咸阳阿房宫均取六盘山林木建盖。丝绸之路经宁南固原州，六盘山下，商贾、使节、僧侣穿梭，马帮、驼铃声声，成吉思汗 10 万人马驻扎六盘山，忽必烈让其子在此盖行宫……

然而，这一切也都消失了，六盘山上的森林绝迹了，黄土高原上寸草不生了。文明消失在人类活动的进程中。

也许，我们有一百条理由来说明文明消失的原因，但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躲避它最强大的敌手——野蛮与蒙昧。

今天，宁南山区 8 县全部为国家扶贫的贫困县，一场艰苦卓绝的“扶贫攻坚战”正在这块土地上进行。“苦甲天下的西海固”世界闻名。

“我们去西海固。”我对宁夏教科所王建华老师说。

“那我们就走窑山。”王老师说。

也许，王老师一生也不再会忘记窑山，作为一个知识的启蒙者，他在那里辛苦了 10 年。1968 年夏天，王建华由宁夏大学数学系毕业，“文化大革命”使分配延迟了一年，1969 年 10 月王建华被分配到贫困的同心，接受了一年“贫下中农再教育”之后，他到县教委报到，县教委说，你到窑山公社吧。王建华二话

没说，找了辆拉货的大卡车，行李往车上一扔，人往车帮上一坐，摇摇晃晃 50 里就到了窑山，县里的电话提前打到了公社，一个老师赶着毛驴来到窑山路口接王建华。那时窑山公社只有一所小学，4 名老师，王建华是第 5 名，半年后，这所小学成立一个初中班，此为戴帽中学，王建华教初中班。没有学生，一家一家去找，最后找来了 12 个学生，窑山中学就这样诞生了。除了教书，王建华和学生们一起拾柴，一起翻山越岭抬水，一起在校园里种树，冬天到了，王建华又和学生们一起四处集雪，然后把雪抬到学校的水窖里，这是他们最好的饮水啊。王建华在窑山一教就是 10 年……

9 月 13 日晨 8 时，我们出发到窑山。

出银川市往南，不到两个小时我们就进入茫茫无涯的鄂尔多斯荒原。流沙在这里滚动，稀落的狗蒺藜、骆驼蓬和芨芨草干枯而萎缩，这是一片死亡之海。惟有十里一座的烽火台在向荒原深处延伸，惟有这剥蚀风化的烽火台像一位苍暮的老人，孤独地站在荒原向你诉说千年的狼烟、诉说曾经的刀光剑影。王老师让全师傅把车停下来，他陪我向荒原高处的一座烽火台走去，此刻，一幕奇景出现了——一个穿红花衣服的女子领着 3 个孩子不知什么时候已在荒原站定，在这吞噬生命的瀚海，她们在等待什么？守望什么？我望着荒原中的女人和孩子，心中充满了惊惧和怜悯，此刻，我感到原本沉寂的荒原更加沉寂，原本孤独的荒原更加孤独。

自治区教育学院全师傅开的老“伏尔加”已跑了 14 年，行程已达 40 万公里，全师傅说早该报废了，因为没有钱买新车，它只好超期服役。此刻，老“伏尔加”如一峰伤痕累累的骆驼，在荒原里艰难爬行，我们用了足足两个小时，才走出鄂尔多斯盆地。

我们在古老的韦州镇回民女小呆了一天一夜，然后继续往窑山赶。

老“伏尔加”在黄土高原上山、下山，再上山、再下山，不知不觉中，我发现我们连人带车都已坠在了茫茫无边的雾海中，山路的能见度只有几米。全师傅说我们已到了大郎顶，大郎顶海拔 2800 米。

此刻，坐在全师傅身边的王老师不时地在提醒全师傅：“开慢点，开慢点……”他声音很低，但我分明听出了他的紧张，王老师的提醒使我意识到老“伏尔加”已走进了悬崖峭壁，这时我才明白这大雾的来头。只见车窗外的雾白如棉絮，时而轻轻漫漫地飘拂，时而又波涛滚滚地翻涌。此刻，我想起数年前我乘飞机飞往格尔木时的心境，在万米高空望着机下白如棉絮静如死海的云涛，我产生了一种幻觉：若飞机坠落，这厚厚的云海会是一床棉被把我轻轻托住……无限的惊恐赐予我无望的寄托。在大郎顶，这种莫名的心境伴随着恐惧又出现了。“开慢点！开慢点……”王老师还在叮嘱，全师傅一声不吭。

几十分钟后，当我们“掉”在了一个沟底，我仿佛也从天空“坠”到了地上，长长出了一口气。“你老让我开慢点，我知道你是不信任我……”长着维吾尔人模样的全师傅说。“我主要是操心人家梅老师，这么远来宁夏出了事负不起责任。我倒不怕……”三人“扑哧”一笑。

一路进王家古窑小学，进田老庄小学，进胡庄完小，进岳家川小学，进李家山小学……几乎每一所小学每一个教室里，都有学生站着上课，因为他们没有凳子，到处都可以看到孩子们 4 个人挤一张桌子。岳家川小学 36 个一年级学生在教室外的土院里，用树棍和废电池的炭棒在地上写字，他们和三年级组成复式班，因为教室站不下，两个年级只好轮流上“露天课”……

正午，我们到达窑山。

我曾在下马关买了 100 支铅笔，20 把削笔刀，我准备把它们送给窑山的孩子，因为我听王老师说窑山的孩子常常因买不起一支铅笔而辍学。

窑山是宁夏南部山区同心县的一个贫困乡。同心县和西吉、海原、固原三县（简称“西海固”）同为著名的“三西工程”移民县。和西部黄土高原的任何县份一样，同心县境内地形十分破碎，山、塬、涧、川、丘陵交错纵横，干旱、风沙是这里气候的主要特征，年降水量仅为 272 毫米，而年蒸发量高达 2325 毫米，是降水量的 8.5 倍，岁月已把同心的植被剥蚀殆尽，森林覆盖率仅为 1.3%；1949 年全县 95% 的人口是文盲和半文盲，儿童入学率仅为 0.63%，女童更是寥寥无几，当时粮食亩产只有 15 公斤；1997 年同心县已有 6 万多名中小学学生，学龄儿童入学率已达 92.4%，女童入学率 83.3%，同心县是宁夏回族人口最多的县，对于一个回民高度集中的地区，这样的发展速度已经很是不易。也如同所有贫困的地方一样——越穷人口越是急剧膨胀，同心县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和宁夏全区的增长速度，1949 年同心县只有 2 万多人，1997 年同心县人口为 33.4 万人，其中回族占 80.4%，比 1949 年增长了 11.5 倍，平均年增长率为 5.7%（全国为 2.7，发达国家仅为 0.7），每平方公里已达 48 人，人口的压力已使同心破碎的土地不堪重负，教育也随之受损，“三西工程”同心计划移民 10 万人。如果我们权且认为那个 5.6% 的失学儿童的统计是准确的话，那全县依然每年有 3400 多名儿童加入文盲队伍，其中 2700 多名为女童。

窑山是同心县最贫困的乡之一，全县 37 个贫困村窑山的 13 个行政村全部包括在其中。解放前，窑山没有一所学校，也没有

一个识字的人，结绳记账，画蚰蚰子记账。1952 年窑山办起第一所小学，又过了 20 年于 1972 年窑山办起第一所初级中学，也就是王老师来后办的那所中学。又过了 25 年，即 1997 年窑山学龄儿童入学率仅为 73%，女童 60%，女童完成小学 5 年学业的不到 5%，全乡 1708 名学龄儿童有 470 多名失学，窑山至今 12 岁以上的回族妇女文盲仍高达 89%。窑山极缺老师，民办老师、代课老师占了 58%，女教师尤其缺乏，全乡 98 名老师只有 2 名公办女教师，另有 4 名代课女老师。

我见到了窑山自己的第一个女教师——窑山小学五年级班主任杨梅花；

我也见到了第一个回窑山教书的女大学生——窑山中学生物、物理老师杨英。

这是窑山顶上两棵绿色的树，这是窑山天空两颗希望的星。

窑山学区年轻的学区校长马景海对我说，窑山乡现在有 36 所小学，一所中学，实在是因为贫困使这里的许多孩子上不了学。年成好点，上学的就多，年成一不好，马上大批失学。1996 年受灾，全乡 1400 名适龄儿童，只招了 300 个学生，1100 个孩子失学；1998 年收成好些，招了 605 人，贫困地区教育也是“靠天收”。马景海说，孩子们主要是交不起书本费，如果国家把课本费免了，孩子们全能上学。每年开学，怕新华书店不给课本，全乡 98 名老师（其中包括 50 多名民办、代课老师）把两个月的工资 4 万多元全部交给新华书店，先垫上把学生们的课本买回来，等慢慢收起学生们的钱再给老师们发工资，有的学生始终也交不起，老师只好给垫上。民办老师一月只有 50 元工资，一年还只发 9 个月，再给学生们的垫上书本钱，有的一年也拿不到二三百元钱。民办老师、代课老师实在是太廉价的劳动力。马景

海还说，窑山人均收入不足 200 元，口粮每年不够吃，一点生钱的法子都没有，只有靠抓发菜、挖甘草维持一点油盐钱。过去甘草能挖到，挖一斤甘草能卖 1 元多，一天能挖个十几斤，发菜抓一天也能抓个半两一两，能卖十几元。现在甘草挖光了，发菜抓完了，生钱的法儿眼看也没了。现在挖甘草要跑四五十里远，最远的 200 多里地。现在有不少人到内蒙、新疆抓发菜，带上粮食、锅、破被子，自己做饭，白天抓，夜里睡露天地……

作为一个基层教育工作者，马景海真实的叙说已经使我们看到了窑山生存的艰难，应该说，窑山是整个西部的一个缩影。也许，马景海忽略了另外一面，那就是成千上万的西部人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的挖甘草、抓发菜，最终彻底破坏了西部的生态环境，西部今天之所以万丈厚土寸草不生，不能说与挖甘草、抓发菜没有干系。可是，不挖甘草、不抓发菜他们会活得更加艰难。

这是一个生存陷阱。

人类什么时候就掉进了这个陷阱的呢？

如果我们少增加一些人口，如果我们早一些办好教育，如果我们更早一些懂得人类和大自然须臾不可分离……也许，我们就不会掉进这个陷阱，或者这个陷阱浅一些，我们挣扎一番还能爬出来。

然而，悲哀的是在陷阱出现之前，没有人能告诉人类这些“如果”。

即使天宇间曾经出现了智者的大音，最终也被愚昧和狂妄席卷了……

愚昧将使人类遭受大罚。

之四 关于困境

“……贫困，除却经济范畴的意义外，还应该包含精神内质，那就是创造力和意志力的缺乏。”甘肃省教科所所长、年轻的教学论博士张铁道对我说。“什么叫教育？对于国家而言，是通过教育的孕育使民族获得发展的能量；对个体而言，那就是人对命运及其发展过程的关注。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的教育目的真义是在改变他人命运的同时，也在丰富着自身的命运……”张博士眺望着窗外阳光般的城市，然后回过头来向我讲述他在澳大利亚留学时的房东，“那位坚强的老人启示了我。老人在30岁时失去了丈夫，她有两个儿子，二儿子是个残废，靠着国家的资助她为二儿子成了家，她自己也靠国家的救济金生活。可她每星期都要拿出两天时间到医院去义务服务，帮助那些需要她帮助的人，如拿药、擦洗、喂饭水等。有一次，我对老人说，你可以不必这样做。老人回答，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生活的权力……老人的回答使我悟出了人生的道理：你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在帮助自己。我常常想，我们的教育究竟为受教育者提供了多少这样的精神内质？”甘肃省教育大厦耸立在黄河岸边，黄河就在窗外滔滔东去。置身在位于17层的张博士办公的房间，我仿佛依然能够听见那不绝的孕育生命的水声……

实际上，1997年10月张博士在面对他的导师李秉德教授、李定仁教授完成他的长达8万字的博士论文答辩时，已经就发展中国家课程设置的弊端，以及普及什么样的教育才能更有效地为个人和社会服务，提出了质疑。

张博士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发展中国家相继赢得了独立，他们出于谋求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和愿望，普遍实行了

统一的西方学校教育模式，即“英才”选拔模式。为此，发展中国家的课程始终没有走出以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为目的，以发展智育为中心的西方学术课程窠臼，严重脱离本国以农村人口为主体、农村发展为主要导向的教育需求和办学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学生缺乏学习兴趣、学业成绩低下、大批学生留级辍学（中国1986至1987学年小学辍学学生数为414万人，辍学率为3.1%；1987至1988学年辍学学生达482.6万人，同年，平均留级率达6.4%，其中一年级留级率高达13.19%），进而造成严重的教育浪费。张博士说，片面的学习课程对于亚洲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是帮助少数“英才”通过考试脱离贫困的农村现实，而大部分升学无望的“不合格”学生则落得身心俱损的结果，许多学习者没有通过学校教育获得为改变农村贫困面貌所必须的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念，难以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生活。

张博士说，关于发展中国家不顾本国实际照搬欧洲以培养英才为目的的学校教育模式所付出的代价，早在70年代就已引起国际学者的关注。比如法国学者保罗·朗格让就曾这样说过——

“……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人口仍然生活在农业地区。那些乡下人经常发现，他们所学到的东西不仅在地理上与他们地区相隔甚远，而且在社会、文化和心理水平上也与他们的生活格格不入。因此，教育与生活的联系被隔裂，这不仅导致了文化体验的贫困，而且也诱使人们离开农业地区。事实上，学校教育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鼓励人们抛弃乡村，加入都市人口队伍。”

还有一位欧洲学者保罗·哈里森在对亚洲、非洲进行了长达5年的实地考察后，完成了轰动世界的《第三世界贫困的内幕》一书。哈里森惊奇地发现“政治的独立并没有给非洲和亚洲带来文化的独立。教育形式与内容仍然因袭欧洲的传统，学校只注

重讲授空洞的理论和遥不可及的事实，却不涉及当地村庄农民的实际生活”。

哈里森每到一处都看到，“整个学校教育都在培养学生参加考试竞争，尽管 65%—95% 的学生都无望升学，但大部分国家的课程却不去帮助他们为生活做准备。”于是哈里森将毕业证书比喻为“摆脱农村体力劳动和贫困压抑的‘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哈里森谴责，教育实际上已经成为诱使青年远离他们的亲人、鄙视体力劳动、抛弃需要他们贡献聪明才智的农村的、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寄生虫和梁上君子。

我想，无论张博士也好，无论朗格让、哈里森也好，他们都是对的。但是反过来想，如果发展中国家不用“英才选拔”模式，即通过考试来淘汰和择选人才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就此问题我曾请教过北师大教育系学者史静寰女士，她很无奈地说，没有更好的办法，现在惟有“高考”这块领地还相对是块净土，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公平竞争，如果“高考”体制被打破，后果不堪设想。我们曾经打破过，但最终是一场闹剧中的悲剧。

张博士的同事马金玲小姐，1987 年西北师大教育系毕业，11 年来一直在甘肃省教科所从事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研究，在她陪同我去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时，这个把头发修剪得如英俊儿郎的女子对我说：在长期的调查研究中已经发现现行的课程无法给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与当地生产、生活结合太少，学完回到地里完全是另一码事。这些年国家提倡素质教育，课程也增加了乡土教材，也学，但效果不好。很长时间上一次乡土教材课，为的是上面检查好说说而已。农村的孩子还是想学正规课，想升学，这是个矛盾，已成为死结，很难解开。马金玲说到了天祝县炭窑沟小学，她说学校周围搞了大片洋芋地膜覆盖，长势很好，

周围很多群众去参观，是块教学生实用技术的实验地。后来校长调走了，也不知现在怎么样。谁都知道教学针对性不强，可一味地有针对性，高考怎么办？家长学生都要求升学。这是中国教育的一大困境。如何挣脱这一困境？马金玲说完，目光一片茫然。

应该说这不是马金玲一人的茫然，这是中国教育的茫然。当一种教育模式历史性地被固化，当由固化而形成的教育观念已如此深入人心，当现代化在中国的城市与贫困的农村相距如此遥远，我们设身处地为贫困的家长和学生想想，他们何错之有？

所以，当我在“苦甲天下”的甘肃定西，人们告诉我，生存环境及其恶劣的甘肃会宁每年居然有五六百名考生考上大学，会宁因此而成为甘肃著名的“状元县”，当人们告诉我说北京电子一条街有 247 名会宁大学生、北京部级机关也有 50 名会宁学生，而会宁山河依旧破碎，会宁像被吸干了乳汁、输尽了血液而倒在路旁的母亲时，我无言以对；当天祝藏族女县长马官保告诉我，他们县的学生范建春 1996 年史无前例地考上北大计算机系，全县开庆祝大会嘉奖学校、老师、学生，1998 年他们县的张永生以 621 分成绩、名列武威地区第一被清华大学录取，武威行署要在全地区召开庆祝嘉奖大会时，我不能不和他们一起由衷地高兴。故乡如慈祥的母亲，并不在意儿子们学成是否归来，依然敲锣打鼓送他们上路。

此刻，谁能把此视为教育的困境？

然而，谁又能说得清这不是困境？

之五 祁连山的雪化了

8 月 12 日晨 8 时，我和甘肃省教科所马金玲小姐搭乘兰州开往武威的长途汽车，13 时 40 分我们到达祁连山区的天祝藏族

自治县华藏寺镇。一下车我们便遭际青藏高原彻骨的寒凉，站在街心我们冻得浑身哆嗦，不一会我就发现金玲脸发白、嘴唇发紫。如果天祝县女童教育课题组的周发科主任再晚一点来接应我们，我们真有被冻僵的感觉……

天祝地处我国地形第一阶梯青藏高原向第二阶梯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境内峰峦叠嶂，河谷纵横，海拔 4800 多米的祁连山、马牙雪山终年白雪皑皑。22 万藏、汉、土、回、满、蒙 16 个民族生活在这片天寒地冻的雪域高原。天祝历史上没有县制，以部落为居，1949 年 9 月天祝解放，这是中国少数民族解放最早的区域。1950 年 5 月，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刚一定下来，经周总理亲自批准，天祝就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当时天祝有 44 个部落 22 座寺院。就教育而言，天祝和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一样，百废待兴。当时，境内只有一所公立完全小学，5 所初级小学，在校生 203 人。经过近 50 年的发展，1998 年天祝已拥有民族师范、职业中学、完全中学、小学共 341 所，在校生 41753 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99.43%，其中女童入学率达 99.48%，高于平均数，全县 15—46 岁的农村青壮年非文盲率达 97.4%，扫盲已达到国务院规定的验收标准。1997 年天祝已全县实现“普初”，世纪末，天祝是甘肃省已定的实现“普九”的县份之一。届时，天祝将成为中国最早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少数民族自治县。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前面我已经提到天祝不断有考取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高材生。

我们已经用了很长的篇幅，说了许许多多关于贫困制约教育尤其是制约女童教育发展的事例与佐证，那么天祝是祁连山里、是雪域高原里的一块富美的天堂吗？

不是，天祝是国家级贫困县。截止 1997 年底，全县财政赤

字已累计近 4000 多万。以 1997 年为例，全县财政收入 2900 万，而财政支出为 5100 多万，除省里每年补贴 1100 万外，缺口仍近千万。那么天祝是怎样在困难中发展教育的呢？县教育局那个清瘦干练的周发科主任反复对我说，是“领导重视”。在内地、在西部、在整个中国，我们都经常可以听到“领导重视”和“领导不重视”的说法，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前者会将一种务实的作风贯穿于整个理想与意志的实施过程之中，权力之于前者，成为改善民众处境和履行义务和责任的有效而有力的“法宝”；反之，后者则是对责权的玩忽和对民众的期望与信赖的亵渎。应该说，中国教育的现状与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的各级当政者对教育的不够重视所致，任我们走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听到一些教育工作者和民众的抱怨。

周发科向我说到了他们县主管教育的藏族女县长马官保。

马官保是 1993 年当选为天祝县副县长的，一上任，她就接到西顶小学的一封信。拆开一看，里面有一幅教室危房的照片，歪斜的墙头，绽裂的墙壁，破漏的顶篷……还有一句撞疼她心扉的话：“没有别的请求，只是希望领导了解情况。”马官保当即决定要亲自去看一看。

第二天一早，马官保就叫上县教委副主任一同前往大红沟乡西顶小学。通往西顶的路铺着一层厚厚的积雪，无法通车，马官保就步行十几里走到了西顶。眼前的境况比照片上更让马官保心疼：墙斜屋漏的教室，扑嗒、扑嗒滴落着房顶渗透下来的雪水，水点、泥点不断砸在老师的讲台上、头顶上，砸在学生们的课桌上、脸上。即使这样，老师仍一丝不苟地在讲课，学生们仍一动不动地在听课。马官保见此，心头一热，差点掉下泪来。回去时西顶的老乡要用拖拉机送马官保，他们不忍心让女县长在泥里雪里再走十几里路，他们还宰了一只羊让女县长带上，马官保都一

一谢绝了。回县当天，她立即找县长汇报，立即批给西顶小学修建费 7 万元。几个月后，当人们纷纷投工献料、在欢呼声中把马官保的爱与责任一同砌就成了一座崭新的西顶小学校时，天祝政府和女县长投进去的仅仅是 7 万元钱么？1998 年 8 月我到达天祝时，周发科告诉我说，全县小学校舍危房面积已由 1993 年的 8.44% 降到 1997 年的 0.97%；马官保上任时，全县 2000 多名教师只有 85 套住房，条件最好的县一中，90 多名教师也只有 12 套住房。许多老师租老百姓的房或用碎砖烂瓦垒间小房，住得破破烂烂。“就这样的生活条件，怎么要求老师们提高教育质量？”马官保感到再这样下去实在对不住辛辛苦苦教书育人的老师们。“不能安居哪来乐业啊！”马官保想。于是，她想方设法，四处筹资，县财政、银行、房改资金……马官保当年筹资 40 万元，先为城关小学和县一中老师解决住房困难。周发科说，现在全县老师的住房基本都得到了解决。

在天祝宁静寒凉的傍晚，马官保来到了我的住处。这是一位朴素文静的藏族中年女干部，一坐定她对我说：“来晚了，刚刚散会。县委、县政府刚刚做了一个死规定，18 岁以前不准入寺，必须接受九年义务教育。2000 年全县一定要实现‘普九’……”面对这位异族女性，当我稍稍了解了她的身世和经历，我便觉着她的全部努力不仅仅是那个朴素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权责良心，支撑她的还有苦难铸就的博大的爱与悲悯之心。马官保的父亲 11 岁时成为天祝连城西寺的活佛，曾被送到北京雍和宫学习 7 年，19 岁时回到连城西寺。天祝解放后父亲还俗，在县政府做藏文翻译。“文革”一开始父亲便成为“牛鬼蛇神”被“管制和监禁”了起来，马官保和母亲也被撵到了天祝最贫困的东坪乡农村，贫病和抑郁相交的母亲就死在了东坪乡下的破窑洞里。16 岁的马官保从此孤苦无依。这时，人世间的善良和悲悯

走近了马官保——东坪小学那个戴帽初中班的尹国庆老师天天派同学去和马官保做伴，帮助她做农事，鼓励她对生活充满信心。1972 年从天祝一中走出的马官保又到三沟台农村当民办老师。在这期间，马官保饱尝了做民办老师的艰难和孩子们上学的艰难。应该说这是马官保日后“为官一任”时一定要为老师和孩子们扎扎实实办几件事的心理基础。

“现在，全县有 19 所牧区寄宿制中小学，有 2400 名学生，其中女生占一半；民族中学女生多一半；天祝师范已培养了 400 多名藏汉双语老师，女生多一半。现在教育最大的困难还是贫困，县里没有骨干企业。1997 年全县‘普初’验收时，干部群众勒紧腰带一下子捐了 437 万元的硬件建设经费。总之，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马官保坐在我的对面，说到了我在西部到处听到并到处看到写在墙壁上的一句话。对于把这句话仅仅只作为时髦口号的地方，我是很不以为然的。但在天祝，在从马官保嘴里说出时，我感到了一种真正的亲切。“我们对寄宿制学校 2400 名学生全部免去课本费，一人 10 元。另外，每人每月补助 10 元伙食费，0.8 元医药费，一年下来需要 31 万元；师范生每个学生每月补助 26 元，一年需要 50 多万元；全县 2300 多名老师，光人头工资一年近 1500 多万，300 多所学校，规模小，分散，但又必须办。财政再困难，但这几项必须保证到位。但所有的学校财政也只能保工资，没有任何办公经费，全靠勤工俭学。县城里的小学发动学生捡瓶子、拾破烂；农村小学种粮种菜卖。牧区一年四季都需要烤火，没煤烧，全靠学生捡牛粪。芨芨滩牧区小学发动群众每户给学校养一只羊，不准死不准卖，每年一只羊剪五六斤羊毛，一斤羊毛卖 4 元，卖 20 多元交给学校，群众叫‘捐圣羊’。芨芨滩有 80 多户人家，一年可捐 2000 元。芨芨滩小学 80 多名学生，9 名老师，一年有 2000 元办

公经费能基本保证正常运转……明天，我和周主任陪你去抓喜秀龙乡，女童试验学校都在那里。”听着马官保的叙述，我感念着一个藏族女性如何把她的权责和爱心结合起来，支持着民族教育，体谅着依然艰难的天祝人民。

入夜，我和来自高寒山区的三沟台小学校长宋维山、来自高山草原抓喜秀龙乡南泥沟小学校长孙德贵、红圪达小学校长谢多来、永丰小学校长赵斌忠、来自天堂乡科拉9年制学校校长晁裕财、茈茈滩小学校长毛永世——他们在县里参加校长培训，全县156名校长都集中在县里进行培训，长达一个月的培训校长们都是食宿自理——我们围坐在小小的房间里，聊他们的学校、聊他们的学生、聊他们艰难的勤工俭学。是的，他们很困难，他们出差无钱报销，他们上课没有仪器，他们还缺课桌凳、缺教室、缺图书，他们种青稞、种油菜籽、种草、种树、种耐寒白萝卜，卖的钱补助点办公费、为困难儿童垫付书本费。三沟台小学种的6000株白杨长大了，每年修剪的树枝够烧柴了；南泥沟小学131个孩子冬天去拾牛粪，拾来的牛粪帮助他们度过漫长的寒冬；茈茈滩每户一只圣羊够老师们一年买粉笔、墨水、备课笔记本子了。但毛校长说，草场退化了，茈茈滩人养羊很少，82户只养了1600多只，平均每户只有20只，而四口之家养260只羊才能够养活一家人。他还说，羊毛市场也不好，原先8元一斤，现在4元一斤，也不好卖。茈茈滩人生活还很苦……

然而再苦，校长们、老师们、家长们都在设法让所有的孩子上学。发现有孩子不来上学了，老师们就到家里找，到山里找，到草原上找……

周发科主任告诉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儿基会的官员都来过天祝；日本、澳大利亚、泰国、巴基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亚、圭亚那、丹麦、尼泊尔、孟加拉等十几个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的教育官员、女童教育专家都来过天祝，有的还不止来一次。

从马官保那里，从周发科那里，从校长老师们那里我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国际教育专家频频来到天祝……

华藏寺镇浸溶在祁连山寒凉的清晨里，如洗的蓝天像一只硕大的玉盘覆盖在四周的达日山、格宁山和马牙雪山上。街市上没有行人，惟有一小阵一阵的冷风擦地而过。站在这“天上一角”凝眸四野，我感受着这“十善华锐地”的圆满和吉祥。不时，马官保、周发科走来，带我和金玲到抓喜秀龙草原。

抓喜秀龙为藏语吉祥富饶的意思，系清顺治九年五世达赖喇嘛进京路过此地时命名的。这一片地处河西走廊东端咽喉乌鞘岭与祁连山东延马牙雪山之间的狭长地带。境内最高海拔 4300 多米，一条高原美丽的河流金强河从这里发源，一路潺潺，流向了黄河。

沿河而上，我们来到了抓喜秀龙乡南泥沟小学。

周发科告诉我，天祝县 5 所女童教育试验学校全部在抓喜秀龙乡，1992 年以前，天祝全县女童入学率为 82%，抓喜秀龙乡为 78%，全乡每年都有几百名孩子失学、辍学。

南泥沟小学的女教师谢玉香（藏名才让卓玛）不断地往炉子里添着牛粪，她怕我们冷。她说抓喜秀龙今天气温最低零下 10 度，最高只有 3 度。她说在抓喜秀龙一年四季都要穿棉袄。谢老师 1977 年天祝师范毕业就来到了抓喜秀龙高原，她在南泥沟小学教二年级汉语、四年级藏语。南泥沟小学服务半径 10 公里，娃娃们天亮 5 点就从家走，中午吃一顿干粮，学校供应点开水。她说娃娃们念书很苦，但大都能来念，有 20 个学前班娃娃，路途特别远的，家长骑马接送。但谢老师马上说到了桥喜文、桥

喜武兄弟，她说桥家兄弟的父亲犯法被判了 7 年刑，母亲跑了。哥哥桥喜文 13 岁，去年念五年级时不念了，放羊让弟弟念。弟弟桥喜武 10 岁，念三年级，下学期可能要辍学。

“我是桥喜武的班主任，”谢老师说，“放假时学校要求预交今年秋天的学杂费 30 元，娃没有，我先垫上。娃说四五月份剪了羊毛还给老师，但娃们的羊毛今年也没有卖出去，还不了老师，娃们可能不敢来念了……”说着，周发科和谢老师就开始满村子地找桥家兄弟，几个啃着元白菜根的孩子告诉我们，说他们到山里放羊去了。山遥远无尽，草滩遥远无尽，孩子们会在哪儿呢？谢老师说，近处的草滩是冬天的草场，夏天的草场都在 50 里、100 里以外，娃们肯定已走得很远，既已走，就要走到入冬才能回来。她还说，娃们也不会有帐篷，夜里都是挤在羊群里、搂着羊肚子睡……

望着浑圆无边的草滩、草滩上浑圆无比的山塬、山塬后面耸入云天的马牙雪山，我们一片惆怅。万年不化的马牙雪山今年非常奇怪，百里银山化得片雪不留，灰白色的石灰质悬崖显得峻冷、狰狞，更加像缺钙而疏松的马牙。

“祁连山的雪今年也化了……”马官保忧郁地说。

“为什么？”我惆怅地问。

“不知道……可能是气候变暖吧。”马官保望着马牙雪山说。

说着，我们又开始在抓喜秀龙寻找李万芳、李万琴姐妹。谢老师说，万芳姐妹的父亲 10 年前就跑掉了，一直下落不明。去年突然出现，住了一夜，第二天把万芳、万琴的二姐带走了，二姐只有 15 岁，至今杳无音讯。大姐前些年 16 岁时自己跑出去嫁人了，母亲带着姐妹俩和奶奶过，奶奶老了，母亲有心脏病，腿也疼。万芳已经失学了，万琴读小学一年级……

我们在双岔村问了十几个大人和孩子，一个小时后，我们才

在金强河边找到了正在割草的万芳、万琴和她们的母亲。13 岁的万芳眉宇间、眼神里已经布满了生活的忧怨与愁绪，9 岁的万琴依然是个可怜兮兮的小女孩，42 岁的母亲高桂英看上去足有 60 岁。

“他嫌我只生女娃不生男娃就跑了，”高桂英说，“万琴没满月他就跑了，10 年都不知去向、也不管家……房子快塌了，雨大一点就泡塌了……娃们上学靠卖点油菜籽，家里没有一只羊，只养一头牛耕地……开学要借钱了，也没人敢借给我们……”高桂英割着草嘬着。

“我资助她们姐妹上学吧。”我轻声对马官保、周发科说。

“那我们替孩子和她们的妈妈谢谢你了。”马官保、周发科说。

再有 10 多天就要开学了，我给万芳姐妹留下 100 元，送她们随身用的两支圆珠笔、两个采访本。我对她们说，要常给我写信、寄成绩单……

下午，在祁连山自然保护区中段，在巍峨的石门峡崇山峻岭，我看到玛尼经轮在石门河上缓缓转动，五彩经幡在如洗的蓝天下灵魂般飘拂，马官保的歌声从帐篷中传来——

太阳和月亮是一个妈妈的女儿

她们的妈妈叫光明

.....

又唱：

无极的雪域啊

无极的唐古拉草原老调

.....

我双手合十
祈愿众生吉祥

听着马官保的歌声，我一时泪流满面，也说不清因为什么.....

之六 西鄂尔多斯荒原的雨声

我很久地沉浸在对宁夏韦州镇的历史想象中。

韦州地处西鄂尔多斯荒原的南端，1998 年 9 月当我穿越辽阔的荒原到达韦州时，韦州整个的色调是土黄色，和荒原一样。土房、土墙、土路，给人一种异常干涸的感觉。可历史上的韦州肯定不止这一种单调枯萎的土黄色，它肯定有别样的色彩。否则，那个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四子不会在韦州建离宫别墅的。“风清月明”、“凉爽宜人”的韦州肯定不是除了人便万物凋瑟。佐证韦州历史上文化自然景观的另一史料记载是：韦州曾成为明代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中心。明万历年间，韦州出了一位卓越的经学大师海东阳，经名艾哈默德。这位海东阳是明代后期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创始人胡登洲的嫡传弟子，胡太师祖创立经堂教育于陕西咸阳，很快被海东阳（穆斯林人尊称海太师爸爸）和其父海师等著名经师传入回族聚居的半个城（今宁夏同心老城）和韦州城一带。胡氏嫡传弟子有三人，其中两人即至同心城、韦州城设帐讲学，二传弟子著名的有四人，其中有三人到同心城、韦州城讲学，其三传弟子也大部分授业于同心、韦州，足见同心、韦州当年伊斯兰教经堂讲学如何盛行。海东阳在韦州设帐讲学，阐训万代，成绩卓著，蜚声海内。云南、陕西、山东、杭州等地

学子负笈载道，接踵其门而求学，韦州成为“天下之人，裹粮问业，户外之履满焉”的经堂教育中心。

我一直在想象“裹粮问业，户外之履满焉”、学子如云的韦州，想象这沙漠边缘曾经有过的求学盛况。如此深厚的文化渊源不可能迹断烟灭，它一定渗入韦州人的血脉之中。那么我就想，我专程到韦州要访问的一个人是不是就归为这种文化传承和渗入的现象之一斑呢？

她是一位女校长，叫马新兰，经名：海迪彻。当然，马校长从事和献身的是现代教育，我只是想说这位女性精神中的韦州文化。46岁的马新兰生命的27年都献给了韦州的女童教育，1985年恢复韦州回民女小时，马新兰从韦州中心小学调回民女小当校长，那时加她一共6个老师、90个女学生。1998年，回民女小有21名老师，360个学生。从1985年到1998年从回民女小走出去的女学生已达1000名。她们中许多人上了中学，其中又有许多中学毕业后考上了北大、北师大、中央民族学院，许多人做了教师、干部、商界老板。从学校到清真寺，从社会到家庭，韦州女小走出去的学生都成为生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就马新兰个人而言，千名学生完全堪称“弟子如云”；就宗教传统而言，在“女孩九岁就要封斋、不能再与男孩一起蹦蹦跳跳、十五六岁就要出嫁”的韦州，马新兰让1000名女孩在不同程度上获取了另一种人生，这在韦州、在鄂尔多斯荒原应该是一种奇迹。

无论怎么说，马新兰也是韦州文化教育的接班人。韦州回民女小始创于1929年，停办于中国异常饥谨的1960年。而它的创始人正是马新兰的外祖父苏乐。明代至清，苏姓为韦州回民的主姓，海东阳墓碑的立碑人中就有近50名苏姓回民。韦州的海姓回民是在海东阳定居韦州后从各地迁徙而来的。30年代的苏乐，是韦州镇四大知名人士之一，他从事商业又经营土地，当年韦州

人评价一个人的富有和财产是看你有几连子骆驼，一连子骆驼是15峰。苏乐有四连子骆驼，这在地处荒原的韦州已相当富有。苏乐把盐池县会安堡的盐运到陕西宝鸡、甘肃天水，再把那里的日用百货、布匹、药材运回韦州。那时，四季穿越西鄂尔多斯荒原和六盘山崇山峻岭的驼队，属苏乐的壮观；苏乐开办回民女小，在韦州是开天辟地的壮举，苏乐聘请马新兰的爷爷到女小当教师（当然马新兰成为他的孙女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新兰爷爷是韦州著名阿訇，是海东阳经堂教育的后承人之一；苏乐开药铺，马阿訇的儿子就在药铺抓药，后来精明的苏乐决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这个青年抓药郎时，他一定是发现了这个青年有别于他人的精神和品格。1952年马新兰诞生时，抓了一辈子中药的父亲已成为韦州镇著名的中医，他精通中医中药，且是韦州镇惟一通读了四部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文学爱好者。这样一个通理博大精深的中医中药又了解波澜壮阔的人类生活的人，就决定了他会把5个孩子送到学校去念书，包括新兰和一个姐姐，决定了新兰和姐姐最终成为韦州镇惟一念到六年级的女孩，惟一考上县城中学的女孩。

那时韦州和县城不通车，新兰和姐姐每学期必须步行近100公里走到学校。当然这样的辛苦是无法阻拦苏乐、马阿訇和那位著名老中医的后代的，不幸的是新兰和姐姐只念了一年初中就遭遇上了“文革”，以后的日子和我们大家都一样，新兰们不能再读书，只能是“混个初中毕业”，那是1968年。

1971年，19岁的新兰做了民办教师，月工资只有5元。做一个女教师、教许许多多的孩子是新兰童年就有的梦想。这梦想如同一粒种子种在一个小女孩纯洁的心灵之后，它是一定要发芽开花结果的。是谁在新兰心上种下了这粒美丽的种子呢？几十年以后，马新兰依然沉浸在纯洁的回忆中——

“……我们的女儿若没有女教师，家长是不让去上学的。那年她来了，我们全村的女孩都去了。她向我们走来时，我们非常紧张，全都躲在墙根偷偷看她……她那么美丽、那么漂亮，她是从北京来的。我不知她怎么就从那么远的北京来到我们这么偏僻的韦州的。那是1958年，我只有6岁。她只教了我们一年就走了，我不知她后来到了哪里，但我一直都在想念她。长大了当一个女教师就是在看见她以后产生的，抹都抹不掉了。1992年，周卫他们开始搞女童研究时，把我们学校定为试验学校之一。他们上上下下做工作，一定要让试验学校的女教师达到40%以上，一定要让每个试验学校配一个女校长，我是深深明白他们的心意的。一个好的女教师、女校长兴许一生都会成为她心中一束不再凋谢的七色花，她会因此一生怀着梦想去追求、去奋斗……”应该说，当年那位从北京来的女教师和马新兰相伴的日子绝不是一年，而是整整一生。

当女校长之初，马新兰带着师生捡半截砖头盖教室、垒院墙；到草滩上捡发菜，卖了添置办公用品；亚运会在北京开幕前，马新兰让学生们把“叔叔，请你注意安全”的话一针一线绣到小手帕上，当几十条、几百条小手帕寄到北京、上海、银川的交通部门时，成千上万的司机叔叔、阿姨们就聚集到一起宣誓“向宁夏的小朋友们学习”。女童教育试验开始后，马新兰周一节大课，一讲就是4个小时，她给自己的学生讲“怎样自强自立”，给学生的母亲讲“怎样做一个合格的母亲”；她开设缝纫、裁剪、刺绣、烹饪、育种等各种实用技术课，她希望孩子们考不上学能尽快在社会上自立……

西部女童教育试验对于奋进的韦州回民女小实在是推波助澜：1992年9月7日新学期刚刚开始，宁夏教科所周卫、王强们即把写着“心灵手巧、自立自强”中、阿、英三种文字的校

训牌轰轰烈烈授给了韦州回民女小，自那时起，女小就成为大西北女童教育试验一颗闪亮夺目的星。你随时都可以听见一个偌大的外部世界向女小频频走来的脚步声——

1993 年 9 月 17 日，女童教育试验一年后，在银川参加“全国女童教育试验汇报交流会”的青海、甘肃、宁夏三省（区）县、乡和学校的 60 多名代表来到了女小。出席这次会议的国家教委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晓辉来到了女小；北京大学中外妇女研究中心的五位教授王庆淑、郑必俊、齐文颖、臧健、王春梅来到了女小；宁夏教育厅、民委、妇联的负责人来到了女小……

1994 年 12 月 11 日，参加国家教委、全国妇联联合在银川召开的“全国女童教育现场会”的全国 28 省市、200 多位代表来到了韦州女小；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康冷来到了女小；国家教委基教司司长王文湛、自治区副主席刘仲来到了女小……

1994 年 7 月 19 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立文、臧健一行 6 人来到韦州女小进行“口述史”访谈……

中宣部文艺局苏小卫等 6 人捐赠的 4 大包工具书和儿童读物从北京寄到了韦州女小……

北京大学教授郑必俊、臧健救助失学女童的 800 元捐款寄到了韦州女小……

中央广播电台一行 4 人来韦州女小采访录音……

中央电视台大型电视系列片《解放》摄制组来韦州女小拍女童教育纪实片……

签着中央电视台各栏目主持人姓名的一份挂历从北京寄到了韦州女小……

加拿大友人帮助建小农场的 2 万元人民币交到了韦州女小……

巴林国法克利亚·亚瑟利比女士捐赠乡村图书室的 750 美元交到了韦州女小……

英国伦敦大学教授伊丽莎白一行 5 人来女小参观考察……

清真寺和社会各界群众的捐款来到了韦州女小……

还可以举一些。

女童教育试验 4 年间，从荒原南端小小的回民女子小学走出去的又是什么呢？

1992 年 4 月 3 日，由宁夏教科所推荐提名，马新兰参加了全国中小幼教职工访日团，赴日本参观考察中小幼教育；

1993 年 11 月 18 日，应北大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邀请，马新兰随西部女童教育课题组一行 8 人来到北大参加第二届国际妇女问题研讨会，韦州女小的手工刺绣品义卖在北大引起轰动；

1995 年 8 月 20 日，马新兰赴北京参加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将西部女童教育成功经验通过非组织论坛介绍给世界各地；

与此同时，马新兰成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并被亚太地区新闻单位评为“亚太地区十大杰出妇女”，1993 年教师节，马新兰成为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人物……

还可以举一些。

这频频地“走进来”和“走出去”，使荒漠南端的韦州、韦州小小的回民女子小学成为“天下人知”的地方。当年在韦州传播经堂教育的海东阳也未必到这份上吧？

在如此的“走进来”与“走出去”中，马新兰和这世界的大人们便把美好的理想和具体的生存、把广阔的外部世界和孩子们未来的人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教育，在西部荒漠沙原如同一滴滴甘露渗透在回民的小女儿们心上。

伴随着“走进来”和“走出去”，一个个美丽动人的故事发

生了——

故事之一：1995 年 6 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史静寰博士带领学生做“性别意识研究”。她写信给马新兰，让马新兰在她的学生中做一个测试，即用简单的图画表达“我长大了做什么”，同样的测试在北师大附小同时进行。当两个完全不同地域的学校的测试结果集中在史教授手里时，她出乎意料地惊诧了：北师大附小女学生图画绝大多数表示长大了当歌唱演员、舞蹈演员、播音员、秘书、美容师等，男孩子表达的是商界老板、警察、士兵、运动员、科学家、飞行员等；韦州女子小学的图画表达的则是开飞机、开火车、电脑操作、科学家、运动员、教师等等，这样的比例很高。北师大附小学生们的图画使史教授发现，城市的职业性别选择已潜移默化为孩子们性别意识，但马新兰的孩子们是怎么回事呢？这让史教授好一阵费解。马新兰到北京参加世妇会时史教授问马新兰：“能说说你的孩子是怎么回事吗？”马新兰说：“史老师，你得知道，在我们那里学校是女孩子惟一能产生梦想的地方。”

作为始终从事着前沿性教育理论研究的史教授，她非常感慨在封闭贫困的西部，学校作用的明显以及许许多多像马新兰这样的校长和老师们正带领千千万万孩子挣扎着走出传统，而城市没准儿正悄悄向传统回归……

故事之二：1993 年 9 月北大五位女教授到达韦州时，围观女教授使韦州万人空巷。“三西工程”移民中的一户移民马小玲母女挤在人群中间，上完小学一年级的马小玲从 100 多里外的贫困山村马高庄移民到韦州时已经失学。小玲母女挤在了臧健教授身边，臧健拉着小玲的手问：“小朋友，你上学没有？”小玲摇摇头。臧健又问：“你几岁了？”小女孩不说话，旁边人代答：“11 了。”臧健又问：“你们家兄妹几个？”小玲母亲回答：“三

男一女，她为二。”臧健又问：“哥哥上学没有？”小玲点点头。臧健继续问：“你想上学吗？”小玲使劲地点头。在这点头与摇头中，善良的臧健对马小玲已经充满了深深的同情与爱怜，她掏出随身带的两支圆珠笔送给马小玲：“小玲，你要争取上学，若实在上不了学，你就跟哥哥学习识字、写字……”说完，臧健就随“大部队”到韦州城南参观清真大寺，又折回参观康济寺塔，转了韦州的好几个土街土巷。这时的马小玲始终挤在人群中，尾随在臧健身后，只是臧健没有发现。几个小时后，臧健他们上车去同心县城，在马达已经启动的瞬间，臧健突然发现远远站着的马小玲，并且真真切切地听到了马小玲的喊声：“阿姨，再见！”这个一度只会摇头点头的小姑娘在离别的瞬间突然发出的喊声，让臧健柔肠寸断，她和身边的全国妇联儿童基金会的丁鹏霎时泪流满面，“小玲再见！再见……”臧健意识到此生此世她不可能忘掉西鄂尔多斯荒原南端这位小姑娘了，丁鹏说：“小姑娘大约也永远不会忘记你了。”第二天，在同心县城的座谈会上，臧健眼含热泪地说到了默默的、无望无助的那个韦州小女孩，说到了那声令她永远牵念伤感的喊声。在座的人无不伤怀感动，臧健发现马新兰哭了。

回到学校，马新兰就把这个故事讲给全体老师们听，然后发动老师和学生在韦州镇寻找马小玲。因小玲一家是移民，没有户口，许多人也不认识，找不到。几天后，马新兰他们才在河滩的一间租房里找到了马小玲一家。小玲的母亲说，自那天见到臧健阿姨后，小玲一夜一夜在梦中哭醒，有时睡着睡着就突然坐了起来，说我要上学。臧阿姨给的两支圆珠笔也让哥哥和弟弟拿走了，小玲哭了半天……马新兰听完就说，明天就让小玲到女小上学，免去学杂费。小玲妈说，小玲得看四弟，我和她爹每天都要去挖甘草（又是挖甘草！）。我们是外来户，没有地，口粮全靠

买。一斤甘草卖一元钱，除了买粮还要供两个男娃娃上学。马新兰说，让小玲带小弟弟上学，小弟弟可免费上学前班。于是小玲上学了，马新兰还免费发了小玲一套校服。这年 11 月马新兰到北大参加第二届国际妇女问题研讨会时，专门给臧健带了一张马小玲穿校服的照片。这就是你说的那个马小玲，我们已经找到了，她已上学，马新兰说。太谢谢你们了，是你们救了孩子。臧健说。她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照片，像抚摸着别离已久的小女儿。马新兰散会时，臧健买了文具盒、铅笔、毛背心托她带给小玲。

回韦州后，马新兰专门召开一个全校大会把臧健的东西转交给马小玲，她要在孩子们心上留下一个仪式。

此后，臧健就和小玲通信，小玲每学期的考试答卷都写得工工整整，由父亲寄给臧健。

1994 年臧健一行到韦州做口述史访谈时专门去了小玲家，小玲又高兴又紧张。臧健给小玲带来了书包和自己女儿的许许多多的书。小玲，阿姨看看你的书包。臧健说。小玲拿来了，是个又脏又破的白塑料袋。小玲，你看，阿姨给你从北京买来了新书包，还有这么多书。小玲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这书包里装的全是知识。小玲，你会做什么，能告诉阿姨吗？小玲终于说话了。小玲紧紧拉着臧健的手。那一刻臧健的心被泪水淹渍了，她想，她和小玲有一种前世今生的缘分。

后来宁夏自治区教科所陈少娟资助 300 元帮助小玲念完小学，1997 年已考上韦州中学的小玲每年接受着臧健 500 元的资助。

故事还没完。1998 年 7 月，韦州女小的马虹以很优秀的成绩考上了同心县重点中学，但马虹姐妹 6 个，5 个都辍学的辍学、不念的不念，马虹父母绝不同意再让马虹上中学。马新兰知

道后越想越觉得可惜，她想找一个帮助马虹的人，她想起了和臧健一起来韦州的中国儿童基金会的丁鹏。她让马虹给丁鹏写封信，她也亲自给丁鹏写封信。可发信时怎么也找不到丁鹏的详细地址，她就把信发给了臧健，她托臧健把信转丁鹏。臧健呢，收到信后一刻也不停地为马虹想办法，她知道丁鹏那年从宁夏回京不久就调到了中国银行，臧健觉得这么多年她们也没来往把信转去也不大好，臧健就问全国妇联春蕾计划能不能救助，回答：春蕾计划只资助小学女童，不资助中学女童。于是臧健就找到弟弟一家商谈，能否资助马虹。弟弟一家欣然应允，并决定以弟弟的女儿臧彤的名义进行资助，每年 500 元。臧彤在 1998 年夏季以 652 分的优异成绩考上了北大生命科学学院；臧彤在中学时代就曾想资助一个贫困地区的孩子念书。

1998 年 9 月我到达韦州女小时，马新兰把臧健和臧彤资助马小玲、马虹上学的信及汇款单复印件一一拿给我看。这一年的岁末，在北大勺园，臧健请我吃韩国料理，我发现，这实在是一位柔情善感、充满同情心的知识女性。我向她索看了马新兰、马虹写给她和给她侄女臧彤的回函。至此，我有一种感觉，中国的女儿们，把善意与良知、把智性与同情织梭般织成了北京至大西北横跨天际的彩桥，这彩桥接通了西部女童抵达另一种人生的路。

西鄂尔多斯荒原下雨了。

那一个雨夜我住在了韦州，窗外，韦州一片漆黑寂静，雨点紧一阵慢一阵地敲打着窗棂。

马新兰坐在我的对面，和我说着很长很长的夜话。

荒原的雨声，辽阔而贴近……

之七 六盘山下不眠的倾听

臧健在北大勺院 2 号楼门前等我，她很高地站在雪后的阳光下。雪后的阳光分外灿烂，穿着豆绿色羽绒服的臧健分外灿烂。“你是梅洁……”“你是臧健……”当我们几乎同时在行人中认出对方时，我想肯定有一种不朽的默契在我们心中同时升起。

在 2 号楼内的韩国料理间，我迫不及待地给臧健拿出了马小玲的照片。臧健反复抚摸着照片，惊喜地一遍又一遍地说：“都长这么大啦……”看着臧健充满母性的爱怜我很感动，我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呀，小玲今年都 15 了……”“我本来说今年暑假领着我女儿和臧彤到韦州去看看小玲、马虹、马新兰的，后来有事又耽误了……1993 年新兰给我带过小玲一张照片，我实在没想到 5 年后又有人给我带来照片……”说着话，臧健一双温柔细长的眼睛一刻也没离开照片上的小玲。

马新兰领我在韦州的土街土巷走了很远的路，走出了镇子、走过了河滩，走到了两间小土房前，就走到了小玲的家。小玲在屋外的一小块地里挖土豆。土豆很小，核桃那么大，像我在窑山看到的一样。

“今年天旱，没长大……”小玲望着我，很腼腆地笑。读初二的小玲已长成大姑娘样，朴实、健康、大方、耐看，有一种成熟美。

“让梅阿姨给你照张相，给臧健阿姨带去。”马新兰说。

“那我换件衣服……”马小玲说。

“不用换，这就挺好。”马新兰说。

“你就挖土豆，我给你照。”我说。

于是，在土豆地里，我给挖土豆的小玲拍了五六张照片。那

时我就想，我是一定要把照片带给臧健的。

就着两盘石锅拌饭、两条炸黄花鱼，我和臧健的话题就没离开小玲，没离开西部女童。然而，我听到更多的是“大龄女童”。作为研究中外妇女问题的学者，臧健发现了一个新问题领域。

以往无论是儿童学或生物学或统计学的研究，习惯将儿童年龄定义在 0—14 岁，15 岁以上即与成年人同等看待，臧健说，联合国儿童发展基金会的定义，将儿童界定为 0—18 岁。这一概念从 1995 年开始，已为我国政府所接受。因此，我们今天谈论女童，应指 0—18 岁的全体女孩子。

儿童按照不同的年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0—5 岁为婴幼儿期，6—12 岁为学龄期，13—18 岁为青春期。女童研究的范畴，应包括女童生长、发育、就业的全过程，也就是说我们考察历史形成的以及不断演变的对女童的歧视，关注女童所应获得的平等权利是否受到侵犯，应包括女童从出生到青春期的整个发展阶段。

臧健在多年的研究中、尤其是在 1993 年 7 月赴宁夏做“口述史”访谈中发现，贫困地区的失学女童不仅仅局限于学龄期儿童，13—18 岁的大龄女童失学问题往往更为严重。相比来讲，大龄女童的生存状况更为不利。种种原因，贫困地区有 70% 适龄女童不能入学，这就势必造成贫困地区有 70% 的 13—18 岁的没念过书或只念过一二年书的大龄女童文盲。这些女童再也无法进入学校，即使在西部女童教育搞得好的地区和学校，大龄女童也因为年龄偏大正规学校无法接受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这部分大龄女童文盲将构成下个世纪初中国妇女文盲的主体。臧健说，目前的研究表明，妇女受教育程度与初婚年龄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贫困地区大龄女童受教育程度低是她们早婚早育率高、多胎

多育的基本原因。

臧健说，90 年代以来，世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处于青春期的大龄女童卖淫、性交易与性剥削问题，在我国也开始出现。在发达地区城市中做三陪女、卖淫女的，大部分来自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未成年的大龄女童。卖淫是个遍布全世界的社会问题，仅靠公安部门打击是不够的，它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假如贫困地区的大龄女童能够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假如她们能够得到技能培训，假如她们具备了发展能力，她们中大部分人就不会选择卖淫脱贫的方式。就此问题，臧健在 1993 年的“口述史”访谈报告中，在 1995 年世妇会女童论坛上，在 1997 年“贫困地区女童发展战略研讨会”上，多次呼吁政府和全社会予以关注。

臧健认为，在女童失学辍学比例和大龄女童文盲相当高的地方，非正规教育不仅使女童特别是大龄女童重新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更获得参与社会的机会，其作用不可低估。非正规教育往往是与贫困相联系的，越是贫困的地区，其效果越明显。非正规教育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却是发展中国家借以促进改善贫困地区女童状况的有效途径……

臧健对大龄女童问题的研究与关注使我立即想到了一个人，这就是六盘山下的固原地区西吉县单家集的单秀明。也许我们早已从《红旗飘飘》大型丛书里、从许多长征过的前辈的回忆录里，看到过单家集。1935 年至 1936 年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聂荣臻、左权、陈赓、杨勇等红军领导人率红二十五军、红一方面军、西征部队红一军团先后三次进驻单家集。离单家集不远的将台镇就是红军三军会师胜利结束长征的地方。

我发现，几个月来我在西部走了很远的路，但我走来走去没

走出黄河，没走出古丝绸之路，再就是没走出这条长征之路。当然我们更能从毛泽东的著名诗词《清平乐·六盘山》里获悉，这是块播撒过革命种子的地方。这主义里包括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等。单秀明的母亲就是在这些革命主义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位英雄的穆斯林女儿，无论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新中国成立，这位女性都勇敢地担当了单家集村妇救会主任、村贫协主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在风雨、炮火中奋不顾身的女性的形象。因此，这位母亲就在1965年国庆节时，随少数民族代表团走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然而仅仅一年之后，一切都翻了过来。“红卫兵”、“造反派”洗劫了单家，因为他们在反复的抄家中发现了这位母亲和刘澜涛的合影，“和叛徒合影肯定是叛徒”，造反派们说。他们殴打这位英雄母亲的丈夫，说他把图钉钉在毛主席像上（用图钉把一张像钉在墙上何罪之有？），立即定为“现行反革命”……于是，这位熬不过惊恐、折磨、凌辱的男人就在1966年岁末上吊自杀，那年单秀明初中毕业，是单家集史无前例的三个女初中生之一。而母亲为了孩子们，顶着熬着走了过来……从遥远的西部农村单家集我们进一步理解什么叫“浩劫”——无论城市农村，也无论天涯海角，命运之苦在劫难逃，如同洪水过街，片甲不留。这种让人无法逃遁、无处藏身的“革命”，其渗透性、残酷性与无人道性实属人类罕见。

少女单秀明经历了光明与黑暗、天堂与地狱的心灵轮回，这势必要奠定她日后的不屈不挠；而血脉里流淌着英雄母亲凛然傲然、追求光明与正义血液的单秀明，日后的人生绝不会卑琐与平庸。

1974年单秀明被西吉县兴隆镇农业技术推广站聘为农业技术推广员，社会上普遍称为“老推”。“老推”的日子永远和农

民在一起，面朝黄土背朝天。所不同的是他们在顽强地推广良种和先进的农业技术的同时，顽强地与千年的传统和保守、愚昧、落后抗争。西吉是“苦甲天下”的西海固（西吉、海原、固原）三县的首称县，西吉聚居着 80% 的回族人口，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直到 90 年代许多村子仍没有一个女孩上学，农村女性文盲率高达 90%。

干旱贫瘠的西吉兴隆，历史上从来不种蔬菜、更不种西瓜，1983 年，单秀明率先要在兴隆推广地膜西瓜。她发动了 40 名能够管得住男人的女人——单秀明向我说这句话时对我解释了一句：即在男人面前说话能够算数的女人。她向她们说：“你们种，我承担风险。成功了你们付给我种子、化肥、地膜款，失败了我赔你们每亩地 400 斤麦子，种子、化肥、地膜款我不要了。”那年推广种植了 60 亩，亩产 2000 公斤，成为西海固农民当年家喻户晓的新闻，结束了兴隆不能种西瓜的历史。后来的兴隆几乎每家每户都三亩两亩地种西瓜，全镇最多的年份种 500 多亩西瓜，最少的年份也种 200 多亩，现在，亩产已达 4000 公斤。后来单秀明见到我时说：“一亩地赔 400 斤，60 亩要赔 24000 斤麦子呀！种子、化肥、地膜我已垫进去 6000 元。真砸了拿啥赔呀？现在想起来也后怕，那时就是坚信能成功。”1987 年单秀明推广地膜玉米 1700 亩，外面风传：“种不成没事，有农技站赔呢！”单秀明说：“你必须给我好好种，别老想着等我赔，只要有人种成功一亩，也别想我赔你。”单秀明说，该硬时也得硬。结果一举成功，亩产 390 公斤，现在兴隆的地膜玉米亩产 550 公斤，最高的达 800 公斤，单秀明在兴隆累计推广地膜玉米 2 万多亩。25 年来，单秀明参加完成农业技术试验课题 30 多项，示范推广地膜玉米栽培、农作物立体复合种植等农业新技术 24000 多亩，增产粮食 164 万公斤，净增产值 74 万多元；单秀明大力进

行农作物品种改良，使兴隆镇的小麦品种更换了5次，马铃薯品种更换了5次，玉米品种更换了3次，葫麻品种更换了4次，兴隆的良种覆盖率达到98%；单秀明推行中低产田改造，使近万亩中低产田亩产由150公斤提高到300多公斤；单秀明推行土壤培肥技术、小麦玉米套种技术、节能日光温室技术20多项，使全镇29300多亩农作物单产由90公斤提高到184公斤，增产粮食5040万公斤，使兴隆镇90%的农民解决了温饱；如同不种西瓜一样，兴隆人历史上不种蔬菜，执著也执拗的单秀明一定要带领兴隆人种蔬菜。现在兴隆人种的蔬菜不仅满足自己食用，还大批量地运往西安、兰州。最多时兴隆一年种植蔬菜1600多亩，亩产3000多公斤，1997年兴隆农民仅蔬菜收入就达20多万元，最好的户一亩蔬菜产值就达2000元。西瓜、蔬菜使兴隆的穆斯林女儿们个个挺起腰板做人了，丰收的季节，她们的西瓜、蔬菜生意热闹成了“兴隆一条婆姨街”……

这是一个多么顽强的、了不起的女儿！这是一个与穿梭炮火、打土豪分田地、做军鞋抬担架的母亲一点也不逊色的女儿啊！

1990年单秀明创办农业技术学校，培训近2万人次，使全镇5000多农村主要劳力掌握了一至两门技术；同年宁夏自治区因单秀明为从事农业技术推广15年的惟一回族女技术员得到嘉奖；1994年全国妇联授予单秀明“三八红旗手”称号，也就在这一年，单秀明才结束了20年“临时老推”的生涯，即摘下了“临时工”的帽子；1997年单秀明获中华科教基金会授予的“全国农技推广奖”。1998年9月，我到达单家集时，听说有关部门正在考虑解决单秀明破格晋升农艺师的问题，我顿感哑然。如此卓著的25年还不够个农艺师？而一个农艺师的职称又怎能涵盖一个穆斯林女儿25年的生命奉献？25年对贫困最切实最根本的

救助？

单秀明之所以走进我的写作范围是因为她于 1996 年又创办了“兴隆回族女子职业教育中心”。

长期与农民打交道的单秀明已经发现农村女娃娃生存的贫困，她们大部分不能上学，上了学的也不接触生产劳动，不懂现代农业生产技术，返乡后她们依然因袭传统落后的农、牧方法，既无致富本领也无劳动习惯，更无终身从事农业生产的准备，而她们中能够升上中等专业学校或高等学校的微乎其微，她们很少有机会体验教育带来的收益，她们对教育的要求不高。单秀明发现，在贫困的西部农村妇女是开发最不充分的人力资源。于是她就想为农村的大龄女娃娃们做些事情。在多年的农技培训过程中，她发现农村女娃娃们对学农业技术不大感兴趣，于是她就想开办一个以服装、裁剪、缝纫、刺绣为主的职教中心。1995 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上，她把想法告诉了宁夏教科所副所长马毓勤，她请马所长给她的中心起个名字……此后，“兴隆回族女子职业教育中心”就挂牌成立了。仅仅两年，“中心”在兴隆农技站的一间办公室里已办班 11 期，培训了宁夏、甘肃、新疆三省 5 县 18 个乡镇的 600 多名 15 岁至 18 岁（最大 35 岁）的大龄女童，其中 7% 为文盲，她们中 60% 的人都已自立，有几十人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服装技师并开始一批一批带徒弟。

我们在城市里、在我们生活的社区随时都可以看到这样那样的培训中心，美容、美发、厨师、缝纫、电脑……我随意做了个调查，这些培训 40 天至两个月的收费每人至少在 600 元至 1000 元之间（不包括食宿），当然这是赢利性质的培训，属商业行为。而单秀明的培训呢？所有学员培训两个月只交 30 元培训费，残疾女童不收费。单秀明自己除了在兴隆农技站领每月四五百元农业技术人员的工资外，再没有任何收入；培训中心现在的老师

郭桂芳是中心首期培训出的学员，小郭是从第七期接任的，前六期的老师是由区教科所从银川聘请，小郭可以胜任老师了，银川就不再来人了。小郭能挣个大款吗？不能。单秀明说小郭一月只拿 60 元工资，远远不及她个人开缝纫铺。

西吉兴隆回族女子职业教育中心充满了救助性和奉献性，但实际上属教育行为。而教育包括职业教育应该是国家行为，她们日后的艰难在于两个一无所有的女人担当起了一种毫无赢利的义务行为，她们未能像私学、私铺那样收费。

为西部女童教育付出了无数心血与精力、几近心力交瘁的马毓勤和宁夏教科所给了“中心”许多具体切实的帮助，他们通过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引来了日本宋庆龄基金会 4 万元的资助，为“中心”盖了一座 80 平方米的教室，他们帮助从银川请培训教师，资助了 11 台缝纫机、两台锁边机和毛衣编织机、5000 元开办费，固原行署教育处资助了 30 套、价值 5000 元的桌椅，还有著名宗教人士洪维宗的妹妹赞助的两台多功能缝纫机、1000 元人民币，还有尤专员的 1600 元工资……

西部大龄女童在贫困的宁夏西吉县兴隆镇感受着一个偌大世界的关爱。

1998 年 9 月 14 日下午 5 时 40 分我们从单家集单秀明家出来，区教科所王建华老师说，我们翻六盘山，连夜赶固原。没想到那辆已跑了 40 万公里的“老伏尔加”刚开出不到 10 米就突然灭了火，任全师傅“翻江倒海”地找原因就是找不出，就是打不着火。两个小时过去我们依然停在单秀明家的大门外边，寸步难行。天已渐渐黑了下来。

“你们别走了，就在这里过夜。小郭，给他们擀面片！老二，去找根绳子把车拖到院子里来，明天再想办法……”单秀

明开始作决定并分派任务，看得出她是一个非常干练且临阵不乱的女人。

就这样，我们在单家集住了下来。吃了小郭擀的面片后我不知单秀明把王老师和全师傅安排在哪个农家，我可是偎在单秀明床上的被窝里，和同样围坐在被窝里的单秀明说了一夜的话……

走不了是缘分，若车坏在六盘山上，这半夜三更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还不遭了抢劫？还不冻坏？留下和我说说心里高兴。单秀明说。你丈夫在哪儿呢？我问。一家子分了三摊，老头子在县医院开车，他是撒拉族。单秀明说。是青海循化撒拉族？我上个月才去过那里……我眼睛一亮地问。是，他就是从那里过来的。两个儿子在县城上班，一个小女儿在银川念书，就我一个人几十年都在兴隆、在单家集。这一辈子都没顾上给老头子织件背心，想起来也对不住他……我现在最操心的是小郭，我都49岁了，奉献也罢，累也罢，还能干几年？可小郭才二十五六岁，为职教中心对象也吹了，对象在银川开车，她在这里做奉献，能不吹吗？现在最大的难处是没宿舍，一期五六十人没处住。女娃娃们从几十里、几百里外赶到这里来学习，中心解决不了住处，她们只好投亲靠友或住本镇女娃娃家里，实在解决不了的只好来了又回去……这里冬天很长，生煤火钱都困难。我在这里硬撑着，领农业上的工资，争取来的钱又都办了教育，不伦不类的，农业上也有意见……看得出，你很艰难，你的收费太低了，可以适当提高一些。我说。来的都是些穷娃娃，咋提呢？单秀明说。那也要想办法创收，向社会化缘终归不是常事，小郭的工资也太低，我说。马所长在就好了，她能给我很多帮助，可惜她调到北京了……说着，单秀明就下地给我找马毓勤的信。那信是我来单家集前三个月从北京中央工艺美院寄给单秀明的——

亲爱的秀明女友：

转眼分别已有一月，由于我家长途电话不甚方便，所以先写信给你以慰思念之情。

我与宁夏，特别是宁夏的教育事业，尤其是浸透着咱们姐妹诸多心血的女童与妇女教育事业，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离宁来到北京后，杨主席（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现人大主任）、金大姐（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您……一个个志同道合、与我和我们女童教育有着不解之缘的女友们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将永远热爱宁夏——这块哺育了我、又让我付出艰辛的热土！怀念和我一起为事业奋斗过的友人们！

我非常高兴结交了您这样一位真诚、正直、聪明、能干、爽快的女朋友，我也非常感谢您对我工作的支持。特别是我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我的关怀和帮助！我永远珍惜这份情义，永远把我最温暖的心意留给您……

（下面一段是马所长到新单位后的一些情况，略——笔者注）

我的通信地址在信封上，邮编别写错。我的电话是……（略），010 是北京的小区号，晚上 9 点以后是半价，星期六、日也是半价，有机会来个电话，真想听到你的声音。

当然也希望读到您的信。拨款 5000 元收到了吗？请告诉我。省着花，说不定以后很难再有这样的支持了！

还要干些工作，做出成绩，才会有援助。尽量争取创收，充分发挥设备的作用。

有事多与杨主席商量，她品格高尚，又有极高的威望，

遇事经验丰富，也有办法。

.....

您多保重，凡事想得开，人生苦短，多想拥有的，多想自己已有的成功就高兴了！常联系。

（笔不好，字写得又大又不好看，希原谅）

祝一切好！

思念您的毓勤

1998. 6. 16.

我之所以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抄下来（略的部分是与我写作主题干系不大），是因为我看了这封信后落下了眼泪。我感知着两位穆斯林女儿事业的艰辛、友谊的诚挚以及她们为西部女童教育全部的付出。无论怎么说，信中透露的是非平庸女性对事业、友情和人生的真正的纯粹。

快凌晨4点了，单秀明说，睡吧，明天你还要赶路。我们睡下，但我发觉我们谁也没有入睡，因为我们都在不断地翻身。凌晨5点，我听见隔壁房间里小郭已起床为我们准备早饭了。因为我们的留宿，小郭一夜也未回家，留下来帮着做饭。

天亮，六盘山地区下起了中雨。单秀明的儿子、侄儿忙乱着，他们从单家集村子里求来一辆三轮机动车，把“老伏尔加”拖到了兴隆镇，又从兴隆镇拦了一辆中巴客车把“老伏尔加”拖往西吉县城.....

离开兴隆很远了，我看见单秀明、小郭还站在雨里送我们。

雨越下越大，六盘山区一片雨茫茫。这时，我心里回响着回族作家张承志多次寻访“西海固”后写下的话：这里的一切问题是关于人、人心、人的处境问题.....

告别伐木时代

李青松

林区具有多种多样的魅力，但最主要的魅力还是来自于森林。

没有森林就没有林区的一切。

林区大都远离都市、远离政治中心，在一些偏远的地方。林区是中国地理上特殊的地域，因为高山密林的阻隔，相对来说，林区是封闭的，每个林区都有自己独特的习俗、独特的文化。从另一方面来说，林区与外部的世界又是相通的，外部世界的变化和进步也常常影响着林区。

黑格尔老人曾说：“你要了解阿拉伯人，就要了解他们的天空、他们的星辰、他们酷热的沙漠以及他们的骆驼和马。”那么，要了解林区呢？恐怕不深入林区，不对森林和文化做一番探究，是很难说清楚的。森林的至善至美，不在于它表面的景色，而在于它群落细部有条不紊的巧妙安排和万世不变的自然法则。在都市人的眼里，森林也许就是森林，而在林区人眼里，森林则不仅仅是森林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早年间，林区吃的喝的用的都是用木头从山外换回来的。

传统意义的林区所特有的那种遥遥路途已不复存在。如今，林区已大致成了静态的地方，它在地理上已经定域，今非昔比。

林区的困惑

在林区，谁都知道“两危”是怎么回事。

“两危”如同恶魔一般困扰着林区。

80年代中期，我就听说林区出现了“两危”，并且在笔记本上认认真真地记下了关于“两危”的含义：一危是资源危机，也就是林子就要砍没了；另一危是经济危困，林区人的日子越过越穷。那时经济学家吴象先生到林区做过一次调查，敏锐地发现了林区已出现了“资源危机”与“经济危困”的局面，并专门撰写了一篇调查报告，向国务院领导报告了这一情况。

绥棱林业局是1948年建立的老局，是黑龙江森工系统特困企业之一。这个局的工会曾作过一项专门的调查，在全局1.4万名职工中，人均月收入在50元以下的有1346户，涉及人口5735人，占全局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林区职工的工资月平均在160至170元之间，连北京的最低生活水平都未达到。然而，这一点微薄的工资也不是每个月都能按时拿到的。

绥棱局从1986年就开始拖欠职工工资，现已累计欠发4000余万元。同绥棱局相比，桦南局更惨，到现在已累计欠发工资35个月。我在桦南采访时，正赶上几位老工人在局长办公室嚷嚷，要求补发前些年拖欠的工资。他们说：“我们都70多岁了，当年给国家做了那么多贡献，现在老了，倒不给我们发工资了。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几位老者相约要去北京上访，一定要当着朱■基总理的面，把林区的困难唠叨唠叨。问局长同不同意。

局长说，这不是添乱吗？

由于企业危困，国家对贫困户给予的倾斜政策根本不能落实，甚至连最基本的最低生活线补贴也无法兑现。不是不想兑现而是拿不出钱来。绥棱局有一位叫吕明的退休职工，月工资只有102元，父子俩相依为命，家里炕上铺的是谷糠和稻壳子，盖的是露出棉絮的破大衣和塑料袋子。

林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先天不足，仅东北、内蒙古林区投资欠账就高达80亿元。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土窝。可有的职工连土窝也无半间。去年8月的水灾冲毁了职工杨春林的房子，灾后虽然上级给了些救济款，但因家庭比较困难，一时难以重新盖房，一家三口现仍寄宿在亲属家里。

目前，绥棱局有危房28万平方米，涉及职工家庭达1000余户。建局以来，这个局为国家生产木材1461万立方米，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十几亿元，上缴利税4亿元，是家大型国有森工企业，而现在，其职工所住房子竟是泥巴房、马架子。正如林区职工自己编的顺口溜所说：“咱们的房子是弯着腰，拄着棍，滴滴答答掉眼泪。”

这些林老大过去日子好过的时候，怎么就不知道多盖好房，架桥修路，搞基础建设呢？

林老大实在，那时心里只装着国家了——生产的木材给国家了，挣下的大把钞票给国家了。没想到自己日后会两手空空。当然，这是比较体面的说法。如果往林区人自己身上找原因，就是传统的“将就”观念害了林区。长期以来，伐木工在一个地方从来就干不长，一个伐区干上一两年就得转场了，只采不育，人跟林走，住处都是临时的那种冬透风、夏漏雨的草泥拉哈辫或马架子。

小兴安岭开发初期，伊春只有十几户人家，主要靠打猎为生。据说，规划伊春城镇时，是位林业干部用草绳子拉的街道，说能开两排马车就够宽了。其中一位开玩笑地把绳子放长一点儿，说，再宽点吧，万一将来走个大汽车呢！

建伊春林管局办公楼时，随便在雪地上画了个图样就动工了。二层楼封顶了，木匠要从楼顶下来，才发现没有楼梯，于是就歪歪斜斜地补了一个。

事后，有人抱怨，建楼干什么？将就几年就搬家了，这不是浪费吗？

未曾想，这一将就，就是几十年。改革开放以后才知道要好好建家园。

林区的问题远远不止房子一件事。林区的光棍汉越来越多已经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还是以绥棱局为例，到1998年末，大龄未婚青年已达到近400人，一个个棒小伙就是找不到对象。此种现象在山上的林场尤其突出。八一林场目前有61个光棍汉，其中光是老工人褚首文一家就占了3个，最小的，也已36岁了。

早先，林场工人找对象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局址所在地或者是县城里的漂亮姑娘尽可由林老大们挑选着找。那会儿，农村女孩子找到一个林场工人是一件荣耀的事。瞧瞧，人家是国家的职工，有劳保，吃皇粮，拿工资，公费医疗，到老了干不动那天，还有退休金……啧啧，跟上个林老大过日子，这辈子就算有了依靠。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如今的林老大失去了早年的风光，往昔不堪回首喽！这会儿，不但农村女孩子瞧不起他们，就连林场职工的女孩子也个个孔雀东南飞了，她们宁可跋涉几千里去东南沿海打工找出路，也绝不回林区嫁给林老大。

此种状况，林区的光棍汉能不多吗？

说来说去，林区的问题归纳到一点，还是一个森林资源问

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保工程的实施实在是太必要了。

疲惫的山林

清朝初年，因朝廷视满洲为其发祥地，实行封禁制度，因而，东北林区基本没有开发。直到 1895 年，清廷设木植公司，山林的寂静才被打破。

史料记载，“黑龙江东部，山脉纵横，林木茂密。其中最富之处，则为大青山，青翠弥望。”据黑龙江志《财赋志》中记载，“光绪时订税章，由征收局代收，作为国家正款，其办法由木把头领票入山采伐，木厂运销按照卖价而征其税”，“于是划分林区，组织木植公司”。自此关内汉人大量涌入东北，东北的森林资源遂被开发。

大雪封山之后，林商通过木把头雇佣伐木工人，用大斧砍伐，每人日采伐约 1 立方米左右。当时在小兴安岭南麓较有名的林商有孙震芳、赵敏、肖广渊等，他们分别是茂源公司、通森公司、兴东公司的老板。所伐森林均为天然林，“……有松、榆、柞，产量最为丰富。”

由于当时无森林管理机构，更无什么作业规程，所以森林长期处于乱砍滥伐的状态。

然而，这毕竟是零零星星的砍伐，当当的砍伐之声在大清帝国的汹涌林涛中，恐怕连一滴水都算不上。

光绪三十年，北满中东铁路的修建，掀开了中国森林史最惨痛的第一页。

中东铁路修到哪里，哪里的森林就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对此著名林学家陈嵘先生曾写过一段愤慨的文字：

中东铁路沿线，昔日均为广大森林所被覆，自与东省铁路公司订立伐木合同后，迄今不过三十年，沿铁路两侧五十里内之森林，均已砍伐净尽，近更向远方采伐，有达百余里者，此种现象，无非受不平等条约之限制；加以国人在昔不知森林之可宝贵，一任彼帝国主义之俄罗斯之要求，将大好森林，为附属铁路之供应品。是以中东路自开办以来，举凡枕木，建筑材，皆无取自林中其暴殄天物之万甚者，则将良材，任意劈成木半子，作为燃料。通车以来，无论工厂，机车，站台，事务所，道班房，及员司工人住宅等，俱以木半子作惟一之燃料。中东路职员约计二万人以上，平均每人每年应用木半子约一百立方尺，其所需已达二百余万立方尺之多；而工厂、机车、工事房所需木材之量，虽百倍以上犹不止焉。是以中东路一带无限宝藏之森林，转瞬间已荡然无存，言之至可痛惜也。

据 1953 年林业部第一次森林资源调查时记载：“仍可看到盗伐所破坏的痕迹，伐根高达 1 米以上，另外还有截好的原木未运出，现已腐烂。”

中东铁路吞噬了无数良材美干，中国的森林同当时的中国一样陷入了深重的灾难之中。

一个强盗尚未歇手，另一个强盗又抡起斧头。1931 年，日寇侵占东北后，开始以拔大毛的方式盗伐红松、鱼鳞松、落叶松等珍贵木材。盗伐的木材全部用轮船运往日本本土或沉于日本海域，等用时捞出。

日寇侵华时，总共从中国东北掠夺了多少木材，现已无任何资料可以考证了，但我在查阅黑龙江省林业史料时却注意到这样一句话：日本投降后，东北林区光是搜集困山、中楞日伪遗留来

不及运走的木材，就整整进行了两年。

森林，疲惫不堪。

森林，伤痕累累。

林老大话当年

林区的第一代开发者，现在大都已经退休或接近退休的年龄。当年，他们是怀着革命的理想和远大抱负来到林区的，他们对冰雪和森林的认识，自然与现在的年轻人不同。

冰雪和森林中曾经有过他们的血汗与悲壮，豪情与困苦，坚忍与疲惫。

他们对冰雪和森林的眷恋之情是现在的年轻人所无法理解的。在无可抗拒的命运面前，生命在这里显得如此无助而茫然。

他们的眼神多半是忧郁的。然而，当我同他们谈起森林，谈起当年的事情，他们的眼神里却又闪烁出兴奋的光芒。

牛绍祥（67岁，绥棱林业局离休干部）：

来林区之前，我在吉林省泰来区政府工作。有一天，单位领导把我叫去，说是国家正在开发小兴安岭林区，需要干部，组织上安排我到那里工作。次日，我背着行李，怀里揣着区政府的介绍信就登上了开往林区的火车。

刚到林区时，我作记账员并负责采购伐木工人的劳动保护用品。那时林区的生活艰苦，吃的是高粱米、咸豆儿，猎到一头野猪，吃顿野猪肉，算是解馋了。穿的服装都是战利品，许多都是苏联红军留下的，用的饭盒和炊具都是小日本的东西。伐木的工具是大片斧、弯把子锯和大肚子锯。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伐木方法。倒套子用的是马拉牛拖。现在看马拉牛拖笨是笨了点，但有利于作业现场幼树的保护。用拖拉机集材，快是快了，但一祸害

就是一大片，拖一株树，毁了几十株幼树，看着心疼。

唉，还说当年吧，归楞用的是卡钩，八八的，六六的，那时的木头那个粗那个大呀，现在见不着了。八八的就是左边八个人，右边八个人才能抬起来的木头，六六的就是左边六个人、右边六个人才能抬起来的木头。现在呢，现在的木头一个人扛起来就走。那会儿的木头都是上等的水曲柳和红松，大部分都是军需用材，做枪托，炮弹箱，枕木，矿木什么的。

林区的工资高，待遇也好。我当时的工资与绥棱县县长的工资差不多。地方上的人都愿意同林区人攀亲戚，姑娘找对象也愿意找林业工人。

那会儿林子密得很，光听到里边的喊声，人就是转不出来。林子里有黑瞎子、狼。晚上躺在工棚子里睡觉经常听到林子里的狼嚎，黑瞎子也老是来扒门，一闹腾就是半宿。开始大家都很害怕，后来慢慢地也就习惯了。

深山老林嘛，就该有这些东西。

高兴东（68岁，绥棱林业局退休工人）：

我参加过抗美援朝，当志愿军在朝鲜打过两年仗。1952年转业来到绥棱局。这儿是1948年建的局，之前是营林署，日伪建的。他们的掠夺式采伐，哪个好采哪个，把好木头都运到日本去了。

大规模的开发，还是绥棱建局以后，最辉煌的时期是60年代，采伐木头最多的年景可达50多万立方米。

现如今你再去林子里看看，哪儿还有什么可采的树啊！

郁玉兰（66岁，女，桦南林业局大肚川林场已故职工唐毕高之妻）：

我同我们那口子来林区是1955年。那会儿，这里到处是林子，没有人烟。我们是从江苏淮安来的，我家就住在周恩来总理故居的对面。我老头那会儿当集材拖拉机手，说是林区的钱好

挣，就回家把我接来了。嗨哟，刚来时那个不习惯呀，睡火炕，吃大渣子，吃酸菜……可把人愁死了。我就整天哭，眼泪都快哭干了，就闹着回淮安去。可我老头儿说什么也不让我回去。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弄来一把二胡，晚上就给我拉。我的老头儿对我特别好，后来，我也就不闹了。

白天，老头儿开拖拉机到林子去集材，我就在草棚子附近开荒种地。种大豆，种萝卜，种玉米。有一年秋天，我正收玉米的时候，黑瞎子钻进玉米地，把我吓得要死，幸亏我老头儿开拖拉机回来，才把那黑瞎子吓跑。不然，我早没命了。

我有四个孩子，三个都离开林区到外地工作了，身边只有老儿子，现在在林场当护林员，儿媳妇是附近村里的，挺贤慧的，从来不跟我顶嘴，小孙子已有半岁了。

我老头儿在世的时候曾跟我说过，咱们老了那天不用儿子养，最后共产党会养咱们的。可前几年，我老头有病，我去找场长要钱，场长却躲着我，不肯给钱（流眼泪）。

我也不要别的，我老头儿挣下的工资，总该补发吧，医药费总该给报上些个吧。

可到现在，这些个事儿也没个着落。

王志诚（59岁，桦南林业局大肚川林场职工）：

1959年，我是从山东梁山县移民来的。梁山县属于黄河泄洪区，国家要治理黄河，就把我们给移到林区来了。由一个农民，一下子变成了林区工人，觉得特别荣耀，挣工资拿现钱跟农民种地的感觉可不一样。我当时是伐木工，玩命地干活。当时就一个想法：树砍得越多，给国家作的贡献就越大。

砍着砍着砍到1984年，就觉着砍不下去了，没的可砍了，木头越来越少。现在全林业局的木材产量也赶不上那会儿的一个林场多。

林子没了，野生动物也就没了，就连孢子、野猪也很少见到了。那会儿可不一样，种一片玉米，到秋天也收获不了几粒，都让黑瞎子、野猪给吃了。

我是怀着一种敬意采访这些当年的林老大的。林区不是他们的故乡，但他们的一生大部分时光都是在斧锯之声中消逝的，当日日残破的森林拖着疲惫的影子退出他们视线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自己的根并不在这里，只是杂七杂八的口音中带有浓浓的松树油子味。

近年来，他们的思乡之情越来越浓烈，然而，省亲之后他们又多半打消了返乡的念头。

因为，家乡的人早已把他们视为林区人，家乡的土地上已没了他们可耕的田，可以生存的空间。

唉——除了长长的叹息，还能有什么？

伐木者不是罪人

1998年夏，长江、松花江和嫩江发生特大水灾后，媒体把镜头对准了中国的天然林。那些日子，几乎每天晚上的新闻联播都有哪儿哪儿禁伐天然林的消息。这封锯那封锯的，一时间捷报频传。

但我要说，我看了那些电视镜头，心里很不是滋味——

疲惫不堪的林业工人排着队从山上下来，把手里的斧头或大肚子锯统统放在一个指定的地方，然后贴上封条……

林业工人成了什么人？难道是刚刚从山里被清剿出的“匪徒”吗？

此种场面，怎么有点像电影里“举起手来，缴枪不杀！”的俘虏就擒场面？

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是那些专门制造“新闻”的三流电视记者导演出来的。

禁伐就禁伐，与那些斧头、大肚子锯何干？

正常的林业生产过程中的间伐和抚育就不搞了吗？而那也是需要斧头和锯的。

禁伐就禁伐，非得摆布林老大们在媒体上出丑干吗？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也有爱，也有自尊呀！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林业工人似乎成了罪人，社会各界对林区人的谴责声不绝于耳，林业行业被推向了尴尬的境地。

早在建国之初，林业企业的利税额曾名列全国前三位，林业为新生共和国的国有资产的原始积累作出了巨大贡献。

东北国有林区的木材生产是新中国的第一产业。从抗美援朝，到国民经济恢复以至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几乎都是由大木头支撑起来的。整个“一五”期间黑龙江省森工产值占同期全省全部工农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

那个时期的林老大可不得了，打个喷嚏全社会都得当回事。

五六十年代，马永顺作为全国劳动模范 14 次进京见到了毛主席，4 次与毛主席和周总理握手。周总理亲切地称他为小马。1956 年 1 月 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当时，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取得重大胜利，大会安排了工、农、兵、学、商五个界别的政协委员，代表全国人民向毛主席报喜。谁代表全国职工向毛主席报喜呢？经过充分酝酿、讨论，大家一致推举马永顺。

作为一名伐木工，马永顺曾创造了全国林区手工伐木产量最高记录。在当伐木工人的 34 年里，共砍伐林木 36000 棵。

这个数字，堆起来就是一座山，放倒了就是一片海。

马永顺与老孟泰、马恒昌、王进喜都是那个时代的著名劳动

模范。而马永顺已经不是马永顺，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符号，作为伐木工的马永顺代表着整个森林工业界。森林工业意味着什么？——国民经济的老大呀！

采伐并不等于毁林，因为森林本身就有一个自然更新的过程。但采伐如不加以控制，不按照森林固有的法则进行，那么就有可能导致乱砍滥伐，甚至毁灭性的破坏。

1961年7月，一直牵挂着林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视察小兴安岭。在丰林伐区，刘少奇站在一棵高大的松树旁，用手抚摸着树枝，看了一会儿，然后语重心长地说：“百年之后还能不能有这样的红松林呢！我们这一代采光了怎么办？要后继有人，也要后继有林哪！”

1962年11月，国务院决定成立东北林业总局。

周恩来总理不无担心地指出：林业的经营一定要越采越多，越采越好，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1964年，林业部正准备将刘少奇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作为林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可惜，随之而来的十年浩劫却淹没了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的绿色梦。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开始起步，对木材的需求形成新的高潮。从1978年到1985年，长达8年的时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木材计划消耗最多的时段。一座座青山瘦了。林子越来越稀，树越来越小。这一次，它大大伤了元气，“两危”残酷地搁置在国有林区面前。

也许，真正了解林区内情的，还是林区人自己。可他们心中的隐痛有多少人知晓呢？

松花江林管局副局长徐国义先生用自己的笔记录了自己作为砍树人的“大把头”的心路历程。

——该调整政策了，该封山育林了，然而，像一列高速急驰的列车不会戛然而止一样，政策的少许微调根本无法缓解大森林的重负，1986 年，我就是在“两危”已初见端倪的情况下走上“大把头”的岗位的。

木材生产仍然处在有组织的过量采伐之中，此刻的大山已不再沉默，它以频繁的水患警示和教训着人们。然而国家要木材，企业要生存，职工要吃饭，国有林区所剩不多的资源已经成了救命稻草。靠山吃山，此时此刻这个最最古老的观念则成了真理的宣言。从 1986 年到 1996 年，这又长又短的 10 年，怎样地熬煎着人啊！明知道不该砍还得砍，明知道当少砍还多砍，真个应了一个法律上的明知故犯之说。

从 1978 年至 1985 年，在中国第二次木材需求高潮中，我在最基层的生产单位组织伐木头。从 1986 年至 1996 年，在“两危”日渐加剧的国有林区中，我以“大把头”的身份继续伐木头。此时，我倒有点儿像个战犯被悠闲地禁在悔过之中，面对新世纪的长天去静思己过。20 年在我的手下抹去了多少绿色？真个好悔！三百六十行，干吗非要误入这个歧途？以至终生都要背上情感的重负。看看我那些当年的东北林学院道路系一同就读、毕业后分配到交通系统的同学，一个个多神气！当一条条高等级公路从他们的手中拽出来，我这个拿着大板斧的杀手怎么与人家相比？

这段文字充满了愧疚自责。看得出徐国义先生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了认真的反思。

徐先生具有强烈的爱国激情、社会责任感，也有强烈的自省意识。

此后不久，徐国义以信函方式向中国林学会森林工程分会提

出辞呈，请求辞去常务理事职务，自此断绝了与木材采伐相关联的一切活动。

壮士断腕，何其悲壮！

1998年4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新办公大楼竣工，坐东朝西，共14层。

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的牌子被摘下，挂上的是国家林业局的牌子。

应该说，社会各界对林业工人的谴责和声讨是极不公正的。历史就是历史，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看待过去的一切。

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几十万伐木工人正在全面转产——手中油锯变成了种树的锹镐。

国家需要木材时，就当砍树英雄。国家需要生态保护时，就当种树英雄。马永顺老人是这样做的，广大林区人也正在学着这样做。

在林老大眼里，国家利益从来都是高于一切的呀！

今日夹皮沟

刚到海林，我就问宣传部的王部长：“夹皮沟还有多远？”

“四十多公里。别着急，我们一定安排你到那里看看。”王部长说，“先歇歇，一路够辛苦的。”

进了宾馆，进了客房，王部长说：“总局的刘庆林部长来过电话，叫我们一定搞好接待工作，李记者有什么要求你就说啊，别客气。”

我说：“没啥要求，就是想看看夹皮沟。”

王部长：“上边来的人多半都要去夹皮沟看看，其实夹皮沟也就那么回事。前些年来了《人民日报》的一位老摄影记者，我

带他爬上了夹皮沟的威虎山，左看右看之后，那位老记者一屁股坐在山顶上，说曲波曲波呀，你可把我逗稀了。”

我就笑，把提着的紫色提包放到桌子上。其实，我对夹皮沟的认识，也是来自曲波的《林海雪原》。

王部长说，参观采访的事，晚上酒桌上再合计。吃狗肉吧？我说，吃。好，晚上咱们吃狗肉。

王部长回去不多会儿，来了一位宣传干事，抱来一摞材料。他说是王部长叫他送来的。

晚上的狗肉吃得极好，酒也喝得挺文雅。吃完喝完，又定了明日的行程，送走了王部长一行人，回到客房，我便啃那堆材料。材料上说，夹皮沟林场建于 1964 年，施业区面积 7999 公顷，全场现有住户 148 户，居民 504 人，在职职工 154 人，每年的生产任务一般在 7 万立方米左右，是一个集木材生产、营林生产、多种经营、综合利用为一体的综合性生产经营林场。

著名的威虎山就在其施业区内。

威虎山与两个人的名字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一个是杨子荣，一个是座山雕。座山雕的枪法与杨子荣的枪法不相上下，但座山雕斗智却没有斗过杨子荣，最后生生被活捉了。

《海林志》上是这样记载的，1947 年初，杨子荣奉命带领孙大德等 5 名侦察员化装成匪首九彪被打散的人员，进入海林北部夹皮沟山里，侦察国民党委任的东北先遣军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三代惯匪“座山雕”张乐山的巢穴。杨子荣沉着地识破了老匪的种种伎俩，并取得了他的信任，于 2 月 7 日凌晨，把“座山雕”等 25 名土匪引出巢穴，到了孙大德等 5 名侦察员潜伏的地方，将其全部缴械，活捉了“座山雕”。杨子荣的这一壮举，受到部队和群众的高度赞扬，荣立三等功。1947 年 2 月 19 日出版的《东北日报》以《以少胜多创造范例，战斗模范杨子

荣等活捉匪首座山雕，摧毁匪巢，贼匪全部落网》大字标题予以报道。全文如下：“牡丹江分区某团战斗模范杨子荣等六同志，本月二日奉命赴蛤蟆塘一带便装侦察匪情，不辞劳苦，以机智巧妙方法，日夜搜索侦察，当布置周密后，遂于二月七日，勇敢深入匪巢，一举将蒋记东北东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座山雕’张乐山及手下二十五名土匪全部活捉，创造了以少胜多歼灭土匪的战斗范例。战斗中摧毁敌匪窝棚，并缴获步枪六支，子弹六百四十发，粮食千余斤。”1947年2月23日，杨子荣又带领孙大德等5名侦察员深入到海林县北部梨树沟山里闹枝子沟，在追剿丁焕章、郑三炮等最后一股残匪时，不幸英勇牺牲，时年仅31岁。

据说，杨子荣是快枪手，手持双枪。那日在闹枝子沟发现匪徒藏在一个木屋里，杨子荣一脚踹开门，左右手同时扣动了匣子枪的扳机，哪知，两支匣子枪都哑了。匪徒一愣神，随即就朝杨子荣开了枪——英雄倒下了。

原来，夜里寒冷，杨子荣烤火取暖时，枪里弹簧烤出了水汽，枪便没有打响。否则，历史就是另一种写法了。

杨子荣是一位了不起的侦察英雄，夹皮沟人永远忘不了他。他的事迹被他的首长曲波写进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小说一经出版立即引起轰动，一版再版，在那个年代，英雄杨子荣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甚至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然而，最令夹皮沟人痛心疾首的是，威虎山上原始林却没有保留下来，甚至连杨子荣利用指挥土匪演习之机，秘密存放情报的那棵老油松，也不知在什么时候，被他们懵里懵懂地伐倒了。

历史在斧锯声中断裂。

次日清早，车出海林局向夹皮沟的方向呼呼开去。大约两个小时后，车便开到夹皮沟，因为事先打过电话林场党总支部书记张山虎正在场部大门口等候我们呢。张山虎说：“这一路颠得够呛

吧，进屋喝茶吧。”王部长说：“李记者急着要上威虎山，先上山，回头再喝茶。”张山虎说：“也中。”张山虎挤进车，车就继续往东北方向开。司机把车停到一堆树皮上（过去，这儿可能是一个楞场），再往前开不上去了，张山虎说，步行上山吧。大家便下车，一看山路两边尽是一蓬一蓬的蒿草，和一丛一丛的榛柴棵子，稀稀落落的白桦在远处长着，有几缕云雾轻轻绕绕地缠在威虎山的山腰，由于刚刚下过一场小雨，威虎山显得翠绿翠绿。

张山虎在前边引路，手里拿着一根树棍，啪啪地敲打着两旁蒿草的露水，脚下是稀泥，呱呱呱呱的。我们一行人在后边深一脚浅一脚地紧紧跟着，生怕草丛里蹿出一条毒蛇巨蟒、老虎什么的。

扑棱棱，草丛一阵乱动，蹿出什么东西，定睛一看不是虎，也不是蛇，是几只飞龙。

大家开玩笑说，当年座山雕摆百鸡宴，那百鸡中不知有没有飞龙。有人说飞龙是鸟不是鸡。另一位说，鸡也是鸟的一种啊。呀呀，飞龙就叫榛鸡嘛。

正说着飞龙的事情，前边的张山虎说：“到了，这就是杨子荣当年活捉座山雕的地方。”大家拨开树枝、蒿草，便看到了被细雨淋湿了的石碑，石碑正面的大字是：杨子荣活捉座山雕处。背面刻的是小字，记载着杨子荣活捉土匪的过程。

照相照相，你一张我一张，大家学着英雄的样子在石碑前轮番表演。

“威虎厅在哪儿？”

张山虎往山腰指了指，“还得往上。”大家就离开石碑继续往上上，前边的拉着后边的，后边的拽着再后边的，三上两上就上来了。

“威虎厅呢？”

“脚下就是。”张山虎哈哈大笑。大家低头一看，脚下是一片废墟，倒塌的木刻楞上长出了一朵一朵的蘑菇和木耳。张山虎说：“所谓威虎厅就是一座木核楞房子。有暗道通往山上的碉堡。前些年木楞房子还在，采伐工和猎人常来避雨或生火做饭。风吹雨淋，年久失修，木核楞便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威虎山因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而闻名遐迩。哪知真正的威虎山竟是这么令人失望。

这些年随着旅游业的日趋红火，夹皮沟人也有心打打旅游这张牌，无奈苦于找不到开发的合作伙伴，更苦于没有开发的资金，重振山威的梦想一直未能变成现实。

通往火星的桥

1999年是共和国建国50年。各行各业都在回顾，回顾50年来所走过的历程，取得的成就。50年来伊春为国家生产了多少木材？

曰：2.2亿立方米。

2.2亿是个什么概念？在伊春北山宾馆，伊春市委书记王利民与我共进早餐时说，2.2亿立方米木材装上火车，节节排列，可以从中国最北端的漠河排到海南岛最南端的三亚，如果这些木材用在一个建筑工程上，可以架一座从地球通往火星的桥。

年轮是昨天的历史，一个春秋就是一个年轮。

一组组数字，随着日月的积累载入林区开发建设的史册：

在国民经济恢复的3年时间里，伊春林区为国家生产了454万立方米木材；在国民经济3年调整时期，伊春林区为国家生产木材915万立方米；就是在那场使国民经济遭受空前劫难，基本处于瘫痪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伊春林区仍然为国家生产

3096 万立方米木材。

当一列列满载木材的火车，呼啸着驶出茫茫林海，驶向四面八方，中国人乃至全世界都知道，在中国的东北部，在小兴安岭丛山峻岭中，有一颗闪耀着翡翠般光芒的明珠——伊春林区。

新生的共和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当时，调运枕木给铁道交通部门是一项军事任务，林区工人夜以继日地用带锯赶制枕木，支援铁路建设。恢复交通所需电柱均从林区调运，恢复煤炭生产采矿所需的坑木，均由林区供应。还有军工用材，如枪托、手榴弹把、军工箱等均由林区承担制作和调运任务。此外，还承担了恢复公路交通和工业民用建筑所需民用建筑木材调运任务。

抗美援朝战争中，作为主要木材生产基地的伊春林区，保证了抗美援朝前线的木材需求。据不完全统计，抗美援朝期间，伊春林区组织了全林区所有的林业局，调运出了大批枕木、方材以及柱木、原木。其中，铁力林业局发出枕木 1 万立方米，南岔林业局贮木场发出原木 1.5 万立方米，朗乡林业局发出桩木 1.53 万立方米，双子河林业局、友好林业局、大丰林业局等发出板材 1260 立方米。总计有不下 10 万立方米的木材运上了朝鲜战场。

1958 年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 10 周年，伊春接受了国家下达的为修缮天安门、故宫大梁、明柱提供用材的任务。丰林林业局采集树长 10 米、径级 60 厘米以上的红松 10 多根，从中挑出 6 根，径级最大的 80 厘米，最小的 62 厘米，共计原木 30 多立方米，用专车运往北京。此外，友好林业局特选材长 15 米，径级 40 厘米以上的红松原木 40 立方米。上甘岭林业局提供红松原木 1976 立方米，全部用于天安门和故宫的修缮。

1959 年，国庆“十大工程”建设在共和国往事中占据着重

要一页。国庆“十大工程”是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中国美术馆、北京展览馆、工人体育场、民族文化宫。这些建筑是那个时代建筑艺术的顶峰，其构图和追求的风格，在今天仍不失为典范。

这“十大工程”的建设从设计到竣工均不到 10 个月的时间。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的建设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抓的，他提出，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要互相呼应。现年 86 岁的著名建筑设计师张开济先生曾参与了当年的设计，张先生回忆说，人民大会堂的柱子是圆的，历史博物馆的柱子是方的。所用木料都是从东北林区调运来的。在为国庆“十大工程”提供的优质木材中，翠峦林业局的红松原木 7000 立方米，五营林业局的红松原木 500 立方米，双丰林业局的水曲柳原木 240 立方米。伊春林区有 20 多个局、场为“十大工程”提供了木材。

1976 年 7 月，唐山发生强烈地震。不久，中央向伊春下达了紧急救灾木材供应任务。伊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林管局迅速部署调拨，各林业局贮木场及时赶装，材种有杂木、径木、原木等。9 月 8 日，乌马河林业局装运出一整列杂木，多达 28 节车皮；12 月 7 日，汤旺河林业局装运出板材 34 节车皮，累计 1000 立方米；翠峦、上甘岭、铁力、大丰、双丰、红星、丰林、双子河、朗乡、神树、桃山、乌伊岭、友好等局全部按要求完成了救灾任务，总计达 9.1 万立方米。

1976 年 9 月，伊春林区接受了建设“毛主席纪念堂”木材供应任务。这是祖国对伊春的信任和重托。接到通知后，伊春林管局迅速组织力量，由翠峦、铁力、大丰、红星、丰林、双子河、朗乡、桃山、乌伊岭、友好等林业局，装运了以红松材和水曲柳材为主要材种的木材。两年时间里，伊春共调运了 3 万余立方米木材，保证了毛主席纪念堂建设的需要。

1982 年，齐齐哈尔市遭遇强风雪袭击，致使铁路受阻，通讯设备被毁。伊春林区很快发出救援木材。仅友好、双子河两个林业局就拨给灾区电柱、桩木 1047 立方米。

60 年代，为支援航空建设，伊春林区对航空用材进行了精选，材种大都是优质桦木材。朗乡林业局为保证航空用材，优中选优，随要随装，保证供应。伊春林区特供的乐器工业用材，主要有鱼鳞松和红松，连年供应，多数运往广州、上海、成都。1974 年维修五台山大佛殿，特选材长 13 米、径级 40 厘米以上红松原木 192 立方米。1972 年 12 月，承德避暑山庄修缮，伊春林区调拨红松原木 530 立方米……

据供货资料记载，1973 年至 1985 年，伊春林区的原木和锯材供货总量 6857 万立方米。中央主管部门用量最大的为轻工业部（主要造纸材），占供货总量的 9.9%，年均达 56 万立方米；其次是煤炭工业部（主要是坑木），占供货总量的 8.1%，年均达 46 万立方米；再次是铁道部（主要是枕木和车辆材）和燃料化工部，分别占供货总量的 2.4% 和 1.7%；交通部和纺织工业部，年需材量平均分别达 8 万和 6 万立方米。

地方用材，除台湾外，伊春的木材供应范围遍及全国，具体用材单位 8000 余个。

无论是社会主义建设，还是抗美援朝、支援灾区，林区毫不犹豫地付出了自己的劳动成果，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

长着两个脑袋的林业局

伊春市市长是谁？吴杰凯。

伊春林业管理局局长是谁？吴杰凯。

此吴杰凯与彼吴杰凯，乃一人也。去林业部办事，吴杰凯就

是局长，去省政府办事，吴杰凯就是市长。市长是政府的一把手，局长是林业企业的一把手，两个一把手的权利都被吴杰凯一人“攥”在手里，就不能让出一个，让别人干干吗？不能让。不是吴杰凯不让，不是他权利欲太强，而是管理体制决定的——国有林区长期以来政企合一。林业局的身躯上长着两个脑袋，一个脑袋是政府，一个脑袋是企业。

政企分开，政企分开，嚷嚷多少年了，可在林区嚷嚷和不嚷嚷是一回事——企业若真的与政府截然分开，那林区的政府就成了空壳壳了，就像掏空了肉的螃蟹。

对于企业来说，政企分开那是一百个愿意的事情，公检法文教卫不用养了，修路架桥盖房子拉电不用管了，哗哗几下，就把企业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负担，撂下了。

对于林区政府来说，政企分开，那是一百个不愿意的事情。林区的人口主要是林老大，林区的经济主要靠木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弄个路架个桥什么的，整日政府跟企业求着要钱，林老大高兴给两个，不高兴就把政府晾在那儿，空壳壳政府窝窝囊囊的尽受气，那还得了。不分不分就是不分，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

就这么着，林老大和政府捆在一起，一捆就是几十年，同甘苦共患难，倒也习惯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伊春为松江省汤原县南岔区公所管。1952年建立伊春县，1957年撤县建市，为松花江专署领导，1964年初改为省直接领导。同年6月经中央批准，撤消伊春市，成立伊春特区，实行以林业部领导为主、省领导为辅的双重领导的政企合一体制，1967年改为市。1970年国务院决定，撤市改为地区。1979年国务院决定恢复伊春市，由省直接领导，政企合一的体制不变，即伊春市政府与伊春林业管理局合一。

作为地方政权，伊春市为省辖地级市，辖 1 市 1 县 15 个区，下辖 13 个乡、11 个镇、246 个街道办事处。作为林业企业的管理机构，是省森工总局的派出机关，管理 16 个林业局及 10 个大中型木材加工、机电、建材企业，下属 227 个林场、经营所。

在计划经济的大木头时代，林区这种特殊的管理体制并未暴露出太多的问题，相反倒更有利于企业和社会管理。因为企业的行为与政府的行为是同一的，企业的活动也就是政府的活动——为国家生产更多的木材。

然而，在市场经济的时代，这种政企合一的体制则像锁链一样把企业紧紧捆住。可采的森林资源多的时候，企业还抗得住，森林资源一少，甚至濒临枯竭，企业就被捆得嗷嗷叫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受市场供求关系的支配和调节。市场需要什么木材，企业就采什么木材，并力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说的直白一点，企业的目的就是赚钱。

而政府呢？政府主要是对林区社会行使管理职权，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政府干的事都是花钱的事，办公益事业——建学校、建公园、建农贸市场、建医院、建烟尘控制区、修公路、改造供水供热设备，上程控电话，开个运动会什么的，哪件事不花钱能办成？

钱跟谁要？企业。企业是谁？就是自己呀。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小女儿三岁时，这是她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

一位林业局长曾不无担心地说，国家要的是林子，所以拿出一笔钱给企业，叫企业别采了，把林子保住。省里呢？省里要的是利润，林子采不采另说，但上缴指标得完成。地方政府呢？地方政府要的是税收，企业采的木材越多，地方政府越高兴。所以，中央下令禁伐天然林，地方政府官员场面上说坚决拥护，实

际上暗地里扭着劲呢。企业职工呢？要工资，得吃饭啊，毛主席早说过，世界上什么问题最重要？吃饭。

企业跟谁要钱？木材——所以，就拼命砍拼命采。越砍越少，越采越稀，最后就走到了这一步，弄成了这个样子。林业局长难当极了——要给国家保林子，要给省里上缴利润，要给地方增加税收，要给职工发工资，提高生活水平，要给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找出路。哪件事情弄不好，都有可能栽进去。

听了那位林业局长的话，我的嘴动了动，却什么话也没有说出来，一种苦涩的滋味涌上了我的心头。

毕竟，记者看到的，只是酒桌上的林业局长，他们殚精竭虑的一面，我们又了解多少呢？

这些林业局长在一些方面很“大”，但在另一些方面却很“小”——大与小，都取决于森林，若没有木材可采，就屁也不是。

在林区，超限额采伐几乎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不采，吃什么喝什么？不采，整日向上伸手要钱，烦不烦？不采，林业局长的政绩从哪儿体现？

在林区，谈论体制问题不能撇开森林这个前提，使森林永不枯竭既是一个目标，又是林区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不论是政企合一，还是政企分开，都是一个形式问题——牌子挂在一起呢还是分开挂。如果几十年的经验教训证明：牌子挂在一起对林区对林子都没有多大的好处，那何必还死乞白赖挂在一起呢？

当然，这个问题不是林区人自己能够解决的。

两个脑袋一个身子的人，干什么都很不方便，这个脑袋说这样，那个脑袋说那样，倒霉的是身子骨，三折腾两折腾，就折腾散架子了。

没有剩余物

天然林保护工程封禁了林子，却没有封禁林区人的思想和意识。也可以说，天然林保护工程给林区人换了脑筋。

北京和平里东街 18 号。

国家林业局办公大楼的一楼大厅里摆放着一对瓶颈系着红绸带的巨型花瓶，高贵典雅，古色古香，其工艺极其考究，精美绝伦。

在这座大楼里办公的官员和进出这里办事的人们也许还不知道，这对巨型花瓶竟是出自胼手胝足的林区人之手，用料是山核桃。林区资源的危困硬逼着林区人在深加工上做文章。近年来，伊春林区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大的削，小的旋，疙瘩节子烧木炭。”

从不把木头当回事的林区人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开始真正把木头当回事了。

森林经过采伐后，在林地上留下大量的枝丫废材、倒木、梢头以及灌木等，这些统称为采伐剩余物。采伐剩余物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据调查，各种采伐剩余物数量占采伐量（干材）的 38~40%，其中，枝丫和梢头占 15%，伐根占 10%，选材剩余物占 3~5%，树皮占 10%。每年全国约有采伐剩余物达 1000 万立方米以上，占全国木材生产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

原木通过制材又产生一部分加工剩余物，成材的材积只占立木的 46% 左右，再加工成细木工制品（如家具等）又有一半的木材变成锯末、刨花、边脚料，最后制材品仅为立木材积的 23% 左右。过去，这些剩余物都白白扔掉了。

没有工业的林业只是造林及向需材单位供应原木，是不会有

竞争力的。如 1986 年芬兰的原木产值仅占全国总产值的 11% 左右，但经过综合加工和深度加工利用的林产品产值却占全国总产值的 40 ~ 50%。因此，发展木材综合利用，既可缓解当前木材供需矛盾，又可为促进森林的永续利用创造有利条件。

如今，利用木材剩余物加工小木制品的厂家遍布林区。光是伊春就有 400 多家，年产值达 4.6 亿元，木制品有几千种，都是市场上畅销的产品。

在伊春林区采访期间，李景才站长驾车带我专程到友好林业局的木制品展览馆开了一番眼界。

想不到那些边边角角的小材小料，经过林区人巧妙组合和艺术处理之后，竟都变成了颇有品味的产品。仅工艺美术品就有薄木镶嵌、立体木拼、彩绘工笔、根雕工艺、核桃皮粘贴、树皮字画等八大系列近千余种产品。采用黄菠萝、水曲柳、山槐、兴安子楸、山桃、丁香等木材的剩余物，利用不同树种的色泽和独特的纹理，镶嵌与雕刻工艺相结合，将工笔彩绘等工艺融为一体，精工细做而成。

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友好的薄木镶嵌画开设了专柜，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还远销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李景才告诉我，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时，黑龙江省政府赠送香港特区政府的礼物“紫荆归春”花瓶，就是伊春一位叫李玉祥的人制作完成的。“紫荆归春”花瓶主体制作现场在友好林业局，整个花瓶用了两万个核桃。这些核桃是从 3 吨原料中一个个精选出来，再一个一个切割出最佳片面，然后挖出切片的核瓢和杂质，经过消毒和防虫处理，打磨光滑，制作成瓶。

山核桃是一种野生坚果，在林区，由于山核桃外壳极其坚硬，除了黑熊食用外，几乎无人问津。

李玉祥曾当过林场场长，对山核桃颇有感情，山核桃的结

构、纹理和硬度只消瞥一眼就能了然于胸。在别人的眼里，山核桃就是山核桃，而在李玉祥的眼里，山核桃却是具有特殊价值的艺术品。

树头、枝丫剩余物过去在人们的眼里一钱不值，烧火都不愿去用，如今却身价倍增，每吨活性炭的价格为 7000 元，可比木炭增值一倍多。

非林脱木项目在五营林业局也方兴未艾。1993 年，五营林业局的一位干部，获得复旦大学科技开发公司研制出新型万能塑料编织袋生产线的信息。领导鼓励支持这位干部下海创办私营企业。林业局有关部门为他解决了厂房、设备和流动资金，很快，这家企业即投入生产，加工的编织袋销往全省各地，年产值超过 400 万元。

最早陷入“两危”困境的森工企业的乌马河林业局，经过改革、调整，形成了较为合理的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布局，率先突出重围。1995 年，全局非林替代产业和木材深加工创造的效益占综合利用产值的 80%，其中非公有经济产值占全局总产值的二分之一以上。全局半数职工分流到了替代产业或自负盈亏单位。他们不再吃林业局的“皇粮”，却也无一人因失去“铁饭碗”上访。

乌马河林业局选择了跳出林业救林业的路子。1990 年，林业局向各林场、经营所提出每个场、所每年必须开发一个产值超 30 万元的替代产业项目的要求。当年完不成的亮黄牌警告；两年完不成的，场长、书记就地免职，不准易地做官。

由于这一决策符合局情，适应了干部职工脱贫致富的愿望，种、采、养、加等各类替代产业在全局迅猛发展起来，远远超过“一场一品”的规模。

如今已经成为乌马河局支柱产业之一的折叠式旅游木凳，年

产量超过 100 万只，产值 1000 多万元，相当于全局木材生产产值的三分之二。

西岭林场，坐落在乌马河局一条沟系中。这个名不见经传、很不起眼的小林场，却是当今在市场上很抢手的旅游木凳的发源地。80 年代中期这个场已基本无林可采，全场 1380 口人每年只有 3000 立方米抚育任务。林业局每年拨给场子的生产、营林费用只有 60 万元，不够职工开 4 个月工资。

困境中的西岭人 1990 年开发出完全利用伐区剩余物加工制造的旅游木凳。由于市场摸得准，木凳打出去后便在远近叫响。

摆弄惯了大木头的西岭人面对这小木凳陷入了沉思：过去木头有的时候，咱没想到用木头加工成产品卖。今天，紧盯着市场琢磨道道儿，就有出路。

产品由大变小，西岭人的思路却由窄变宽。

在西岭林场，职工下班后，还把木凳散件带回家，用砂纸打光组装。每只工费 1.7 元，熬点夜，每天能干四五个。每年约有 3 万个木凳在家庭组装。青年女工每月平均收入可达四五百元。

只要在市场上畅销，林区人就会加紧加工，争分夺秒，赚回钞票。过去喊山号子的嘹亮声音，现在已变作暗中与市场上的竞争对手的叫板。

林区已告别了大手大脚的时代，他们也学会了用市场经济的眼光来审视森林，审视林区的一草一木。

把木材所有的东西都吃干榨净——不管是树枝、树杈、树皮，还是锯末，只要还有纤维成分，就用智慧把它变成产品，创造出高附加值的经济效益。

关于森林的争论

1999 年 6 月，中央电视台《科技博览》节目制片人丁广师，通过国家林业局宣传办一位朋友找到我，叫我为一部三集的电视片撰写解说词，是写林业的。我说先看看你们拍摄的素材画面吧，于是，就猫在制作间里看了小半天。看的过程中，我强烈地感受到天然林与人工林的差别竟是如此之大，我甚至产生怀疑，人工林还能算是森林吗？至少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森林。

作为记者，虽然从事了十余年的生态报道，但我承认，我对森林的认识还是相当肤浅的。

实际上，森林是一个生态系统概念，绝不仅仅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些树。

在森林群落中包含着许多生物群体，它们各自占有一定的空间和时间格局，通过生存竞争，吸收阳光和水分，相生相克，捕食与被捕食，寄生与被寄生，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构成了一个稳定平衡的生态系统。

最早把森林视为生态系统的，是德国林学家穆勒。1911 年，穆勒说：“森林是个有机体，其稳定性与严格的连续性是森林的自然本质。”

虽然当时这一概念尚不十分清晰，但这一思想的提出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带来了全新的思维，并在德国林学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重商主义的森林收益代表人物恩特雷斯认为，穆勒的学说是学院式的东西，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他说：“我坚持认为，森林的首要使命是给拥有者带来现金收入，在经济中充分发挥作用，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穆勒反击：“林业工作者的职责不仅仅是关心木材，而是要关注更多的方面。”穆勒把自己当初没有说太清楚的森林的概念，又进一步作了阐述——不应把森林看成是木材制造厂，而应视为是土地、植物和动物的融合，是持久的生命共同体，是自然的森林。

另一位不满现代林业的林学家嘎耶尔则干脆说：“人工林看起来像森林，实际上不是。”他对德国林区当初的皆伐作业方式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说，这简直是一种灾难——“我们背离了自然之路。只有从这里出发，经受自然的教育，我们才可能回到正确的道路上。”对于皆伐作业问题，一位与嘎耶尔并不相识的林学家阿恩特说：“人们不得不承认，国家和个人常常如此行事，似乎今后再无日子要过，也再无人要生存，他们在几年内挥霍尽几百年积累的财富，而这些财富本应是留给子孙们享用的。”他说，“如果说我们不再需要用干木材供人取暖，那么我们就更需要这些绿意盎然、青枝滴翠的森林来温暖人的内心。”

针对森林里松鸡的不断减少，鸟类学家也开始痛斥现代林业，一位叫雅克尔的鸟类学家写道：“松鸡极为厌恶文明与一切人烟，它有许许多多天敌，较之所有天敌对它更为有害的，是如今我们深入森林的脚步，是大面积皆伐取代以前普遍采用的择伐，是大面积培育树种单调，同龄的茂密林分……”

雅克尔指出：“德国现代林业不喜欢腐朽、空心树干，而猫头鹰、啄木鸟、寒鸦、秃鼻乌鸦、穴鸽却需要它们。”

德国林学家的争论是富有成效的，皆伐作业方式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停止，取而代之的是谨慎的择伐作业方式，大木头的声音被彻底赶出了林学界，森林生态思想和森林美学精神成为德国林学界的强音。

林区的命运

当中国大规模开发林区的时候，是不会听到德国这些声音的。新生的共和国需要的是木材，而不是专家学者的喋喋不休的争论。

中国林区的采伐方式经历了这样一个历程：拔大毛——皆伐——择伐——禁伐。

我国重点国有林区有 135 个林业局，主要分布在东北、内蒙古及西南的广大山区。国有林区作为我国最大森林资源后备资源培育基地和木材、林产品供应基地，一直承担着国家商品材供应任务，建国以来累计为国家提供木材 21.6 亿立方米。

东北国有林区经过几十年的采伐开发，森林资源发生了结构性危机，成熟的天然林面积已由建国初期的 1200 万公顷减少到目前的 560 万公顷，森林蓄积由 20 亿立方米下降到 5 亿立方米。

原始林是天然林群落中最珍贵的部分，然而黑龙江林区只有在小兴安岭的五营尚能看到原始林的景象。

伊春市委书记王利民建议我，一定要看看那片原始林，他说，过去的林区就是那样子。

那片原始林共有 18 万公顷，为我国现存最大的最完整的原始林。林区大都是地带性顶极植被，以红松为主的针阔混交林，树种除红松外，还有云杉、冷杉、水曲柳、胡桃楸、黄波罗、榆、杨、槭、椴、桦和蒙古栎等，森林蓄积量 573 万立方米。

林中野生动物有东北虎、黑熊、飞龙、野猪等近 700 种。

60 年代至今这里一直是中国林科院开展红松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的基地。当小兴安岭腹地的原始林在斧锯声中几乎全部消失殆尽的时候，惟有这里意外地保留了下来。

我国著名森林生态学家王战教授说：“保护十万亩原始林与营造十万亩人工林是绝对不能等同的。”

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评价人工林，生态学家一般均持否定态度。因为当前的人工林已经和正在发生严重的虫害，且有遗传单一性的危险。

营造人工林普遍强调“集中连片”——大面积人工纯林的大量扩展，使得天然物种的数目剧减，而人工林本身也出现近交和共祖现象。

著名林学家王明庥慨叹：“怎么可以一方面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合成新基因，另一方面又允许自己毁灭大自然留给我们的丰富的基因库呢？”

在一个地理区域中，最少受人类干扰的、最古老的森林称为原始林。这是一个模糊的、相对的、缺乏数值度量的概念。但也可能是最易判断、最具有实际意义的。

生物多样性理论认为，原始林具有三个层次：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原始林包含了该区域中生物种类的组合、生物与环境间相互作用过程以及经受干扰后的演变过程的最为完整的记录。正如气候顶极类型提供的当地植被完整的演变历史那样。这些生态过程，是从人为干预下生长时间较短的人工植被中无法获得的。

作为进化和适应基础的遗传多样性，也同样只有依靠保存那些未经人为筛选的原始林群落才可能获得。

原始林中巨大的老龄树林和各种年龄树木以及枯立木、倒木和深厚枯落物层共同构成的“原始”景观不仅提供了多种类型的“栖息地”，成为保护多种动物所不可替代的基本条件，而且，从人们日益增长的“回归自然”的需求来说，原始林又具有它无可比拟的生态价值。

据说，林学界目前在原始林的如何定义上仍存在争论，在作为基因变异的储存库究竟应保留多少大面积的原始林上也同样存在不同说法。有人认为：几千株树就足以建立有效基因库，即能够保持自身更新能力的群体。也有人认为：在一些情况下，几百公顷的森林即可满足这种需求，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会需要保留几千公顷才足以取得生态保留地的目的。

森林为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居场所、隐蔽条件和食物来源，从而决定了森林内野生动物种类多和数量大。在我国已知 500 多种兽类和 1200 多种鸟类中，有 60% 的兽类和 70% 的鸟类常年居住在森林里或一年中于某一季节在森林中度过。

但是每一种动物对生境都有不同的选择。小兴安岭兽类以林栖型为主，这类兽类约有 40 种，占该地区兽类总数的八分之五。可见小兴安岭兽类生境类型主要为森林生境。但是不同类型的森林栖息着不同的动物，棕熊、黑熊、马鹿、野猪等喜欢栖息在针阔混交林或阔叶林中；细嘴松鸡、貂和熊多栖息在针叶林中。

即使原始林中那些枯朽的老树也不是废物。林学家们的研究表明，枯朽的老树不但不危害中幼龄树木的生长，而且在维护森林自然生态方面，还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只有父母子孙的生存，而没有爷爷奶奶的存在，并不能算得上是一个完整的人类社会，而森林树木，同样是一个老中青幼连结着的群体，正因为有枯朽老树的存在，才意味着一方森林的生长有着不同寻常的历史，才构成了完整的自然生态。老树又是一个地方适生树种的见证者，没有老中青幼的结合，而纯一轮龄的树木，不能算得上完好的森林。专家告诉我们，枯朽老树，有的已经失去了生命或失去了生长能力，根本不再孳生与传播病害。它们虽然暂时站立林中，占据着一定位置和空间，但并不妨碍周围幼青壮树的生长。同时它们那逐渐枯腐的植株，正是可以作为养料源源不断地

供给新生命的萌发和生长的。恰恰是因为它们衰枯的木质繁生着大宗的天牛幼虫，才使得啄木鸟获取了更多的美味佳肴。啄木鸟是为森林而创造的，它有拥有自己森林的权利，而森林也有拥有自己啄木鸟的权利。没有啄木鸟，森林就缺少一种属于自身的生命因素。

枯朽的空筒老树，还是紫貂、青鼬、艾虎、花鼠、灰鼠、鼯鼠等兽类和原生蜜蜂栖居的巢穴。大空筒树是黑熊蹲仓冬眠的极好场所。就是虎、豹、猢狲也常常借助于大树窟而栖身。

据说，加拿大和瑞典等国，还制定了有关保护衰枯老龄树木的法条，采伐中，保留一株老龄空筒树，尚能得到一定的奖励，而无端伐掉一棵枯朽老树，还要受到一定的处罚。其目的就在于保持森林中各种鸟兽昆虫的繁育栖息环境免遭破坏和维护自然生态系统平衡。

森林按其自身的生物、生态学特征有自然发生、发展、衰亡和再生的规律，而这种自然演替是通过种群间的竞争，在自然淘汰中实现的。

大兴安岭火灾后的森林，与火灾前的森林是完全不同了。这是一个新的森林生态系统，毕竟各类乔木的种群数量和比例发生了变化，离开的大型动物也许不会再回来，也许有更多的大型动物迁徙到这里，这是个没准的事。

生态系统的自然演变是生物进化的自然过程。

它会在打破旧的生态平衡中建立新的生态平衡，美国 1946 年于基尼岛进行原子弹爆炸试验，把岛上一切动植物全部毁灭成焦土，但是 16 年之后，前往考察的专家们发现，这里又是一片青枝绿叶和鸟语花香。

一位林业局长告诉我，林区林区，林区最适合生长的东西就是林子。林子采没了，可林子的根还在，深根浅根都在下面猫

着呢。其时，真正的林区根本用不着出傻力气造林。他用手指了指脚下的防火公路，“你看，这公路上的树都呼呼猛长，沙子压也压不住。”我一看，可不是吗，路面上拱出好多青翠的幼树。

林区大禁伐后，公路上很少有运木材的卡车来来往来了，寂静取代了喧嚣——而那些能量积蓄已久的根，便在一场透雨之后睁开新绿的眼睛，并用力拱出地面，占据着一方属于自己的空间。

有道是：“春根能够冲破紧锁的门户。”

天然林的自我恢复能力超出我们的想象。

保护天然林最好的办法就是封山育林。在天然林采伐迹地上人工造林是一种徒劳无益的举动——只要原生树木的根系没有被毁垦成农田，只要封山育林的措施科学、得当，给它们充分的喘息时间，一般十余年之后，年轻的天然林就可以恢复创伤，郁闭成林，达到森林群落的完好状态。

我们必须认真而理智地审视自己的行为。

拼命采伐森林资源，盲目地发展经济，不考虑可持续利用，那么，这个社会不是在前进，而是在走向衰败。

我们不要因为自己没有去采伐森林，破坏生态环境就有理由去责怪林区与林区人，因为正是我们无休止的欲望，才促使他们采取了不顾一切的采伐行为。

一位哲人曾说过：经验的获得总是晚了一些，当我们知道某一经验有用时，实际上它已经没用了。

但对保护天然林来说，我们立即行动起来或许还为时不晚。

林区的命运取决于森林，而森林的命运取决于林区人自己。

一 号 工 程

天然林保护工程是目前我国最大的生态建设工程，又称天字号工程，一号工程。

我国森林总面积 13370 万公顷，其中，天然林面积 8727 万公顷，集中连片分布于长江、黄河、松花江等大江大河源头和东北内蒙古国有林区。

从天然林分布情况和所处生态地位所发挥的生态作用看，这些地区的天然林资源能否得到有效保护直接关系到各大流域乃至全国生态环境的改善，甚至对今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

全国林区人口 500 余万，林区林业职工 150 余万，到 2000 年，将有 121 万职工转产或分流下岗，有 65 万职工由“砍树人”转为“种树人”。

社会上有一句话：天保工程是 1998 年的大洪水冲出来的。事实上，了解内情的人知晓，早在 1996 年 10 月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视察四川西部国有林区后就指出：“上游植被不保护，三峡水库用不了多少年就被淤平，修多少水库都没有用”，“现在进口木材并不贵，外汇拿得起，为了保护我们的子孙后代，值得花这点外汇”，“要少砍树，把森林老虎请下山。”

同一年，在听取林业部徐有芳部长汇报四川森工和生态型国有场圃困难时作了重点指示：“关于四川、云南森工问题要统筹考虑，尽量减少砍伐，把减下来的人员转移到营林上来，主要从事造林、护林等工作。你们先提个方案报国务院。关于东北森工问题，你们再作一下深入研究，向国务院写个报告。”

同一年，在对《林业部关于解决特困国有林场和四川、云南森工有关问题的请示》（徐有芳部长信）的批示中朱■基说：“请春云、家宝、俊生同志核报泽民、李鹏同志。泽民同志批来‘国有生态林场困难’一文，并看到电视中银川局沿线森林砍伐殆尽的报导后，我即找徐有芳同志商量，并商扶贫办，同意从扶贫资金中拨出一部分帮助特困林场发展生产、解决困难。如果扶贫资金有困难，财政部在年度中予以支持。”

1997 年 4 月 18 日，姜春云副总理在听取林业情况汇报时指出：“要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认识林业在生态环境建设上的地位。环境问题的根本是林业问题”、“要将天然林保护、国有林区发展纳入整个国家生态体系建设来考虑。”

1997 年 7 月底，对森工企业减产转产问题，朱■基副总理指出：“森工企业转向营林事业的方向不可动摇，势在必行，关系子孙后代。”

1998 年 3 月，刚刚任国务院总理不久的朱■基在对《林业部关于报送“重点国有林区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实施方案”的请示》中批示：“请财政部先与林业部协调，然后国务院再开会。”

1998 年 3 月 25 日，温家宝副总理在宣布国家林业局领导班子大会上讲话指出：“当前的林业工作，要真抓好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春季造林，第二件事是森林防火，第三件事是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森工企业的转产。”

1998 年 6 月 20 日，温家宝副总理对国办秘书三局给国务院副秘书长马凯的报告所作的批示中说：“四川是全国重点林区之一，是长江流域主要水源涵养区。保护天然林、营造生态林，对于防止长江上游水土流失、保护三峡工程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拟同意四川天然林保护方案和有关部门的意见，要抓紧组织实施。”

1998年6月24日，朱■基总理作出批示：“同意各方协商一致的意见，可先行启动，早动手，早提供经验。同时抓紧编制全国天然林资源保护实施方案，报国务院审定后全面启动。”

就在林业部《重点地区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实施方案》即将出台的时候，洪水来了。全国人民都把目光投向长江及长江上游的天然林。这时人们才猛然发现，洪水之猛，是与森林资源的减少有关。

此前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为天然林保护所做的一切似乎被人们忽略了。

此间，天保工程已在川西和东北林区先行启动。

1998年7月25日，温家宝副总理对黑龙江省委书记徐有芳、省长田凤山给温家宝副总理和朱总理的信作出批示：“黑龙江是实施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的重点地区，应给予必要支持，尽快启动。建议请林业局商国家计委处。”

1998年8月5日，温家宝副总理对云南省省长李嘉廷给朱总理的信《关于学习贯彻朱总理对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补贴到手，斧锯出手 的批示意见的报告》中批示：“要加快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的进度，加强对天然林保护工作的指导、组织和监督。”

1999年8月。朱■基考察陕西后提出，坚决制止新的毁林开荒，做到树上山，粮下川，这是治理水土流失的关键措施。具体来说，就是16个字：“退田还林（草），封山绿化，个体承包，以粮代赈。”

朱■基在延安看了黄河水利委员会花2500万元搞的一个治理1万亩水土流失的工程，感慨万端。他说，造1亩地，要花

2500 元，搞不起呀！”“黄委会”的人说，我们可以保证 100 年泥沙不下去。朱总理问：“100 年以后呢？”

“黄委会”的人不语。

朱总理说：“我来告诉你，现在植树造林就可以保证 100 年以后泥沙不下来，可以延长水库寿命。你小浪底 20 年就淤平了嘛。所以，植树种草是治本，你那个是治表的。”

说到小浪底，一下又让人想起三门峡。

1957 年 4 月，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1958 年 10 月截流。1960 年，一座高 106 米、长 875 米的大坝横断了滔滔的黄河。

千年泛滥的黄河被制服了。浑浊的黄河似乎开始变清了。

然而，黄河依然是黄河，黄河毕竟是黄河。

黄河不但没有变清，滚滚泥沙还大有淤满三门峡水库之势。蓄水仅仅一年半，就有 15 亿吨泥沙铺在了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里。开始的三年中，三门峡水库的年平均淤积率高达 9.8%。不仅如此，回水倒灌渭河，水库蓄水后，使同流量下的潼关水位抬高 4—5 米，渭、洛、北干流河道拥水，滞洪滞沙，潼关与临潼间的渭河下游河床每年抬高 0.41 米，河床高出地面 3—5 米，已经成为和黄河下游一样的悬河。库区本来就淹没了关中平原近五分之一的宝贵耕地，浊水又溯源淤积侵蚀八百里秦川，致使关中几十万亩肥沃富饶的土地沼泽化、盐碱化。浊水继续西侵，危及西北经济文化中心古城西安。

在下游，本来天然河道的输沙能力还是相当强的，一般每年黄河的 16 亿吨泥沙中，有 12 亿吨输进大海，4 亿吨沉积在下游河道。而三门峡水库的调节，打乱了下游的水沙关系，河道输沙能力减弱了，下沿程淤积加大，河床上升速度加快，据专家测算，到 1990 年，三门峡工程的拦沙结果是：建库前全程淤积，

建库后，花园口一段冲刷，其余都是淤积，并从库区向下游逐渐增大，山东段竟增大了七倍多。洪水威胁比建库前还要严重。此外，三门峡工程的建成加速了下游 900 多公里悬河的抬升，黄河的泄洪能力在继续减退。

1973 年 3 月 21 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三门峡工程是我经手的，不能说是成功的。”

毛泽东视察黄河时看到建成后的三门峡也没有出现“黄河清”的奇迹，沮丧地说了一句话：“不行，就把它炸掉。”

不能否认，谈论三门峡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朱■基总理望着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感慨万端。

他还要建水库，不过，那是另一种水库——绿色的水库。一万亩森林蓄水能力相当于一个蓄水 100 万立方米的水库呢。

总理指出，这是一个愚公移山的工作，必须下定决心，持之以恒。而且这件事刻不容缓，现在再不起步，再贻误时机，今后黄河中下游就更难治理，对不起子孙后代。朱总理说：“我看，对长江、黄河中下游必须下这个决心，封山育林，停止砍伐，谁砍树，就砍谁的头。”

——中华民族怎样才能在这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存下去？现在黄河断流，中国的母亲河没水了——朱总理担心：再这样下去，八百里秦川将来也会荒凉。水土都流失了，渭河被泥沙淤积满了，这怎么得了？总理说：“我算了一下，现在陕西大概还有 10 万平方公里的地方水土流失需要治理。你水利部每平方公里要花 50 万，林业只要花 20 万。一平方公里国家补助 20 万元，10 万平方公里 200 亿。200 亿元我们干 10 年，一年 20 亿元，我看这个钱值得花。干什么？就是植树造林种草——这个事就这么定了。”

一年给陕西省植树种草 20 个亿，这在共和国的林业史上是从来没有的。

随着国家农业政策的成功，农业科技的发展，粮食生产能力明显提高，中国已经从一个缺粮的国家变成一个粮食富裕的国家。粮食库存量大增。为保存粮食要付出大量的仓储保管费用，承担大量的粮食霉化陈化损失。现在，国际粮价很低，粮食要补贴 30% 的价格才能出口，6 毛钱收购的小麦 4 毛钱出口，得补贴两毛钱，国家每年用于补贴粮食就达 500 多亿元。这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而在陕北及西北广大地区的农民每生产 1 吨粮食就要流失 157 吨表土。

朱总理说：“我们现在要求长江、黄河中上游各个省所作的贡献，不是要你多出粮食，而是要你把水留住，把土留住，别往下冲。你这里不往下冲，下边灾害减轻了，增产的粮食比你生产的粮食要多得多，而且成本也低得多。所以，根本的是思路要有所调整。黄河中上游地区不要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生产粮食，主要是治理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为下游治理和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条件。这是为根治黄河奠基，为子孙后代造福。”

过去，林业部门的提法是“封山育林”，而朱总理则在这次考察时把“封山育林”改成了“封山绿化”。

朱总理把国家林业局局长王志宝叫到自己身边说：

“我考虑光绿化荒山还不行，所有山里的空地田块都要绿化，把山封起来，保护植被，人和羊都不要上去了，所以叫‘封山绿化’。‘个体承包’，就是把造林任务承包到户、到人，谁造林、谁所有、谁受益，建立健全责任制，明确造林权益，落实管护措施。这块林地要包给他，他要管护、维护这块林地，将

来围绕林地搞副业，但是不能砍，绝对不能砍。有些速生林可以间伐，要规定一些办法。每家每户承包的山地如何还林，怎么种上树，种上草，也得有个办法。”

朱总理说：“延安这个地区可以搞大面积的飞播，然后封山。飞播时，乔木、灌木、草籽一起来，活不了的，人工再去补种。‘以粮代赈’就是农民减少了粮田，所需的粮食由国家无偿提供。当然，具体办法要研究。情况要核实，你退了多少田，应该给你多少粮食，然后给你粮票户口，不能吃大锅饭。还要有一个严格管理的办法，退的田还得植上树，种上草，你把它荒到那里，还吃我的粮食，那也不行。”

总理提议，这件事中央由国家林业局局长王志宝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共同来做。地方上陕西成立领导小组，组长由程安东担任。总理对程安东说：“你这辈子办好这一件事就行了，上对得起祖辈，下对得起子孙。只要搞好了，就应该给你立碑。我希望你这个‘米袋子’省长要变成‘种树’省长。”

大家想乐，但谁都没有乐出来。因为总理此时的神情是极为严肃的。

总理说：“整个项目要按程序办，要有规划，一切审批程序都要履行，这个项目由计委提，然后报国务院。但今年可以灵活一点，先启动，我们干什么事都得有点机动灵活，今年需要多少钱，报到财政部楼继伟那里，我来特批。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花钱，要投入，为子孙后代、为中国的长远利益是应该花钱的，而且是值得花钱的，要马上起步。我们把这个步子一迈开，年年都这么搞下去，我相信10年、20年，陕北的面貌就改变了，全国的面貌就改变了。但是我估计你钱花不出去，准备工作都来不及，今年花10个亿就了不起了。”

朱总理用手指了指程安东：“安东，花出去了吗？”

程安东乐了：“你给我们多少就能花出去多少，10 亿有 10 亿的干法，20 亿有 20 亿的干法。”

朱总理说：“这要做好多方面的准备，要规划、要航测、要育苗，还有承包，承包就很复杂。如果他根本就没有造林，拿着粮本来吃粮，那还得了。特别要搞好‘以粮代赈’，你不能白拿了我的粮食再去倒卖。黄土高原治理，延安是一个重点。在陕北这么一小块山沟里边，曾经养育了共产党的几万军队。军队要吃饭，不吃饭怎么革命，所以就开荒、砍树烧炭。为了夺取全国的胜利，陕北人民作了重要贡献。现在这个情况，漫山遍野许多地方还是光秃秃的，看了心里很难受。因此，你们要尽快动手，作为先行一步的试点。延安人民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把过去‘兄妹开荒’的革命精神，发展为‘兄妹造林’。在水土保持、绿化荒山、生态工程建设方面，我是一定要投入，一定要保证，就看你们花钱的本事了——绿化荒山的本事，首先把延安的郊区绿化起来，三年以后我再来，没有这个秃头秃脑的，你们能不能保证三年以后延安郊区山上都把树种起来，我这个要求不高吧。”

程安东从位子上站起大声说：“我们保证把树种起来！”

在陕西省委汇报会上讲话时，总理用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结束了讲话。他说：“1991 年我第一次来陕西，主要是清理‘三角债’，1992 年第二次来陕西，帮你们批了一条铁路。事隔 7 年，我 1999 年来，就送你们三个字：‘多栽树’。”

哗——全场响起如潮般的掌声。

同样是在 8 月，在云南，朱总理说云南要实现满山绿色，锦绣花草，青山绿水，一条很重要的措施就是搞好天然林的保护。天然林保护一定要加强力度，要加强堵卡，要坚决保护好。以天然林为原料的中小企业要一律关闭，企业债务由国家冲销，人员

安排原则上由地方负责，实在有困难的中央适当补贴。

在丽江，总理专门听取了五地市的汇报。他说，思茅纸厂，能否不用天然林。天然林保护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到了该下决心停止砍伐的时候了。晚办一天，损失就加重一分。停伐带来的一切问题，关键是经济结构调整，如经济体制改革调整跟不上去，转产就难以实现，不要习惯于老思路、老方法。好多都是遗留问题，但也必须解决。

云南要发展，结构要作大调整，不能光靠烟光靠木材，要发挥多气候带和多种生物的优势，要发挥多资源的优点。过去付出了几万亿的代价，主要是由于生态破坏，植被稀少，因此要大力加强植物保护。实现满山绿色，首先要保护好资源，为此天然林必须停伐。你们说已停伐，我还有点不太相信，但木材生产大大减少了。所以，你们的工作还要深入下去，到林区，到基层，到田头去。

1999年9月，朱■基总理在四川考察时指出，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是贯彻执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他强调，要下决心在长江、黄河中上游地区恢复植被、绿化荒山、保护生态，力争五年初见成效、十年大见成效。

朱■基总理是个颇有个性风采的人物。历史最基本的粒子当为个人的活动。对于中国的西部来说，记录那些最活跃的个人活动对整个历史的描述和分析，意义重大。

当摆在我们面前的西部不是一个大致轮廓，而是一个具体的开发它的决策过程时，不是完全抽象的空洞的理论分析，而是决策人的对自然和我们民族自身充满深爱情怀的思想痕迹时，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忽略朱总理的这次西部之行对未来中国所产生的影响。

目前，国家正在制定《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规划》、《全国防沙治沙工程实施规划》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办法》，并加大了对林业和生态建设的资金投入，调整了全国治理水土流失的总体思路，明确了“退田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基本措施，林业和生态建设面临着从来未有的发展机遇。

没有穷山恶水的现代化。

世界上的现代化国家都基本实现了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现在，绿色的面积在中国西部一寸一寸扩展着。

绿色不仅需要空间上的分布，更需要时间上的积累，我们该向在共和国的土地上播种绿色的人们投去深情而崇敬的目光。

新世纪的脚步无疑要与更多的绿色相伴相随。那句话是对的——当一切结束的时候，其实一切刚刚开始。

世界第一村 ——中国首家罪犯子女儿童村创建纪实

常 扬

新世纪将是新的中国的黎明，贵国为其在历史上的伟大而自豪，为你们进行的事业而自豪，为明天的到来更自豪。在新世纪中，世界可能再次转向中国寻求她文化的活力。思想的新颖、人类的尊严和升华，这在中国的成就中显而易见。在新世纪中，最古老的国家有可能帮助建设一个新世界。

——比尔·克林顿
(1996 年访华时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世纪之交最易勾起幻想的心灵。

人们用最美好的语言盛赞新世纪，用最辉煌的构想设计新世纪，用最强烈的愿望憧憬新世纪……

其实最能代表新世纪、最能体现新世纪的前景和趋势的是儿童。儿童的生命像新世纪一样鲜活，儿童的命运决定着新世纪的未来和发展。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说：“我们并不需要超能计算机来展望未来世界，从我们现在如何照顾我们的孩子就可以

看出下一世纪的大致情况。”

世纪之交的儿童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应该说总体是良好的。经过人类长期的奋斗，尤其是“二战”以后，50 多年的努力，人类保护儿童的意识趋向自觉，儿童的权益已得到普遍地正视和尊重，儿童的生存和健康状况已被世界公认为是评价一个国家先进或落后的重要标准。其标志就是联合国于 50 年前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和 10 年前颁布的《儿童权利公约》，它对儿童权益的关照之细，得人心之普遍，效果之好是任何世纪无法比拟的。

然而，由于战争和灾害，由于歧视或忽视儿童的观念还没有在本世纪消除殆尽，儿童的不良状况留给新世纪的伤疤还很深很深。联合国调查资料表明：发展中国家 2.5 亿 5 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每年有 1200 万儿童非正常死亡；南亚一半儿童健康状况不好，非洲三分之一的儿童体重不符合标准。即使发达国家的儿童也难逃厄运，美国 20% 的以上儿童处于贫困之中。其它国家如俄罗斯 15% 的儿童发育迟缓；中欧和东欧由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和国营社会福利的大量削减，儿童的福利和健康状况更趋恶化。更令人担忧的是，艾滋病这个“世纪瘟疫”正在侵害着少年儿童的身心，全世界艾滋病患者的一半是 25 岁以下的青少年，每 6 分钟就有一个青少年感染艾滋病病毒。未成年犯罪愈加增多和泛滥，愈加低龄化和团伙化。美国一位犯罪学家预测：“未来十年将是一场犯罪的大风暴，原因是十五六岁青少年的作案率不断增加。”

造成儿童不良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父母犯罪导致的子女无人管理不能不说是重要的一点。由于父母犯罪，他们或游荡社会，乞讨为生；或寄人篱下，受尽歧视；或因生活所迫，偷盗抢

劫，走上犯罪之路。遗憾的是，无论是《世界人权宣言》，还是《儿童权利公约》都没有涉及罪犯子女，也缺乏有效的管理办法，罪犯子女成为一个被忽视的空白，成为人类社会中最不幸的群体。

可喜的是，中国填补了这个空白。

1996年6月，世界首家罪犯子女儿童村在中国陕西创建，很快由一家发展到三家；1999年，中国特殊儿童救助中心成立，更大范围地救助罪犯子女的行动遍及全国。

参观过罪犯子女儿童村的各国政府和民间代表团由衷地赞叹：这是中国人权建设的又一体现，这是中国维护儿童权益的超前行动，这是中国文化的特殊魅力，这是中国人的胸襟和气魄。

无疑，罪犯子女儿童村是中国献给新世纪的一份厚礼。

孤 童 悲 鸣

罪犯子女是由于父母犯罪而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得不到烈士子女获得的尊重和照顾，也没有一般孤儿受到的救济和扶助。他们被公众社会忽视，被传统观念歧视，在有些地方，在有些人眼中，他们也成了十恶不赦的罪犯。

罪犯子女的人数也不可小觑。按中国各级法院每年审判的40万桩案件计算，罪犯人数至少在40万以上，已婚罪犯估算为70%，也就是说，每年约有28万罪犯造成28万以上罪犯子女的恶劣处境。那么，累计起来呢？那么，整个世界呢？那是一个何等触目惊心的数字啊！

生活在陕西陇县的文龙、文英兄妹就是其中一例。

他们的生活曾是令人羡慕的。能干的爸爸在外搞建筑，一年带回很多很多的钱，给他们买回村里最鲜亮的新衣、最高档的文具，还买回村里人想都不敢想的风琴；母亲贤惠勤俭，什么活儿都不让他们干，只指望兄妹俩好好读书，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随着 1994 年 1 月 17 日的到来，黑色的日子降临了。

那天晚上，文英已经睡着，文龙躺在温暖的被窝里，看妈妈织毛衣。炽烈的炉火映红妈妈瘦削的脸，闪动的灯光勾勒出妈妈精干的身影。文龙觉着这形象是世界上最完美、最崇高的形象，他全身心地爱这形象……不觉之中，进入朦胧状态，隐隐约约听到爸爸回来了，叫走了妈妈。妈妈衣服敞开，头发松散，准备很快就回来……

然而，妈妈再没有回来。

黯淡的 17 日牢牢地刻镂在文龙心中，他做出了许多猜测：妈妈会不会出远门了？

事隔半年，文龙终于在电视里看到了妈妈。

那是一副何等凄惨、何等吓人的形象！妈妈身体腐烂，面孔模糊，再不是炉火映红的那副好样儿了。

他害怕，他伤感，他咬牙切齿地憎恨杀母亲的凶手。

10 天后，文龙无法接受的消息接踵而来，杀死母亲的凶手竟是他父亲！就在那个恐怖的“1 月 17 日”！

他懵了，11 岁的年纪解释不了这个冷酷的现实，更无法理解人世间绝顶的丑恶。只是从村里人的议论中得知有钱的父亲因为有了新欢呀……

父亲受到法律的制裁后，更严酷的现实向两个孤苦伶仃的孩子袭来。

父亲的家族中因为出了杀人犯，都极力回避杀人犯的儿子，

似乎这样才显自身清白。母亲的亲属把凶杀的仇恨宣泄在杀人犯的儿子身上，仿佛无辜的孩子也成了罪人。

春节来了，兄妹俩像往年那样，去串亲戚，也希望饱一饱干瘪多时的肚皮。然而，竟无一家开门。一位姑姑还凶神恶煞地说：“你俩就死了心吧，我要是看到哪个姓文的敢给你们一口饭吃，我立马掀了他家的桌子！”

往日羡慕他们的村民，眼里全是冷漠与鄙视，没人给一碗热饭，也没人敢来他们的破屋，甚至那些要好的同学和伙伴也瞧不起他们。

他们被人的世界隔绝了。文龙变得孤僻、自卑，乃至有些迟钝，弹过风琴的手握不了笔杆，爱唱歌的口说话缓慢，每说一个字都要做一次很费力的吞咽动作。

文英因为小，也因为有哥哥的保护，她还保留着过去的性格，但“恐怖的17日”一旦在她眼中显现，她的眼睛就射出与哥哥一样的目光：麻木和憎恨。

由于恨，也由于躲避别人的恨，他们退学了。告别了热闹的校园，告别了他们喜爱的课桌。惟有扔在窗台上的书本给他们些许回忆和安慰。

中秋节，阖家团圆，四处飘来一股股肉香。兄妹俩躲在破屋里，忍受着饥饿的痛苦。突然，门开了，先伸进两只碗，又进来步履蹒跚的邻居大伯，碗里的月饼叫人眼馋，红烧肉喷香，两人嘴里直流口水。然而，兄妹俩不敢正视，也不相信在自己被亲戚抛弃的逆境中，还有哪位好心的邻居关心他们。

“吃吧孩子，别呆住了，今天是中秋节。”邻居大伯放下碗走了。

几天后，邻居大伯又踏进这间冷冰冰的破屋，放下半袋麦种，沙哑着嗓子说：“该下种了，把荒芜的承包地收拾收拾，学

学农活，也好养活自己。”

地已荒了 3 年，杂草丛生，野花争妍，蚊虫乱舞。城里的孩子，也许为大自然的丰富兴奋不已。但是，文龙、文英只有忧愁和焦灼，过去，母亲为了让两个孩子安心学习，从不让他们染指农活，而今天……

只有面对现实。文龙抡起镰刀割草，文英挥舞棍子驱虫。一天下来，手磨破了，腰累酸了，回来又没有热饭，兄妹俩懒得做，吞口炒面就睡。

好在土地是平等的，一番劳作，终于有了收获。夏收时节，兄妹俩地里的麦穗摇头摆尾，没一点自卑，像乡亲们一样亩产 200 公斤。

然而，好景不长。第二年，兄妹俩正准备耕地下种时，村长收走了他们的责任田，理由是“罪犯子女无权享受承包制”。

这是哪家的理啊！兄妹俩再闭塞，也知道自己是无辜的，是共和国的公民，有资格享受改革开放赋予农民的权利。强行收回，太无理了！他们理直气壮地质问村长，村长不屑一顾，扬长而去。文英性格强硬，拉着哥哥说：“咱们找妇联去，妇联是保护儿童的。”

当时是 1996 年 3 月，《儿童权利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已颁布多年，也下发到基层妇联。妇联的同志们应该知道“儿童的生存权、劳动权应得到保护”。她们更明白妇联的职责。但她们面对两个孩子的陈述，却甩出一句无理的话：“你们的事，不归我们妇联管！”

也许妇联的同志出于村长同样的心理。在这个远离现代文明的山区，人们的心理依然受传统观念的支配，株连思想根深蒂固：出了杀人犯，枪毙了还不够，非得让他的后代受苦受难，那才解恨呢！

可见，笼罩在兄妹头上的阴影并非个别人所致，那是编织了千百年的网啊，小小年纪怎能挣脱得了……

就在文龙兄妹生活无望之时，王龙兄妹却找到有滋有味的活法：偷！

因为王龙兄妹的母亲不仅给孩子留下罪犯子女的恶名，也遗传了“偷”的基因。

王龙的母亲王忠霞，18岁染上偷盗恶习，一发不可收，24岁被劳教，出来后，与无业游民王虎子结婚。有了孩子，王忠霞打算重新做人，丈夫却不安分，在母子需要他时，不辞而别。

可以想象，没有生活来源的母子生活是何等艰难。

王忠霞不甘于艰难，也不愿劳动致富，她重操旧业，行偷乡里，有时还当着孩子的面……

所以，母亲“二进宫”后，母亲的遗传基因就悄悄地在孩子身上显灵了。

那是妹妹王珍病重之时，6岁的王龙无计可施，便想起母亲的惯用手法，他翻过一道高墙，溜进隔壁的工厂宿舍。双职工正在上班，孩子都去了学校，正是下手的好时机。他放心地偷了十多个空酒瓶、几个硬纸箱，老鼠一样地背到废品站。

所得的9元钱，他一分也舍不得花，全给妹妹买了药。没妈的孩子生命力强，药到病除，两天就下了地，但身子骨依然脆弱。

王龙又翻墙进厂。这一次他胆大了，偷了半麻袋机械零件。收购站的人打开一看，全都崭新锃亮。王龙有些害怕和懊悔，但没料到，还是收了。

王龙为他的英勇行为和大丈夫气概兴奋不已。6岁的他不仅能给妹妹买药治病，还能买回妹妹最喜欢吃的羊肉串。

他的胆子更大，手脚更灵巧，偷的东西也更多。但他决不让

妹妹参与。他认为他能养活妹妹，也希望妹妹不要学坏，这是他王家唯一的一块净土啊！

王珍佩服和崇拜哥哥的行为，母亲的遗传基因也常把她搅得躁动不安，趁哥哥不在，她上街了。街市上人头攒动，色彩纷呈，太诱惑整天关在家里的王珍了，尤其是钻心润肺的烤羊肉味逗引着王珍走上前去。

烤羊肉串摊上坐着几位客人，一边吃肉，一边喝酒，滋味美极了。王珍由不得注目细看，哦，一沓钞票露出客人的屁股兜，仿佛向王珍招手。钱，假若我有了这钱，我就可以自食其力，分担哥哥的忧愁。但突然女孩子的羞耻感又在她心中萌动，她咬咬牙走了。没走两步，她又回过头，那钱仍向她招手，她忍不住这极大的诱惑，便安慰自己，就算是“拿”吧。

哦，“偷”和“拿”的一字之差，使王珍心安理得，也决定了一个4岁的女孩子今后的人生道路……

王龙得知后，冲妹妹发了一顿火。但妹妹“拿”的哲学还是把6岁的哥哥说服了。兄妹俩相得益彰，战绩赫赫，小小的村子拴不住他们了，阴暗潮湿的窑洞容不下他们了。

他们杀向西安。

庞大而美丽的都市灯红酒绿，应有尽有，处处可以“拿”到东西，时时可以顺利得手。没人注意这两个孩子的存在，也没人给他们法制方面的教育。兄妹俩的技巧日趋成熟，尤其是已经8岁的王珍的手灵巧得就像钳子、镊子，轻轻一夹，钱就归她所有，两层楼的阳台，蜥蜴一般地爬上去，居室里的东西随她翻腾，一次得手上千元……

这个时刻，他们想起了母亲。兄妹俩采购了一大堆吃的用的，向女监走去。

王忠霞入狱4年，感情几近麻木，听说儿女要来看她，沉睡

的母性骤然苏醒。她慌忙跑回狱舍，找出梳子梳头，手抖得拿不稳梳子，换衣服时，紧张得纽扣都扣不上。

看见了，终于看见4年未见的孩子，龙儿长高了，说话粗声粗气；珍珍俊了，小脸蛋红扑扑的。真是谢天谢地，我的儿女总算没啥闪失。

王忠霞扒着铁栅栏张望着。

兄妹俩流过积压多时的泪水，高高举起一大包食品：

“妈，快吃吧，这是我俩专门给您买的！”

管教干部接过食品，递给栅栏这边的王忠霞。

王忠霞又喜又愧：“唉，我没管孩子，孩子倒孝敬我。”刚刚止住的泪水又涌了出来。

猛然，她又觉得不对头，神情紧张地问：

“你俩哪有钱买这么多东西？”

“我们……拿的……”王珍吞吞吐吐地说。

“怎么拿的？快说。”

兄妹俩低头不语。

王忠霞是从那一行出来的，她知道“拿”的含义，直觉得眼前一黑，心中翻江倒海。

啊，我王忠霞的一生就是栽在偷盗上。第一次劳教因为“偷”，“二进宫”还是因为“偷”。本以为好好改造，结束这种悲剧，与两个可怜的孩子过安稳的日子。没料到这种悲剧已经在孩子身上延续。什么错不能犯，偏偏犯在一个“偷”字上。这是遗传？还是教唆？王忠霞直感到万箭穿心，罪孽深重……

她扑通一声跪在管教人员脚下，求她把两个孩子送到少管所去，否则，他们就没救啦！管教人员心如刀割。她同情这一家人，也可怜这两个孩子，更理解一颗母亲的心。这里的哪一个犯人不希望孩子平安，不希望孩子成才呢？她们最痛苦，最接受不

了的是孩子步她们的后尘。

但是，管教人员爱莫能助。我们的社会还没有一个救助罪犯子女的机构。谁能保护他们？谁给他们法制教育？为了生存，走上犯罪之路的何止王龙兄妹，他们像一个长长的犯罪后备队正在残害着自身，滋扰着社会……

陈星小名黑豆，一个“黑”字，说尽黑豆的不幸。

这种不幸从他母亲就开始了。

其母韩静庭，11岁为哥哥换亲，嫁到蓝田县陈家沟村。当时社会封闭，她像祖辈的妇女那样，服命了。开放之风唤醒了她做人的意识，她猛然感到她的婚姻是一场交易，她根本就不爱她丈夫。她冲破传统的樊篱，大胆地寻找她的爱。由于接触较多，她爱上丈夫的弟弟……可是，韩静庭寻找的是错误的婚姻，更大的错误还在于，她不懂得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违法杀害了她的丈夫。

她的不幸，家庭的不幸让两个稚嫩的孩子背起。

当时黑豆才4岁，他姐姐6岁，却没了父母，没了吃喝，没了起码的生存依托。

乡党委书记李义荣算得上合格的父母官，他以《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为依据，在全乡招募养父养母：

“谁代养两个孩子，可补助30斤粮，110元钱。”

韩静庭的妹妹迫于情面抱走了黑豆，这不仅因为补助的钱粮在贫困山区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更因为黑豆是个男娃。

黑豆的姐姐一时无人问津。自家生个女婴都想抛弃呢，谁还愿要别人的，更何况这是罪犯的丫头片子。李义荣再做工作，一位村支书出于党性，也出于人道，领走了这个孩子。

韩静庭被枪毙后，陈家开始向韩家宣泄仇恨，代养黑豆的姨

妈自然成为主要攻击对象。

她要养活一家人，还有自家孩子，况且姐姐已经入狱，人走茶凉，犯不上为姐姐背黑锅。

她像退还东西一样把黑豆退还给乡政府。

乡政府的干部讨饭似地抱着黑豆挨户央求。一个星期呀，无一户愿意代养，绝情得连门都不开。

当时，这一带村村修庙，许多人信佛求道。而佛家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道家也提倡积德行善。在一个迫切需要救助、需要行善的孩子面前，这些信仰却都不见了。

一个月后，一个姓李的中年人一瘸一拐地来到乡政府，言称他愿代养黑豆。乡政府的干部喜出望外，忙出来迎接。一瞧，他们的眼睛直了：这是一个身高不足 1.3 米的侏儒呀，满脸怪相，浑身污黑。他本人也属于民政救助的对象，哪有能力代养一个孩子呢？

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总不能让黑豆整天呆在乡政府吧。乡政府咬咬牙，把黑豆交给了这个叫李新新的人。

从此，小黑豆雪上加霜，过着非人的生活。

李新新代养黑豆，并非他动了善心，而是看上了那点补助。作为残疾人，他本有一份救济，但不会料理，还参与赌博，入不敷出。等待救济，又无机会。听说养一个孩子，给 110 元，他高兴得不得了。认为孩子有啥养的，风吹雨淋，不就大了。他就是这样过来的呀。

他也着实寂寞，30 多岁了，还没个老婆，有一个人陪着总是好事。过去，他对正常人的怨恨，对有家人的嫉妒，对命运的不满，只能咬牙切齿地向天、向地宣泄。现在有个会言语、能听话的人代替，何等好啊！

黑豆才 4 岁，走路不稳，爬坡摔跤，然而，侏儒竟让他放

羊。开始，黑豆不懂咋回事，泪眼汪汪地望着他，意思说，我还没羊高呢。侏儒使用鞭子打。黑豆懂了，这就是命，得认！后来，放羊回来晚了，羊滚坡了，侏儒都打。用手、用木棒、用鞭子，哪样顺手用哪样。一次，黑豆在山上放羊，返回时下不来了，一闪失落下山崖。幸亏崖不深，摔掉了几颗牙。黑豆血淋淋地回来，侏儒不是赶快送孩子到医院，还是打……

鲁迅先生早为这种人画过像，他说：“自己被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于是，“他把所蕴蓄的怨愤不是向强者反抗，而是在弱者身上发泄。”

可惜，这种人让小黑豆遇上了。

夜里，侏儒浑身燥热得睡不着，他便把黑豆从睡梦中拉起，或打、或骂、或让黑豆下跪。虐待够了，他才精疲力竭地睡去……

如此非人的折磨，使黑豆从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变成麻木呆板的小老头。偶然与羊在一起，他会复归一点童心，还会发出人的呼唤：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是一个头啊！

受此虐待的何止黑豆一人。

6 岁的代海云，因为母死父囚，与 70 多岁的外婆相依为命，两年后，外婆病死，她无奈到干妈家苟且偷生。干妈嫌她是罪犯子女，轻则赶她住在猪圈，重则打得鼻青脸肿。村里人看不过眼，把代海云送到了敬老院。从此代海云退了学，成为敬老院的一名帮工。她住在一间没有门窗的破房里，随时都可能受到坏人或野兽的侵袭……

还有田松、姜涛及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的罪犯子女的生命都受到严重的威胁。

“救救孩子”已成为刻不容缓的紧迫问题！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万万没有想到，人类中竟有不如禽兽的一类。他们在丈夫或妻子受到法律的制裁后，为摆脱影响，推卸责任，竟然抛弃了亲生骨肉。

为了给无辜儿童伸冤，为了揭开罪犯子女悲剧命运的原因，我们不得不把孔秀玲女士推向道德的审判台。

应该说，孔秀玲女士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原因非要抛弃唯一的儿子万江。无非丈夫犯了罪嘛。她完全可以离婚另嫁，因为孩子她是她的亲骨肉，是无辜的。

然而，她还是狠心地抛弃了，那时孩子仅有3岁。

那天，趁孩子熟睡，孔秀玲横下心找享乐去了。万江醒来，习惯地喊妈妈，没有回应。他翻身下床，用蹒跚的脚步满屋子找，厨房、厕所、阳台都找遍了，没有妈妈的踪影。他跌跌撞撞地跑出门，扯开小嗓子喊：“妈妈！妈妈！”

没有回音。他不死心，便坐在门外一块石头上，歇一会、喊一会……

天黑了，仍不见妈妈回来。爷爷怕外面凉，撑着瘦弱的身子要抱孙子回家。万江在爷爷怀中大哭大叫，乱抓乱踢。爷爷抱不动，便哄孙子：“妈妈到别人家玩麻将去了，回来很晚，咱们先睡。”

第二天，万江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找妈妈，没有，哪都没有。

他把一切气、一切怨都撒向爷爷，他哭闹着。爷爷不好再哄孙子了，只得说，咱们出去找找吧。

找遍附近的大街小巷，没有。万江一路喊妈妈，行人都禁不住回头望望，好心的大娘还送给泪流满面的万江一包好吃的东西。然而，就在附近的母亲始终没看孩子一眼，应孩子一声。

爷孙俩艰难地生活了半个月。万江哭个不停，哭累了睡，醒了又哭。爷爷本来就有病，如此折腾，饭都无力做了，整天都是

开水泡馍。

爷爷只有抱着万江，敲开孩子舅舅的家门：

“把万江放在这儿几天吧，我实在带不动了。”

“他妈都不要他了，哪还有个舅舅？”万江的舅舅胳膊一横，把爷孙俩挡在门外。

万江听到了妈妈的声音，他拼命地向里冲，他舅舅双手一拦，大声训斥：“这是我家，哪有你妈妈。”

万江发疯似地向里边喊：“妈妈……妈妈，你出来吧……”房门遮住了孩子的喊声，也挤压了渴望母爱的童心。

日子长了，万江逐渐适应没有母亲的日子。然而，一踏进校门，站在有父母的同学之中，童年的痛苦又涌上心头，并增加了一层鲜明的对比。他只觉得，低人一等，矮人三分……

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万江常年呆滞的眼睛突然发亮：那不是妈妈吗！尽管，已经过去6年，妈妈变了样儿，但妈妈在万江心里的印记太深了，这些年万江又天天端详妈妈的照片，不会错！

万江小心翼翼地跟上去，想再仔细辨认一下，因为这些年他认错妈妈的事儿太多了。

哦，他认出了舅舅。那个阻挡他进门的男人，万江是永远不会忘的。哦，舅舅在叫“秀玲”这个名字，没错，就是妈妈。他加快脚步，这时，妈妈也认出了儿子。但她没有一点良知的复苏，没有对自己行为的丝毫反悔，也加快了脚步。

“妈妈！”万江的喊声还没有落地，妈妈已慌忙地钻进出租车。万江使劲地追赶着，嘴张得很大，就是喊不出声来……

万江9岁那年，爷爷不幸骨折，显然无法带孙子。一位近亲便接万江过去。他并非出于人道，也没有丝毫怜悯，一心在万江爷爷那套房子上打主意。老人年迈，又卧床不起，没几年活头。死了，孙子就是房子的唯一继承人，而万江还小，房子自然是他

们的。

可惜算盘打错了，万江爷爷家属拆迁户，安置必先付款，老人命都保不住，哪来这笔钱？所以，房子也随着老人的死，泡汤了。

这位近亲马上翻脸，要退回万江。危难之时，万江爷爷的一位老乡收养了万江。这位人家的住房本来就紧张，万江一来，只有赶走自己的亲孙子，他的儿女自然不悦，万江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幸亏苦难磨炼了万江，使他有了维护自己权利的意识，危难之时，他上书当时的西安市副市长张富春。

市长爷爷：

我是西安市报恩寺小学四年级学生。10年前，我刚刚出生，父亲因盗窃罪被判刑20年，现在铜川崔家沟监狱服刑。父亲出事后，母亲离家出走，至今未归。长期以来，我一直和爷爷生活在一起。今年三月，爷爷因病去世。爷爷的老乡张道明爷爷见我无依无靠就收留了我。但张爷爷只是个普通工人，家中儿孙共10多口人，生活困难，住房紧张，我实在不忍心连累他们。

我才10岁，无力抚养自己，还要上学念书，请市长爷爷帮帮我吧！

由于罪犯子女的环境没有改变，即使有一个善良的母亲，他们的悲剧的命运依然无法更改。

马丹两岁那年，父亲因犯罪入狱。母子俩的生活尽管艰辛，倒也相依为命，平静安宁。

不久，灾难轮番向母子俩袭来。先是马丹爷爷病故，接着奶

奶死亡，很快，马丹的姑姑、姑夫双双死于房屋坍塌之中。马丹叔叔受不了接二连三的打击，精神崩溃，成为疯子……

于是，马丹的母亲被视为“克星”，受众人唾骂，乡邻歧视。她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嘲弄、挖苦和指责。处境就像当年的祥林嫂。

不！比当年祥林嫂的命运还惨。因为她的儿子马丹也受株连，被称为“小克星”。小朋友不愿与他一起玩，大人千方百计回避他的身影，只要他在村中走动，就会遭受石子、瓜皮的袭击。

为了保全马丹这根独苗，母子俩只有逃往娘家。脚跟还未站稳，马丹的外祖父、外祖母就被债务所迫，辞别人世。

“克星”这一恶名又移植过来，沉重地压抑着母子俩。他们不敢出门，不敢与人搭话，更不敢下地干活。

马丹小，还不理解人世间的冷暖，压抑就小，母亲受不了，仿佛有一个挣不脱的催命鬼，非要把她逼死。她只有认命。一天夜里，她给儿子整整齐齐收拾好，悲愤自杀，甩手而去……

可怜的马丹啊，仅有5岁，独自背起沉重的十字架……

造成昔日祥林嫂的悲剧，不仅仅因为她的头上压着作威作福的鲁四爷，更重要的是她的心上压着神权和夫权，一句话，传统观念使然。

中国虽然被认为是一个讲究仁爱、礼义的国度，但这些礼义很少恩泽妇女儿童。《礼记》一书中，就讲男尊女卑，忠孝之道，讲得最多的是君主和老人。在“官本位”思想依然浓厚，利益驱动一切的当今社会，歧视妇女儿童的现象，不是常常可以听到和看见吗？

当克拉玛依油田失火时，现场指挥不是先抢救妇女、儿童，

而是高喊：“让领导先走！”这些领导果然踩着妇女、儿童的头逃出险区，结果，288名儿童被活活烧死。北京某校将操场租给汽车公司，当汽车与孩子同时在操场上奔跑时，一名7岁的孩子被压死。1994年春节，鞍山市图书馆管理员白雪洁乘车回家。行至半路，她看见一个凶犯持刀威逼一个孩子，急令司机停车，跳下去与凶手搏斗。孩子得救，她却被砍成重伤，围观的200名群众无一人上前阻拦。事后，她成了英雄，但她为围观者的麻木不仁而心寒啊！

看来，救助罪犯子女的前提，是形成一种尊重和保护儿童的社会风尚，树立人人平等的人权意识，呼唤拯救无辜儿童的人道主义。

这是神圣的，也是艰巨的历史使命！

女 性 疾 呼

应该说，具有了人权意识的人类是极力想救助罪犯子女的，但由于维护儿童基本权利的任务太重，还无力顾及这个特殊的角落，即使顾及了，也仅限于个别国家的局部措施。如加拿大等国设立的“监护人”机构，即以监护人的方式代养没有父母或父母犯罪的孩子。从整个世界来讲，全面的系统的专门救助罪犯子女的组织还没有。

而在20世纪末，在遥远的东方古国，一位普通的中国女人，一位善良的充满着人道精神的女人最先走了出来，她及时地发现了那些被遗弃了的孤苦无助的儿童，担当了抚养、教育这些罪犯子女的重任。

她叫张淑琴。

张淑琴不是专事慈善、腰缠万贯的富翁，也不是主管儿童工

作的妇女干部，更没有服刑离开子女的痛苦经历。

那么，她凭什么挑起神圣的使命？凭什么产生不凡的创意？又靠什么把这个创意实施得轰轰烈烈呢？

自然，这与她时任陕西省监狱局《新岸报》的记者职业有关。但是职业仅仅给她提供了接触这个领域的外在条件，内在原因还在于张淑琴是中国妇女善良美德哺育出来的女性，是饱经磨难、有养儿育女体验的中国母亲。

女性较男性而言，更富人道。人类战争犯中，无一位妇女，而从事慈善、救护、扶助的多是女性。作为东西方慈善象征的圣母玛利亚和观世音菩萨都是女性形象，若换就一副男子面孔，就有些滑稽了……

母亲酷爱和平。战争岁月，她们诅咒流血、诅咒残杀，祈祷人类所有的儿女安宁；战争结束，她们的形象又成为和平的雕塑，耸立在世界各个城市。

妇女和儿童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她们都作为弱者被人类歧视也被人类保护。联合国关于维护人权的条约中，妇女多与儿童并列；许多国家的妇女和儿童工作常常合为一体……

正是这种女性和母性使张淑琴多了一份善良，多了一份爱心。

哺育这种女性的乳汁，最早来自张淑琴那个女性色彩浓厚的家庭。

张淑琴的家史里，男人短命且软弱，最长的没活过 50 岁，女人都长寿能干，挑着张家的大梁。张淑琴出生时，一家中竟有 4 位女性，男性仅父亲一人。

奶奶、姥姥、母亲、姑姑都是传统的中国妇女，忠厚善良，忍辱负重。尤其是对张淑琴影响最大的姥姥更是典型的吃苦耐劳型的女性。

张淑琴的姥姥佣人出身，干了一辈子侍候人的活儿。嫁到张家时，唯一的嫁妆是洗衣板。丈夫死后，她随女儿过，操持全家6口人吃饭。那年月，粮食匮乏，多靠瓜菜填肚，每顿饭要煮满满一锅萝卜、白菜。70多岁的她能自如地把2尺大锅端上端下。槐花成熟了，她爬到高高的树上摘；野菜长大了，她漫山遍野地挖。自然，她最疼爱外孙女。张淑琴小时候奶水不够吃，她把粗粮细做，玉米面搅团依然把外孙女养的白白胖胖。外孙女上学了，每周从家里背一次干粮。她用萝卜缨子拌玉米面，烙成小饼，再暖些柿子，把外孙女的书包装得鼓鼓胀胀。

为了使外孙女安心上学，姥姥增多了爬树的次数，她摘槐树、桑葚，换回白面、豆腐渣，改善外孙女的伙食。张淑琴坚持读到初中毕业，姥姥却累得病倒了。按她硬朗的身板，吃几副药就会痊愈。但她舍不得花钱，硬挺到闭眼。临终，她留给外孙女一句话：做一个善人……

张淑琴的婚姻也承续了中国妇女的传统命运：早婚。19岁那年，由于生活所迫，不懂爱情为何物的张淑琴仓仓促促嫁给一个军人。从此两地分居，她带着孩子插队，一时成为知识青年中的奇观。上工，她把孩子拴到窗户上，任孩子在炕上“自由”驰骋，待她回来，孩子的手脚被炕席磨得鲜血淋淋。有时孩子挣断绳索，爬到院里与乱窜的猪玩。饿了，竟噙着猪奶习惯地吮吸……

孩子大了，张淑琴招到县医院当护士，整天下乡巡诊，仍没时间守着孩子。那天，接生遇到难产，折腾到半夜，显然赶不回去了。第二天，进了家门，孩子躺在床上，汗和泪抹满小脸，嘴唇干裂，浑身发烫。一查，出麻疹了。张淑琴想给孩子喝口水，暖水瓶是空的，炉子是灭的。她抱着孩子直哭：妈妈再不离开你了。没料到，当天夜里就有人敲门，一个村长的孩子出麻疹了。

张淑琴记得，这个村长的两个孩子都死于麻疹，家中仅留下最后一根苗，若不去，后果不堪设想。她征求孩子的意见，孩子能说什么呢？只是哭。张淑琴咬咬牙，走了……

那些年，张淑琴接生过上百个孩子，为上千个村民救死扶伤，唯一拖欠的是自己孩子的感情。但是，正是这样的经历成就了张淑琴博大、宽广的母爱！

忘不了张淑琴当《新岸报》的记者时，她接触最多的是罪犯。善良的心使她不可能以旁观者的身份应付差事，而是以诚恳的态度和满腔的热情把犯人当人看。于是，犯人也视她为朋友。隐秘的内心愿意向她敞开，深藏的痛苦愿意向她倾诉，张淑琴发现犯人也有人的需求和欲望，即使表面再阴冷、再残忍的犯人，内心世界也富有人性。其中最丰富最善美，也最脆弱的就是恋子之情。

由于孩子安置不当，他们有后顾之忧，自然忧愁、烦躁，乃至产生对抗情绪。女犯绝望者，自杀；男犯胆大者，越狱……

记得采访一位因表现好而减刑的犯人。开始的谈话沉浸在立功受奖、感谢政府的愉快情绪中，但当问到犯人的家庭状况时，犯人蓦地沉下脸，眼眶湿了，声音也沙哑了：

“不怕你笑话，我妻子也坐牢了，5 个孩子扔给他奶奶。老人年过古稀，连自个儿都管不了，还能管孩子？……”

犯人泣不成声，张淑琴递给他一杯水，犯人抿了一口，又说：“孩子只有退学，在家劳动，大女儿积劳成疾，又没钱治，瘫了……前不久……才死……”

犯人实在说不下去，趴在桌上抽泣，张淑琴抹一把自己脸上的泪，劝慰道：“别难受，我代你回去看看孩子。”

第二天，张淑琴来到女监，对那位犯人的妻子说了自己的想法。面对一个身着警服的记者，女犯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战

战兢兢地问：“真的？”

“我都安排好了，今天就去。”

女犯慌忙跑回狱舍，拿来一个布包，打开。几条裤头、袜子和两双小鞋展现在了张淑琴面前。她掂在手里，觉得沉甸甸地，这里含着一个母亲多少心血和思念啊！

张淑琴背上包，要走，女犯又要回，重新打开，拿出针线，把一枚没钉牢的扣子细细缝好，这才放心地交给了张淑琴。

张淑琴风风火火地赶回家，找到女儿小时候的旧衣服，塞进犯人的布包，马不停蹄地奔赴犯人的家乡。

到了目的地，一个现代化的村庄扑面而来，楼房鳞次栉比，装饰时髦讲究，打听犯人的家，一条土路把她引入崖下，崖面上挖了几孔破烂不堪的窑洞，与刚刚看到的景象恍若隔世。

窑门锁着，看热闹的孩子喊：老奶奶带着四个孙子割麦子去了。寻到他们的麦田，第一个撞进张淑琴视野的是6岁的小男孩，他扛着一捆与他差不多高的麦捆，上身赤裸，见生人过来，抬头傻笑，露出还未换尽的乳牙……

又过来一个扛麦捆的女孩子。她不敢正视生人，头弯得很低，使劲用麦捆挡住衣不遮体的上身，张淑琴只能看到两只穿着凉鞋的小脚，鞋的颜色不一，右红左绿，都绑着线绳……

向麦田里展望，更惨烈的情景跃入张淑琴的泪眼：老奶奶仍佝偻着身子，伸出僵硬的胳膊，一镰一镰地割。没几下，她就跪着，两个膝盖轮换向前移动。两个孙女也在割，低矮的个头湮没在麦田里，站起身，才能看到晃动的小脑袋。他们用拳头使劲敲打酸困的腰部，其中一个孩子的左手还打着绷带……

张淑琴实在看不下去，她走过去，扶起老人家，拉过孩子，说明来意，拿出捎来的衣物。孩子们见物如见人，哭得昏天黑地，撕肠裂肺。老奶奶直叨叨：“唉，这都是罪，大人造的罪，

让孩子们受。”

张淑琴劝慰一番后，亲自给他们穿上鞋袜、衣服。然后气冲冲地奔向村长家，劈头盖脸喊了一通：“你也看到了吧，一个快死的老人怎么带几个孩子？那潮湿的窑洞怎么住人？下雨塌了咋办？父母犯罪，老人、孩子还是你的村民，你得管！”

村长见这一阵势，忙说：“我管，我管，麦收后就给他们修房。”

张淑琴只觉得言犹未尽……

由于女性的柔肠，张淑琴自然与女监接触最多。一次她应邀为女监的少年犯讲课。走进会场，一片黑鸦鸦的小脑袋堵得她心疼，都是孩子呀！最大的仅有 15 岁。她们的神情饱含着稚气，歌声荡漾着童音。张淑琴讲不下去，心中翻腾着一行行沉重的诗句：我走上台/看见一双双眼睛闪烁/这哪是眼睛啊/分明是群星璀璨……

讲完课，正好是孩子们的体育活动，张淑琴感兴趣地留下来观看。一上运动场，孩子们没有听课时的拘谨，更没有受审时的窘态，兴趣复苏了童心：嬉笑、调皮、天真……

她们本来就该这么无忧无虑地玩乐，本来就该享受人生的花季。是什么导致她们成为少年犯呢？经了解，多数少年由于父母犯罪，无人管教，逐步走向犯罪道路。在这里张淑琴特意结识了一位叫王君的女少年犯，因为她的经历太特殊、太复杂了。

王君曾是一位知识青年的私生子，母亲返城时，把她遗弃在公园里，一位善良的老干部发现，抱回收养。她 5 岁那年，养父病逝。养母可怜她，把她带回老家，嫁给一位刚刚失去妻子的干部。不久，第二位养父因车祸身亡。他的子女容不得薄命的母子俩，赶她们出门。流浪几年后，养母无奈与一个无业游民结婚。

这位养父好吃懒做、赌博成性，严打那年，关进监狱。苦命的养母再不想嫁人，但又要养活女儿，工作没有门路，摆摊缺乏本钱，她只有卖淫。自然，她很快步丈夫后尘，入狱受法……

无依无靠的王君还得活人呀。她以盗窃为生，一步步走上犯罪道路……

而就是这个王君让张淑琴伤透了心，也让她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重感。

不久，张淑琴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几句交谈，才知道是王君。她出来啦！张淑琴热情地邀她到家，问她今后的打算。王君没主见。张淑琴便介绍她上服装学校，并替她交了学费。可惜王君浪荡的性格难改，她坐不住，与一个男孩子窜到广州。几月后，王君又来电话，伤透心的张淑琴不想搭理，但听说王君在广州挣了钱，要开发廊。她的善心又来了。不仅高兴地祝贺，还答应参加发廊的开业典礼。那天，张淑琴穿上警服，邀上报社记者，郑重其事地去了。她为王君走上正道感到欣慰。

谁料到，张淑琴再去女监，又碰到了王君。她因吃不了苦，继续行窃，再次犯法……

张淑琴的心彻底碎了……

想拯救的无能为力，拯救的又不争气。视若无睹吧，不是自己的天性和人格。从职业道德、从社会义务、从母爱人性都该为千百个王君做点什么呀！

然而，区区张淑琴能干什么呢？50 平方米的住房能收养几个孩子？几百元的工资又能拯救几个孩子呢？

惟有呼唤社会，惟有依靠众人才能改变罪犯子女现有的生存环境，为他们创造一个遮风挡雨的家。

这个家里的孩子应该既有基本的生活条件，又有受教育的权利。要让孩子们在家里真正地回归童心。

哦，就把这个家取名为“回归儿童村”吧。非凡的构想像婴儿躁动母腹，在张淑琴心中萌生……

冲破血统

人们又是如何看待罪犯子女的呢？

应该说，中国文化最大的特色就是，尊老爱幼，同情弱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历代社会等级制度极其森严。君臣上下、爵位内部、官民之间都有严格的区别，如《礼记》所言：“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一人犯法，更是株连九族，灭杀无辜……

以出身论等级的“血统论”在中国“阶级斗争”盛行和“文化大革命”疯狂的年代里更是登峰造极。“家庭成分”的锁链扼杀了几代英才，禁锢了亿万人心；“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荒唐口号使多少人惨遭迫害，受尽凌辱。至今想起仍让人心惊胆战，后怕无穷……

改革开放一个最大的功绩就是砸碎了“血统论”的枷锁，使人人平等，使心灵解放。但是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并非 20 年的短暂时间所能更改，它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和习惯中。即使人们在观念上把罪犯和他的子女区别开来，即使人们在感情上同情罪犯子女，但在行动上却远远不够。

有部名叫《吴天祥的故事》的电视剧曾经给许多人留下印象。该剧描写的就是一个罪犯子女上学的艰难。他上课，被老师和学生拒之门外。街道办事处主任吴天祥找他熟识的校长说情，这才允许孩子进教室。但学生家长找校方闹事，理由是：我们的子女怎能与罪犯的孩子一起上课？吴天祥四处奔走，教育局长等官员均不接见，连同情孩子的校长也都受到批评……

这个故事形象地表明了人们对罪犯子女的态度，也明白无误地展示了罪犯子女在现阶段的艰难处境。

所以，当创建罪犯子女儿童村的消息传出后，种种舆论就像凶猛的狂潮，大有把这个难得的创意淹没之势。

“烈士子女、贫困山区的孩子都管不过来，竟然管罪犯的子女。立场在哪？”

张淑琴及儿童村的支持者并不惊慌。他们有科学的理论，他们有成功的实例。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稍读些书，或者略有些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东方文化尽管有牢固的“株连”观念，但“泛爱”思想更为突出，它源于3000年前的孔子学说。“泛爱”即广泛的爱，即孔子所言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那么，只要是人都其中，罪犯也是人，何况其子女？！

西方自资产阶级产生以来，平等观念一直是最响亮的口号。被马克思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人权宣言的美国《独立宣言》庄严宣告：“人们在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方面的平等权利是不可剥夺的。”

几十年之前诞生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更代表人类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唤：“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1990年，人类历史上签署国家最多的公约《儿童权利公约》诞生。它更加明确和响亮地提出：“每一位儿童不因儿童或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观点、民族、族裔或社会出身、财产、伤残、出生或其它身世而有任何歧视。”

中国忠实执行《世界人权宣言》和《儿童权利公约》，为此特别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之中没有将烈

士子女和罪犯子女区别开来，更没有说罪犯子女不在被保护之列。

烈士子女和贫困山区的孩子当然需要人们的爱，他们似乎也更更有理由得到人们的爱，但人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忽略那些罪犯的子女儿童，他们也需要社会的关爱，也需要一种健康的环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一种爱的情怀、一种人道主义的情怀。

就是在敌我界限分明的战争年代，共产党人也没有为儿童分等级。就在延安创办以烈士子女为主体的“育红小学”的同时，聂荣臻元帅也在敌占区救助过一个日本战犯的后代。

那是在著名的“百团大战”中，八路军一举攻克日军固守的山西娘子关。打扫战场时，战士在烈火中发现两个日本孩子，大的5岁，小的还在襁褓之中。战士们想，其父惨无人道，死有余辜，其子也不是好种，准备随其自然。但向聂荣臻汇报后，大出战士所料，聂荣臻让人把孩子立即抱到他这里来。仔细查看了孩子的伤势后，聂荣臻把一个难得的梨放在大孩子手里。

孩子有些惊慌，聂荣臻忙用水把梨冲洗了一下，又朝孩子一笑，孩子这才毫不拘束地吃了。一会儿，他又让炊事员煮了稀饭，一勺一勺地喂着孩子……

由于战事紧张，不可能让孩子跟着部队，聂荣臻思前想后，决定把孩子送回日本。家乡尽管没了父母，总有亲戚照管呀。

送别那天，聂荣臻依依不舍地把孩子放在他精心挑选的竹篮里，深吻了一下，又抓起10多个梨，放在篮子四周。聂荣臻刚直起身，孩子突然抓住聂荣臻的裤腿，“哇……”的一声哭起来……

这种仁义举动在日本士兵中引起巨大反响，至今仍是人道的楷模、中日友谊的佳话……

由此，张淑琴有充足的底气给舆论一个响亮的回答：烈士和

罪犯的子女是平等的，创办罪犯子女儿童村决没有错！

张淑琴立即向主管司法工作的副省长和省司法厅的领导汇报。这些在司法战线战斗了一生的领导们深知救助罪犯子女对于教育罪犯和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也正为此事犯愁呢。现在有人主动承担此事，真是千载难逢啊！他们表示大力支持，并称赞这是一个创举，一件维护人权的大事。但地方没有钱，资金困难。

没有地方，儿童村在哪办？没有钱，孩子们吃什么，用什么？张淑琴一下子从亢奋的峰巅跌入苦恼的深谷。她扬头灌进半斤白酒，昏睡过去……

张淑琴是个性格鲜明、喜忧皆形于色的人。高兴时，潇洒倜傥；苦恼时，心灰意懒。她又是个女人，女人天性意志弱的一面有时也让她打退堂鼓。

而每当她有退缩的念头时，她就想起了她的母亲，想起了母亲刚强的身影。张淑琴的母亲，13岁当童养媳，16岁结婚，17岁生儿育女。到张家后，光办丧事就达5次，其中张淑琴的姥姥和父亲去世仅隔20天。这耗去一个女人多少情感的眼泪！丈夫死时，她仅39岁，一直守寡。从未求过人，也从未向命运低头，咬紧牙把三个孩子拉扯大……

于是，张淑琴很快振作起来，寻找新的突破口。她打开记忆的闸门，让一个个结识的人物在大脑中过滤。猛然，一个合适的人选定格了。

他叫郭建华。

汉唐后裔

郭建华称得上是时代的弄潮儿。

他紧握改革快船的缆绳，把一个曾被抛弃在时代岸边的贫困

小村，拉向富裕的大海。人均收入由 1978 年的 131 元跨跃为 1995 年的 5600 元，激增 42 倍，是全省同年农民人均收入的 7 倍，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 5 倍。

行驶在时代洪流里的“小康示范村”像一艘豪华客轮：105 座欧式建筑的小楼，争艳斗奇；宽敞的水泥大道，花草掩映；室内装饰色彩斑斓，现代设施一应俱全。世界银行的官员看后说：它赛过国外老板的别墅；日本农村装备事业访华团给这里留下美好的赞誉：这是世界第一流的村庄。

郭建华顺应时代潮流，兴办的 10 多个村办企业，规范有序，管理科学，人才济济，产品对路，年产值近亿元。他头上的桂冠更是光彩照人，名目繁多：全国乡镇企业家、省劳动模范、省政协委员、市人大常委会……

然而，张淑琴百里挑一地选上他，决不仅仅因为郭建华领导的东周村具备承办儿童村的物质条件；郭建华不负厚望，撑起儿童村的大厦，也不因为他财大气粗，好求功名。这样的富翁多的是。重要的原因在于，郭建华曾是一个刑满释放犯。

想起来就心惊胆战的“文革”时期，万物之灵的人遭到空前的杀戮和践踏。20 多岁的郭建华被莫须有的罪名打成反革命。他说理，无用；他辩解，惨遭毒打。还未待他弄清到底犯了什么法，就在游街示众、百般凌辱之后，囚进空旷偏僻的陕北槐树庄监狱。

一关就是 9 年啊！

9 年之中，正值极左思潮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郭建华能有什么好果子吃？

对这些已成历史的磨难，郭建华很少提及，但是，两件细小的往事却令他刻骨铭心，常常挂在嘴边。

忘不了工伤住院时，与郭建华同病房的一个囚犯行将死去。他含泪给郭建华留下临终遗嘱：“老郭啊，我是马上就要入土的

人了，没什么可惜的，惟有一个心愿未了，我见不到无家可归、受尽歧视的儿子。拜托你出狱后一定替我看着他，我也能在九泉之下闭眼了！”

一次，久别的弟弟长途跋涉来监狱看他，默默地递给他一封信，信笺上出现了儿子歪歪扭扭的字迹：

爸爸：

自从你进了监狱，全家人都遭了殃。村里的人都歧视我们，老师说我是阶级斗争的活靶子，我的学上不下去了，14岁就外出干活。干活的日子也不好过，人家总骂我是狗崽子、反革命。我不服，他们就打我，我和弟弟、妹妹们经常被打得遍体鳞伤。全家人就靠我和娘挣钱，我娘一天才挣两个工分，合几毛钱。爸，你快点回来吧，没爸的日子不好受啊！

想念你的儿子

郭建华如万箭穿心。再大的冤苦委屈，都没让他洒过男儿泪，而看到儿子的信后，他哭得像个孩子。万万没有想到啊，自己的灾难竟给下一代留下这么深重的灾难……

这种经历使郭建华对罪犯子女有了彻心透骨的理解，农民企业家的境界使他能站在维持人权的高度救助罪犯子女。

所以，当儿童村这件善事降临到他的头顶时，他就像找到久久追求的目标，十分坚定地支持它，敞开宽大的胸怀拥抱它！他由衷地对张淑琴说：“我是个被新时代拯救的人，正等着回报这个时代呢，何况儿童村还是个特殊难寻的善事，我干！为了表示我的诚心，也为了增强你的信心，我无偿提供20亩地，为儿童村盖楼，你抓紧筹款吧。”

可是，大款们并非都像郭建华，当他们受到某些舆论的左右

和影响后，原先答应资助儿童村的款不给了。

张淑琴仿佛挨了一闷棍，顿时晕头转向。没钱咋盖楼？咋在喊出去的时间里成立儿童村？

她立即拨通电话，向郭建华求援：

“老郭，还得求你，盖楼的钱黄啦，我看是否你先在村里腾几间空房，让孩子们有个落脚的地方。”

郭建华一时无语。

张淑琴急了，声音大得能把话筒震裂：“老郭呀，你千万不能变卦，你那里一出问题，事全砸了！”

“张淑琴，你不用急，不就几间房吗？村上有现成的。不仅如此，儿童村的家具、用品我也全包了。你一心找孩子吧。”

郭建华放下电话。加快的心跳还没有舒缓下来。毕竟是 61 岁的人了，这几年说话轻慢，做事稳健，早非当年那个愣头小伙。但他心里比谁都急，不然，企业不会上的这么快，“小康示范村”不会一步抢先。刚才接电话时的停顿只不过是在思索哪里有空房子。

让张淑琴一逼，郭建华立即想起那栋小楼：舒适宽大，上下水畅通，足够 20 多个孩子用。房主长期不在，我老郭出面租用，绝对没问题。

他放心地躺下了。

但他怎么也睡不着，孩子们仿佛已经到来，就在他眼前活蹦乱跳。是啊，孩子不是临时过渡，而是长期居住，他们要生活、玩耍、学习，那幢小楼怎够用？必须有 500 多平方米的面积，还得有室外活动场所。

他把全村在脑子里如数家珍地过了一遍。

哦，村上不是刚刚盖起一幢办公楼吗？面积宽敞，样式别致，还紧挨公路。孩子上学，外人参观都便当。只是没装修，按

常规得3个月，而离儿童村开村的日子仅有两个多月，来不及了。

他习惯性地想起了与他共同渡过难关的东周村村民。

关于建设儿童村的村民代表会议在郭建华家中召开。这里没有眼下许多村民会议的懒散氛围，也没有各抒己见的离心场面。

不错，分田到户解决了农民的温饱，使许多人富裕，但由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没有同步，一些农民的自私性依然存在和膨胀。个人存款过亿，而道路不平，学校失修的村子不在少数；“穷庙富和尚”的乡镇企业现象也司空见惯……

但东周村村民不同，他们牢牢保持着陕西文化的古朴和三原故土的敦厚。

陕西自古帝王都。尽管孔孟学派没能在陕西诞生，但其兴盛和作为统治阶级的正宗思想却出自陕西。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有力的佐证。唐代广纳百家，佛、道与儒学争鸣，依然无法取代儒家的统治地位。宋代以后，帝都南移，但恰恰在这个时候，陕西出了个张载。他弘扬儒术，讲学陕西关中，形成以“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为特色的“关学”流派，不但使儒学更富人道，也对明清的民本思想、近代资产阶级“博爱”论产生极大影响。

正因为如此，儒学就不能不在陕西民众中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尤其是附和民情、民风，适于处理宗族、人际关系的忠恕之道和仁爱思想更是彻心透骨。全国土改中，惟陕西地主和赤贫者少，就可见一斑。

三原县地处陕西的“白菜心”，也成为儒学最兴盛之地。明清期间，泱泱长安仅有书院（相如今日大学）一所，而三原就有两所。儒学自然是主要课目。受此熏陶的于右任正是三原人

氏。他对家乡的功绩之一便是创办学堂，宣传儒学。这里出来的许多学生都成为共产党的栋梁之才。

东周村是三原的东北门户，交通发达，交往甚多，民风自古开放祥和，颇通仪礼。解放前没有刘文彩之类的恶霸，也没有杨白劳式的赤贫；“文革”中，稳定太平，绝无文攻武卫式的过激行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集体经济尚存，“小康示范村”便是例证。

何谓“小康”？也是出自孔子之口，孔子云：“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是谓小康。”

这样的汉唐后裔，这样“小康”臣民怎能不以固守的道德规范对待罪犯子女呢？他们齐声对郭建华说：“村长，有啥讨论的，善事么，你说咋干就咋干！”

大楼的装修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村里的施工队来了。义务承包大楼的地面、装修和水暖设备。

村里的个体户来了，免费为儿童村打制 20 张结实耐用的小床。款式也赶时髦，一律席梦思。让做噩梦的孩子在咱东周村做美梦吧！

张叔来了，李婶来了，刘奶奶也来了。抱着被褥，提着碗筷，扛着书刊。

郭军辉两口子踏了几昼夜缝纫机，赶制出 20 套潇洒漂亮的小水手服……

仅仅 58 天啊，就把 500 平方米的大楼装修一新，床铺、灶具、桌椅、板凳全部到位。谁说 90 年代“各顾各”，只要传统的美德不丢弃，中国农民依然大公无私，依然创造奇迹。

他们展开慈父善母般的胸怀，等待苦水中的孩子快快到来……

千里寻孤

真没想到，寻找罪犯子女的第一步竟是蹦蹦车的轮轴碾出的。

1996年4月8日清晨，自愿加入筹备儿童村的刘华伦、周月贵乘班车急驶陕西渭南市，到达后一打听，女犯姜亚珍孩子的所在地距渭南市还有60公里。没有公路，不通汽车，要去，惟有乘本地人称做蹦蹦车的拖拉机。

真是名副其实，蹦蹦车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蹦，平地上蹦如筛糠，凹地上蹦如跳舞。往日她俩见了，绝对退避三舍，但此刻，想想姜亚珍因孩子处境恶劣而焦虑的神情，想想儿童村即将开村急需孩子的形势，她俩还能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呢？找孩子的差事是自找的，自找的不该埋怨，也不会埋怨。于是，她俩在司机好奇的目光中，滑稽地爬上高高的车帮，坐在坚硬的铁板上。车一发动，就开始疯狂的颠簸，时而艰难爬高，时而翻筋斗似的下坡。凸处，车轮翘起，她俩的心提到喉咙眼里；凹处，车轮下陷，她俩的魂滚落在脚下。强烈的摇晃几乎撕裂两副老骨头架子，胳膊腿怎么也不听使唤，随时准备分家。车后的黑烟和荡起的黄土混合起来，形成污浊的雾气把她俩裹得严严实实。沿路三个大坑，水有一尺深，车在洗澡，她俩也在洗澡，溅起的污水从头浇到脚，把一身灰尘和成泥，下车时，浑身硬邦邦，如披上盔甲。

先找到姜亚珍的父母家，迎面一个闭门羹，碰得她俩更加沮丧，坐在台阶上喘粗气。此前听张淑琴念叨办儿童村的艰难，她

们不理解，现在初次尝到了滋味。但不难能是首创吗？能值得拼上老命吗？于是，她俩互相搀扶着站起来，打听到村长家。村长还开明，早为姜亚珍孩子的处境担忧，听说办此善事，高兴得不得了，立即把她俩带到姜亚珍弟弟家。

姜亚珍因杀夫入狱后，两个孩子留在村上，按理本应由住在一起的大伯收养。但弟弟被杀，弟媳自然成为仇人，怎能容忍仇人的孩子呢？伯父理直气壮地赶走两个孩子，并加上一道防盗门，永远与孩子隔起一堵铁墙。两个年龄加起来不足十一岁的孩子，只有四处流浪，得到的多是歧视和凌辱。谁敢谁又愿意照顾杀人犯的孩子呢？惟有人贩子关照他们，人贩子盯了许久，发现同村人对这两个孩子都视而不见，见怪不怪，若拐走，肯定无人追究，也不会有人报案。于是，他轻而易举地拐走了老大……

姜亚珍的邻居探监时，告诉这一噩讯，姜亚珍顿时昏倒。醒来后，她跪在邻居脚下恳求：“求你们做小儿子的干妈吧！他再不能被人拐走了，他是我的命根啊！”

这位邻居也信奉孩子他大伯那种观念，杀人犯的孩子她绝对不会收养。出于邻居的面情和本能的善良，她顺水推舟地把姜亚珍的小儿子推到姜亚珍的弟弟家。

“姐姐毕竟是娘家人嘛。”这种观念使姜亚珍的弟弟的心理得到平衡，他顶着街坊邻居的舆论收养了姐姐的小儿子姜涛。

但姜亚珍的弟媳并没有把自己划为姜族。她依然用孩子他大伯的眼光看待姜涛，很不情愿地为杀人犯的儿子做饭。所以，等刘华伦、周月贵看到她时，她一副不屑的面孔，既不让座，也不问吃喝。谈起姜涛，她的话极其鄙夷：“这娃，跟他爸一模一样！”

刘华伦和周月贵心中一惊，她俩知道姜涛的父亲是何种模样。那是一个霸妻欺妻、无恶不作的流氓，因此，才逼得姜亚珍

怒杀了他。姜涛仅有6岁，怎能说与其父一模一样呢？可见“血统论”的观点在此人身上何等深重！持有这种观念的她又怎能带好姜涛呢？姜涛放学回来了，刘华伦、周月贵打眼一瞧，果然一副狼狈相：都初夏了，仍着冬天的服装，瘦小的黑布棉袄把身子裹得紧紧的，像套着枷锁一般。蓬头垢面，脸似乎就没洗过，惟有一双眼睛里含着怨恨的光，才显出几分亮色……

刘华伦、周月贵更感到带走这个孩子的紧迫性。

如注的大雨洗涤着落满风尘的秦岭，冲刷着整日吵闹的柏油公路。静极了。无人，也无车，惟有雨声独奏。

一辆面包车却不顾险情，冲破雨障，向山头奔来，这不是救护车，也不是缉私队，而是专程从西安到汉中寻找罪犯子女的张淑琴、郭建华及陕西省女子监狱教育科科长高知非等。从出车的时间和人员的配备上，足见这次行动的紧迫和重要。

确实的，前方有两个孩子处境危艰，安全和生命随时可能受到侵害。救人如救火啊！

昨天，他们从罪犯陈素珍口中得知，由于她杀夫犯法，她的两个孩子在略阳县大伯家放牛养猪。每天背着比自己瘦弱的身体还重数倍的猪草在崎岖的山道上盘行，由于人小力单，常常连人带草摔下沟去。猪草不够了，要挨骂，牛滚坡了，要挨打。夜晚，两个孩子挤在一间草房，无门无窗，随时会遭到狼群的侵袭……母亲的梦中，不是大女儿摔死，就是小女儿被狼叼走，陈素珍的精神几乎崩溃，她常缠着高科长想办法。昨天，张淑琴与郭建华到女监，她又声泪俱下地诉说了一番。

决不能有丝毫的耽误！张淑琴、郭建华他们办儿童村就是救无辜孩子于苦海之中，现在有三个孩子正在苦海中煎熬，耽误就会出现意外，就会有违儿童村的宗旨。当天下午四时，他们刚刚

送走参观三原儿童村的法国友人，就风风火火奔赴汉中。

老天也不长眼，车到宝鸡就下起暴雨。一尺多深的洪水沿街流淌，行车如行船。这时候上山等于自蹈凶险。但张淑琴、郭建华都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猛士。创建儿童村，有多少误会流言，他们顶住了。眼下的这场暴雨根本算不了什么。

车也像主人的性格，执着地冒雨前行。车旁塌方不断，泥石流轰鸣；头顶，夜雾和雨注缠绕的秦岭，龇牙咧嘴，甚是怕人。行至凤县县城，店门全关，一片漆黑，打开车灯巡视，连一个问路的行人都找不到。细细端详路标，才知通往略阳的路有三条：一是甘肃两当，直插略阳；二是绕留坝、勉县，再到略阳；三是闯简易公路，抵达略阳。张淑琴和郭建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第一条路，它既稳又快。

调转车头，向西疾驰。很快进入两当。但到杨家店，却遇堵车，一打听，方知这段路属陕甘两省交界地段，因互相扯皮，常年未修，路况极坏。堵车成为家常便饭。只有掉头返回。

二进凤县，已过午夜，车也无油了，但加油站全关门，猛敲，店主才懒洋洋地开门，用城市里已见不到的加油法慢慢悠悠地加了两桶油。车焕发了活力，向沙石路上狂奔。这时雨更大了，把路面的沙石冲击起来，很快形成大坑，越向前，坑越大，车栽进去抛锚了。

掉头三进凤县，已是黎明时分，雨停了，山显得格外秀丽，空气显得格外清爽，街上也有了行人，摆出了小摊。全车人饥肠辘辘，迫不及待地下车就餐。

当天下午，他们终于到了略阳县官停乡。当地司法局长、乡党委书记、乡长等候多时，并设下丰盛的午宴。一下车，张淑琴第一句话就是：“孩子呢？”

“孩子……先吃饭吧。”司法局长欲言又止。

“先见孩子吧。”张淑琴紧追不舍。

“孩子流落到宁强县他大伯家了。”司法局长不得不说实话。

“对不起，我们马上赶往宁强。”张淑琴扭头钻进车里。

又饿着肚皮走完 120 公里，黄昏时分赶到宁强县城。一打听，孩子所住的龙王乡还有 30 多公里。住下休整也属情理之中，况且赶到那里，也无法让同行的电视台摄像。不容考虑那么多，张淑琴、郭建华下令继续走！

到了龙王乡，太阳已经落山，巍峨的巴山沉睡在暮霭中。乡长听此善事，很热情地唤来村支书，共同带路前往孩子所住的陈家山。

“还有多远。”张淑琴有点急了。

“不远，■一道河，爬一座山。”

这里的河曲折蜿蜒，说是一道，实际要■多次。张淑琴穿着一步裙，迈不开脚，走水路如扭秧歌，她索性跳进水中，急匆匆地向前赶。山上全是羊肠小道，刚从河里上来，一路打滑，幸亏张淑琴有下过乡的经历，才不至于摔倒或落入身旁的悬崖。

孩子他大伯和婶娘见来了这么多公家人，不知所措。待张淑琴说明来意，他们才定下神，说了声：“孩子放牛去了。”

“小艳！小芹！”张淑琴焦急地呼喊着孩子的名字，沙哑的嗓音在大山久久回荡。

可能是孩子从未听过这生疏的呼唤，没反应。待她们的大伯喊叫后，草丛中钻出了两个小鹿一样的女孩。小艳走在前，破烂的花格衣服裹在瘦弱的身上，肚脐明显露出，小芹跟在后面，蓬头垢面，裤腿高吊，千疮百孔的鞋藏不住伸出来的脚趾头。

看到这么多陌生人，孩子战战兢兢，额头上渗出汗珠，互相牵拉着手。一股母爱的温情袭上张淑琴心头，她一把搂住姐妹俩，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下来。

“想妈妈吗？”张淑琴和颜悦色地问道。

一提起妈妈，姐妹俩再也控制不住沉积长久的感情，一头扑进张淑琴怀里。

“想，我们想妈妈！”姐妹俩异口同声地说。

“跟奶奶走吧，奶奶带你们找妈妈。你们去吗？”张淑琴抚摸着姐妹俩的头发问道。

“走！”姐妹俩紧紧拉住张淑琴的手，胆怯地望着大伯，生怕张奶奶跟她们开玩笑，过一会儿扔下她们俩。

围观的乡亲凑到张淑琴的耳边说：“快带走孩子吧，晚了会没命的。”天彻底黑了，孩子的婶娘端出油灯，借着灯火，张淑琴让她看了孩子的母亲签署的委托儿童村代养孩子的协议书。

就在这一瞬间，姐妹俩迈开逃脱苦海的小脚，向山下狂奔而去。

又到了让张淑琴吃尽苦头的小河了，她二话没说，背起小艳
■ 进水中……

人生真是一个循环道啊！当年，张淑琴在农村当医生时，整天也背着自己的孩子，恰恰她的孩子也叫小燕，同音异字。每天外出巡医，三岁的小燕把她送到医院的台阶下，一直目送着看不到妈妈。待张淑琴回来，很远处就看到身着红衣服的女儿在台阶下等候，如一面旗帜向她召唤。张淑琴一阵心酸，然后每天把这种对孩子的负罪感寄托到背上，背起孩子，登上台阶。一步、两步，整整八步台阶，一部台阶就是一个年头啊！终于把孩子背出大山……

今天，她又背起了孩子，这是一种更宽大的母爱，更神圣的职责，所以，再沉重，脚下的路再难走，张淑琴都坚信会走到彼岸。

罪犯子女的悲剧来自父母的犯罪，也与冷漠社会的大环境无关系。所以，寻找孩子不仅仅是解救孩子于危难之中，也是一场与冷漠的社会大环境碰撞、较量的激战。更是张淑琴他们宣传、启蒙维护儿童权益的课堂。她们走到哪，讲到哪，呼唤到哪，喊叫到哪！

在高陵县找郭冲三兄妹时，张淑琴看到孩子一身破烂，满嘴南瓜瓢，气得向跟在身后的村支书发起了脾气：“看看这些孩子都成了什么样？偷南瓜、挖红薯，总有一天会变成抢劫的土匪。你们就麻木到这种地步？全村子每人拔一根汗毛，伸一个小指头扶持一下，也不至于让他们如此可怜。”

在蓝田县，周月贵向抛弃黑豆的姨姨大发心中怒火：“你还是她姨，你竟然让一个侏儒收养了孩子。你也知道孩子过的啥日子，你就不心疼，不后悔，不知道收回。还有一点人性没有？我们如不把孩子领走，孩子会死的，你咋交代？到那时，你也逃脱不了法网。”

在西安，刘华伦尽管被万江的舅舅拒之门外，她仍然对着无情的铁门大喊：“你稍有点良心，就会劝说你姐姐回家，孩子不至于没妈妈。你不但纵容姐姐的行为，还为她提供方便，安的什么心啊？告诉你，也请你告诉万江他妈，孩子我们代养了，你好好想想吧！”

郭建华年龄大，他是另一种工作方式。每每找孩子，他揣着《礼记》、《儿童权利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趁张淑琴她们一阵猛火烧过，他文火补上，与愧疚的、良心发现的被训斥者促膝谈心。他讲忠孝之道，讲儿童权利，讲公民义务。

猛火加文火，着实火力暴烈而持久。烧热了多少冰凉的心，烧红了多少冷漠的角落……

超 前 行 动

儿童村的创意者和支持者，善良的人们和呼唤友爱的社会，无辜儿童及其父母急切盼望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1996 年 5 月 26 日，中国首家罪犯子女儿童村在陕西省三原县东周村隆重开村。

猎猎的红旗就像奔流的热血，簇拥的鲜花好似赤诚的心房，四方贵客，八面嘉宾都奔着两个共同、庄重的大字而来：人道！

应该说，和平和人道最富有号召力。无论你是高官，还是平民；无论你是名流，还是常人，都在这面神圣的旗帜下，顶礼膜拜，万般虔诚。

初到儿童村的，不就是 16 个不足 12 岁的孩子吗？但正因为他们是罪犯子女，正因为拯救他们就标志着善良，维护着人权，追逐热点的新闻界来了，百忙之中的领导和各界名流来了。哦，司法部副部长刘■ 也专程赶来了！

她带来部里的祝贺，带来中国政府的声音：“据我所知，由联合国资助的国际儿童村在我们国家已不是罕见的事情。但是，完全靠我们自己社会的力量，并且以服刑人员和劳教人员的子女为对象的，我想东周村这个儿童村在全国尚属首家。应当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它的意义我想已经远远超过这个儿童村的本身。那么，它的成立本身就是对西方有些国家对我国人权状况一再发难的一个有力的回击，也弘扬了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的博大爱心和人道主义的精神。”

对儿童村的成立起了决定性作用的陕西省副省长徐山林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今天是一个非常感动人心的日子，陕西省回归研究会和三原东周村主办的这个儿童村，为父母犯了罪而无

人抚养的这一群可怜的孩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活条件、成长的环境和学习场所，而且对这些孩子进行长期代管，长期抚养，这是一件善事，一件义举，一个创造，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朵新花。”

开村仪式没有限于一般的庆贺，更没有落于俗套的排场，它是借儿童村之东风，掀爱心之狂潮。为此，陕西省民政厅、陕西省司法厅、陕西省妇联联合发出倡议：社会各界，各方人士，积极支持“陕西省回归研究会儿童村”的建立，给无辜的孩子献一些爱心。

为了他们的明天，
请伸出你的手……

儿童村一时成为新闻的焦点和热点。先后有 120 家中央、地方的报纸、电台、电视台对此报道，中央电视台拍摄了 5 部关于儿童村的专题节目，仅张淑琴个人就上了“亚洲名人”、“东方之子”等媒体栏目。他们用人类最美好的语言盛赞儿童村，用人类最深刻的思想评价儿童村：

“创建儿童村，不仅仅是为了助养几十个罪犯的孩子，它更是中华民族美德的生动体现，是人们对真善美的亲切呼唤。”

“创建儿童村，让罪犯的孩子也像其他孩子一样，享有同等权益，是一项富有特殊意义的希望工程。”

新闻的推波助澜造成儿童村的轰动效应。街谈巷议，百姓捐款，名人题词，作家撰文，各类参观者纷至沓来。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 30 名院士，认为儿童村与他们一样，都在攻克人类科学文明的制高点。为了表示他们的敬佩之情，特捐款人民币 1.4 万元。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布赫、蒋正华先后视察儿童村后，大力赞赏，认为这是近几年少有的大事，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中国人口基金会副秘书长于德慧想得更深，说得更绝：“儿童村是中国维护人权的超前行动！”

好一个超前的行动！

面对全世界 2.5 亿 5 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每年 1200 万 5 岁以下儿童非正常死亡，联合国和各个国家都想出许多拯救的办法，为此还专门制定了《儿童权利公约》，并由 187 个国家签署和承认。但细观条约，还未涉及，也无法涉及罪犯子女，自然就没有这方面的组织出现。中国在经济还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能有此创举，实在是惊人的超前啊！

在这种维护人权的超前行动面前，曾对中国人权状况肯定或误解的国家都会发出由衷的赞叹。

法中友好代表团团长埃杜阿尔·贝雷在儿童村留言簿上写道：“据我所知，经济发达国家也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在法国像你们这样代养罪犯子女的儿童村，好像还没有听说过，更多的是罪犯式的儿童村，也就是说所有儿童村的儿童都是罪犯。”

欧洲对华关系代表团团长德卢坦率地说：“欧洲新闻传播媒体报道说中国儿童福利保障非常差，可我在这里看到却是很好，很好！”

在众多的国外客人留言中，我们特别注意美国客人的评价。因为美国政府曾对中国人权状况大做文章，甚至诽谤攻击。事实面前，来自这个国度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又持何种观点呢？

美国官方代表团看到儿童村良好的环境，孩子们健康的身体说：“中国人民了不起！我们国家也有犯罪，也有流浪在街头的儿童，却没有人过问。”

美国环球志愿者队长史达琳热情地写道：“这里的孩子受到的照顾使我非常感动。在此情况下，常常有许多儿童被抛弃。而我却在这里亲眼看到，一个村庄为这些孩子提供了幸福和成功的机会。”

我们不妨再引用 1998 年 6 月 29 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北京大学的一段演讲，作为美国政府对华态度的最新注释：

“新世纪将是新的中国的黎明，贵国为其在历史上的伟大而自豪，为你们进行的事业而自豪，为明天的到来更自豪。在新世纪中，世界可能再次转向中国寻求她文化的活力。思想的新颖、人类的尊严和升华，这在中国的成就中显而易见。在新世纪中，最古老的国家有可能帮助建设一个新世界。”

是啊，罪犯子女儿童村展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魅力。为什么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地方能够有此超前行动？为什么一个普通的女人能够产生非凡的创意？不正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起着内在的作用吗？

它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巨大和深远的。

继第一个儿童村后，张淑琴趁热打铁，借势发力，又陆续建立了两个儿童村。60 多个孩子，要吃要喝，要管理教育，这都需要人，需要钱。没有用人指标，没有专项拨款，只有奔走呼号，寻求赞助和支持。

张淑琴像一个“丐帮帮主”满世界奔走呼号。

一个女人家，表面上性格泼辣，但不擅求人，尤其忌讳谈钱，谈则脸红心跳。为了孩子，学做当年的武训，不要什么脸皮了。她今天到这家企业，明天跑那家单位，磨破嘴皮宣传儿童村的价值和意义。人道的理论经她声情并茂地表达，着实打动人。可惜企业大多不景气，但他们鼓足劲儿捐些实物，什么油呀、面呀、图书用具呀。实在拿不出手的，便热情款待，以表心意。

看冷脸、听冷话、碰钉子的经历也不在少数。

一次，张淑琴向一个资产丰厚的经理开始了化缘演说。她从罪犯子女的遭遇讲到“儿童村”的成立。眉飞色舞，声泪俱下。但经理心不在焉，不是翻报纸，就是打手机。还未待张淑琴说完，他就打断话题：

“对不起，我很忙，没时间听你的大道理。”

张淑琴真想过去给他一拳。孩子的命运难道感化不了你？这么了不起的善事，难道吸引不了你？如此冰肠冷血！但重任在肩，她忍住了，并强装笑脸：

“那就请经理给个准话吧。”

经理把老板椅转了转，又吐了一口烟圈，傲慢地说：“今天就是要给你一个准话。钱嘛，我有，但我得用到紧要处，哪顾得上罪犯子女。”

张淑琴仿佛吞进一只苍蝇，说不出一句话。听说这位经理出手大方，仅孩子过生日就花销 10 多万。那么，同是孩子，拿出它的十分之一，支持儿童村可以吧。想到这些，张淑琴才登门的。没料到经理的话如此难听。难道他的孩子就比罪犯子女高贵？赞助他们一点，就脏了他的钱？看来根深蒂固的“血统论”不是建起儿童村就能清除得了，必须加大攻势和宣传力度。

还有比这更让张淑琴难忘的事。

就在社会各界纷纷捐助，儿童村稍有规模时，一些流言也开始传播开来：张淑琴搞集资，为了个人发财……

张淑琴哭笑不得。儿童村举步艰难，惨淡经营到这一步，她比谁都清楚资金的来之不易，她比谁都珍惜这些资金。三个儿童村至今无一机动车辆，去市里工作，无论年龄大小，一律步行或骑车，远途均乘班车。一次，张淑琴与工作人员小黄出差北京，10 天时间，旅差、住宿共花销 600 元。600 元啊！抵不上一桌酒

席，买不起一张到北京的飞机票，住不上一天的高级宾馆。她们是靠坐硬座、住地下室、吃方便面节约出来的！还有一次，张淑琴独自去北京，为了给儿童村省钱，她住在一个剧组的库房，后来演员增多，库房改为集体宿舍，张淑琴搬到一个离京外出的朋友家。几天后，晚上办事回来，发现朋友一家也回来了。这咋办？她只好收拾东西满街找廉价的住处。这种住处偏偏很少，她硬是游荡到天明，才在一个地下旅社落脚。

哦，一个 50 多岁的女人，一个一级警督为什么如此寒酸？还不是为了给孩子们省下一口饭，挤出一两油吗？观此现象，恐怕铁石心肠的人也会潸然落泪……

再看看张淑琴的家吧。她住的那栋楼，惟她安不起天然气、防盗门，惟她家的电视机老化没声，洗衣机旋转不灵，也惟她这个中年妇女睡着硬板床。孩子上学，她无力资助，孩子患病，3000 元的住院费，她都拿不出啊！变卖家产，无一样值钱的东西。

为了儿童村这个大家，她忘了自己的小家。家里的东西，能捐的尽量捐，能用的尽量用。家里的人，一年忙到头，竟然连顿像样的年夜饭都做不起……

如果不办儿童村，写作挣稿费也不至于落此境地吧！

每每想到个人得失，张淑琴真想撂下这副沉重的担子……

但一接触孩子，她又觉得阳光灿烂；与善良人相处，她又感到万紫千红……

啊！啊！善良人总是多数！他们是装扮人世间的主色调，他们是儿童村的原动力！

儿童村的纪念碑永远铭刻那些善良人们的名字！

复 苏 的 心

这是世界监狱中罕见的场面。

中秋节，儿童村的孩子要与服刑的母亲见面啦！

世界各国的监狱，也许允许母子同监，也许可以设立罪犯子女幼儿园，但像中国这样把罪犯子女组合一个团体，在合家团聚之际探望狱中父母，实在是独一无二的！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既体现罪犯权益，又维护儿童权益的人道义举！

早到女监门口的孩子们跃跃欲试，探头探脑，张淑琴让他们站住整队，做最后一次叮咛。

看见了，神秘的狱舍；看见了，昼夜思念的妈妈。孩子们按捺住急于跳出的呼唤，有礼貌地齐声叫：叔叔、阿姨好！

在监狱操场等候的有关领导、管教人员及女犯们热烈拍手。叔叔、阿姨为孩子的文明叫好赞叹。母亲们伸长脖子，用焦灼的目光寻找自己的孩子。哦，找到了，那是黑豆，那是姜涛，那是文龙……都高了、胖了、也穿得漂亮了，早不是梦中那副寒酸样儿。

孩子的节目显然经过精心挑选，都极富感情色彩，最动人是齐唱《世上只有妈妈好》。

全场先是屏声敛气的沉静，惟有稚嫩的童音在倾诉，继而是小声的抽泣，接着哭声像拍岸的浪，哗、哗、哗地一声高过一声。全体管教人员哭了，全体犯人哭了，母亲哭得最伤心。泪眼一片朦胧，朦胧中闪现的是过去的孩子：讨饭……挨冻……失学……

突然，一片开心的笑声拨开母亲的视线。原来一个孩子没勒

裤带，裤子脱落下来，只留下一件小裤头。但是母亲们没笑，又哭了，但这时是滚烫的热泪啊。

农村孩子多不穿裤头，儿童村却想得这么仔细，收拾得这么妥当，能不放心，能不感激吗？

最动人的时刻到了！

孩子们像久未吃食的小鸡，扬着脖子，喊着“妈妈、妈妈！”向各自的母亲怀中奔去。母亲没了往日服刑的拘谨，敞开怀抱，放大嗓门，叫着：“我的孩子，我的小可怜。”紧紧地搂住各自的孩子。

黑豆的母亲韩静庭几乎是爬到孩子跟前。她一手抱住黑豆，一手在黑豆头上、脸上、身上抚摸。当她触摸到孩子残留的伤疤、缺落的门牙时，撕心裂肺地呼喊起来：“这是我的孩子吗？我走时还好好的，咋成了这样？孩子，快告诉妈呀！”

黑豆还未从往日的巨痛中恢复过来，对久违的母亲她还有几分生疏，他不张口，冷冷地看着母亲。母亲以为娃的脑子也坏了。便跪在地上，大幅度地抽泣起来。张淑琴忙把她搀起，仔细地叙述了黑豆的经历。她猛地跪下，向张淑琴、郭建华等人连连磕头：“感谢你们救我儿子的大恩大德啊！……”

小艳、小芹一前一后奔跑着，一左一右投入妈妈怀中。

陈素珍入狱以来，两年没女儿的消息了，有时胡思乱想女儿被狼叼走，有时在梦中看见女儿脏兮兮的小脸，醒来空空如也，她整天不说话……今天，真像还在梦中，她真不敢相信，也不愿再承受醒来之苦。但女儿在喊“妈妈”，声音很真很真。女儿的泪水滴在她的手上，舔一口，咸的。哦，这不是梦，是女儿真的来了！

陈素珍疯狂地合拢双臂，怎么也搂不住俩，便抱了这个，再

抱那个。嘴里不停地喊着：“小艳！小芹！我的孩子，你们真的还活着啊！”

女儿见妈妈言语了，争着撒起娇来。小艳说：“妈妈你看，我这手是割草时，镰刀划伤的，不过现在都好啦，郭爷爷带我治了好多次。”小芹说：“妈妈，你摸，我头上的伤是伯父打的，他嫌我把牛丢了。但是你放心，吃了张奶奶亲自配的药，不会影响美观的。”

陈素珍不由抬头仰望张淑琴和郭建华，发现他们眼角也噙着泪，又看见张淑琴向她示意别说话。她理解了，这是张大姐不愿打扰她们母子相见的气氛，更不愿占用她们一分一秒啊！

她低下头，在自己身上摸，可能想给孩子摸出一块馍，或者摸出一件小礼品，可惜她已让噩梦折磨得麻木了，什么也没给孩子准备，只摸出一把小梳子。她用口水把它喷湿，然后让小芹在她腿上坐正，一丝一缕地把她的头发拆开，再一下一下地梳起来……

姜亚珍当过民办教师，是女犯中文化程度最高的，感情自然细腻。她曾把见孩子的方式构思过多遍，但见了白白净净的姜涛，她竟然不敢认了。记得临别前一天，因为姜涛放炮时把手烧了，她打了儿子一掌，儿子眼泪顺着黑瘦的脸流下，样子狼狈极了。从此，这副形象就定格在她的脑海里……

姜涛向前跑了几步，犹豫地停下，他也认不出母亲了。在他朦胧的记忆中，母亲是一张忧愁蜡黄的脸，今天咋这样红润？

母子对视……

在旁边看得着急的张淑琴马上提醒。这对两年未见的母子相互认出昔日熟悉的模样。哇的一声，抱头痛哭起来。哭得那样伤心，那样惨痛，几乎把接待室的天花板都震落下来。

姜涛把两年的怨恨、爱恋都聚集在小脑袋上，在母亲温暖的胸脯上拱来拱去，母亲乳房发热，又复苏了喂孩子的甜美感觉。

她真想让孩子再吃几口压抑的乳汁啊，她欠孩子的太多太多……

无论是母子相见，还是父子通信，无论是大会报告，还是个别谈心，都在儿童村孩子的父母及其他罪犯中，引起了强烈反响，都使他们向回归社会，回归人性，回归母爱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

让我们从雪片般的来信中，随便摘两封看看吧：

尊敬的儿童村各位领导：

见到我孩子天真的笑脸，作为父亲，我愧对下一代，愧对生我养我的中华河山。由于自己的失足，将子女像包袱一样抛给了社会。是你们办的儿童村才使孩子得到优越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什么语言和文字都不能表达我的心情，但有一点我可以诚恳地告诉你们，今天（1997年中秋节——作者注）将是我改造的新起点！我将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谢党的政策……

田松之父：田培印

1997年10月21日

尊敬的儿童村各位领导：

由于我的犯罪，给我的两个孩子带来极大的不幸。自从入狱后，我心情一天也没平静过，甚至产生过消极对抗的情绪……

正当我绝望之时，是你们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中秋节

见到孩子涛涛，我的心彻底放下了。只有一个心思地改造自己……

姜亚珍敬上

1997 年 10 月 23 日

姜亚珍的信正是她行为的真实写照。

初入狱，她情绪低落，不听教导，常常莫名其妙地发火。甚至没有一点斯文，大打出手，拉都拉不开。管教人员批评她，她要么低头不语，要么消极对抗，用更恶劣的方式制造事端……

自从儿童村收养了她的孩子，尤其是参加了几次监狱与儿童村的联谊活动，她冰冻的心复苏了。脸上有了笑容，行为开始规范，劳动卖力勤快。干起活来，小小个头比谁都跑得快，仿佛要把曾经造成的损失补回来。她在犯人中文化程度较高，消极起来，坏点子最多，好起来，文化就派上用场，为监狱小报积极投稿。她写儿童村的观感，写中秋节母子相见纪事，写改造体会。感情真挚，文字优美，篇篇都在犯人中引起反响，对改造工作起到很大的作用。

监狱看上了这个人才，提拔她为管事犯，即管理一定事宜的犯人。她具体负责新犯人的管理和教育。这些犯人，初来乍到，不懂狱规，旧习气未改，行为散漫，好吃懒做。她们对管教干部都阳奉阴违，何况姜亚珍也是个犯人，开始根本不把姜亚珍当回事。姜亚珍心里有数，她有从坏到好的亲身体会。熟悉之后，她使用体会给新犯人进行感化教育。新犯人中不少人还没有当母亲的体验，但她们毕竟是女人，认同善，追求美，鄙视丑恶。渐渐地，她们就与昔日告别，踏上重新做人的轨道……

儿童村的冲击波也在其他犯人中辐射。

尽管他们的孩子不在儿童村，但他们也是为人父母，他们的

孩子同样有儿童村孩子的遭遇，儿童村的善事善举依然触动着他们的良心和母爱。

春节将至，儿童村要给孩子们做棉衣，女犯们闻讯，申请要下这批活。

她们向监狱立下军令状，不耽误正常工作，利用星期天，保证完成任务。星期天的厂房停了暖气，寒风袭人，手很快冻僵了。而这批活又格外复杂，布料是儿童村便宜买来的布头，色彩不一，缺尺少寸，必须一块块拼起。200多块布头摆了一大桌，她们先按色彩挑好，再按尺寸一一拼起。走针行线中，她们仿佛不是在缝合破碎的布头，而是她们曾经破碎的心。

裁剪也自己干。好在她们之中有这方面的人才。她拿起彩笔，横竖画好，再握起剪刀，长短裁毕。这一瞬间，她仿佛又找回当年自食其力的自己。可惜后来财迷心窍，丢了本行，走上犯罪之路。不必后悔！现在不是又循环到老路上吗？人生本来就是一条循环道，必须经过七折八磨的炼狱，才能净化灵魂，升跃天堂。如今的服刑就是炼狱，眼下的善事就是修行……她欣赏着比过去裁得更好的衣服，满脸微笑和自豪……

她们知道，孩子好动，衣服必须结实耐穿。为此，她们决定一律手工缝制。冻僵的手，捏不稳针，她们从心底呼出股股暖气，哈到手上。棉花太厚，走针必须用顶针顶，手冻得不灵巧，常常顶到肉里，血渗出来，她们也顾不上擦，干脆就渗进在棉衣里吧，母爱的血更温暖孩子的心！

棉花均匀装好，经纬纳上几道，外表像当年志愿军的棉衣，内含的是母亲密密麻麻的血脉。

30套崭新的棉衣做好了，男孩咖啡色，女孩大红，她们高兴地披在身上，瘦小的还穿起来，在车间里又唱又跳。这个时刻，她们忘了犯人的身份，没有母亲的年龄，全成了活泼可爱的

小姑娘。

史颖的父亲服刑后，母亲怕受连累，愤然离婚，把年仅两岁的史颖甩给年迈的爷爷。不久爷爷病重卧床，史颖的生活立即成了问题。她父亲在报纸上看到儿童村的消息，通过监狱向儿童村申请代养，儿童村前去调查核实，并很快接走。史颖的母亲知道后，又心疼又惭愧。身为母亲，竟然把亲骨肉抛弃，让孩子遭那么大的罪，而儿童村不沾一点亲，却收养了孩子。一番重重地感谢之后，提出要带走女儿。

根据儿童村章程，凡领回代养的孩子，必须征得委托人的同意，这样就自然得去监狱见孩子的父亲。史颖的母亲为难了。她不想见自己的丈夫，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都因为丈夫的过错。她也怕见自己的丈夫，危难关头，是她逃避了做母亲的责任。但不去又有什么办法呢？

“去吧，也好给孩子的父亲鼓励鼓励。”张淑琴好言相劝。

管教干部热情地接待了母女俩。并高声地介绍道：自从史颖进入儿童村，她的父亲如同换了一个人，认罪服法，主动改造，积极肯干，各类考核名列前茅。

史颖的母亲心敲起了鼓：儿童村行善，代养了女儿，监狱施人道，改造了丈夫，我做妈妈和妻子的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

机灵的史颖看出了妈妈的心思，也希望父母破镜重圆，她有一个完整的家。当父母见面时，她有意夹在中间，左叫一声爸，右叫一声妈。动人心魄的声音好似感情溶剂，促使了母亲的决定，她当场提出复婚。史颖的父亲激动得热泪盈眶：“谢谢你，为了咱们一家人早日团聚，我一定拼命改造！”

“应该谢谢他们，没有儿童村牵线，就不会有今天。”史颖母亲拉着丈夫，向在场的张淑琴、郭建华深深鞠躬。

“我们只不过为了你们的孩子做点善事，你们复婚，真没有料到啊！”张淑琴高兴而谦虚地说。

哦，人性复归，这就是创办儿童村的初衷，也远远超越了它的初衷。

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着实填补了维护儿童权利这个神圣事业中的一个空白。

它超过预想，在整个社会掀起阵阵波澜，对善良的人们是最好的呼应，对践踏人性的丑恶是最大的撞击。

它超越国界，在全世界引起极大反响，给人类的文明发展写下新的篇章。

即使如此，它更新、更深的意义还待新世纪的人们予以总结……

昨夜西风凋碧树 ——忆一段头朝下脚朝上的历史

徐光耀

老作家徐光耀已年过七旬，他想以轻松的“讲故事”的方法，回顾那段“头朝下脚朝上的历史”。然而字字落地有声，醒人耳目，撼人心魄。老作家以善良的心地叙说过去，将胸中积郁半个多世纪的块垒化作含情孕泪、有骨有气的文字。相信读者会从中读出那段历史的社会沉疴、人生况味，其价值已超过艺术的审美范畴，实为一篇慷慨警拔的大文章。

我自小喜听故事，13岁当了小“八路”，此习不改。后来受多了火线英雄的感动，也练着写故事、编故事，于是成了作家。从作家再发展，便很自然地成了“右派”。

说“很自然地成了”，即指“命中注定”，故事之成为故事，都出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交叉路口上。

因不想让读者大痛苦，也为减轻我的痛苦，顺手取了讲故事的方法。这样可以大家轻松一点。当然，也难免忽地“激昂”一下，或跑跑“野马”，原则是不离开大题，而事实则保证字字

真确。

一、祸 源

如果不是傅作义一个偷袭，夺去了张家口，则当时解放区的“华北联合大学”也就不必急惶惶地千里行军，逃到我们军分区来了。然而他们逃来了，且驻在我们分区附近——距辛集不远的一片乡村。我那时在分区“前线剧社”当创作组副组长。由于写过几十篇抗日报道和故事，很方便的得个机会进了文学系，插班（人家已上过一年多课了）学习。陈企霞就是系主任，一下成了我的老师。这是1947年的事，我22岁，正当上进心特强之时。于是专心听讲，拼命读书，8个月毕业后，竟因学习成绩优秀而立了一功和一小功（那时立功分三级：大功、功、小功），是文学系的最大功臣。这给老师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也给自己展现了一片光明，可也开启了我的祸端。

建国之后的1950年，丁玲奉命创办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讲习所），我当时刚出版了长篇小说《平原烈火》，由于写的是共产党打日本，党的声望正高，小说颇有点影响。丁玲必是也看过这本书，所以一经我申请入读，所里就表示欢迎。还在开学之前的两个月，我就脱下军装，搬进了鼓楼东大街103号，兴头十足地跑进跑出，为所里帮办杂务。所长丁玲尚未露面，就急切地盼她快来上任，以一睹这党员大作家的风采。那时，不管什么，凡是党的，都是感觉着崇高可贵——谁知在这快快乐乐中，又种下了第二桩祸根。

1953年，我刚从文研所毕业，便下了乡。一则，那时的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说，农业合作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作为一名党员和军人，理当在这条路上冲在前头；其二，

丁玲曾劝戒我：“要忘掉自己是一个作家，踏踏实实到生活中去锻炼，一时写不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永远写不好。”于是我带着军职，跑到故乡大清河北的雄县，作了三区区副书记，分工专管互助组和合作社。这个“猛子”一扎就是三年，日日与农民“三同”，付出了很大辛苦。以致我第一个孩子出生，也没有顾上去看。

在这三年的最后一年，文艺界出了一桩大事，忽地打出个“丁陈反党小集团”来，我的两个老师——丁玲和陈企霞，一下子全成了“反党分子”。我是回京取薪津才听到这个消息，脑海里像打个炸雷，怎么，他们都是老地下党员了，我穿开裆裤的时候他们就在革命，又都在圣地延安“浸泡”多年，从文章看，又都是党的事业、党的威望的铁杆维护者，平时接触中，并没有听到过他们一句哪怕是是很小的牢骚，怎么？怎么？……

我还没有“怎么”清楚，单位通知去参加中宣部召开的党员大会，并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可我连丁、陈犯的是哪几条，还未听到正式传达呢。然而，言是必须发的。我也是13岁入的党，那时已有17年党龄，自幼听党的话听惯了，党向来没错儿，既然说他们反党，那必是反了。我是他们的“得意门生”，先肃“流毒”也是理所当然的。

中宣部的党员大会会有几百人参加，当然是批判“丁、陈”。印象至今深刻的是部长陆定一的讲话，他说，文艺界什么都“嘻嘻哈哈”，政治上吊儿郎当，不知道严肃。他的尖锐措词和疾言厉色，使我身上直冒冷汗，深愧自己的迟钝和麻木。在几个声讨之后，我被点名上台——真抱歉，不是有意掩饰，我确乎记不起当时说些什么了，总之，是抓住“一本书主义”这个词儿，没头没脑地骂了一顿了事。

故事有波澜起伏才好看，仅仅隔了一年，1956年，我结束

下乡生活，回到北京，写关于合作化的长篇。人也由华北军区调到总政文化部创作室来了，和胡可、杜烽一同住在前外西河沿大耳胡同 15 号。其时已有风传，说丁玲陈企霞不服反党之说，正向中央告状。我这个人较孤僻，生活面很窄，不是党组织发的话，也不认真听，只伏案搞我的创作。是在夏季的某一天，侯金镜来我们小院串门儿。他原是老“抗敌剧社”，华北军区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艺科长，我们的老上级，现正做张光年的副手——《文艺报》副主编，消息自是灵通。我们又知道，侯金镜一向很敬业，有思想，作风严肃，从不信口开河的。果然，他坐下不久便说：现在有件事搞“被动”了，中央已经批下来，要求“重审”“丁陈反党集团”。作协党组整天在忙这件事，很紧张。随后，他又亮了两个观点，其一说，党内斗争是不宜使用压力的，因为后果常弄得很糟糕。其二，“还是时间解决问题”。

这段民间闲话，触发了我的一些思想活动：一个，丁陈真的“告状”了，而且现在要“重审”；其二，党内斗争不宜使用压力，很对。可这句话听来新鲜别致，也许不是侯金镜的发明，会不会是更高层人物的话？由此想到自己经历过的“运动”，“三反”，“五反”，“肃反”等等，无不使用压力，以致每次“运动”后期，都须特别挂个“复查”、“甄别”阶段，以便把打错的“洗”出来。一个人忽被打错，当然很痛苦。但痛苦而能洗清，究竟比冤到底强得多。于是想，丁陈果真被错打，岂非已有出头之日了吗？谁知这一想不要紧，从心理上又种下一桩祸根了。

二、自然陷坑

干脆就把“丁陈反党集团”定成铁案，别搞什么“重审”，

其实倒是件大功德，至少可挽救相当一批人，也省了把很多人牵进来共演一台翻滚大戏。可是，故事的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推进展现的，这才使人眼花缭乱，生动有趣。

我隔在军队创作室的小小一隅，本与以丁陈为中心的大舞台不相干的。尽管“重审”之风强劲，连周扬也承认 1955 年“斗争过火”了。可我们创作室没有谁对此热心，大耳胡同 15 号三个人，都在埋头于自己的作品：胡可正围着戎冠秀酝酿构思，杜烽在忙于为剧本《英雄万岁》煞尾，我呢，沉在农业合作化的故事中大绞脑汁。搞创作的人经常挨的批评是“不问政治”，大家都不愿意惹是生非。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还是来敲门了。头一桩，联大同学李兴华（时任《文艺学习》的编辑）打来电话说，陈企霞被关一年多，新近放了出来，因扣发工资，家属无措，搞得十分狼狈，快下雪了，连件过冬的衣服都没有。你是联大同学中出过书的，能不能把稿费分一点出来，给老师解决件大衣？我想，恩师有难，同学高义，自己确有稿酬，给件大衣又扯不上是政治问题，干吗推呢，便问需要多少。答曰二三百吧。我让他派个人来，取走了三百元人民币。

刚进入小说，又来了其二，还是为钱。这回是联大女同学，在文学系时是我的学习小组长，为我一向崇敬的。她进门就说，陈企霞苦死了，简直家翻宅乱，鬼哭狼嚎，已到了过完今日不知明日的景况，要我立即“周济”几百元。这次，我犯了一点嘀咕，我是个吝啬人物，对自己也很苛苦，刚出了三百元，怎的这么快就“苦死了”？而终究使我担心的，还是怕“翻案不成”，被扯进什么“集团”里去。过去的“运动”已有过不少实例。于是便犹豫说：钱呢，可以给，但须向我的支部汇报一下，看看组织的态度，以便将来发生什么变化，大家说不清楚。

这个女同学一听就变脸了，很愤慨地责我“忘恩负义”，颇说了一些难听的话。我很尴尬，仿佛真的“忘恩”了。但她还是给我找了个下台阶，变通说：“这样吧，你把钱借给我，与陈企霞无关！我总没有反党吧？你也用不着去支部汇报了。”

巧的是我刚刚得到一笔稿酬，四百元，还未及存入银行。她拉开抽屉，一把全抓走了。出门时还特别叮嘱我：“不要告诉任何人，陈企霞你是知道的，若知道钱是同学给的，他会退回来。”我向来做人可靠，点头保证。

这两笔钱，后来都判了“资敌”的罪名。什么是“资敌”？现在的年轻人已很生疏了。当年在抗日根据地里，谁若把根据地出产的棉花、粮食等贵重物资弄到敌区去卖，一旦抓获，往往判为奸商，要枪毙的，罪名便是“资敌”。

真正决定我命运的是 1956 年年底。创作室文书夏信荣亲自登门，送给我一个大信封。信封上卡有十分显眼的“绝密”大红戳，背后粘着三联单式收条，收条号码是“1266”，打的日期是“1956 年 12 月 1 日”，小夏让我在三联单上签字，然后撕下两条，留下一条，走了。

我回进屋中，小心地打开信封，里面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给我的信，字迹很清秀，像是女同志所写。信末盖有“中国作家协会”“代”字章。还附着打印好的文件，都是丁玲写的：一、《我的检讨》；二、《给中宣部党委的信·重大事实的辩证》；三、《辩证材料的补充》。总计约三万字。

我必须把党组这封信抄在下面，虽说破坏了讲故事的风格，为真确计，也顾不得了。

徐光耀同志：

去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所揭发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

行反党小集团活动的问题及事实，经中宣部党委指示，目前正在调查对证。关于丁玲同志的历史问题，现已审查清楚，除她过去所交待的问题外，没有发现新的问题。现有几个有关丁玲同志的问题，请你协助提供材料，问题如下：

（一）有人说：过去文研所学员中曾流传着文研所是丁玲创办的说法，对这一问题，你是否能提供出具体情况，如系何人说，何人传，你和其他学员对这结果是如何理解的？说文研所是丁玲创办的，这是否就是说在学员心目中，只知有丁玲，不知有党？据你了解，丁玲在学员中的影响如何？你和其他学员当时对她的看法怎样？

（二）有人说丁玲散布过“一本书主义”、提倡骄傲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你是否听到过？你和你所熟悉的学员和其他同志是否受过这种思想的影响？你对此问题的看法如何？又，丁玲曾在某个会上提出你的《平原烈火》比《日日夜夜》只低一点。她是在哪个会上谈的，什么情况下怎么说的？她是否在鼓励你的骄傲情绪？对你有何影响？此外，有人说，丁玲从苏联回来后曾对你说人要写出一个作品来才行，她的意思是否向你宣传“一本书主义”？她当时是怎样谈的？你当时的理解和现在的看法如何？

（三）有人说，丁玲在文研所宣传和培养个人崇拜，张凤珠也在学员中散布了一些助长个人崇拜及有碍团结的言论，你是否知道这些情况？请提供详细材料。

（四）有人说，文研所在丁玲的把持下，不要党的领导，党和革命的空气进不去，你是否也有此感觉，能否提供具体事实？你的看法怎样？

（五）中宣部讨论停办文研所时，据你所知文研所派了哪两个学员列席了中宣部的会议？由谁派的？如何布置的？

关于这一问题，在当时学员中有些什么反响？你是否听丁玲同志在学员中散布过不满中宣部的言论？

（六）据你了解，丁玲在学员中的影响如何？丁玲曾给你一些什么不好的影响？你对丁、陈反党小集团这一问题的看法如何？

附上丁玲同志的辩证材料及检讨各一份，请你看后提出具体意见或看法。

上述问题，务请于12月7日前以书面材料交给我们为感。

作协党组（盖章）

11月30日

看完信，首先涌上头脑的有三条：一、作协党组以“绝密”方式向一个党员调查材料，说明事关重大，未可等闲对待；二、信上屡称“丁玲同志”，且说历史问题没新发现，看来“反党”定性或许有变；三、问题提得十分具体，说明“查对”得认真而且仔细，很像要实事求是。于是心头欢喜，以为“老八路”作风又回来了，党毕竟伟大、英明、正确啊！

从信中的问题反观，丁玲之被打成“反党小集团”，罪行大体是这些：把持文研所，不要党的领导，学员只知有丁玲，不知有党；宣传“一本书主义”，提倡骄傲；培养个人崇拜，散布对中宣部不满的言论，等等。问题都与文研所紧密相关，是否还有其它，可就知道了。这是谁“发现”和“揭发”了这些罪状的呢？我怎么就不觉得？——咳，管他！还是写回信要紧。

由于来信严肃认真，我也给自己定个规矩：一定要用党性顶住心上的欢喜，只当丁玲仍是反党小集团头目，所述事实，必须客观公正，不偏不倚，严防把偏私情绪带进去。决心既下，立马

停下长篇，查日记，翻笔记，忆交往，对事实，两天准备，一天起草，快速把复信写成。自己读了两遍，犹恐不够完备，便悄悄拿给住在北屋的党小组长胡可，请他挑挑纰漏。胡可一向谨慎正派，活泼温文，很容易亲近。他读完，说：“看不出有什么不妥。”却又握住双拳做个“对撞”手势：“只是还缺点儿这个。”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嫌不够有力和尖锐，应该更带劲些才好。回到我屋，便又在信末的“意见”部分加了第5条——胡可若看到这里，或许会苦笑吧？他怎能想到，那个挺俏皮的“对撞”手势，竟是在给我的“反党”加油呢。

第二天，誊正抄清，恭谨封严，派一个共产党员直送作协党组，嘱他也要取收条回来。

在此，我对读者提个小小的请求，求你无妨带着“鸡蛋里挑骨头”的精神，从中找一找“反党”成分或因素。如此，则益莫大焉。下面便是这封回信：

作家协会党组：

我本月8号晚上才收到你们的来信，所以这份材料没有办法在7号以前送给你们了。

接信后，我用了两天时间翻查了我从1950—1953年的全部日记，也翻读了我在文研所时的听课记录，联系它们，又把我和丁玲的接触作了一番回忆。现在，我便根据这些来回答你们的问题。

（一）关于“过去文研所学员中曾流传着‘文研所是丁玲创办的’说法”问题。

1. 有过这样一个事实，1950年9月30日，我初由天津来北京，遇到陈森同志，他告诉我文研所的创办缘由，大意说：（1）解放不久，毛主席找了丁玲去谈话，问她愿意

做官呢，还是愿意继续当一个作家。丁回答说“愿意为培养新的文艺青年尽些力量。”毛主席听了连说“很好，很好”，很鼓励了她一番。所以，丁玲对这次文研所的创办，是有很大的决心和热情的；（2）文研所的创办，与苏联友人的重视也有关系。苏联的一位青年作家（可能即龚察尔，记不大清了），一到北京便找文学学校，听说没有，表示很失望；（3）少奇同志去苏联时，斯大林曾问过他，中国有没有培养诗人的学校。以上两项，也对文研所的创办，起了促进作用。

这就是我听到的关于文研所创办的传说，以后，我再没有机会听到谈这个问题了。

我当时的看法是：文研所是党办的，这没有疑问。（当时也流传这样的说法：“文研所是文艺党校。”）丁玲在里面起了很大的甚至是主要的作用，也觉得没有疑问，因为是党委托了她来办文研所。文研所的创办，体现了党对青年写作者的关怀，这关怀又具体表现在丁玲对这事的热情和积极性上。

2. 以我看来，说当时学员们“心目中，只知有丁玲，不知有党”，完全不合乎事实。第一，丁玲在学员中确实有很大威望，这威望的形成有很多原因，原因之一，便是她是党员作家，而一部分人由于她是党员而寄予很大信任，是很自然的事情。第二，文研所的日常工作，很多具体领导，丁玲插手并不多，大部分是田间、康濯等同志直接做的。支部的活动从头到尾一直没有停止过，很多次思想斗争，政治运动，以致最后的整党，都是支部直接领导的，这些工作都进行得相当成功。第三，党员对文研所的指责和意见，也大都经过支部提上去的，党的活动经常影响着学员们的学习、

生活和思想。怎么说不知有党呢？就我知道的，学员中一半以上是党员，且大部分党龄很长，说这些人“不知有党”，也太把我们的觉悟水平低估了。第四，文研所的教学方针、计划、人员组成等重大事项，我们都听说过是经中宣部讨论研究后批准的。不曾感到过丁玲想把党的影响掩盖起来。

3. 至于丁玲在学员中的影响，我认为是很大的，她差不多获得了普遍的爱戴。人们对她的印象主要是，她很了解创作，很能知道人，对青年很热情，也很关心。而且，她还给我以热爱党和热爱新社会的印象。她曾多次为解放区文艺——工农兵文艺做过辩护，特别在它们遭到攻击的时候。

（二）关于“一本书主义”和提倡骄傲等问题。

1. 据我所知，丁玲是再三再四反对过骄傲的。开学之初，她就批评过一些学员们看不起“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倾向。后来，又有人看不起解放区的作品，不看新出版的文章，她都联系着骄傲，进行过批评。在文研所未期，她曾两次严厉批评过我的骄傲，这曾造成我在一个时期内怕看见她的原因。所以，反对骄傲，提倡虚心学习，是她给我的突出的印象之一。这一点，恐怕文研所的学员都可以作证的。

2. “一本书主义”这个词戴在丁玲头上，我现在认为是不妥当的。她说过恍惚可以这样联系的一类的话，如她说：写一本书出来，应该让读者读了有所收获，长久不忘，要有作者自己的心血、自己的发现在里面，要有站得起来的人物，等等。我以为她是在提倡注意质量，反对粗制滥造。这话至今看来，也没有什么错。

至于来信中提到的她向我说过“要写出一本作品来才行”的话，可能指的是这事实：丁玲和曹禺预备去苏联参加对果戈理的纪念，在动身的前一天，即1952年2月26

日，丁玲叫了我去帮她买些礼品，在她家里，对我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出国，出风头，并不是什么大荣耀，那是赶对劲儿，人家让你去的。其实，作家出国，只有几个作家注意；学生出国，也只有几个学生注意，别人是并不注意的。所以说，真正的为人民所景仰，永远记在心上，还是得有几本作品留给人民，留给后人。”这段话是我自苏联回来三个月时对我说的，我以为她是在暗示我，出国也没什么了不起，值不得骄傲。

3. 也有过这样一事实：1950年11月9日，文研所开全体会，宣布1951年第一季的学习计划，丁玲在会上的确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们总觉得中国作品太少，但真的少吗？文艺杂志有几十种，没有人能全部看得过来。然而，没有像这样的作品，像我们读了《水浒》，就想去跟人说李逵怎样，武松怎样；看了《红楼梦》，大家就吵架，你爱黛玉了，我爱湘云了。可看了我们的作品呢，常常说，生活丰富，语言很好，但不久，便忘记了。前几天我在人民大学讲演吹牛说：《平原烈火》比起《日日夜夜》来只差了一点点，那就是人物，周铁汉还有点概念化。我们说作品少，主要是人物概念。然而，我们每人都想出几本好书，可是这是不能着急的，你们都还十分年轻，哪有这样快呢？……”如果把“《平原烈火》比《日日夜夜》只差了一点点”这句话单摘出来，是有问题的，但上下联系起来看，说她是在鼓励我骄傲，便显得牵强了。而就在这同一次讲话里，她就说过：“我们是个长途竞赛，我们才从起点上跑起，以后的路子还长，有成就的就不能骄傲，大家也不要害怕他，应该有什么就说什么。书出来了，是人民的，不是你的。人民是应该批评也能够批评的，不让人家批评，就是守财奴，那你

当打字员去好了……”

以上便是她说的话的真相。它是有可能被误解的。我在中宣部召开的党员大会上的发言，也曾指责过“一本书主义”，然而那是在一种空气，一种压力下未经认真思考说出来的，它只是说明了我思想上的一种错误，我为那样的话感到惭愧。

（三）我没有觉得丁玲在文研所中宣传和培养过个人崇拜。我是对她崇拜过的，但我觉得这并非由于她的培养，问题是在我自己。还应该说一句，我曾崇拜过很多人，连长、团长、兵团司令，一直到我们党的很多领袖，我都崇拜过，但同样不能说是他们培养了我的个人崇拜。

张凤珠散布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我和她没有接触过。

（四）文研所“在丁玲把持下，不要党的领导，党和革命的空气进不去”的感觉，我是没有的。康濯、田间和其他很多同志都做了很多工作，那时，我倒觉得丁玲对文研所干涉得太少，我倒是常常盼望她多到所内做些工作的。当然，如果康、田等人都给丁玲把持住了，她是通过他们不要党的领导的，我便不清楚了。但我细细想来，觉得并不是那样。

（五）中宣部讨论停办文研所的事，我根本不知道，也没有听说过。

（六）丁玲给我的不好影响，我想有：（1）她捧过《平原烈火》；（2）她偏爱过我（让我给她买出国礼品，让我到她家陪爱伦堡、聂鲁达、刘芭等人吃饭等）。这些，会促使我骄傲的。但，在我心中被更多的影响着的，是她那“不要骄傲，不要骄傲”的话。

最后，我想说一说丁、陈事件以来我的一些想法和一些

意见，请作参考。

1. 我觉得，丁玲假如没有其它政治问题，只有思想和作风等方面的错误，则她仍不失为我党优秀的作家，她在宣传、坚持和保卫工农兵文艺方向上是有功绩的，对培养文艺青年也做过很多工作（在这次丁、陈事件的揭发过程中，这一点也反映得很突出），她对党、对新中国有着真实的感情，在创作上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如果但有一线希望，我请求党能尽力挽救她，本着“八大”精神，用珍惜的态度，澄清她的问题，并采取措施消除这件事所引起的消极影响，这对党是会有利的。

2. 假如在丁、陈事件的揭发处理过程中，有着过火或失当的地方，我希望作协党组能记取这样一个教训：在开展思想斗争的时候，尽量避免使用压力，防止造成那么一种空气，即没有人敢讲反对的意见。因为，无论怎么说，这是对事情的解决没有好处的。有许多年轻、幼稚、缺乏斗争经验的同志，在这种气压下，常会说出一一些不够认真的话来。我自己在中宣部那次大会上的发言，便有过这种情形。这很可能只助长问题的更复杂、更混乱，而不能充分反映事件的真相。这对党不利是不待说的了，即对这些年轻的同志说来，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心情会容易轻松得下来的吗？这些同志自应进行他自己的检讨，而党组也应预先便考虑到那可能是痛心的后果的。当然，假定有人故意说谎，向党骗取信任，则应给予必要的谴责。

3. 即使丁玲很多地方错了，我以为单就她对培养青年作家的热情和努力来说，也值得我们党的作家和前辈们学习。一切党的作家，都应该像她那样跟青年写作者们有那么密切的联系，从党同群众的联系的观点来看，也应该是这样

的。

4. 对文研所创办几年来的功和过，应该有个恰当的估价。自丁、陈事件揭发以来，在许多会上的报告、讲话和发言中，有把文研所全部否定的倾向，好像文研所只是培养了“一本书主义”，提倡了骄傲，宣扬了资产阶级思想，它是否有成功的或对了的地方，一字不提。这不但是不合乎事实和不公平的，而且使几十个在那儿学习过的青年们，也无形中一齐给背上了包袱，使他们常常感到困惑，甚至羞于承认在文研所学习过；也影响到一些组织上对他们的看法。我以为，这也是个不能轻视的问题，那一些过于片面的说法，应当加以纠正。

5. 我对你们这次给我的来信，有一种在态度上不够全面和不够客观的感觉，上面只是问我受了“一本书主义”什么影响，某件事是否即鼓励我的骄傲，丁玲给过我“一些什么不好的影响”。却没有向我要对这些问题的反证，也没有问我受过她一些什么好的影响。这使我有些担心，这样的调查问题会不会得到完全公平的结果。

意见是否有错了的，望给我以批评教正。

此致

敬礼！

徐光耀

1956 年 12 月 12 日京

我的“规矩”形成了这信的特点：一、所有事实，都有时间、地点、场合，极便查证；二、对丁玲有利的话说了，对丁玲不利的话也说了，没有回避，没有“耍心眼”；三、用事实回答问题，用党心提出意见，至于怎么给丁玲定性，全然听凭组织。

如果说到倾向，也只“但有一线希望”，“请求党能尽力挽救她”而已。最大的尖锐，则是担心这样的调查“会不会得到完全公平的结果”。

信发出之后，心里很踏实，丝毫没有大祸临头的预感，谁知“罪行”却由此铸成了。

三、“兴高采烈”

平心静气地想，自建国直到1957年上半年，那日子实在是美好的，供应充足，物价稳定，社会治安良好，各条战线欣欣向荣，人民生活大有提高，各级干部清正廉洁，党群关系鱼水情深，旧社会的恶霸、土豪、官僚、黑帮，一扫而光，小小一阵风，就吹掉了千年痼疾——吸毒和娼妓，党的任何号令，无不四海风从。朝鲜战场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头号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个个吐气扬眉。东欧虽然闹起了波匈事件，可我们安定如常。相形之下，在社会主义阵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我们是最足自豪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党、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正确啊！

到1957年上半年，全国各地报纸，仍是一片连一片的大好消息。国家所有举措，大都得民心，顺民意。知识分子们，每天都在用他们的如花妙笔，大力歌颂形势大好，海晏河清。像我这个从一当兵就被教导要关心国家大事的人，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没有！很高兴，很放心。我若想跟上形势，有所作为，只有更深地埋头于我的长篇，我的人物。

突然，毛主席提出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单这充满诗情画意的两句话本身，便很让人喜欢，“百家争鸣”，何等动听，“百花齐放”，何等灿烂。粗览一下它的内容，无非是给人更多

的民主、更多的自由，把政治空气，文化环境，包括创作思想、学术气氛，搞得更宽松，更活跃罢了。建国七八年了，干部更加成熟，人民更加觉悟，党的绝对权威极为巩固，把民主自由予以扩大，岂非顺理成章的事吗？抗日和打老蒋时期，我们天天高喊民主自由，《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也一再呼唤民主自由，现在要把承诺兑现，看来民主自由之花，就要在眼前开放了。谁个——尤其是知识分子，哪能不欢天喜地呢？

随着“双百”方针的发布，党又提出了“整风”。党已尽够伟大，但还存有缺陷，还有阴暗面，不适应执政环境，也不符合人民利益。怎么办？号召“鸣放”，给党提出批评，帮党改进，使党更完美。为了解除人们的顾虑，凡开会就提倡“畅所欲言”，再三再四地宣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声称马列主义是不怕批评的，如果一批就倒，马列主义也就没有用了。还画出一幅美妙的前景来：“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说得如此动听，如此恳切，不知别人，我一听就喜欢到骨髓里面去了。倒不是我有意见不敢吐露，而是感到这么一来，党就真的会使我们的国家超越历史上的任何太平盛世，达到空前的繁荣富强。这怎么不激动人心！我甚至想到了当年的“整风参考文件”苏联话剧《前线》，这是个揭露苏联自己阴暗面的戏，它批判前线某些高级指挥员顽固守旧，压制新生力量，致使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当时新华社发表文章说，苏联在正遭德国法西斯重创的时候，公开上演这样的戏，是她自信有力量，不怕批评的表现。当前，我们迎面没有希特勒，全国人心齐向党，党还要发动批评，以疗救党的疾患，可不比当时的苏联更伟大吗？

有一天，胡可从外面开会回来，神情特别兴奋。我问怎么了。他说，刚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哎呀讲得真好，毛主席水平就是高！”胡可是全国人大代表，有资格亲听毛主席的讲话，他的兴奋，他的幸遇，都使我啧啧艳羡。只过几天，我也接到通知，去听毛主席这个讲话的录音。我高高兴兴地跑了去，发现会场里很多人都把本子铺在膝盖上，一面听，一面与自己的记录对照，他们早听了非止一次了。他们在追求一份更完备的记录。我的手一向较慢，又是录音，又是湖南话，记得很糟糕，很生了一场自己的气。

毛主席亲自出马，亲自动员，苦口婆心，竭尽热诚，必是想到了1945年在延安回答黄炎培的那段话：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那个“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支配，这条新路，就是民主。现在，正是毛主席为此而大展宏图的时候了，他要为中华民族种一棵常青不朽、开历史先河的大树！所以才如此热情地鼓励大家多提意见，以便发动全国人民，发扬民主，倾心吐胆，帮助党把风整好。毛主席尚且如此，我辈小子，有何德能，逢此开明盛世，眼望光明前景，真是觉得太幸福了！

恰在此时，部队上却出了个“四人文章”事件。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下子被毛主席指为：跟中央“双百”方针唱反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毛主席甚至说，解放军开来了四个团，要对“鸣放”进行阻止云云。瞧，反对“鸣放”的左派们，遭到痛击，不是给“鸣放”政策上了双保险吗？凡对“鸣放”心存疑虑的人们，还有什么可犹疑观望的呢？

在这么火热的气氛中，创作室全体开会，宣布“鸣放”开始。会场上人人笑容满面，一派祥和轻松。然而，发言虽说踊跃，“火力”实在不猛，且多数与本单位无太大关系。即使扯到

国家大事，也多有言不及义的。直到“反右”了，才有人总结说，创作室一周左右的“鸣放”，“攻击方向”主要集中在三大主题：一曰“肃反”，二曰统购统销，三曰反苏反共。其一是指，有人在总政文化部“莲花池肃反”中挨过整，心存委屈，“鸣放”时有所抱怨，如公刘。其二，有的家属从农村来信说，“卖余粮”卖过了头，挤了农民的口粮，有的地区不得不又吃“返销”。其三，新来的秘书吴占一，东北人，很年轻，给陈沂部长当过秘书，大概从上层风闻到中苏关系有变化，便来“鸣放”说：苏联红军1945年进入东北时，到处强奸妇女，乱拿老百姓的东西，还拆走了我们好多机器。这些话，其实只能算作“闲篇”，没有谁把它当真的。

惟一“火力”较猛的是樊斌。樊斌不是创作室的正式成员，他从小要饭，要饭要到八路军那里，同志们说，别要饭了，当兵吧，共产党就是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他就丢了讨饭棍，成了红小鬼，从卫生员一步步熬到军医，也提高了文化。在进军西藏途中，眼见无数战友艰苦卓绝，大受感动，写了个中篇《雪山英雄》，出版后颇受欢迎。他再接再厉，又结构了一个新中篇。创作室发现他是个好苗子，为成全他的作品，便暂时“借调”来了。他也跟我一样，是个“一根肠子通到底”的家伙，自恃根正苗红，便放胆“鸣放”说：我见过一些坏干部，吃着国家的饭，整天闹自私自利，就像枣树上的尺蠖，一屈一屈地到处啃吃人民的财产。有些更可恶的，简直张着血盆大口，公开吸食民脂民膏。说起这些蛀虫来，我真恨不得拿机关枪嘟嘟了他们！

“反右”时，樊斌成了创作室当头第一名，说他对党“怀有刻骨仇恨”，证据就在“要拿机关枪嘟嘟共产党”！

若论我在“鸣放”中的表现，倒是个十足的“左派”，不但没有一句错话，还把三大“攻击方向”批驳了两个。从“左”

的立场上说，真称得起是我的一份“荣耀”。我说，“肃反”确乎伤了一些人，可也把一些人的问题弄清了，譬如我们华北军区整张志民，整得他几次哇哇大哭，连书信、日记都翻查了，最后结论是没事儿。既没事儿，他就用不着背个不清不白的“包袱”了。这不也挺好吗？我这话的内含是：我做过除奸工作，深知有些“嫌疑分子”的档案中，存有长久弄不清楚的“问题”，本人也许全然不觉，但在知底人看来，其“包袱”是极为沉重的。诗人张志民之被肃，是由于公安部的两条检举：一曰在逮捕胡风时，他在门口“探头探脑”；二曰，从胡风家中抄出了他的书信一封。假如没有把他“整”一通，想落个清白档案，是不大可能的，何况检举者是公安部呢。

至于“攻击统购统销”，创作室最大的反驳“权威”就是我。我刚刚亲自办了三年的农业合作化。三年中，按照党的文件仔细观察，确乎发现不少“新富农”苗头，就是说，这些“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多数还留恋新民主主义，不愿、也不满农业合作化的，因而成了合作化的绊脚石。党之所以发动“卖余粮”运动（即统购统销），就给“新富农”们一个沉重打击，绝了他们拿粮食去“投机倒把”剥削别人的路。我甚至拉扯上我的父亲，说他解放以后，小日子蒸蒸日上，就忘了旧日苦楚，正顺着“老富农”的发家路线，兴致勃勃地寻求发财呢。若不把他的“路线”掘断，怎么会规规矩矩地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呢。——我这话，说得叮叮当当，被驳的人只好哑口无言。

为此，当反右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力压下来的时候，创作室有个同志在惊愕之余，指着我说：“徐光耀，你小子这回又闹对了！”我听了，还真觉得又经住了一次严峻考验呢。

大家已经“兴高采烈”得差不多了，在宣布“鸣放”结束的那次会上，主任虞棘突又加给大家一个任务，他说：“‘鸣放’

是结束了，可每人还得交一篇‘鸣放’文章，把你们已经说过，或没有说完的意见，再用文字表达出来。这不是要求，而是死命令。诸位都是作家，各自去找题目。”我急不可待地说：“我怎么写？大家都见了，我根本没有意见呀……”不等我说完，虞棘就连忙又摆手又摇头：“不管不管！不是说了吗，死命令，有没有意见，都必须交文章，谁都一样。”老实说，自打参军以来，这还真是第一次听到“死命令”。好吧，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自己去想办法吧。

在家里绞了两天脑汁，从陈、陈、马、鲁“四人文章”，忽然想到部长陈沂。陈的领导，我素来觉得有点家长作风，而社会上时露苗头的文艺教条主义，也导致一些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这些“公害”，都有使文艺脱离群众的危险……就这样，脑子里一步步生发开去，一条凑一条，终于把文章凑成了，题目叫个《海阔凭鱼跃》，副题是《向部队文艺领导献上我的几点浅见》。为给写长篇挤时间，匆匆抄正发出。

过了不几天——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敲响了“反右”的战鼓，又过8天，《海阔凭鱼跃》在《文艺报》登出，白纸黑字，斧头也砍不掉了。

如果稍许世故一点，我也许能避过这次失足。因为已有征兆，足够使人警惕。是侯金镜又一次来到了大耳胡同，在谈及《文艺报》的内部情况时，他感情复杂地说：“这一回，唐因、唐达成、侯敏泽几个，恐怕要吃亏。他们说了不少‘出界’的话，至今势头挺盛。这么下去，会栽跟头的。”我听了不免着急，问他：“为什么不提个醒儿，帮他们一把？”侯说：“不行啊，你一说，他们会在会上揭你，说你破坏‘鸣放’。”接着他又说，本来他也想说说的，可张光年不让，说着，侯把拳头往腰后一掖：“张光年要保持我这个‘拳头’，到时候好用。”恨只恨

我那时太自信，太痴愚了，连这么明显的“引蛇出洞”警钟，也未放在心上。

但事后我常常想，虞棘其人，一向较为谨厚，有山东汉子之风。我们虽无深交，也绝无私怨，他从哪里找来“死命令”这一招数的？若说是“恶作剧”吧，虞棘似不是这种人；若说是支部故意设计，而同时上当的还有魏巍和胡可，他们都有“鸣放”文章出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直到1977年，忽得宝书《五卷》，拜读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时的伟大领袖，目光四射，洞察一切，对像创作室这样冷清的“鸣放”，是不能满意的。他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好来个“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五卷》425页）原来如此，“死命令”，乃整个战略部署下的战术发明，你还往哪里逃呢？

四、插 曲

忽想起一件与“鸣放”小有关系，可互相“照应”，最后留下一个“谜”的事来，也无妨记在下面：

约在创作室“鸣放”后期吧，虞棘通知我及另外一二同志，让去旃檀寺总政大院，参加给陈沂部长提意见的会。并说，此会是文化部与宣传部联合召开的，目的是整风，陈部长也希望听听各方面的意见。这使我有点兴奋：有机会当面给部长提批评，不是随意可得的。况且平时总认为他说话生硬，办事武断，文艺观点偏“左”，创作室许多人对有些畏惧。把这些话说给他听听，总是件好事。当然我也知道他是老革命，有不少功劳，文艺界惟一的一名少将，挑了我去“捋虎须”，不是好玩的。但还是

做好了发言的准备。

会场设在一个中等会议室，约五六十人之多，清一色都是军官，绝大多数我不认识，主持会议的是总政宣传部领导。与一般“鸣放”不同，气氛相当严肃。会议预定八点半开始，人早到齐了，时间已过，独不见陈沂露面。主持人一面派人去催，一面频频看表。催的人回来说，还有一点什么没有办完，得再等一会儿。主持人颇不耐烦地宣布：“再等五分钟。”五分钟过了，仍不见来。便有人提议，“开吧，开吧，说着等他。”于是有位首长指指我说：“徐光耀，听说你有些意见，你先说吧。”可我却站起来摇头说：“我不，我要等着陈部长来了当面讲。”这句话居然引起了一阵轰笑。但我刚刚坐下，陈沂就大步匆匆地闯进来了，连连说着“对不起”。

主持人便再次指我：“陈部长来了，你讲吧。”

可惜“文革”期间，我忍着剜眼剖心之痛，把日记毁掉了，不然，我会把意见复述个大概的。如今记忆力衰退，实在想不起说了什么了。但由此也可证明，我那些话都属于“鸡毛蒜皮”，没有可以上“性质”的。不然，总会记住一两点。但有个细节还留在印象中，即，我谈到了一件事，刚说了半截，陈沂突然插断说：“事情不是这样的，那是……”我也立即插断他，说：“陈部长，请你让我把话说完。我说错了，你有的是时间反驳。”接下去，一口气把话说完，没有再碰到阻拦。

几年之后，才奇怪我哪里来的那么大“贼胆”，“猖狂”到如此程度，可不就是明目张胆地向党进攻吗？有趣的是，此后不久，陈沂和我都被当成“右派”来打了。据传，斗陈的会场上贴有大幅漫画：满脸青绿的陈沂，正抱了马寒冰的尸体做投枪，凶恶地向党进攻！而我这次对陈沂的“攻击”，既无“向党进攻”之罪，也不给“反击右派”的嘉奖，大会小会毫不提起，

悄悄的“功过相抵”了。

此后的四五天，忽接到一封很奇怪的信。信封上标明寄自“克拉玛依第 495 勘探队”，打有三个邮戳，日期分别是“5. 23”，“5. 24”，“5. 25”，都盖自北京。8 分邮票的图案是红军长征“过雪山”。“克拉玛依”那时正声名大噪，因为据说发现了大油田。可我与克拉玛依素无来往，谁给我写信呢？

打开看，是半页竖行红格稿纸，字迹秀美流利，信很短，抄之如下：

徐兄：

偶读高中文学课本，见曹植《野田黄雀行》，甚感古风犹可贵，抄寄共赏。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
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削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致

敬礼！

友人自远方寄

（课文中注解尤有味道，不赘）

我的文化水平很低，看了，不懂。愣了半晌，想到正有一套高中文学课本在架子上，找着曹植这首诗看注解，说此诗乃告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意，才恍然觉得可能是个警告。然而又拿不准，我并没有“捕蝉”，惟一想捕的只是长篇。我身上也没有什么油水，怎会招得“黄雀在后”呢？虽给陈部长提过意见，可那是在会上，当面讲，毫无伏在背后偷袭谁的意思。到底怎么了？

下午，创作室仍开会“鸣放”，我把信带到会上去给大家传阅。人们有的摇头微笑，有的说是匿名信，是开玩笑，也有的说，写信人怕有阴暗心理，最激烈的说法是，“这是破坏运动，应当查一查！”……当宣布正式开会之后，我就把它收回兜里，一直保存至今。

匆匆 40 多年过去了，今天再看此信，猛觉写信人实在是一位贤明，在那网罗四张，钓饵垂遍的年月，他能一展大慈大悲之心，给我这位盲人瞎马一个提示，该有怎样一副济世救人的古道热肠啊！可惜的是，还从哪里去寻这位恩人呢？他是不是仍活在世上？他还记得这件事吗？天可怜见，信主虽然难找，信却成了我最堪珍藏的一件文物，若把它视之为抵制“阳谋”的义举，那价值就更高了。

五、“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反右运动兴起之后普遍流行于大小报刊的一句话。它所形容的是：各色各类的“右派分子”都落入“大海”里了，正遭着“人民”的“聚歼”。这“大海”之深、之广、之沸腾如烈火烹油，都够得上是“史无前例”。过去小说中常用的“鱼落网中，鸟已入笼”，绝对不够劲。一旦入“海”，你即使以头抢地，哀告求饶，都不管用了，必要扫尽你的斯文，剥尽你的尊严，辱尽你的人格，骂你个狗血喷头不可。其实，泛过这个“大海”，用不着再劳动改造，已尽够使人“脱胎换骨”了。

但后来有人评价创作室的整个“运动”说，“鸣放”阶段，基本上冷冷清清，“反右”阶段，也没有太大“火候”。意思是，从全局衡量，算不上“典型”。现在想来，倒也不无道理。若与

军外相比，真可能是很文明的。拿敲起“反右”锣鼓的6月8日社论之后说，创作室竟还安排人去度“创作假”呢，使我们几个——史超、周洁夫、柳其辉、黎白夫妇、徐孔和我，优哉游哉地上了北戴河海滨，轻松地写开了东西，并大游其泳。已在风起云涌地“反右派”，仿佛与我们全不相干。可是，有一日在阅报栏前，忽听周洁夫“哎呀”了一声，吃惊说：“怎么，刘宾雁也成右派了？他要成了右派，我们都得是右派！”我立即凑上去看，果然，刘宾雁已在报上“点名”，同章伯钧、罗隆基等划归一类了。

周洁夫一向沉默寡言，性格内向，我跟他不甚熟，亦不知他与刘宾雁是啥关系。但他的惊叫也惊了我的心：什么叫“我们都得是右派”？“右派”跟我们沾得上边儿吗？

然而，当天即接到创作室的长途电话，叫我们立即赶回单位，以参加对“右派们”的反击！我除了遗憾游泳尚未过瘾之外，倒庆幸长篇恰好杀青了。第二日一早，几个人骑了自行车往车站赶，路上，我绑扎得很紧的长篇底稿包袱，忽从后架上颠落，丢在地上。我心上猛感一震，觉得这是个凶兆。

创作室的第一次会议，给人印象还算平和。虞棘主任讲话，主要是要求大家放置手上工作，积极勇敢地投入“反右派”斗争，该揭发的揭发，该检举的检举；如果在“鸣放”中说了“出界”“出圈”的话，要进行检讨，早日“卸包袱”。谁跟社会上“右派”有联系的，更须及早交待，划清界限，以便轻装上阵。

气氛不算紧张，但是开始了。

“要拿机关枪嘟嘟共产党”的樊斌，自然首当其冲。可怜这个小要饭的，大概在旧社会也没有被30来人围着臭骂过。“尺蠖”、“血盆大口”、“吸食民膏”、拿枪“嘟嘟党”，开头还算是

“出界”，经过三批两批，很快都变成了“对党怀有刻骨仇恨”，“疯狂向党进攻”！按理说，谁个心中都明白：樊斌所想“嘟嘟”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坏干部。这个“个别”与“一般”的常用概念，不知怎的一调换，坏干部都成了“共产党”。与会的多数人在战争中锻炼多年，原则性原本很强，竟无一人（包括我）觉得这有什么不妥。悲剧就这样“顺利”而反复地循环。在这种局面下，朴实而又木讷的樊斌，全无一言可辩，只能认罪低头，不几天便“斗熟”了。最后，党籍军籍双开除，戴上“右派”帽子，发往云南麻疯病院“改造”去了。《解放军文艺》上发表的批判文章，题目就叫《反党逆子——樊斌》。

在斗樊斌的时候，创作室插空发了个打印文件，人手一份。题目毫无感情色彩：《公刘在“肃反”以后写的几首诗》，录有《怀古》二首，寓言诗四首，新诗两首。分别发表在《新观察》、《文汇报》、《诗刊》等处。只有最后一首长诗，不知何故，注有写作日月，而无发表处所。文件很干净，无一字说明。

公刘在“鸣放”中，对“肃反”表示过不满，但意见唔唔啾啾，说不上有多少“上纲”的东西，而这八首诗，却把他“扣”住了。我向来不懂诗，公刘兄这八首，我是第一次欣赏，读得也最认真。但当时还是不大懂，只觉得很好玩。且抄一首《刺猬的哲学》，大家共赏：

冬天来了，到处飘着雪花；
两位刺猬哲学家，
为了寻找食物，
抖抖索索的在野地里爬。

它们在路上偶然相遇，

彼此像绅士一样行礼如仪，
相互问过夫人公子的康健，
然后咒骂了一阵天气。

可恶的北风越吹越紧，
两位哲学家都觉得很冷；
不靠拢吧四面招风，
靠拢吧又实在蜇人。

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聪明的主意：
让双方保持一定的距离，
既不要过分的疏远，
也不宜过分的亲密。

可是天啊！这样怎能取暖？
如果各人只顾自己缩成一团！
丢掉这种刺猬的哲学吧，
应该掏出赤诚的心来交换……

怎么说呢？这首诗的用意并不隐晦，最后一段已经喊出来了。可按斗樊斌时专挑毛病的习惯，据我分析，还确有“反党”成分：同志间靠一靠，就会“蜇”着吗？这种现象如果有，也是个别的。党从来不主张人与人“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非要这么说，就是诬蔑！这么一想，自然奋勇起来，积极参与了对公刘的声讨。凡人如我者的毛病就在：自己挨骂的话记得清楚，自己骂人的话，大都不记得了。幸而公刘仍然健在，我都骂过他些什么，他是完全有权力随时揭发的——写到这里，忽觉有个疑难：

骂了公刘，泼了不少“诬蔑不实”的污水，道歉是当然应该的。可是，迁延至今，我既没有向公刘说过半句赔情的话，他也丝毫没有要别人道歉的意思，大家都认了！整人的，挨整的，都认了！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过这码事！今天，倘若有谁说了一句伤人的话，是要打官司的，道歉不说，还要索赔。可几十万或上百万的“右派”，至今无一人提过“道歉”要求。岂但道歉，即使“内部控制使用”，人不人，鬼不鬼，甚或家破人亡，“曳尾涂中”20余年，等等，除了一纸“改正”，和一个“扩大化”之外，也就万事大吉了。宽容固然是美德，可尽是一味宽容，老是认了就认了，认了就罢了，陈陈相因下去，会不会又弄出个什么“文化大革命”来呢？公刘兄善于思辩，不知他又有怎样的看法？

公刘在创作室诗名较著，文化素质较高，“知识越多越反动”，斗起来自然升温加码，格外带劲。所费时日也大大超过了樊斌。在“背靠背”会议上，支部几次布置要“加温”。随着斗争的深入，报上“点名”的“右派”越来越多。突然，四川冒出个“反动透顶”的诗人流沙河来，喊得最响，批得最凶的是他的《草木篇》，说是一株恶毒攻击党的大毒草。创作室顺风顺水，把公刘的寓言诗与《草木篇》排行，称之为《禽兽篇》。这样一搭配，“双峰对峙，二水分流”，在反党上便有了“异曲同工之妙”！哪怕公刘浑身是嘴，也辩不清楚了。

“人民战争”越打越火，地方上的反右烈焰，很快烧到部队来。一日，创作室的党员干部奉命去参加全国作协的“党组扩大会议”。我那时真是闭塞得该死，竟全然不知这个“扩大会议”是干什么的，直到卡车开到王府大街文联大楼门口，有人说：“丁玲来了！”我忙问：“在哪里？”有人指：“那不是！”果然，陈明搀着戴墨镜的丁玲，徒步蹒跚而来。我急忙跳下车厢，

跑过去把手伸给丁玲，说：“你好！”丁玲沉着脸不吭声，也不伸出手来；而陈明的眼睛里聚着一团惶恐和疑惧。我这才恍惚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急忙翻身跑回创作室的队伍，傻呵呵地一同进了大楼。

六、军外大舞台

原在王府大街 64 号的文联大楼，现已归了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甚觉可惜。这地方很有资格成为一个纪念馆。50 年代后期，特别在“反右派”运动中，它实在是个极有意思的风暴中心。我相信，文艺界大部分从那儿进出过的人，终其一生，都将很难把它忘怀。

“党组扩大会议”的会场，设在二楼圆柱大厅，不大规则的摆着些桌椅，说不上哪是主席台，靠东墙有两张“课桌”，几名主持人就常常聚在那里。就风格论，很有点自由散漫的民间意趣。主持人中最活跃的，自然有周扬指为有“大功劳”的刘白羽，以及邵荃麟、诗人郭小川等等。不知为什么，周扬却坐在一个角落里，不是后来他偶然插话，我还以为他不在座呢。丁玲和陈明共一张“课桌”，陈企霞坐在另一个地方。另有几位格外苦脸低眉的，如冯雪峰、艾青等，都插在角角上。其他与会者大多是文艺界的头面人物和知名人士，散乱地挤在“池座”里。宣布开会前，满大厅只听见“嚓嚓”的脚步着地声，有交谈也是噓气样的“窃窃私语”，整个气息都屏住了似的。

我绝对不是描述这场风暴的“权威”，也谈不上合适人选，充其量是个半陪绑性的“小萝卜头”。因“内幕”不明，又事隔 42 年，我只能从个人角度，就耳目所及，略述些“表面现象”。若睹全貌，只能俟诸真正权威大家了。

会议开始，周扬和主席们都没有讲话，这也不奇怪，“扩大”已开过多次了，我们是被再次“扩大”来，半途插入的，没有见到开场一幕，也就很自然。今天抢占发言先机的是方纪，他那时在天津作协负责，正当壮年，身材高大，口才极好，洪亮的嗓音配合着手势，加强了他揭发问题的轰震效应。他说：天津文艺界的反右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与陈企霞关系密切的柳溪，已低头认罪，并揭发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大的反党阴谋计划”！接着，他先历数陈企霞“伪造信件”，组织“翻案”，“到处点火，向党进攻”等等恶行，然后才把这个“大的反党阴谋计划”揭开盖子，说：丁玲计划在即将召开的文代会大会上“公开退出作家协会！”这是令人“全身发冷，毛骨悚然”的“分裂全国文艺界的”狠毒阴谋！在最后，方纪又掏出一本《南唐二主词校订》，摔在桌上，说，它就是陈、柳之间联络暗号的物证。

我惊愕，我痴呆，我脑袋里轰轰乱响，但还不到魂飞天外的程度。停了一阵，在新奇感和震颤感递减递消之后，忽而敏感了起来，在方纪列举事实过程中，牵连人数之多，最叫我惊心。依稀记得“被点名”的有：艾青、冯雪峰、李又然、聂绀弩、胡考、唐达成、钟惦■、孙毓春、浦熙修、梅朵、姚芳藻……还提到陈企霞有 200 多学生，等等。至于丁玲和陈明，更是案中主犯，不言而喻，这个发言的威慑力实非寻常，特别是一提到大阴谋“分裂文艺界”，界限一划，“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些人不就都归到一块去了吗？

“反右”进展到当前阶段，“点名”，已成为一种“请君入瓮”的手段，甚或就是“罪行”的证明。方纪的发言，很明显把会上的“火候”提升了一个高度，如他自己所说，是“突破性的”。此后不久，郭小川有个发言，更把“点名”带上新高。

郭小川同志是个好人，口碑至今不坏。但他在批判冯雪峰时，一开口就吓人一跳。他说他怀疑冯雪峰到底是不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如果不是，骨子里又是什么？为证明这一“立论”，他念了一个为冯所接近所信任者的索引表，上名单的一共17人，他们是：

胡风、姚蓬子、韩侍珩、冯达、黎烈文、孟十还、彭柏山、刘雪苇、吴奚如、潘汉年、肖军、尹庚、丁玲、陈企霞、顾学颉、舒芜，张友鸾。

郭小川解释说，这些人都是反革命，特务，叛徒，右派，反党分子，政治面目不清，思想反动的人。说冯从“左联”时代就与这些人“像影子一样离不开”，一起发泄对党的不满，与党闹对立，或是进行疯狂的反党活动。郭小川还引申说，“如果雪峰也像普通干部那样，拿着这张社会关系表去谈工作，我看哪个机关也不敢收容的。”这话自然很不错，然而，若按此“标准”也套一下周恩来，给他也列这么一张社会关系表，又将如何呢？——真不敢想下去了。

我认为，还应在此赘上一笔的是：郭小川同志在批冯与胡风的关系时，说了这么一句话：“冯（雪峰）胡（风）利用了鲁迅的生病的身体，那几篇重要文章都是在鲁迅病重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的情况下通过发出的。”我觉得实在太过分了，不但不讲道理，也不通。我真想为郭小川同志一哭！

每次会议都必须参加的丁玲，自始至终的与陈明坐在一起，听着各种各样对她的批判，侮辱，作践和羞辱。她的痛苦，她的隐忍，她的入地无门，我这支秃笔是没有办法写出来的。曾几何时，她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从延安来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左联”时期的领导骨干，中宣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文艺报》和《人民文学》前主编，斯大林

奖金获得者。转眼之间，变成了“反党阴谋家”、“野心家”、“极端卑鄙的个人主义者”，当面被斥之为“落水狗”、“杨荫榆”、“莎菲”，乃至“凤姐儿”、“奸臣”……新中国建立才七八年，自己阵营里的“阶级斗争”就打成了这样！

为了把丁陈彻底地“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会议还邀请来党外的茅盾、郑振铎、老舍、曹禺、臧克家、许广平等这些民主人士和文学巨匠，借助他们的声望、威信、影响和才干，来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批判和侮辱这些人。在一次会上，我亲见许广平指着冯雪峰的脸，骂他“心怀鬼胎”，“不知羞耻”，几乎声泪俱下地指斥他说：“那时鲁迅正病得厉害，你还去絮絮叨叨，烦他累他，说到半夜，还在纠缠不休，你都想干什么？……”仿佛冯去找鲁迅，真个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冯雪峰放在案上的左手抖得瑟瑟的，一张惨青的老脸，憋涨着怎样的痛苦啊！这位 55 岁的驼背老人，领导过“左联”，参加过长征，蹲过上饶集中营，奉党命去做鲁迅的工作，为革命赴汤蹈火大半辈子，他怎么会想到，忽然之间就成为如此遭人唾骂的“右派”呢？

人们会绝对相信，从许广平的一生看，无论怎么说，她都是革命阵营中的一位志士。岂但她，其他被邀请来的党外文学巨擘，也都或长或短、或轻或重地发过言。他们往日在旧社会、与国民党作斗争的时候，都是品德高尚，注重名节，从不胡说八道的，如今却顺着大势，做些连自己也未必清明的所谓“批判”，捕风捉影，胡乱扣人“帽子”。他们都是有资格名垂后世的，此后，当他们面对后人，要出全集的时候，再重翻这些“发言稿”，还能找到法子安放这份尴尬吗？有人说，中国文人自古就有个毛病，一碰上“黑手高悬霸主鞭”的逆境，很容易堕入下作不文之流，以至出现人格分裂，神志昏崩，理性和良知陷入混乱的情况。特别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整人的也挨整，

挨整的也整人，大家互相诋毁，互相撕咬，最无可奈何时，甚至互相欺诈，互相葬送。作家唐瑜说得好：“整个国家像中世纪的罗马竞技场，奴隶扑杀奴隶，以供奴隶主取乐；奴隶扑杀奴隶，为求自己得以苟延残喘。”话虽苛苦，情形确是这样啊。

当然，动机是有差别的：有的为洁身自保，有的为“立功自赎”，有的为证己无罪，也有的是奉命“打冲锋”，强作积极，自然也不排除有用人血染红顶子的。但从绝大多数看，却只有一条，那就是吓坏了，吓昏了！许广平倘不吓昏，怎会对鲁迅的战友说出那种话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巴金，若想反思或痛悔，能“思”得了，“痛”得成么？

但也有一个人与众不同，这便是老舍。老舍先生的发言最具个人特色，依然保持他幽默、冷峻、直白的一贯风格。听内容、名为批丁陈，实则颇多弦外之音。他说：“我早知道有人不大敬重我，说我当作协副主席，是把我抬得过高了。我说，并不高。”接着，他就说了几件在重庆从国民党手里救作家帮作家的事情。然后自问自答：“我不是在这里表功，更要紧的是解放后我可曾拿这些当作资本，争取当作协副主席没有？没有！我在重庆团结过作家，我有资格当作协副主席。我不是向上爬的人。我不会向首长们吹嘘自己，让我作副主席。”下面又谈到，外宾在他家吃饭，他送外宾小礼物，都没向作协要过钱。组织上请他去北戴河、颐和园休假，他也不去，“我有自己一个小院子，为什么要上颐和园把别人休息的机会挤掉呢？”他说，作协的庶务科说他是“最省事的副主席”。他号召，“我们的国家还不富，我们应当勒紧裤腰去搞建设。”

他还谈到要尊重民间艺人，要帮助戏剧曲艺的发展，要重视侯宝林。最后落到“要团结”，做到“人人能够不猜忌，不虚假，不狭隘”，“大家都说真话，不背后嘀嘀咕咕。”

他的话，说不上石破天惊，确乎是格格不入，不记得有什么掌声，不过，人人都听得很提神。老舍毕竟是老舍，在这样的会上这么说话，也就难怪他后来要跳太平湖了。可若把他的话细一“咂摸”，也有令人生疑之处，有些话，是颇涉党的“秘密”的。会上常批冯雪峰等人向党外“泄露秘密”，那么，是谁向老舍“泄露”过呢？可当时谁也想不到要去追究，这就更使人觉得耐人寻味了。

七、“花絮”（一）

人生大舞台毕竟是丰富多彩的。在压抑紧张气氛中让人破颜一笑的“花絮”，也曾出现过。我首先要说的是艾青。艾青虽然很早就同丁、陈一样坐在了“被告”席上，可态度一直很悠闲，似已超脱红尘之外了。每听见逗乐及滑稽话头，他绝不掩饰、也绝不控制自己的笑容。为此，常有人骂他“不老实”，“不严肃”。但他仍照笑不误。有一次，主持人拿他开刀，选了他一段“自我检查”稿，念给大家听，其中有一句说：“那时我正生孩子呢……”引起爆炸性的哄堂。主持人气愤已极地说：“这个所谓的‘检查’，明显地是他老婆代写的，他看也不看，就这么原封交上来了。这对党是什么态度？”大家也自然跟着气愤，乱哄哄抗议。可你瞧艾青，脸上意气洋洋，照旧浮着一层微笑，意思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有位诗人说过，真正的笑，是“穿越了地狱的琼瑶”，大概就是这样的了。

第二件事纯粹是场意外，说不准是第多少次的会上了，批判正在高潮中。那天会场的布置也有所创新：桌子摆成一个大圆圈，人在内外分坐，坐在内层的脸朝外，坐在外层的脸朝内。谁发言就站到圈子中心去，可以很自由地转着圈子选择“听众”

交流。事情就出在我联大的师母逯斐身上。她一面发言一面转，恰恰转到坐在外层的我的对面，突然说：“有人还恶毒攻击揭发问题的同志，比如——这话好像是徐光耀说的，说康濯同志是个‘汤裱裱’！……”这句话刚一落地，坐在我对面的康濯就“腾”地跳了起来，高举拳头，大呼口号：“我抗议！我抗议！这是对我的最大侮辱！……”他满脸紫涨，目眦欲裂，先是狠狠地瞪着我，见我也正瞪着他，便转过身去，又嘶声高呼：“我抗议！我抗议！……”大家都被这奇峰突起的事件闹愣了，像在静观，又像变成嘴爪麻醉的一群呆鸟，静悄悄全无反应。康濯只好喘着咻咻大气，又复坐下。场上一冷，逯斐又接着发言，气氛乃渐次归于平静。

我已无心再听逯斐，一面观察康濯，一面想：“到底怎么了？干吗发那么大的火？”康濯是文研所副秘书长，我入所学习时认识，是个很会办事，颇讲上进的人。郭沫若曾说他的短篇比丁玲的写得好。约一年前，曾风闻说他是“起义将领”，至于起了什么“义”，我连打听也没有打听过。这次是戳着哪根肺管子了呢？直到逯斐下去，又换个新人发言，众人都不再注意我俩时，我才悄悄问与我并肩坐着的胡可：“什么叫‘康裱裱’？”

胡可一听就睁大了双眼，反问：“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我懂都不懂，怎么会是我说的！”

胡可叫我马上写条子给主席，声明不是我说的。我还满不在乎，说忘了带纸笔，反正跟我无关，慢慢再说吧。胡可就掏出本子，撕下一页纸，又把笔给我，促我立即写了这个条子：

主席：

逯斐同志刚才说的那句话，不是我说的。

请调查。

徐光耀

把条子交给刘白羽，回到座位又问胡可：“什么叫‘康裱褙’？”胡可颇烦躁，只低声一句：“回家再说。”

散会回到家，我又追着胡可问，他才说：“你不是看过京戏《一捧雪》吗，那里头有个汤勤，会裱画，人称‘汤裱褙’，这出戏的后头两折，就是《审头·刺汤》……”我想了一想，才恍然似有所悟，原来‘康裱褙’是我听错了。

即使如此，康濯那么激动，似也大可不必。个别行事不妥，人人在所难免。日后孙犁说他，有时有“进退失据”的地方，为人还是很不错的，话说得很是公允。

还有一次“洋相”，也出在我身上。好像出于爱护，支部劝我说：“徐光耀，你是丁玲、陈企霞的学生，对这场斗争应该有个更明确的态度，这对你是有好处的。你考虑，是否可以在大会上发一次言呢？”话虽客气，刺是硬的，我敢说“不”吗？于是又嘱咐我，发言稿写出来，先交大会主席看看。我道“好”。

这是个不小的难题：一、我手中没有丁、陈的犯罪事实，在如此激烈的“发言比赛”中，怎么能争得上“名次”呢？二、在给作协党组的复信中，已郑重“惭愧”过了，承认在1955年中宣部党员大会上的发言，是“不够认真的”。这一回，难道自己拉屎自己吃，再去“不认真”么？……

然而，不发言是绝对不行的。憋了将近一个通宵，把致作协党组的信中单单不利于丁玲的“事实”抄上一些，而把重点放在“批判”上，只当是臭骂自己，拣着解气的词句狠批一通，大约也就够了。稿子写成，第二天一进会场，就呈交给主席刘白羽。

大会又开半天，临散，背后有人捅我，说刘白羽叫你。转身

一瞧，在大圆柱子那里，果有刘白羽在候着。他那张本来很白皙的脸，此刻更白了，嘴角紧闭，一双眼直盯着我走到他的跟前，右手忽地一掷，我那发言稿就向胸前飘过来。我急忙伸手抓住，到听清“你还在‘吁请’啊！”这句话的时候，他已转过脊背，走向圆柱后面去了。

展开发言稿重读，才发现“错误”是出在最后一句上。话是冲着丁玲说的：“我以你学生的名义，吁请你痛改前非，争取回到党的怀抱中来。”当初倒也有点预感，写这“吁请”一词时，心中曾嘀咕是否太软了？可又一想，是希望她“回到党的怀抱”，不“吁请”，难道强迫不成？何况我一个微不足道的学生，娃娃辈，谁在乎我用词的软硬呢！哪知这一含糊，不但稿子通不过，恐怕就此定了我的命运，也说不定的。

然而也有个好处，自此再无人找我发言，也就免于重犯“不认真”的错误了。

我所经见的最后一件“花絮”，不太轻松，反而构成会上的一个大浪，也是给我的第二次“点名”。陈企霞未能“顽抗到底”，终被“突破”，作了“坦白交待”。他这个“坦白交待”，正像有些人说的，标志着“丁陈集团”的“全面崩溃”。他开口就说，他想死，他已经买好白酒和毒药，准备了遗书。因为他预计，在柳溪发言之后，他会被绑上台，由大家臭骂。然而，没有绑他，于是被感动，决心彻底缴械。

他所交待的“比柳溪所谈更可怕”的第一件事，是与一个女人姘居十年，二人合伙写过三封匿名信，向党中央告状。他当场交出一把钥匙，说就是他与那女人在“密室”的门上的。接下来，谈他受处分后怎么不服，怎么与丁玲密谋翻案……后来，又揭发冯雪峰，说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胡风看法一样；说苏联的日丹诺夫，是有学问的大教条主义，最难

反……等等。他说得很激昂，很直率，听来十分“过瘾”，我也听得如傻如痴。

其中也有关于我的一段话，是这么讲的：“徐光耀一向把我看成道貌岸然的老师。我要人向徐说：你悄悄送给陈企霞三四百块钱，但不要让陈企霞知道是谁送的。用徐光耀的钱不止一次，还曾托李兴华向徐要过钱，徐送来两百元。对这些事，同志们可以用最恶劣的字眼加给我。”确乎很赤裸，把自己剥得“精光”。

用了我的钱，还预先策划“不要让陈企霞知道是谁送的”，使我这个缺心眼的人，乍一听，很感悲凉。而关于那两笔钱（有一笔是三百元，他说成两百元，是记错了），以陈企霞向来的高傲和自尊，能说出“同志们可用最恶劣的字眼加给我”这样的话来，就事实论，也就很清楚了。岂但如此，便是他的“坦白”，除了些私丑，又有多少事称得上是“反党”的呢？然而，整个会场已经沸沸扬扬，一些人掩不住自己的高兴，大敌攻破，一面准备上报，一面预备庆祝胜利了。

总之，在这王府大街的文联大楼里，“党组扩大会议”是富有“成果”的。我有幸目击了丁玲、陈企霞、艾青、冯雪峰诸人的被批斗，他们很快都成了大新闻的主角——登报了。可惜的是，以后怎么又网住了舒群、罗烽、白朗等一千人，因我已落入“大海”，取消了与会资格，就全不知情了。而十几次会议锻炼出来的这个“右派集团”，究竟有多大，恐怕是更难说清的。在方纪发言中点到的如李又然、胡考、聂绀弩、钟惦■、唐达成，甚或梅朵、姚芳藻，以及后来的公木等等，算不算入了伙的？古立高曾在我们大耳胡同说过：在丁、陈、冯、艾之下，另有“八大金刚”、“十二门徒”之说。创作室在批斗我和黎白的时候，又说联大文学系有个“一百单八将”，还郑重命令黎白把这“一百单八将”的名单开列清楚，呈交上去。若按方纪说的“陈

企霞有两百多学生”，那这数目还须加倍。此外，文研所已办两个班，属于丁玲的“门下”，又有多少人呢？若再加上冯、艾等人的亲朋好友、从来过往诸人，就愈发数不清了。可见，“汪洋大海”之说毫不夸张，“人民战争”很有得打呢。

近日读到雷达一篇文章，说他前不久曾去一趟王府大街64号，在二楼大厅，忽听到“咕咚”的一声，不禁毛骨悚然。这是“文革”时，戏剧家田汉被“红卫兵”逼得无奈，在此处猛然跪地的声音。雷达以为，这是他平生所见的惨事之一。其实，这样的惨事还有很多，都不过是1957年“党组扩大会议”的顺延罢了。所不同的，是后来“运动”得更为壮观、热闹和惨烈，因为已不止是“知识分子成堆”，又掺和上“红卫兵”和“造反派”了。所以雷达也说，这地方确有成为纪念馆的资格。

八、挨 斗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还是让我们回到创作室来。

文联大楼的斗争热浪，催得创作室亦连续升温。先是命令与丁陈有关的人赶快交待，“再被动就危险了”。我于是写了个文字材料，恭恭敬敬地交待了三件事：

一、去年12月12日，给作协党组写过一封有关丁玲的信。

二、经李兴华手，送给过陈企霞三百元钱。

三、到丁玲家去过四次：一次帮她买出国礼品；一次是丁玲宴请《桑干河上》的俄译者刘芭夫妇，让我去陪吃；一次是丁玲宴请聂鲁达、爱伦堡两对夫妇，又让我去陪吃；最后一次是与同学孟冰，找丁玲要求去朝鲜战场体验生活。

这个交待写在陈企霞的大“坦白”之前，由于一时的人情味发作，心一软，把给陈企霞的第二笔钱隐瞒了，于是铸成我的

第四行大罪。隐瞒的原因，主要是怕把那位女同学扯出来：她30左右了，一直未婚，一个人孤苦伶仃过日子。联大时她是我的学习小组长，很文静，也勤奋，十分爱惜“羽毛”。丁、陈的案子如此火爆，一旦扯进去，必被穷追，那她的日子还怎么过呢？何况，不是说过钱算她借的，与陈企霞无关吗？就算隐瞒了，拿党性、良心一比，也说不上有多大过不去……

冷不防陈企霞在大会上自己揭出来了，而且说他们已姘居10年。我大惊之余，赶忙给支部写补充交待，但已来不及了，铁的事实证明我“对党不忠”，而我自己也很服罪，对党隐瞒，这当然是很不对的。

为什么每逢交待，我总把给作协党组的信列为头条呢？它本来在党的生活中很正常：党组织给党员写信调查事情，党员按要求提供回复。其中无诬陷，无造谣，不虚假，也不故意制造混乱，凡事实都有根据，日月地点场合齐全，极其便于查对，按理说，这么用心的写信，应该受表扬才是，怎么倒成了犯罪嫌疑呢？这不滑稽吗？若说这就叫反党，那么，党员再接到党组织来信，应该怎么办？难道不回答，不理睬，什么全不提供，一切都去你娘的呱哒哒，才能做到不反党吗？何年何月，有过这样的党章呢？

但又为什么交待呢？这主要是凭感觉、环境给的暗示。尽管作协党组是党，支部也是党，但你的信与丁玲有关，那就得“交待”！同时我也感到，仿佛有人正等着这封信，好早日见识一下它的内容。

“交待”了，也果然马上见效，不出三天，这信被复印30份，在斗争公刘的会上分发，创作室成员人手一册。也给了我一册。复印技术在当时很先进，原件上被人划了黑线的地方，也都清晰可见。

尽管凶兆越来越多，我仍很自信，就让大家拿最挑剔的眼光，把这信好好儿看看吧。创作室那么多老党员、老干部，大多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过，有着多年的党性锻炼，我不信会凭着这个定罪，除非他们都疯了。然而，事实却证明，恰恰是我疯了！

就在斗公刘的会宣布“告一段落”那天，我被正式点名。主任虞棘说：“明天上午的会，徐光耀同志检查交待，希望做好准备。”尽管我已有预感，还是大吃了一惊。虞棘看到了我的惊愕，解释说：“第一，你给作协党组的信，性质很严重；第二，你也有‘言论’，《文艺报》上发表了文章；第三，文联大楼会上，‘点’了你两次名……”

谢谢他，一下子使我明白了很多……

又一下子使我糊涂了很多……

这一夜，我几乎没有睡觉，明白和糊涂捉对儿厮杀，两个我：你杀死我，我杀死你……

可恨的“文革”，吓得我把当时的日记毁掉了，记不清这个日子了。这一日，真是我生命史上下地狱的一天啊！

第二天上午，我作了详细的“交待”，交待了与丁玲、陈企霞来往的全部历史，全部过程，全部内容。所谓“全部”，其实不准，我所交待的只是丁、陈“错误言行”的全部。至于他们那么多革命的正确言论，那是绝对不能提及的。提了，就会招致“又搞翻案”，甚至“继续向党进攻”的训斥。这在樊斌和公刘的身上，已屡屡体现过了。

大凡一个人挨斗，总须经过这么一些阶段：坦白交待，批判揭发，深挖根源，“梳辫子”定案。而交待，揭发，批判，大都错综交叉，贯彻全程的。一般的规律是：凡初期的交待，总被批为“不坦白”，“不老实”，“避重就轻”，“继续隐瞒欺骗”。眼见的樊斌、公刘、丁玲，无不如此。我，当然也逃不掉。后来，

从别处推广来了“经验”，在“坦白交待”之后，必须来一个“打态度”阶段。据说，有些被批斗的人，顽强抵抗，放肆狡辩，气焰嚣张，全无认罪之意。若不先把他们的“威风”煞下去，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因而，必须先“打态度”，待其老实低头之后，才能有所“交待”。而方法，则不外乎臭骂加温，拍桌打凳，大呼小叫，“狗血喷头”，必要使你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屁滚尿流，筋骨瘫痪而后已。斗公刘的时候，“背靠背”会议还只布置“加温”，到我这里，“打态度”经验恰恰传到，于是，什么丁、陈的“走狗”，“马前卒”，“吹鼓手”，什么“忘本”，“叛党”，“资敌”，“卖身投靠”等等等等，都成了司空见惯，题中应有之词。“温度”之高，要人保持不发昏，那是万难的。

其实，我与丁、陈的交往，就那么几次，活人当时都在，哪里需要下大功夫呢。1947年，我成了陈企霞系里的学生，除听课外，没有其它接触。开国那年，他给我的长篇《平原烈火》提过修改意见，并介绍发表和出版，是对我的最大“恩惠”。可《平原烈火》是歌颂共产党八路军的，我也没吹捧过陈企霞，这都没法子“上纲”。此后，他被打成“反党小集团”，我们就没有再见面了。我的“错误”就是两次给钱，又全是别人主动、别人经手，陈企霞自己已证明得很清楚了。至于丁玲，我交待中有一个精确的统计；听她讲课、讲话（包括开学典礼、学期总结、“三八”节座谈、毕业典礼等），共八次；通信两回；去过她家四次。就这些，全可找得出人证物证。凭这点接触，她就能把我培养成“反党分子”，岂非太神了吗？

细心的读者会问，“去过她家四次”，有无实在内容呢？问得好，本来这也是斗争会上的重点，且让我把“坦白交待”底稿上的有关部分，原文照抄如下：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一日，她（即丁玲）打电话叫我和李纳（文研所女学员）到她家去玩，我们去了。原来是陪《桑干河上》的俄译者刘芭夫妇吃饭。这是第一次到丁玲家去。这次，她把我向冯雪峰介绍时说：‘他的《平原烈火》我觉得比《新儿女英雄传》写得好，《新儿女英雄传》没什么人物，是凭故事取胜……’又说我是陈企霞的学生。然后又向我说：‘你那篇《我怎样写 平原烈火》写得不好，以后不论谁再叫你写这类文章，都不要写了。你怎么写的那本书，脑子里朦朦胧胧还不大懂呢。我本来想给你抽掉的，又怕打击你的情绪，还是发了。’当时，她是《文艺报》的主编。

“第二次到她家去，是一九五一年十月二日（还有十来个青年作家），是去陪爱伦堡夫妇和聂鲁达夫妇吃饭，坐约三小时。她把我向这二位大作家介绍时，曾说：‘这个青年出过一本小说，写得很有才能。’

“第三次到她家去，是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我和学员孟冰向她要求到朝鲜去体验生活。这次她跟我们谈了很多话。大致有：

“谈到了读书，从而谈到果戈理，普希金，巴尔扎克……等等，向我们推荐了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也谈到了中国古典文学。

“谈到了生活。她说：她‘就是一个作家，气质也是作家的气质。’她说，‘我就近不得生活，一接近生活便有创作冲动。’她说，她想写的东西太多了。目前最吸引她的有这几个方面：第一，想到新疆王震的部队去看看生产和打小仗（剿匪）；第二，想到东北的大森林中去看看伐木；第三，或者到湖南故乡，看看伐木者们的‘顺流而下’；第

四，去黄河，看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她说，‘我喜欢有色彩的地方，喜欢一般人不大注意或不爱去的地方，我是不跟人赶浪头的……’

“还谈到《桑干河上》的写作情形，她说，这书是她的一种试验，试验怎样用许多小事把人物刻画出来，尽量避免单纯的叙述。

“这一次，她答应了我们到朝鲜去。

“第四次到丁玲家去是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丁玲和曹禺将去莫斯科参加果戈理逝世百周年纪念。因我曾在去苏联前帮代表团采办过出国礼品，说我有经验，也帮她买些出国礼品。这一天，除上街两次买东西外，还管了些记记账，打电话，催商号送货等事。丁玲跟我说过这样一些话：‘一个人出国，出风头，并不是什么大荣耀（此段话在复给作协党组的信中已引用过，见前，不再重复——笔者）……’

“她还拿出几本装订得很考究的果戈理的书，对我说：‘一个人写出书来，值得这样装订就好了。’

“她问过我家里还有什么人，有没有在北京的，对继母叫不叫‘妈’，杀过人没有，过去有没有很大的烦恼，等等。但我不明白她问这些的目的。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丁玲去找马烽，在（文研所）院子里碰到我。因我马上就要回部队了，她说了一些鼓励的话，最后说：‘你应该想法搞创作，不要搞编辑，蹲办公室不好。心里要经常有个打算，有个写长东西的打算，不要乱抓；乱抓在没事可干的时候来一下，磨一磨笔，不能总是乱抓。

又，“一九五四年（忘记了月日），不记得在一个什么

公共场合碰上了丁玲。我当时是从农村回京办事。她见面问我去看陈企霞了没有（正是《文艺报》犯错误，陈企霞挨批评，反胡风斗争刚进入批判思想阶段的时候），我说没有。她说：‘你去看看他吧。他现在情绪很不好，就一个人闷在屋子里。他这个人是没有朋友的，难得有人去看他。你是他的学生，他见了你会感到安慰。你去劝他写写文章，批批胡风。文章写好了，发表了，他的精神情绪，都会好些，就不会光集中在受批评的事上了。而且文章一发表，人家也就不会以为他是被打倒了。’隔了两天，我去看了陈企霞，并把这段话的意思向他说了。当一说到‘人家就不会以为你是被打倒了’时，陈企霞跳了起来，连问：‘谁说我是被打倒啦？谁说我是被打倒啦？’我没有说是丁玲说的，只说是怕人误会成这样。”

大家看，这儿所录的话，从用词、语气、风格，到情感表达方式，都绝对是丁玲的。那时的“反右”运动，正“遍地开花”，所有与丁、陈有关的人，都在忙于“坦白”，各单位互通信息，互转“材料”，共同“破案”，“气温”一升再升，“牙膏”挤了再挤，哪容你有半字虚假。我这人向来“无事不可对党言”，从第一次交待，到最后定案，基本事实就是这个样子。参与斗我的十几、二十人，至今大多健在，他们没有一个指出过，说我第一次的“坦白”，后来又作过修改。惟一的一次“补充”，就是给陈的第二笔钱，我连忙申请了处分，当时还有人疑我故意小题大做，是想掩盖重大阴谋呢。那时我可真的怨恨起丁玲来了：你暗地里搞了那么多反党勾当，就一句知心话也不跟我说。如果说了一句，我今天也好坦白呀！

无可“坦白”，就把上面所录丁玲的言行拿来抵偿。凡能上

“纲”的，都被录进去。所以，这些就都成了“宣扬一本书主义”，“鼓励骄傲”，“宗派小集团活动”，“向党猖狂进攻”等等罪行的佐证。至于丁玲说过的更多的话，那是不能、也不敢录进去的。可悲的是，这些“坏话”被保留下来，而好话却永远消弭在大气里了。

九、也让丁玲亮个相

在这篇长文中，我一直没给丁玲一句申辩的机会。从开头到眼下，她一直是个罪犯形象。这是有失偏颇的。现在借个机缘，请她自己来点“独白”。不只为公正，也调剂一下氛围。

在我挨斗不久，支部又下过一道命令：凡与丁、陈及相关人员的通信，要尽数上交，不得隐匿或销毁。这是把“反胡风”的经验移植过来了。胡风只“三批材料”（主要是通信），就打出一大群“反革命”来，效果非常显著，创作室跟我要信，自是理由充足。于是连忙检点丁、陈及联大同学们的来信，即行清理上交。

上交之前，禁不住要把它们看一看，也是加小心的意思。其中属于丁玲的有两封，不看则已，一看，不觉悲从中来，翻来覆去硬是难以割舍。幸已夜深人静，大家都休息了，便冒了加倍遭惩的危险，把稿纸铺于灯下，一字套一字地把它们偷抄了下来。为了保真，我甚至仿临了丁玲的签名。所谓“叛逆精神”，我身上向来稀有，这一回，要算是最大的例外了。

私人通信，不为宣传，最能见人肺肝，我们不妨用吹毛求疵的方法，潜心静意，仔细看看这个“大右派”是怎么说话的。前一封，写于1952年8月4日，我正在朝鲜战场体验生活，因碰到一些困难，写信向她诉说。不久，就在火线的山洞子里，收

到了这封信（为保存原貌起见，行文有误之处，亦一仍其旧。下同）：

光耀同志：

今天读了你的信，忍不住要同你谈谈。

你走后，我才读到你的文艺整风思想检查的发言。从那个发言中，我才知道在你的思想中存在着颇大的问题，就是你关心你的写作问题比关心政治生活（即生活的政治意义）多。因此你心中是空空洞洞的，并没有使你非写不可的东西，所以你就怎么也写不出，写不好，而且觉得无什么可写。看到发言后觉得你去朝鲜是对的，但觉得没有好好同你谈谈，很可惜。我就怕你去朝鲜也收获不了什么。许多人去了也是这样的。不过现在同你谈也不迟。当然会因为是写信的关系就谈的简单些。

第一，我劝你忘记你是一个作家。你曾写过一本不坏的书，你是一个文艺工作者，你忘记了，你就轻松得多。因为这就会使你觉得与人不同。这意思不是指骄傲，而是指负担太重。因为你发表过一本书，你就有读者，你的读者和朋友就要求你跟着写第二本更好的书。自然，他们的意思是不坏的，可是你却苦了，你怎么也写不出来，你焦急也没有用。我可以告诉你，读者又在慢慢忘记你，朋友的心也在冷了，这并不可怕，这就是说你可以不着急了，你可以慢慢来，你也可以把你的读者朋友忘掉，把那些好心思忘记掉，你专心去生活吧。当你在冀中的时候，你一点也没有想到要写小说，但当你写小说的时候，你的人物全出来了。那就是因为在那一段生活中你对生活是老实的，你与生活是一致的，你是在生活里边，在斗争里边，你不是观察生活，你不是旁观

者，斗争的生活使你需要发表意见。所以你现在完全可以忘记你去生活是为了写作的，是为了你的读者朋友等等的想法。

第二，你不要着急任务。我们并没有加给你什么任务，你的任务是去生活，去好好改造自己，学习生活，学习做人，学习做一个好党员，一个有知识，有学问，有见解的好党员，一个有修养的党的文艺工作者。你曾经写过一本很好的书，这是非常可喜的事，但离一个作家，一个成熟作家还很差，现在还是首先从做人做党员着手，写是第二。你不要忘记，暂时写不出不要紧，怕的是永远写不好。

第三，暂时可以不回。中国文学史这一季，你已经没有学了；没有学就留在以后学。下一季是苏联文学，你如在朝鲜无法生活下去，就回来学，如有法生活下去，就暂时不回来，苏联文学也留在以后学。不过，如果的确生活不能深入下去，我以为就要回，免得在那里虚度光阴，以后再下去也是一样。生活中的方式、运动、变化是很多的，但也不是非死捏着不放，死捏着也不一定就懂得了。你可以按情况机动，也要有决断，不要从小处顾虑。

多理解人吧，不是为写作和人做朋友，是尊敬人、帮助人，是向党负责的去爱人、帮助人。努力克服思想中的个人意识。应该有热情，有雄心（做一个最好党员的雄心），能艰苦，能坚持。我对你的希望是很大的，愿你从细小的地方做起。你可以和那边的部队的负责同志去商量，要设法取得他们对你有切实的帮助。

祝你坚强努力！

丁玲 8月4日

第二封信写于1953年春。当时，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学员正在结业，同学们即将各奔西东。丁玲当时在大连休养，写信回来向大家征求意见，希望就怎样才能把文研所办好，直言不讳地把意见提给她。我当时正面临工作去向的选择，对所里也有一些意见，顺势趁风，给她写了一封信。于是，便获得了这封回复：

光耀同志：

先祝贺你的结婚之喜。

你提的几点关于“所”的意见很对。我始终觉得我们搞了两年多，还没有造成一种蓬勃的、热情的、对生活、对艺术有无限倾心的气氛。因此也就是有斗争、有批评、又能爱人、又有很大愉快的情绪。一个搞文学事业的人，首先应该要求这个人是活的，而又是活得充实而又高尚的。苏联的作品很在这方面用功夫，马特洛索夫就是写这个英雄是怎样成为英雄的：是因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因为有那么多好人来养成了马特洛索夫有一颗高尚的心，他在那里都是最好的，他在战场上去牺牲个人就来得一点也不突然。我们文学研究所始终还不能成为一个熔炉，现在情况是：大家都很好，相安无事最好，对个别调皮的人就束手无策了。为什么呢？我们整个的社会，“所”的社会气氛不够，一两个人去谈话批评是不行的，这些人不是怕谈话怕批评的人！只有把大部分人团结好了，大部分人都活得严肃、认真、有意义，那么，少数人就同化了。为什么没有做到呢？因为有许多原因，我们缺乏完全献身于“所”的创造的人太少了！我个人就受到很大的限制！这还不是指现在的几个负责人而说，这是包括了全所的人，特别是学员而说的。但我是相信可以

搞好的，天下事都是这样，只要有人就行，有共产党员就行。你的意见是很好的，这些经验我们要接受的。

其次是关于你的去留问题，我个人对你有这种看法：你有些好处，就是有些条件，可是也有些缺点，缺点是经历太少，文学底子不够。按我的看法，你最好留在“所”内，我已把这意见告诉田间、马烽他们。原因我觉得再打几年底子，生活底子，知识底子，再回部队去。可是，可能他们要求你回去。我以为你是否可以提出来，因为你去年没有学习，最好留下来补学（我也把这个意见说了的），田间他们再把你的意见转到部队去，再学一期后回去。田间他们有你的意见也许好同部队商量些。但如果不能的话，我建议你回冀中部队去工作。不做文艺工作，不属文化部。你可以写两部作品，为这两部作品做准备，第一部，写冀中的抗日历史小说，收集这方面的材料，像肖洛霍夫写《静静的顿河》一样。如果你有这个计划，将来文研所还可以支持你、帮助你的。第二部，写回家的军人在地方工作上，在农村里，在工业的开展上，如何起作用。战争不是永远的，建设才是我们的目的。像《幸福》、《金星英雄》、《收获》、《库页岛的早晨》，都是写退伍军人如何从事建设工作。你回到冀中可以找到这种材料的。你看怎样？你到朝鲜只一年，看的方面少，给自己一些印象，一些启发，准备在你将来的作品中用的，写点短的散文是可以的，想从一些零碎的感受中写出著作来，有血有肉的人物来，那是不够的。你也不必为写不出着急。

总之，要努力！要夜以继日，贪心的去爱生活，爱人，爱文学，从各方面加强自己，提高自己的修养。做一个诚实的人，像马特洛索夫式的青年！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如有需

要我的时候，我会乐意的帮助你！

四月初我不能回来了！

敬礼！

丁玲 3. 19.

这就是丁玲！这就是罪该万死的“反党右派”丁玲！据揭发，写这二信的时间，正是丁玲闹“反党”最活跃、最疯狂的时期。可我们许多自称响当当的铁杆“左派”们，写得出这样对党有深情的信来么？尤为费解的是，把信没收了去，为什么搁置不用？为什么不汇报，不交流，不转达？当事人心中明白：方针已定，就是要把人打倒。凡不能打倒，不利于打倒的，概予不闻不问，不查不证，不理不睬，为什么？就为“按既定方针办”啊！“人民战争”就是这样的打法，欺谁乎？欺天乎？

最令人不解的是：在我“改正”之后，这两封信的原件仍不发还，我屡次申请、讨要，就是不给。答复是：“已入文书档案，取出不便”云云。这使我愈发糊涂，“改正”时给我说过，有关定罪材料已经由组织上销毁了，怎么又出个“文书档案”呢？它是干什么的？没有解释。既是档案，取出应该很方便，怎么倒“不便”了呢？还有，丁玲的信放在那里，究竟要它起何种作用？倘有人要查对或研究点什么——包括她或我的什么“不轨”之类，还许把它拿出来见见天日吗？

十、“花絮”（二）

尽管我性子严谨拘束，挨斗日子一长，也就发“皮”，若把那些发言都记在心上，不仅太累、太烦，亦非做人之道。但要都略过去，又嫌粗率。还是让我们去粗取精，把些能起消闲醒脾、

“以点带面”之用的花絮，记一些在下面。

头一个想到的是白桦。他当时风华正茂，倜傥风流，因出差没在创作室“鸣放”，自觉无“辫子”可揪；也由于“打态度”的经验尚未到达，他的发言颇富超脱而轻松的意趣。他说了个故事，说在云南有个傍河而居的少数民族，家家靠水为生，人人水性出众，能在风波激流中日夜出没。怎么练就的这份水性呢？是孩子一生下来，当娘的就把他（或她）绑在木板上，放在河里，任其游荡漂流。日日年年，高强水性自然练成；以至长大以后，人问他（或她）的母亲是谁，他就说“是木板”。借此，白桦转向我说：你自小参军，党把你培养成作家，如今你却把木板当成了亲娘！

这故事，他说得动听而有文采，我虽并不认为自己是把木板当成了亲娘，故事的美丽，却使我至今不忘。

另一位是张桂，上校，年纪较大，品性憨厚，有大好人之称。他在会上发言不多，斗樊斌和公刘的时候，都不记得他说过什么。这一次，不知是否要求“加温”之故，他一开口就很激动，整张脸都红通通的：“你，徐光耀！一个穷人的孩子，十三岁当小鬼，在党培养下，你，你怎么，就，就——”，“哇”的一声，突然大哭起来，眼泪鼻涕齐出，抽噎得上气不接下气，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这使我极为震骇。这么一个大老实人，竟成这样，我可真真罪孽深重啊！当时，我很想像个老鼠一样钻到地下去。主持人见他久久说不出话，便劝他冷静冷静，由别人先说。然而，直到会终，他也没有再发言。此后的多年，也一直未再见他。我总在想，成年人的眼泪可不是很现成的，他哭得那么恸，必有个道理吧？在他深心中，到底有什么块垒梗梗着呢？

再一位就要说到寒风。他是老二野，参战甚多，爱开玩笑，有点顽皮，也有点猛愣，是条生于易水的汉子。他的短篇《尹

青春》，写长途行军中的艰苦，警句联珠，堪称一绝，很令我折服。可有一次他把我骂得很苦。那是斗我的后期，斗了一整天，临散会，虞棘忽给我一个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明天上午，要交出一份完整的文字检查材料，就是说，把犯“错误”的全过程、所有事实、关系、思想根源和认识，完全写清上缴。我以前已交过几次这种材料，字数都在 15000 至 20000 之间，现在时间只剩一夜，如何写得出，这分明是有意刁难和施压。我于是央求说：自被审查以来，一直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连日开会反省，体力消耗太大，要一夜写这么长的材料，我就是不睡觉，也做不到的。希望多宽限一两天。谁知话刚说完，寒风便往起一站说：“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体力消耗太大，谁叫你犯错误，谁叫你反党，活该！”

尽管斗“皮”了，这“活该”二字，还是“滋”地钻入鼻孔，狠酸了一下。战场上抓住了国民党汉奸，也不曾用这种字眼对待他们。如今的我，真就糟到这种程度了吗？日后有许久，脑子里总被这两个字缠着。缠来缠去，竟想起一个传说，据传在疯人院里，所有疯子都绝不承认是疯子。若有谁被指为疯子，其他疯子就会扑上去一齐把他痛打，打得越凶，越证明自己不是疯子。寒风许久抓不到发言题目了，“同情右派”的帽子或许已悬在头上。他正心急火燎，来了机会，此时不发，还待何时？本质上还是吓坏了啊。

为无言可发而发愁的，还有许多人，如胡可、杜烽，我们一块从华北军区调来，住同院，食同桌，上下班一起走，说不了解情况，当然推不过。但细听其发言，也真为他们痛苦，那真是嚅嚅唔唔，字斟句酌，又想词锋犀利，又要气势凶狠，又须不背良心，又须批判深透，“架势”之难拿，无以形容，只能说是令人哭笑不得了。

在这方面处理得较为“妥善”的，大约数黄宗江。他来自华东，正追求入党，也正追求阮若珊。他平日本来爱说话，一向滔滔不绝。在斗我的时候，却是个“结巴”了。他发言的特色，往往是从自我挖苦开始，把自己批判够了，再转向目标。印象最深的是后来批斗沈默君。他先相当赤裸地批自己一通，然后才转口说：“我不怎么样，我坏，你比我还坏！我小资产阶级思想，我自私自利，你呢，你还不配，这样的帽子给你戴，还是太小了……”这是黄宗江的聪明，即使在斗别人的时候，他的“疯子意识”也是清醒着的。

还有一位也许更加清醒，但他大智若愚，不大为人注意。这便是画家黄胄。他那时在创作室美术组，军衔最低——少尉。每当开会，他都拣最碍手脚的角落坐着，眼本来有些“眯”，胖胖的在那儿一闷，一副与世无争、自甘卑微的样子。但他知道，反右派，不发言是不得了的。于是在逢有较大空隙的时候，用他十足的蠡县口音批判我说：“凭你徐光耀，打小当八路，受党的教育不能算短，党把你拉扯这么大，也不容易。可你往丁玲那儿跑个什么劲儿呢？要说不恨你，你反开党了；要说恨你吧，心里又丝丝拉拉的……”这个发言，在当时看，大不成体统，明显是“心慈手软”，“右倾情绪”。但他军阶低，参军未久，似也“笨嘴拙舌”，大家便不予深究，包涵过去了。他很透亮的心，似也乐于利用这一“误差”。

然而，真正使我认识了黄胄的，还在几天之后。那是又被长枪短剑狠斗了三小时，散下会来，正耳鸣眼晕地独自往家走，不提防黄胄从背后拉住了我，拍拍肩膀说：“光耀，上琉璃厂转转去呀？”

这太出我意外了，鄙人正烈火烧身，“过关”之不暇，去那种雅人消闲的地方，不是开玩笑吗，别人看见，岂不更增加了我

的罪恶？便说“不去。”但他拉住我不放：“嗨，你一个人回家有什么事儿？走走，跟我看看画儿去，懂点美术，对你写作也有好处。”我仍是辗转挣扎，连说：“不去。”他却硬不松手，一劲儿再劝再说。我这才明白，哪是什么“看画儿”，分明是见我淹进脏水沟，日渐沉溺，要拉我上岸罢了。他这样做，是要冒“同情反党分子”的大风险的。不由得心上一翻，也燃起“丝丝拉拉”的火热，便任他拉进了琉璃厂。

那时的琉璃厂，除了荣宝斋，还有多家公私合营画店，四壁所悬，尽是名家，尚有不少明清佳作。但我于画一窍不通，看不出门道。黄胄便指指点点，给我解说，还一再撺掇我：“买一张，买一张！搁着稿费又不下崽儿，画是陶冶性情的……”我很理解，这“陶冶性情”四字，正是他拉我来此的隐隐深心啊。

也算是盛情难却吧，我终于买了一幅齐白石的《群虾》，当夹着画轴回到家时，心中确已有了云开雨雾的幻觉。再看那水藻丛中，一群小生命活泼泼的自在游动，心神也就暂时飞离了风暴中心……

日后，在“生活像泥河一样流”的悠长岁月中，赏画，竟成了我的“业余兴趣”，也是让我活下来的未可小瞧的支柱。革命20年，我按照党的教导，一贯只讲公心和忠心，不肯讲私情。这一回，却是黄胄的“私情”，使我懂得了：绘画，原来还有济世救人的一项功能，可使人脱离苦海的。黄胄与我同庚，都生在1925年，他竟先我归西，这又是老天的不公了。

最后，要点到黎白。他是我的联大同学，生于中国最显赫的知识分子家庭，参加过地下斗争。他眼界开阔，年轻气盛，有识有胆，勇于任事。可也爱“多事”，敢在斗争会上跟“左派”拍桌子。曾坚持说，沈默君其人，宁可叫“坏分子”，也不应定成“右派”。1956年底，他忽发奇想，要参加有关王林《腹地》的

那场“战争”，为文反驳侯金镜在《文艺报》上对陈企霞的批评。文章相当长，警句有：“金镜同志拿着企图刺穿教条主义的长矛，却没有找准真正的手。”我和另一同学李兴华都看过，并表示基本同意。然而，文章未及出笼，“反右派”来了，创作室赶忙把文章抓住，将我和李兴华的短简附在后面，复印成册，发给大家。在斗黎白时，就有了这么个说法：黎白我们三个，互相勾结，自动发难，形成配合陈企霞向党进攻的一翼。其实，今天重读这篇文章，无论是态度的认真，作品分析的仔细，学术探讨的严谨，都很值得某些十分“潇洒”，专为卖钱，或“过把瘾”的“评论家们”仿效的。可是，斗到最后，给黎白弄了个“留察两年”，之所以没有戴“帽”，或许是沾了敢拍桌子的光。可见“天道”也有出格的时候，难于一概而论的。

现在让我们扳正面孔，再回到战场中心来。

十一、定 命

忝列“重点”的我，从8月斗到10月，仍未结束。当然，在我之后，还“花插”着斗了黎白，沈默君，白桦，吴占一等人。美术组因为发现了艾灸、何孔德等人也在反党，分出去单独斗去了。艾灸当时我不熟，后来在农场一块“改造”，接触渐多，才知道他的冤案“纯粹”得奇怪。但是，竟无人敢一伸手指为他“翻案”。致使这位文天祥的嫡传子孙，在左权将军牺牲的战斗中纵身跳崖的壮士，也跟着我们苦海翻腾22年。为此，我曾写过一篇纪实文学《跳崖壮士》，发表在《人民文学》，此处就不再交待了。

一次次“坦白交待”，一次次“深挖狠批”，所得结果，总是“不坦白”，“不老实”，“继续对抗”，“坚持反动立场”，“不

肯向党彻底投降”……祖宗三代，亲戚朋友，社会关系，历史表现（当然专找坏的），都翻得底儿朝天了，还不行，怎么办呢？真是心急如焚啊。有一天，实感无路可走，便鼓鼓勇气，找到胡可，请求给我个好好的帮助，指示我“怎样才能把自己挖深挖透”？谁知胡可把手一摔，悄悄着急说：“我帮你？我还有八条！”

这不但出我意外，也大感诧异，忙问：“你？你怎么会有八条？”

胡可伸着指头，一项项数给我听。果然，若真把这八条一亮，按当时“标准”，胡可也真就没逃儿了。譬如，八条之一，“鸣放”时，有人说，《解放军文艺》没有什么人爱看，不如交给地方去办。胡可曾表示，这意见并非不可以考虑；之二，虞棘下过“死命令”之后，胡可也写了“鸣放”文章，投给《解放军文艺》。但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一出，他同魏巍一起把稿撤回了。但创作室仍将该二稿的校样翻印，创作室每人发一份，其中当然有“反党言论”；之三，“鸣放”时有人提到，什么地方有人正议论“同仁刊物”，我们是否也探讨探讨。胡可也说，这倒不失为一条思路；之四，又是在“鸣放”会上，胡可曾说，何直（即秦兆阳）的文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是认真下过功夫的，这样的文章不多见。不几天，秦兆阳在报上“点名”了，同意他，自然是呼应“右派”，大罪一桩……可惜事隔40多年，“八条”仅记得这么多了。但就是这么多，不告便罢，若有人一“捅”，则反对党办军队报刊，主张“同仁刊物”，攻击党的文艺政策，与地方“右派”内外呼应等等罪名一加，也就难逃“法网”。

胡可正心神不定，自身难保，我还怎能死死缠他，只得快快而回。回屋细想，胡可的天性不能与艾青相比，艾青洒脱灵通，

可以满不在乎；胡可却是精谨慎细的，有这八条压着，必然日日夜夜翻肠绞肚，陷入巨大煎熬之中。如此下去，他会熬个什么结果出来呢？这种感染来的担忧，在脑子里反反复复，忽想到一个传说，不禁另有所悟。据说，某些领导人有一套带干部的“绝活”，方法是：先把干部当根大葱叶子狠命揉搓，直到揉去所有筋骨，变成“提起来一条，放下去一滩”，柔若鼻涕，然后再往葱管里吹口气，使他满精神的“支棱”起来，那么，这个干部就很好使唤了。在挨斗初期，我也曾想到过这一“绝活”，但在饱尝被“围歼”的滋味之后，才又有了新的觉悟。我固然被揉搓得差不多了，可揉搓我的人们，又何尝不也在“被揉搓”；我自然没了筋骨，而别人的筋骨，还在正常的保持着吗？所以，整人必须用“运动”的法子，“运动”来，“运动”去，那相关效应就自然翻番，真正是“让全国人民都受到教育”！也许你日后仍能“满精神的支棱着”，可脊椎骨呢？还在原处直着吗？

在斗争会上始终严肃认真，很是敬业的，印象中有个陈亚丁。他是总政文化部副部长，大校，分工在创作室“蹲点”，绝大部分会都参加的。他讲起话来也很严肃，但因身份关系，轻易不开口。开口也只出题目让你答，他不作结论。如：你的问题是不是很严重？为什么很严重？是否把背后的活动都揭露出来了？还有哪些不敢见阳光的？与党的关系怎样？只某些问题有矛盾，还是经常有矛盾？文艺上你要求绝对自由，不要党干涉，那要谁干涉？……等等。明眼人一看就懂，这些问题都有答案的，所以还提，若不是猫对耗子的“逗弄”，就是心存“城府”，以防言多有失、失足落水了。此人曾列名“四人文章”事件，刚挨过批，可能还心有余悸。但后来在“文革”中不知怎么“很来劲”，在军队中附和“放火烧荒”，颇走红了一阵子，却又不明不暗的隐没，至今不见踪影。

陈亚丁提的问题虽叫人难受，毕竟还有回旋余地。相形之下，魏巍便要直接而正面得多了。魏巍那时是我们创作室副主任。发表《谁是最可爱的人》已三四年，在室里声名显赫，很为大家敬重。在文联大楼会议上，曾代表部队作家“讨伐”丁、陈。他在多次发言中，有两次给我震动最大：一是批判我的《海阔凭鱼跃》。我原文中有一句说，任何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可以用他认为最好的任何创作方法进行创作。魏巍在发言时针对这一句说：“你把党像破鞋子一样扔掉了。”我听了真吓了一跳，心想，如果中宣部长陆定一在座，也会发毛吧？因为我这句话，原本抄自陆定一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是为了强调一下，加一括弧并其中六字而已。我以为，共产党员是不应排除在“任何人”之外的。所以，比较起来，《徐光耀的修正主义思想》的二位作者就慎重多了，她们批前批后，批左批右，扣我“绝对自由化”的“帽子”，就是不把这句话拉出来示众。

魏巍批我的另一件，是说我在杨成武兵团时，提倡“鸡抡太主义”，并解释说：“这是一种极为反动，极为腐朽，极为可耻的主义！”这简直是掀天揭地之文，我当时就出了一身冷汗，我真是罪该万死了！不得不进行垂死挣扎式的剖白。大约终是靠了真实，侥幸没有再被追究。

到了1957年11月2日，当是“梳辫子”阶段了，魏巍又有一次发言，分量甚重，系统性、权威性、结论性十分明显，是经过充分研究、准备的。原话较长，只能提纲撮要，录其大概，以见一斑。

他开头就说，要彻底弄清你的两个问题：一、“是不是反党？吞吞吐吐的承认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二、“与丁、陈反党集团的关系，是不是偶然的？”他逐条分析，说我在“检查”中只一味侧重与丁、陈的关系，虽然重要，但很不全面，应该联系

历史上的问题全面检查。丁、陈问题“只是你的问题的总爆发”。又说，“畏惧”反党帽子是没有用的，结论不会按你的愿望去作，越不觉悟，越需要搞透。不搞透，便会觉得冤枉。冤枉，会成为一个消极因素存在你脑子里，这不利于改造。丁、陈集团如果在 55 年搞透，他们就不会又在今年犯错误了。又说，你至今还想保持自尊心。吴祖光的小家族内部是没有自尊心的，你的自尊心，只说明你和党还有很大距离，反骨还没有彻底击碎。

下面，进入“反党是否偶然”的正题。

在丁、陈反党集团问题上你当然是反党的：“四大件”（即给作协党组的信，《海阔凭鱼跃》，给陈企霞七百元，把第二笔钱隐瞒——徐注）只是表现形式，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的实质是你内心的情感，从情感上早已是丁、陈的走卒了。反党不反党，有一个明显的比较，比较一下党和丁、陈之间，你是站在哪一边的，心中有党还是无党，是丁、陈近还是党近？事情就很清楚了。比如给陈企霞送钱，为什么不征求一下同志们的意见？支部问你，还隐瞒一笔，这还不是心中无党？给党组的辩正书最严重，你真有党的观念，为什么不反复思考？为什么没有充分把握的东西就否定？这不是张狂的向党进攻吗？！

你心中无党，是否有丁、陈呢？给丁玲的母亲送花圈（我没有给丁玲的母亲送过花圈，此话不知从何而来——徐注），那情感之深，观念之深，不得了！你把对丁、陈的忠心来对党，可就要打 80 分了。可惜，你心目中的丁、陈就是党，是你具体的党，你的上帝，你希望的寄托。卖身投靠是最可耻的！所以，你做个党员就很成问题了。

联系当时的背景，今天重温这个发言，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它都是严肃认真的，深刻的，严正的，也是最革命的。就内容，

就方法，就逻辑，就其哲学高度和整体意义看，都折射着那个具体时代的特有风貌，很值得后世子孙受用和借鉴。若视为“胡乱骂人”，那就太轻率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后这句话，措词相当谨慎，透着欲说服旁人的商量语气。但含意明确，就是要开除我的党籍。我的命运，大概此时已然注定了。

概括我全部罪行的“四大件”，赫然居其首的仍是给作协党组的那封信（魏巍称之为“辩正书”，大约是跟丁玲向中央告状时附的“辩正材料”归到一堆去了）。为这信，我曾屡屡奇怪，斗了几个月，发言如此之火，却没有一个人拿它进行条分缕析地批判。但凡提起，只当成“张狂向党进攻”的证据，一句带过，从不说它错在哪儿了。连魏巍也只说“不反复思考”，“没有充分把握的东西就否定”，更无其他。相比之下，倒是《海阔凭鱼跃》屡遭鞭挞，颠来倒去从中找我的立场、观点、世界观。最后在报刊“点名”了，它仍是惟一的靶子，其余“三大件”，竟不涉及。老实说，我私心对此很觉不公，为什么不把我的全部罪状都拿出来？把它们统统“亮在阳光下”有什么不好？干什么把本来的“四件”藏起“三件”？特别令人费解的是：定我“右派”的主要罪名，是“给丁玲翻案”，而拿到社会上批判搞臭时（报刊点名），又说我是“修正主义思想”——当然，这只是一时的闪念，从8月斗到11月，连我练就的“皮”也已瘫软，哪还能想个究竟啊。

事情终于到了“头”，在我又交出一大本子“自我检查与交待”之后，会上宣布：从即日起，徐光耀还要继续检查，继续反省，想起新的问题，随时向党交待。无事不要出门，需出门时要向党小组长请假。阿弥陀佛！这就是说，我已被“斗熟”，“挂起来”了。

回到家里，一头栽在枕上，只感到一阵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疲乏，浑身上下，像是一摊烂泥。我这才知道，原来自己是如此的脆弱！

十二、意外的“苦果”

“挂起来”的滋味，原先想，总比挨斗轻松一点吧。开头两天，倒还可以这么说，但时间一长，那份入骨钻心的煎熬，是常人绝难领略的。我 32 岁，正血气方刚，参军入党，都已 20 年。20 年中，无一日一时是没有任务可干的。哪怕站在生死交接线上，都在为肩上的任务而追求；精神和思想，就在这追求中保持平衡和奋进，从不知什么叫做“失落感”。这次可不同了。所谓“继续检查”，只是把你“闲”起来的托词。“扫穴犁庭”几个月，底儿早朝天了，哪还有什么“检查”要“继续”？不给任务，不准出门，无会可开，无话可谈，不能交往，更不能去娱乐场所，就这么“闲”啊，“闲”啊，“闲”你个百无聊赖。

为免涉嫌其他，最好的法子是读书。于是读啊读，读过今天是明天，读过旧年是新年，到 1958 年新春了，妻子大学毕业，被分去河北保定。大女儿由她带走，交岳母去抚养。二女儿不满周岁，由保姆王阿姨代管，这个小孽障很“闹”，虽也能造出些乐趣，却无论如何不能替我分心。书，读了一大堆；字，数了万亿行，却把脾气读得越来越躁，越来越坏。屋里的东西全成了“仇敌”，看见椅子也想踹它一脚。忽听说，一起挨斗的人已有“处理”了的，便去问党小组长胡可，我怎么样了？胡可特别沉得住气，说，别着急，安心学习吧，有了准信儿，一定告诉你。

受心里一串又一串疙瘩的缠磨，脑子里的“战斗”越来越激烈：我反党？可真要把党反倒了，我往哪儿去呢？蒋介石回

来，不就是专拣我这号儿的杀吗？……丁玲本事大，把党反倒了，她能当主席？她能指挥全国？……渐渐的，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一度小有恢复的体力，又加速度的消损下去。再也憋不住了，又去问胡可，可胡可仍是那两句话。我想到了抗战初期的锄奸科，那时对付狡猾的犯人，曾用过“熬鹰”的法子：让犯人坐在一根棍子上，也管吃，也管喝，就是不让睡觉。48小时过去，犯人会从棍子上掉下来。当重往棍子上架他的时候，他在你手上就睡着了，那情景，历历在目。现在，要把我熬到几时呢？在焦躁到顶点时，曾小声对自己喊：“枪毙我算了，省得慢慢熬死！”后来《小兵张嘎》上有句台词：“在这儿，都快把我熬炸了！”来源就在此时。

终于熬出两件很可怕的事。一是，当我把12大本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全部读完，想回忆一下书的内容，总结几条收获的时候，发生了大怪事：12大本，几十出戏，我竟一个字也忆不出！连人们常说的莎翁最高成就“四大悲剧”，也是一片茫然。这一骇真是非同小可！我的脑子呢？脑子哪儿去了？我到底怎么了？

正自焦虑狐疑，叉手在门后望着院子发痴的时候，我的小女儿蹒跚着走来了。她刚学会走路，想是要来找我玩玩儿的。但我隔着玻璃却恨恨地想：我正不知死活，你还来添乱！岂不真是个催命鬼吗？正当她伸手抓门，就听我一声大吼：“滚！”她抬头见我那张狰狞的脸，唬得回身就逃。她，两只小手扬着，跌跌撞撞，失魂落魄，最后扑在对面的台阶上……

我盯着这一切，忽地热泪盈眶。我想，我必是疯了，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呢？

“疯了”？使我又一骇。我跌回椅子，第一个念头就是：如果疯了，就不如死掉。死掉，妻子儿女彻底解放，可自去谋生；

而疯了，就会粘连牵累她们一辈子，既失去劳动能力，又要给家人、朋友、街坊，甚至派出所，增加没完没了的麻烦和负担。受人民白白供养，却到处惹是生非，那实在太可怕了！

昏茫茫，只觉眼前一片漆黑……

忽又想，能不能找个解脱呢？死，简单得很，方法有的是，真心寻死，没有人能阻止得住。剩下的问题是能否治疯？绝不能去疯人院，那等于已经死了。还有别的法子吗？突然，我想到了前年读过的译自苏联的《普通心理学》，上面曾提到，人在经历巨大打击和挫折的时候，神经不能承受超负荷的压力，有可能发生精神分裂症。在这关键时刻，人要控制自己，不然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当时读到这里，觉得好玩儿，就特别留心了一下控制的法子，于是记住了八个字：“集中精力，转移方向。”

就是这个“八字方法”，使我看到了曙光：如果心里老为“把党反倒，我往哪儿去”打仗，就会越陷越深，无法拔救。只有把全部思虑投放到一个新的焦点上，才能从火坑里逃离出来。可这个新焦点在哪儿呢？读书？已证明全无用处，看戏看电影如何？以待罪之身去溺于娱乐，岂非更是“跟党对抗”？逗孩子？找朋友？……都不能拴住我的心，也不现实。其实我很清楚，最有效的“集中精力”便是创作。但这个念头刚一冒就被否决了，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年月，怎能写文章？

又熬了三两天，再三搜索枯肠，依然毫无结果。晚上，盯着灯光又想：自杀，不也是死吗？写文章，一口血喷在桌子上，也是死。过去搞创作，总嫌时间不够，总嫌开会、学习，干扰太多。现在，大块时间摆在面前，你不写，是没有出息，自甘堕落，谁又干涉你来呢？这样一想，眼前灯光忽然变亮，心里喊：干！

决心既下，第一步是先找题材。给自己定个规矩：不管写

啥，一定要轻松愉快，能逗自己乐的，至少能使眼下的沉重暂时放松。这就很自然地想到了《平原烈火》，其中有个小鬼“瞪眼虎”，出场时，曾是挺活跃的。可后来被主角挤到一边去了，没啥事可干，最后只得蔫而不唧的结束。一位老战友看了批评说：“你怎么把个挺可爱的孩子写丢了昵？”

那好吧，现在就把他抓回来吧，能逗我笑的就是他。

于是我大敞心扉，把平生所见所闻、所知所得的“嘎人嘎事”，广撒大网，尽力搜寻，桌上放张纸，想起一点记一点，忆起一条记一条，大嘎子，小嘎子，新嘎子，老嘎子，尽都蹦蹦跳跳，奔涌而至。由于我不喜欢自己的老实刻板，从幼年便把嘎子当作楷模，注意多，观察多，交往多，“嘎相”储藏也相对较多，尤其抗日时那些嘎不溜丢的小八路们，竟伴着硝烟炮火，笑咪咪地争先赶来。不多几天，那具有情节功能的嘎人嘎事，竟拉成一个长长的单子。我把单子从头细看，加以去粗取精，编排调整，一个嘎眉嘎眼的嘎子形象，便站在眼前了。啊，我的孩子，啊，我的救命恩人！在紧要关头的时刻，你真的来了呀！

再没什么可迟疑的了。稿纸铺开，收拢心神，开始描画。为怕组织上怪我又不“老实”，连胡可杜烽也一律保密。但我写的是电影，而非小说，原因很简单，写小说必须细抠语言，一字不妥，心下生腻，多处不妥，读者会半途把你甩了。而细抠则须下细功夫，太累人，当时的体力已经担不动。而写电影呢，语言粗糙些关系不大，导演能看懂就成。对话虽要求精彩，却又越少越好，这就省劲多了。总之，写作目的是“集中精力，转移方向”，能把我拉入写作就好。

感谢苍天，感谢捷普洛夫的“八字方法”，写作一开始，情绪就变了。各路英雄纷至沓来，抗日烽火燃遍大地，化装袭击，狭路埋伏，端楼打点，越墙掏窝，一派神出鬼没，灵动壮美的活

跃景象，布满眼前，它们所引起的激情，是可以压倒一切灾难的。老实说，在敌方占绝对优势的环境下，我们坚持武装抗战的整个斗争，就是一场嘎子式的游戏，斗心机，斗智慧，斗谋略，斗谁的“鬼点子”多，正是我们“小米加步枪”克敌制胜的法宝。写嘎子，无须发愁生活的枯竭，抗战史实，永远是取之不尽的源泉。所以，一开始写就相当顺利。由于思想和情感的激扬和专注，情绪也似又上了当年的战场，连睡中梦中，也枪炮轰鸣，杀声震耳。什么“反党”啊，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食量于是增加，睡眠于是安稳，眼里消灭了“金花”，红润又回到脸上。写到高兴处，甚至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在屋里飘飘然旋转起来，简直忽然之间又变成另一个“疯子”了。

若深究一下，是什么力量使我顺利地“转移方向”了呢？简单说，就是战争中的党和战争中的老乡啊。抗日战争长达八年，日寇不但占有特别巨大的优势，也格外残暴凶狠，对剿灭共产党是始终竭尽全力的，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在那种局面下坚持斗争，真是苦极了，险极了，残酷极了，千千万万的先烈，把尸骨铺在大地，血流成河；可活着的人，照旧“把脑袋掖在腰里”，迎着雷暴，拼死冲杀，没有一个为升官，为发财的。老乡们看在眼里，感在心里，他们才肯、也才敢不怕烧房砸锅，不怕妻离子散，亲你，爱你，舍生忘死地支持你，保护你。如果不是这样的好党，老百姓只要向你一闭眼，日本鬼子的铁扫帚马上就会把你扫个精光，连芽儿也冒不出来。而处在那等恶劣的环境中，战士们仍能意气风发，豪情满怀，活得理直气壮，就凭着那点忠心，那点信仰，那点正义感，那一派浩然正气啊！

当然，那时偶尔也有老百姓骂骂共产党的。可这些骂，能极快地地上达高层领导。当时的决策者们，不是忙于抓人惩办，而是先检讨自己，探询根源，找出群众之所以不满的所在，坚决下令

纠正错误。被人传为美谈的“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不就是这么骂出来的么？而真正打动群众之心，换得他们亲爱的，就在这些地方啊。历史推移，千百沧桑，真理只有一条：只有真正的军民鱼水情，才有人民的更无私，战士的更英勇。两者映照激发，才形成如虹正气，遍地英雄。

说到英雄，我在朝鲜战场碰到一位营教导员，抗日时认识，他问我：“你干什么来了？”我答：“采访英雄来了。”他听了，长叹一声说：“真正的英雄全死光了，剩下些半英雄不英雄的，成了英雄！”是的，这话我很理解，冲在最前头的，总是最先中弹啊。可那最英雄的千万先烈的骨殖，早已化为泥土，除个别幸运者外，谁还记得他们呢？但他们的精神还活着，他们创下的业绩和优良传统还活着，这个传统，可以使一个党在危难中起死回生，是伟大中华民族的真正的精魂！

我又“回到了”抗日战场，精神和情绪一下子都“拔”起来了。于是就“忘”掉了眼前的一切。尽管断言我80分的忠心已奉送给了丁、陈，可七八万字的《小兵张嘎》，能从其中找出“反党”的影子、或者挨整“右派”的影子来么？这不是葱管里吹了气，是先烈们的英灵在敲震着我的良心和神经啊！

顺利的写作，忽在中途碰上技术性的“拦路虎”：在“嘎子”坐了禁闭之后，怎么出来的问题上卡了壳。按常规，这地方必有一套思想政治工作，道理不仅要让“嘎子”服，思想上还得有新提高。而“嘎子”是不轻易服人的，话不入耳就会辩论，如在电影上开起辩论会来，这戏就没法看了。我是个急性子，仅仅憋了两天，便灰心了：电影这东西咱没搞过，又不曾受过训练，“行行不是力巴干”，何苦来呢？还是回过头来写我的小说吧。

这时体力已有相当恢复，觉得可以在语言上下功夫了，于是

搁下电影写小说，毕竟有点底子，居然一鼓作气，一月之间把小说拿下来了。起初题名《小侦察员》，总感不顺，最后定名为《小兵张嘎》。

小说写完，再拿起“电影”看看，觉得就按小说的路数往下“糅”，也可勉强成戏。于是电影剧本也在以后的十多天中完成。“撒斜”一点说，也可叫做一箭双雕了。

关于创作方法，似也值得说几句：过来人当记得，当时文坛，到处是禁忌，凡执笔为文的，无不战战兢兢，何况“反右”一来，文网大张，人人动辄得咎，胆战魂飞。但我反正已经“头朝下”了，写作只为自救，不为应时，还管那些禁忌干什么。惟有联大老师肖殷的一段话，始终是我注意追求的。他说，文学的最终目的是写人，写人的性格。性格，由个性和共性两者组成，而共性是通过个性表现出来的。因他说的是“最终目的”，脑子里曾连转几弯，所以印象较深。现在写“嘎子”，抓个性成了方法上的头等大事，即：凡符合“嘎子”个性的，就拼命强化、突出；凡与“嘎”个性无关的，戏再好，也予割弃，即或“冲犯”了什么，亦在所不惜。这一条，看似简单，但从效果衡量，恐怕还算说得通的。

十三、不是结束

把两个“嘎子”抄清，装订成册，已是1958年的5、6月间。心中颇有点高兴。便又问胡可有无消息。胡可依然说，别急，别急，耐心等着吧。其实我内心已经不急了，既然能写东西，拖就拖吧，拖得越长才越好。我回到屋子，开始谋划酝酿已久的大长篇。实在说，写这个长篇是我此生最大野心，最后的梦想。我想写一个农民，从抗战当兵开始，经历三场残酷激烈的战

争，最后成长为一名将军的故事。题目老早就定下来了：《将军向我们走来》。

我以为，中国革命之取得胜利，主要是靠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而在几十年的奋斗中，武装起来的农民起了中坚作用，尽管牺牲了千千万万，风波险恶，道路曲折，但确乎锻炼出一大批人才。而这些人才，即使在建国之后，依然是国家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和“拳头”。就是说，写一个从农民到将军的成长过程，也就大体概括了当代历史的主要风貌。我自己亲历了抗日、解放、抗美援朝三场战争，时代背景是熟悉的，对连、营、团、师、军各级指战员，有相当程度的接触与了解。心中藏着不少英雄的动人形象。把他们用心组织，精雕细刻，自信可以塑造出典型。是的，也许我承担不起这样的重大题材，但每一想及它的史诗性，丰富性，和它含有的重大意义，总不免雄心勃勃，激动不已，觉得，果真此生能把它拿下来，是可以死而瞑目的了。现在，《张嘎》已完成，锋芒小试，感觉尚好；胡可又叫“耐心”，大块时间似乎还有，此时不干，更待何时呢？

用三天时间拉了个粗疏的提纲，为尽快投入，决定先开始，后细磨。开笔之初，依然保持着《张嘎》的势头。然而，雄心也就“勃勃”了十来天，小休时翻看《人民日报》，忽见《解放军文艺》第六期广告上，赫然一条标题：《徐光耀的修正主义思想》。头上轰的一个炸雷：啊，报刊“点名”了！

那么，我已经是“右派”了？已经成了“敌人”了？

急急推开案上的一切，跑上街去找这份刊物。一面昏昏然想，“修正主义”？这不是内定扣给赫鲁晓夫的帽子么？斗我的时候，没有谁这么扣过我呀！？怎么又跟赫鲁晓夫弄到一块去了呢？跑遍了大小报摊和邮局，都说该刊尚未到。又等了好几天，刊物来了，却又怪，从头翻到底，没有这篇文章，撤掉了！为什

么撤掉？一时又坠入五里雾中。“将军”不但不向我“走来”，趁此机会，他也逃之夭夭了。

正自神不守舍，文书夏信荣送来六月份的工资，打开纸袋点数，削去一大半，从原来的 210 元变成了 99 元。

把两件事加起来去问胡可。胡可显得很尴尬，嚅囁着说：他也不知道怎么了，“可能是行政科他们，弄错了吧——你别急，等我去问问看”。

等了一星期，不见消息，再等一星期，毫无动静。一日三餐，都与胡可、杜烽同桌而食，他们一个支书，一个党小组长，消息竟打听不来，我也就知道：不能再问了，他们是没有办法解释的。

心中大乱，“八字方法”也失灵，我必须面对全新的“现实”了。人往哪儿去？家庭怎么办？孩子往哪儿安插？……特别糟心的是那则广告，它覆盖全国，我父亲，我姐姐，我妹妹，都可能看见，而他们都是追随党多年的铁杆红人，都曾为有我这么个亲人自豪过。尤其是我姐姐，自 4 岁失去母亲之后，是她把我拉扯大的，一向把我的荣辱看成她的荣辱。这可好，霎时之间，我变成了一个可耻的“右派”，一个“反革命”，一个“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她将怎么“迎接”这个消息呢（后来正式消息到达，她果然一下昏厥 4 个小时，落一身大病）？

大约因为“疯”过一次了，有了免疫力，尽管心乱如麻，倒还能够稳住。人在无可奈何之时，也就“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又等了三四个星期，依然没有动静。为招惹点什么以欺骗自己，消磨岁月，便把电影剧本拿给黄宗江看，请他提提意见。黄看了，带着满脸怜悯，说：“写得不错，提不出意见。”因见我十分狐疑，又补充说：“真的，不骗你，可以说在水平线之上。”其实即使是“真的”，我也没有心思去丈量他含意的轻重了。

不断去转转琉璃厂，打算让齐白石徐悲鸿们帮我打发那无尽的岁月。《将军向我们走来》已收进抽屉，喊杀连天的腾腾烈火，早告熄灭，谁知日后还有机会“拾”起它来吗？——唉，在此后的年月里，我还真有两次机会重新写它：一次是在1963年，好不容易请了半年假，刚写了两万字，保定发了特大洪水，过后，被市委书记点名调出，命令写“抗洪救灾”的大型剧本。这一写，就写到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一来，一切“砸烂”。第二次是1973年，“造反”进入武斗高潮，我无资格参与武斗，刚刚趁“逍遥”时期再次动笔，谁知“红色政权”诞生了，又命令我去写“本市的革命样板戏”，大块时间又被剥夺。在进入新时期的前二年，也是个机会，但文坛上“新潮”涌起，花样翻新，令人眼花缭乱。某出版社编辑当面对我说：“写战争？现在谁看那个！”心下犹疑，蹉跎两年，忽地当起官来，于是加速度地跌入老年，只剩下徒唤奈何的力气了。命运啊命运，你是多么的无情与暴虐！

等到1958年的9月25日，“结果”终于来了。支部书记杜烽和支委周洁夫，进了我的屋子，很严肃，有点想笑，也有点惶恐，没有寒暄，代表组织出示两份文件，说：“你的问题，党委已经作了决定，都在文件上。你要同意呢，就在上头签个字；不同意呢，也可以提出上告。”我拿起第一份文件，是总政机关党委的“决定”，文曰：“由于徐光耀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剥夺军衔，降职降薪（降为行政十七级），转地方另行分配工作。”干净利落，无其它说明。第二份文件是军事法庭的军法“判决书”，除没有“开除党籍”一句外，其余完全相同。

心上“蹦蹦”一阵乱跳，只觉大地忽然开裂，我像块石头一样往下沉坠，听得见“刷刷”的声音。还没有沉到底，忽

有了第一个反应：啊，“判决书”！在六年锄奸工作中，我写过不少“判决书”，那都是给别人定罪的，想不到当兵入党 20 年，自己也上了“判决书”了……

我还是向杜、周提了一个问题：“文件上只说‘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没有具体事实（我过去写‘判决书’是要把全部犯罪事实都写上去的），定我右派，到底是根据什么呢？”回答是意外的巧妙，一句话就把我堵死了：“就是根据你的‘自我检查’啊。”是的，千真万确，是我自己写上了“反党”的，是自己把脖子伸进了绳套，白纸黑字，还有何说？他二位见我愣在茫然中，又补充一句：“主要的，是你给丁玲翻案，是那封信——”幸亏有这个补充，使我知道了犯罪由头。

后来在保定，大街上碰到一位已经很熟的业余工人作者，劈头问：“老徐，听说你是自个儿花了八百块钱买了顶右派帽子戴，是真的么？”我笑笑，想纠正他“八百”是七百之误，又一想不对，忙说：“恐怕是瞎传。我戴‘帽子’，是因为给丁玲翻案。”这个回答，就是根据官方的解释。

他二人又重复提醒：“你不同意，可以上告。”我立即坚决回答：“不，我不上告，我同意。”党章不顾，宪法不顾，事实不顾，根本不讲道理，我上告，找着再抹我三级么？

两眼一阵发黑，我拉过文件，往上签名。又听到一个朦朦胧胧的声音，像是劝告：“你不要抱幻想，这次运动有规定：一律不准搞复查、甄别，定了就是定了，不许动！这是真的。”即使在朦胧中，我也认为这不可能。我当共产党 20 年，向来“有错必纠”，怎么会兴出这么反常情的规定呢？于是根本不予理睬。

然而，这竟是铁的事实。22 年确乎无人敢动，便是见证。也可见他二人的话是有文件根据的。事情既已开头，有其一必有其二，刚刚翻过年来，这一招就又用在了彭（德怀）黄（克诚）

张（闻天）周（小舟）身上。后来的刘少奇，是“永远开除出党”的。我当年多么天真啊！

我又问：“需要上缴什么东西？”我预计会没收校官礼服和“独立自由”及“解放”两枚勋章。那礼服的领口袖口，都绣有华丽的金边，灿然耀眼，“右派”是绝不可以上身的。然而只收了肩章领章和武装带，其他给留下了。至于去向，他们说，我会被“分配”去保定，这使我很感安慰，不去北大荒或团泊洼，却发往保定，我妻子、岳母、大女儿，都在那里，可以互为依傍。对一个“发配”的人来说，很算得上是优厚的了。

但是，接着又一个晴天霹雳：叫我国庆节前，把家整个儿搬到保定去。原因是上级有指示：“凡戴了‘帽子’的，一律不准在北京过国庆”！我的天！距国庆只有5天了，我一个“双开除”的“右派”，两手空空，保定还不知情，这样一个倒霉透了的散乱摊子，我怎么“飞”得动呢？只好要命有一条了！

杜、周也很为难。踌躇再三，也算是“天无绝人之路”吧，他二人提议：我自己先去保定报到，抓紧把家事也安排一下，待过了国庆，再向组织说明情况，请假回京搬家。

不错，这是走得通的，得救了。向二人表示了感谢。

隔了一天，即1958年9月27日，正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我由一名大尉监护着，上了南下的火车。大尉谨慎而温和，使我感到是“监护”而非“监押”，更打消了“董超薛霸”的影子。开车不久，播放了一首儿歌，动听而嘹亮：“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我向来喜欢这首歌，今日听了，却差点掉下泪来。可是，渐暗的天色，又使我想到中秋圆月，心想，人虽已从北京“起”出来，今晚却可以同妻子过个团圆节了。谁知车到保定，大尉很神速地从忙于过节的市人委那里开个条子出来：“直送保定农场。”我一愣，忙问，“‘决定’上说的

是‘转地方另行分配工作’，怎么送农场？”回答是：“市人委同志说了，你们这个，都是先送农场。”

格外大格外圆的中秋月跳上屋顶时，我已进入保定农场。这儿拥有 400 个“右派”劳动大军，我立即被编入一连一排。副连长指着一份锄、镐、锹、钁说：“这是你的。”

故事告了一个段落，可并没有结束。这时我 33 岁，到 1979 年“改正”，还有 22 年。中间经过“劳动改造”，“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四清”以至“文化大革命”，还有一长串“故事”。“改正”时，我已 54 岁，如今又过 20 年，垂垂老矣，天知道还能写得出来吗？

仍有些小疑惑在心头逗留不去。其一是，虽说我写过一本书，但农村小学四年，自幼当兵打仗，实在说不上是知识分子。何苦必欲“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而后快呢？就说秦始皇坑了 460 个儒，还不过瘾，非要再“坑”个样儿出来不可，也应分分敌我友吧？到 1979 年，胡可才告诉我：本来 1958 年 6 月就定了给我戴“帽”的（所以才发生了《人民日报》的广告和扣工资的事），因支部大多数人不同意，打报告上顶，顶了三次，还是得戴。为什么对自己人下此狠手？让中国人普遍的聪明一点不好吗？凭什么断定“知识越多越反动”，为什么非要跟“知识”势不两立呢？

其二，戴了“帽子”是“右派”，1959 年保定农场给我摘了“帽子”，又称为“摘帽右派”，因此一条，“文革”中把我归入“黑五类”，“遣返回乡”，打回老家务农去了。1979 年“改正”（不是平反）后，却又有“改正右派”一说：保定有位安姓文化局长，打报告申请住房，一位贾姓宣传部长批道：“安伟，14 级，副局长，改正右派。请帮助解决住房困难。”据说这

并非个别例子。此项“名目”一立，人们就会把不管什么脏事烂事，都往我们身上乱贴，因为已是轻车熟路，成了“惯性”。冤了这么多年，所扣工资不补，株连妻儿活该，不准重新参军，没收信件不还，犹有说也，难道这“右派”阴魂，必要追随我们直到入土吗？

当然，这只算是个人琐事，非常渺小，说起来也很没有意思。但若回顾整个“反右派”运动，可就不能采取这种轻薄态度了。众多冤案，还在其次，看看它的效能和后果，才是最为值得的。

凡敢提意见、讲真话的，一律头朝下了；说假话之风，随着“大跃进”的兴起，满天飞舞，横扫了一切。各色“卫星”纷纷上天：小麦亩产5500斤，红薯亩产60万斤，稻穗上站着人的照片发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小土群”胜过大洋炉，“钢铁元帅升帐”，到处“热火朝天，形势大好”。可是，老百姓砍了一人高的玉米栽红薯，砸了饭锅“炼钢铁”，拆了民居建食堂，抽出柁檩去烧火……这些疯狂的胡作非为，非只一时一地，都是大小干部带头、或逼人干出来的。为什么？难道都失去理性、丧尽天良了吗？我的故乡，在一些非常好的干部中流传这么个口号：“要命不要脸，要脸不要命！把良心夹在胳肢窝里，往缺德那里干吧！”彭德怀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他实在看不下去了，在庐山会议上提了个很温和的意见，立即被定性“反党”，使他也很快懂得了必须“要什么，给什么”。自此之后，“一人之下”的所有高干嘴巴也一律被封。于是，除了培养出林彪这个“马屁精”之外，各种形式的“鸣放”就彻底根绝了。

所以，才来了“三年自然灾害”，才吃了“四大两”，才有“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才使数千万冤魂梦断旷野！……报应来得多么神速啊！

物质的损失，较易补回。至于高尚道德沦丧，精神长城不存，人人成了“违心”的行家，最吃香的是溜须拍马，这诸种大弊，则是极难救治的。一般群众也养成逆来顺受，奴颜媚骨，“阿 Q 精神”变作安慰剂，“顺时听天”成了保命符，如此等等的“窝囊废”现象，不是比毫无筋骨的“葱叶”更可怕么？在这种情况下，连旧社会都有的“文死谏，武死战”，怎能再现？灵魂大幅度扭曲，信仰危机大面积扩散，还怎么挡得住霉变和腐败？！封建主义可以凭借“绝对权威”随意“计白当黑”、“指鹿为马”，而吃苦受罪、水火遭殃的，却是亿万人民。损失如此巨大，性质如此恶劣，在全世界面前大丢其脸，整个民族大滑坡！千古教训，核心只在“说假话”之一端啊！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当我们还“有暇自哀”的时候，应赶快把事情办好，以免“为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就是，对封建主义流毒再也不能容忍了，奴化教育，愚民政策，必须废止。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是最为紧迫的任务。封建主义扫清之日，才是中华民族大放光芒之时！鄙人写此一文的目的，仅仅在此，岂有他哉！

1999 年 7 月 11 日。今之凌晨，中国女足与美国队争夺世界冠军，偶尔失利，大痛于心，草草结束。

1999 年 8 月 7 日，改一遍。

1999 年 9 月 11 日，改讫于石家庄市。

附录一

点击 2000 年报告文学

李炳银

文学在整体上表现着走向边缘化的进程，报告文学尽管是一个例外，但似乎也不能不受文学这种大环境的影响。

2000 年的报告文学创作是在波澜不兴的平常状态下行进和结束的。在这一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中。引起巨大震动的作品不多，但曾经引起人们很大关注的作品，有何建明报告和反思中国高考现状以及这种现状给考生和考生的家长带来沉重压力，给许多人造成精神负担甚至产生悲剧情形的《中国高考报告》；有凌志军真实描述“微软为什么需要中国人，微软的中国人做了什么”的《追随智慧——中国人在微软》；有梅洁用真情实感诉说中国西部女童失学状况以及追问造成这种状况根源的《西部的倾诉》；有陈歆耕对几位现代战争专家及其有关现代战争大趋势研究判断意见进行报告的《战争大趋势》；有周桐淦对一位检察院检察长果敢、机智地同违法犯罪分子进行坚决、巧妙斗争并取

得重要收获事迹进行报告的《法与法的较量》；有李青松怀着复杂的感情描述昔日的伐木人经历沉重的精神和现实生活转变而变成种树人的《告别伐木时代》；有常扬带着某种欣喜报告陕西建立起中国第一所，同时也是世界第一所“罪犯子女儿童村”，尊重罪犯子女人权事迹的《世界第一村》；有老作家徐光耀怀着苦涩感情，沉重“记述一段头朝下脚朝上的历史”生活经历的《昨夜西风凋碧树》；还有已经成书出版了的徐刚追溯描述长江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以及这些历史和文化面临现实危机的长篇作品《长江传》；有张建伟在新的史料支持下对义和团运动作出新解释的《最后的神话》；有李鸣生、岳南追巡“北京人”头盖骨自发现到遗失到寻觅过程的《寻找“北京人”》；有邓贤冒着巨大危险，深入到世界有名的种植销售毒品的“金三角”地区，对在这里从事毒品种植和销售的人们的历史和现实命运进行报告和审视的《流浪金三角》；有林雨纯、郭洪义通过对深圳南岭村二十年巨大变化的描写追问，反映改革开放辉煌成就，表现农民观念、意识和行为变化的《天地男儿》等一些作品。在文学衰退的时期，我们能够有这些报告文学的收获，虽然谈不上兴奋，但观察一下文学创作的左邻右舍的收获情形，我们还是会感到某些欣慰。

在今天的文学环境中，报告文学无疑是最直接，最深入，最具体地同现实社会生活发生联系的创作了。在其它文学创作日益和社会人生的现实状态有所间隔和疏离的时候，报告文学可能是人们通过文学作品认识和感受社会生活的唯一渠道了。在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今天，报告文学总能够为人们在这方面提供不少的帮助。虽然，报告文学在发挥自身优势，真实、快捷、深入、深刻、形象地报告现实社会生活方面还存在着不太令人满意的地方，但是，许多报告文学作家作品所表现出

来的精神和努力依然是很叫人感动的。何建明为了能充分掌握有关高考的资料，对现实的中国高考状况有一个逼近真实的感受和认识，他走访了许多地方，对数百人进行调查；梅洁为了写《西部的倾诉》，一个人在贫瘠荒凉的中国西部，采访调查了六十多天；徐刚为了搞清楚中国的严峻生态现状，深入长江、黄河源头，走进风沙弥漫的风沙线；李青松为了报告全国林业战线的生产和人们的生活精神状况，他几乎跑遍了所有的林区，将林业工人昔日的辉煌和现实的困惑及新的开拓生活，全面具体地作了真实描述——报告文学作家这种神圣的使命精神，这种无私的忧患意识，这种对于前沿思想生活的认知感受，这种积极进取的实际努力，是报告文学不虚飘，包容内容广泛，见解独到深刻，个性精神旗帜不倒的具体表现。尽管报告文学的现实创作存在着不少局限和干扰，出现了某些变型，未能使我们感到很大的满足，但报告文学的精神旗帜不倒。所以，报告文学的远景，必然是美丽和迷人的地方。对此，我们充满信心。

附录二

2000 年中国报告文学参考选目

- | | | |
|-----------|------|---------------|
| 《中国高考报告》 | 何建明 | 《中国作家》第 5 期 |
| 《追随智慧》 | 凌志军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 《西部的倾诉》 | 梅 洁 | 《报告文学》第 7 期 |
| 《战争大趋势》 | 陈歆耕 | 《解放军文艺》第 7 期 |
| 《法与法的较量》 | 周桐淦 | 《中国作家》第 8 期 |
| 《告别伐木时代》 | 李青松 | 《报告文学》第 8 期 |
| 《世界第一村》 | 常 扬 | 《报告文学》第 6 期 |
| 《昨夜西风凋碧树》 | 徐光耀 | 《长城》第 1 期 |
| 《长江传》 | 徐 刚 | 福建教育出版社 |
| 《寻找“北京”人》 | 李鸣生等 | 华夏出版社 |
| 《最后的神话》 | 张建伟 | 《报告文学》第 1—4 期 |
| 《流浪金三角》 | 邓 贤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 《天地男儿》 | 林雨纯等 | 人民日报出版社 |
| 《牧童遥指杏花村》 | 焦祖尧 | 《黄河》第 4 期 |

- | | | |
|---------------|------|---------------|
| 《帝国的黄昏》 | 雷抒雁 | 《报告文学》第 6 期 |
| 《“库尔斯克”号》 | 黄殿伟 | 《解放军文艺》第 10 期 |
| 《罗布泊随笔》 | 朱增泉 | 《人民文学》第 3 期 |
| 《泰国的中国女人》 | 胡 杰 | 《中国作家》第 4 期 |
| 《盗猎揭秘》 | 江 浩 | 《中国作家》第 6 期 |
| 《生命，镌刻在顽石之上》 | 李木生等 | 《十月》第 5 期 |
| 《一个女硕士生的真情独白》 | 石穆海 | 《报告文学》第 11 期 |
| 《协商建国》 | 郝在今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 《智慧风暴》 | 王宏甲 | 新华出版社 |